马前卒
苏拉密
文章选集



少年中国评论

目 录

上部：马前卒文选

下部：苏拉密文选

酒后经济学随笔

想当初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是个纯洁无暇的小男孩（说纯洁是客气的说法，换个方式来形容就是头脑简单，知识贫乏，容易被唬住），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一进大学，我立刻被图书馆吓住了–人类居然能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堆砌那么多的文字！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图书馆是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虽然被纪念的许多人并不配住在里面。当时我读书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除了上点专业课应付考试（确实是应付，大学四年我的平均到课率在10%以下，我可是学工科的），每周去踢三场球，偶尔打打游戏，其余的时间全部都在读书。其中30-40%的时间在读期刊，剩下的时间躺在床上看我借来的书。

大伙看了上一段肯定认为我是个一心读书的好孩子，其实这和我一穷二白的经济情况有直接关系，在大上海，没有什么娱乐不要钱，在工科学校靠嘴皮子骗美女上钩的难度又太大，我只好在图书馆和操场上实现我高中时的誓言——当时我发誓上了大学，一定专心的玩四年。结果，穷人就是这么”玩”的。

都说开卷有益，拼命的看书很快就有了结果。生物学上有个说法似乎叫什么初始痕迹，说是刚出生的小鸭会把看到的第一个足够大的活物件当妈妈，你要是恰好路过的话，小鸭子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即便方向是全聚德。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往脑袋里填东西的时候还是朱总理号称带上一百口棺材当政的年代，市场经济改革风风火火，招招都是大手笔。各种刊物和新书宣传的全是市场的优越性、主张的一律是产权改革，正在激进风头上的南方周末在大学里的影响直追足球与三级片，我这只毛还没长全的小鸭子也就顺着潮流飘了下去。当时的我看到什么都能用西方经济学发通感慨，走在路上看到募集捐款的恐 龙 mm 想到捐款等于降低了受灾地区对灾害成本的预期、减少受捐助人对下一次灾难的敏感性，必须反对；看到马路牙子失修想到该把马路分段私有化，分到每家一段的程度，然后在所有车上刷条型码，建立自动收费系统，让街道老太太在利润的驱动下去开压路机，天天积极的修马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无聊程度和今天猫扑强淫有一拼。

不过，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前几天东南亚海啸，还真有个主流经济学家跳出来高喊捐款不利于对未来防护工程的投资，建议让受灾地区自己承担所有重建工作，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当年的胡思乱想，看来我发昏的时候也有当经济学家的潜力，失业了不怕没有地方混饭吃。

当时和西方经济学一起来轰炸我脑袋的的东西还有不少，我选了门文革史，本来想当消遣混学分，结果来上课的老先生开口就告诉我们他曾是王洪文的邻居，金训华的老师，要用亲身经历痛说家史，我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子何尝见过这种阵势？自然把先生的讲义奉若神明，在这门课上，我得知49年-76年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年代，知道贵族制度要比儒家官僚制先进1000年，知道了自由主义是世界的希望，还有，文革期间杀人如麻，人命不如狗之所以我们能坐在这里装满教室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一言难尽，总之你记住中国人不信上帝，不信自由主义，该着有这场报应就对了。另外一门课的美女教师开始倒不谈这些，只是过了几天就请了个匿名教头过来，自称是戚本立的朋友，曾经一起办过报，上来开讲89事件，听的我心惊肉跳，几乎立刻就想捏住柴 jj 的小手，立刻去美国大使馆求庇护。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在无数自由主义宣传员的说教之下，小鸭子在一年内就变成了最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徒，坚定程度远胜如今论坛上的所有右派。99年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了，我在声讨大会上公开站出来反对游行，不知道如今论坛上有几个自诩右派的朋友能有这个胆量。99年在同济武东路校区的兄弟们可以为此作证，我当时第二个发言，光头，第一条理由是不要以政治影响贸易，第二条似乎说未必没有误会的可能。搁到今天，哪怕是在论坛上，估计敢这么说的人也没几个。另外，要不是老家那边的基督教实在不长进，整天宣传什么世纪末大灾难，让我对所有教会都没有好感，与自由主义者走一路的教会估计早把我发展成下线了。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读的书的作者，给我上课的老师，大多都在80年代受大学教育，自由主义过剩并不意外。可惜如今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了，没有根基的思想要么消亡，要么原教旨化，我正好赶上了中国自由主义原教旨化的开头。

不过，这毕竟是一套成熟的理论，在面对对现实不满，又无法从官僚意识形态中找到答案的青年人时，以骇人听闻的说教来哗众取宠的自由主义还有极大的吸引力，就象这个标题一样。显然，对于愿意思考的青年而言，一个自洽的，能给出完整社会蓝图的理论无论如何要比民族主义美妙的多。至于官僚机器所宣传的那套以社会主义命名的大杂烩，官僚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竞争力基本为0，大可忽略。竞争对手的弱小而不是自身的强大使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

不过，没有经济根基的东西是长不了的，一个世纪之前有人说”30岁以后再当左派是没有脑子”，这句话还是对的，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不少空间可以扩张，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政策还可以鼓励资本去积极的寻求利润。因此，如果眼光局限于一时一地，当时主张自由主义倒未必不是本国人民之福。但在今天，世界市场瓜分基本完毕，西方各国都是用自由主义外套包着垄断集团的板砖来掐架的，中国的资本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民间资本）发现自由主义不再代表效率，张五常和顾雏军的沦落表明在经济上自由主义已经被资本集团当垃圾抛弃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微风也只好在尚未展开时就要下台。我预测一下，剩下的自由主义者，要么随着年纪增长，放弃那份年少轻狂，要么转向神秘主义，从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根基，搞原教旨主义（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把教义本身当唯一的标准和目的，不愿意关心现实）当一个思想彻底疯狂，彻底脱离现实以后，自然会以一些虚幻而不加验证的原则做判别标准，宁可相信书斋里的精妙推导也不愿意相信现实。如果按某些人的简单头脑，把”右派”定义为自由主义者，那么，如今我可以说，10年之后，中国再有30岁以上人的当右派，如果不是宗教信徒，多半就是思考能力欠佳。

扯远了，继续谈我的经济学，我当时的经济学思考很简单，起码不比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更复杂。（张五常逢人便说经济学其实只有两条原则，真是对不起他年轻时写的几本尚可一读的书）在我当时的思考中，总前提自然是人性本恶，然后用自私去解释一切经济行为，能让人们通过自私来合作，谋取利益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反之则是坏制度，必然会损失效率。这种想法保持了好几年，直到伟大的市场经济先行者朱总理用下岗大潮彻底改造了我的家乡，直到我那些曾经认真上学诚实工作的朋友们纷纷在产权改革中自由的去干黑社会，自由的卖淫，自由的跳楼，我才开始感觉似乎有点不对劲。

不过，由于感性因素而产生的置疑并没有立刻扩展到理性方面，因为我找不到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问题。这也很好解释–一种理论要想唬人，自恰是最重要的美德。我的一个朋

友曾经认为自己一句话可以问住算命先生：”你要真会算命，为什么自己不去买彩票？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老爸找块好坟地？”不料算命先生早有准备，从容回答：”算命先生是靠易经吃饭的，易经讲究人卦合一，只有让起卦者自己也在易理计算之内，才能给你算的准。一旦给自己算命，算命人和被算人重叠，根本无法起卦，自然也就不准了。”问了几个，都是如此，看来这个行业已经为此准备了标准答案，有一个算命先生还用物理学中的观测影响和测不准原理来从高层次阐述，说的我那个同学招架不住，落荒而逃。这个例子说明，想在一个成熟理论内部找茬踢场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鉴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如此之多的人的谋生之道，它必然早就为各种质疑准备好了标准反击套路。凡是新兴地区在自由贸易和私有产权下出问题的，应解释为是市场化还不够；至于正在市场化的地区问题越来越多，要么是计划经济遗毒厉害，要么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刻。总之理论没有问题，一切问题在于对理想状态贴的不够紧，因为理论的基础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如此明显，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证明。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

理性的置疑从细节开始，首先是 GDP 问题：我一直在各种刊物上看到类似的说法，说中国人均 GDP 是如何之低。然后还有类似数据，说中国人均的教育投入是世界倒数第几云云。然而，我有不少同学朋友在高薪的诱惑下去了非洲、西亚、拉丁美洲打工，从他们那里我可以得到一些直观资料。按他们的描述，高薪自然不是白给的，他们经常要冒着冷枪施工，经常被派到瘟疫频发的地区搞商业，环境非常艰苦。在他们的观察中，许多国家的 GDP 颇为不低，人均数额比中国高许多，但大部分平民住在简易房里，吃非常简单的食物，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受教育是奢侈品，学校老师大部分是兼职。从全国来看，我的家乡绝对是落后地区，但普通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与许多人均 GDP 远高于中国的第三世界相比，还要强许多，即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问题和贫富差距也是如此。后来读到的许多游记、新闻也验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国内，从人均 GDP 来看，长江三角洲许多地区的经济水平十倍于内地，但就我接触到的当地居民来看，收入至多是内地平民的2-3倍左右，考虑到物价差距，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完全不能用 GDP 差距来评价。同时，许多沿海地区的 GDP 年增长率高达10%甚至20%，如果生活水平按这个数字增长，即便物价被锁定，人均收入也应该在短短几年内翻番，但人均收入事实上基本稳定。后来，当我发现大部分沿海地区为了避税而少报 GDP，内地官员为了政绩而浮夸 GDP 时，这个问题就更让我困惑了。

国际经济中的一些矛盾是让我对西方经济学产生怀疑的第二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无论按照哪种西方经济学理论，让劳动力这种经济要素象资本和商品一样自由流动的都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让效率最大化。但事实上，每天高喊自由贸易并不惜用武力捍卫这个原则的西方国家坚决拒绝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某些农业领域也是如此。难道这不是拒绝互惠互利吗？还有，随着阅读领域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我发现比中国富裕多的西方并没有象主流经济学家描绘的那样更倾向于用更大的贫富差距，更清晰的产权来刺激工作积极性。发达国家的平等程度、福利水平远高于中国，而所谓用产权保证效率，在充斥着基金、大集团、企业官僚的西方社会更无从谈起。许多文章还曾经谈到国民素质与效率的问题，但从我接触的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居民并没有显著的差别，都有勤劳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有懒汉，有聪明的工程师，也有笨蛋，而且比例上是差不多的。（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人，在普通日本人中，吃里扒外，偷懒耍滑者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

家）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主流舆论所指出的那些导致中国相对落后的因素越来越不相信。

在大二以后，我的思想逐渐转向左翼，原因不限于前面两个理由。意识形态上的许多东西不是用逻辑可以说清楚的，这篇文章是随手乱写，不想引起过多的争论，就不多说了。不过，虽然我发现了许多矛盾的地方，虽然事实证明在许多地方计划经济很有效率，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传统文献拼命论证传统苏式经济的效率。我依然不能在逻辑上找到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在许多问题上，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自己抽自己的耳光，但我找不出原因，更找不到替代理论。所以，我对此前所有的左派经济学理论都不甚感冒。

转折点出现在03年-04年，这必须感谢网络的作用，在强国论坛我看到了钟庆（“愚蠢小猪”这个 ID 应该更有名气）的《刷盘子-读书》系列文章，立刻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先是发现这个系列的文章与事实贴的很紧，然后看到了许多从来未曾见过的材料，比如日本产经联与日本政治经济的关系，再回头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觉得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经济。这种新的解释方式还没有被明确的给出来，但通过那几个月的思考，我看到了新理论框架的轮廓。

与其他人批判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不同，钟庆很明智的没有去探讨经济人假设问题——那是个永远没有结果的讨论，你不能指望在网上扔几块砖头就解决历代高僧大德都说不清楚的人性问题。他只是用亲身经历和强烈的对比告诉你，发达国家，尤其是进步最快的日本根本不搞什么自由市场、明确产权。然后他越扯越远，根本不在逻辑推理上做文章，而是转到了他最熟悉的工程技术领域，讲起了工程师的常识，目的是告诉你为什么整天赔钱造坏帐的大集团却往往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钟庆用工程思想和统计分析来搞经济学，从事实而不是从基本假设出发，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完全相反，但他却讲的头头是道，在 BBS 上所向披靡，赢得无数叫好，我从中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要找一个理论的问题，绝对不能沿着原有理论的构造方式去找。正如前文所述，成熟的理论都是自恰的，你按原来的思路去找问题，肯定一无所获。于是我换了个思路，不去找逻辑问题也不探讨基本假设，而是从事实出发，看看这个理论有那些默认事实是有问题的，从此茅塞顿开，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我彻底扔掉了头几年的虚妄思想。

罗嗦了这么多，开始说正题，现有主流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由市场的信徒在逻辑推导上是对的。如果所有人把收益最大化当作目标，如果所有财产都清晰的量化到个人，如果人们可以自由的传递信息，那么，一个允许人们随意交换财产和劳动的自由市场制度会自发的让社会资源配置产生优化倾向。社会将不断的把人和物资都送到能让它们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去，这个结论其实只用了小学生就能理解的简单逻辑推理，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理论描述的是一个趋向，它告诉我们自由市场将导向最大效率，但一个定性而不定量的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要用多长时间让我们的社会达到最大效率，不能给出一个效率—时间曲线，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本身产生效率的效率。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真实的社会，考察信息传递的效率、人类理性判断的速度，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运行方式，然后才可能给出一个近似的结论。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智力，他们没有把社会学数据导入自己理论的能力和愿望，自然只能用定性的结论去大话唬人。

当然，即便考虑到社会的摩擦，考虑到达到最有效率的平衡需要时间，我们必须承认趋向本身是存在的，只要我们等上足够长的时间，总能得到最优结果。但是，这里包含着一个隐含前提——社会和自然条件在这期间不变。打个比方，我们知道放在地上的小球会滚向最低点，但如果地面在起伏不定，小球在滚到一个最低点以前就可能发现自己滚过去的方向并非现在的最低点，小球因此会在惯性下冲上一个小山头也说不定。同样，社会和自然条件总是在变化的，气候在变、社会组织在变、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出生和死去，获得遗产的人未必有死者的能力和愿望………我们必须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所处的状态究竟离最优点有多远。

气候变化并不快，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也需要积累，个体的死亡和出生只是细节问题，老练的经济学家可以争辩说自由市场的状态总是离实际理想点很近。但当我们把工业技术的进步纳入考虑，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高速的技术进步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手工业，任何劳动方式的变革都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以至于父子相继成为许多职业的常态。人们不需要到学校去学习基本科学知识和最新的技术操作，只需要了解父辈的技能和习惯就足以养活自己和老婆孩子。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战争和频繁的外来干涉，几乎是不变的，有充足的时间去优化经济结构，正是自由市场理论的用武之地。

不过，欧亚大陆的传统农业社会只是在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才真正靠近代火器和稠密的人口压倒了北部大草原或阿拉伯沙漠中的牧民。在此之前，所有的大国要么把和蛮族作战当做一种经常性任务，要么干脆本身就是蛮族建立的半军事纳贡制国家。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政治—军事组织积极介入农业经济，对财富和人力的使用作出干涉，因为不这样做的大国都必然会遭到军事上的毁灭。

另外，直到蒙古入侵所带来的人口波动结束，人口才第一次基本填满了旧大陆上适合人畜力耕作的地区，从这时起，直到美洲大陆被大规模开发，没有大块的地区被旧大陆的农民开垦，自然资源的供给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蒙古毁灭的西南亚农业地区从未得到恢复）。所以最接近于农业自由市场的社会都存在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比如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比如中国的宋、清两朝。在这种社会中，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但相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来说，比例非常低，社会有足够的时间将自身调整到最优结构，亚当斯密式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在这种社会里形成的；在中国，虽然没有亚当斯密，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远离积极干涉的法家思想，无为和间接干涉成为了默认的准则。

工业革命是个转折点，我这里说的工业革命，不是某些人为了证明西方的天命所归而上溯到中世纪的广义工业革命，而是以蒸汽机、金属切削机床、铁路为标志，开始于18世纪末的狭义工业革命。从这时起，重工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只要保证有限的人力和粮食供应，可以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传统经济部门进行独立发展，能够独立提高自身的精度、生产规模，为精确量化的科学实验提供仪器，从而促进科学发展。当然，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重工业可以为所有其他消费品工业提供各种新式设备和生产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了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

对于重工业以外的所有经济部门，这相当于外部条件在不断变化，于是资源和人力分配的最优点也在不断变化。虽然伟大的市场压力和经济人追逐利益的趋向会促使社会资源

分配不断的向新出现的平衡点移动，但在工业时代，新技术出现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最近的几代人在一生之内就可以看到数次工业革命。这就出现了新问题——市场经济究竟能否在平衡点再次移动以前就把社会推到这个最优点？如果不能，那么这将带来多大的效率损失？这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家从来未曾考虑过，也不愿意考虑的问题。

前面这个问题先放下不论，换个角度来考虑：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言，各个部门都基本达到了长期供需平衡，没有哪种部门具有特别突出的特性，没有哪种产品长期稀缺，所有产业部门之间是平等的。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新出现的重工业部门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对它的需求，如武器铸造等（好象有个历史学家说过，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成规模的金属铸造和铸炮扩军是同义词，谁说的我忘了。），而且通过拓展人类的产方式不断制造自身的需求。设计第一段铁路的人本意只是拉矿车，但铁路一旦出现，各个产业部门都发现自己可以从中得益。同样，能够制造自身的金属机床一出现，原来很少不需要金属部件或精确加工部件的传统产业部门都发现自己需要这个东西。重工业就这样成了经济的发动机——不是通过提高原有生产结构的效率，而是通过在原有的生产体系之外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如果重工业的发展有个极限，那么，一旦人类达到了这个极限，随着重工业的规模满足了全部现有需求，这个产业也就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重新成为普通部门。但就目前而言，这个极限还远远没有达到，所以重工业依然能够不断的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断的创造新的经济空间，不断的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平衡。其他产业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它们的发展上限是由重工业水平决定的，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现状来看，重工业起码还能在下一个世纪里维系这种特殊地位。这是所有西方经济学的拥护者从来不谈的一个问题，当然，以他们僵化的脑袋，未必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

重工业还有其他一些特性：

首先，由于重工业并不直接生产消费品，所以这个产业离实际的市场需求相对较远。

其次，重工业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

虽然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并不是每天都跑到大街上做市场调查，但他们知道在保持可靠性的前提下，不断的提高电子产品的运算速度，提高集成电路的密度是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种判断不需要时刻用市场来检验，隔几年检查一下就够了。

第三，重工业的基本类型是固定的。

扩大负熵来源和提高负熵物资的利用效率是从来没变过的方向。（只学过经济人假设不学物理学的大师们，去读读初等物理教科书吧，理解我这里的大白话一点也不难，如果实在没那个阅读能力，就勉强把负熵理解为能源也可以）工业革命的启动就是从煤矿和机床发起的，如今依然没有脱离这两个方向。这是因为人类是生物，一切经济活动其实都是利用负熵的活动，所以扩大负熵来源和提高负熵利用效率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水平，其他的细节问题才是经济制度该解决的问题。

从这三个特征，估计读者能看到点问题了。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发展经济有两种选择：

一是轰轰烈烈的开展市场经济运动，就象蒋介石和总设计师先后干过的那样。先让资源在现有水平下达到平衡，达到最大效率，然后让各个企业去自己揣摩，一点点的走发达

国家的老路，用频繁的试错法来提高技术水平。技术每提高一点，赶快就用市场优化资源，让资源达到最优。

另外一种方式是不管什么效率配置效率，用行政手段强行从各个经济部门收集资源，只要剩下的资源够吃够穿就成。然后按照可预测可计划的重工业发展方向（在已经存在更发达的工业国家时，预测就改为学习），用计划手段提高重工业水平，让重工业水平超越其他产业部门的需求（当然也就没有效率）去发展。然后才逐渐放开市场，让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重工业为其他产业提供工业物资，让其他产业在这个技术水平上去造消费品，去按市场配置资源。

按照我们前面的讨论，两种方式各有优劣。

第一种方式的问题是重工业必须在需求刺激下发展，技术水平停滞，各个产业部门在低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比如1800年的中国就很平衡）。由于市场充分作用，技术进展缓慢，这种方式能把各个技术水平下的效率达到极限。但是，与重工业潜在的发展可能所提供的机遇相比，这种经济模式的平衡点只是当前的最优点，远不是潜在的最优秀点。

第二种方式的问题是把财富积压在不能吃不用用的重工业上。只有等重工业成熟了才回头支持其他产业，在这以前，社会因为耗费资源建设重工业，还因为资源配置被行政力量干涉而损失了大量效率。优点则是重工业上来以后，其他产业很轻松的可以提高效率，人们不必很辛苦的在市场里时刻拼杀，哪怕懒散一点也不要紧，反正支撑效率的是重工业创造的外部条件的提高，而不是人们在自私下拼命劳作的效率。

两种方式的收益和成本上面已经定性的讨论过了，究竟谁好谁坏呢？空口无凭，要么量化的精确讨论，要么在现实中比较。可惜现在的经济学家们两样都不会干，只会端个大喇叭，无视这些问题，坐在高处坚守自己的“原则”。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计划经济执行了一代人的时间，虽然还没来得及把重工业里积攒的财富释放出来就倒台了，但依然让人均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让人口增加了两倍多（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人口出生率也不比49年前更高，人口的增长来自死亡率下降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普及了中等教育。这个效率从长期来看是不低的。至于苏联，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中间有一次内战和一次世界大战，残酷性都是世界罕见的）在一个到处都是穷困农民的国家普及了别墅和小汽车，顺便还建设了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效率更为可观。如果看现实社会，越是发达的国家，重工业的计划水平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高，效率来自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是靠生存竞争逼迫出来的效率（最好的样板就是日本）。究竟哪种经济更符合这个世界，读者可以自己给个结论。

写到这里，我可以用大白话把西方经济学的要害说一下。

第一，这个理论只告诉我们市场有优化资源的趋向，不能说明要用多长时间和代价来优化资源。尤其不能说明在最优点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能不能达到最优点，或是和最优点的平均距离是多少。除非市场的信息交换成本为0，建立各种经济组织的时间为0、成本为0，否则市场经济的假设永远要修正。

第二，现实工业社会好象非要和西方经济学作对，重工业体系的特殊地位和发展速度始终让经济系统的外部条件和西方经济学的理想状态相差很远。远到一个根本不管市场规

律的国家可以当超级大国（苏联），一个不存在私人大企业的国家可以成为产业中心（日本）。

如果你读懂了这两点，回头再看西方经济学，相信你会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当然，人家发展到那么烦琐，那么精巧也是很不容易地，大家要象尊重神学那样保持对西方经济学的低线尊重，尊重它的生存权。有朝一日，当技术进步停滞，当我们复古回到农业社会，我们还可以翻出来当经验用。

其实，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已经用实际行动违背了西方经济学，这充分说明商人们比教授强多了，现实就是能促进理智的发育。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企业的存在：在一个理想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是不存在企业的，所有人都当个体户最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任何不是计件工资的雇佣都会导致劳动者的劳动与利益不能100%的成正比。按照经济学原则，所有被雇佣者都会耍滑偷懒多拿多占，只有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是个体户，通过无数的复杂契约和交换来完成从刮胡子、耪地到造航天飞机修长城的所有工作显然最符合效率——没有监督成本，自私会解决一切问题。但除非世界稳定1000年，没有人死也没人出生，没有任何自然条件变动过，个体户才能占领世界，但只要有一点变化，比如今天可能某个矿采空了，明天可能另外一块耕地一不小心泛了盐，一个好工人死了，接班的儿子不如他熟练…..所有的契约都要重新签定，所有的合作都要重新考虑，我们才能保证社会处于最优点,签定这些契约和建立合作的成本会高的难以想象。所以在充满大大小小的变化的世界里，人类很聪明的建立了超出家庭的经济单位——企业。

只要存在企业，必然会存在内部成本，不管雇你的是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利益大于风险，任何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个人都一定会偷懒、贪污、盗窃。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只有两种选择：A 加强监督，B 增加工资，方法 A 减少了违规的收益（能干的坏事变少了），方法 B 增加了违规风险（被发现后丢掉的是高薪工作），两个方法都需要很大的成本。当然会有人提道德，但据说建筑在道德上的经济学是不可靠的，西方经济学的拥护者告诉我们必须用人性本恶做论证基础。为了规避企业内部成本，有人想出了第三个主意——如果某个经理贪污，干脆把这个部门卖给他，用合同而不是计划指令来完成经济活动。其实这个主意并不高明，近 25年来，中国所有的改革家都想到了这个主意，先是承包，然后抓大放小，搞股份制、MBO，把庞大的工业系统拆成个体户。不过，放眼世界，好象许多企业并不赞成这个主意，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不是无数的中小企业占据了发达国家的主流，这说明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很笨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产生最多的利润、还能操纵政府、颠覆国家、发动战争……这表明，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有成本，而且在许多领域高于大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产生的内部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大型企业就这样占据了竞争优势。

具体说来，是什么东西如此恐怖，以至于让企业宁肯承担巨大的内部成本呢？为什么大型企业宁可承受管理层的高薪，提供超额福利、向管理层分红，也不把腐败的经理们换成平等的合作企业呢？这有许多老套的解释，比如市场上信息交换需要成本、签订合同需要成本、更换合作伙伴需要成本等等。这当然说的都很对，但依然不得要领，大型企业内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必然也有信息交换、人事考评等成本，也有决策失误，而且未必就比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小，所以问题不在这里。企业取代个体户，大企业挤兑小企业必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对现代工业制度有一定的认识（可惜大部分经济学家没有），现代工业体系是靠一整套标准和规范来运行的，整个生产流程，从矿山农场的初级产品到超级市场货架上的商品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让整个系统的效率降到0。绝大部分技术人员的工作并不是发现新理论、新的工作方法，而是做维护、修理、交接等一般性技术工作，保证现有体系不出差错。他们不需要探讨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在已知存在技术可行性的前提下找出执行方案。这和前工业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说，19世纪一个商人如果进错了货，把丝绸从中国长途贩运到英国，发现花纹和质地并不是人们最喜欢的品种，肯定会亏损，但不会血本无归，因为这些货可以降价出售，收回不少成本。同样如果是煤炭、木材等大宗商品，经营失误或数量出差错也会带来损失，绝对赔光的可能性很小。当今社会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运一船化工原料到某大公司的专用港口，到港后发现质量达不到要求，或是检测标准有微小差别，对方会不会降价收购呢？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拒绝接这批货，因为化学性质的微小差别可能会损害设备导致整个生产流程受损。再换个例子，火车轨距的确定是历史习惯的产物，如果这个数字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未必就比现在坏，没准还会更好。但如果你造了一批轨距与标准轨距差一厘米的车头，无论车头的性能多么好，无论价格多合理，也不会有任何铁路公司来买你的车头——除非是当废铁收购。这两个例子其实说的是一件事——现代工业需要的是一个整体合理、各部分配合严密的工业体系，而不是每个部件都很优秀却无法配合的工业。再找深层原因，其实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现代工业大大拓展了经济涉及的范围，符合物理学和工程学原理的合理选择太多了，但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有限，我们无法把所有可能性的排列组合都试一通，在高昂的选择成本下，挑一个经理智判断离合理化不太远的工业体系来用更符合效率原则。所以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垄断集团往往比小企业更有效率。计划经济不能保证指向最优的选择，但理智保证了选择还是离最优不太远，而且可以保证工业体系可以运转，保证人们可以享受到工业化以来的技术成果。无数个体户和小企业搞市场经济，达成这种信息认同需要太多的时间和成本，可能要几十年才把一个工业体系的细节搞好，但在这以前，大企业已经在建设下一代工业体系了。经济学家理想化的世界很美好，但美好的东西未必有用。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经济学家用自身的无聊为这个论断作出了充分阐述。

继续谈经济问题，开始是重工业和运输业在前一段指出的条件下实现了垄断化，然后是大宗工业和科研，随着计算机的推广、社会统计学的深入，垄断集团开始在服务业和需要多样化服务的产业取得了优势。随手举几个例子，壳牌石油、微软公司、 KFC、默多克的媒体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户和小企业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有！永远会有！，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它们的份额还会越来越小，前几年我还以为大集团无法承受小商店和小饭店的管理成本，如今我所居住的城市大街上满是连锁便利店和连锁快餐，传统的小卖部和小饭店哪怕在茶叶蛋和早餐市场上都敌不过社会统计数据指导下的大集团，下一步还有什么产业沦陷给垄断产业还很难说。

有的读者读到这里还会自作聪明，说：难道不能让小企业之间按照一个制定好的技术规范去发展吗？在技术规范内自由竞争，既能避免内部成本又能保证各个工业部门互相严密配合。能有这种想法说明你是开窍了，但开的不够。在技术足够成熟的产业内，这种想法是不错的，如果某个部件的技术标准十年不变，肯定会有街道小厂来造它，这种厂子我在浙江见的太多了。这也符合我前面指出过的：技术停滞的地方市场经济才有活路。但现

实社会技术日新月异，大集团不反对让小企业来干这种简单劳动，大集团自己集中精力来管理最有利益的部分——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或者是开发新技术，或者是优化现有工业体系，或是应对社会的变化改变生产模式，一旦工业体系稍有变化，那些搞简单生产的小厂子立刻完蛋，必须从头开始当打工崽不说，原来积累在技术和设备上的投资也一下子变成废铁。有句被说烂了的话：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专利，三流企业做品牌，四流企业做产品。指望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吃市场经济饭的企业，在技术天天翻新的今天永远是三四流。

说到这里，回过头来看，计划经济的优势在哪里？是资源分配合理吗？显然不是，翻开计划经济的教材，除了空话套话大部分教材几乎用全部篇幅教你做物资（人力、或资金）平衡表，教你如何做的平衡。（插一句，平衡表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二维表，横栏是物资入项，竖栏是出项，X、Y 栏相交的方格里面的数字表示有多少物资从来源 X 分配到需要处 Y,整个表需要保证所有物资都用上）这当然不错，因为做平衡了说明所有物资都被用上了，总比浪费好，但任何分配表，在出入项都确定的前提下依然有无数种填写方式，填平了本身不是目的，让物资分配优化才是目的，但如果出入项都确定了，其实市场分配物资的能力一般会比计划好。薛暮桥孙治方等所谓计划经济学家，和邓总设计师、朱总理等优秀官僚一生不开窍，非要用平衡表去模拟市场，搞市场化计划经济，其实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浪费时间，计划经济的要领根本不在于此。找来苏联计划经济的纲要一看，第一句话开宗明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条原则是突出重点，第二条是物资平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为什么要突出重点？因为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是能优化物资分配效率，而是用人的理智去规划工业核心产业的进步，提高整个工业体系的层次。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优化物资，一般还是市场更合适一点。但现实中中苏计划经济体系，搞到后来官僚专权，没有优秀人才，总是以平衡为目的，识小节不识大体，一点点的引进市场经济追求局部物资分配合理，而不是搞长远的工业发展计划，结果不能扬长又不能避短，倒台是早晚的事情。

说到这里，很多人估计要从我对计划经济的态度来把我归类到左派。对此我必须解释清楚，我自认思想偏左，但这和我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没有半点关系。计划也好，市场也罢，都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选择的结构，目标都是扩张和利润，而不是人类的利益。愚蠢小猪和我合作的很愉快，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极右派，在基本观点上和我是死敌。历史上的几个官僚社会主义大国都是落后国家，需要靠计划来迅速提升工业层次，同时又有发达国家先例可循，因此大搞计划经济，而且不象西方国家那样喜欢在垄断集团外面包层漂亮的装饰品，所以显的左派崇尚计划，右派崇尚市场。其实呢，今天的日本计划经济搞的比任何国家都严重，我不认为那是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官僚社会主义后期，官僚集团已经逐渐转变为垄断资产阶级，这里计划经济也不代表社会主义。将来有一点真的实现了社会主义，农贸市场这种双向透明的市场还是要搞市场经济，我也不认为那是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在技术问题上，傻瓜通常站在两头，聪明人取中庸之道，我自认比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聪明不少的。

关于信仰的随笔

以往经常在有关信仰的帖子里吵架飞砖，都是回帖，慢慢的自己也越想越清楚，这几天有个朋友和我谈信仰，于是把以前的一些零碎思想整理一下，凑篇文章。这纯粹是个人的随想，大家如果喜欢就回个帖子，不喜欢也莫要砸我。

一、定义信仰

什么是信仰？先偷个懒去查查。《辞海》的定义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为之行动的准则。"这个定义显然太简单了。可以用来对付语文考试，但不足以指导个人问题。如今是电脑时代，可以上网查一下（不过要小心，因为这样搜到的网页 1/3 是 FLG 的东西，很容易弄的你暂时断网的）。google 中文自己的定义是"概括地说，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这个看起来差不多了，只是顺序还有点问题。

构成信仰的先是世界观，你如何看这个世界？是看成一个所有人的大竞技场？还是一个需要小心维护的大家庭？或者干脆学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世界无非是上帝的一个试验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宠物，为了去取悦主子而活？这是信仰的基础，将决定你如何构筑下一个层次——个人价值。必须说明，世界观和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无关，我们是人类，有生之年不大有机会离地球表面很远，如果你要在你的世界观里安排一个上帝或是天堂地狱之类的零碎物件，总可以在宇宙某个角落给他们找一个旮旯的。所以，不要指望用什么新发现的观测事实去推翻宗教或是别的什么信仰，除非这个事实能迅速而直接的影响到某人的整个生活。

然后是价值观，许多人可能对这个世界有着相似的看法，但评判各种东西的重要性时则看法不一。最简单的，2 个家伙可能都认为爱情是一切，但除非两人是情敌，否则两个 mm 的不同点将决定他们未来的行为。复杂的，两个教徒可能都认为上帝主宰这个世界，但有的就认为抄家伙去改造那些异教徒的脑袋（改造不了就砍掉）是对上帝最大的尊重，有的则会在家里祈祷，让上帝的神力去对付异端。你认为什么东西最美好，自然就会追什么。

第三层次也就是最具体的层次是人生观，这个比较具体。你有了世界观，而且有了自己的价值标准，然后呢？毕竟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世界观并不能决定一切。你把一块火腿放在门口，猫和狗都喜欢，但跑过去的方式肯定不一样，狗是小心的过去，仔细检查无误后当场大嚼，猫则是直冲上去，叼到一边慢慢享用。人也如此，有人刚强、有人懦弱，有人多疑、有人从不后悔，性格显然会影响你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

三个层次都定下来，信仰也就定了，一般人确定信仰也都是这个过程，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则正好相反：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自然先用惯用的人生观来做决定，有疑问的时候就要坐下来仔细考虑"值不值得？"，如果发现价值判定也出了问题，就该考虑世道是不是在变，当你确定世道发生了变化，整个信仰也就被修正了。这三个层次区分并不十分严格，互相有一些交叉，但总的来说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一个信仰。

二、信仰的特点

信仰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终极性，它本身是所有事物的判别标准，因此说一个信仰“好”或者“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别人既然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对于他而言，就只能拿这个价值体系来评判一切，你以你自己的信仰体系为出发点做出的判断，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苦修者拒绝一切文明社会的享受赤身裸体，素食露宿，甚至损害自己的身体，可能会以常人的眼光认为这是个“坏”信仰。但在信徒看来，在他的弟子和教友看来，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两种信仰体系不能互相换算，我原来还不认同这个概念，后来去藏区时候看到磕长头的藏民，从此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理解，再后来读书看到英国人禁止殖民地土人殉葬，寡妇自焚，结果引发暴动也就不奇怪了。

终极标准意味着信仰不是工具，你不可以用利益的眼光去看信仰，哪怕这个利益很大，很高尚。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信了某个教以后心情很好，身体也好，脾气变好，进而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你就要去信他；或者某个牧师告诉你信教可以受庇护，可以心想事成，你就要皈依。这都是很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在用现在的信仰去评判你将要接受的信仰，把信仰当成了工具，如果你能通过信某个东西得到利益，得到了你自然不再需要它，如果你没得到，那么你会生出怨恨。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频繁改变信仰的痛苦和亵渎信仰的失落感都不会好受的。

信仰不是很高深的东西，你在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情，扣除随机性以后，其实都是出自你的信仰体系。举个例子：有个项目，公司要求最好明天能做完，偏偏你今天身体不舒服，那么你会加班到几点呢？这其实就涉及到你的世界观——如何看待事业、他人的利益、信任、责任和个人利益，然后是价值观——如何在衡量这几样东西的轻重，然后你的性格又决定了你如何具体取舍。当然，一般你感觉不到自己做了这么复杂的思索，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出现，日久天长，人生观已经具体到每一件事情，习惯成自然，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但只要出现新的问题要应对，或是要作出重大决定，你肯定会费点时间，用自己的信仰仔细考虑的。依据信仰做的事情未必让你快乐，但至少可以让你规避你认为最痛苦的事情。

如此说来，所有人都应该有信仰，否则做不了事情，但为何我们经常说某些人无信仰呢？在现代社会这有几个常见原因：

首先，从进化论的观点看，动物无非是传播基因复制基因的一个自动机械，收集资源和占有异性是动物的本能。人脱胎于动物，如果一切遵从本能，不需要建立信仰也可以做出各种决定——让野蛮和欲望指导一切。老祖宗离原始人比较近，因此有“食色，性也”这种深刻总结。到了市场经济社会，资源和异性都可以简单的换算为钞票，某些人把敛、消费财富作为唯一的准则，这种人可算作按本能行事的动物。其实有正常智力的人都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即便是纯粹追逐金钱和欲望的人也并非是简单的靠本能和条件反射行事，只是在他的世界观中，地球就是个弱肉强食的野生动物园，只有金钱、享受和美女（帅哥）才是有价值的，于是虽有信仰，行事与本能行为却并无差别。因此，我们说这种人没有信仰。对于拜物教的信仰者，有无信仰是一样的。通俗点，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太现实，学术点，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符合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实验动物之一。

另外，信仰的根基不稳，频繁变化也会让人痛苦，这会让人觉得自己缺少信仰，不过更确切的说法是缺少稳定的信仰。既然信仰的基础是世界观，那么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特别是一个逐步走入动荡的社会，很容易让人的世界观来回摇摆，个人生活的动荡也经常影响你对世界的看法。晃动的世界观支撑不起稳定的信仰，你对各种事物价值的认识也不断变化，每天都对前一天的认识和作为进行否定，却又无法构筑起更稳定的认识，这将使你感觉总是生活在迷茫和悔恨中。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否定自己和后悔，一个花花公子可能一辈子沉浸于肉欲和享受，一个嫁入豪门的女子可能一直满足于安稳富裕的生活，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可能偶尔会寂寞，但并不会觉得有多么痛苦。但一旦有一天，他们接触并认同了另外一种积极的生活，回首以往的半辈子，其悔恨和痛苦肯定会比破产丧家还厉害。没有稳定的信仰是很难过的，冷静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在这种状态下过的太久，你可能会害怕新的事物，害怕思考，干脆让自己进入一个颓废的状态，要么简单的崇拜欲望和享受，要么否认一切，愤世嫉俗——否认一切当然也是一种信仰，但绝对不会让你幸福。

三、信仰之上

信仰是终极标准，所以讨论高于信仰的事情似乎有点荒谬，不过，既然这里要讨论信仰，就不是讨论我自己的信仰好不好，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把信仰当个社会现象来看。这样，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点规律。

根本规律当然是信仰要自恰，这是废话，因为人是有逻辑的，如果一个理论自己和自己冲突，你或许可以把矛盾掩藏起来去骗别人，但绝对不能让自己相信它是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暂且不论。

然后还是要强调，人是动物，是社会动物，而不是计算机。你可以用一张光盘给计算机装上你指定的操作系统，或是发出一个终极指令，禁止计算机违反它，但你绝对不可能用纯粹灌输的方式让人得到坚定的信仰，社会动物的信仰是要从生活中来的。当然，我不排除一本书或一场电影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可能性，但那是因为这个人此前的生活经历和小说或电影有相似的地方，有共鸣，以前的生活构筑的价值观让他从这个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极大满足或震撼，没有生活基础，不要指望你可以单纯靠思考来选择人生道路。

既然信仰来自生活，那么从宏观来说，生活其实是在信仰之上。作为一个人，你可以说信仰是一切，但作为客观的观测者，还是能够指出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随便举两个例子，古希腊发达城邦的公民居住在当时地中海—黑海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既能剥削奴隶又能通过贸易轻松的取得廉价生活资源，闲暇时间和生存压力较小，所信奉的神灵多是人类或人类组织的象征，乐观而不完美，指导人们过自由、积极的生活（当然限于少数人）。到了罗马末世，蛮族与军阀肆意蹂躏着帝国，安静的生存成为平民的奢望，宣扬天国在来世，这辈子要忍耐的基督教虽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起码可以让人活的不那么痛苦，因此轻松占领西欧。其实拟人化的城邦神灵崇拜和一神论在当时都不是新鲜东西，哪一个占上风是要取决于生活状态的。

在现代社会，起码大部分政府已经宣称信仰自由，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几个政府真能管到人的信仰，但这不意味着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信仰要用来指导生活，不受制约的信仰会伤害到别人，最起码尊重信仰不能是随心所欲的理由。你或许是纯粹环保原教旨主义者，私下认为人类是世界的祸害，但你实现理想的方式若是杀人而不是自杀，这种信仰是肯定不会被尊重的。其实，宽容已经是现存信仰的第一准则。类似的，现在的义务教育法其实就取缔了那些拒绝现代文明的人按自己的愿望教育子女的权利。这种限制其实都是生活对信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对作为终极标准的信仰进行探讨了。

四、工业化社会的信仰

工业化社会和传统社会有三个区别：

一是社会富庶，农业社会大部分人为生存而活，如果你不按父辈祖辈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代价往往是饿死。而在工业社会，第一次有很大比例的人口每天参与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活的更好，许多人从而得到了自由的可能性——即便活的不经济也不至于立刻被生存竞争夺取生命，信仰自由的基础也正在这里。

二是全球的生活开始趋同，起码平民的生活方式、文化、爱好......都不断接近。原因是越来越发达的交通和新式传媒。特别是录音机、唱片、电影、电视、电脑等工业品使传播艺术和文化产品的代价降低，享受艺术的不再一定是贵族。我们平民不仅有了信仰的自由，还有了歌唱自己生活，学着用艺术表达自己感情、传播文化的机会。（不会作曲，还可以做个 flash 看看么）

三是大众教育，原来人类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由于大部分人忙于经济活动以维系生活，不参与生产的未成年人最多接触到自己的邻居。如今的孩子都要去上学，在学校学的东西可能几年不用就忘了，但与大批同龄人的交往经历是一生受用的财富，农业社会从未有过这种事情。包办婚姻的解体，根本原因不在于婚姻法，而在于男女同校的学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许多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从学校里积攒了最初的领导能力。大众教育的影响可谓天翻地覆。

工业社会的新特征对信仰有什么影响呢？一是自由，没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给你在艰苦而一成不变的的生活中灌输信仰，你就要自己去建立信仰，可能很艰难，但自由也带来从未有过的欢乐。二是信仰趋同，小的方面可以有自由，但由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大部分人有了相似的生活感受，从而有了相似的信仰。当然，这是柔性的限制，另类总是存在的，但从概率上分析，大部分人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将趋同。而且被新的平民生活所确定。三是交流增多，以前的信仰要么是从上而下，由你的父辈或传教士、牧师成体系的给你，如今自由的你要和大批的同龄人一起建立类似的信仰，相互之间的影响虽然比不上独立思考重要，但远大于过去自上而下的旧模式。

这三个特征，再加上前面说过的“宽容”，就是工业化社会中信仰的基本特征。

五、如何建立一个“好”的信仰？

前面说了，信仰无好坏，信了就是绝对标准。不过，既然生活创造信仰，那么我应该可以向我的朋友、与我有类似生活经历的同一代人提点建议。（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代出生在工业社会的中国人，70 年代以后生人的年轻人）。

稳定信仰的确立是成熟的标志，少年时期的价值观每天都在变。不过，我们建立信仰所需要的生活经历正是在成熟以前得来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例如：善良、负责、忠诚、忠于爱情、不纵欲、不贪财等等。这些准则来自传统社会，将来可能会变，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们是很难甩掉的东西。信仰自由意味着你可以拒绝它们，但这需要彻底消磨掉我们此前的生活经历，会让你和大部分人格格不入，需要从头建立一套成体系的东西，这都是很痛苦的。中国人强调人性本善，你一定要相信人有原罪，或者认为他人即地狱，也没人不允许，但你得承担代价。另外，工业化带来的普世文明还提供了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宽容，比如说把一定程度物质文明作为生活基础，比如说平等，这些东西也一样很重要，你可以不接受，但对于这些已经深深扎根于文明中的东西，建议你还是要先认真理解再作出取舍。尽管信仰无法用好坏来评价，但就大多数人而言，遵循这种柔性的限制将增加你幸福的概率。

信仰既然来自生活，就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全盘照搬。前面说了，信仰不是工具，可遇不可求。不过，既然一个稳定的信仰要比没有稳定的信仰带来更多的幸福，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我们不去有意制造信仰，而是引导自己早一点确立稳定的信仰还是可能的。

从前面来看，信仰的基础是世界观，建立世界观自然需要接触生活。积极的参与生活显然要比整天窝在床上睡懒觉更有利于创造一个世界观。当然，参与生活不意味着整天扎在人堆里，看书、看电影也一样是参与生活，甚至可以间接的经历别人的人生，不过这一切都要以眼前的世界为基础，没有足够的生活经历，没有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再多的书籍、电影你也只是看个热闹，无法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共鸣。

价值观的建立需要认真的思考，因为人类社会是充满矛盾的，许多事情就是在微妙的平衡上滑动，才让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如果真的事事遂心，想什么来什么，恐怕也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意味着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而不是天上掉馅饼。你要反复掂量，亲情、友情、爱情、事业、家庭、舒适.......这些生活要素的轻重，不光是考虑单个要素的重量，更要衡量他们冲突的时候你如何取舍，最后决定你的理想生活中如何配置各个要素。这恐怕要消耗不少独处的时间，但与一生相比不算什么。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自己写一点东西给自己看，从而帮助自己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写什么都成，小说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理想生活，随笔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潜意识，诗歌则是你最想说的话，写的好坏不重要，因为这是给自己心灵看的。

除了自己思考，多交几个可以谈心的朋友也很重要。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理解你最深处想法的人，这或许有点危险，但一般也会给你带来快乐和心灵上的安全感。生于今天的社会，你有很多的机会交到和自己有类似生活经历的朋友，不要光吃喝娱乐，也应该认真谈谈心，说说彼此一辈子的理想。如果彼此的信仰中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除了能增强感情、信任，还可以反过来让信仰本身有了依托，更稳定。

一个稳定的的信仰肯定需要时时修正，一些基本的东西尽量不变，小的事情若也不变，肯定四处碰壁，只有小处放的开，想法开通而宽容，才能真正把自己的理想维护一生。否则那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可不仅仅是背炸药包的穆斯林，整天什么都看不惯的老太太也是她年轻时价值观的原教旨主义守护者。不过，这种修正毕竟是枝节，年轻的时候，冷静的观察，认真的思考，抓紧已经确立的一些精神财富，尽早给自己的一生做一个不后悔的规划非常重要。

还有，信仰要想是终极标准，就不能太具体，太渺小，否则实现以后失落感很不容易摆脱，而即便一生都追不到理想，老了也会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信仰是比生命和时间都高的东西。为一生做规划，眼光要放远一点。

罗嗦了几千字，暂且就这样了。信仰毕竟是很个人化的东西，说的太详细也没有意义，这些是我的生活经历的总结。要想把这个问题想的清楚，最好还是看看一些流传更广的东西，比如圣经、佛经、共产党宣言、道家经典和一些现代思想流派的总结，还可以看看别人的遗书或自传，应该都有帮助。

良师原来在敌营——向坚守信仰的共产主义者介绍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兼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

九月初，当代中国出版社将出版一本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作者钟庆。此书约 23 万字，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认真读的话，一天即可读完，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 1978 年以来掌握中国政治经济权力的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

在苏联和中国的官僚社会主义相继崩溃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集团迅速向新出现的生存空间扩张，试图接管整个世界；同时，中国、苏联、东欧的官僚资本集团和民间资本集团也组织起来，利用本土优势抢夺利益。在剩余的空间和资源被瓜分干净以前，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是一致的——消灭社会主义残余、压制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新共产主义者的反思，尽可能掠夺旧体制的遗产。但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旧体制的力量和遗产被消灭殆尽，天生有无限扩张趋势的资本集团之间开始了新一轮争夺空间与资源的冲突，摩擦逐步升级。

中国官僚资本集团脱胎于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精英阶层，从 40 年代到 70 年代末，精英们一直受到体制中社会主义因素和少数理想主义化领导人的压制，并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沉重打击；直到 70 年代末彻底掌握政权，这个集团从未有机会公开讨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计划，一旦它们发现自己控制了这个国家，根本不知所措，因此，混乱之余才有“摸石头过河”的荒谬国策。在这种思想真空中，西方浮在表面上的一些政治经济思想、其他第三世界小国做买办的历程、旧农业社会的残余统治经验.....一并被官僚集团拿来应急，这种大杂烩就是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统治集团的思想基础。至于民间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后，完全要从零开始发展，发展历程酷似 400 年前的西方同行，其模糊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接近于西方体系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然而，无论是官僚集团的杂烩还是民间资本的亚当斯密式梦想都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去甚远，在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始终不变的只有追逐利润、无限扩张这一个本性，具体运行规律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如今只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层遮羞布，或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发挥作用。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由于发展受阻碍，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把发展方向从对内掠夺向对外竞争转移，不再甘心做发达国家的附庸，试图利用旧体制留下的遗产为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博得更有利的地位。这时，他们才发现现实的世界远不如想象中美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先发垄断优势，大肆欺压边缘国家的资本集团，当落后国家努力赶上，规则对自己不利时，发达国家又会随时根据自己的利益修改游戏规则。从纺织品壁垒到经济危机后的趁火打劫，再到被强迫修改汇率，残酷的现实和屡次碰壁让中国资产阶级学到了两条教训：一、理想中的世界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弱肉强食是永恒的规律。二、大工业时代要求资本集团内部实行严密的组织，在核心产业中尤其需要压制个人或单个企业的自由竞争，以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号令应对世界市场的风浪。

很显然，由于此前二十年的“主流经济学”与实实在在的教训存在严重冲突，社会产生了对新经济理论的需求。如果说张五常的名誉破产和顾雏军的入狱、张维迎被媒体围攻标志着虚浮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者被资产阶级无情抛弃，《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的出版则代表着新的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开始走向前台。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关心并了解并这一重要事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本书共分 12 章，少数内容是为了顺利出版而添加的应景颂世之作，与主题明显不符，读者当可轻易发现，大可忽略不读，还有一些内容属于应书商的炒作需要而添加的噱头；除此之外，内容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者从一个工程师的个人视角对中国经济的描述与分析。在一至三章中，作者抛弃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评价标准和语言体系，直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中日经济的对比，并由此得出初步的结论——是否能坚持以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建设基干产业，是决定后发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自由贸易和对比较优势原理的推崇只会给后发国家带来灾难。与其他几部分相比，这一部分相对粗浅，事例和逻辑结合的并不严密。因为这几章基本是 BBS 辩论的原文，是作者写作全书的来由。但阅读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思想历程，从而更容易理解后面的主要内容。从绝对信奉自由市场的年轻学生到冷眼旁观的思考者，社会用强烈的对比和沧桑世事教给了作者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第二部分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在第五章中，作者从感性归于理性，对第一部分的粗浅描述做了详细、量化的解释。作者为“重工业体系”、“发达国家”、“基干产业”等主要概念作出了了确切定义，详细介绍了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威力、结构、运行规律，以及现代工业体系的出现后新的经济规律。第六章以近代主要强国从工业革命到二战的历史为研究样本，找出导致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分别取得今天历史地位的原因，总结了各国在工业革命到来时，各种国策的经验教训。第七章是前两章的总结与提高，从最基础的物理因素开始分析，为工业革命对经济规律的冲击做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找出了了西方经济学的致命问题所在，随后作者转向战后社会，用前面总结的现代工业经济规律解释了今天的经济现实，并指出今天落后国家很难通过合作和贸易来改变自身的被剥削地位，只有相对脱离世界贸易体系，才有可能通过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方式取得和西方平等贸易的地位。不过，即便是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的中、苏两国，也因为各种新的阻力而最终失败，今后试图打破现有不平等经济体系，免遭西方垄断集团剥削的国家必须认真吸取这里所给出的中苏两国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完整自恰的理论体系与对现实的详细阐述在这一部分精确的结合，无论读者对本书的观点持何种态度，都应对这一部分，尤其是第七章中所总结的规律、经验、教训给予最大的重视。

本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是第三部分，内容分别是中日比较、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以及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部分重点在于通过对三个不同样本（中、日、东南亚）现状的详细比较，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开了一个剖面，向读者展现了核心发达国家与受剥削、提供简单劳动力与资源的边缘地区之间的鲜明对比。其中第十章对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介绍颇有意思，将包裹在日本垄断集团外面那层民主、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的外衣剥的干干净净，让读者清楚的看到发达国家的深层运行规律，破除了目前主流人群对日本的错误认识。而通过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介绍，我们倒可以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里找到

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市场和私有产权等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制度与结构。这种鲜明对比为第二部分中对现行“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提供了最好的论据。

在第二部分，作者给出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近代分道扬镳的原因——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大工业体系的建立。在最后一部分中，作者不满足于这一结论，继续追溯历史，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近代社会条件决定了大工业的建立？”、以及“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成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作者给出了圆满的解答，非常有新意，为此前史学界所未见。在回答了这个历史问题以后，作者在第十二章提出了更现实的问题：“如何摆脱这种历史宿命？”这一章的第一节通过对工业革命后历史规律的分析首先论证了认识和改变历史方向的可能性，然后依据前几部分的推理与事实，为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今天的惯性方向大为不同的道路——尊重事实，不盲目崇拜经济利润，放弃部分眼前利益，培养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民族精神，集中资源建设自主的基干产业，以国家而不是以企业为单位面对世界竞争。作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开出的药方是否正确，读者可自行判断，这里不再赘述。

全书内容大致如此，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此书最关键的地方有三处。

首先是产权问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相对分散且联系不紧密，在效率的压力下，资本直接选择了资本家作为自己的代表。这个时代的资本家既在法律上拥有自己的企业，又直接控制企业的运行，在广阔的外部扩张空间中奉行最有效率的自由竞争制度，各自向外扩张。强调清晰的私有产权会刺激效率，减少浪费，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的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

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要求各个企业之间密切协作、一致对外，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率和利润。企业不断合并、扩大，庞大的企业集团拥有可与国家相提并论的规模和实力，垄断时代就此到来。在掌握经济霸权的大型垄断集团中，不管股权如何分配，是集中于少数老板还是分散到职工乃至全民，真正的经济控制权已归于经理、工程师、律师、投资顾问等技术官僚。技术官僚不仅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壁垒控制着企业的实际运行，还可以随意的用互相控股、滥发高薪、提高福利等方式消费企业的利润，乃至直接用配股、期权等方式将企业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归于自身，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或者说真实的统治集团。在日本这种因后发而特征明显的国家里，早就在核心产业中消灭了私人产权的作用，企业和关联的银行互相高比例持股，最后还有大比例的国家股份，没有人能说清楚三菱、三井等大集团是属于谁的，最后一个私人大型企业西武铁道已于去年被勒令退市。技术官僚集团实际上拥有一切。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唯一统治者是资本，人类只是利润的附庸，资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人或组织当代表，只取决于利润。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大型经济组织的内部成本还不能压倒因垄断、合并、纪律所节省的资源。那么，由垄断集团或国家机关中的技术官僚作为资本的人化代表就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由垄断集团制定的经济计划也将在核心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领域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复杂化程度不同，资本所选择的组织方式也不同。石油产业、信息产业多是世界规模垄断集团，毛绒玩具厂或袜子车间却适合几十人的小公司，只是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将能创造最大利润的产业集中于本国，留下低水平产业给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才通过不平等交换进行双重剥削——既剥削劳动力，又要在穷国资产阶级的身上另外剥下一层

皮。这就是落后国家反而要比发达国家要更“市场化”，更强调清晰产权与加强个人竞争的缘故。作者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呼吁改造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为新时代的计划经济思想张目，思考堪称深入。

其次是作者认识到了各种产业之间的利润是不一样的。按常理来说，各种产业部门之间本无高低之分，人类要用电脑，也必须吃饭穿衣，在一个各种产业都按照人类需求充分发展的世界上，同样的资金，投入不同的部门，从长期来看回报率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然而，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大的，对于那些进入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后来者很难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赢得一席之地，这就造成了某些产业的相对稀缺，各种产业部门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很显然，无论用哪个学派的经济学知识来推断，自由竞争与不平衡的产业结构相结合，自然会带来利润率的不一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占据了那些相对稀缺的高利润行业，并用包括军事讨伐在内的各种手段排挤其他国家的同行，以保持相对更高的利润率。如果落后国家坚持信奉自由市场的效率原理，坚持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永远也不会有摆脱现有地位的机会。作者在亲身体验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后，终于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产业不平衡问题，矛头直指正风行于中国，让国人以出卖土地、资源和简单劳动力为荣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信正在试图摆脱附庸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会欣赏这种清醒的认识。

最后，作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缓和国内矛盾的手法。相对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竞争压力要小的多，这并不表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愿意压榨本国的下层阶级，而是由于革命的现实威胁和历史记忆，他们更愿意把矛盾转移到国外。在国内维系一定的福利水平固然要减少利润，但为了避免革命，为了保证稳定的长期利润，他们愿意稍微降低一点利润率。
在发达国家，除了那些高利润产业所必须的劳动力，大部分劳动力还是在工业、服务业、农业中从事简单劳动，他们的劳动效率和技术水平与第三世界的同行并无本质差异，如果开放国界，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自由竞争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会迅速的把这些发达国家简单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拉平到世界平均值，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就必须直接面对第三世界常见的革命、暴乱、恶劣的治安，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断用媒体、世界银行、导弹等各种方式强迫别国开放市场，“遵循市场规律”，却绝对不允许劳动力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也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产品“自由”的进入本国市场，这样就保证了本国的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超出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工资福利。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可以对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二级剥削，然后再从剥削利润中分出一部分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资本集团还继续需要国家这层外壳，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是相关的，这也正是民族主义的基础。作者作为一个准民族主义者，极力号召中国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不要把目光局限于国内，不要把国内民众压榨的太过分，认为从国外的无产阶级身上获得剥削收入才是最稳妥的经营之道。这种思考，无论如何要比许多鼠目寸光的土财主要强的多。

本书其实是一本网文合集，又经蹩脚编辑滥加增删，在逻辑推理和考据上还有不少细节问题，但瑕不掩瑜，作者发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指导理论的要害，又以帝国主义的发展经验为蓝本，为中国资产阶级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发达之路，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够资格成为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短期内，这本书可能不会受欢迎，也可能被

禁，但从长期来看，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对本书的内容不感冒的读者可以把书留起来，十年以后再读，一定会有新的认识。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有其局限性——把某个资本集团的利润或效率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混为一谈。具体到这本书，前面指出的三处关键点其实都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

在产权问题上，作者认识到法律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不再代表未来资本主义的方向，但技术官僚的统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是因为发达国家能够从整个世界掠取资源，才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但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人类并没有外星殖民地可剥削，资本主义终有碰到扩张边界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完全交给技术官僚，中苏两国官僚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接下来的事情。

关于不同产品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作者已经能用各个产业部门的不平衡分布来完美的解释。但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全球经济危机所致，而且无法避免，这是楼主不可能看到的角度。无论资本选择哪一种组织结构来完成自身的无限扩张，都是以剥夺无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为代价的，结果就是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超出了社会消费能力。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产业部门不平衡带来的的生产力浪费正好缓和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想要通过创造稀缺生产部门来分享超额利润，正好加深了这个矛盾，阻力大的难以想象，与西方争夺因经济危机而狭小的市场空间的结果可能就是下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作者提出的第三个要点——民族主义，国内共荣，充分的说明了本书的阶级定位，也为前两点的问题做了解释。作者并不真正关心人类社会的未来，也不去考虑资本主义体系的前途，作者真正关心的只是中国企业的繁荣，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象今天美、欧、日的垄断集团一样痛快的斩杀它国企业，同时要求中国资产阶级在发达以后用一部分利润来缓和国内矛盾，以保证利润的稳定可靠。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但现实是否能让作者如愿呢？

从今天的世界局势和国内资产阶级的状态来看，恐怕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为中国资产阶级指出的道路是很难走通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拟订的计划无非是两个步骤：1 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及与之相配合的文化。2 开门大掠，从国外掠夺资源以缓和国内矛盾。最终目标则是让中国资本集团取代老牌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至少是分享世界霸权和利润。这条道路与历史上美、德、日等国的崛起道路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历史上强国的崛起是历史沉淀与时势结合的客观结果，作者在今天却试图说服中国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有意识的创造一次崛起。

既然楼主给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创造帝国主义霸权，那么，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中国与现存的帝国主义强权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作者能看到的问题，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会有人看到；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很清楚，即便帮助中国打破现有秩序，唯一的改变只是统治集团的名称，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必须独自去挑战整个现有秩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指望不上的。再看外部因素，今天的发达国家内部已经不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唯一相对独立的日本因没有独立军备而听命于美国；以前的后发国家都能够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得到工业资源和生存空间，今天的中国资本集团稍有动作却要受到西方的一致追打，举步维艰。

外部条件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阻碍作者梦想成真的最大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资产阶级可以细分为官僚资本集团和民间新兴资本集团。前者得到了遗产中较大的一份，尤其是继承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配套的人力资源控制权，遗憾的是这个集团因为发家容易，缺乏锐气和长远眼光，而且形成已久，在多年的腐败堕落中丧失了全部的名誉，还要背负 20 年来所有失败政策的责任，很有可能在下一场革命中被迅速地打成碎片。即便少数被称为“太子党”的少壮派试图励精图治，也无法改变整个集团的下滑惯性，即便官僚集团有幸生存下去，估计至少还要一代人扭转这种趋势，但到那个时候，估计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已经所剩无几，世界局势也更没有任何突破机会了。

民间新兴资本集团白手起家，即使分得了社会主义的部分遗产，也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盗窃到手，因此这个一直在积极扩张的集团不缺斗志和信心。遗憾的是这个集团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以充当强势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外国资本）的附庸为荣，虽有积极扩张的欲望，但暂时缺乏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能力，对建立独立大工业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眼下也不具备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复兴核心的能力。另外，在外资 20 多年的渗透下，两个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官僚集团大修开发区，贱卖土地；民间资本组织廉价劳动力进行外贸生产，替外资在中国开拓市场打前锋。表面上看中外利润互相依存，但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下，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这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

随着西方压力的渐渐增加，我们可以预计将有更多的资产阶级从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转向作帝国主义的尝试，作者的理论也会越来越受欢迎，但无论如何，自身能力和现实条件已经基本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一方面中国逐步沦为西方的附庸，另一方面中国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遗产的国家，合格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无人可比，中国未来的最大可能是成为介于发达国家与纯粹的边缘地区、资源产地（如南美、非洲、中东）之间的一个中间层次，通过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来维系大部分劳动者的生计、少数买办的奢侈生活。同时有一部分优质资本融入西方体系，登入世界经济金字塔的顶层，但这无关大局。

退一步讲，即便中国资产阶级按作者的设计走上了帝国之路，顺利的取得世界霸权，同时对内缓和矛盾。中国人也不可能过上今天西方那种幸福生活，因为光是中国的 13 亿人口就远远超过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总和，整个世界背不起这样庞大的霸主。如果中国真的以西方模式取得了世界霸权，那么，我们可以庆祝全球革命的同时爆发。因此，虽然作者的思想超出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依然不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真正的转机。

本书是一本符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作品，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左大培就亲自为此书作序，但与以前连篇累牍的“主流经济学”作品相比，它显然更接近现实社会，对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和当代帝国主义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揭露。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清楚的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到自己敌人的思想动向非常有必要，因此我向共产主义者推荐此书。另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许多理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于今天的现实多有不合，比如以单纯的法律归属权作为划分阶级的做法在今天就与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冲突；资产阶级的许多著作在维护阶级利益之余，也揭示了一些客观规律，共产主义者应该去了解它们，充实自己的理论。最后，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留下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教训，如计划经济理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方式等，

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于一个执著于自己的事业的人而言，最狡猾的敌人往往也是最好的老师，本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作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修订工作，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上，具有阶级属性的是完整的经济思想本身，而不是作者或我这样的个人。整个世界每天都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但只有那些符合社会需求且自恰的理论才会受到重视，才有出版传播的机会。对部分客观规律认识的一致导致了我和作者的合作，我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思考深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益非浅，在此我向作者表示感谢，同时也明确表示对他完整观点的敌视。

说明：我现在没有这本书的最终电子版本，另外，由于版权问题，我也无法立刻将手头拥有的资料公布于网上。在书出版一个月以后，我将把我参与的部分全部上传，请各位耐心等待。

一个自锁的结构--我看医患矛盾及当今社会

在工程力学上有个名词叫自锁，所谓自锁，就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任何原有变量的增加都会导致系统的稳定因素与扰动同步增长或更快的增长。譬如：一块斜坡上的石头，在重力、斜坡面的压力、斜面摩擦力的作用下达到平衡。这时你增加石头的重量，或者干脆站在石头上，给石头增加一个向下的力，都不会导致石头从山坡上滑下去。为何？因为：虽然重力本身有平行斜坡面的分量，促使石头向下滑，但也同比例的增加了对斜坡面的压力，增加了摩擦力的上限，系统的稳定程度并没有变化，除非你增加一个原来系统里没有的变量——可以横着推石头，或者挖坑改变斜面的坡度，这才有把石头弄下坡的希望。

上面算是我这个学工科的人掉书包，各位看不懂或不愿看都没关系，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种结构，一旦进入稳定状态，指望系统原有力量的变化来改变这种稳定是不可能的，必须从系统之外寻找解决的路径。在我看来，如今的医患矛盾乃至当今社会都处于类似的一个结构中。大家都对医疗体制不满，大家都不断的抱怨这个社会，但一旦某些医生或者“理智人士”发言，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之余，一些观点的逻辑还是对的————直接取消红包并不会使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单纯用法律或行政命令取消行政收费、公务员加薪、城管人员等我们深恶痛绝的东西也不会让社会变的更美好————事实上，这个已经锈蚀的社会也没能力彻底取消这些东西。

为何会有自锁？我们还是从医疗行业说起。首先，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大家抱怨的目标之一，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富两极分化，这是整个社会的罪恶，与医疗行业本身无关，所以，这里放下不论，我们讨论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医疗行业。

首先要说的一个问题是，我绝对不同意什么医生的高收入的原因是医生工作强度大，危险大，技术含量高。我想说的是，这些医生都是自愿去学医的，没有人拿枪逼它们去。如果他们认为医药行业的合法报酬太低的话，当初就不该来干这一行当，干了也可以转行。这都是自愿的。另外本科课程设置为 5 年的学科有很多，也不限于医疗一个行业，我很关心这些学科毕业的工程师和在野外一线工作的施工工程师都拿到类似的收入没有？如果没有，那说明医生高收入的出现并非是因为技术含量特别高，危险特别大。我更愿意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

治病救人是一种复杂的技术，又关乎人命，不经专业训练是不能行医的，所以，现在的医生必须要求大学毕业，护士也至少要在护士学校训练 3 年，而且他们在上岗之前都要先考试注册，还要年年审核。这绝对合乎情理。身体脆弱，生命宝贵，摆弄它们的人自然要严加训练。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专业训练导致了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我不否认患者或患者的监护人也是有理智、有思想、有判别能力的正常人，但在分工如此精细的今天，正常的理智并不能保证你拥有判别服务水平并监督提供服务者的能力，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在一般的市场条件下，只有在买卖双方都很清楚商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交易。举个例子，在菜市场里，你只有在如下情况下会付钱：

1 你清楚你晚饭打算吃什么，吃多少

2 你发现菜市场里的某样东西符合你的要求，且数量足够你吃一顿的

3 这种东西价钱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且性价比让你满意。

但在医疗服务的交易中，你会发现你根本无法作到这三点，你能做的只是付钱。我们可以把上面三条标准一一对应的分析一下。

1 你肯定不清楚你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否则，你就没必要去请医生诊断了。

2 同理你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3 你不知道这个医生究竟是好是坏，因为作出这个判断也需要专业知识。

这是一个单向透明的市场，所以，不能用通常的交易理论来分析其中的问题。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需要经济人假设——人人自私的假设做一切理论的基础的。在此，我也暂且接受这个假设。在这个假设下，医生和患者都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现实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医生，你占有这个优势，自然要加以利用，如果在同样的疗效下，开贵一点的药可以得到更多的提成，你自然不会开出便宜的药方，如果是独立开业的医生，你同样可以推出无数专业上的理由，来收取高昂的治疗费用，而作为普通人的患者，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无法在医学理论上与其进行辩驳————“你能做的只是付钱”。当然，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如果有疗效，多花几个冤枉钱固然很窝火，但毕竟保住了命，保住了健康。最坏的情况就是医生为了牟个人利益而违规操作，对你施行的医疗方案不仅仅不是最便宜的，而且疗效还不好，乃至会害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无法辩驳，因为你不懂解剖，不明药理，没有能力判别健康状况的恶化究竟是因为你得的病实在太严重，还是庸医误人。

上面的讨论限于医生与患者一对一的博弈，由于医生的专业知识优势，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一边倒。但正如上面所说，患者或其监护人是一个具有理智的正常人，患者还可以利用社会资源来制约医生，使其不能肆无忌惮的剥夺患者的利益。比如：

1 患者可以找另外一个医生，听听他的建议，对比一下两种治疗方案，然后决定取舍。但这种方法意味着你要付双倍的诊费，而且效果不太好，因为作为普通人的你，很可能无法判别两个医生究竟谁说的对。甚至，在试图用多个医生的竞争来抵消他们的信息优势的同时，作为普通人的你往往会被一个擅长广告学而不是医学的医生而诱惑，结果反而更坏。事实上，目前充斥于大小医院的“医托”和占据黄金时段的 X 白金广告正是靠广告而不是医术骗取了普通人的钱财。（如果你还不明白，去找赵本山，让他给你表演卖拐。）

2 患者可以雇佣一个独立的医学观察者来为他做判断，这类似工程行业的监理行业。工程中的监理不负责具体施工指挥，也不负责设计工作，他要做的是以独立的身份监督整个工程进程、控制质量与造价，因为监理本身不收取工程施工款，只收取固定数额的监理费用。所以，他比靠施工款与实际施工成本的差价赢利的施工方有更高的可信度。在医学中，这就意味着需要找一个不负责具体医疗的医生来监督具体治疗方案。这个方法比上面的可行，而且我也相信医学监理将在今后几年逐步兴起并取得合法性。但这同样不能回避成本问题、监理与医生本身串通的问题、以及在固定的监理费用下，监理是否有工作积极性的问题。考虑到工程中施工设计工程师与监理的比例，和医疗事故的不可挽回性，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将有 1/4 左右的医生不从事直接医疗工作，而是对其他的医生进行监督。

这批医生必须与被监督者具有同等水平（如果不是更高的水平的话）。这种人力资源的巨大投入是否值得，我不好说，但我真的很难接受至少 1/4 的医生不看病的事实。

患者可以动员社会资源来对抗医生的专业优势，医生自己也要受到行业内部的一些制约，如行业自律，同行的指摘等等。他不能做的太过分，也不能太藐视普通人的智力，不能摘了患者的器官去卖，还要向患者收取手术费。但只要做的不太骇人听闻，太超乎常理。总是能够用“具体情况需要”、“学术分歧”、“个人风格”等理由搪塞过去，因为医学上，确实只有具体当事的医生掌握最详尽的信息，这意味着他在讨论上占有先天的劣势。所以，这种制约是很无力的，最多是一种底线制约，可以防止丧心病狂者当医生害人，但离理想状态实在太远，基本可以排除在考虑之外。

综上所述，如果患者和医生都以自私为准则，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博弈，虽然医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但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违规后被查处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为了保证医疗质量、控制医疗成本，患者不能光采取对抗的策略。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一犹太人开店，伙计向他举报另外一个伙计怠工，犹太人发誓要重重惩罚。结果下个月反而给怠工者加薪。举报者大为不满，原来怠工可以加薪？犹太老板表示，惩罚在后头呢。结果过了两个月，犹太人随便找个理由开除了那个怠工的伙计，然后说：如果仅仅是开除他，他可以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但加薪后开除，那个家伙会痛心疾首一辈子的！

这个犹太人老板没有权利殴打怠工的伙计，就用增加他的预期收入损失的方法惩罚他。现在，患者无法有效监督医生的违规行为，只能用类似的手法来提高医生违规操作的风险。(违规操作的风险=违规操作被发现的概率 x 违规操作被查处带来的损失)于是在医生的合法收入之外，患者可以送红包，可以送礼品，甚至卖色相，总之是提高医生的预期收益，在医生违反医德行医被查处的风险不变（且稳定为非常小的数字）的情况下，提高他们被查处后的预期收入损失。用高收入来惩罚违规医生，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事实就是如此，对不违规者的贿赂就是对违规者的惩罚，在经济人假设下，我们只能采取“高薪养廉”的方法来对付医生。鉴于医生不能一个人独吞违反医德操作的赃款，他必须和医药代表、药品厂商、后勤人员、医疗技术人员一起分肥，而红包是给医生一个人的，这样，红包往往成为一种更能“双赢”的方式。逻辑可以用如下的不等式表示

1 试图利用其他资源制约医生的成本>患者在违规操作下的损失>整个违规操作利益集团的收益>违规操作医生的收益

2 考虑到红包的情况下，医生的全部预期收入/被查处的概率>违规操作医生的收益

3 患者为送红包付出的成本<患者在违规操作下的损失

考虑到患者和利益集团都是理智的经济人，第一个不等式是现实情况，后两个不等式决定了红包里要装多少钱，在这几个不等式均成立的情况下，红包确实是自发形成的最优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或许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前面给了一个等式：违规操作的风险 =违规操作被发现的概率 x 违规操作被查处带来的损失。在医生违规操作被查处的概率不能有实质提高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增加对医生违规操作的惩戒而不是送红包。极端一点，我们可以判处所有违规操作的医生死刑。但正如前面所说，想准确区分医生采取特殊的治疗手

段、昂贵的药物究竟是出于医学判断还是个人利益是很困难的，哪怕是医学权威也只能在一定的概率内给出结论，说这个医生“很可能”在这次医疗过程中过分考虑了自己的利益或“很可能”玩忽职守。这样，如果对所有被判定为违规操作的医生都施加重刑，必然会导致许多医生仅仅是因为学术分歧、判断失误、技术不够精湛而受重刑，还会导致医生们为了避嫌而在可能应当使用昂贵药物的情况下使用不恰当的药物，这都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也和正常社会的立法精神相违背，所以，这并不可取。相对而言，给医生高收入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上面我用结构+经济人假设解释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生取得相对高收入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大部分国家直接体现为医生的高薪。而中国公立医院沿袭了过去的国有制经济传统，按照各个工作的学习年限、劳累程度发放工资和岗位津贴。这种报酬仅仅考虑的是训练医生的成本，在道德沦丧，市场经济渗透一切的今天，当然不会为掌握有信息优势的医生所容。所以，红包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是病人和医生博弈的结果，是医生在博弈中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的结果。如果强令取消，结果是减少了医生的违规风险（被查处的概率不变，损失变小），会导致更大的损失。某些利益集团以此为红包或高薪辩护，逻辑上也确实能

说的过去。（举个例子：《单方面取消医生的回扣或红包的结果就是医患两亏》）

这样，我完整的论证了红包的合理性，说它合理，是因为在前提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取缔这个大家痛恨的制度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这就是社会结构的“自锁”。既然是自锁结构，我们必须从体系外部着眼，改变体系的前提条件。医疗行业的专业训练绝对必不可少，我们只能从另外一个前提上打主意————经济人假设。这就不能把讨论局限于一个医疗行业了。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请看拙文《谁在统治社会？ ——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些探讨》）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社会分工的进展，所有行业都呈现出顾客与专业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自私压倒一切的经济人假设也基本适合于大部分技术人员。为什么医疗行业的红包现象最为严重呢？为什么这里成为大家火力的集中点呢？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鉴于行业之间的艰苦程度并无量化指标，医疗利益集团还是可以冠冕堂皇的宣称医疗行业的特殊收入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贡献或特殊付出。下面，我试图探讨这个问题，这一部分的思考尚且不成熟，望各位多多指教。

现代医疗行业的一个特点是：患者是以个人身份来接受服务的，而医生，一方面要从属于一个庞大的工业结构才能工作，另一方面又以个人身份与患者进行博弈。这样，患者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付红包，试图用增加预期收入的方式来减少医生个人的违规行为。

工程设计行业是一个与医学很相似的行业，同样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技术人员提供服务，同样存在让外行人士无法发言的行业壁垒，同样存在设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样监管困难。我们可以把它与医疗行业进行对比。找出医疗中红包的起源。

我是公路设计人员，就公路设计而言，并没有谁给设计人员送红包的现象，但这并非是什么好事情。因为公路行业的特点是提供服务者和接受服务者都是不能以个人身份来博弈的，必须由地方交通局代表当地的居民向设计院(不是单个技术人员！)及施工队来“购买”公路。（ “购买公路”这个词听起来很别扭，但确实是交通局出钱，雇佣设计院来勘测设计，给出图纸和技术支持，施工队用人工和机械把设计成果变成事实工程，最后由

公路局验收并付帐），在这里，公路的消费者——司机和乘客并不能给公路下定单，也不会直接向设计院和施工单位付钱，他们是通过税收、养路费或过路费的形式来间接支付公路的造价。所以，他们即使愿意出钱给公路设计人员来保证设计工作本身的质量，也没有这样一条渠道，而公路设计人员即使指望高薪来换取自己在尽心尽力的工作，也无法到收费站拿到一分钱。所以，公路设计人员只需要在不违反技术规范的基础上满足交通局的要求就可以了，他们并没有优化设计的自身动力。

当然，交通局在公路质量不好的时候会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压力，他们有一定的动力去监督设计单位的工作，但这很困难。对于可以很容易找出设计漏洞和缺点的部分（如路基路面设计，排水设计），他们的监督工作相对做的好一些，对于那些只能宏观控制的部分（如道路几何线型，标志标线设计，交叉口设计）监督聊胜于无。就我个人的观察，公共工程的设计几乎都在这方面存在问题。这里确实不存在接受服务者向技术人员付的高薪，但这仅仅意味着"红包"送不出去，而不是意味着情况要好一些。

当接受技术服务的主体是个人或企业的时候，与医疗行业相类似，付钱者不需要通过代理人接受技术服务成果。在这里，因为没有类似公立医院的低薪限制，"红包"直接体现为高昂设计费。如家庭装修业，这也是大家意见极大的行业。

机电行业的设计中也没有什么使用者给技术人员的红包，在这里设计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各路厂商的设计代表。因为机电行业中的各种部件过于繁杂，许多部件的生产都是被垄断或由少数几个寡头生产的。只要你设计使用这种部件，基本也就确定了这笔采购费用将流向哪个企业。这个企业自然乐于给设计人员丰厚的报酬。在许多企业中，这笔支出会占到总成本的 1/3。而设计人员在技术壁垒的保护下，受到惩罚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所以，如果受服务者以提高设计费的方法来制止他们这样做的话，需要增加的设计费用将远远超出现在国家标定的设计费用，这是受服务者在现行体制下根本无法接受的。所以，在机电设计行业中，红包是给由制造配件的企业送给设计人员的，类似医疗行业中的处方费。而没有接受技术服务者的红包来缓和这种损失。

其他的技术密集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医疗行业中的红包，并非是因为医疗行业的技术壁垒比其他行业高，而是医疗行业中多是患者以个人身份对医生个人的博弈，所以交易成本比较低，容易出现红包。

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原因是：在死亡或伤残的概率逐步增加到不可忽视的地步时，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估价不能用通过小概率事件推算的生命成本来计算。比如，即使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没什么区别，矿工与一般工人的工资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矿工的死亡或伤残概率与普通工人不一样。如果矿工的死亡率为 A%，工资为 a，普通工人的死亡率为 B%，工资为 b。那么（a-b）/(A%-B%)就是普通人对生命的估价。在中国，这个数字大概在百万元的数量级。但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矿工的死亡率也很低，而当死亡率或伤残率上升到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如 10%以上时，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估价将不能用刚才的公式来计算，而是趋向于无穷大。这是物质刺激的效益递减与人的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100 万并不能让大多数普通人放弃生命。对于许多重病人而言，医院就是一个分生死的场所，医生的行动可以决定你的生命和你的健康水平。既然患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趋向无穷大，自然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经济规律必须用前面的效应加

以修正。这使医生在博弈中获得上风，收取比其他技术人员更大的红包，当然也招来了更多的唾骂。

综上所述，在一个崇尚自私的社会中，指望任何人放弃他的技术优势是不现实的，医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红包反而成了一种合理的现象。医疗行业由于自身特点，在这个疯狂的社会中首当其冲的受到指责，但除非改造整个社会，否则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随着社会分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将筑起他们的技术壁垒，并在一个强调个性化服务的时代中快乐的收取红包。这似乎也有一种公平——各个行业之间的互相敲诈。但在任何社会中，专家是少数，做社会螺丝钉的百姓是多数，一个主任医师可以用自己的红包去轻松支付装修公司的欺骗价格，但老百姓只能默默忍受他们的盘剥。何况即使各个行业之间达到了平衡，红包的存在也明显提高了所有行业的交易成本，最终吃掉社会的大部分效率。在地球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的未来引发社会动荡。

这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不理想，否则医患矛盾问题也不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手段解决他。在我的思考中，一个自锁的结构是无法从内部找到突破口的，我们必须反思整个市场经济社会，反思整个崇尚自私的制度。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独自承担，

人的个人理性在面对庞大的工业经济体和专业人士时其实用处不大。萨缪尔森举过一个例子，垃圾工人罢工总是比教师罢工有效，因为平民不会立刻体会到教育中断对一代人的后果　但可以在当天早上体会到垃圾满街的效果，如果垃圾工人因此比教师多拿了收入(确实有这种事情!) 你觉得是算什么报酬好呢?

公平绝对是道德概念，我们的目标是施行公平，而不是指望公平自然出现，或者利用公平。

经济危机中一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简记

火车在苏州只停 2 分钟，苗丽楠拖着一个沉重的皮箱走进 12 号车厢，四处寻找自己的号码。开车铃声响过，窗外的未婚夫和几个朋友使劲的敲窗户，她却还在慌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无暇道别。沉重的皮箱放不到行李架上，我帮了一下忙，她的未婚夫在窗外看见了连连拱手。就在这时，车开了。

苗丽楠今年 21 岁，是陕西渭南地区 XX 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微胖，并不怎么漂亮，但长的很壮实。脸颊很明显地发红，是经常做农活风吹日晒的结果，在江南水乡的的两年生活也没有改变这个特征。站在车厢中部，苗丽楠对自己的上铺很困惑，因为她从未进过硬卧车厢，或许某天对软卧车厢的一瞥让她以为所有的卧铺都应该是双层的。直到列车员过来换票，她还在观察别人怎么坐，似乎想确定窗户边上的折叠座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这期间列车员花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释换票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折叠座上，紧紧裹着自己的外套。旁边的下铺没人，估计是无锡或南京的预留铺位，另外 2 个中铺的女孩很随意的坐在上面聊天，苗丽楠还是谨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愁晚上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铺位。随着火车一路向西，无锡、常州都被抛在身后，窗外密集的厂房、住宅，杂乱的仓储用地开始被农田和丘陵取代，她的紧张表情开始舒缓：“终于又看到地（农田）了，我要回家了！”。尽管已经失业，但对已经 2 年没回家的她来说，过年回家依然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事情。为这次回家，头 2 天她就开始准备东西，回家前一天她后半夜才睡，早上 6 点即起，和男友一起挤上吴江到苏州的汽车。其实，火车下午快 1 点从上海开出，1 点 45 才到苏州，她大可不必这么着急，苏州火车站只让离开车时间有 1 小时的持票旅客进候车室候车，她肯定在站前广场的寒风中等了几个小时。但苗丽楠实在是怕耽误回家，实在怕这花了 300 块买来的卧铺票浪费掉，宁可早早的站在火车站。

2007 年，苗丽楠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家乡做了一年小生意。“可惜我不适合做买卖”，于是她又到渭南市上技校。尽管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让苗丽楠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是个骗钱的地方，一年到头只想着骗我们几千块钱”。技校上了没几天，校园里来了一个职业中介，还是 XX 县的老乡，保证你能在苏州找到月收入上千的工作，于是苗丽楠断然决定出去见识见识。“连西安都没去过，总要出去见识一下，否则永远没机会出去，出去一次，以后就敢自己出去打工了”。更何况这老乡把苏州说的天花乱坠，对老乡只收 1100 块中介费，“外县的要收 1300－1400 呢，有个人是她（中介）的远方亲戚，还花了 900 呢!”。苗丽楠就这样登上了去苏州的火车。

去苏州的路远比回来的漫长，中介为这群懵懂的小姑娘小伙子准备了每张 90 多块的无座票，教他们中途逃票。2009 年的苗丽楠依然要问我“回家要经过几个省？”。自然她早已说不清当年走什么路线去的苏州，只记的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小旅馆倒头便睡，还好，中介负担找到工作前的旅馆费用。每天中介大姐都会带他们出去面试，十几个厂子不停的跑。那是经济高涨的 2007 年春天，这群年轻人却对苏州的工资水平没有任何概念，1500 的月薪就足以惊喜，1000 也能接受。不到一星期，这批廉价劳动力就不再消耗中介的住宿费，进厂上班。每人至少为中介贡献了 800 元的净利润。2009 年元旦，苗丽楠回忆往事：“太黑了，这买卖我现在也能干，换了我不会要那么多钱的。”可惜如今的苏州已不再需要劳动力。

苗丽楠也进了吴江的一个电子厂，安装设备面板，月薪 1200 元："要算上加班费的"，她补充。在工资表上，老板表现出对劳动法还有一点敬畏，周六的工资另列，按平时日薪的 150%计算，同样的薪资适用于其他节假日。但苗丽楠从来没打算弄清楚周六的工作是不是该领 200%的工资，对她来说，"加班"这个词不包括周六，因为"那是正常上班"。平时的加班倒是依照劳动法，如果下午 5 点半之后继续上班，可以领 150%的时薪，可惜这 150%是一个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恶劣结合——5 点半时即公布加班的工作量，你必须在晚 8 点前完成，否则此后的加班即便到了半夜，也只按加班到 8 点计算工资。最忙的时候，隔个两三天就要加几天班，还好消耗体力不算太大，苗丽楠能够跟上世界经济的节奏，靠加班把月收入稳定在 1200 块。

1200 块的工资，每月要向厂里缴回 200 元的伙食费，如果愿意住厂里没有空调的宿舍，只要再交 30 元，于是每月有 970 元钱可支配。"第一年我往家里寄了五千块"，苗丽楠现在还很怀念世界经济一路飙升的日子。只是厂里的伙食实在难吃，"只能吃第一顿，以后就纯粹是填肚子"，苏州的酷夏和不取暖的冬天也实在难熬，于是苗丽楠打算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晚饭。可一打听房租，吓了她一跳，在这个离吴江县城还有十几公里的村子里，15 平方米不带厨卫的小隔间居然要 400 块！而同时在苏州城内比较老的一个城内小区，厨卫齐全，有木地板的两室户只要 800 块。苗丽楠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对本地房东的愤怒还要再加几分。这些房东都是几十年前的农民，过去都说苏湖熟，天下足，但本地天下第一等的良田已经全部被征去做开发区，农民们只剩下自己的宅基地，于是盖起高高的楼房吃房租。小小的镇上有上百家工厂，十多万工人，房租水涨船高，农民房东们也期盼着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再加几个百分点。

自己租 400 块的房子太贵了，两个人分担倒还可以勉强接受。于是苗丽楠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快更进一步，两人同居了，租了一间 500 块的房子。房子不到 20 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房租每月一交，但房东保留随时涨价的权利，冬夏两季，房东还要收他们 60 块/月的空调折旧费。此外，电费是 1 元/度，比市价高约一倍，房东的理由是线路损耗；水费包干制，每月 10 元。这种自建的房子很不防火，所以房东不许在屋子里动火，为此苗丽楠还要再买一个电磁炉。很显然，这些消费超出了苗丽楠的经济能力。好在男友的收入要高的多。苗丽楠的男朋友叫许欢，22 岁，长发，看起来很象学生，家乡是山东济南所属的一个偏僻村子。和苗丽楠的家乡相比，这里人多地少。苗丽楠的家里人均 2 亩多好地，和许欢全家的土地差不多。在许欢的家乡，全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依照订婚时苗丽楠的观察："五六十岁的也都在外面干活，不过不少是因为儿女不肯养"。因此许欢早早地出来工作，如今是 4 年工龄的熟练工，和苗丽楠结识前已升任领班，月薪 2300-2400，忙时可有 2700，甚至超过了许多电子厂里新来的大学生，足以承担"昂贵"的房租。在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前，我认为他是准高薪阶层。

许欢在玻璃厂工作，和同事一齐把大块的玻璃加工成安全的钢化玻璃。成吨的玻璃在厂区里堆放，玻璃墙倒下来时像一座刀山，碰到轻则割伤，重则丢命；处理不好的玻璃随时可能自爆，象一个反步兵地雷那样打出无数破片；运输和包装过程也必须万分小心，忽然破碎的玻璃随时可能划过你的血管。总共 500 多人的工厂，每月都有数十人受程度不等的伤害，大部分人没有医保，和老板各承担一半的医疗费。按照概率计算，工人每年都有 50%的概率受或大或小的一次伤，许欢已经受了几次伤，为自己上了医疗保险，而且"当

了领班，可以少干活，只在忙的时候上生产线”，这让苗丽楠非常欣慰。从这个 22 岁的男人身上，你可以体会“血汗钱”的真正含义。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月收入有 3000 多，除了给家里寄一些，电视等电器也逐渐配了几件。08 年春节，两人一起去了济南见许欢的父母。苗丽楠的父母嫌山东太远，但也管不到那么远，只是在电话里说年纪太小，先订婚吧，长大了再结婚。除了这次去济南，苗丽楠很少离开工厂所在的镇子，去苏州的次数屈指可数，只和一个要好的同事（江苏人）去过一趟她的家乡。她知道苏州有天下闻名的园林，知道大上海就在几十公里外，知道杭州就在不远的南方，但这一切和她都没有任何关系。周末有时她会去买点东西，再就是在家里看电视，话吧里打长途只要一毛钱一分钟，可以和家人好好聊聊。网吧就贵了，周末每小时 2 块，平时 1 块，苗丽楠偶尔也会挑 1 块钱的时段去上网，和各地朋友联系一下。每周只休一天，总是过的很快。苗丽楠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轻松一些，还可以买米买菜，许欢从此在家里吃饭，既可口又省钱。但飞涨的物价让这个贤惠姑娘很不满意：“苹果 2 块 5 一斤，随便捡几个就 10 块钱，吃不起”，来自苹果产地的苗丽楠抱怨说。我提出建议，可以吃便宜一些的柚子，苗丽楠表示赞同：“柚子要便宜些，也好吃，”但也有问题“皮太厚，而且单个重量太大，想少买点都不成”。倒是许欢的老板逢年过节发些水果或副食，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这对小夫妻的日子就这样简朴而又温馨的过着，苗丽楠的同事和老乡都很羡慕。

2008 年到了，上网几乎不看新闻的苗丽楠开始感受到人民币升值问题。她打工的电子厂都是出口产品，一下子就没了市场。从 4 月份起，加班渐渐少了，甚至正常工作日都无事可做。苗丽楠说“台湾老板最小气，过中秋节只发一个月饼，年夜饭弄得谁也吃不下”，这样的老板显然不会放过转嫁危机的机会。苗丽楠的月薪从 1200 跌到 500－600，同事们也一样，但扣的饭费住宿费标准不变，许多人纷纷离职。许欢的玻璃厂主要针对国内汽车商，一时还能维持薪水不变，苗丽楠也就留了下来。“我给他做饭，对他身体有好处”，“他厂里饭菜贵，随便一个菜要 3 块 5，还很难吃，每月总要几百块的”，日益闲暇的苗丽楠安慰自己说。自我安慰不能改变收入剧减的事实，于是房租标准换成了 400 元/月，没了独立卫生间，面积也变小了。苗丽楠也不是没想过换份工作，如今的她并不害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但她不可能扔下许欢一个人在这边，所以选择面就只能限于附近的几家电子厂，可它们也都在裁员。就连电视都和他们作对，苏州有线电视说是改数字化，要交几百初装费，房东不肯出，他们只能不看有线电视，奥运会也看不得。酷热之下，苗丽楠常去网吧，里面有空调，还可以看看服务器上的盗版电影。

8 月份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电子厂一家家关门，不关门的也半死不活。听去广东的朋友说，那边工资本来比这边还低，七八百的很常见，如今也是不停的倒闭、裁员。苗丽楠打消了换工作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本来打算还往家寄点钱的，现在也只能先搁下了。玻璃厂也受到了大形势影响，好在不象电子厂那么大，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长此以往总不是个事。夫妻俩决定，到年底先把房子退了，让苗丽楠回家过年。明年年初看看形势再作打算。12 月底，两人退掉了房子，卖掉了家具和电器，这让苗丽楠很是心疼：“电器连 1/3 的价格都卖不到，自行车 160 块买的，只能卖几十块”。我 03 年刚到苏州时，自行车是从上海骑过来的，电器大多来自旧货市场，我建议她可以依样行事。回答是：“不知道哪里有二手市场，镇上没有”。我再次提议把东西寄放在朋友处，反正明年因为许欢的缘故，她还是要出来的。可是“朋友老乡大多走的比我还早，都快没

人了，剩下的住集体宿舍”。最后，我设想把东西寄放在厂里或房东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人家不管这个，除非和保安熟悉，可谁知道和你熟悉的保安干多久？”，看来，的确只有变卖一条路。快回家了，问及社保关系怎么办。苗丽楠似乎不把这当回事：“本来没上全，加起来 1000 块，要算辞职才能拿到一部分，很麻烦的，现在我算自己离职，没得拿”。算是捐给苏州市政府了。

12 月下旬，苗丽楠想法设法买回家的车票，可回家的人越来越多，都想提前走，硬座票实在买不到，她才忍痛买了一张 300 多元的硬卧：“汽车也有，但年底总要贵得多，可能要 500”。在火车上，虽然苗丽楠总是说自己回家了很高兴，还不时的念叨许欢答应春节不忙的话，去陕西看他，但她一路没有露出过真正的笑容，在折叠座上一直坐到半夜。当然，她也表示“这里比硬座安静多了”，可还是每逢临时停车就坐立不安，开车了就舒一口长气。很容易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个环境。我问她回家之后是否还要出来，她说过了十五还要出来，家里还有一个读高一的妹妹：“她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就让她读，我家供 2 个学生不行，供一个还可以”。还说“现在也不怕去哪了，全国各地都有老乡同学去过”“要不是许欢就不一定去苏州了，两个人只能顾一头”。我说许欢对你不错，应该高兴，应该珍惜。苗丽楠叹了一口气：“才在一起几年，将来日子长着呢”。大概是上铺太热的原因，6 点多苗丽楠就穿戴整齐，坐在了窗子旁边，看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家乡景色，还是没有一点笑容。8 点半，车到渭南，苗丽楠匆匆下车去赶一趟经过她家的汽车，否则就只能到县城再转车，她指望在家里吃午饭。她的手机停机了，“等我回到苏州，应该会充值的”，今年春节没法给她发信息祝福了。

火车继续前行，更多的苗丽楠和许欢从硬座车里涌出来，走向他们阔别已久的家乡，休一个久违的长年假。几十年以来，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青春推动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同时也被这列火车拉着勉力前行，现在他们可以暂时下车休息了。他们是这一代中国劳动力的典型代表，是工薪阶层的主体。很显然，和他们生产出来的无数财富相比，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他们的老板只能指望出口和富裕阶层的奢侈消费为这无数的工厂提供足够的需求，经济危机的祸根就此埋下。从这个角度说，2008 年这个动荡的年份来的一点也不意外。但对于这些指望微薄的工资来支撑自己简朴生活的，来养家糊口，为下一代积攒希望的无产阶级来说，2008 年底的“长假”实在太沉重了。在这里，我祝愿苗丽楠和许欢们春节愉快，祝愿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祝愿他们的脸上总有笑容，祝愿他们年年都能有一个温暖而又安心的假期。

后记：

2008 年结束了，这是一个多年以后我必定要向子孙讲述的年份。讲述这一年的故事可以有许多角度，在我今天回头看时，我发现这居然是自中国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第一个迫使全体无产阶级反思、认识社会的年份。在它结束之后，苗丽楠或许欢们终于有空闲坐

下来，回望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将来——他们原来也不是没想过这些事。用苗丽楠的原话说“到哪生活都无所谓了，反正是打工，随着工作走吧。结婚不敢太早，赚点钱才能安家”。但从 2009 年的趋势来看，春节后返回吴江的苗丽楠这点小小的期望恐怕会被现实打的粉碎。但他们不能不回到工业化社会，农村已经不再有需要他们耕作的土地。城市里有他们的爱情、友情、梦想和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2009 年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现在，还是让他们和另外一些人过一个安静的春节吧。

能在网上读这堆干巴文字的读者，大部分应该处于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不会是底层，因为我们读过大学，我们有空上网，我们有空看别人的故事。在读故事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些故事对于苗丽楠来说是真实的生活，而且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苗丽楠告诉我：“中学同学有不少读大学的，听说还有一个考了渭南市第二，很厉害的”，但是“我们早不联系了”。同学之间的感情可能会因为生活道路不同而渐渐变淡，产业工人们却不会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息息相关。和中间阶层比起来，产业工人最大的差距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和理想的生活。中间阶层也有生活的重压，但社会起码还给了我们一点希望，一点向上爬或逐步积累技术的希望。我们可以指望有朝一日让自己的生活更理想化一点，而产业工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身上的担子太重了。尽管我们也是小人物，但在向上爬之余，最好还是向下看一看，想一想怎么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改变这个弱肉强食，下层却已经没机会吃残羹剩饭的社会。退一步说，就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经济危机可是逼到了眼前，把我们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一步步地逼向彻底的无产。你回避现实，现实可绝对不会放过你。

2009 01 03 随笔

注：本文内容均为实事，人物均为化名。

城市贫民骚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关于新疆事件的闲扯

从目前情况来看，乌鲁木齐有数千人在街头施暴，杀人、烧汽车、抢劫、制造混乱。最终可能会造成 200 人死亡，伤者 10 倍于此。从结果来看，这是中国 20 年来从未有过的恶性恐怖事件。

数千人很多吗？其实不多，80 年代，90 年代，随着农村基层权利宗族化，和政府仲裁权威弱化，为了争夺农业资源或矿产资源，数千壮年农民的械斗非常普遍。双方一般都有冷热兵器和旺盛的士气，也有一方攻克另一方村子的事件，但是伤亡很小，几十人就很可观了。当然，这是农村械斗，不是城市暴乱，可比性差一点。但 90 年代，随着下岗高潮的到来，数万市民的骚动，几千工人筑街垒，烧汽车，抢劫，对抗军警的事情也很常见，但伤亡也很少到几十人。如果说民族冲突，其实 20 年以来，恶性民族冲突也不少见，集结上千人的也很多，但基本死亡都在个位数。我中学时也曾随大队人马冲入民族中学挑衅斗殴，双方参加斗殴的人都不是纯粹的学生，而是包括不少成年混子和附近的市民，武器有钝器，刀具等。在这种无序冲突中，一旦打到面前，年轻人的理智是很有限的，都会努力击倒对面的对手，不会考虑什么控制烈度，保护自身。结果在凶狠的对打之后.........无人重伤。类似的，92 年洛杉矶暴动，最后逮捕了 1 万人，死亡不过 50-60.

为什么？为什么伤亡这么小？因为杀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从体力上来说，纯粹的踢打，钝器打击杀伤一个人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体力，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能非常迅速地严重杀伤一个普通人。其次，从心理上来说，人并非杀戮机器，普通人如果没有指挥、鼓动、督战，不经训练。杀人效率低的可怕。其次，杀人，严重伤人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在 90 年代的许多冲突中，许多骨干人员和参与人员都是当年的民兵，受过半专业的杀伤训练，比如拼刺训练。但杀伤依然不多，因为人不是先天的杀戮机器，对直接杀人有本能的抵触。必须有人帮他们卸下心理负担，让他们把杀人而不是抢掠当做第一目标。这才能明显提高杀伤数字。如果能以组织而不是个人斗殴杀人，把杀人分解成每个人负责一道工序的专业行为，比如有人只管钝器击倒，有人割喉，有人放血，效率就要高得多。

所以说，数千城市贫民的骚动导致伤亡是必然的，但伤亡如此严重，几乎可以断定。其中有专业的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介入。数千壮年维族暴民中，应该有几十人的核心犯罪人群，其中专业人员很可能来自境外的训练营。大部分维族暴民满足于抢掠、发泄、放火的同时，核心人群负责杀伤，指挥。这里说的军事人员，不仅仅是杀人技术训练者、专业的带队杀人者；还要包括负责事先计划的参谋人员；负责调配力量、包围重点目标（如中国记者团），远离重点目标（外国记者团）的指挥人员。这里说的政工人员不一定是政委，也可能是宗教人士和军事心理专家，总之就是让人卸下心理负担杀人，让人以杀人为目标的专业人员。这些人才是导致伤亡的重要原因。

城市贫民骚动，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很明显，这次自治区警方误判了形势，低估了对手，请报上有严重问题。他们可以看到数千暴民打砸抢，以为还是几百警察列队就能驱散的骚动，没想到其中裹挟着几十甚至可能上百的专业人员。从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次暴动被驱散后，警方自以为像每次骚动一样，局势已经被控制。结果有组织的暴动去而复来，甚至能围攻医院，围攻车队。这最终导致全国调集特警入疆，胡锦涛紧急回国。

这少数核心人员的目标是什么？杀人、放火？泄愤？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扩大事态，军事斗争永远是政治的延伸。我曾和一个 20 年前从郊区去过广场，当晚在纪念碑执勤的军人谈过。问他当时最大的困扰是什么？是学生？是街垒？是请愿者？都不是。最大的困扰就是人群中的少数袭击者。不断有人从路边的高层建筑上射击，或是骑摩托车过来，打一枪就逃窜。无论是高层建筑上的远射，还是摩托车不停车的射击，都不足以真正杀伤军队，甚至打中群众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本来也不在乎平民的生命，他们只希望军队无差别还击。事实上，军队确实一度无法控制还击的冲动。还有少数战士被卷入人群，大部分殴打本身其实不足以伤害壮年男子。但有专业杀人者割喉，放血，那就不一样了。这次也一样，几十个核心人员根本不在乎维族人是否也会被误伤，是否会被报复。他们希望流血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挑动仇恨，才能建立自己在民族内部的权威。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必须是找出核心人员，找出掩护他们入境，给他们提供补给的网络，找出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政治鼓动的高层人士。乃至出境作战，毁掉训练营，推翻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如果这个政权是大国，那么就要做出相应的政治经济手段。这样才能对恐怖主义斩草除根。普通暴民，作为帮凶必须惩处，杀人伤人打砸抢的都有相应刑事民事责任。但不可无差别报复，否则就是恐怖主义的胜利。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普通人之间的差别不大，都有自己的感情，也都有自己的理智。如果你硬要把人民看做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如果你和群众讲道理，让暴民和普通少数民族民众看到恐怖分子的真面目，让他们看到恐怖分子要的是所有民族的血，目标是少数人的政治地位和长期经济利益。那些试图重建封建权威，或者试图做组织大国代理人政权的人物，那些充当犯罪核心的骨干，都必须毫不妥协的拿下，公审公判。甚至可以交给维族民众执行死刑。

再往深层说，眼光还是要落回普通民众。真要是几十个核心人上街，会有这么恶劣的结果吗？也不会。必须有外国的城市贫民基础，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才能搞出严重破坏来。作为一个近千万人口的群体，如果平均经济水平差，失业率高，发展无望。那么他们的青年会去犯罪，他们的女儿会去卖淫，他们的骨干会被吸引进黑社会。一旦有城市动荡，他们还会走上街头，泄愤抢掠。我说的是当年东北的下岗工人。维吾尔人作为一个 1 千万人口的大民族，如果普遍经济水平较差，缺乏发展空间，那么永远是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城市贫民，不稳定性还要胜于农村贫民。那么问题就落在如何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了。当然了，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大，即使在名义上。劳动收入也只占 GDP 的 40%不到，大部分人和少数高薪阶层就是分享这 40%的社会财富。指望维吾尔人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不现实。但至少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打工机会，让这些人有机会去参与创造 GDP，有机会分享 40%的财富。

这个机会如何来？只有融入主流社会才可能做到。其实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是要消灭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汉族也在类似的过程中，被少数民族改变了许多。比如说，我们不介意中国男篮的未来领头人可能是一个维吾尔人。不介意中国的音乐风格受到藏族、蒙族音乐的影响。不介意饮食文化加入西部少数民族元素。各个民族都在取长补短。汉族人为了打工而学英语，维吾尔人也可以为了打工而学汉语，改用汉语。汉族人为了打工，放弃回家过年，维吾尔人也得放弃一些风俗习惯和行事方式才可能打工。这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以胡耀邦为代表但不限于胡耀邦的一批领导人，强行推行维语教学，恢

复民族封建势力的地位，才是真正害了维吾尔人。过去30年，和民族上层旧势力妥协，放弃发动群众，漠视普通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得到批判和反思。

不过，客观来讲，一个蔡京推不倒王安石变法，一个貌似能干的胡耀邦也没资格说危害一个民族。甚至1000万人的维吾尔人也不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变。8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和旧统治阶级上层妥协，都在压制群众。指望胡耀邦逆潮流而动，也完全不可能，人家胡耀邦也要落个改革先锋的名不是？整个国家迅速拉开贫富差距，让富人毫无廉耻地继续掠夺，结果就是贫民犯罪率高，落后地区的人因此被整体妖魔化。人口压力大、交通方便的河南人首当其冲，下岗灾难下的东北人紧随其后。工地上，薪水被压低的苏北民工以保护打工权利的名义，把安徽民工堵在宿舍里打，焚烧他们的行李；过几天安徽民工反过来再来一遭。苏南的资产阶级政府除了逮捕和安抚，难道还能说你们应该团结起来搞工会吗？薪水提上去了，投资者可就要到别处开工厂了。整个社会的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别指望能够一事一议。

就算一事一议，也要当事人敢担当，从长远解决问题的角度着眼去解决，眼下的官位和此生的虚名都不足取，这才能真正平息事态。可究竟谁是当事人？政府和党？机构不能拟人化，政府和党不是一个人。寡头共和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寡头们也需要民族主义呢？也希望百姓是乌合之众，希望百姓总是不明真相呢？毕竟不明真相的群众，不管哪个族的，闹起来声势浩大，实际却对付不了任何有决心控制局面的工业社会政府。如果流血能换来地方头目的地位，如果流血可以让大家相信王将军真的靠屠杀定边，真的相信本族的黑社会和贪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未尝不是好事。反正寡头不逛街。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人民，或者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拒绝当乌合之众的时候。新时代就要来了。

吃饱饭之后咋办？关于阶级的历史乱弹 评今求德的社会论述

被独孤求婚点名了，因此看了金求德的社会分析文章。这里我乱谈几句，完全凭着感觉说说，甚至懒得用百度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感觉。因此，如果各位要打脸，就当打了个醉汉的脸吧，打的没成就感，被打的没痛感。随便。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在马前卒只有 70 年代旧书可翻的时候。历史是这样被分类的，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近代开始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我被告知，这个历史流程是斯大林和马克思合谋制造的骗局，最多只能说是西欧一小块的畸形描述。和这个认真你就输了。然后我就去读各种版本的世界史，读着读着，才发现反马克思的那批人最多翻了房龙的儿童读物，能读威尔斯世界史纲的都算高人，倒是圣经读了不少。其实他们脑袋里也就西欧那一小块，偶尔延伸到中东一下。于是就不以为然了，再往后，自己也读了不少杂家的书，不那么容易被忽悠了。回头想想，世界史分上古、古代(古典)、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几块还是对的。只是不能简单的用奴隶、封建这种词来套。

上古时代，就是各地自己萌发文明的时代，第一代文明，如两河、埃及、中国、印度河都起来了。当然，除了两河之外，其他多少都受了前面文明的影响，但总体上还是独立的。这些文明，说是完整的文明，其实都各自是一个城邦群，无数文化上互相影响，政治上互相攻击的小城邦构成了文明区域。偶尔有一两个帝国崛起，统一大半个文明地区，也只能建立松散的霸权，在强迫各城邦纳贡称臣的前提下。还得承认各个城邦，或者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有自己独立的行政体系和文化结构。比如说亚述，商朝。甚至从征服者这里分出去的文明也不是被原来的母城邦直接统治，也要采取分封和承认新增领土的方式。比如说周朝的分封和赫梯的封侯制度。

这主要原因是 3 个，头两个是硬件的，即交通网络的延伸不足、剩余产品的比例不够。剩余产品比例低，那么让别的地方完全臣服就意义不大，成了亏本买卖，不能维持新的征服；交通网络不发达，军事打出去的成本高，抢到东西到异地使用的效率低，也等于降低了剩余产品比例。因此各地都是分立的城邦，这就是上古时代的现实。第三个原因呢，依赖于前两个原因，就是缺乏一套能够融合其他城邦人口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不绝对独立，但在几百年的时间段里看，这也是影响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各个霸权，即使存在的话，也都是以本族人口为基础，做总督，做军队，做税务官。外族人还是拜自己的神，听自己的长老、祭司和贵族的话。一旦本族人口不足以支撑更大的霸权，那么不是灭亡就是停滞。所以霸权忽起忽落，

只有埃及那个地方例外，因为埃及硬件上优越，埃及有一条贯穿全部农业地区的河流，河流到任何有意义的地区只有几十公里。尼罗河水流平缓，从南北往北流，顺流而下很方便；盛行风从北往南吹，逆流只需要一张帆。尼罗河还每年带来大量淤泥，每个劳动力都能种出远远超出家庭需要的粮食。这样埃及靠尼罗河统一了起来。但法老还是缺一套能够统一各地意识形态的东西，只能把地方神系一概承认，融入法老的神性。结果就是各地遍布消耗剩余产品的神庙，分配比例只能升不能降，积累多了还是会变成一次次分裂的诱因。法老郁闷了好多代之后，终于发明了一神教，即把所有的神都废了，融入阿吞崇拜。这是世界一神教之祖，结果.........琢磨这事的法老到底被多神教祭司给做了。祭司

们宁可不要亚洲领地，也要和法老作对，也要多神教。但不久之后就有一个利比亚的蛮族头子试图袭击埃及，应该还抓了几个埃及的异族奴隶当部属——这些奴隶是头些年入侵的亚洲蛮族后代。埃及的军队可以不要亚洲霸权，但不能不防卫本土。结果这个利比亚蛮族头子流窜一番，带着新手下去了亚洲……….他的名字叫摩西。于是一神教自此开始。埃及限于多神教传统，还是局限在那个尼罗河两岸，没啥发展。

一神教到了巴勒斯坦也没啥发展，老子、孔子们也只能占个公务员编制混混。只是随后的几百年，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人口越来越密，耕作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总能在文明之间、城邦之间找到可开垦土地，剩余产品比例和绝对数量都上升。另一方面，城邦之间的荒地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多，道路上通过的人和物资增长速度更快。秦国袭击郑国，专门走僻静地方，还是被贩牛的商队碰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硬件上有了大帝国的可行性，软件上各地也都在寻求突破。终于有几个地方出现了突破，比如儒家讲有教无类，祭神如神在，各地的底层士人乃至农民都有机会当“君子”，融入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而不是在一个地域性的贵族国家里为王前驱。比如罗马人可以接受一个来自希腊的公民，一个来自北非的皇帝。源于犹太教支派的宗教，只要尊重既得利益，只要不强调主教的种族，也可以成为罗马国教。其实过去的几千年里，类似的文化突破尝试也有，只是硬件不能满足。孔子就因为这种硬件水平而不招人待见，差点饿死在陈蔡之间，到老也潦倒。

其实孔子也好，基督也罢，类似的天才或者说疯子、传销大师在上古时代不算罕见，大概每个文明区域几百年就能出个水平高的吧。但从人类进入农业时代到公元前 500 年，几千年下来，硬件不足以让这些人的理论出头，不知道有多少类似的牛人被饿死或者被祭司宰了，耶稣不还是被旧祭司集团给钉了十字架吗？只有在欧亚大陆硬件水平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类似的上层建筑设计突破才可以造就巨大的帝国。汉朝、罗马按下不谈。就连稍早一些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要实现各地贵族杂交混血的梦想，不仅要靠骑兵和步兵，还要靠第一波斯帝国这个实质上的蛮族盟主的道路网建设，靠中东地区繁盛的农业基础才行。这就是我们说的古典时代，即硬件的发展使那些普世性的，不区分种族，不计较农业文明地区特点的上层建筑有了发展的机会。孔子从濒临饿死的老头变成大成至圣先师，基督从钉死的私生疯子变成万人敬仰的神子。就连默罕默德都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尾巴，在南方游牧民里率先搞出高级宗教，覆盖了一大片地区。

这个时代叫啥时代呢？有个时髦的词叫轴心时代。咱们刚才说了，轴心时代的大师们，从几千年的角度来看还不算缺，属于过剩物资。但在硬件刚好可以满足古典大帝国文明的那几百年，类似的大师还真没普及化。不是每个犄角旮旯都能分上一个的。这就使那些先产生或者先接受这种上层建筑的文明区域牛气起来。因为他们的征服不再是那种压服旧贵族，要求纳贡的征服，而是彻底消灭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建筑，然后把民众变为新的统一上层建筑的信徒。这种扩张比起波斯、亚历山大、商朝、亚述那种全靠本族野战军镇场子，各地基层还是自行其是的征服，要踏实 100 倍。所以古典时代迅速出现一票大帝国，物质资源的集中度远胜前代，因此在长安洛阳亚历山大罗马巴格达等地方，人才和财富荟萃，古典艺术文化极端发达。

这就是古典时代或者说轴心时代的来源。即在硬件基础满足大帝国存在的前提下，率先取得软件突破的地区搞出了大帝国的架子。依托于统一大帝国的经济文化第三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个时代在不同的地区略有差别。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查查汉朝、罗马、撒珊、孔雀、阿拉伯帝国的起止时间。我懒得 baidu 了。从整个欧亚大陆来说，交通网的延伸是同步的（路桥技术，运河技术 造船术的传播相当容易），农业技术和种子的传播从几百年的时段来说也是自由的。所以几个大古典帝国的年代没差太远。前后一千年吧。如果不考虑唯一一个以南方游牧民起家的阿拉伯帝国，能缩短到 600 年左右。比起人类一万多年的定居农业史，这个时间得说还是相对挺集中的。搞一个世界史分期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或是西欧的年代。其实美洲也有类似的年代，印加人在西班牙人刚到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古典时代的曙光了，曙光来自道路网和初步的一神教，可惜没有往下发展的机会。

现在的重点是古典时代的结束。也就是古典时代为什么接下来是中世纪呢？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个高端统治技巧，或者说帝国驾驭能力的传播。轴心时代那些牛人，本来也不是类似理论的首创者，只是赶上了硬件发展的好时候而已。现在他们忽悠的那一套玩意已经被证明有效，那别人有样学样还不会吗？你这边可以读圣贤书，讲新约旧约，我这边也没必要独创了，另给一套解释方法，创个新教派不行吗？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都是一样的。当初是罗马人、汉人（严格说是边郡汉人）、波斯人、孔雀王朝、麦加-麦地那联盟先发现了这套组织方案，所以横扫四周，建立古典文明。现在文明在大帝国的基础上四处蔓延，蛮夷也习孔孟之道，突厥人也开始建立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原来的那几个帝国想垄断这种新统治结构就行不通了。过去的蛮族，打到文明地区，掠夺几个城邦，发现这些城邦之间打仗，也和蛮族征服差不多。不是抢了就走，就是设个总督，驻军，监督原来的贵族上贡。现在蛮族要是略有小胜，甚至是被俘到文明地区，都会学习到一套管理广大地区的新方式。就像当年被埃及国防军痛扁的摩西一样。蛮族尚且可以学习新东西，被征服的农业文明地区自然也可以。王翦灭楚，背后是秦国变法后的新社会结构，转手这套结构被楚人刘邦拿去打平了另一个楚人项羽。类似的，王莽篡汉，自此天子禅让层出不穷，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只是儒家士人始终被各朝所用。于是，古典帝国让位给中世纪。罗马帝国被法国、英国这种政治单位取代。汉朝之后是三国，晋朝统一没几天就是五胡乱华。没办法，大家都学会了新玩法了。结果就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遍布英法这样的中型国家。大型霸权也经常出现，但稍有颓势就会被聪明的臣民或蛮族干掉。于是稳定的古典时代大帝国再也没法重建了。

这个趋势其实在古典时代末期就很明显了，默罕默德那个最后的一神教本质上就是个抄袭的大杂烩。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因为很明显他的癫狂症状比不上耶稣，而且教义根据需要可以随时迎合既有利益集团进行修改。整个就是一个定制的传销方案。而且可兰经吸取了圣经、犹太教缺乏对定居生活指导性意见的教训，不仅有总纲还有细则。因此大获成功。占了南方干旱地带缺乏文明先例的发展空间，成为最后一个成功的高级宗教。等到强调阿拉伯军人有信教特权的倭马亚王朝被全面融合被征服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取代，本次赤裸裸的抄袭和复制终于全面成功。这说明古典时代那种高级宗教+大帝国组织不再是稀缺物资，从此各民族再次回到一个起跑线上。乱世要来了。果然，默罕默德之后虽然搞原创宗教不再时髦，但那无非是因为借壳上市的成本更低而已。今天出个马赫迪救世主，明天出个再洗礼派，你可以玩今文经学，我可以玩古文经学。外壳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学会用一套体制来以我为主，融合被征服地区的力量了。像禁止图书出关这种小伎俩抵挡不了文明传播的大趋势，世界无可避免的进入中世纪。

刚才说了，埃及因为那条尼罗河而在上古时代与众不同，现在轮到中国在中世纪与众不同了。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帝国都在混乱中解体，然后进入一个分多合少的中世纪。唯有中国，在隋唐帝国之后，又保持一个合多分少的局势直到现代。这是为啥呢？还是地理环境的原因。

仔细研究旧大陆的地形，适合发达农耕文明的地区有五片粮食产量差不多的地区。

1 欧洲农业地区（含英国和北欧）

2 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

3 印度农业地区（从印度河到恒河再到斯里兰卡）

4 远东农业地区（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

5 东南亚农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半岛和群岛）

其中 5 号比较弱，而且雨林在近代前都是阻碍。所以前 4 号是主要地区。其中 1、2、3 之间的交通很便利，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提供通畅的水道，就算走陆路，也没有什么大山。亚洲真正的大山都在西藏帕米尔高原这一带。这个高原加上南面的雨林半岛和北面的干旱地区，把 4 号农业地区和前三个分割开了。穿越高原或热带雨林的商路可以过商队，过文化，过书籍，过种子，过科技，但绝对过不了粮食这样的大宗物资，也过不了大部队。所以中国一方面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一方面又和西边那 3 片地方之间缺乏直接的压力。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设置个超级简化的模型。

某片文明地区，原来有几十个小国，几百个小城邦，大的如巴比伦的乌尔，西周的宋国，小的就是纯粹的一座城的百里候。这样一片地区，在轴心时代之后，被并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假设这个大帝国初创的时候，力量是 10。被灭前，战国七雄级别的战斗力每个都是 3。那么，如果帝国处在东亚以外的地方，只要帝国的力量衰弱到 3-5 左右，那么就会被边界外的小国羞辱，乃至打到解体——漫长的边境线上，总有 3-4 个这样的中等强权，其中有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概率很大。而如果帝国处在东亚，那么力量衰弱到 3-5，如果集中起来还能驱逐北方一条线的蛮族，比如说蛮族不出阿骨打，成吉思汗这种人物，力量也不过 3-4，那么帝国就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中国统一是主流的原因，即缺乏境外的中等文明国家做威胁。

都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这不是中国的特色。而是各民族都掌握新的文化工具后，整个欧亚大陆中世纪的特色。但是，大部分地区合了几十年就要换政治地图，唯有中国，由于独立的地理空间，一旦合了就能合上二百年。哪怕在头 30 年就损失了一半开国时的力量也无所谓。所以中国显得统一的时间长。这也是为什么开国之初，开国帝王喜欢远征那些文明化的半蛮族的原因，宁可不打真正的蛮族也要打半蛮族。他们要趁着初期锐气消灭真正的隐患，免得子孙柔弱，基业守不了几年。唐朝和隋朝打高丽，明朝打高丽，打越南，都是类似的想法。日本如果上岸了，可能军力不如漠北蛮族，但也必须优先打下去。这都是头几代帝王的直觉。如果开国帝王没做到这一点——宋朝就是榜样。

如此，世界史的上古——古典（轴心）——中世纪的马氏分期法论述完毕。至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折，那是由新大陆、新大陆作物、航海学突破共同作用的几个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里不多扯，言归正传。

扯了这么多，可谓三纸无驴，但其实这个问题和今求德提的问题是相关的。古典时代大帝国的由来，本质是在交通、农业等硬件满足跨地域政治结构的前提下，一小部分民族或者说地域集团率先掌握了跨地域统治，融合当地统治集团的上层建筑，从而建立了稳定性和地域都空前甚至绝后的大帝国。一旦这种上层建筑的制造技术扩散，这种大帝国就很难在东亚之外的地方维持了。古典帝国的建立和消失，本质上是在硬件没有多大变化的前提下，软件扩散的结果。是一个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内的文化扩散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用生产力增长和偶然都无法进行足够明确的解释。今天的事情也一样。

再谈一个更接近主题的例子。即在中国进入上面的那个稳定态之后，还有一次如何传承这种稳定态的问题，即到底是由贵族世家来传承儒家文化，充当统治骨架，还是由考试选出的平民（正确的说是中产）进士来填满官僚机构。这个争论主要爆发在唐朝。唐初，统治集团就有分封贵族，永久统治地方的打算。当时从六朝留下来的谱学，即讲究一个人血统的学科还非常盛行。到了晚唐，还有“进士轻薄”之说，即平民进士，一是缺乏天生的政治训练，二是急需靠考试来翻身，因此急功近利的成了书呆子，成了趋炎附势的走狗，成了贪污的预备队。这个评价固然有评价者的立场因素，但也相当客观。因为当时既没有真正介绍政治潜规则的书籍，印刷术也没有廉价到把经典著作之外的政治书籍普及化。平民士子能把经书读好就不错了。其他的，只能顺杆爬，爬到哪里算哪里。反过来看世家子弟，一是不考试也有官当，这个就托底了，不用玩应试教育；二是读经书、写诗词之外还要受终身的政治训练好继承家业；三是不必着急吃相难看的贪污受贿，世家子自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这三点看下来，“厚重”的世家子弟鄙视轻薄进士也有道理。终唐一世，老世家和进士共同分享政府职位。整个宋朝看下来，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官员总数中也是少数，当然上层已经有进士主导的趋向。到了明清，除了末世，不考虑满族贵族，进士官占据中枢和省级，在府县分出一些份额给举人监生，基本上垄断了官员名额。这种变化的基础不是农业社会本身变化有多大，也是因为文化的扩散。

明清官员上任，不是只读了四书五经就去的，有大票的小册子满天飞。水浒传印得，邸报传得，讲行政技巧的小册子也印得。所以大伙不要总以为明清上任的官员都是范进那样的疯子。他们除了带上师爷，和刀笔吏分赃之外，还要读许多如《秋粮征收细节》、《文件处理流程》《如何和村长打交道》、《户部各司运行机制介绍》的手册。（肯定不是这样的现代名字，但我懒得 baidu 去查了）。与之相比，贾雨村要靠小吏介绍才读了一个粗浅到极点的护官符，实在太逊了，干不了半年准滚蛋。不是我夸张，这些小册子比起现在公务员上任前读到的东西，要切合实际的多。比如说，小册子还会教你，说你这个职位，比如说某某道吧，一年是 2 万 3 千的陋规。如果你和上司分享 5 千，迎来送往给其他官员花掉 6000，那么剩下的自己揣了，属于咱们朝廷的合理规则。如果你不打算升官不在乎名声，把 2 万 3 变成 4 万也是可以的，但只能干这一任。或者你只拿一万五，但给上司分享不减，也可以博个清廉名声往上爬…………现在绝无这种出版物，网上帖子都不会有。官员不仅可以从类似的东西里学到行政知识，还有制度化腐败的入场方式。比起世家子来，起码行政能力不会差别太大，还能批量生产，当然要取代他们。当然了，腐败还是腐败，比起世家子弟不差钱，进士官还是要捞的。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有意义的是官员

消耗垄断多少资源，世家子弟的钱哪里来的？还不是贵族的私产或者国家的世禄？一样在整个国家的税收基础上吸血。只要科举官把自己的腐败制度化了，不要腐败一块钱要糟蹋国家十块钱，和世家子弟在这个角度也没区别。

再进一步，科举制度最后也吸取了世家的一部分教育方式。除了少数倒霉蛋，只要你得了进士出身。典型升官路线是这样的：即进士选出来一部分最优秀的进翰林院。在翰林院里先给你几年时间清闲。你以前是应试教育，现在可以放开读点地理、历史、时政、以及上面说的那些小册子，真正了解这个政府。然后你被放到御史等言官位置上，趁年轻，专门给别人挑毛病。挑毛病自然需要认真观察其他官员咋干的，你自然就熟悉政务了。再往下，给你学官做，出去主持考试，或者阅卷。这样你开始管人管事，但还是相对学术化的事情，还可以借这个机会看看祖国各地。再下来，你就有资格干实务了。有的去州县当官，有的进六部管一个司，最后在类似的位置上，机缘+能力，一部分能够当省级封疆大吏，或者六部长官。最后一跃就是入阁拜相了。整个流程就是让很大一部分进士们在考中后，也有类似世家子弟的培养过程，既不造成贵族分裂隐患，还能得到世家教育，量产合格的官员。科举制度到此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极限。

之所以从中世纪又扯到中世纪的官员选拔，俺的意思还是说，知识和行政能力扩散本身可以在硬件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统治结构。

我总结他的意思如下：农业社会，农民一是穷，二是想法简单，所以呢，能吃口饭就不会造反。士人、官吏、商人不穷，也吃得上饭，但他们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活法比农民复杂的多，必须为保卫自己既得（或者说自认为既得）的东西而斗争，比如利润（或盈利前景），比如说权力（或者说等级）。他们不会等到吃不上饭才造反，在那之前，即使农民还吃得上饭，他们也会造反。只是造反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是否吃得上饭，或者他们是否能让农民今后吃上饭。

到了工业社会呢，好多人既没认识到普通人已经和过去的农民不一样了，也没有认识到士人、官吏和商人的比例增加了。还是觉得普通人饿不死就不会造反，就不该造反；还以为普通饿不死社会就不会乱，因为造反的人没法带动群众往前走。

今求德元帅严厉批评了这种幼稚的想法，指出：现在的大学生或者说受过教育的大部分人口，能力上是否配得上当管理阶层是另一回事，心态上早就是“士人”了。他们不是吃饱穿暖就不骚动的，不是有了千把月薪就能永远打酱油的。而且这部分人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再加上已经很高的商人、官员。将来必然会在绝大多数吃饱饭的前提下产生新的社会动荡。千万别以为读书人既吃得上饭就不造反，千万别以为他们缺乏绝对无产者的勇气就不造反。勿谓言之不预也。

最后呢，今求德元帅说南方周末等报纸的存在既是这类人存在的象征，也是这类人进一步扩大自己不满的基础。因此南方周末的实力将继续扩大，最终比现在强大十倍。还能参与下一次洗牌。其实呢，南方周末只是个代表，元帅的意思我领会着就是偏右的自由派宣传力量颇有存在基础和前景，早晚上台分羹。

元帅钧旨，我已经领会完了，开场白也说过了，下面是我的看法。

首先，我赞同元帅对农业社会的评价。这个农业社会从公元前一万年一直延伸 到 1800 年的世界，而不是 1500 年。在这样的社会里，牧民可以被远方的财富搞得心痒，然

后全民动员去打仗。农民则首先要守着自己那块地，保证老婆孩子不会饿死，明年的种子粮还能留下，今年能半干半稀吃到明年，这才会把剩余资源交一部分给别人。如果政府或是地主或是黑社会要的不多，那么农民会一直认命的过这种日子。如果被拿走的太多了，他会哀求，加倍努力翻地，让老婆孩子做家务之余去挖野菜。如果挖野菜也供不上吃，好吧，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民要造反，或者不造反，原因就这么简单。天才人物每年都有，起家本钱大的也有，但要把农民都煽动起来。只有让农民吃不上饭才行。最近有本书，叫《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的评论》。这本书充分说明，一个完美的叛乱开局，如果没有饥民或制造饥民做基础，那啥也不是。而上层社会，比如商团，比如军阀，比如官员集团，要短促政变可以，要彻底洗牌，在农民吃得上饭的时候也没门。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农民到了城市里，拉车或者做小贩，即使收入略高于原来当农民，战斗性也不一样。因为他的生活没有稳定的预期。经济波动对他的影响远大于农民，这样的人既容易走投无路，也因此组织成行会等组织。这就是古代统治者不喜欢聚居工商业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因为自然气候波动之外的原因出现动乱。此外，往往工商业聚居的地方，收入还能略高一点，高的足以抵偿风险。因此这些人一定程度上也是既得利益阶层。典型的就是巴黎工人。在工业化之前，这个欧洲的中心供养了最大的一批无产阶级，而且是过的比农民好不少的无产阶级。因此才能吸引年轻人不断的流入，才能抵偿城市的高死亡率。（缺乏现代的上下水系统，缺乏医药，城市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样一批人，在欧洲掌握世界海权的年头，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远高于农业社会的“正常”水平。结果就是频繁起事，成为革命的中心。

这种造反，或者说叛乱，或者说暴乱，本身只是摆脱饿死前景的一种尝试——反正情况也不能更坏了。所以，本身只是促使上层社会减少压榨而已，真正的受益者还是宗教、军事、政治方面有预谋有组织的野心家。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课本描述的现实，农民一次次起义，一次次失败，或者被 XXX 篡夺了成果。当时看着这种描述很傻，觉得是强词夺理，现在才发现描述的很准。

不过，即使在农业时代，还有一点遗留问题，就是平民的理想主义倾向。即造反或出去打仗不止是为了吃不上饭，还为了平民的一点梦想和野心。虽然每次造反，最后都要掺和上知识分子集团和军事集团的梦想和野心，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平民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其中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宗教，比如说白莲教的千年盛世传说，比如说伊斯兰的马赫迪传说，比如说十字军对农民的动员或是教徒平民对抗异教徒统治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不会和宗教太过不去，毕竟全部宗教都尊重统治者的权利，统治者一般不会为了一个名分和教徒太过不去。只要农民吃得上饭，这种理想主义不会作用太大。另一种理想主义就要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了，即世俗化的理想主义构想，或者说空想社会主义。在农业社会，书本很贵，识字率很低，平民一般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很难。但在贫民聚居的城市，人口长期密集相处，没有书本和文字也能传播文化。鹿鼎记里韦小宝从说书人那里听民族主义，从黑社会那里学为人处世，就体现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当时的区别。巴黎这个地方能反复革命，还能让妇女乃至妓女站在革命一边打到底，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次要原因呢，就是还有一些穷学生和识字有文化的工人，比如印刷工人，每次革命都有他们做中坚力量。不过这些原因都属于农业社会里经济中心的特色，属于西欧农业—手工业社会扩张期的特征。不具有普遍性。

总的来说，到此为止，我站在元帅一边。

然后就是工业革命直到我们现在的世界，大概 200 年多点。工业革命促成了生活缺乏保障，在城市聚居生活的无产阶级大量出现，而且这个阶层和上层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从世界角度来说，贫困农民向工业简单劳动力的转换都没结束。因此工人的收入始终有贫困农民做参照，高也高不起来。（在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工业国另当别论）。这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长期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反过来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之下，指望饿肚子的工人乖乖等死是不可能的。造反这事，农民干得，工人更干得。所以世界越来越不稳定。这个造反，还是属于吃不上饭的范畴。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原来那个欧洲中心，巴黎的问题放大版。工业化的经济必须让无产阶级受教育，受教育的无产阶级就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斗争了，还会被马克思的一些奇妙语言所打动，还会组织成工会玩罢工，最后就是组织成党派要政权了。这个骚动不仅是为了吃不上饭，还为了吃更好的饭，为了吃穿之外还有点别的指望。后来经济发展了，工人组织工会拿到了比温饱还略多的工资，还用血换来了 8 小时工作制（名义上的 但有个名义总归更好）。工人们参与文化活动和接受文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文化的作用就更强大了。客观上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工人们维护自己工资的行为阻止了更多的人被卷入工业化。但无论如何，这个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庞大的识字、有闲（相对前代工人）集团。文化不再完全依附于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原本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居然萌发了一种叫普世价值的东西。这个玩意最终成为政治决策是否“政治正确”的判别标准。

又是 200 年过去了，现在呢。苏联解体，中国修正，但马克思的预言却落实了一半。按照马克思的指示，资本家集团不是被消灭，至少也边缘化了。各强国掌权拿钱享受生活管理社会的都是那个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其中一部分，现在该叫官僚资产阶级或者技术官僚了。但这个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大部分无产阶级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工业国压制人口流动的行为使一部分还在原位置的无产阶级过的不错，余粮更多，也更有闲。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在终于要说现实之前。还是要回顾一下过去。为啥工人们更有闲，为啥企业不搞人口自由流动降低成本？原因还是灭掉的那个苏联和修掉之前的中国。你不给工人一点优待和空间，沙俄就是榜样。本来一战结束后，协约国不是不想去挑了莫斯科这个乱党老巢，也有优于布尔什维克的军力。只是一打之下，军队哗变，港口工人造反，而且还有往本国腹地蔓延的趋势。可见资本主义的统治集团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普世价值这种东西，太看重了不行，完全藐视的话，革命的铁拳就要来修理你了。但工人们为啥能从黑社会一般的工会里组织出布尔什维克这样的组织呢？为啥工人们能从急功近利的经济斗争转向新社会构想，进而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呢？如果简单的用工人有闲、受教育来解释，是颠倒了因果。

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成本的下降。近代古登堡印刷机已经开启了这个趋势，等到工业革命降低工业物资成本，进而把印刷、造纸和物流业的成本都降下来。信息的廉价化趋势就不可逆转的开始了。工人识字率的上升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接下来还有大众邮政体系降低了信息的传播成本，进一步还有电报、电话、传真。无线电就更牛了，一方面降低了传播成本，一方面也降低了发送成本——几个电台工作人员可以对几百万人广

播，均摊下来自然是降低信息成本。摄影术和电影则是在低成本上增加了信息的提供量，也算降低信息成本。等到影像技术和电气技术结合，电视走上前台，接下来还有卫星电视。信息在迅速增加总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就更牛了。

这个趋势的结果就是，即使无产阶级绝对上还算不得一个有闲阶级，即使他们一直没有啥余粮买书看，他们也能获得比以前更多的信息。从而想更多的事情，发起更大的群体运动。而掌握这些信息发布渠道的人也发现这样有利可图，于是积极的搞媒体，搞宣传。

信息廉价化的同时，还有两个趋势，就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社会管理技术复杂化。工业化社会千头万绪，各地因为各种因素区别巨大。而且大部分问题都和工业技术的参数有关，不再是几条简单道理一摆就能搞清楚的。前面说了，科举出来的书呆子，见习几年，读读四书五经之外的小册子，也能在地方官任上混混。现在这种事再也不存在了。复杂的社会问题意味着可以很容易搅混水。同样一件事，不同立场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愿意出钱的话，都能找到爱财胜过爱真理的专业人员把话给你圆上。编造理由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但把这理由嚷的满世界都知道，就要花钱………结果大众们的意见往往取决于谁在宣传上砸钱更多。

这个结论和“普世价值”相悖离了。普世价值是认为群众最聪明，最有资格决策的。这其实是 19 世纪和贵族政治，和少数人的共和政治对抗的一种价值观。在那个工业社会还简单的像过家家的年头。这是个进步的价值观。也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主张的东西。但在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最高层还是理解这个社会基本规则的，在这样一个核心（比如中国的高层寡头集体，比如日本的政坛元老，比如美国顶层的几百名准贵族中）领导下，技术官僚分门别类的管理国家。但为啥技术官僚能理解，普通人不能理解呢？这个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到底现在的社会学教材在哪。

社会学教材可以堂而皇之的写主权在民，可以写官员是公仆，可以写股东拥有企业，可以写所有人一律平等。但绝对不会去写官员们需要合法的腐败或非法的腐败作管理润滑剂，不会写人民其实很好忽悠，不会写大范围民主如果简单的进行小规模民主的放大就是程序为王。不会写寡头专政自有其合理性………..当然人民不傻，事实上，每个人都很聪明。但聪明不等于见识深刻，尤其是在社会有意回避一些基本知识的时候。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一个农夫看懂了自己的村社，大概也能摹想一下整个世界的样子。虽然一万个村子并非一个村子简单放大一万倍，但起码还在想象之内；工业化社会的各部门各地区千差万别，绝非见一班而窥全豹就能解决认识问题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落上看到社会有一些潜规则是不那么理想化的，但作为动物，我们必须也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难以了解社会其他角落的潜规则，没办法把这些潜规则放到一起归纳总结。还是只能用那些大面上的宣传词把整个社会的模型粘到一起。事实上，许多处于中层的技术官僚也同样处于这种状态。如果我现在大喊，人民需要一本真正的社会学教科书，才能对重大社会问题做出基本判断。有两种指责我是跑不掉的。首先有人会政治正确的指责我藐视人民的智商，我对此的回答是：智商和见识是两回事，社会的全貌本来就离普通人很远。其次有人会拿出另一条“政治正确”的准则来批判我——自由。如果给每个人提供一本社会学教科书，我就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更何况我完全可能在政治教科书里夹私货。这两个上纲上线的罪名足以在这个世界上干掉大部分政客的政治生命。好在老马平头百姓一个，所以还是要继续大放厥词。

民主还有个问题，就是表决程序问题。3 个人表决，各抒己见，有提案就拿出来表决。这样的民主好简单，30 个人也没问题。到了 300 个人，如果我们不打算每天拿出半天来开会，就最好有个表决程序和提案方式。3 千人的时候，让每个人都了解你的意见就必须用高音喇叭——还得人家有空听。让每个人都看到你的提案就要印刷机——还得人家有空看。到了 3 万人，这完全超出古代城邦公民的规模了，基本上这种情况下啥是民主程序，没人从数学角度论证过，只是简单的用一个代议制解决问题。但作为工程师的老马还是认为数学问题该归数学，不能归直觉。复杂到一定程度的表决，基本上表决顺序和提案技巧可以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差异通过任何决议。

自由也是普世价值的一种，即大家都有尽量自由活动的权利，同时不侵犯别人自由即可。这个问题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也相对简单。大家各自种地，相敬如宾即可。但工业社会，千百万人在一起协作才能创造财富，咋分配，咋使用都成了问题。农业社会，没有啥是不可替换的，工业社会的经济部门千变万化，规模巨大，有不少资源、不少选择都是有天然垄断性的，没法尊重农业社会那种绝对的自由选择。但是，不管咋说，能有自由的选择总归是好事。但无视工业化社会的复杂性就是扯淡了。

还有就是自由市场，这个理想模型既符合自由主义原则，貌似也奖勤罚懒，鼓励生产。这个模型还非常符合农民对自由市场的理解。但实质上，任何交易都有成本，任何交易都需要信息充分流通才有公平——完全透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没利润的。市场经济天生就要在不对称交易的前提下进行。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聪明的人发明了企业，在内部搞计划经济来规避交易成本，减少信息成本。但直到现在，市场经济还是大部分人潜意识里崇拜的对象。

不管咋说，人民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聚在一起打工，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就根据农业社会形成的直觉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为了打破政治垄断，在公共财政和决策中发言，人民要民主；为了摆脱人身束缚，自由地追求幸福，人民要自由；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活的像人，人民要平等；为了每个人都能发财，都勤奋工作，人民要自由市场。问题在于，人民要的这些东西，定义都来自农业社会，在工业社会咋定义，还没重新考虑过。在考虑出结果之前，人民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足以发起 1848 年革命那种大潮，并在大潮中把这些意见混合成现代普世价值的前身。1848 年之后，整个世界的大趋势都是承认这个普世价值，最多只能说实现它需要时间，没人乐意说我是天生要和人民作对的恶人，我不实施这个普世价值。

于是普选、消灭人身依附、自由市场经济这些东西开始缓慢的延伸。一开始旧统治集团，不管是通过贵族共和组织的英国人，还是王权为主的德国人都以为这就是变天的开始。后来发现，不考虑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一盘散沙，缺乏长期规划的人民并不能用这玩意变天，只要稍微安抚，社会还是原来的社会。类似的事情老马也经历过，老马亲眼看过下岗工人代表在扣押了足够的官僚资产后，和被迫前来的官僚代表谈判。谈判结果……..不是工人没有革命性，实在是代表根本不知道咋体现几千工人的意见，结果没有预案，没有完整解决方案的工人在谈判中一败涂地，基本按照对手的思路签订了协议。回头工人不满，重派代表……….一切照旧。现在希腊的平民也是一个路数，减少工资不满，加税不满，减少福利不满。那么，什么都想要，什么也不计后果的结果就是他们永远只能在街头闹，如果没有人像俄罗斯撺掇吉尔吉斯斯坦那样掏钱派人，永远闹不到政

府里。就算有人帮他们夺了权，还是解决不了老问题。历史转了一大圈，还是个肉食者谋之。

既然肉食者谋之，那么肉食者就大大方方的建立了一套体制。基本模式是在核心搞寡头贵族专政，中层技术官僚高薪管理，下层自由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快乐的打酱油。这套体制表面上自由民主平等讲足，但对着一盘散沙，被鼓励用荷尔蒙思考和投票的人民，其实就是该干啥干啥。日本、美国、中国、德国……….各大国的体制从未在实质上如此相像过。同时有一批媒体充当永恒的反对派，本着农业时代剩下的普世价值骂街。骂街内容千奇百怪，共同点是有了普世价值就不必管具体情况，不必论证替换方案的可行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南方系、绿党和各国在野党。

这种情况的来源是啥呢？刚才说了人民比以前更有闲，获得信息更廉价。所以积极的参与政治，不管是不是去打酱油。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信息的廉价，主要是指大规模发出信息的成本低了，单向传播的成本低了。受众之间互相交流的成本并没有同步降低，反馈信息的成本没有同步降低。结果就是吸引眼球或者耳朵的信息是作用最大的信息，刺激你体内荷尔蒙和本能，不用你过脑子的信息才是最大行其道的信息。美国之音和新闻联播都是走的这个路数。在这个路数下，人民相信自己直觉的判断力，跟着眼前的胡萝卜走，坚信自己的直觉引导向光明。结果呢？结果就是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刚才说的那些萌发自工业社会早期，背景却是农业社会简单结构的普世价值大行其道。直到互联网时代早期还是如此。

互联网有两个效果。一是单向发布信息更廉价，于是真相党遍地，自由主义烈火烹油。看这个帖子的不要以为你在 bbs 混久了，看透了自由主义。网民的主体是在新浪网新闻下面发评论的人，是看着凤凰卫视真相揭秘骂街的人，是看着袁腾飞的视频说过瘾的人。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未如此盛行过。我平时在 bbs 外接触的人，从出租车司机到市县级官员，再到大中小学老师，无不把眼前的问题用自由主义方式的骂街来总结，并认定民主自由可治百病。从这个角度说，今求德说的继续保持正确。南方系确实还有上升空间，信息廉价的趋势还要继续推着社会在旧轨迹上走。至于互联网的第二个效果——信息交互，影响还要几年才出来，按下不表。

可能有人对我说自由主义正处极盛的判断嗤之以鼻。因为网上自认五美分党的人固然有，但更多的是五毛党和美分党的帽子被来回扣，打的不亦乐乎。这是因为自由民主这一套曾忽悠倒了一个苏联，现在还被美国拿到中国来找茬。所以大家起了逆反心理。其实自由主义并不排斥民族主义，现在每天反自由主义的人，大部分还是认同自由主义那套普世价值的，只是不能由美国人来实施。他们也认为中国要民主要自由，要联合起来从国外弄到资源。或者干脆一句话扔过去“自由主义能当饭吃吗，老子就是要中国强大，要中国人富裕，要政府给我赚钱的权利和机会，别的与我何干”。这种对内酱油党，对外五毛党的境界正是自由主义的最高境界。中国网络的主流就是这种不知是叫民族自由主义还是叫自由民族主义的东西。所以南方周末这样的文化骂街党大行其道，环球时报这种貌似南方系的对立面也发的一塌糊涂。两者到底有啥区别，别问我，我看不出报纸上登三个代表的宣传和登楼盘广告哪个好，也觉得新闻联播和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不妨互换。国家资本主义走到发达阶段，都是一样的。

过去科举时代，当官的技术手册可以潜规则明规则一起写，因为那时读书人、识字人就是统治阶级。大部分平民接触不到这些玩意，接触到了也拿不出什么“政治正确”的理由来反对。再加上农业社会咋说都简单，所以考了进士的穷儒也能控制好这个国家。到了现在，社会复杂了，潜规则没处学去，大学里只能学到明规则，真要有人开课，必定被“政治正确”的。真正控制社会的那套游戏方法，要么是家学渊源加上从小得到父辈（不一定是本家）的交替栽培，要么是天生悟性强，配上好学历慢慢打磨。这就是寡头太子党和拼命打熬的官员搭配出来的最高层。就是习总、萨科奇二儿子、小布什、李显龙和李克强（县长之子而已）、温家宝、奥巴马等人搭配的世界高层。

然后平民官员转为太子党的父辈，太子党家族偶尔被温和淘汰出局一两个。这就是各大国的现实。随着官僚往政客转型，随着理想主义口号大家都知道是渣，随着工业和金融越来越复杂，太子党的位置越来越牢固。自幼门门精、门门松，但历练很多，出错有人担着的教育方式明显还是优于技术官僚逐级递升，拼命爬阶梯，40 岁之前眼光只能集中在一个角落的发展路线。但平民官员的比例也下降却很少降到 0，因为再优秀的贵族也要换血，何况不那么优秀的太子党。世家在高层重振威风，技术官僚也能坚守一小块阵地。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至于中层么，其实不需要那么全盘掌握社会，也不是每个人天生要入阁拜相的。因此在文化上和平民倒差异不大，从平民中换血也很频繁，他们的腐败也日趋制度化、阳光化。好吧………..其实这是 1984 社会的一个温和版。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1984 里还描写了针对平民的色-情(日！关键字)暴力侦破小说的批量制造，这就是今天的新浪网、劣质网游和火车站法制日报的由来。乔治.奥威尔这种给共产国际和中情局都打过工的人就是看的透彻。

再绕回主题。今求德认为现在大学生的自命地位相当于过去的士人，其实这个还说少了。义务教育和肥皂剧，以及插播的广告给每个读过中学的人都画了一个中产阶级的饼，一个有房有车有社会责任，有尊严有安全感的饼。如果明清那种潦倒的老童生算士人，那么中国的下一代基本都能归到这个范围里。换句话说，下一代人都打算要房要车要娇妻要二奶，还要社会尊重和认同感，别指望低保+廉租房+混日子能打发掉他们。尽管我没必要为商业广告的背景负责，但我还是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普通人因为获得的廉价信息太多，也因为前几代工人用血换来了 8 小时工作制，结果对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吃饱穿暖就行，这说明大家对啥是活的像个人样有了更高的定义。这是好事！南方系能卖的好，起码说明大家有了精神生活，也是好事！

事实上，苏联倒台的时候，人民不缺吃穿；颜色革命的国家也不是解决不了温饱。但人民还是要不满。缺啥补啥，这说明苏联没满足大家的需求。眼下中国这群人是否也会造成动荡？我看未必。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在逐渐转型了，大家都看透了，到底是用社会主义的壳还是资本主义的壳，实质统治秩序都一样。所以壳该换就换，官僚该往政客方向转就转，选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该放就放。放了就可以提供大量虚幻的满足感和发泄感来满足大家的精神食欲——营养好不好不管，管饱！实在不行，还可以让大家上街有希腊人民的自由，可以让大家喊着民族主义口号去打仗，去自由的搞法西斯。至于这些事情哪个能侵犯到统治集团的秩序？我看哪个也不能。早慢熊早就对这个未来下了定义——历史的终结。归根结底，自由主义要达到的目标，共产党会更快的达到，何必折腾呢？美国现在的实际权力结构和中国有多大差别？是翻盘折腾的成本高，还是执政集团学会利用媒体，学会用媒体和程序控制选举，学会作秀，学会合法腐败，学会养听话的黑社会成本高？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是否会在自由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幸福生活里好好过日子，或者至少认定这个狗年月虽然混蛋，但比其他选择还是更好。从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菲律宾的经验来看，这个目标不难达到。现代国家为大家提供的防暴警察+自由主义+网络游戏的套餐真的很强大。强大到既让你觉得自己享受到了反抗的快乐，又让你实质上在老套路里走。今求德老兄，你真的还是看不穿啊…………….自从苏联倒台之后，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玩不倒大国，因为根本没必要玩……….

只是世界上还有 2 个玩意不老实，一个是提供交互性的互联网，一个是卷土重来的共产主义。

互联网是啥？既是个廉价的信息发布地点，也是个廉价的信息交互工具。后者刚刚开始显现作用，在咱们 sb 至少表明时间的推移并不利于真相党。虽然短时间内真相党爆发，但长时间的讨论会让事实慢慢显现。

共产主义是啥，是人类的美好理想，换句话说是普世价值的承载者。这一点和自由主义并无差异。共产主义还是啥？还是马克思的严肃推导，一个根本不认为社会简单到可以用直觉判断的严肃理论。共产主义的后一半，随着学过概率论和高等数学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知音体的文章慢慢交出阵地，随着大家都认识到搞工程有多难。还是会改变这个世界的。

总而言之，老马认为人类的胃口提高了是事实，也是好事。但不能放任廉价信息和自由主义直觉带来的社会这么走下去，否则今求德对动荡的预言就要失效。人类还真可能暂时的让历史终结一阵子。等到大家开始用科学而不是直觉来阐述自己的普世价值时，世界就该不一样了。

最后，资本主义还有个自掘坟墓的习惯。08 经济危机到底啥后果，咱们走着瞧。

终于说到最后啦，估计会有人说。这么一个简单问题你你忽悠了上万字，你有病吧。我只能说，世界就这么复杂，故意简化过头的描述才是恶意的歪曲。大伙要不想当乌合之众，还是把打网游，在网上骂街的时间拿出来认真考虑一下问题。愚钝如马前卒，还能忽悠这么一大篇。各位高人必有更先进的说法才是。

后半部分为后半夜打字的结果，无序且混乱，啰啰嗦嗦说了不少车轱辘话，估计还是没说明白。在此还是推荐《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何尝会温柔》这篇老文章，可以回答独孤求婚的部分问题。现在马上要纂一个 40 万字的时政书稿，其他坑一概靠后。老马必须睡觉了，真的抱歉没空把本文写好。好在新书虽然是个商业项目，却恰好针对本文说不清楚的问题写了不少内容。老马要睡觉了，回头新书欢迎大家捧场！

如何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

——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序言

一个平等的世界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并不符合现实。在这个狭小的星球上，少数几个发达工业国家事实上主导着全球经济体系，并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了制高点。中国是落后国家，又确定了融入全球化，利用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争取复兴的基本国策，自然会把这些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样板。不过，作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这些发达国家乐于看到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并积极的在中国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允许同属经济要素的劳动力向它们的国土自由流动。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样板国家”并没有直观印象，只能由少数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转述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和见闻。

就目前而言，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描绘为沐浴在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天堂，西方议会民主保证了人民的权利，自由市场则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则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本文将试图用事实和数字来分析事实的另一面。

本文选择日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考虑到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

一 日本的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 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

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 1946 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 1947 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 ”，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

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
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
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

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

提取 500 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 500 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已，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

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 1 人 1 天只有 4 支，肥皂 1 人 1 年 1 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 年 10 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 34 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 年 8 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 年 2 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

2002 年 5 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 1，623 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 1，306 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 129 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 47 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 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 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 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 1947 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

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 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 6 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 4 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 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 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 17%，据 1993 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 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 One set 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

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根据 2000 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 96%、牛奶 95%、肉类 85%、蔬菜水果 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 67%、肥料 83%、农机具 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二 日本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

（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由国家机器集中货币主导投资，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

（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事实上的国家垄断。

（3）国家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各部门统一规划，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日本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只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利掌握于企业界的联合组织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经团连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连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连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经团连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方案（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方案。

日本政府毕竟在名义上是议会民主的产物，因此经团连需要控制议会。具体控制过程如下，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日本议会民主的本质。在日本，政治家和政党接受经济组织的政治捐款（献金）并不是需要避讳的事情，只要遵守一些很松散的规则即可，如：政治团体的代表或领导人，只有在被证明对该团体财务负责人的选任和监督两个方面都出现失察和失责的情况下才要负刑事责任，相关省厅的大臣或政务官不能接受相应的政治献金等等，这些规则一般都非常容易规避。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献金，日本的绝大部分政治团体都无法生存，因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财团捐献的政治资金已占日政界所获政治资金的 98％。唯一拒绝接受政治献金的议会党派就是日本共产党（依靠发行党刊和开办医院等党营事业支付办公经费）。

如果只是企业对政界献金，看起来并不太出奇，因为大大小小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总不能全靠成员交党费运转，政治派别接受社会政治捐款，各国大抵如此。但国内很少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经团连，而经团连根据一个早就拟订好的打分制度对各个党派分发捐款，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日本政治的本质。（前面曾经谈到日本的大小企业分别结合成经团连和日经联，并在 2002 年合并成新的经团连。就是这个经团连代表日本的企业界出面给议会各个政党打分。）下面这张表格是 2003 年 10 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经团连给各政党打分的简表。

日本経団連の「優先政策事項」と各党公約の "採点"

優先政策事項	主な事項	自民	民主	公明	保守	社民	共産
税制改革	法人税引き下げ、企業の税・社会保障負担の抑制	B	B－	C	A	D	E
社会保障	消費税率の引き上げ	B＋	B	B－	A－	D	E
規制・行政改革	医療・福祉・教育・農業への株式会社参入。道路公団、郵政事業の民営化	B＋	B－	B	B	D	D
科学技術創造立国	先端科学技術開発とその産業化	A	B－	A－	A	B－	C
エネルギー・環境	原子力を基幹エネルギーに。環境税反対	A－	D＋	B－	A	E	E
教育改革	競争原理と評価制度の導入。株式会社の学校	B＋	B＋	B－	B＋	D	D
雇用	派遣、裁量労働の促進	B	D	B－	B＋	E	E
都市・住環境	都市圏の道路、空港の整備、民間企業の活用	B＋	B	B	A	D	D
地方制度	補助金・交付税見直し、市町村合併推進	A－	B＋	B＋	B＋	D	D
貿易	ＷＴＯ（世界貿易機関）交渉の早期合意。農業の「構造改革」	B＋	B＋	C＋	B－	D	D

（注）A　非常に良い　B　良い　C　触れていない　D　悪い（逆行など）　E　非常に悪い（相いれないなど）　それぞれ「＋」「－」あり

http://azalea.sunflare.co.jp/COMM/F1.jpg　　表 1 经团连的评分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打分有很严密的评价体系。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都单独立项，每一次立法投票都对各个党派的投票倾向按 A-E 五等打分，每等中还用+-分出三个档次。汇总后经团连就按这个打分表给各个党派发钱。资金来源是经团连下属企业的捐款，经团连根据纯资产把伞下企业分成 25 个层次，纯资产 100 亿以下最低要出 50-200 万，100-150 亿的下限是 100-300 万，3000 亿以上起码 1000 万以上，此外还根据经营规模和营业额等综合测定，协议出资额，2004 年计划分发 40 多亿日圆的政治献金。（数字引自京都新闻 2003.11.19）。在与每一次投票挂钩的高额奖金刺激下，各派政治势力无不对精心揣摩经团连的意图，言听计从，经团连的意见书百分之百的变成了具体的法律规章。

关于降低法人税，要从现在的实质税率约 40%，降到 20%台的水平。同时消费税从目前的 5%逐步提高到 18%。此外还削减养老金和提高养老保险费。经团连的意见书：

産業力強化の課題と展望－2010 年におけるわが国産業社会－」（2003 年 4 月 22 日）

「『近い将来の税制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政府税制調査会中期答申取りまとめに向けて－」（2003 年 5 月 29 日）

「今次年金制度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2003 年 9 月 10 日）

这些意见书已经演变成正式法案。经团连关于反对修改独占禁止法的意见书：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日本経団連意見」（2004 年 4 月 15 日）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コメント」（2004 年 6 月 25 日）

日本刚通过可以出口武器的法案，对应的经团连的意见书是：「今後の防衛力整備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に向けて－」2004 年 7 月 20 日

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2004 年 5 月 27 日经团连设立了「国の基本問題検討委員会」想必将制订出意见书，然后交国会变成法律。

经如此介绍，读者当可看出，日本议员其实只是大财团的投票机器、政治宠物，各个党派争吵不休，不过是揣摩大企业官僚的心意，吃醋争宠罢了，所谓的议会民主，一张幌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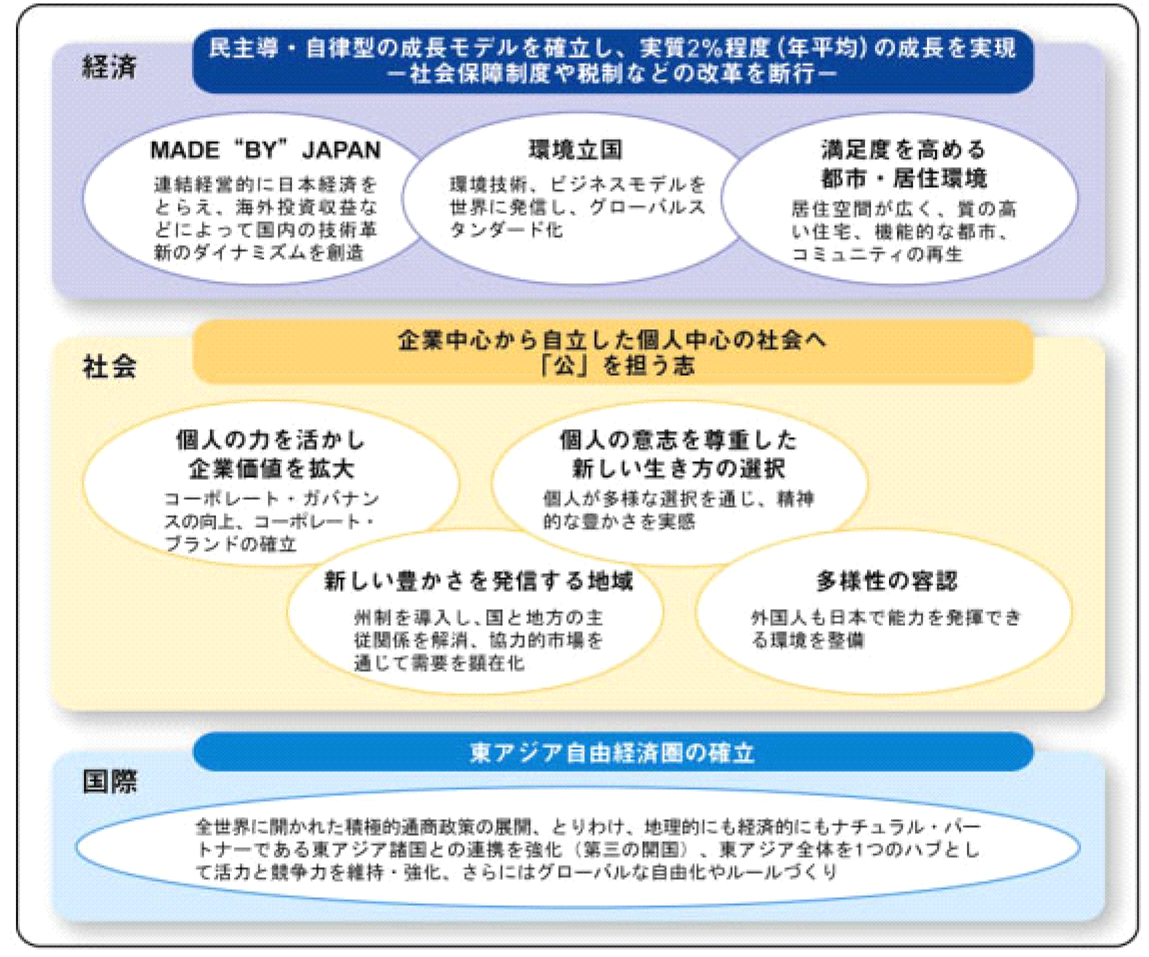
议会虽然已是经团连的驯服工具，但大企业的官僚们并不希望这个工具索要太高的价码，经团连通过巧妙分配政治献金，始终让议会中的大党之间保持平衡，不使一党独大，防止一党主导议会投票后和经团连讨价还价。如果已经形成了独大的政党，就一定要在党中搞分化，促成各种派别，这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等大党党内外斗争和不断出现的各种派系的原因。（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所有议会斗争的本质）

举个例子，根据 2004 年《一次政策评价的发表》，（经团连网页 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04/012.html），自民党得分 85 点，民主党得分 50 点以下，自民党明显比民主党更贴近经团连的主张。2004 年经团连的政治献金约 40 亿日元，如果经团连下属企业自主决定政治献金方式，那么 40 亿日元基本会给自民党。经团连统一献金，则自民党 63%（85/135），民主党 37%（50/135），这样就保证了自民党不至于独自控制议会，拥有与经团连博弈的能力。如果一定说日本是个自由市场国家的话，恐怕议会是唯一体现这种竞争原则的地方。

关于国会，这里还要说一下，虽然立法活动和内阁决策已经基本为财团掌握，但议员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和象征意义还是让各派势力趋之若鹜。特别是官僚集团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更是希望直接掌握投票权而不是通过收买这种间接方式插手政治。这就构成了日本政治中特殊的“族议员”现象。所谓族议员，倒不一定是家族政治（虽然日本议员有相当比例的父子相承，甚至祖孙相承），但肯定是稳定的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运输族代表汽车修理业的部分小业主和运输省部分官僚反对取消车检，厚生族直接代表医生协会捍卫医师优惠税制等等。这些族议员在服从大财团之余，还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及社会地位，千方百计直接为所属的“族集团”牟取利益。这给日本议会政治带来一些争吵和不确定因素，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议员代表所谓的“人民”，他们只是各个大小财团、利益集团的投票机器而已。

很显然，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赤裸裸的垄断企业专政，经团连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且公开的摆出一副“事实政府”的样子。下面是摘自经团连网站的一幅图。

21 世紀日本のめざすべき国のかたち



http://azalea.sunflare.co.jp/COMM/F2.jpg　　图 1 21 世纪日本应该成为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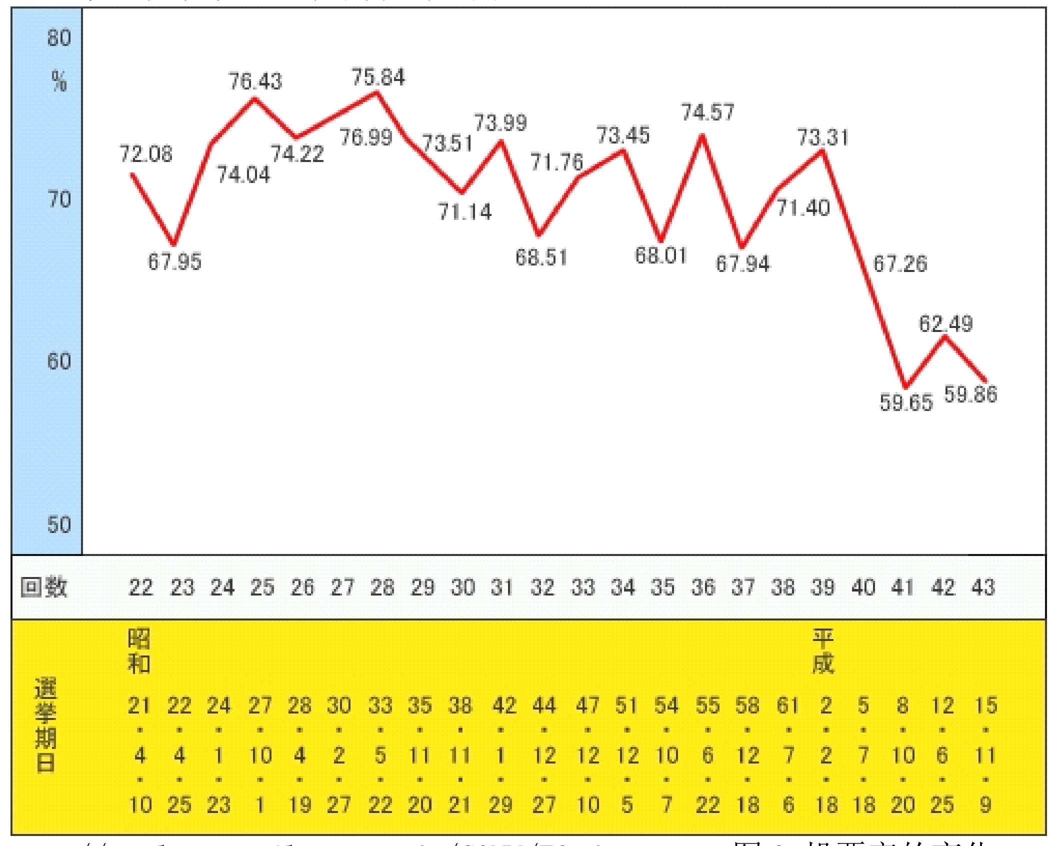
这个图表简要说明了经团连对日本未来的规划——日本作为东亚核心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竞争。这个规划是否会成为现实暂且不论，但制订这个图表的行为本身足以反映经团连对自身的定位。

三 经团连与日本平民生活

少数财团和官僚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和运转，日本平民对此却并没有什么抗议，至少是熟视无睹，只有共产党等少数政治团体不断呼吁取缔政治献金，只是无权无势，在媒体靠金钱运转的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不意味着日本平民已经被资本专政外面的民主包装所蒙蔽，普通日本人对社会现实还是有充分认识的。譬如，日本的议员被民间称为“三ばん（bang）”议员，（“看板”、“皮包”、“基盘”，这三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的日语发音都是ばん bang）。看板就是广告牌，有能力把自己的画像贴到大街小巷。皮包里装的是钱，有钱方能当选，有钱才会投票。基盘则是老子遗留的势力和人脉。日本的议员普遍世袭，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小泉是三世议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的老子是原首相，田中真纪子的父亲是原首相田中角荣。由秘书承接老议员衣钵的也大有人在。

议员既然如此，日本平民自然对政治没有兴趣，车站门口时常有些议员或准议员抱着扩音器演说，但很少有人驻足围观。平时一般人都要工作，没时间搭理，而即使在节假日，也基本没什么人看。除非党魁或派系领袖出场，才能热闹一些，但也不排除事先安排人手做秀的可能。而日本的投票率也逐年下降。如下图。



http://azalea.sunflare.co.jp/COMM/F3.jpg　　图 2 投票率的变化

投票率走低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是日本整体国民参政热情的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代平民对政治了无兴趣。青年人生于这种政治决策于己无关的社会，比父母一代更不愿意投票。30 岁以下的人，投票率不足 40%。倒是女性的投票率稍高，但在女子普遍以家务为重的日本社会，这多半只是反应了女性的闲暇较多而已。可以预见，未来日本社会的投票率会越来越低。

经团连控制下的政府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不便干涉日本的一般生活秩序，但作为日本的事实主宰，必要时介入平民生活是必要的。事实上，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下政府——暴力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却不是整天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组织，暴力只是他们经营事业的保障，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平时还是避免使用。暴力团的财产基本上来自色情、赌博和高利贷等行业的利润或保护费（变相的税收），这些行业或为日本法律所禁止，或者打擦边球，总之是一些边缘行业。新宿的歌舞妓町就是暴力团的财源之一，日本最大的高利贷会社、东证上市企业，武富士也有很深刻的暴力团背景（在日本经营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若无暴力团通过武力威慑确保欠款人还钱，就难以规避伴随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或许是日本主流社会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些行业很是兴旺，暴力团也获益非浅。

以日本财团力量之盛，政府议会尚且是经团连的附属品，暴力团也不例外，前面说过的武富士高利贷公司就是经团连的成员。事实上，在经团连面前，暴力团和政府不过是左右手

的区别，都是财团控制社会的工具。暴力团虽名为黑社会，和政府间基本上处于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政府利用合法手段介入成本太高的社会领域承担了管理职能。举几个例子，东京都政府在新宿，新宿的区政府在歌舞妓町，暴力团的最大财源之一——歌舞妓町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搞非法色情事业，却一直无人过问。而新闻里时有暴力团枪战的报道，枪战过后，警方马上就可以报道说暴力团成员某某死伤。说明警察深知暴力团内情，但从不干涉其运行。政府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征用土地。日本的土地名义上私有，受法律保护。政府一家一家的去谈价钱，免不了有满天喊价的钉子户，这个时候往往由暴力团出面摆平。政府与暴力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说不清的。

四 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

前面几节是对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的一些介绍，与目前国内对日本的一般认识多有冲突之处。但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信息来源，事实上，上述信息都来自公开的媒体或者调查机构，有关经团连依照打分表发放政治献金、控制立法机构的图表和文字部分来自经团连自身的官方网站。之所以国内大部分人依然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家，恐怕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即默认只有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能够带来富裕安宁的生活，既然日本是第二大经济大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创造了“日本奇迹”，那么，奉自由主义思想为真理的思想界自然倾向于用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和分权民主的政治理论去解释这一现象，无视基本事实地把日本名义上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看做是真实规律的体现，甚至动辄以日本作为市场经济、议会民主的成功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在日本这个典型样本的参照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事件，详细分析具体的运行过程而不是满足于对表面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当然，正如序言所说“……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西欧和北美工业的国家早在１９世纪就占据了对全球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能够轻松的向外界轻易转嫁矛盾，它们现存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建立了１个多世纪，磨合良好。表面上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实质上的资本专政。象日本这种由经团连向议会打分发钱的赤裸裸手段，一般不会在英美等国出现。因此观察这些国家的运行规律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分析。

英美等国自立宪以来，选举中基本是两党竞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竞争党（无论是哪个党）的纲领越来越接近，甚至随着竞选形势的变化而交换立场。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保持竞争的需要。但两党都没有坚实的基层组织，党的唯一作用就是竞选本身。一定要用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竞争来解释党派斗争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事实上，通过与日本的议会选举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纲领相近的党派是大财团收买成本最低的政治结构。既不会出现单个党派控制议会（或直选），不听指挥或漫天要价的行为，也没有政治派别太多，乱中出错，交易成本太高的弊端。还能自然的作出激烈的竞争姿态（如前所述，争风吃醋）。从这个角度看去，激烈但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的政治斗争就很好解释了。

当然，在总统制国家，行政权相对强大，总统一经当选，任期固定，总统在地位暂时无忧的时候有可能做出与大资本大财团利益相悖的举动。大资本即使控制议会也不能随时倒阁阻止其行为。这时就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来保证财团利益。譬如刺杀（肯尼迪）、适当的造出

一些丑闻（水门事件）并在达到效果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让丑闻消失（克林顿）。这些事件看似偶然，且都有正常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把这些偶发事件及最终结果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关性，这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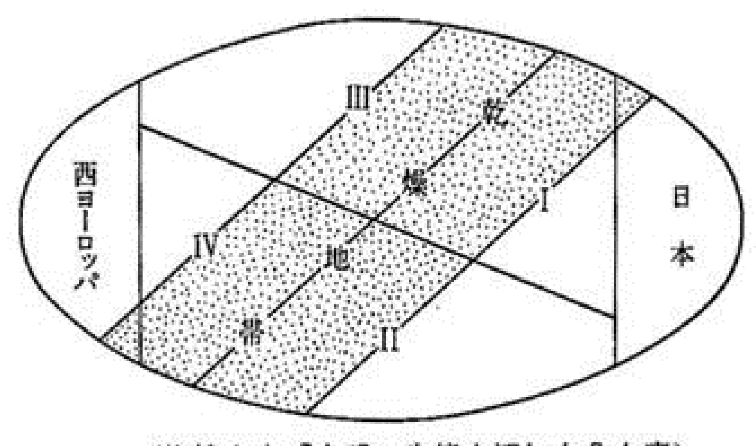
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但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倾向性和与政府的默契程度不如日本暴力团。至于为美国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充当打手的私人军事公司，早就走上了前台。

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今的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大企业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譬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贷款担保。另外、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有高额补贴，这似乎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理论来解释。当然，大部分发达国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占有优势的行业会很高兴提倡自由贸易，但这显然不能为贸易自由做榜样……….

限于篇幅和资料搜集能力，本文对其他国家不再进行系统分析。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与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都偏差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向国民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这种事实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的演变，以便更好的解释现实世界。

五 历史的沿革

日本及西方社会是工业革命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只是在庞大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员。组织中的个人觉得压抑，于是高喊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整个社会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至少与中国人理解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这种体制继承于中世纪时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靠现代文官制度的前身——科举制度产生，经济上以自耕农+全国大市场的自由经济为主。这种差异最终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结果。用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态史观》中欧亚大陆示意图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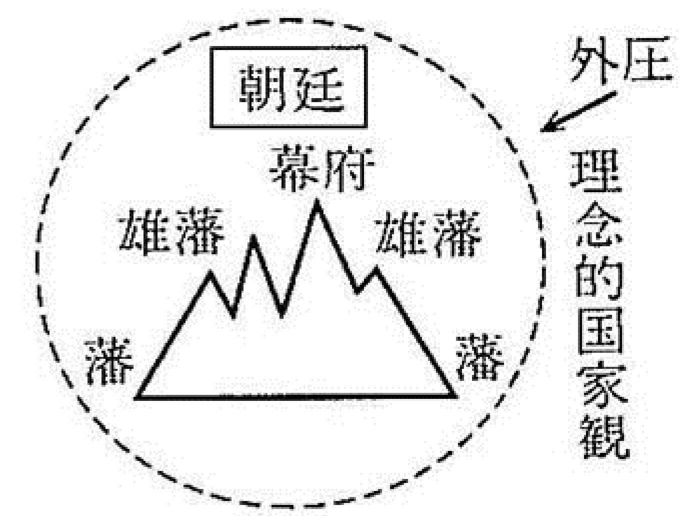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中公文庫）

http://azalea.sunflare.co.jp/COMM/F4.jpg　　图 3 欧亚大陆的示意图

旧世界的主要文明发展可以分为第一和第二地域。旧世界是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可以简化成椭圆形。椭圆的东西两端的日本和西欧是第一地域，进入近代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地域是椭圆的其它部分，进入近代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地域的中心位置，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范围干燥地带，古代的高度文明处于干燥地带的边缘，如中国。干燥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对文明有极大的破坏力。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和统一治水，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第一地域很少受干燥地域的暴力影响。这个地域的西欧和日本，进入中世纪时产生了权利分散型的封建制度。西欧以种植小麦为主，小麦的产量比水稻低，再加上喂养家畜，经常为争夺粮食发生流血冲突，中世纪的欧洲私斗横行。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倚赖有力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间的互相争斗，需要国王拥有权利进行全国平衡协调，形成了国王支配领主，领主再支配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形象直观，以中世纪的日本为例来说明封建制度，如图 4。



http://azalea.sunflare.co.jp/COMM/F5.jpg　　图 4 封建制度的构造

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禄，约占总人口的 1/4，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 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

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 年

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

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嫁，如克扣武士的奉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

1853 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 2000 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大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譬如：当年藩之间和藩内的交易是通过特权商人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权商人积累了很大势力，能够和特定藩的财政相互结合，谋取更大的利益。当时的特权大商人三井就拥有为幕府发行纸币的特权。幕末的经济政治动荡，三井又为幕府提供资金，如 1864-1866 年镇压长州藩反叛的战争。由于长州战争失败，三井又暗中支持长州倒幕，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时，以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 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维新后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和发行纸币。现在经团连操纵政党，在历史中能找到影子。

再以三菱为例子，土佐藩 1870 年（明治 3 年），以 3 艘汽船创办名叫“九十九”的海运会社，岩崎弥太郎被任命为经营、监督者，这是三菱的起点。不久“九十九”更名为“三川”，1873 年（明治 6 年）岩崎弥太郎成为社长，更名为“三菱”。1877 年（明治 10 年）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三菱负责给政府军运送军火和补给，得到了大发展，占据了大财阀的位置。

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是亦官亦民，被称为“政商”。他们直接干预、支持政府的运行，并从政府得到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井等幕府时代的旧商人，产权是不清晰的，是受限的股份所有制，出资人只能把自己的股份传继，不能分割转让，也不能拿取本金，只能根据规定领取经营的利益，投资优先。经营者则由招聘而来，或长期培养选拔，出资人不能随意干预经营。这种受限所有制被称为财阀“总有制”。这种“总有制”演变成今天日本的经营者支配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股东的牟利趋向对企业经营的刺激微乎其微。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文士又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现状和变迁完全没有了解。完全凭中国传统的小农-手工业自由市场思想去理解现代工业经济，凭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去接受西方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自由。结果到现在，南辕北辙，离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越来越远，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基层组织瓦解，中央集权也成无本之木，只有依赖西方及日本的大工业体系活命。

附文 经济效率与现实世界

现代经济体系具有很复杂的组织结构，在工业领域、机器与人力被企业组织在一起，开发自然矿产和能源，造出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更多、更精密的机器。在教育体系中，人们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并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最终为未来的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在科研部门，专业人员不断的进行实验、研究、思考，为社会提供和储备知识与技术.....这一切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能够生存并扩张的经济体系。很显然，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所有行业的运转细节，但为了分析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律，经济学家必须将所有的行业纳入考虑之中。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对复杂的现实经济体系做一定的简化。简化模型能帮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不过，在应用任何简化模型的时候都必须时刻注意模型与现实社会的不一致，并力求将这种不一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审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假设是很有必要的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有下面几点

1 财产私有制是社会的基础

2 自由贸易原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

3 政府不应干涉经济

同时，依附于这种经济学体系的政治理论则指出，自由主义政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公民自己会对生活作出选择，政府的任何干涉和控制都将带来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对于这些原则，支持它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来试图证明它的不可侵犯，有的乞灵于自然法，有的竭力从宗教中寻求帮助，总之是要把这些法则套上神圣的光环，把反对者扣上“反对文明”或者“道德败坏”的帽子，从而试图阻止对它们的质疑。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曾经先后被套上过这种光环，也都曾先后被无情的贬斥为罪恶的源泉，但无论这些论证巧妙还是拙劣，历史总在前进，经济发展才是历史的根本动力。

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达到富足，因此，效率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评价标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趋向于能达到最高效率的制度。在许多时候，这种趋向通过缓慢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会进行对抗，而同一个社会内部也会出现不同

经济制度的对抗，具体表现就是战争与革命。无论是哪一种，总的趋势都是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被淘汰。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为了解释现代西方发达社会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我们应该研究现代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

基于效率标准，现代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其逻辑基础。简要的可以总结如下：鉴于人人自私，只有私有财产才能在自私的保护下得到最好的照看，并通过拥有者对财富的渴求达到最快的增殖目的。同时，自由贸易是社会分工的组织纽带可以使任何财产体现出它的价值，并流动到能够使其最快增殖的主人手里。如果前两个原则得到贯彻，那么，一切财产都会在最能将其增殖的主人手里得到了最好的照看，政府要尽量避免打扰这个最优状态。至于附属的政治理论和其他具体的经济政策，不过是把个人自由和福利量化后代入这个逻辑结构的结果而已。

这个理论推导看上去完全自恰，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上的许多具体现实，这就是它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之一。不过，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其中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企业悖论--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自由贸易理论，会发现企业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因为各种社会资源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完成分工并达到最佳状态，在个人生产与市场之间出现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一定会导致效率损失。亚当.斯密曾经使用一个著名的别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促进效率，但如果自由贸易真能完成这全部的分工的话，别针厂就不需要存在了，每个车间和工种大可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相互博弈竟价，还可以在同类企业中形成竞争，最终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再极端一点，连这种车间级企业的存在也违反市场规律，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每个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市场中博弈，最终用复杂的契约和换算方式达成平衡，完成整个别针的生产过程。但事实上，别针厂运转的很好，并没有被无数个人的竞争所排斥，其他各个工业部门也存在大量运行良好的企业，这说明光用私有制和自由贸易两条原则来组织经济活动还远远不够。

企业为何存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为什么工人大多数接受固定的日工资而不是对每天的劳动都进行一次谈判竟价？为什么资本家要雇佣经理、监工和工人并指望这些不拥有企业本身的人去为企业的利益努力工作？难道不能让他们为自己工作，然后从他们手中购买劳动产品吗？这一切的原因在于真实世界与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偏差。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指出分工能够促进效率，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效率必须通过交换来得到体现，张五常之流的经济学家经常会使用这种例子：A、B 两人达成协定，合作伐木，其中 A 力气大，负责砍树，B 擅长赶车，负责把树运到城里供出卖，两个人通过契约来规定收入的分配比例。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分配比例不利于自己，或任何一方能找到索价更低的合作伙伴，都不会达成合作协议。这样，最终的收入分配方式充分反映了砍树的工作和赶车的工作所值的价钱，充分调动了两个人的积极性。

这个例子有问题吗？没有，正如前面所说，西方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上的许多具体现实”，如果模型限于农贸市场和伐木工人，模型的逻辑没有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模型无法推广到整个世界，认为这种伐木工人的契约在各个经济部门复制无数次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是书呆子的想法。我们必须分析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在这个契约里，A、B 双方都很了解对方的劳动，很清楚伐木+赶车就能带来利润--所以他们可以迅速达成合作的意愿。双方可以在无数的合作者中进行比较，寻找索价最低的合作者，这种比较是基本不消耗成本的--如果在合作过程中一方要提高出价，你可以迅速找到替代者，这个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下面几个条件：

1 所有合作者都很清楚能够取得利润的合作目标，达成这个共识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不是 0 也可以忽略。

2 选择合适的合作者不需要成本，如果某个合作者中途退出，寻找新合作者的成本也非常低。

3 所有工作和资本都可以被量化评估,具体到个人，并通过所有具有这个技能者的竟价达到合理价格。

如果条件 1 发生变化--市场上存在许多劳动力，具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但他们并不清楚如何组织这些技能--这正是符合大多数现实的描述，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合作，通过试错法淘汰效率不高的组合方式，努力寻求更大的利润。但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加入已有的经济组织寻求一个好职位。或许这个选择并非最优方案，但试错法的成本或许更高。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让大部分劳动者达成某个共识是不现实的，哪怕是最粗疏的共识。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在已经结合好的企业中接受稳定的契约，这个契约并非是最公平的契约，但在信息交换会占用大量成本的情况下，或许是一个成本相对最低的选择。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在社会中，对某个行业具有深入了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方面强调人的智能体力限制，认为分工达成效率，另一方面又要求每个人都了解整个生产过程，从而“理性”的达成契约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同样，条件 2 也很难得到满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合作者过多或对其他工作缺乏了解等原因，无法允许每个人都去挑选自己的全部合作者，由一个企业根据某些条件来挑选并管理劳动者显然更有效率。最后是条件 3，必须指出，在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把所有的工作都量化评估后分发计件工资是很不现实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预先制订好的分配制度来代替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计件工资。

与最优的资源配置相比，任何经济计划都可能带来效率损失，这是对的，市场可以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这也是对的。但是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配置资源都需要成本，计划经济的成本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譬如：当雇员每天领固定的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时，雇员会趋向于偷懒，当企业使用固定的考核指标时，考核指标之外的事项将不被重视这都是计划经济的成本。但纯粹的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巨大成本，因为在个别劳动者不能完全理解整个经济体系的时候，一切资源和人力的组合都需要用试错法和竞价来挑选，这对于两个樵夫组成的砍树经济或许合适，但如果你指望任何现代工业企业的全部成员通过自由的互相交易来完成分工合作，谈判时间可能会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永远无法达成谈判。在这一方面，企业家要比经济学家清醒的多，为了最大程度的追求效率，他们不追求虚幻的“最优配置”，而是宁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人类智慧来分配资源而不去指望低效率的市场。

前面的讨论或许有些复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讨论：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提供压力，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人类必须创建企业，在企业范围内对资源配置进行计划管制。这种管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配置，但它可以更高的效率完成资源配置，从而节约了最大的成本：时间。事实上，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企业存在的现实，但他们坚持认为企业的存在不改变总体上的市场经济，因为企业之间还在互相竞争，形成外部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随着企业的增大，内部成本会逐步上升，带来越来越高昂的成本，从而保证了宏观上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科技门类和工作种类不断增加，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成本也在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一个科技进步不断改变最优资源

配置方式的社会里，市场永远不会及时的把资源配置到最优。两相对比，理论上对最优配置的趋向并不能帮助市场经济获得胜利，胜利永远属于成本相对较低的一种经济制度。哪一种制度将胜出呢？经济学家在作出市场最优的结论时并没有详细的对比两种体制的成本--事实上，从来不愿意关心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篇短文里，作者也同样不能作出这种对比，因为这需要考察整个工业、科研、教育体系，但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在前三节中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并粗略讨论了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结果，我们发现了庞大的垄断企业和与被大财团控制的国家机器。这说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经堪的是与国家相比，（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株式会社”）甚至使地球的尺寸都嫌太小。自由市场被迫交出了统治地位，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属品和装饰物。而垄断机构需要服务人员，不是为了自身产业的兴旺，而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官僚、工程师和教育人员，他们或许没有小业主的精明算计，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创造了超出其他体制的效率。这种制度，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也人称其为改良资本主义，但不管叫什么名字，它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都相去甚远。这种体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与其他体制一样，它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1840 年，一向不干预具体经济运行的中国 政府败于为财团利益而战的英国军队，丧失了独立关税权，这就是中国人对这种制度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无论经济学家论证的多么巧妙，逻辑多么清晰，事实足以推翻一切。

西谚有云“存在既真理”，前面的讨论一直遵循了这个思路，因此我们不注重复杂的逻辑推导，而是基于效率竞争原则，直接观察现实的世界，从而发掘当今世界的经济规律。同样基于这个思路，我们也要找出目前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理由。应该注意到，现代经济学奠基于在西方刚刚开始进行贸易活动的年代，那个时代的自耕农、行商、海员乃至海盗们的行为决定了这门科学最初的思考方式。在亚当.斯密及其他早期经济学家系统地陈述经济学规律的时候，他们只能去总结眼前的现实--以帆船贸易为主的商业，以个人手工劳动为主的工业，以畜力耕种，没有生物科学指导的农业，以及缺乏官僚机构的政府。而人口，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更少更分散，大部分经济契约在相互熟悉的人之间发生。在那个世界里，经济体系比今天要简单的多，工业革命尚未发挥它的威力，无视组织计划的作用，忽略信息交换的成本对于早期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顺便说一下，亚当斯密在著作中谈到的唯一有现代化气味的工厂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别针工厂。为了描述这样的世界，经典经济学理论确实足够精确了。不过，我相信，如果亚当斯密能够复活，看一眼今天纷繁复杂的工业社会，他一定会重写他的著作的。

经济学如果真是一门单纯的科学，在现代工业彻底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后，它一定会修订自身的一些基本假设，但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这导致了它不能象其他科学一样，随时根据现实修订理论，最终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相对现实世界的滞后。另外，在今天，虽然结合紧密的垄断企业已经统治了这个社会，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既然西方经济学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支持这种学说自然对已经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本国有利，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与科技均远远落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农贸市场式的交换仍有其空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把一些边缘的简单装配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后，倡导自由贸易和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正好大展拳脚，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在今天的生存状态。

六 对近代历史的一种解释方式

在第五节里曾经谈到，“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下，对历史的描述方式也趋向于用市场和私有制来解释 15 世纪全球化以来的兴衰。在这种历史观中，凡是有自由市场的的地方就有繁荣，凡是把私有财产神圣化的地方就有高速的经济发展，而凡是政府试图规划经济的地方最终都会衰退，西方因此而兴起，古老的农业帝国因此没落。不过，既然本文的作者否认市场是大工业时代以来的主要发展要素，自然也不会承认这种历史观的真实性，下面将阐述另外一种可能的历史解释。

用市场和私有产权两个标准来预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有一定的道理和适用范围，本文作者认为这个适用范围的下限不晚于 1800 年，在这以后，科学技术的进展和世界贸易的深化使经济体系复杂程度急剧上升，同时使大多数人完全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完全遵循自由竞争并指望私有产权制度促进繁荣的国家在此以后将被逐渐淘汰。但在此之前，整个世界的低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决定了自由市场的兴盛。事实上，在 16 世纪以前，由于中国发达的官僚制度扫清了土地贵族，中国对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低税率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手工业品生产足以压倒其他任何国家，这正好解释了在西方扩张的早期，贵金属向中国的流动。但是在 1800 年以后，西方工商资本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使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力量，最终能利用工业革命的优势向世界扩张，把原来只能欺压落后民族的贸易站变为向发达农业文明挑战的基地，最终控制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弱小穷困的日本能在 1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落后的半殖民地转变为发达国家，任何历史解释方式都不能把这个事件排除在外，下面将具体讨论 1800 年以后的历史发展。

在近代历史中，经济是最关键的决定力量，而 1800 年以后的世界进入了现代工业和全球贸易阶段，由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经堪与国家相比，只有受到国家机器坚定支持的经济体系才可能得到最快的扩张。但是，工商企业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不能在一夜中完成，与任何其他社会变革一样，变革的成败和效率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国与日本均处于远东，先后 在 19 世纪中期受到西方的打击和刺激，都作出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但成败迥然不同，为此，我们必须从变革前的社会、文化诸方面寻求原因。

在前工业化社会中，中国堪称典范，发达的官僚制度消灭了分封制度，除了皇室和极少数儒家官僚，中国没有其他特权阶层。与其他农业社会相比，中国既没有土地-军事贵族也没有宗教特权集团，因此能在广大的区域内维系和平，并且保持较低的税率（特权阶层相对人数少）。特别是在宋朝以后，政府不再直接控制人口活动，只是通过税收来维持运转。自由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创造了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如果把作者送回到前工业时代，作者一定会选择中国作为栖身之地。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农业社会要落后的多。分封制是日本国家的基础，大大小小的诸侯把国家分成数十块，互相攻伐，只在名义上承认天皇的权威。间或有某个强悍的 大名（领主）压倒其他大名，占据幕府将军之位，但也只是领主中的强者，占有相对较大的领地，并不能用统一的官僚体制取消其他贵族的半独立地位。由于领主众多，内战不止，日本拥有庞大的武士阶层。大名和武士都属于贵族阶层，接受农民的供养，在 19 世纪初，虽然已经多年没有大规模内战，但武士和领主依然占总人口的 20%，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日本平民的经济负担之沉重，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这个体制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中期。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完善的农业文明，与美洲、非洲、澳洲与世隔绝的落后文明不可同日而语，西方虽然扩张迅猛，但在 1800 年以前，限于手工业和帆船贸易所能提供的力量，只能在远东建立渺小的贸易站用美洲金银来交换远东的先进产品。直到鸦片战争（1840）和美国舰队攻击日本（1853）中日两国才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产生一些改革思想。在这样的局势下，只有尽快转变制度，谁就能摆脱殖民地地位。威胁来自西方，转变制度自然均以西方为样本，但具体如何转变，有两种选择：其一，走西方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然后发展出自己的垄断资本与西方对抗。其二，直接学习西方的现行制度，建立垄断资本。两条路对比，前者是西方的自然发展过程，有先例可循，但历史证明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第二条路可以迅速的转变制度，但由于转变过快，必须用高积累政策来支付迅速转变的社会成本。中国选择了第一条，而日本走上了后一条路，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社会变革需要两个主要条件 1 上层精英的指导 2 下层经济组织的转换 从这两个方面对比中日社会，可以得到决定变革方向的原因。在社会上层，日本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比中国晚的多，且土地狭小，无法支撑稳定的官僚政府，所以军事贵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社会下层，日本生产力水平低，市场被分割，自耕农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附于领主，为大地产效力。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不仅仅要负责维持社会治安，抵御外敌入侵，还要直接插手生产，管理领地内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贵金属开采，分配物资，对经济实行放任政策是行不通的。反观中国，土地广大，政权统一，上层的任务是需要维持社会安定，兴修水利，只要不横征暴敛，下层自然会互通有无，物资自发流通，自耕农通过统一的市场取得食盐、铁器就能进行生产，所以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两个差别最终导致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走向。在需要向新制度转变时，中国的上层儒家官僚在漫长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了半宗教的特征，发展了自身的哲学体系，很难迅速转向，官员和学者拒绝放弃长久以来一直成功的管理方式。而日本的上层精英是军事贵族，没有稳定的哲学，唯一绝对相信的是力量，自然乐于接受能增强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另一方面，在下层组织方面，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反而成了劣势，长期的自由放任导致中国无法适应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要求，既没有愿意直接插手生产的精英，也缺乏服从纪律的工人。相反，落后日本农业社会一直处于领主的直接管理之下，很顺利的转向了工业化的目标--对于下层而言，服从领主是维持生产的唯一途径。套用一句老套的话--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转回原来的位置，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艰苦的条件要求贵族直接管理农业生产，而现代工业也要求国家政权介入生产，两者结构上的相似也给予了落后的日本以更好的发展机会。

传统的观点把整个农业时代看成一个发展缓慢，适用统一经济规律的时代。但如果对整个地球的农业文明进行考察，会发现早期、较低级的农业社会和晚期发达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构。（早期、晚期并不一定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只是表示一个总体上的繁荣程度和发展顺序）任何农民都不能够孤立的在地球上生存，为了维系生产，一个农民需要有军事力量保护他不受掠夺，手工业者为他提供铁器、食盐，以及其他器具，以及外来力量为他调节纠纷，兴修水利.........根据这些外来服务的提供方式，我们可以做出早期农业社会和晚期农业社会的分界线。

早期的农业社会，交通不便，贸易不发达，农业技术低下，独立的自耕农无法从市场上取得服务和资源，农业生产共同体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域内。这时，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各个地区独立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并由当地的权力机构具体组织生产，提供服务，抵御灾害和入侵。。这种经济所支持的政治结构就是在欧洲和日本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分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于政治单位比较小，市场不发达，封建主不仅要控制土地、还要直接控制农民的

具体活动，是一种原始的计划经济。早期农业社会如果处于合适的地理环境，有继续发展农业技术和克服交通障碍的可能，在经历长时间发展之后，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粮食、手工业品自由流通，只需要较小的官僚机构就足以提供市场所不能满足的服务，如在整个大河流域兴修水利、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分散在各地的军事贵族和他们的庄园显然是一种过于累赘的高成本机构，历史的浪潮迟早要将他们淘汰，由高效率的中央官僚机构取而代之，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和小亚细亚的具体事实。假如不发生工业革命，西方和日本在农业和贸易得到发展以后，也会逐步走向这个方向，事实上，西欧的自耕农与商人已经建立了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并逐步剥夺地方贵族的权力。但这种农业社会的大趋势最终为工业革命所打断。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时代需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权力对经济的直接介入，这种趋势与发达农业社会的自由放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但与早期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却多有相象之处。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中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现代工业社会与早期农业社会在组织体系上的相似验证了这一点。也正是这种相似使西方和日本的社会易于向大工业时代转变，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在工业化的路上却步履维艰，必须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管理体系。事实上，在中国和土耳其这种一度拥有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和对经济的放任传统的国家，往往是军队担负了在社会中引入组织纪律并直接管理经济的任务，这也和西方、日本军事贵族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坚力量的过程颇为相似。

另外一个能够验证这种说法的事实是 18-19 世纪，英法全球争霸的结果，英国的贵族阶层与全球贸易相结合，法国的贵族却为大革命一扫而空。英国可以利用旧社会的组织资源，法国则必须重新开始。最终这种差异导致了法国的衰落和英德两国的兴起。

注意：限于作者能力，上述的历史解释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实支撑，尚属不完善的理论，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这个问题并多加指正。

七 中国的选择

今天的中国，无论左派右派、保守激进，各种势力都承认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中国何去何从？工业时代的竞争是胜者全得的斗争，中国要么称雄世界，繁荣昌盛，要么沦为发达国家的廉价生产车间，永无翻身之日。中国的会拥有哪一种未来呢？关键还是在于思想。

在工业社会到来以前，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结构和自然条件造成的历史潮流面前，任何把历史潮流引向另一个方向的计划都被碾的粉碎。西方的霸权，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兴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沦落，无不表明了历史大潮的不可抵抗。但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通讯方式的进步和普遍教育的实行，无数的人可以通过现代的通讯手段交流思想、协调行动，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都有可能能通过思想的传播来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是否会变成现实，关键就在于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当今中国的思想界，奉自由市场为强国之本，私有产权为立国之纲，却看不到发达国家强盛的根本；为了维护教条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无视帝国主义统治地球的现实。特别是整个统治阶级在糜烂之余，还要拿这种过时思想为自己牟取的非法资产辩护，长此以往，中国危矣！中国缺什么？缺人身自由吗？在西欧诸国封建割据，贵族指挥农奴劳动的时候，中国已

经把自耕农和行商作为社会的基础了。缺市场规则吗？在日本和欧洲的贵族还在裂土封疆，鱼肉人民的时候，中国已经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了。缺乏私有产权吗？中国在 2000 年前就消灭了随意夺取农民财产的贵族阶层。这些“优点”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积累了上千年，为什么反而让中国沦为穷困的殖民地呢？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中国最缺的是组织纪律，缺乏与大工业时代相配合的制度，缺乏能够让中国拥有独立产业基础，不受外国盘剥的政策！

梁启超曾总结到：“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 异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百年历史，我们发现这句话依然适用，今天台上台下高呼“改革”、“现代化”的兖兖诸公认准了自由市场强国的方向，对其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反怪改革之心不诚，力度不大。对此景象，作者虽然闲居在外，也不得不说几句，聊尽人事吧。

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

听到经济危机的风声，抄起电话打探消息，全国各地的同学朋友反馈过来的信息都很不妙，中国哀鸿遍野。先说苏州，苏州一向是中国修路修的最疯狂的地区，总共8000多平方公里，内地两个县大小的地方，过去每年公路投资都以百亿计算。这还只是公路投资，更大头的市政路桥不在其内。我在苏州时，经常有市县政府搞一个几百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征地后让设计单位进去打网格修路，一级公路间距修到4公里，你说要修多少路?我这样的设计员天天拼死拼活、加班画图也忙不完。如今再打电话给原来的同事，电话里一片乒乓球声，都在大厅里锻炼身体，说是3个月来只做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实施的项目方案。从邯郸来个同行，说是那边建筑设计院已经全部关门。上周去宝鸡，陕汽上半年每月8000辆卡车供不应求，如今一个月生产2000辆不到；就这样，比起已经被迫放假停工的上海大众、株洲机车厂还要好一些。更惨的是钢铁行业，半薪休假停产都做不到，直接大裁员。更多的企业连裁员的机会都没有，资金链断裂只能倒闭。甚至倒闭都算不得最惨。不少已经被供货商拆了的企业，在政府统计中居然还是营业状态，看来好多老板在看到未来的当晚已经跑路，注销手续都不敢办。企业都这么惨，政府还坚持说没有返乡民工潮。我是守法公民，不能打政府的嘴巴，可我昨天在候车室里把钱包掉地上，低头捡钱包的时候发现：凳子底下全是白色染料桶——民工最喜欢用的旅行包代用品。惨白一片，和股民的脸一样，不知道温总可曾如此低头看过。朋友从杭州发来消息，萧山工业区一般小姐的收费跌了1/3，据说服务态度也大大提高，依我看是因为男人们没了私房钱，需求大跌；但如果你相信人民政府，认定女工们确实没有返乡回家的话，这事也可以理解为供应过剩，这社会问题还真是复杂啊。对了，河北老家那边有几个同学刚凑钱买了车给铁矿跑运输，我借这里给他们道声节哀；陕西有几个朋友在钢材价格大跌前中了一个钢厂房的施工标（包料），我打算去吃他们一顿海鲜，分享一下他们的喜悦，结果.........老板宁赔定金也不盖新厂房了。

裁员风声四起，退休年龄要推后，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自然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即便这样，钱袋子还是越来越瘪。过去房价高涨时买不起房，如今房价跌了，发现自己还是不敢买，猪肉的情况也是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人真是有远见。据说商品房空置已经有2亿平方米，若是按100平方米一户人家算，起码可以解决2百万户、近千万人的住房问题。天天上班，我都要路过老城区，那里成千上万的市民还靠公用厕所与自来水站生活，边走边想这2亿平米的房子白白地在风雨中折旧，真是造孽。今年还有一个骇人的数字，上半年钢产量2.63亿吨，已经差不多等于欧洲、北美、前苏联地区之和，如果不经济危机的话，钢产量差点看6亿吨。过去总说赶英超美，这下可好了，欧洲、苏联、美国绑一起都不是对手，可我们还是没房子住。要知道，即便在8度设防烈度区，普通高层民用建筑每平方米用钢量也绝不会超过80公斤！一边是房子空置，钢铁产能压缩，求客户赊账买都没人要；另一方面企业减薪，工资不断下调，打工者们只能压缩房租开支，从小房子搬到更小的房子。在几个打工者集中地区，上半年房价已经停滞，大伙买涨不买跌，宁租不买，结果二手房租金倒有上涨，真是雪上加霜！穷人需要改善生活却买不起东西，富人有钱又有商品，可惜卖不动。所以，不用怀疑，经济危机真的来了。

危机肆虐全球，席卷中国，该怨谁呢？从中国人的角度看，70％的外贸依存度，出口完蛋了，经济肯定要跨。可出口为什么完蛋呢？归根结底是美国人买不起。美国人为啥买

不起？又要追溯到次贷危机，个人破产了，贷款都还不起了，如何买你的东西？投资公司都破产了，如何给企业拿钱雇人？于是矛头指向没良心的金融界，玩包装游戏，把一堆垃圾贷款包装成大有潜力的金融产品，最后拉上整个世界买单。可反过来一想，就算没有黑心金融家又如何？那群美国佬早就要靠贷款买你的东西了，如果没贷款的话，岂非头几年就没购买力了？如此看来，黑心金融家固然不是好东西，可问题归根结底还不在他们，在于美国老百姓没钱。美国是第一强国，老百姓为啥没购买力？其实这是个很自然的结果，从80年代开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工人的收入其实一直在下降，几十年降下来，老百姓买不起东西了。当然，美国有钱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拉着平均收入一起往上走，可穷人赚1块要花1块，富人赚1亿也就花1000万。平均收入增加不能解决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但退一步讲，中国自己造的出6亿吨钢，美国人不买了，难道不能给我们的老百姓盖房子、造汽车吗？显然不能，盖好的房子还有2亿平方米卖不掉呢?新盖谁买?看来问题也不能全怪美国人，自己也要检讨检讨。

中国和美国都出了一样的毛病，就该去找找共性了。话说这几年有人说中美是邪恶轴心，一起高增长，一起扩军，一起排挤其他国家。其实中国和美国矛盾不少，远谈不上联合轴心的程度，但共同特征还是有的，就是走彻底的市场经济道路，和欧洲、独联体那些老惦记福利社会的国家划清界限。市场经济讲利润，利润是怎么来的？单对一个企业而言，利润＝商品售价－工资－其他成本（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其实“其他成本”一项可以省掉），利润＋其他成本＝商品售价－工资。只要大多数企业盈利，指望自己企业的工资买下全部商品断无可能。如果大多数企业或至少一半的企业亏损呢（利润为负）?人家老板又不傻，不会赚钱还不会关门吗？当然，鞋厂工人不会拿全部工资买鞋，建筑工人不会拿全部收入买房子，但由于这个等式适用于所有企业，最终工资之和是买不掉全部商品的，必须指望全部利润加入购买才行。可惜还是前面说那个道理，穷人赚1块要花1块，富人赚1亿也就花1000万，老板们的消费倾向永远低于穷人，于是就有了经济危机。

怎么办？首先我们可以指望老板花光他的利润，这样等式就平衡了。可惜这样的老板只会让同行窃喜。你花光利润，我用利润扩大再生产，你消费上档次，我用利润搞开发，不吃掉你的市场份额才怪。于是乎，以奢侈浪费为增加购买力大业做共享的老板成了败家子，正式加入高消费倾向群体——穷光蛋的行列。好在投资也是需求，老板拿出利润建工厂，搞技术升级，归根结底钱还是用来雇人，自己不雇，供应商也要雇。老板们不当败家子，当大老板还是喜欢的。于是眼前的需求不足被投资所弥补。可投资本质上是扩大生产能力，而且一样要靠利润来支持。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增量部分归于资本，结果不仅商品总价－工资的差额上了一个台阶，商品总价/工资的比值也上了一个台阶。在新的台阶上，工资买不完商品的问题依旧，比例更加可怕，只能寄希望于下一轮投资提供需求。一轮轮的循环下去，需求缺口一次次被投资弥补，系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一旦稍有风吹草动，比如某个投资主体在新一轮的缺口前稍有犹豫，立刻就是滔天大祸，而且比经济过热来的还迅速。下山比上山容易，经济的事也一样，开一个厂子需要征地、买机器、调试、培训......那一步都要时间。关一个厂子可利索的多，万一资不抵债，跑路只需要买张机票的时间，或者直接算算楼的高度就用自由落体定律了。一个购买力小缺口必然会造成更多的商品无法形成利润、更多的投资被削减，几个下坡循环下来，经济雪崩就形成了。崩到什么时候？天知道。下坡循环是自身的催化剂，没有市场以外的东西来托住的话，生产能力的高山恐怕要崩成小沙堆，小到大伙在大萧条中藏下的那一点可怜的家底能盖住沙堆为止。

当然，我们还有政府，政府可以在利润中收一部分税，然后转化为购买力，政府可以向富人收税转移支付给穷人，减缓这个危机。最不济，大雪崩的时候也可以出来印钞票，把灭顶之灾变成淹脖子的小问题。可问题是这个地球没有世界政府，经济上行时你从利润里分钱，强迫提高工资，企业肯定要受影响。你多收税，多转移支付，别的国家不一定搞啊；你有劳动法，有工会，世界上有地方没有啊。人家的企业能榨出最大利润来投入下一轮竞争，你的企业就得死，不想死就把企业往没劳动法的地方搬。搬来搬去，那些搞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成了邪恶轴心。政府收税多了，如果不配上高关税的话，白白为他国提供购买力。关税提的太高，人家有报复，形成贸易战，购买力还是完蛋，结果是大家一起死。不打贸易战也行，希特勒就有办法，过剩生产力全用来造大炮，造大炮的欠账可以让战败国来还，当然，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最后输了。

说来说去，越说越觉得自己象邪教祭司。一样喜欢说灾难，一样喜欢说灾难躲不开，一样喜欢说灾难去了还要回来。1999年之前也有那么一拨人，絮絮叨叨地说大灾难。最后1999年除了大使馆被炸就没大事，那些神棍就消停了很多。我呢？在瞎子也能看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出来，当事后诸葛亮，貌似也差不多。不过1999年还有个沃勒斯坦，他这么说“看看最近30年，我们看到了什么？1、世界体系的两极化显著扩大，2、发达国家内部两极化显著扩大，那些干得不错的从来没这么得意过，这是事实，但贫困地区的贫困也在升级。”最后，他还有一句乌鸦嘴的话：“这张清单留给你去算”。经济危机就是清算的时候。

拉了名人当后盾，似乎我能多点底气，但好象还是不对。按这个逻辑，这个世界岂非离不开经济危机了?而且一来就是灭顶之灾，怎么大伙是头一回见呢？不光大伙没见过，大伙的爹娘也没见过。一次萧条就上纲上线地批判整个市场经济，肯定是老马这个极左分子又再忽悠人，想趁经济危机拉几个同党。还是一事一议好，把黑心金融家，或是阿拉伯腐败的石油亲王拉出来，诛了这些球贼，萧条立止，天下必安。领导和专家不早有教诲吗？：“改革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现阶段最大的隐患是有人借经济危机的机会反对市场经济”。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这经济危机的历史可比各位的爹娘长多了。早在1825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没收尾，世界就容不下这些新式企业的过剩商品了，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10多年后又来了一场更大的。从这以后，危机十来年一次。哪次危机都伴随着10%或更多的经济收缩，然后再配上或大或小的几场战争。各位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不就是生产停滞几年吗？有啥子可怕的，你老说什么灭顶之灾，英国、德国、美国今天不是好好的吗？我们中国高速发展这么多年了，停几年有什么大不了的？恢复增长再赶上去就是了。这让我想起来一个家乡的老笑话，说是一个懒媳妇，到婆家不想干活，偏生那公婆还特勤勉，以身作则，媳妇无从偷懒。媳妇只得天天暗自祈祷“多少来点病.......千万别要命”。看起来经济危机就象是这常来但不要命的小病。犯不上为它操太大的心。

从懒媳妇的角度看，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从整个家的角度来看，壮劳力下地干活回来没人做饭就是大麻烦。视角不同，对问题的评价也不同。如果你从英国的视角看，经济危机没什么大不了，无非是不列颠需要稍微扩张一下市场空间。比如1836年那次经济危机对于英国来说是小小停滞，海军得去东方弄点购买力，对中国可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鸦片战争！购买力和生产能力的差异是对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如果外部购买力能弥补这个缺口，那你本国差异再大也不要紧。所以，只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

之外还有其他的文明，那么，一切危机都可以通过扩大殖民范围，增强对殖民地的经济入侵来解决。至于卖鸦片还是卖布料，那是小问题。当然，如果外部购买力补不上窟窿，那就坏了，内忧外患一起来，哪个强国也撑不住。1895年，英国有90万吨战舰，差不多是法国的2倍，美国的3倍，俄国的4倍，直属领地包括世界1/5的土地，1/4的人口，经济附庸国也不止10个。光罗德斯一个人在非洲抢到的领土就相当于本土3倍。可罗德斯回国一看，这扩张还远远不够哇！“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了使联合王国4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英国尚且这么想，你让其他国家怎么办?

还好，世界够大，大到几个列强能够抢上差不多一个世纪。印度和中国本来都是农业大国兼手工业大国，1800年时，制造业总产值一个占世界1/3，一个占1/5，手工业者都是几千万的水平。19世纪，这两个大国都在炮舰政策下投降。割地赔款乃至亡国暂且不论，仅从购买力角度来说，印度完全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只剩下把关税定到5％的权利，别国对你设多高的关税却属于内政。这么100年下来，中国1900年制造业占世界产值只有6%,50年后还要继续跌到4%；印度更惨，仅剩1.7%。这可不光因为欧美工业发达，经济增长快，把你的比例相对降低了；按绝对值计算，1900年中国制造业也才1800年的一半，还亏的中国这期间起码涨了1亿人口！到最后，中国和印度乃至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只有两个作用——提供资源、提供购买力，出现的经济萎缩、社会动荡只能自己承担。靠从这些殖民地提供购买力，英国和其他国家才勉强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把经济危机这个癌症变成了感冒。

世界还是不够大，20世纪初，全世界能提供多余购买力的地方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已经成为经济殖民地的国家也被压榨的差不多了。再压下去就只好崩溃，人民不堪忍受，穷则思变要造反！土耳其和中国，在第三世界中一个最强，一个最大，但还是架不住这上百年的盘剥，通货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不稳定，最后旧体制只能一跨了之。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了苏丹的命，1911年武昌新军推倒了大清帝国。西方从此没办法从第三世界弄到更多的购买力——不是不够狠，而是实在没有了，甚至越来越少。于是列强只好互相打主意，离的近的就惦记灭了对方的生产能力，离的远的就琢磨抢你的殖民地。世界大战很赶趟地在1914年开打。英国和德国各自拉上一群帮手 pk，美国快快乐乐地发战争财，等双方消耗差不多了进来参战，渔翁得利。俄国工业最烂，屡战屡败，工人士兵实在受不了这个疯狂的世界，干脆把沙皇推翻，拥护列宁搞社会主义，这里按下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掉了1600万人，主要是工业国的潜在劳动力，同时糟蹋了法国北部和东欧的工业区，算是减轻了一点生产过剩。可日本美国趁机闷声发大财，迅速扩张产能，结果战后立刻就又是一场经济危机。好在战后重建是躲不过的需求，美国出钱借给各国搞建设，勉强混了不到10年。1929年立刻又是死去活来，经济跌个1/3一点不稀奇，1/5的人口失业也是寻常事情。整个30年代，除了搞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德国日本，列强经济都是半死不活。美国最发达，生产过剩也最严重，因此最惨，工业直接跌了5成，退到19世纪水平还止不住，眼看不是解体就是工人起义。好在出了个罗斯福，下意识地搞凯恩斯主义，拿国家订货制造需求，把失业人口都雇起来，有没有利润暂时不去管他，到底为美国

提供了点救命的购买力。美国也从死到临头的状态转回来，和欧洲一样半死不活地等打仗。

英美法老牌强国半死不活，德国日本搞法西斯，用军备吸收过剩生产力，倒是蒸蒸日上，实力对比逐渐倾向于新兴强国。可惜军备吃不得、穿不得，积攒起来还会过时，也不能直接变成利润兑现，压在手上也着急，必须找地方用掉，二战毫不意外地开场。德国先吞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大口吃波兰。英法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怕的是再忍下去就没小弟跟着混了，只能出手，结果法国被励精图治的德国灭了，英国被赶回本土。这时日本早就不老实，鲸吞蚕食地在东亚占地盘，眼看要独吞中国这块公用殖民地，逼的英美断它贸易，这一断就断出了个珍珠港。德国海军不行，庞大的陆军不用是浪费，打完西欧就就打苏联。德国偷袭非常成功，头几个星期成百万的歼灭苏联兵，希特勒以为会象上次大战那样，三下五除二打垮俄国。没想到这些年全世界大危机，唯有俄罗斯搞共产主义，所有产品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不存在剩余产品，结果生产力大发展，已是世界第二工业国。虽然丢了一少半工业和人口，苏联剩下的部分依然强大且强悍，和德国打了个旗鼓相当，43年已经开始反推，45年就推到了柏林。

二战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见风使舵的意大利半途反水，德国日本一败涂地，英国法国胜利却蚀了血本，只有美国得意，正式当上世界霸主。按旧时的规矩，这霸主就该号令天下，占最好的资源，最肥的殖民地。其他国家的企业只能捡剩下的，还要向老大开放市场。老规矩自然有老结果，美国真要这么干，那下次经济危机还是十几年就来。不过，这一回，世界上多了个苏联。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就在了，可那时的苏联是一片战争废墟，经济也就沙俄的1/3，军事上勉强能自卫，出国作战连波兰也打不过。有它没它一个样，头几年连参加国联的资格都没有。二战之后，苏联虽然比不上美国，但已经是法国德国没法比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军事上也是苏联推掉了轴心国陆军主力；资源上人家要嘛有嘛；到了49年，苏联也有了原子弹，谁也不敢单靠武力打苏联的主意了。

对于战后列强来说，苏联的几万辆坦克固然吓人，但更吓人的是苏联的建立过程。本来沙俄也算世界一霸，只是因为工业社会崩溃，无产阶级起来冒险造反，一夜之间就废了帝制，一年后连资本主义制度都废了。无产阶级真的做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苏联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工人政权，所以无产阶级造反最多是一时混乱，苏联政权稳固下来之后，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有样学样。要是美国真的独霸全球剩余购买力，不给其他工业国一点活路，那各国无产阶级很可能揭竿而起，从内部毁灭资本主义。

美国没那么傻。罗斯福已经整合了资本主义，美国不再是随便哪个大资本家就能养上一团精兵的美国，不再是黑手党抢地盘可以出动空军轰炸的美国，不是某个资本家可以单打独斗的美国，也不是那个陆军常备军和矿警不相上下的美国。现在的美国企业头上有一个全盘考虑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懒散的更夫。为了应付一个更加残酷的世界，全世界资本家和经理必须在美国的秩序下联合起来，通过强力的国家政权进行统治。为了避免后院起火，自己的势力范围瞬间变成共产主义恶魔的新基地，美国总统必须从大处着眼，扔掉一些老规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苏联建立的过程看，教训有两条：一是不能让工业社会随便崩溃，即便那是你的潜在对手，二是不能把工人榨的太狠，必须让他们过上象人的日子。在解放军打过长江后，还得加上第三条——在殖民地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了不让其他工业化国家崩溃，美国大方地扶植日本德国，援助法国英国复兴，具体说来就是又给钱又开放市场，还允许你自己保护自己的产业。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迫使二战后的列强纷纷改良，让工人集体谈判工资，政府多收税，搞政府采购，搞福利社会。中国和苏联的领土从太平洋延伸到东欧，美国就得反过来给殖民地输血，即便那边的统治者是李承晚或蒋介石那样任人宰割的废物。这样，美国积攒起来的财富回流其他国家，工业社会向穷人分享了财富，殖民地也得到了各种援助。《九阴真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补有余”资本主义被苏联逼的练《九阴真经》，居然就真的经脉逆转，起死回生。即便世界上开发不出新殖民地，也不用再靠世界大战来解决问题了。一直到苏联解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经济危机，但即便和石油危机赶到一起，也不会象大萧条那样要死要活。

再说苏联，苏联经济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无非就是地大物博、重工业优先和建立了一个没有购买力限制的经济体制。地大物博在资源上无求于人；重工业优先可以快速扩张生产力，还能增强军备；没有购买力限制正好让前两个特点肆意发挥。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为战，以邻为壑，还动不动就自我毁灭，所以苏联单靠这三点就足以笑傲江湖。战后美国一统武林，还给小弟们定了规矩，也能稳定发展，一群老牌强国的底子可不是沙俄那半吊子工业国能比。等到苏联初期的锐气磨钝了，发现自己三板斧砍过了没新招，西方却从苏联偷学了不少本事。已经形成发展惯性的苏联只能重复粗放式经营，玩命开采资源、上重工业，造坦克。虽然军事上一时不输，基础却逐渐薄了，增长率也不断下降。顶到80年代，虽然苏联已经能赶上大半个美国，单光比经济的话，日本却也能顶大半个苏联，更别说还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自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官僚们一直靠经济增长来证明苏联制度的优越性，等到初期的锐气磨钝，相对实力越来越差，就应了那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不光老百姓人心不稳，官僚们自己也开始犯嘀咕，91年崩盘看似忽然，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剩下一个中国，底子更差，起点更低，靠55年从苏联拿到了一笔空前绝后的技术援助，加上共产党凝聚力空前，到70年代也小有成就，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80年代之后，中国看着周围半圈被美国罩着的小国，发现它们靠西方投资，靠从欧美拿劳务分包过的也不错，要比高楼大厦，自己连尼日利亚都不如。邓小平赶快画了一个圈，号召大伙扔了自己原来那点小买卖，也去混打工，至于人家是否能容下中国这个超级打工皇帝，一心打工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21世纪的事情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话说那资本是个记吃不记打的玩意。苏联解体、中国改革，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再没人给左派撑腰了，这资本就越来越往老路上走。资本的天性是竞争，除了共同的敌人，啥也不能让资本团结起来。冷战几十年，美国带出来的小弟羽翼丰满，开始独立门户，日本说什么要收购美国，欧盟搞了个欧元和美元对抗，美国没了1945年号令天下的位置。孔子说“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和红色帝国一齐消失，资本主义毫不犹豫地走向生产过剩。前面说过，从苏联走下坡路开始，按购买力计算，美国老百姓连着30年工资往下跌，利润率持续上升，技术开发日新月异，把涉嫌赤化的欧洲日本挤兑的靠边站。无论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混不下去，日本进入衰退10年，然后欧洲日本都要改革增效，压工资、开除无能员工、减少休假和福利，好和美国企业一争高下。购买力缺口的问题谁也不去管。

这时侯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工业向第三世界转移。其实苏联在的时侯就有这事，可那时侯中国自成一体，印度半边屁股坐在苏联的凳子上，非洲东南亚遍地都是苏联或中国支持的游击队，只好在韩国、台湾、拉丁美洲玩这一套。拉丁美洲的劳动力纪律不够，四小龙之流又太小，转移就不太明显。等到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各地中苏附庸势力消亡，一下子有二三十亿人口拥入打工队伍，配上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大气候，产业转移就时髦了。让要价低的工人干活肯定增强竞争力，只是欧洲少了一个年薪2万欧元的工作，中国多了一个月薪1000的工人，全球购买力会打滚地下降。中国本来有自己的一小摊，现在扔了来打工，工业纪律和技术水平绝非其他打工者可比，劳动力价格便宜量又足，大老板们就把工业一窝蜂地扎进中国。结果...........我们就有了6亿吨钢的产能，有了世界第一大港口，江南水乡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区，还有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过剩生产力。按老规矩，苏联解体之后十来年，就该有总清算的大危机了。不过，世纪之交还有一件事情来凑趣，就是造就了无数宅男的计算机革命。个人计算机性能两三年一翻番，价格还一路走低，单片机、数控机床也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这次革命推出来的电脑干复杂劳动比人还差不少，干简单劳动已经充分胜任，而且还可以让廉价的劳动力经简单训练就干原来技工才能干的活。这迫使老板想方设法也要挤出钱来更新设备，不更新就要落伍，这更新设备的投资就是需求。这么一混，又是七八年。时光流逝，岁月如梭，眼看着老马就要到奔三张，大危机终于不耐烦了，一脚踢开门就来到了2008年。

2008－1929＝79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现在的社会里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29年之后发生了什么，能完整回忆1914－1945年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没有人能用直观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占领了整个地球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来搅局，生产过剩会带来什么？老马还不到三张，头发还能盖住脑袋，凭回忆说不个啥，但翻翻历史书，上一回这种状态带给大伙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粗糙的共产主义政权。这次呢？还是不知道。

1922年是大萧条的预演，欧美经历了一次小型经济危机。那年，意大利穷人发动罢工，占据工厂，还想夺取政权。有钱人和王室一片慌乱；中产阶级又惊又怒，惊的是穷棒子要造反，怒的是居然自己也快成穷棒子了，赶快跟着墨索里尼混法西斯。10月份，墨索里尼带着4万黑衫军进军罗马，军队和政府默许了他们的行动。10月31号，国王授权议会支持率6％的墨索里尼组阁，对付穷棒子们，保卫国家！墨索里尼回头就解散了社会党。2008年，泰国农民不知好歹，居然敢于让他信的妹夫上台，眼看这个不知好歹的颂猜又要拿企业的合法财富去农民中收买人心。泰国中产阶级忍无可忍，起而拯之，游行有军队护送，占据机场有贵族慰问。终于在12月2号让宪法法院开了窍，搞清了选举舞弊案。颂猜下台，5年不得参政，政党被解散。阿披实被召来组阁，高呼国王英明。

历史事件头一遭出现是悲剧，第二回是闹剧。但上次的悲剧实在太厉害，拉上了1亿人陪葬，所以，闹剧也要当心。何况今天的中国遍地是悲剧兼闹剧呢？

悲剧和闹剧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演的，每个演员都以为自己将在剧本的下一页成为主角，因此个个倾情投入。既然是主角，就不能光是抢钱抢粮抢娘们，再黄再暴力的片子也得有句台词煽情，给自己的行为划出个道道来，经济危机这幕大戏也一样。老板和经理说利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不追求自有人追求，没理由我减利润为别人增加购买力。工人们当然想加工资，但新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社会与贫民窟中涌出来，再强有力的工会也得步步后退，何况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根本没有工会。当工资停在养家糊口的水平

上，商品却象流水一般从生产线上滚落，经济危机也就快到了。这时，专门卖台词的经济学家说，莫慌莫慌，别听老马那个家伙危言耸听，没了消费还有投资。这年头货币又不是50两一锭的大银元宝，企业没有好项目投资，纸币也不会死在保险柜里，自然会到银行去生息。银行拿了钱也不可能干给利息，还是要拿出来投资，投资最后变成工资也是消费，怎么会买不光商品呢？

按经济人假设，确实每一分钱都不会闲下来，不是消费便是投资。钱从投资者流到消费者，再从消费者流回投资者，才有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就是让钱流起来的渠道。水是往低处流的，因为必须有高差克服渠道的摩擦力，水才会流起来。这世界上显然没有一整圈都是下坡的渠道。要想让水绕圈流，必须在环形渠道上设置水泵，把一路下坡的水重新提到高处才行。经济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消费这一块，老百姓不得不把工资全拿去养家糊口，消费的“摩擦力”不大；但渠道的其他各段都有相当的“摩擦力”。投资有风险，经济信息交流有成本，只有明确的利润预期才能提供驱动力，让企业背上风险和成本这些“摩擦力”前进。利润预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比如股息、直接的销售收入、有价证券增值等等，但归根结底，利润必须来自千千万万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人类对财富的定义不是钢锭，不是矿井，不是厂房，不是坦克和导弹，而是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自家宽敞明亮的房子。只有普通老百姓买房子，买商品，利润才能最终落实。可是由于普通老百姓不占有所有财富，大部分生产力不得不被拿去投资，才能维系经济运行。一轮轮循环下来，老百姓的财富吃光喝光，有钱人的投资越滚越大，总的投资率就自然地往上走，大部分生产力生产的是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商品。按说这投资率高是好事，说明人类制造财富的能力提升快，人类今天少消费，过几年可以消费的更多，唯一的问题是，未来谁来消费？经济越高涨，对未来的预期越高，工业物资/最终产品的比例越离谱。这些工业物资要想被承认为财富，就必须在下一轮投资中体现为被普通人买掉的商品，否则就只能进入再下一轮、下两轮........乃至无穷的将来投资。按理想化的经济学分析，在一轮轮的循环中实现从物资到财富的跳跃，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好比秦始皇设计的制度，“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可惜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老马是搞土木工程的，当年上课有个概念叫“压杆失稳”，说的是当杆件太长的时侯，承载力急剧下降的现象。按常识理解，一个均匀柱体能承受的压力和截面积成正比，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10，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变成1/10，这不需要学材料力学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从柱体顶端传来的力不是正好通过柱体的轴线，那么柱体不仅要受竖向压力，也要抵抗一个弯矩。有弯矩，柱体就有变形，就要沿着弯矩的方向有一点弯曲。如果柱体又短又粗，象个水桶，这点弯曲微乎其微，压力还是沿着柱体从顶端传到基础。但是，当柱体越来越长，或者截面积越来越小，木柱变成了木棍，进一步变成长筷子，这时小弯矩本身带来的弯曲在杆体中段就很明显了。杆件的明显弯曲会使压力的作用线进一步偏离轴线、增加弯矩，弯矩再带来更大的弯曲，几经循环，小弯矩变成大弯矩，简单的截面积受压问题就转化为杆体受弯问题。对于杆体来说，用弯矩掰断远比用压力压缩容易的多，掰断或压断一根筷子或铅笔很容易，但如果把筷子截断成很短的一截，那么它足以承受整个人的身体重量。因此一旦受压的构件长度和截面积之比达到一定程度，承压能力就必须乘以一个小于一的参数。对于筷子这样的受压杆件，这个参数甚至可能是0.1或更小。当庞大的工业物资生产必须以很低的消费品购买作为预期利润来源时，经济就象一根越伸越长的受压长杆。按理想化的理论计算，只要压力不变，受压长杆伸多长都不会断；同样按理论推导，无论分配比例如何，总有足够的投资吃掉所有商品。但只要随

机性一捣乱，长杆的抗压能力就必须打折，经济运行也怕扰动。就像长杆一旦弯曲，就会越来越弯，直到被弯矩折断一样；如果经济总量大而消费面小，经济一旦因为某个负面小问题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然后引发雪崩般的连锁反应。很显然，减少投资规避风险很容易，增加投资追逐更多的利润需要时间，所以不能指望积极的扰动可以平衡消极的扰动。

在长杆失稳的时侯，如果及时地有一只手把弯曲扶正，那么稳定还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再次有扰动出现。在经济中也有类似的手，比如说在需求出现较小缺口的时侯，政府实施温和的通货膨胀，或是通过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把积蓄拿出来消费。但这样副作用很大，过犹不及。通货膨胀向来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平民花光积蓄会明显降低个人抗波动能力，增加社会风险，资本主义下的调控很难控制幅度。何况，调控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平民得到的分配比例低到一定程度之后，不断相对缩小的消费能力不得不承担将越来越大的投资实现为利润的任务，虽然不是不可能，但调控经济的成本和难度都不断加大。这时的政府需要频繁地变换经济政策，才能维持脆弱的供需平衡和投资信心，职能就从守夜人变成了杂技演员。让杂技演员同时抛3个球不落地很容易，4个球或许还将就，10个球就要碰运气了；如果同时抛20个球，虽然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不是没有做到的可能，但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就必然失败；同时抛100个球？那从物理学上来说也不可能了。或许一两个格林斯潘式的人物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微妙平衡，但毕竟天才不常有。在这一轮经济高涨中，分配比例越来越失衡，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离谱，早晚会超出任何天才的能力。

说到这里，大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老马居然根本不提扰动从哪里来？凭什么你要给柱子一个偏心压力？凭什么你要给经济捣乱？难道是左派故意与人民为敌？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充分说明了工程问题和理想化设计的区别。工程上没有理想化的构件，也没有理想化的荷载。柱顶传来的压力不可能正好沿着中轴线压下来，柱体本身也不可能是非常均匀、标准的柱体。所以，顶上传来的压力总有那么一点横向分量。当计算一个构件的强度时，你首先要把随机扰动和构件本身的误差考虑进去，而不是问：“扰动和误差从何而来？”。扰动和误差是现实世界的常态，必然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必然要出现。经济扰动有促进发展的，比如计算机革命或其他能产生大量设备更新需求的技术进步，也有压制发展的，比如政治动荡和贸易冲突，技术停滞乃至一个小经理贪污。这种扰动的分布是随机的，从强度上来分类，多半也会符合正态分布，超出可调控范围的负面扰动早晚会出现。因此一个在理论上可以运行，但不能够抵抗扰动的体系早晚会遇到麻烦。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并不一定100％的立刻带来经济崩溃，一个分配非常畸形的经济体系完全可能因为暂时扰动较少、调控对路而保持发展，甚至高速发展，但经济风险会在这一过程中一步步增加，最后无可避免地进入经济危机。可能缓解这一问题的只有外部市场或革命压力。所以说，格林斯潘真是聪明人，知道人力不能抗天道，及时顺天而行，退休后管他洪水滔天！

大危机的解释多种多样，老马的解释不过其中一说。而且说来说去，老马还是回避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拿个“高风险”的概率解释来搪塞。真正的教授们可不会这么说含糊话，一个个旁征博引，理直气壮。这个说贷款风险控制不合理，那个说政府管制太多压制了企业活力，欧美的教授说中国血汗工厂太过分，张五常说新《劳动法》破坏了市场规则。这种场面一点都不新鲜，1929年之后，对大萧条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苏俄抛售木材，打击了木材产地的商品需求；有人说，加拿大粮食大丰收，造成美国粮价恐

慌性下跌，压制了农民购买力；有人说英国人邪恶地提高利率，提高了投资成本；还有人说美国银行都是独立营业，稍微挤兑就要破产。反正总归是哪里出了点岔子，经济学家有义务把这岔子指出来，提醒人类下次别犯。有此能耐深入剖析经济的人就去当了教授，老马这种废柴看不清世界，点不出具体问题所在，只能在网上灌水，搞点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还好，灌水之余，老马还能找到几个重量级人物作同党，头一个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本是个学医修道皆不成的宅男，22岁那年随海军出海5年，回国刚宅了一年，就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两下一凑，就凑出个进化论。从马尔萨斯那里，达尔文认识到的生物数量有指数化增长的趋势，早晚会使自然界的能量乃至空间都短缺，因此就有了生存竞争，大部分生物在产生下一代前就被淘汰了。从海外考察的经历中，达尔文发现一方面生物的下一代很象自己的父母，会继承绝大多数特征；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象自己的父母，会有一些变异。很显然，当环境变化时，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生物有更多的机会免于淘汰，把变异传给下一代。产生有利变异的生物在一代代的增殖中积累自己的优势，逐步地把自己的亲戚的生存空间占领过来，最终形成新的物种。就此，达尔文作出伟大的推断——物种在变化，在被环境塑造。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你可以不知道动物为什么要长毛发，但你依然可以推断：两极的生物多半皮厚毛长；同理，沙漠里的生物一般来说储存水的能力都比较强。反过来说，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生物的性状来确定它的来路乃至成因，比如说，变色龙这东西肯定来自一个色彩变化丰富的环境，而北极的熊除非有一身白色掩护色，绝对不可能捉到猎物。这样，所有生物的所有特征的成因都可以归结为2点：始祖的特征和环境的变迁，人类自己也不例外，上帝就这样失去了造人、造生物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魏源翻译《物种起源》，总结下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关心生物如何变异，不关心生物如传递变异，不关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环境，也是一个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达尔文只是抓住了一点——只要出现适应环境的变异，自然选择和环境压力就会让这一变异获得巨大的遗传优势。所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达尔文不知道世界上有基因这种东西，不知道娶表妹为妻会为后代造成隐患，但他依然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开山鼻祖。1900年，在达尔文躺到牛顿旁边18年之后，失传几十年的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整理出来，达尔文的理论得以在细节上被阐述；又过了半个世纪，DNA 的复制机制被人发现，达尔文的理论终于有了依托。但在这之前，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已经根深叶茂，为好几代人类效力了。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生物学是个难以量化的学科。限于技术水平，实验也提供不了多少有意义的结论。但达尔文忽略那些具体的变化细节，直接从大处着眼，讨论发展趋势，一下子就压过了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直到今天，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如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生物学家可以解剖兔子，经济学家却不能把国家拆开分析；生物学家可以拿豆子作遗传实验，经济学家却不可能拿100亿美元去股市实践。所以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象博物学家，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发生的细节进行记录和阐述，预测未来则非他们所长。要说这记录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承认经济学在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向达尔文学习，非要依据不完善、缺乏量化的细节反过来指导全局，结果只能是各弹各的调。赶上谁运气好，碰上了一次预测准确就时髦几年，过几年风向转了就到垃圾堆里蛰伏一段时间，等风向再转回来。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上纲上线，把自由市场或是什么制度神圣化，连观测事实都不用，直接扯什么自然规律是天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譬如那个开古董店的张五常。这连博物学家都算不上，直接上神学了。

再打个比方，隔壁一个台球桌上有一个台球，有人拿着杆子随机乱捅，捅了一下问你台球在哪？你肯定说不知道，一定要你说，你只能要求他告诉你怎么捅的球，捅的角度如何，然后勉强猜一猜。如果他推着桌子晃了一小时再问你台球在哪？你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洞里！”。这不是因为你掌握信息多了，只是因为你知道球进了洞就出不来。当经济这个台球被扔到球桌上乱晃时，你一样可以忽略晃球桌那个家伙有多大力气，直接考虑台球是不是掉到萧条洞里就不会再被捅出来就成。

话题越扯越远，其实罗嗦了这么多，老马的意思就是教大伙偷懒。世界太复杂，复杂到我们现在没法从底部细节构建一个万能体系，那么就不妨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的无能，把细节的事情留给概率论去做。别硬啃那些你不可能啃下来的东西。趋势比细节更重要。

说过了达尔文，再说另一个懒汉——马克思，老马有幸和他同宗。不光同宗，老马还是人家的徒孙，前面约莫扯了万把字，其中倒有9000字是从人家的政治经济学里抄来的，不认人家做祖师的话，就只能算剽窃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吃人不吐骨头，就想研究研究资本主义的前生后世，没想到一动手，发现这历史学的复杂程度比起生物学来毫不吃亏，作实验的难度比经济学只大不小。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马克思纵然是天纵奇才，也没法用一个脑袋装下那么多历史细节，于是就习惯性地想偷懒，把眼光往上一个层次看。这一看就开窍了，原来这历史也是个竞争体系，什么文化、制度、宗教、教育，都是依附于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养活自己，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去扩张或抵御其他上层建筑的扩张。这么一竞争，用不了几代人，人类喜欢什么制度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还能长期维持下去。比如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采集游猎、刀耕火种的部族时代到建立文明的定居农业时代就不是 很hi，很有可能伴随着失去自由、被奴役、被虐杀等待遇，甚至健康程度和预期寿命都会下降。但是，和游猎时代相比，定居农业文明能制造更多的人口（尽管不是快乐的人口），能产生剩余产品（尽管都被上层建筑吸收了），可以养活专职的军队和教士，肯定在竞争中节节胜利，最终把游猎部落都赶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近点的例子可以看非洲，一群农牧部族本来划地而界，生活谈不上快乐平静，也会经常打来打去，但起码大多数人还有个安生日子过。忽然海岸上来了一群白人，拿着刀剑火器换奴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下可就热闹了，没准哪个小酋长先动了心思，抢先捉了一群邻居送到港口，换了火枪回来，立刻势力大涨，可以捉更多的奴隶去卖。这就立刻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建筑，有用火枪的捕猎队，有论证被抓的人有罪的祭司，有总结捕猎经验的长老，这些上层建筑的吃穿完全可以让被征服的部落提供，原来从农牧业中收取剩余产品的制度就这么被替代了。只要有这么一个先例，这个酋长（没准因为脑袋灵活，已经是国王了）的盟友和敌人肯定都坐立不安。有的酋长多少有点良心，不肯靠卖奴隶立国，那他和他的子民早晚去当奴隶；有的酋长脑袋也够灵活，也加入奴隶换军火的行列，虽然未必就能避免当奴隶，但起码自保能力有了提升。经过这么一个竞争—淘汰的过程，奴隶－军火－掠夺制就取代了原来的部族政治，整个西非沿海的黑人从此进入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总体的经济水平没有提高，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捉去当奴隶，显然日子是越过越差了。自从白人开始买奴隶那天起，黑人接下来几百年的命运已经注定，你不能指望所有西非的黑人弟兄能靠绝对的团结一致来避免这个命运，这就是残酷的历史竞争规律。哪一种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和制度中的个人选择无关，你不选择合适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通过淘汰赛另找合适的代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总结成另一个懒人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少数人占据了太多的财富，为啥会这样呢？这也不是某个人选择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一向如此，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平民劳作的产品除去供养自己和一家老小，多少能有点剩余。这些剩余要是留在老百姓手里，肯定能改善生活。但如果哪个文明真的如此“仁慈”，那显然就养不起官员、士兵和教士了，缺乏这些上层建筑的文明在其他文明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如果说哪个文明想征收一部分剩余产品，把另一部分留在平民那里进行投资，扩大在生产，希望他们能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那也是一样碰壁。农业社会的技术停滞，土地有限，不会因为生活的少许改善就能提高今后的土地出产。所以从长期来看，成功的文明都是那些征收全部剩余产品，用来供养上层建筑的文明。当然也不能过分，征收的比例不能大于剩余产品，否则就是涸泽而渔。

前两年曾看到一本书，作者认为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大型病原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病原体的特征是什么？能传染，要利用你体内的资源进行复制，还要利用人类进行传播。因此病原体首先要和你的生命争夺资源，但又不能干的太过分，很容易让人病死。因为它自己没有腿，不会种地，必须依托于人类移动和获取资源，把人快速弄死不利于它的进一步传播。最初进入人类社会的病原体可能多种多样，但几千年发展下来，能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病原体是那些轻微致病，但又不致命的病原体，如果病的症状恰好能加速它的传播，那就再好不过了。鼻炎菌，感冒病毒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它们在人类之间传染，寄生于我们的呼吸道，得了感冒或鼻炎的人不会死掉，只是有打喷嚏、咳嗽的症状，不断地把一部分后代释放到空气中，继续感染别人。国家、宗教、文化等“大型病原体”的最初形态也可能千奇百怪，许多国家是蛮族随意设计的，好多宗教根本就是精神病人的作品，但经过无数随机事件的变异，在社会竞争压力下，最终他们都有类似的特征。都得从平民手中拿走（或抢或骗）剩余产品，又要保证平民的基本生存资源。把剩余产品集中起来之后，官员、贵族、教士们肯定要奢侈消费，但同时也要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保卫这个结构，或者向外扩张。谁也敌不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也一样，只是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向少数人聚敛剩余产品，一方面要通过最终消费品的出售来体现这个财富，所以总要被经济危机骚扰。

历史上制度那么多种，唯有资本主义要为这过剩的生产力发愁，可到了2008年，往四周一看，笑到最后的竟然是这个总闹危机的资本主义，为啥？这又得让老马翻老账。刚才说了，工业革命前的老百姓就是得到剩余产品，也没法用这笔投资提高产量。因为技术水平、可耕土地和能开发的水利资源在那里摆着，亩产几百斤顶天了。再投资，多打的粮食还赶不上多出工吃的粮食，属于白折腾。既然粮食不能连续增产，那就别指望多供养不种地的手工业者、商人，其他经济部门也不能乱增长，否则早晚出乱子，所以整个经济都停滞。马克思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是有哪个文明老琢磨拿不多的剩余产品去投资，去追求更多的财富，运气好时可能会有一两个好年头，但终究是要碰壁的。经济上碰壁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保卫自己、维护稳定的机会，于是这种离经叛道的文明被淘汰出局，换上一个务实的乖宝宝。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人借着几百年的扩张势头，找到了联系绕旧大陆的航线，还在西边找到了“新”大陆。一下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几十个国家在这种局面前又竞争了3百年，最后竞争出一个适应扩张的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统治集团收到剩余产品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维持原状，而是用来进一步投资，期望有更高的利润，英国就是其中的头牌。

农业经济和帆船商业原来就有，新航路和新土地的开辟也不是头一回，欧洲1500年这一次无非是搞得比较大而已。到了1850年，新土地上已经也有了农业文明，新航线也不是什么秘密，按说这一轮折腾就该结束了，世界重回稳定的农业时代。结果技术进步累积了上千年，居然在19世纪初累积出一个工业革命，从此蒸汽机里的煤块能够替代人的肌肉干活，经济基础一下子发生了根本变化。只要地底下的石油和煤炭还能继续挖，经济就有无穷的上升空间。工业时代竞争更残酷，有了工业，不光经济上台阶，军事实力也能疯长，于是不整天琢磨提高工业能力的文明只能退场，新建的社会也必须搞工业。这时侯全世界只有一个资本主义文明最能和工业相结合，自然处处是资本主义，家家要搞工业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再往后.............就到了老马前面忽悠的世界大战，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次总危机。

马克思讲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说从人类刀耕火种进入文明，一直到日不落帝国扬威七海，这几千年的历史既非上帝设计，也不是人类定做，而是一部不请自来的戏剧。人人都在这剧里当演员，但导演偏偏不是人类，而是一个冷酷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这个导演是一个穿着西装、正襟危坐的老头子，对台上的演员一点也不喜欢，好在也不讨厌。他只是一板一眼地督促大伙按照剧本把戏往下演。演员幸福还是痛苦与他无关。以往的演员都入戏，觉得自己演得好就能修改剧本，马克思偏偏说你越入戏就越被那个老头子玩。而且他还对导演很不满意——剧本不在手里，老子睡觉怎么能踏实呢？这幕戏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天崩地裂，或者群魔乱舞，全凭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演员不就成奴隶了吗？不成，演员得反抗，得把未来抓在手里，不然下地狱都不知道坐几路车去的。有了这个打算，马克思再回头一看这些演员，有的是资本家，正站在舞台中央当主角，呼风唤雨，显然不会和导演作对；有的是过气贵族，上一幕的主角，衣着华贵，总是埋怨自己不够入戏，所以丢了主角位置，正积极准备再夺男一号呢，也不行。舞台边缘有大批无产阶级龙套演员，明显工资低，待遇差，却全靠他们支撑气氛，一下子就被马克思看中了。马克思立刻着手组织这批龙套演员闹革命，号召大伙烧了那本几千年的老剧本，现在这些主角要是敢挡路就一概推倒。马克思为龙套们许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说大家可以自己写一部更精彩的剧本——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这东西不是马克思100%原创，最起码目标部分不是。马克思并没有告诉你到了共产主义有多么幸福，没有说共产主义社会给大伙分几室几厅，也没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能开多大排量的车，至于到那时候让大伙抽厅局级香烟还是县处级，那恐怕要靠你自己去理解。马克思只是简单的说“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述只有四个字,即“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对以往共产主义目标的一个概括。

啥叫自由发展呢？对俺这种俗人来说，就是尽可能地按自己意愿过日子，免于天灾人祸，过的顺心！

天灾有的可以对付，比如天气预报说要来台风咱就不出海打鱼，粮食不够吃就开垦耕地、造化肥，洪水淹人就修个大坝挡水。有的暂时对付不了，比如说大地震往往没法预测，那就要发展科技来对付。总之要靠发展科技，发展生产力来对付自然。当人类发现自己改造自然、生产物资的能力越来越大，大部分需求都可以满足的时候，可以预计离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不远了。

对付天灾不容易，但起码目标明确，解决人祸就没那么简单。有好事者统计，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小战争一共打了14351场，要让采集社会的原始人来评判，他们肯定会奇怪："这群家伙都学会种地了，找吃的那么容易，干嘛打来打去的？"，可文明人就是乐此不疲。19世纪工业大发展，人均财富翻番，结果下一个世纪的战争打的空前惨烈，最后还得靠原子弹这种最恐怖的东西来暂停自相残杀。如今21世纪了，各国还在争相扩张军备，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越来越多，战争也没见少，咱们依然是原始人嘲笑的对象。值得原始人嘲笑的还不光是战争，文明人为了维护这个文明设立了绞刑架、监狱、黑社会、宗教裁判所、集中营.........乃至城管大队，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用来对付自己的。文明人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都要向老板或更大的老板点头哈腰，为人前活的像个人样而精疲力尽。到了2009年，文明社会一方面减少所有人的开支，让大伙节衣缩食，另一方面还要担心需求不足，关闭越来越多的工厂，让更多的劳动力节衣缩食。只有军费节节拔高，这种事情，不仅我们打猎的老祖宗要笑一下，我这个不肖子孙看了也只有咧嘴苦笑。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消除所有天灾人祸、自由生活的梦想就从来没断过，名字也花样翻新，三代之治、大同社会、桃花源、乌托邦..........至今不绝。记得我6岁的时候曾看过一本童话书，说是有个小孩，到处去寻找一个天天都是星期日的国度，当时还没有双休日的说法，我也很向往一个天天星期日的世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天天随便玩，不用上班，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啦。所以说么，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不用马克思来创造，人人下了班都能躺在床上想，我能他能你也能。反正就是设想人间天堂。没有压迫，没有奴役，不需要为了养活家人而累断腰杆，不需要为了升官发财出卖良心。只是要记住人间天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天堂，你不能说在现实中卑躬屈膝的伺候领导，到了理想社会就让别人卑躬屈膝的伺候你，那还不如在现实社会里往上爬几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有人不光会想，还会作，比如欧文之流，还能买块地，搞个公社，号召想要人间天堂的人快来建设。物质问题可以慢慢积累，那些人为的问题既然已经认识到，改了不就得了吗？大伙精诚合作，脱离旧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共同促进经济大发展，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古往今来，这样作的人不少，欧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今天的中国也有南街村的王宏斌。他们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失败。马克思说，你们不是运气不好，而是钻了死胡同。

马克思说，这历史发展不是谁设计的结果，也别指望靠某人的良心就能改变。历史从来不问"往哪个方向走更好？"，而是闷头看各种制度竞争。哪个上层建筑收集的经济剩余多，拿出来竞争的本钱大，进入下一轮选秀的概率就高。因此，一切制度的设计——如果你有那个天才去设计的话，必须立足于两点：一是促进经济剩余增长，二是尽可能把经济剩余收集上来进行竞争。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让人类幸福，那从一开始方向就偏了，再怎么折腾，马克思也不看好你。

当然，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说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老板和城管的世界不好，而是说那样的社会不能靠美好的愿望凭空凑出来。历史既然有客观规律，那么就要看这个规律什么时候给人类这个机会。于是马克思回顾人类历史，总结指出：一切剥削和压迫，从本质上是上层建筑收集经济剩余、维护这一秩序的手段，而具体的实施方式呢，就是由少数人占有关键经济物资——生产资料，进而取得经济剩余。如果只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实现经济扩张，保证竞争胜利，那么不管历史走到哪里，共产主义也只能是空想。

如果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已经成为经济剩余增长的累赘，那么下一步自然是生产资料及衍生财富由社会共有，共产主义应运而生。

谈了理论，下一步是理论结合实际，给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马克思左右一看，这正是资本主义挟工业革命之力横扫天下的时候，其他类型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面前不堪一击，讨论它们的先进与否毫无意义，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身上就行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管理社会，把利润、也就是经济剩余拿来投资扩大生产，在马克思活着的年代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好资本主义，理由很简单很暴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赢。因为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 。欧美列强垄断了先进军事机器，能向全世界倾销商品，繁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唯独马克思这个乌鸦嘴说资本主义的繁荣长久不了，理由也简单——世界没那么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有生产过剩，外部市场用完那天看你怎么混？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你还繁荣个啥？

为啥有经济危机？这就是老马开头啰嗦的那些内容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有钱的不想买，没钱的买不起，消费相对投资越来越小，经济基础也就越不稳固。矛盾积攒下来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压缩生产力，会减慢科技进步，也就是减少了经济剩余——那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已经是经济增长的累赘了。用马克思的逻辑分析，这说明又到了制度更替的年头。以往的社会更替，是因为旧制度的生产能力不行，新制度靠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压倒旧制度。这回旧制度有能力生产更多的商品，问题倒出在没能力消费上，这是几千年来的头一遭。因此这次制度更替不比以往，不能再用一个贫富分化巨大的私有制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在一个经济依赖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年头，消灭贫富差距又不可能以平分财产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必须指望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解决生产过剩，保证经济进一步发展。

新社会不需要资产阶级这个累赘，谁来接手这个社会的控制权呢？马克思再次观察社会，发现另一个矛盾——这资产阶级本身也在逐渐退化，表现为一个衰败的阶级。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比较简单，资产阶级也有锐气，自己管工厂，长子从军，次子参政，再送个侄子去殖民地发财，社会权力全都直接掌握。慢慢地，工业社会越来越复杂，教育越来越普及，以资本家族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就渐渐地往技术人员方向转了，资本家的子孙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转而去剪息票、领年金，吃喝玩乐，经理和工程师的力量倒是越来越大。往伦敦街头一走，出身东区（贫民区），穿夹克而不是正装的那些人物在谈论最新锐的技术问题，制造最新的机器。因此，马克思认定，拿工资，当雇员的无产阶级有能力接管社会，没了那个退化为食利者阶层的资产阶级，社会能更健康，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力量来，淘汰那些让旧资产阶级占据高位的社会。

生产资料公有，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就是全体人民控制社会，你该怎么称呼这个新社会呢？马克思认为这个新社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都足够支撑人类的大同社会梦想，因此得出论断：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之后就是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推论冰冷严肃，结论却温馨美好，令人向往，其中反差之大，颇似书呆子以论文体写了篇情书，用数学公式证明自己的爱情完美，读起来很别扭。但千百万人的生活本来就和一家一户的生活有本质区别，不能用过家家的方式来考虑问题。正因为马克思用科学分析历史，给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个踏实的理性基础，共产主义运动才得以摘掉“空想”的帽子，加上“科学”的头衔，从少数人的盲目实践，变成千百万人的伟大运动，最终深刻的影响了马克思身后的历史。

100多年过去了。在2009年的世界，推崇马克思的人虽多，放眼望去，竟没一个国家符合马克思的设想。苏联解体了，中国和谐了，朝鲜几十年没开过党代会，天知道那是什么社会。马克思的预言都落空了？

其实马克思说的相当准。马克思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说你将要自我毁灭，热闹葬礼就是新社会的揭幕仪式，是无产阶级的就职典礼。马克思1883年就死了，没福气看这场热闹，他的哥们恩格斯估摸自己也过不上眼瘾，就在1887年预测了这场葬礼的排场，过过嘴瘾——“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这个预言作出来时离世界大战还有一代人的时间，够牛吧。本来资本主义是不打到集体自杀不算完的，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嘴脸就知道，资本主义可没有打够了就停手的意思，还打算折腾到死呢。只是打完了第二场，苏联的软硬力量都强大，逼的资本主义搞改良；原子弹太恐怖，后果不可控。这才让资本主义又和平繁荣了几十年。马克思出生的时候，风帆战舰是海上霸主，死的时候骑兵队还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他老人家没把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纳入理论，不是逻辑或智力问题，用俺马家学派内部的黑话来说，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

至于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领导世界，这个预言也实现了一大半。如今的世界，是高级工程师、投资经理、银行主管和党组书记、政协委员的时代，他们控制着生产资料却没有所有权，他们可以享用社会剩余而不必等股东或人民同意。至于那些剪息票的资产阶级，今天倒还没死光，他们的祖先曾经把中世纪的军事贵族送进了议会上院供养，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他们当吉祥物了。一个个在基金会里养尊处优，看着经理们折腾“自己的”企业。经理们强占家产倒也不是完全不讲理，他们或者交叉持股，互相提供支持，或者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分散股权的授权压制大股东，仔细研究起来，手段其实和自称人民公仆的党委书记们差不多，或者说本来就是一回事。这次金融危机，美国首付救市资金7000亿，经理们先不管危机不危机，自己先拿上700亿，今年中国政府打算花4万亿重振经济，书记们说还得5000亿来吃喝和养车，果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些经理、书记们，一般统称为技术官僚，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是无产阶级。技术官僚接管社会，完全可以阐述为一部分无产阶级夺取了资产阶级的世界。爱迪生和富兰克林的同道们从穷兄弟中间脱颖而出，接管了洛克菲勒、摩根的权力。邓小平教导我们说：“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因此这当然算进步，至少人类认识了一个代理人当道的世界，知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一批直接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没有了纯种资产阶级的私欲，工业经济一样会向前进。但问题在于，这是共产主义吗？或者说，退一步，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自动扶梯吗？美国人可以明确的回答“不是！”，中国共产党恐怕也没脸大声说“是！”，问题出在哪呢？老马说，好事多磨。

俺是个胸无大志的俗人，古人有云“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说的就是俺这种小市民。自从碰了几次壁，知道自己的斤两之后，俺从来不追求自己拿不到的东西。就算真有好事上门，我也要先用馅饼三定律审查一下，三定律如下：

馅饼第一定律——天上不掉馅饼

馅饼第二定律——掉馅饼也不会掉到我嘴里

馅饼第三定律——如果掉到我嘴里，那也不会是牛肉馅，而且一定是连盘子一起来。

由于馅饼三定律的毒害，我不习惯好东西自己来敲门。有人告诉我，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给我们送来的廉价大礼包，我的态度用一句外交辞令来表达非常合适——“谨慎乐观”。春运不过是一亿多工人要回家过年，中国已经天翻地覆；60亿地球人都需要获得“自由发展”，这肯定不是个容易事，肯定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制度又需要大量的劳动来维护。类似的，人类需要开采矿石、冶炼金属、制造机械，寻找能源，然后才能造出汽车火车来获得交通上的一定自由。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在历史中取得自由只需要等待规律的自然发展，这靠谱吗？上帝是耶稣他爹，不是我们的爹，不会在我们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指望他老人家的规律带来完全的幸福，无论这个规律是制度竞争还是自由市场，统统不靠谱，还是自己努力更踏实一些。

其实，共产主义这个“自由发展”的定义本身就决定了它不是客观规律送来的礼物。人类几千年砍来砍去，弱肉强食，这才是客观规律。在这个规律下，人类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比如说没有解散军队的自由，没有不供养一个统治阶层的自由，老百姓没有潇洒度日的自由，贵族小姐少有嫁穷光蛋的自由。所以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人类制度野蛮竞争的结束。前面说了，马克思的懒汉理论要依赖于竞争规律对历史的主导，那么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来预测共产主义的到来，本身就是个悖论。竞争规律从主导历史到退出历史，期间肯定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前，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预测也应该越来越不准才对。太准了反而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敲门。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大战的爆发预测算是够准吧，大战前欧洲也有一大票人奉马克思为师。可大战一起，这群“社会主义者”都轻松地被各国政府用民族主义忽悠了，争先恐后地为了大资本的扩张去死，1917年才有一个俄罗斯质疑旧秩序。马克思恩格斯猜得到了开头，可没猜到结局。但这正是希望所在。

坑填到一半，老马忽然走狗屎运，接了个设计项目，于是跑去开会。领导在会上拍桌子踹凳子，说这是市长主抓的工程，国庆要使用，2个月内必须拿出设计！这年头么，设计就是那么回事，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出错第一，关系最重要。能不能给领导添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出大岔子抹黑，有利润空间让大伙和谐一下就成了。所以老马非常乐意替领导排忧解难。可惜呀...........基础资料不全，原场地的平面图都没得一张，领导光顾着拍桌子，一张书面的设计要求也没留下，这就把设计卡住了。如此看来，即便在今天的和谐盛世，改造几座楼也设计也不能乱作设计，必须有依据才能动手。改造整个社会，建设共产主义就更需要依据了。最起码得先有个衡量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然后才好说自己比别人强。马克思用“自由发展”来概括人类梦想的综合，这确实很精辟。但自由并不是个简单的东西，绝对不能和“随心所欲”划等号。事实上，你也没法“随心所欲”。一个人的爱好、欲望、需求，除了少数从猴子祖先那里继承的基本特性外，都是人类社会教的，需

要人类社会提供定义，需要父母和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就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这个词如今已经臭大街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高喊普世价值的那些家伙自己光说不练，甚至只拿普世价值的棒子敲别人，自己还是我行我素。比如说美国喊维护世界和平，比如成克杰下台还讲反腐,比如藏独讲人权。结果就是大伙觉得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块遮羞布，或者说是黑社会头子捐的政协委员头衔。但这事反过来想一想，这东西是遮羞布不错，但遮羞的前提是知羞。有句老话说得好，“伪善是邪恶对道德的最高敬意”。过去的人们打打杀杀，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讲不到一起就是刀枪说话。现在的霸权最起码要讲一个大伙都赞成的大道理了，说明社会还是在进步，说明大家还是都认同普世价值的。平心而论，美国人没有打仗的爱好，不是从屠杀中得到快感的变态，无论他是资深参议员、财团首脑还是扛枪的大兵。但为了利益——军饷、利润或政治资产，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现在导弹逐渐成为主流装备，手上粘血的概率就更低了，更容易同时扮演一个好人和一个刽子手。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好多人也不怎么信那些民族主义的鬼话，但一旦动荡开场，只有依附于民族主义军事力量才能生存，于是原来的好邻居纷纷进入战壕互相杀戮。就连香港的黑社会片子都知道拽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其实说的就是普世价值和社会自身规律的矛盾。

普世价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社会竞争规律用了几千年塑造出来的东西，和以前任何社会的价值观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是最后被工业时代的世界经济体进行了一番整合。大概说说，这个价值观崇尚平等，反对性别歧视，支持堕胎，认同民选政府，宽容，认为财富和社会责任并存........总之是适应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价值观。比方说，世界大战把男人都抽上前线，妇女劳动力就得承担劳动，最终确立了两性平等的价值观。不过，以往各个社会的价值观时刻要由竞争规律来维持，好比抽鞭子让牲口走回垄道，这次普世价值观有机会赶上了教育大普及的年头，跟着西方式的教育渗透到差不多整个世界。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好比物理学上的惯性，不容易随着制度竞争的鞭子走。在它成为主流其他价值观之后，具有了一定的垄断地位，竞争减弱，就不再完全依附于社会制度，反而会反过来批判社会。这才有了我等一票闲人在网上发牢骚，拿五毛和五美分的帽子扣人。

这么看来，这普世价值的出身一点也不高贵，和那些宗教的价值观差远了。人家一个个受命于天，来到人间也动不动几千年历史，这一二百年来的人间俗物简直没法上去比。不过，神的玩意再好，那是神的，何况那神还是个人造的假货；我们从小学课本、童话故事和父母言传身教中学到的东西或许不够高贵，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是和我们的感情、生活紧密相连的东西。人不需要在人类之外找什么高贵的传承。这就是我们创建新社会的基础。

假如各位读者真有耐心读到这里，估计会发现老马绕了一圈貌似又绕到了原点，刚才还说马克思用冷冰冰的事实否定了欧文的温情，可说到这里怎么老马又拿什么日常生活中的普世价值说事？这共产主义到底是门科学还是行为艺术？

答案是两者均是，或者说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从出发点来说，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普通人梦想的集合，我们基于身边的价值观所向往的社会，是一个感性的需求，和自古以来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西方霸权的遗产，工业化的人类拥有比他们的祖先更相似的生活，因此现代的共产主义梦想能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

很大程度的共鸣，但它依然是一个梦想，一个美好而不求现实的梦想。马克思的学说则是迄今为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最简单、准确的描述，有了这个描述，共产主义者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知道为什么共产主义过去行不通，才能规划未来，考虑共产主义怎么才能行得通。共产主义梦想和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好似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共同搭配才组成是一个值得为之付出的运动。

没有硬件的软件没法用。空想共产主义者已经拿他们的失败给我们作了榜样。如果硬件性能不行，跟不上软件的需求，那也一样运转不灵。建设一个新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分析历史一样，靠直觉绝对不行。类似的例子在人类社会中比比皆是：比如说普法战争，法国人的枪械和战术都占上风，一直打到停战，伤亡也远小于普鲁士人，但还是一败涂地。这是因为战争不是械斗的简单累加，成千上万军队在战场上对决，主要目标是力图破坏对方的作战组织，杀伤敌人反而不是第一目标。又比如说民主，几十个人的团体，有什么事情大家聚在一起举手表决就是，要委托谁办什么事情，把人拉出来让大伙认识一下也就结了。随着人数的增多，几百人的社区采取类似的方式应该也凑合，几千人就恐怕没法让想发言的人都发言，几万人则不可能聚在一起讨论。等到人数达到几十万，完全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触所有事物，必须有常设官僚机构；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识代理人，于是就需要媒体和选举宣传。到了更大范围的选举，复杂的国家事务只能被通过简化性的口号和候选人的笑容来表达，公共关系专家和选举经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理性的判断。现代社会的人类，一般有200左右个熟人，其中数十人又占了交往的大部分，并不比我们在小部落里打猎的祖先多多少，但这正是我们大部分社会学知识的来源。60亿人口的地球，数亿人口的国家，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运行方式绝对不是几百人小集团运行方式的简单放大。许多规律与日常生活造就的直觉甚至完全相反，不精研社会科学，再美好的愿望也只能成为笑话，巴黎公社就是一个标准的恶例。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历史的阐述相当简明，但光分析历史是远远不够，马克思的时代离现在已经有上百年，今天社会的规律不是靠读马克思就能读出来的，技术官僚的统治权就是一个例子。

马克思那时候，技术的门槛不高，与科学结合也不紧密，各个学科分化不严重。因此对专业人员的监督，无论是由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进行都比较有效，因此技术官僚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随后的100多年，技术天天进步，学科天天分化，培养一个技术人员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监督门槛就一天天上去了。到了最后，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优劣已经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甚至评价专业人员的工作有无必要、是否怠工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即便是同行业专业人员实施监督，复杂的技术工作依然有利于先介入的人推脱责任、掩盖问题。用简单的数学语言来说，就是专业人员的违规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较低。在较低的被查处概率下，为了明赏罚，保证工作效率，唯有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一条路。从而使处罚力度*查处概率的乘积保持不变，保证监督能够对专业人员形成足够威慑，维系工作效率。

问题在于，人类现有法律的原则是宁纵勿枉，你以更多的过失没有被发现为理由，对专业人员的某个过失处以超过正常水平的处罚，这违反了法律精神。此外，处罚在经济上的极限是没收财产，在生物上的极限是死刑，没有更重的处罚可以用于重要的专业部门。这时候唯有三条路：

一是尽量把可能的处罚方式都加上去，对所有证据不足的违规都进行处罚，比如斯大林的大清洗，这被证明可以救急但代价巨大，严重打击社会心理，不利于发展。

二是大幅提高专业人员的正常收入，即高薪养廉，通过提高不违规者的预期收入，来提高经济处罚的空间。有一个古老的笑话可以说明问题：一犹太人开店，伙计向他举报另外一个伙计怠工，犹太人发誓要重重惩罚。结果下个月反而给怠工者加薪。举报者大为不满，原来怠工可以加薪？犹太老板表示，惩罚在后头呢。结果过了两个月，犹太人随便找个理由开除了那个怠工的伙计，然后说：如果仅仅是开除他，他可以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但加薪后开除，那个家伙会痛心疾首一辈子的！这个犹太人老板没有权利殴打怠工的伙计，就用增加他的预期收入损失的方法惩罚他。我们现在对专业人员的态度也是一样。

三是干脆把经济的控制权交给专业人员，让老板或者人民靠边站，让他们为自己的事业负责。

自从二战结束，第一条方案就不常用了，第二条方案依然有监督成本，第三条方案影响社会化大生产，一般情况下是二、三方案并行。不采取这些措施的经济体就会因为专业人员的效率降低而损失巨大，从而容易被淘汰。技术官僚就此走上前台，取得管理社会的权力并享用大部分收益。至于技术官僚叫经理还是局长，他们的老板是洛克菲勒还是养老基金，或者是全国人民，都不影响技术官僚成为统治阶级的现实。这是在复杂工业社会条件下，制度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时代的人们没有复杂工业社会的生活经验，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这是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作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者兼实干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坦承自己的无知，发动一场文革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的人们依然从直觉出发，坚信消灭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就自然会有共产主义，或是坚持靠什么巴黎公社原则、文革经验就能治国平天下，那就好比用486来跑2009年的3D 游戏，必死无疑。

没有软件的硬件当然也没用。再大的硬盘，再牛的 cpu，再多的内存，要是没有合适的工程软件，那处理专业问题还不如个算盘。没有基于普世价值的理想主义作目标，只讲绝对的理性，绝对的科学，绝对的力量。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将回到制度竞争的老路子上去，追求更先进的导弹，更多的钢产量，更多的 GDP.........唯独漏了人的自由发展，最后没了往前走的动力，散伙了事。有苏联败家史在前头，我这里就不啰嗦了。总而言之，软的硬的两手抓，人类社会才能朝前走。

说了这么多，回头再看看今天的社会。虽然技术官僚替换了资产阶级，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没有变，而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加剧，因此经济危机跑不掉，老马也有了由头写这篇文章。这意味着现有秩序在否定自己存在的基础——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不是因为矿少了，不是因为机器少了，更不是因为劳动力少了，而是社会结构问题。换句话说，未来的新社会只要能解决分配结构问题，就享有一大笔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作红利。这是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另外，前面说了，教育的发展、全球价值观的趋同，再加上今天这个互联网的存在，让上层建筑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一套规律，不再全盘受制于制度竞争，这是新社会的文化基础。今天的社会问题在那里摆着，你看的到，他看得到，愚钝如老马都看得到，那么就别以为千千万万的新一代人民看不到，这是新社会的潜在群众基础。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爆发在哪个国家，都是第一次在识字率超过50%的社会中发动革命，一切都和过去相似，一切也将和过去不同。

正文完

后记

共产主义到底有多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共产主义作为摆脱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限制，给人类自由发展空间的制度，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好”。在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生物武器、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气候突变..........至少有十几种因素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消亡，至少是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但人类社会并没有真正负责且有权力的机构来处理任何一个问题。诸如核武器数量、资源存量等关键参数，真正关心的人们除了观测之外什么都不能作。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实仔细想来非常恐怖，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就更恐怖——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自身的能力，却没有能力选择前进的道路。古人认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来形容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但从稍长的时间段来看，今天人类社会的危机还在那个倒霉的盲人之上。

以前看过一个短篇小说，作者题目一概不记得了，只记得主角替政府研发一种超级武器，并把这当做个人的伟大科学事业。一日有陌生客来访，力劝主角放弃研究，劝说不成功即离去。晚上主角回家时才发现陌生客人临行赠给自己的孩子一支手枪作玩具！其实手枪并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我到工地上随便开一台施工机械出来，都具备比手枪更大的杀伤力，但于我和操作手是成人，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会有意识地避开事故，儿童既不清楚手枪的威力，也不会刻意避免向人射击。因此，我可以接触施工机械，儿童就不该玩弄手枪。从这次大危机可以看出来，目前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自控能力和集体意识恐怕还不如一个儿童，拥有的武器的相对威力却远大于儿童手里的手枪，这真的是人类最该担忧的事情。儿童总要成人才能开始独立生活，人类要真正保障自身的利益，也必须摆脱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把残酷的制度竞争从历史的控制室里赶走，共同规划一个未来，这样才能让我这样的杞人忧天者睡的香甜。

当然，人类灭亡，对于宇宙、太阳系来说毫无影响，甚至对于地球来说，也不过是苹果皮上少了几片霉菌，不足挂齿。但问题在于我们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人类自身。宇宙本身没有意义，我们人类给自己规定意义。人类诞生于荒野之中，曾与野兽为伍，只是最近万把年才试探出定居农业，建立了文明，最后还普及了教育，让许多人有闲工夫也有能力考虑人生的意义。作为个体，几千年前就有许多人思考了生活的意义，但对文明的建立过程，对历史有初步的整体认识不过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还是一直被竞争规律推着走，和当年东非大裂谷里的祖先没什么本质区别。

有人可能会推崇自然的竞争规律，以为那是天道，是最值得尊重的规则。一般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没体验过“天道”。自然界的规则意味着弱肉强食，没有人会帮助要消亡的弱者，甚至没有人痛惜。整个物种的消亡在自然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作为动物的一种，人类抛弃自己略有缺憾的婴儿乃至同类相食也是竞争压力下的习惯。如果有人回到那种社会，今天也有非洲草原可以去体验天道，无需叶公好龙。大部分人类在这个工业化时代已经融入工业化生活，至少也融入了被工业文明改造的农业生活，他们绝对不会漠视人类的消亡，不会吃同类，不会抛弃自己的病婴，原因就是我们有一套今天的价值观。

有两句常见的粗话“不是人！”、“没人味！”，大家都知道，这是为道德败坏、为

人不齿的行为准备的形容词。这里引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定义一个人有没有做人的资格，不是以他的智力或制造工具的能力为标准，而是看他是否尊重基本的道德准则。我的外语很差，不知道其他语言是否有类似的形容词，但在我看来，这就是“普世价值”最基本的部分。我们不愿意回到非洲草原，我们希望避免危机，我们批判社会，我们干坏事的时候找借口，都是因为这个价值观在起作用。历史在竞争规律下运行，可能有时会符合这个价值观，也有可能会挑战这个价值观，总之是按它自己的方向进行，根本无视我们人类是否会痛苦，是否会灭亡。所以说，历史从来不温柔。

自然界的危机挑战我们人类时，我们会迎战，这是猿人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不用人教。但人类社会内部的规律也会挑战我们人类，这是人类最近才认识到的问题，我们也要迎战，否则可能连生存权都保不住。输了可以从头再来，赢了则赢得无限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迎战。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先搞清楚敌人的底细，马克思告诫我们说，这个规律可不好对付啊，世界没有你直觉判断的那么简单。

历史从来不温柔，人类就要对自己温柔一点，因为你指望不着上帝。世界从来不简单，复杂到远远超出一个家庭，所以要动用科学来研究，给全人类一个温柔的家，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总说宏大的问题，这共产主义运动就显得很严肃，其实对于每个人而言，共产主义都是很贴近个人，很感性化的一种思想。我们都曾经是个纯洁的小孩，都想作个好人，都希望每天能说实话，希望每天不用戴假面具，希望有从天而降的爱情，希望能够衣食无忧，自由生活。然而，长大了，我们必须学着“成熟”，学人情世故，学阴谋诡计，学着带上面具去相亲，学着告诉自己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直到撕碎最后一点点梦想融入生活，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无奈。有些无奈是无解的，比如你暗恋的人不一定喜欢你，但你至少不希望你喜欢的女孩为了一套大房子嫁给别人。

如果你只停留在个人的视角看这些问题，那么确实只有融入社会的选择。但我们是有思想有逻辑的高等动物，能够把眼光放的远一些，比如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其实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是人类从历史惯性中继承的负资产。丢掉这些包袱，我们可以活的更开心，比如说经济危机。当然，许多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无法独立解决，比如说和金钱联系的婚姻，不是靠修订婚姻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消灭战争也不能靠一国单独裁军。于是，我们需要马克思，需要超越马克思，需要在先进的社会科学指导下进行一次全盘解决，为了追求幸福，也为了避免危机。这就是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

对于共产主义者，有句很著名的评论“30岁之前不是左派,说明你没良心;30岁之后还是左派,说明你没脑子”。这话说的很准，准确地描绘了一些准共产主义者的面貌。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理解共产主义中的科学部分，纯粹是个人的一种行为艺术。因此一旦到了自食其力、拖家带口的年头，就发现自己撞到现实的高墙上，觉得这高墙坚不可摧，应该现实一点，理智一点，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这不是理性的表现，恰恰是理性不足的表现。不过，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所有人心中都有种子，只是需要科学的力量让种子萌发。科学可以来自前辈的探索，更需要来自对时代的观察，某些共产主义者的理性停留在19世纪，而且拒绝前进。那么，我们只好

把他们留在他们喜欢的时代喊口号，其他人继续前进，融入21世纪的生活，改变这个时代。这就是当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全文完，本文为纯粹的快餐作品，论述缺乏逻辑，逻辑缺乏证据。如果你读完本文还不嫌又臭又长，那么，不妨读一下作者另一篇更长、也更认真的未完文章《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读过如有兴趣，请督促老马写完，你们的督促是我最大的填坑动力。

马前卒 09 02

二十世纪结束了，中国要习惯帝国主义

一直习惯于把自己20岁之前的生活看成一条线，而把20岁之后的生活看做一个点。需要玩点怀旧情调的时候，总是想20岁之前的事情，而20岁之后的事情基本上是我的“当代史”。说起来就在眼前，还谈不上回忆二字。混着混着，一不小心，我就发现2010年春节已经在眼前了，当年那个说起来好似科幻小说的21世纪，原来不声不响已经过了10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一个“点”来形容。作为一个三十的中年秃头宅男，不光要有少年和童年可以怀念，还得承认自己不知不觉溜过去的青年时代也变成了历史。

21世纪的宅男回忆，自然还是从网络开始。这几天看了好几个关于这十来年的帖子。有人说中国好像这10年彻底翻了个身。从一个大使馆被人扔炸弹，飞机被人撞，海岛被人占，经济赶不上发达国家零头的穷国弱国一下变成了打个喷嚏世界都要感冒的帝国主义——以往都是中国外交部靠空头声明抗议别人的帝国主义，咋一转眼，换了中国满世界地收抗议了呢？但也有人说，中国十年前很烂，遍地下岗工人，现在遍地躲猫猫、周老虎，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合起来欺负老百姓，给人打工拿空头国债，还是一天天的继续烂下去。有人说，民主自由思想靠网络大行其道，十年硕果累累。还有人说，这10年的网络就是一个民主自由臭大街的历程。我这里也倚老卖老地扯几句这十年，说的都是一家之见，说错莫怪，跑题也正常。要是实在跑的太远，大家就当没看见标题吧……去年这个时候，俺写了个《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何尝会温柔？》，今年过年就接着那个话茬写，那里写过的东西这里就不再废话了。乐意捧场的兄弟可以先看看那篇文章。

从大处说，这几天有两件事挺值得一说。一是统计出来的09年钢产量，09年钢产量5.67亿吨，世界第一，等于第二名到第二十四名之和。其实第25名的钢产量只有500万吨，全国的钢铁工业凑成一个企业，拿到中国一个地级市开发区都算不上头牌项目。简而言之，中国造了全世界差不多一半的钢铁（5.67/12.19=46%）。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国、美国这两个世界老大曾有过这种场面。要注意的是，中国这个产量是爆发出来的，04年的时候，世界钢产量已经10亿吨多了，中国还只有2.8亿吨。现在世界钢产量12.19亿吨，相对数增长百分之十几，绝对数增长了1.49亿吨，中国却用5年时间翻了一番，绝对数增长了2.8亿吨。结果就是中国生产辆近半，同时还抢了其他国家的买卖。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当然不太可能），用不了几年，其他国家就不必保留钢铁工业了。这无可争辩的表明了中国的工业规模。

另一件事就是 CNMD 了，台湾从美国买了一票武器，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抗议之后忽然玩了个中段反导出来。美国过几天也玩一票，悲剧的失败了。自从苏联垮台以来，美国在顶级军事竞争中第一次碰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还被人家占了小小的先手。这说明中国也不是一味地靠数量混江湖，在顶级技术对抗上也不算怎么吃亏。

如果说钢铁是夕阳产业，战略武器对抗又太尖端，发电量算是一个能够在数量和质量之间取平衡的指标。09年中国的发电量3.6506万亿千瓦时——是美国的90%。这基本说明了两国现在的实力对比。自从1900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另一个国家和美国的实力如此接近（苏联发电量曾在86年达到美国的60%），再考虑到发展速度和加速度，可以说抢班夺权指日可待。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要变天了。如果说21世纪前10年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

震荡中往前走。现在终于可以从国际秩序的角度宣布20世纪结束了。被两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搅起的滔天巨浪已经平息，下一浪长什么样尚待观察。

在 BBS 上被网友羞辱多了，老马久病成医，也有了点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读历史的时候不要把目光集中在少数标志性事件上，标志性事件顾名思义就是个标志，背后的历史趋势才最值得关注。比如中国连着反卫星 打导弹，这绝不是外贸做了几笔大单就能花钱砸出来的热闹。同样的，钢产量接近世界一半，打翻所有国家的一般钢材行业也不是几个开发区的招商局长能策动的事情，甚至不是印度这种同样上十亿人口的国家能一咬牙就能干的事情。

现代工业社会就是这样，具有足够重要性的大项目必然是一个复杂系统集成项目，而这样的项目从立项到出成果总要花上几十年时间积累。而这几十年时间的积累又必须以一个完整的工业国实力做依托。美国的 F22刚刚开始在天上耀武扬威了，可它的立项要追溯到70年代初，基本确定技术路线在80年代初，试飞的时候是90年，苏联还没解体。前后差不多40年时间，才有了今天独步天下的空军实力。而翻开1987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447页有一个基于华国锋时代经济数据的预测曲线，在那张表上，2010年的中国 GDP 是德国和英国之和，毫无疑问地和美苏（他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旗鼓相当。64事件，邓小平南巡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这种长时段的曲线上都不值一提。

在这个导弹射程之内才有真理的野蛮世界上，要想当一个和美苏同级别的大国，光富不强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中国而不是当时更富裕的工业国能够在一代人之后和美国平起平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010年开年的 CNMD。这玩意追根溯源是640反导工程，1967年立项，比 F22还要古老。到70年代末，中国尽管还没有美苏那种级别的反导能力，却也有了自己的超级反导雷达、反导导弹，反导大炮。是20世纪美苏之外唯一一个制造反弹道导弹武器的国家。(有人说这玩意低级，比不得美苏，这没错。可战略武器是一种永远用不上的东西，用上那天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从无到有的差别根本就不是从好到坏能够比的)差不多同时，能砸到美苏的东风四号导弹也列装了。正是有了这一堆多半永远用不上的东西，中国才能在2010年开年 show 自己的 CNMD，才能让自己的经济直追美国。

当然，保罗肯尼迪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但也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苏联的相对衰败和日益增长的内部问题。而60年代就有人写书提问《苏联能活到1984年吗？》。总的来说，60年代末中苏分裂之后，苏联在长期竞争中的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另类的话题——毕竟苏联要在没有任何强大盟友的情况下对抗其他所有工业国。苏联人和苏共的信仰而苏联的衰败又必然和欧洲卫星国、非俄罗斯族领土的离心同步进行，即使苏联的工业经济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和整个西方的差距却越来越大。91年的巨变，看似突然，但深层诱因也是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不是91年几个疯子一闹就能闹成的。再把眼光放得宏观一点，其实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不少东欧国家解体前后的统治阶层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一部分党委书记在解体的动荡中出局，但另一批党委书记取得了比以前更实惠的权利——这种事情即使没有苏联解体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说1968年，中国有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野战军出身的工农干部痛快淋漓地修理地下党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在苏联后期，克格勃首脑越来越接近真正的权力中心，如果从安德罗波夫拉一条曲线到叶利钦、久加诺夫再到普京，完全可以把苏联解体看成特务系官僚势力上升、僵化的党务官僚靠边站这两个趋势中的较大插曲罢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老马说说2010年 CNMD 一声巨响，20世纪结束了。这句自相矛盾又貌似很 NB 的话其实是山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他老人家按照实际的标志性事件而不是整100的年头来分，把“漫长的19世纪”的结束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这个“短暂的20世纪”结束在苏联解体之时。现在看来，把苏联解体看做20世纪的结束未免太高估了苏联解体的意义，也太偏欧美视角化。20世纪历史的主流应该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苏联解体之时，自由资本主义的门面还能忽悠人，中国还没有摸到能过河的石头，因此还算不得时代的结束。所以老马才把这个界限划到了2010年。

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凡是被政治课折磨过的弟兄们都应该记得列宁有个著名的总结：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这个总结放到1916算是比较准确了。它很准确地描述了工业革命发展到20世纪之后的现实，即资本在这个年头，要不联合起来变成垄断资本，养科研机构，养军队，养政府，养黑社会，好保证自己的存活和增殖；要不就被人吞并，然后让人家养科研机构，养军队，养政府，养黑社会。在1916年那个年头，像无畏战列舰和装备重炮机枪的现代集团军已经太贵，不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可以独立开发并维护的东西，所以世界上只有那么四五个国家能玩世界大战这种游戏。而世界就那么大，英法德美俄再加上各自的势力范围就差不多了。

既然世界分割完了，那么下一步就是世界大战，列宁盘算着大战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战后列宁这个乱世赌徒带着几千靠得住的布尔什维克就拿下一个俄国，自然有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感觉，以为世界革命就在眼前，也甭费精力给资本主义再算命了。结果呢……不等资本主义灭亡，苏联自己就先修后亡。很关键的一点是列宁那一代人实在想不到苏联这个大块头一旦出现，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就跟着变了。

毫无疑问，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势力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减缓内部竞争压力，改善分配方式，从而摆脱1929式大危机的重要原因。但作为美帝的对立面，苏联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其实也谈不上共产主义，列宁对此也毫不讳言。“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24万忠诚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战时共产主义也罢，新经济政策也好，都是布尔什维克掌握工业资源下的策略问题，国家资本主义是苏联的立国之本。列宁盘算着靠这个坚持几十年怎么也等到世界革命了。斯大林则干脆不想什么世界革命，直接就盘算着怎么把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家当做大。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确实成功了——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成功的是资本。资本选择了一群共产党官僚当代理人，认定他们能让资本取得最佳的扩张速度。从这个角度说，苏联只是一个由共产主义者建立，一些靠共产主义旗号以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官僚统治的国家。列宁没有料到，苏联没有推动欧洲工业国发生革命，自身反而成了新的工业国，成了新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这个新帝国主义国家，过多的强调它的共产主义出身或

是认为它一直是个共产主义国家都不合适。但毫无疑问，红旗褪色褪到和白色差不多的那一天，就是它的死期。

有句话说得好，你天天打人耳光，偶尔有一天不打，那叫善意。你天天给人蛋糕，有一天不给，那叫悲剧。苏联承诺的太多，实际上还是一切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只是带上一些共产主义色彩的改良和主动给的福利。即使福利绝对值一样，效果也不如承诺一个丛林世界，然后再“善意”地给一些福利的资本主义好。何况苏联本来就没有和整个西方对抗的本钱，所以垮了。但在苏联跨之前，共产主义色彩可以说已经消退的差不多了。中国也一样，只是苏联官僚发现自己弄垮了苏联，可以获得更实在的权力，中国官僚先有控制地撕下遮羞布，然后发现保持这个壳才更实惠，又有苏联休克疗法的前车之鉴，所以不用搞一次解体的折腾——虽然折腾也不过是一次内部大洗牌。

说到休克疗法，这倒是比苏联解体还重要的多的荒谬笑话。因为那种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本身就是19世纪都未曾实施过的一种幻想，至多只能在那种不配谈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小国玩玩。苏联这种世界上规模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20世纪还要搞什么彻底的私有化，让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指望市场自己组织自己。那简直就不能用悲剧来形容了。问题是这种闹剧还真就发生了。余波持续到20世纪，俄罗斯本来还可以保持一个地区大国的经济规模，实际上连这1/3都没保住，到今天还是个往下滑的命。这次忽悠战术的成功，还是得追溯到苏联成立之前。

在列宁那一代人的青年时代，或者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一代人的晚年，也就是那个“漫长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那是一个真正的丛林时代，也是一个赤裸裸宣扬富人权利的时代。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工作到肢体畸形，然后被一脚踢出门等死。养老保险、社会福利、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凡是干预企业和市场自由的行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靠这种制度这种先行一步的英国、蒸蒸日上的美国，都是绝对大逆不道想法。然而，这样的制度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际运行中，都创造了自身消化不了的生产能力，不断地要从外部获取市场才能运行。因此工人的贫困化和生产力的高涨同步进行，工人越努力工作，日子越难过。资本家则头疼于如何开拓新市场，干掉自己邻国的竞争对手。因此国内国外的局势都一天比一天紧张，小摩擦不断，劳资冲突不断，世界大战的轮廓也渐渐浮出水面。对于这么一个因为生产力发展而越来越艰难的世界，一个因为太富裕而让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的世界。马克思和列宁都觉得必须靠“有计划的生产和消费”来解决问题。换而言之，消灭市场和企业主导的经济秩序，给平民享受工业财富的权利和社会福利，之后天下大同。

在世界大战到来之前，马克思那一套还是异端邪说，列宁还是个丧家之犬。资本家、贵族和知识分子为了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客气地垄断政府，并认为这是上等人天然的权利。虽然已经有议会制度，但选举人资格受财产和学历限制这不仅在欧美国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做法，还被那些照猫画虎搞议会的国家，如中国日本作为先进经验学过来。1867年之后的英国经历了重大改革，把选举权在城市里开放到每年房租10英镑以上的阶层。这才让13%的成年人有选举权，而且还实行等级选举制和复票制。有钱人和有知识的人拥有普通选民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投票权，好比说你读了211大学，就可以在老家的街道和大学各投一票，当了讲师就能投10票，这种制度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在俄国，每个土地贵族的一票相当于大资本所有者的4票、中产阶级的65票、农民的260票、工人的543票。屁股决定脑袋，这样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可想而知。马克思批判的，

列宁盘算着要推翻的政府就是这么一种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普选制离共产主义已经没多远了。

经济上让企业市场主导，拖着整个世界去经济危机，政治上放不开普选制，有钱人和旧贵族拉上知识分子垄断政权，制造社会分裂。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这样的世界没有前途，早晚在世界大战的震荡中自取灭亡，而新社会将因此浴火重生。这个论点熟悉不熟悉？用时髦的话说，列宁那一拨人当时想说的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剥削社会的历史到此为止，共产主义的千年帝国即将到来。当世界大战在1914年如约开场时，虽然一大票和民族主义牵扯不清的左翼（今天这样的左翼也不少）急忙赶回国，和当局一起把几千万人送到壕沟里去互相填沟，但这只是略微让剩下的共产主义者感到不快而已，因为恩格斯那个帝国主义自取灭亡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如何给这个罪恶的制度收尸。苏联的建立既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是对这个理论的进一步证明。对于列宁个人来说，苏联的建立不是为振兴俄罗斯而进行的一次换壳操作，而是终结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序幕。从事后诸葛亮的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说法不成立。但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再荒谬，再残酷的事情，也比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暂且不提第二次）和1929年大危机——人类因为自己生产能力太强而必须自相残杀，必须让一部分人饿死！

列宁之所以对"历史的终结"自信满满，就是因为他对帝国主义特性的第五条总结。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换句话说，从此不会再有新的帝国主义了。

以往的帝国主义发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直到日本，再加上勉强算半个的意大利。都是靠一批企业把本国工资压低，把东西卖给别人，换回不能吃不能穿的金银发展起来的，然后企业纳税养军队，出去再抢市场抢资源，对内镇压温饱线上下的工人，把廉价的东西卖出去再赚钱进入下一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逐步整合成个位数的寡头集团，行动协调一致，小企业放弃实质独立性，变成附庸。平民闹事要么被镇压，要么信了民族主义，也被绑上出去抢劫的战车。最后，还必须有几个外国国家倒霉，变成殖民地和附庸国，才能有资源供本国企业滚雪球，从散漫的小作坊变成气派的垄断企业。从英国到日本，可用来掠夺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小，这条路走的越来越艰难。英国万把核心部队扫印度，几艘战列舰横扫中国沿海，日本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赌上全国资源也只是打赢了两场基本上在失败边缘的战争。进了赌场，要是赔率一场比一场不利，你上一个玩家连扔2个六点才勉强还本，那你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玩。列宁就是基于这个结论认定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完毕的。而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扩张就要死的玩意，所以新时代要来了。

1914年，20世纪正式开场（还是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定义）。现在差不多100年过去了，政府早就开始搞福利了，大企业受政府调控了（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个意思），理论上一人一票都平等了。共产主义还是没有出现，反倒是苏联垮了。咋回事？原因也很简单，国家资本主义还在竞争呢，还在竞争中蒸蒸日上呢。苏联发卫星，美国也跟着发一个，苏联发飞船，美国也不能落下，美国登月，苏联发和平号。在意识形态对峙和核恐怖平衡下，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既没有导致世界大战（或许这应该归结为运气），也提高了技术水平，消耗了剩余产品，甚至还向底层和落后国家再分配了财富，从而缓解了矛盾。

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夹缝中窜出来的中国争分夺秒地发展，这就是20世纪的基本脉络（参见上一篇：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何尝会温柔？）

不过，分析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还是要把纷繁的事实归纳到少数规律上来。即使列宁那一拨人预测错了，也必须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是唯一预测对的人。也必须注意到共产主义运动给二十世纪带来的巨大进步。至少，我们得闹明白，他们错在哪里？

再次跑题，先说一个不相干的故事。

某市有一个新建的政府办公区，相当的宏伟壮观。壮观到里面每一栋主要单体都包括好几个复杂的回型走廊，和几个完全一样的巨大天井，各层的平面结构还不完全相同，最要命的是还没安装路标、门牌和平面图！。不熟悉的人在里面很难找到正确的路。偏偏没见过世面的老马和那里的某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的小小干部有一点小小的业务关系，必须到这个足以拍科幻片的大建筑里面去找到这位公仆。第一次去，人家快下班了，老马东绕西绕，估计走了直线距离四五倍的路，才在4点40摸进人家办公室。第二次去，又赶上高速堵车，又是四点半多才到人家大门口。本来老马去过一次了，大致知道那个办公室的方位，就算问不到人，也能隐约猜出应该有更便捷的路线。奈何时间不等人，老路线虽然绕路，但起码能保证我在下班前找到那地方。寻找新路线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败，彻底把事情拖到第二天。两相权衡，老马还是沿着老路线，上楼下楼，迂回包抄，气喘吁吁地跑到目的地。

第三次，好吧，这次时间更紧，虽然没下班，但负责走这道手续的爷们在电话里说马上要出去。老马没时间迂绕了，情急之下直接依照自己猜测的大概方向直冲而去，能走楼道走楼道，走不了就穿过天井，穿过天井后的方向对不对？跟着感觉走吧。最后，踹开一道防火门，目标就在眼前…….基本就是直线距离的一倍半就到了。

办完事回去的路上，我就琢磨，这几次折腾，和国家寻求发展路线也差不多。基本上大国发展都有自己的惯性，不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不会急转弯。火烧眉毛的时候，没空仔细琢磨往哪个方向转，如果前面有成功先例，那跟上就是，实在跟不上了才需要自己趟。英国第一个误打误撞地趟出工业资本主义的路来，其他国家穷则思变的时候也只能把这一条路走到黑，哪怕像日本那样不成功就成仁的走法也顾不得了。至少这条路有人走通过，至于这条路绕远不绕远，好走不好走，那不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该考虑的事情。可是俄国这条路刚走到一半，就发现路越来越窄，俄国这个大胖子有卡在这里的危险（日本刚刚把自己饿瘦了钻过去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世界大战来了，彻底把那点家底打的粉碎。再走英国的老路既不可能也没时间，只好权且让列宁这个标新立异的家伙接手——反正情况也不可能更坏了。

列宁没几年就挂了，斯大林左看右看，世界革命一时也来不了，自己先活下去是正经——这就把国策基本定了。在一个狼和羊的世界上，不想当羊，那就是当狼，起码也是条和狼差不多的猛兽。西方国家先搞自由资本主义，小企业逐步滚成垄断集团，再操纵国家机器保证进一步的扩张。斯大林虽然没打算走这条路，但也深知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活路，因此用国家权力强行建设工业经济——不管有没有市场。这正好从另一个方向走进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大门。靠企业和独立资本家来搞国家，还是靠国家反过来直接搞企业，搞工业经济。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列宁没有想清楚，觉得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应该搞革命。恰恰是这个革命给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式——以革命党组成强大的国

家机器，用国家机器来实现资本的扩张！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这样成长起来，而且后发先至，国家机器与工业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更能提供足够的需求，更有利于调动资源协调经济发展。再过几年，1929大危机来了，苏联不仅不受影响，反而趁机快速发展，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美国出了个罗斯福，也用国家力量提供需求，还带着美国去打世界大战，也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市场问题。至于德国日本意大利，早就以法西斯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和工业经济的结合。只有死抱着殖民帝国不放，觉得没必要加速变革的英法悲剧了，在接下来的二战中彻底边缘化，二战后才扭扭捏捏地转向。

革命成了工业资本主义扩张的新方式，但要成功的扩张，还有一个前提是这个国家足够大。因为只有大国才能从原有的农业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资源（从外面弄已经不可能了），打造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弱小的工业提供需求和投资。比如说新疆建设兵团的工商业启动资金，就是王震从兵团官兵的军装里省出来的，每年两套改一套不说，全部军装都减少两个口袋，节约布料卖钱搞工业。小国显然玩不了这一套，因为攒起来也没几个钱。此外，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就是一个壳，这个壳除了苦练内功搞工业社会外，还必须挡住其他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你可以设想志愿军的轻步兵在苏联援助没到的情况下从鸭绿江冲到汉城，却不可能设想匈牙利红军在日翻捷克部队之后再去围歼协约国联军。这个世界太野蛮了，以至于小国从来没有主导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就限制了苏联道路的后继者。如果说日本是因为个头小才在英国的卵翼下成长起来，中国就是因为足够大，才可能自成体系地搞国家资本主义。其他国家自主地搞场革命都难，更不要说靠革命红利搞国家资本主义了。东欧，朝鲜，东南亚那些国家其实只能算苏联和中国体系的延伸。

不管咋说，咱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站在苏联的尸首上可以随便展示自己的见识，说什么共产主义者主导的革命也可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其实这从苏联之前的历史来看，也有脉络可循。从英法美到德国日本，国家对企业的扶持、干预，乃至直接投资一个比一个多，原因很简单，外面可盘剥的地盘越来越少了，如果国家不伸手干预，那本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很难形成能出去拼杀的体格。只是当时还没到1914，外面的地盘就算少了，毕竟还不是没有，1929年大危机也没有到。所以各国政府终究没有迈出靠政府信用来解决需求这一步。因此列宁觉得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无可变，共产主义指日可待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俺说苏联的解体不算大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才是个历史拐点。因为休克疗法本身是自由主义大忽悠的一个笑话。好比个街头卖假药的，本来也就想忽悠个百八十块的拉倒，没想到俄罗斯这个继承了亿万家财的憨货说啥信啥。那，说不得要骗他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骗的有多惨？前几天在 sb 看了个回复很贴切：“戈尔巴乔夫在台上时，俺有一次看新闻联播，他去考察农业，听播音员说苏联全部粮食年产一亿九千万吨！可损耗居然占四分之一！败家子呀…………后来听说俄罗斯产量才7、8千万吨，大吃一惊，听说还出口………..就没话说了”。其实，俄罗斯最低谷的时候，粮食产量到了四千万吨。一向被指为苏联弱项的农业都这德行，自由主义大忽悠战果辉煌。

然而，正如我一个做业务员的同学所言：“骗人要骗的成功，第一条就是得自己真信”。 诚哉斯言！谁也不是傻子，要想骗的一个大国团团转，光靠几条白纸黑字的方案是不行的。要有一批立场一贯坚定的知识分子搞理论体系，还要有成功的案例当样板。为啥已经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北约集团能拿出这两样东西给苏联呢？

这就要回到列宁的青年时代去看问题。那个下限放到1914年的“漫长19世纪”其实就是一个资本主义适应工业时代的过程。现代工业一方面扩大人类的经济能力，一方面也扩大了有效率的经济单位的规模。企业越来越强，联合越来越多，从卡特尔、辛迪加到托拉斯。这确实是一个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转型的趋势。但列宁看不到身后的事情，看不到1929大危机和苏联本身对资本主义的冲击。以为垄断化过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到头了，以为垄断企业养私兵，养议员就够牛了，殊不知这个进程到他死只进行了一半。后面的官僚化，国有化、军事化、虚拟金融化、法西斯化他都没看到。直到冷战开场，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才算基本确定下来。

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还有自己的惯性。即便经济模式和结构彻底变了，从一种文化，一种政治外壳转向另一种总需要几代人时间。受过原来那种文化影响的人口越多，影响越深，这个惯性就越大。但无论如何，人的记忆和习惯会随着生命结束而结束，所以几代人时间一般也能过渡过去。在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型可能需要上百年，正好给了上层建筑过渡的时间。相比过渡期前后上千年的稳定期，过渡期被忽略掉也无关大局。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经济结构可能几十年就要转型，稳定个几十年后再花几十年往另一个模式转，文化、艺术、社会心理、社会分层肯定也要跟着变，但问题是上层建筑变化不能无限提高，结果就是一路小跑也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许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表现甚至落后于经济结构一个时代。即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改变几十年之后，已经要再往新时代转了，上一次经济调整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才走到台面上来。

打个比方，我们上中学时都学过内燃机的基本原理。无非就是四个冲程，进气、压缩、做功、排气，每个冲程曲轴转180度，一个周期下来转2圈。从理论上说，气缸的进气口出气口都有单向阀控制，进气冲程进气口开，排气口闭，排气冲程相反，压缩和做功冲程两个口都关。往返循环，做功不止。这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放在低速转动的机械中是很符合实际的，也很容易被人理解。但问题在于实际应用的内燃机几乎都是高速转动，这时空气本身的惯性就不可忽视了。可能是压缩冲程已经开始了，进气口还没闭，空气的惯性可以使气缸内的气体一边进气一边压缩，也可能是排气冲程已经结束了，但排气口还要再开一会，一边排气一边进气，既利用了空气惯性，也使气缸里残气变少，燃烧充分。但发动机始需要稳定地转，这种滞后不能阻止本冲程的继续进行，也不能阻止下一个冲程及时开始。所以实际应用的发动机理论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滞后。

类似的，经济基础变革就好比发动机从上一个冲程进到下一个冲程，在竞争下必须及时更新；社会结构和各种社会学理论就好比空气的流向，在自己的惯性下，不一定和经济基础完全同步。再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在一个地区过时的思想和社会结构在其他地方未必没有生存空间，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具体到我们这个地球的20世纪初来说，已有的工业国成功案例基本都是靠私人企业的自发扩张起来的。其中最成功的英国（截止到1914年），正是在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工业的情况下，放自己的企业和商人出去跑马圈地，圈成世界霸主的。政府和舰队只是个保驾护航的守夜人，企业碰了壁（比如鸦片卖不动），才出手干预。因此亚当斯密那一套颇能忽悠人。西方也一直打着这旗号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左右国家政权的垄断企业打着“尊重私有产权”“保持企业活力就是保持国家活力”的自由主义旗号行垄断之实，说着说着，自己也就相信了。

等到世界大战打完，世界上多了一个苏联，和美国控制的其他工业国打对台戏。这场对抗实质上是两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对抗。既然是对抗，就要在宣传中体现出自己和对方的不同，好定义道德制高点。苏联自命共产主义，美国自然不能说咱们其实是一个操作系统，就得强调自己是自由世界，自己的经济因自由而有活力。这样，本来应该跟上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又因为阵营分明的冷战而固化乃至宗教化。冷战的结果是用3亿工业人口对抗6亿工业人口的苏联解体，一时间原苏联统治集团也被这几十年的忽悠迷茫了。糊里糊涂地就把对手的面子当里子，真心实意地学习“西方经验”搞休克疗法，搞市场经济。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本来不过是个悲剧，俄罗斯可以保持一个50年代英国那种准大国的架子，这个忽悠结束后，完全就是个惨剧了。

对了，成功的忽悠还需要成功案例，越近越好，这个西方也不缺。在日本也加入工业国的行列之后，各个工业国都像列宁一样，认为新增一个工业国不太可能。但工业实力薄弱，资本不足的殖民地和弱国不妨诚心诚意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做好殖民地和资源产地的本分工作。所以殖民地小国颇有不少代理人认真地搞市场经济。再客观一点说，对于那些弱国来说，确实搞工业是亏钱的，如果工业搞不出一个完整体系来，搞多少亏多少，远不如顺应市场规律，挖矿卖资源，进口物资来的合算。所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相当诱人，也能在特定国家收到实效。苏联是91年倒的，就在不久前的70年代末，智利就靠休克疗法翻过一次身。可智利是什么国家啊，那是一个除了铜矿就是石油，除了石油就是金矿，除了金矿就是森林，除了森林就是海岸线（打渔啊）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是玩命挖矿就行，私人放开了挖肯定比政府绞尽脑汁培养本国制造业强。所以休克疗法一试就灵。可惜苏联不是一个光靠卖石油吃饭的国家，卖资源一向是个贴补而不是大头。苏联经济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门类，水准还相当不错。这种复杂程度的经济交给市场去配置，让政府撤出对经济部门的管制和协调，在理论上不是不能混，但实际操作中恐怕要300年才能达成最优资源配置——到那时候没准其他国家都不住地球了，或者说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试错法”已经把整个经济试没了。所以苏联经济在比智利还爷们的休克疗法中变成了大茶几。到现在，久病成医，俄罗斯已经拥有了对休克疗法的免疫力——变成了一个纯粹吃资源的国家。休克就休克，谁怕谁？现役坦克减到2000辆又怎样？苏联的核武库还要20年才过期呢，休克了你就敢动我？

20年之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现在回头来看中国这个也是靠革命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案例。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而蒋介石政权是如此残暴无能，以至于中国人民只用了3年就取得了胜利，以至于战争能力过剩的美国，也不再愿意支持这个没法支持的盟友——可惜他们在越战时没这么聪明。胜利的第二年，朝鲜局势急转直下，美国军队直抵鸭绿江。鉴于500年来中国受到的致命进攻均从东北和朝鲜开始，中国志愿军又斗志昂扬地拿着十几种口径的万国造武器出国作战。虽然没有海空支援，补给断断续续，但以轻步兵为主的志愿军还是把美国人赶到了三八线以南，然后艰难地守住了这条防线。志愿军的无畏战斗一下子使中国真正获得了大国地位。对敌人而言，中国从此不可轻侮，对盟友而言，中国值得下本钱支持，尤其是没有一个重量级盟友的苏联。

中国对美作战的战果让乐观其成却又缺乏正面对抗美国信心的斯大林大吃一惊，然后苏联武器援助和米格战斗机都来了，一起把朝鲜的局面维持住。更重要的援助是一整套现

代工业体系，苏联人提供了关键物资，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手把手地教中国建立工厂、研究所和大学。这些援助折合成现金和工时并不算多，也就是数亿美元。远不如美国援助台湾，苏联援助东欧的规模。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转移。因为在这之前（可能也包括之后），从未有一个国家主动促成自己的邻国（一个巨大的邻国）工业化。只有不靠外部需求发展的苏联才可能在特定时期这么干。

诚心诚意的技术援助和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建设精神结合，迅速创造了人间奇迹。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纯粹到全国钢铁产量15万吨。相比之下，1947年，人口更少的印度已经有100万吨产能。15万吨是啥概念呢？北京那个鸟巢就用了11万吨钢——这是修改设计之后的结果，原设计要15.7万吨，正好是49年全年的钢产量。要是造个鸟巢，全国人民连个菜刀都不能买。这意味着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关键部位用铁包一层，车轮是木头的，稍上点档次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水瓢，不是木头的，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我奶奶从那个年代过来，直到90年代还习惯性地收集一切钢铁、玻璃容器，认为把这些宝贵的物资卖废品是极大的浪费。直到她老人家1997年去世为止，弄的我家老院子的墙根下一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罐头瓶。

和革命前已经是地球一霸，钢铁产量和法国相当，能够在外国技术支持下自造战列舰的俄国（当然，大部分现代工业都是英法资本控制）相比，中国这个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甚至和当了上百年殖民地，英国人留下五万五千公里铁路的印度相比，中国也差得远。殖民帝国的统治者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问题是殖民者也不能先知先觉，不会想到有一天要灰溜溜地卷铺盖卷回欧洲，还以为自己的帝国可以千秋万代呢。所以殖民帝国还是在大部分亚洲殖民地留下了不错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矿山和交通设施。为了保证对殖民地的基层控制，往往还会建设一个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培养二鬼子的同时也传播工业化知识。这些东西在二战后都成了独立国家的宝贵资产。但偏偏中国太大了，一直没有被一个帝国主义独占过。19世纪时，大清国靠中法战争和左宗棠西征，还有那么一点点威风和架子在，中国因此只能算半殖民地，人家只能零散地投资修点铁路。等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后，中国实质上只是个军阀割据地区的地理名词。可中国还是太大，没法被人独吞，殖民地经营太晚的美国就跑上来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成了列强的公用殖民地，只有台湾被日本割掉，日俄共享的东北在帝俄崩溃后也被日本独吞。其他地方都是列强共处，利益均沾。公用殖民地+军阀割据就意味着没人投资投技术搞全国的基础设施，列强一起在上海修个豪华办事处就算了，其他地方任用代理人一味掠夺。结果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化教育水平平均下来还不如朝鲜、东南亚。日本当年占了东北和中国东部之后，还是缺钢铁，缺石油，必须发动太平洋战争去抢东南亚，为抢东南亚不惜先打珍珠港和美国开战。其实不是因为东南亚比中国腹地资源潜力大，也不是因为东南亚的人力动员潜力大。而是因为那地方基础设施完备，占了就能用。中国就算占了，找到资源并开发出来也要一代人之后，说啥都晚了。所以就算鬼子知道大庆油田，也不会真的往那边修铁路专线，也不会钻研深井技术，还是得左手打珍珠港，右手去印尼抢油田。

1949年的时候，全国称得上有工业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地方就三处，东北、上海、台湾。其中上海是个点，无关大局，其他两个地方算是有一定的工业化交通设施、零散的几处现代企业、相对系统的中级教育体系和普遍化的小学教育（还谈不上普及）。这种地区在农业国内战中就有决定性作用了。共产党抢先去拿了东北，奠定全国胜局，国民党靠海

军拿了台湾，因此内战至今还没终局（海南岛开始也在国民党手里，但对全局影响不值一提）。只是这种资源对内是决定性的，横向一比就不行了。日本本来就是最弱的工业国，投到殖民地的资源还优先济着被视为本土的朝鲜台湾用。东北虽然也摊了一些，但在日本撤退、苏联拆迁、内战争夺之后，剩下的玩意和其他前殖民地比实在寒碜的多，朝鲜战争的时候造不出飞机大炮也就罢了，连胶轮大马车和棉衣都得动员后才呲牙咧嘴的抽出来。东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工业化水平不问可知。

直到1966年的时候，搞了10年工业的中国农业产值还占经济总量的一半，小学教育还没普及，各个工业部门还停留在仿造外国产品，抄袭工业标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上。幸而此时中国的工业不需要摆开了和外国产品竞争。闭关锁国之下，中国的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技术学校里教的工业技术可能不是国际上最一流的东西，但问题在于马上就要到10亿的人口大部分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农业时代。赶快用手里的东西把这近十亿人拉到工业化社会的门槛上才是最要紧的任务。

接下来的10年，中国在苏联援助结束的情况下自力更生，造三线，笨手笨脚地把工业复制了一份到西部；把几千万教育水平稍高的知青赶到农村，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搞乡村科普；同时被赶到县城以下的还有无数电影放映队、宣传队、剧团、乐队、医疗队；上千万的农民被招工、征兵，走出家乡，以平等而不是仰视的角度去见识工业社会。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伟大的山寨时代，原来被少数人垄断，移植于欧美苏联的工业技术、神奇科学、贵族文化、高雅艺术，统统被放到中国这个大染缸里山寨，然后以最通俗乃至粗俗的方式向最底层普及。等到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门类齐全，运行顺畅的工业体系，有了完全国产的卫星、导弹、原子弹、核武器和反导武器，有了成昆铁路和超高压输电网。几乎每个县都建起了自己的小水泥、小化工、小五金、小纺织厂，这些厂子如果放开了和欧美的跨国集团竞争，估计是一触即溃，但在封闭的环境下，这些红砖厂房+中专技术员的破烂企业却使中国的县城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变成工业城市，变成生产性城市而不仅仅是附近农村的一个行政中心，千千万万人开始购买本国工业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国有了一个普及性的中小学教育网络。县级师范训练的年轻人在夯土的操场上教学生打篮球，夜校老师在没有电灯的教室里讲电路原理；民办教师在农忙的打谷场上带着学生仰望人造卫星缓缓飞过，下放的工程师在学工的火柴厂里给农村学生讲元素周期表，头脑灵通的农民跟着县科技站的实习生放引雷增氮火箭弹，打防雹高射炮………..

这就是我父亲那一代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的青年时代，是他们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牢骚满腹的年代。因为教育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工业社会，现实却告诉他们，不能上了学，往大城市里或者工业国一跑了之，必须继续在这个贫困的农业社会里流汗，才可能享用那个未来。在大部分国家，教育和工业训练如果超前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毛泽东和他的党勉强压制住了这种动荡，坚持在穷困的社会里继续训练最庞大的农业人口。于是中国有了以亿计算，受过基本工业纪律和技术训练的劳动力，有了一个中高端完整的工业结构，但人均消费品生产则未必比海地这种国家强多少。至于训练了人口之后怎么办？是把人口拉出去打工还是靠自己这点小资本慢慢滚？说实话，当时的中国还没想好。但无论如何，凭直觉判断，这是一条比海地乃至拉美更有前途的路。

这就是1978年的中国，是那个周恩来宣布要用一代人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从建国算起只建设了29年，从一五计划算起是23年，从志愿军回国，彻底进入和平时期算起

只有20年。80后的宅男回忆一下从记事到看这篇文章的时间，就能对毛泽东时代的和平建设期长度有一个直观感受。

1980年之后的事，对老马来说算是亲身经历了。现在回想80年代，和本文有关的事情大概有这几样。

首先能想起来的就是80年代的自由主义忽悠阶段。那时候听美国之音理论上是敌台，实际上是风尚。一个政治笑话或是一个政治传言头天晚上在美国之音里出现，第二天晚饭后就能在街头乘凉的人群里流传。我当时还是这乘凉的人群中打闹的小孩子，但也模糊记得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教师、青工）在谈到工作、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时，往往要加一句"这事要搁在国外…………"。快到89年时，《丑陋的中国人》，《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这一类东西影响极大，封面上那几个恶心的扭曲人形我至今都认为是平面设计的典范。那时候电视少，成人看《河殇》，孩子也没选择不看。现在20多年过去了，内容几乎全忘，只有重看结束词才能回忆一二，唯有危机时低沉的语音，描写中国文明时昏黄的色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最后画面一转，黄色文明转成天蓝色的西方先进文明，高楼大厦，蓝天白云，林荫大道，立刻让人有扑过去洗个澡，彻底冲掉身上黄色尘土和肤色的想法。现代传销手段+只有一个台的 cctv。这个宣传效果真是没治了。河殇播出之后，有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登载的解说词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最受欢迎的传阅品，因此不少单位的人民日报第五版都没了。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将来最好的前途莫过于重点中学、大学……….乃至留学。这个"留"学一度也被我理解成一个学历级别。总之外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资本主义就是好，偶尔有几个非洲拉美的援外人员说起国外的实情，让我这样的听众感觉非常的矛盾——还有这样的外国？

尽管中国不如外国好。但生活还是在改善，在城市里，企业开始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财务单位，能不能攒钱搞技术升级不一定，但肯定能够拿出钱来给职工盖房子。成排的5层楼房取代了原来由成排平房构成的工村，单位里的人开始为了奖金和彩电票而打架，领导们也把朝鲜战争缴获的美国吉普换成了国产新车。在农村，分田到户没啥意思，但是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是实实在在的，电泵和农电也相对便宜了，保证了分田之后的灌溉问题。农村老家的主作物是玉米高粱，现在老乡们每年吃细粮的时间从用天计算改成了用月计算。粮票从硬通货变成了换鸡蛋的零花钱。70年代末期的时候，公社已经有了剩余劳动力，中间头脑灵光，读过中学的那一部分被公社抽到供销社、社办企业见习，现在他们拥向南方打工，赚到了几十块钱的月工资，回家拉上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赚钱（中学入学人数直到80年代中期才在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止跌回升）。在他们去打工的地方，70年代的县办企业被个人承包，社办企业被个人以租代买的经营。在下放工程师设计的生产线上，廉价的轻工业品和小机械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比如孩子们过年时得到的化纤新衣服，比如修鞋师傅那全国一律的补鞋机，乃至爆米花小贩的制式膨化机。上一代人攒出来的山寨工业社会终于为十亿人转化出农业社会不可能提供的财富与奢侈品。只是城乡差距依然巨大，由于待业青年和回城知青的存在，农民被国企招工基本上只在需要拆迁征地的时候发生了。在城市里，尽管行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收入也增加了，但比起手头活泛的企业干部，看看生活水平和自己差距越来越小的普通工人农民，这批人反而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期待进一步的变革。所谓端碗吃肉，放碗骂娘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反正有个虚幻的国外天堂在那里比着，怎么可能不吃肉骂娘呢？

骂娘最狠的是企业和机关里新来的大学生，如果他们没有赶上被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这一拨机会，那骂的还要花样翻新。我就听人背后议论某几个新来的大学生喝酒时放狂言“用不了几年，这个企业就是咱们管了”。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那场超级狂欢中达到了高潮，然后悲剧。

89年之前，其实那几个大学生的闹腾也就在86年上了次台面。对普通人和我这样的孩子来说，88年大涨价才是80年代末最深刻的记忆。冰棍从5分到了一毛，今天拿到的彩电指标，当天没从银行取到钱，第二天就要再找亲戚借上50块才能提货。在这种气氛下，原本存上几百块钱觉得足以老来花用的退休工人赶快去提前支取定期存单，原本就是月光族的青工更有理由潇洒消费。商店里挤满了购物的人群，人们一面咒骂着传说中倒卖物资致富的太子党，一面把商店里所有的商品，从过时的搪瓷缸到自己家里摆不开的家具一并买走。上海火柴厂在88年2月还积压着6000万盒火柴，每月还要新产出2000万盒，结果到4月份时，库存空空如也。这在一个打火机迅速普及的年代真是奇闻——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钱“毛”（土话 贬值之意）的太快。所以人民拒绝相信人民币的信用。真正的社会危机来了。

这个危机其实还是和年轻人的狂欢有关系。1986年胡耀邦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换马，之后上台的赵紫阳并其实还是沿着他的路往下走。一批指点江山的年轻人在赵紫阳周围继续体会到什么叫如鱼得水、君臣相知。他们以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机关为中心，用自己在80年代学到的西方经济学来给中国经济动手术。进而还要设计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的政治结构。1984年，遵循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主刀医生提出了双轨制，然后包括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在内的太子党们一拥而上倒卖物资。到了88年，官倒带来的资源损失和社会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严重到这些医生只能高喊着“长痛不如短痛！”进行“价格闯关”。据说这是更符合经济学原则的改革，只是普通居民必须站出来为官倒买单，这显然带来了极大的不满。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湮没成本不是成本，边际效益才是效益。换句话说，一个买卖是否要做下去，决策原因不应该取决于之前损失多大或是赚了多少，而是下一步到底是亏是赚。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们已经在中国制造了足够的社会危机，但对聪明人而言。利用这个危机谋取最大利益才是最紧要的事情，解决危机如果没有效益，则不妨放一放。于是，从4月份胡耀邦挂掉开始，大学和知识分子开始骚动，部分工厂也跟着不稳。虽然骚动的人群并不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至少有人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这就足够了。此时旧执政元老虽然未必猜不出骚动的用意（他们自己策动过类似的事情 后面另说），怎奈何执政集团内部就有人煽风点火，所以火越来越旺。

骚动的人群有三种人，1 模糊地相信西方民主自由、市场万岁的小知识分子和学生，2 因为涨价和官倒而不满的普通城市居民 3 直接或间接地从某些新兴官僚或美国大使馆领受任务，煽风点火的骨干。其中1和2在普通教师、青工上有交集；1和3在某些自以为加入新型文化、宗教或学术组织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交集。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大家不难想象他们的心理。第一种人作为运动的标杆，我可以说个小段子来谈谈他们。

北方某城市，大学不多，驻军不少。学生们在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其他城市狂欢节的进度，决定发动一次游行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几个学生领袖在宿舍里谋划不已，你拍桌子我讲道理，好不热闹。但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人议论好久也拿不出个方案。这惹恼了

上铺趁停课睡懒觉的一位仁兄，此人素来对政治无兴趣，但觉得不帮帮这几个废物自己就没法睡觉。于是翻身下床，拿出地图，三下五除二拿出个方案。如何集结，如何整队，如何喊口号显示气势，如何绕几步躲开驻军，如何整肃纪律博得市民同情…………几个民主精英虽然不服，但肚子里没货，只能言听计从。第二天，这位仁兄继续睡觉，游行大获成功。又过了几天，各地都在搞“高自联”。本地自从游行结束后也没啥成型的组织，一时间为了赶潮流，也没法搞普选，讲究程序正义了。于是几个精英一商量，就地把这个老兄推举成了省高自联主席，反正他也整天睡觉，不会出来夺权搅局。等到秋后算账，毕业分配的时候，那老兄才搞清楚当年那一冲动的代价，只能认倒霉了。这就是当时民主精英的典型面貌，既无组织和管理能力，也没有一个包含实施细节的政治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不满和对虚幻的民主自由天堂的向往，最多再加上几分不明确的野心。

真正在运动中起主力作用的还是第二种人，对官倒和涨价不满的群众，简而言之，无产阶级。这次政治风波，深层因素本来是胡耀邦-赵紫阳代表的激进“改革”集团引发的经济问题。只是通过第一和第三种人的中介，运动的风向才转向所谓的“民主自由”，转向怀念胡耀邦，支持赵紫阳以及他身边的人，赵大军以军车搞官倒的事情被轻轻放过了。在事后的宣传中，国外媒体需要渲染这场运动的自由主义色彩，国内低调的自由派媒体需要羞答答的表功，出手镇压的旧集团也自然不希望把事情描绘为底层民众的不满，三方难得的在宣传口径上达成了一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89事件成了一次年轻人策划的可笑闹剧，那些打着毛主席像游行，保护天安门上毛主席像的工人职员队伍被默契的无视了。其实，如果只是几千几万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旧执政集团根本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派数个野战军重装进驻。就算需要动用军队，如果不是公交部门的破坏和怠工，向广场的推进完全可以好好利用发达的地铁和人防系统，而不需要在地面上推开一个又一个客车街垒，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当然，第三种人包括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躲在人群中主动向军警发动攻击乃至开枪，他们是不怕流血的，尤其不怕流人民的血。因为事情闹得越大，对他们越有利。但军队保持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对平民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在确实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也没有把北京变成另一个光州。如果像各方宣传的那样，他们只需要对付那些一小撮松散的知识分子联盟，即使有几个恐怖分子也不会导致开枪流血，杀伤无辜。

对于执政旧集团来说，他们并不是因为道德上的特殊原因才出手制止这场骚动的。事实上，十多年前的北京，他们已经借着周恩来去世做过类似的事情。1976年，返城后暂时赋闲的高干子弟们充当了通讯兵，他们往来串联，在各个单位进行地下动员，把普通城市居民对稳定增长的期盼巧妙地引导到邓小平复出上——正是他当年主持了反右和大跃进，并在自己离开权力中心时授意中层官僚怠工，造成经济停滞。这些事实随着当年参与者得意忘形的表功而逐渐披露。89年的时候，新官僚集团想在老官僚面前玩这一套，着实是嫩了点。

赵紫阳、胡耀邦以及他们代表的新官僚集团和邓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在立场上并无实际矛盾。从21世纪回望，赵紫阳计划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均被后继的几任总理更激进的继承；赵紫阳去广场作秀时的拥趸在反戈一击后也坐上了他的位置，在作秀表演上更上一层楼，成功地完成了从官僚到政客的转变，赵紫阳如果真的把他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作风当做理想（而不是工具），那他大可含笑九泉。事实上，两派均对新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没有深刻认识，都被西方经济学的休克陷阱忽悠过。只是新派急于利用激进改革来树立旗号，博取政治资源，吃相难看，这才引发老官僚出手干预，稳定局面。俄罗斯的叶利钦

也是声讨旧特权集团上台，赢了之后立刻营造自己的新特权集团。两者区别只在于胜败不同。

那么，为啥俄罗斯的旧官僚输了，中国的旧官僚赢了呢？难道俄罗斯的坦克还不如中国的老59？大的历史转折点不能从个人特性上做文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结构上寻找答案。

中国直到21世纪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没办法，底子太差，农业人口太庞大，1949年的时候貌似有11%的城市化比例。但那时的城市其实就是附近农村地区的一个中心而已，除了基本行政管理外，不做任何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事情，几乎不生产大众工业品给农村，倒是每年消费不少资源和生命（因为卫生条件差，城市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除了二三百万人之外，几千万城市居民都不是现代工业人口。到了1978年，城市化比率勉勉强强地增加到了20%。然而这20%实打实的都是现代工业人口，是从1%不到的比例硬生生增出来的现代工业人口，（多余的都派下乡，改造农村去了）。这些人口拥有极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复制能力，享有基本的福利和相当程度的教育、卫生服务。如果中国学习拉美印度那种城市化方式，可以立刻让城市人口扩张3倍，但也只能像印度拉美那样，让这些新增人口拥入毫无基础设施的贫民窟，让其中一半失业，另一半从事低价值的三产糊口。我们作为只需动嘴的后人，当然可以左手批判城乡二元体制是封建制度，右手批判知青下乡是历史倒退，也可以昨天批判工资标准20年不变，今天批判工农剪刀差。但对于当时的决策者来说，在工业资源极端紧缺的中国，一边用二元体制吸引相对优秀的人力从事最要紧的工业社会建设，一边尽量扩大工业化生活覆盖的人群，同时还要尽量降低工业化人群超出平均水平的消耗，积攒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积累，这是一个必然的策略。

甭管怎么解释吧，到1989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还是农民。在一个准工业国（1976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72%），工业人口的政治态度要比松散的农民重要的多。这些工人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有保障的阶层，享受着超出国民平均水平的工业化生活，这和1976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意味着这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工业国中产阶级的特性——保守，求稳定。激进的改革，即便在理论上有大大加快整个国家发展速度的可能，但如果激进的改革或革命会破坏眼前这种二元体制，哪怕仅仅是有可能采取更平均主义的工业发展策略，都可能导致工人阶级趋向于支持旧秩序。

依靠这个“民意”基础、旧部在政府内部的配合，以及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串联，1976年邓小平就曾经在城市中汲取过政治资源。只是当时毛泽东还在，在城市民众中拥有更高的威望和动员能力，骨干分子没有发动起89年那样的运动规模。结果毛泽东老练地派只携带木棍的一万多民兵去驱散这次政治闹剧，未尝流血即取得完胜。邓小平和他的同盟很遗憾地没有看到真正的流血和事态扩大，只能在得到一定的政治成果后暂时蛰伏，等待毛泽东去世再说。这一事件也促使工人阶级更加趋向于保守和短视。

到了1989年，历史重演，城乡二元体制依然使大部分工人乐于保持现状。只是邓发现自己的位置正好和当年反了过来。当年工人中的一部分很容易就被忽悠到广场去反对文革派的“折腾”，抱怨自己的子女被送到农村。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对官倒表示愤慨，对涨价表示恐慌，但如果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宁愿选择看起来似乎“不折腾”的官僚。此外，当年表示反对折腾需要上街，现在表示反对折腾只需要留在家里。因此情况还没有失控。对于平民的这个选择，我虽然当时不在北京，也深有体会。我生活的矿区是中

央企业，常有人要去北京出差，在1989年春天去北京的人，回来都表示："可回来了，北京太乱了，你们要出差也快去快回"，"军队和便衣真多，不能造次"。虽然这些人平时在晚饭后的聚会中也对社会表示了严重不满，但这依然不足以让他们跟着那个虚无缥缈的民主自由旗帜走。在许多城市，学生占据了广场道路，不许公交车通过，工人们就步行几个小时继续上班。既没有兴趣参与，也不打算参加工人纠察队去镇压。尽管在货币贬值之下，上街的人远多于76年，但经验老道，经历过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老官僚们依然很快得出结论：局势依然可控，可以在少量流血后恢复秩序。于是，想政治投机的军官被替换，部队坚决地攻击前进。在接近广场的地方，急于完成任务的军队还进行了小规模的集体开火，之后受到攻击的人群和民主精英一哄而散，89年的狂欢结束了。

城乡二元体制误打误撞地帮助了当局。所以，在中央电视台热播《河殇》的中国，尽管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本国的自信。中国还是没有像苏联那样，先解体，然后拆散自己的工业体系卖旧货。在1989年这个转折点，旧官僚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趋于保守，有了坐下来想想的时间，没有一味地往自由主义的套里面跳。当年冬天，天安门还没恢复正常开放，东欧即出现剧烈动荡，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的倒台，在无数的谣言中，齐奥塞斯库被私刑枪毙。一大批东欧前共产党官员反戈一击，加入自由阵线，然后在几年后排挤掉动荡时期的风云人物，重新上台。这个榜样实在太有说服力，一部分夏天时还有投机心理的旧官僚们现在都暗暗庆幸自己半年前下了狠心，回头给那些心急的新官僚又加了几条罪状。

1991年，苏联倒台了。中国没有在天安门的狂欢中转型，没有顺手拆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因此苏联人和接手俄罗斯的得势官僚不知道一个大国拆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是啥下场，心甘情愿地走进了前面说的休克陷阱。这下子，倒轮到中国看热闹，吸取经验，顺便到苏联低价收购宝贝了。

苏联解体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中国不再需要和一个充满敌意的超级大国当邻国，在节约大批军事资源的同时，还可以用白菜价买一大堆高级技术兵器。事实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人不等人家送你渔网，直接就上手挖了几百个高级人才过来，好多研究所的分支机构被中国连窝端了（当然美国端的更多）。中国因此节约了一大笔防备苏联的军事资源。90年代中期那阵子，一度老式作训服和老式电子元件满大街都是，也是以稀烂贱的价格往外卖，以至于有了个"民工迷彩"的说法。那就是头几年，更穷困的中国辛苦积攒的对苏作战物资的九牛一毛。在这种情况下，大裁军，军队经商，驱逐舰拿来走私都暂时行得通。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保持社会繁荣的资源。同时期美国不再给中国提供军事技术支持，因为不再需要中国去拖住小半个苏联，但这部分援助本来就没多少。倒是美国重新重视扶植东南亚和台湾的举动更提高了中国对自由主义陷阱的警惕，放慢了开放的步伐。

89之后，邓继续保持自己幕后元老的位置，由在89年表现良好的江出面组织政府。然而官僚们依然没有搞清楚一个二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行，如何兴旺。江泽民犹犹豫豫地想当个裱糊匠，一方面已经实行的改革方案一律留下，未曾实行的则暂放一边。另一方面，重新向毛泽东时代寻求道统和法统支持。像《大决战》这一系列的主旋律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的官方文化代表。当然，作品要有时代特色，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被电影赤裸裸的提高了；曾和他一起挨批，本质上区别不大的林彪也借机恢复了历史地位。1993年初，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按早就定好的计划搞的热火朝天，但这个短暂的回潮

很快就要结束了——在头一年冬天，邓小平以幕后元老的身份巡游全国，宣布改革要继续深化。

改革没有办法不深化，因为正如邓自己形容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本身是被一个虚幻的西方天堂激发的盲目行为。每一步都在试图纠正前面的问题，或者说取决于上一步的疯狂程度。这倒也没啥，你不能要求统治集团全知全能，未卜先知，但问题在于，统治集团的自身利益也在这一过程中深深地卷入了决策。1992年对于执政集团自身来说，也是一个发展拐点。在此前的十几年中，除了少数高干子弟外，大部分政府官员只能在缓慢提升的工资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对于体制外私营企业主丰厚的利润，相对于国企滥发的奖金和福利，同为社会精英的政府官员竟成了相对的经济利益下降阶层，干部们抱怨不已，非常不满这个让自己在分配体制中边缘化的阶层。

干部的怨气既因为苏联式的官僚体系被相对削弱，也因为干部队伍丧失了精神支柱。80年代以来，唯一不变的思路只有一条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等于啥也没说。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又彻底消灭了基层组织自行构建精神支柱的可能。这个党曾在执政后二十多年依然以革命党自命。革命党和执政集团的最大区别在于有一个改造社会的目标，这是革命党的合法性和道德优越感所在，也是一切行动的最终动力来源。现在这个党既不能从中央也不能从基层获得明确目标，只能变成一个以维稳自命的统治集团。 80年代自由主义风潮尽管事后看来浅薄可笑，但当时好歹也提供了模糊的一点理想主义，粉饰了80年代的黄金时代。这点理想主义色彩也在89年的骚动后从党内部消逝，于是革命党只能转变为执政集团，把维持稳定和少量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到了90年代初，这个转变彻底结束。92南巡一方面宣布要继续改革，另一方面继续否定六四，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主义道路。很显然，一个虚无缥缈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特色的）天堂没法当做具体的目标。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但还必须沿着这条路往前走。邓小平亲口封了这种糊涂路线100年不动摇，还用南巡讲话这种方式高调表示。干部们迷茫之余发现这意味着他们自由了。领导们从革命党的遗产上继承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和庞大的财富控制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毫无对手，同时行动又不必被一个明确的目标所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谋福利。80年代缩手缩脚的干部们现在有的在干休所里后悔，剩下的一齐撕下遮羞布搂钱，为自己过去十年的“利益受损”寻求补偿。在我的直观感受中，80年代和90年代的干部最大的区别对以权谋私的道德评判太多。在二人以上参加的私人聚会中，80年代的干部尽管也会谈论别人以权谋私，但很少会承认自己在类似的位置上也会有同样的选择。90年代的干部尽管不会愚蠢到谈论自己以权谋私的细节，但绝对不会羞于承认自己有类似的动机。共产党干部身份在8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负担，在90年代，就是饭碗，而且是金饭碗。虽然对干部们的硬性制约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同样的事情，知耻和不知耻，知羞和不知羞还是不一样的。

说到89年的时候已经说了，在二元化中国社会中，最要命的问题还是在工业。江试图当一个裱糊匠，混得一时再说，但问题在于此前改革带来的问题还在那里堆着呢。

比如说，国有企业不再受全盘管制，上面收走了国企技术改造甚至资产折旧的资金，又把这部分资金拿去维系繁荣，补贴新兴的私企和外企，还放任国企给自己的员工超越经济水平的福利，给自己的领导超额报酬。这样的企业自然在一时繁荣后难以为继，竞争不过实际税率低得多，还可以用几百块工资就挖走国企高级人才的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开

始只是国企的一部分业务被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外包，慢慢地就是整个国企在走向亏损。国企亏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装备制造业的市场被外国人抢走。购买先进设备，提高眼前的效率，用折旧资金来粉饰利润，成了一个个企业，一个个地方争夺短期竞争优势的行为，而不是整个国家全盘考虑，尽量少购买，多消化的理智行为。结果就是机械工业等上游工业逐步被放血。还有一些试验型企业、研究所，本身就是国家花钱锻炼工业队伍，培养长期竞争力的地方，本身不具备作为独立企业的盈利能力，如今更是悲剧。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比不过军工领域的全面下马、队伍解散厉害，运十的故事不过是其中不太重要的一个结果而已。

随着国企技术设备的磨损和人才的消耗、流失。国企再也无法在高税率下持续为财政提供支持。这些生产上的欠账逐步摆上台面，最终体现为三角债，银行坏账等问题。政治新星朱镕基亲自坐镇东北，徒劳无功地清理了几个月三角债之后。决心快刀斩乱麻，彻底把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引入80年代未曾大改的国企。同时加大对民企、外资的支持力度，试图堤内损失堤外补，靠这些更“市场化”，更“符合现代经济需要”的企业来支撑中国的未来。一场和苏联休克疗法类似的经济大屠杀就此开幕，只是时间拖的更长。但时间长有长的好处，时间长了，就有反思的机会，砍自己的基础就不会砍的斩钉截铁。何况美国还一如既往地制造台湾大选危机、银河号事件、大使馆被炸事件来逼迫中国统治集团反思，逼迫中国统治集团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的军队，收拾自己的军事工业，进而收拾整个工业经济和社会。饶是如此，90年代国企和内地（尤其是东北）城市的危机回顾起来还是相当骇人。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下岗！”。

下岗的意思不是说失业那么简单。毫无疑问，为了吸引相对优秀的人力进入工业部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工业体系给予了工人们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待遇，而且这一待遇在80年代得到了明显提高。但待遇不等于现金收入，工人的报酬主要体现在良好的福利待遇上，如公费医疗、退休金、福利分房、副食品分配、低价粮食、免费教育等方面，以现金体现的工资收入在整个工人家庭的实际物质消费中只占一小部分。一旦企业破产，或工人下岗，这些待遇和工资一并消失。这意味着下岗工人很难靠积攒下来的工资应付这种局面。在90年代中期，下岗操作非常野蛮，许多工人拿了每年工龄100元或更少的补偿后，直接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退休金。这使他们一下子沦为赤贫阶层。同时，社会上再次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93年），越来越多的服务转为市场化，（教育 医疗 住房），价格一路攀升。城市生活越来越艰难。等到这种变化带来的不满使政府官员倾向于谋求。

无产阶级如果缺乏组织，那么永远只能对社会做消极的抵制，做出本能的无意识反应。苏联式的革命，往往在革命后80年代以来，一盘散沙他们可以很明确表达自己对政策的不满。但基本上不可能提出明确考虑到数千万人口的基数，这种反应可能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实际即便80年代城市工人得到了超出以前的报酬，依然无法改变国企一向低工资高福利的现实。

98年左右，京津一带的繁荣地区流行一句话“东北虎，唐山狼”。说的是这两种口音的人惹不得。为啥惹不得？因为这种人拉帮结伙，而且动起手来无所顾忌。这说的就是老工业城市的下岗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失业人口中年轻力壮的那一部分纷纷去繁荣地区求生。能打工则打工，不能打工则走进黑社会。不管是干什么，他们因为工业训练而有纪律，因为既然国企不行，就从另一边收钱大力鼓励恶性循环.没有人不犯错误，不犯错误一心发展的国家可能2代人就翻身平世界, 或者说错误正确大部分不是有意选的。

掌握细节的人总会赢——2011年新年随笔

一九八一年生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每当有人问我年龄，我都含含糊糊的回答“奔三啦!”。奔三者，不到三十也。于是别人多半以为这是个二十五六，二十七八的小伙子，觉得尚算年轻。当然了，装嫩是装嫩，但我也没说谎，毕竟按周岁算，我才二十九么。即使是男人，潜意识里也总是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

装嫩是个早晚会输掉的游戏，从昨天起，从几十个小时之前起，我就是坐三望四，略有资格倚老卖老的中年人了。于是立刻披挂上岗，对着年轻人摇头：“有点年轻啊……不过年轻真好”。

这句话的的由头是一个知名的左翼青年来访，谈到这几天参与唱红歌、纪念毛主席、反对美帝和自由派奸党，召集一群左派青年声讨资产阶级文化，说的慷慨激昂，意犹未尽，邀我同去。

我平静地表示：“偶尔为之无可无不可，拿这个当营生，就太幼稚了”

左翼青年的热情被泼了冷水，立刻翻脸：“你以为你有多高明？人家不拿工资志愿作这个事，你不支持还说风凉话？”

我赶快道歉：“真不好意思，其实俺也没那么狂，不会过了一个晚上就以为俺有多么沧桑，俺怎么敢笑你们——俺笑的是10年前的自己啊”

没错，我10年前也这样，或者说，我们10年前都这样。

这里说的“我们”，说的是2000年前后的左翼青年。那时的左派青年，基本上是20出头，在世纪之交前后来到大城市读书工作，逐渐通过网络这个载体聚集在一起，谈论政治。那年头网络刚刚开始冒头，资料不像现在这么多，大家还不是被网上的汹涌民情培养出政治情绪的，大家的政治情绪来自自己的少年回忆，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90年代。

和80年代的繁荣相比，90年代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可不是个好年头，剧烈的通胀、通缩，开始逐渐泛滥的毒品、妓女、黑社会。工人、教师甚至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十几个省都各有上百万的的工人下岗，全国几千万城市居民因为医保断顿而跟着李大师练功治病。省会城市的过街地道里，失业工人拿着螺丝刀抢劫，一次只抢5块钱。大家读小学的时候只交学杂费，读中学的时候发现重点学校有一半人要出上千块钱，读大学的时候要每年交几千块的学费。回到老家，县城的街道上看到自己的女同学在卖淫，男同学在给负责拆迁的黑社会当打手，县政府旁边的饭店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批判社会的情绪是不用人教的。

农村也不见得更好，农资年年涨，水利逐渐废弃，卫生所甚至卫生院纷纷撤回县城。地方税收被大部分拿走，只好在提留统筹上动脑筋。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一亩打五六百斤麦子，提留统筹要收走200多斤。眼看剩下的不够吃喝，不够子女上学。好多地方的乡政府因此被烧了一遍又一遍。

甚至国家也是一路认怂。轮船会被人在海上截住，台湾的空军居然比大陆还强，李登辉靠着美国洋洋得意，毫不在意解放军拼了老命的军演。到了最后，连大使馆都会被人轰了。这种事情把民族主义情绪也挑动的总想出头。和80年代末大家心向自由主义不同，大

家都看到了苏联解体的惨状，都看到了价格闯关的结果，看到了朱镕基这个经济改革先锋的成就。虽然学生们批判社会，但宁可从左边批判，也要对自由主义敬而远之。这就是当时小资和学生们左倾的社会基础。2000年开始巡演的《切•格瓦拉》，不过是对这种情绪略加提升罢了。

我们是批判的一代，所以只要不满政府且不是自由派的人，都可以结合。文革造反派民族主义、下台老干部、新农村建设派、托派…………在政府无力安抚的情况下，大家站到了一起。基本活动如下：纪念毛主席，茶话会，读书小组，革命文艺，听老干部说套话，浅尝辄止的社会调查，去南街村学社会主义等等。一旦大家聚集起来，发言基本是抱怨政府，抱怨社会，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之类。那时没人唱红歌，但聚到一起 K 下歌还是有的。不管怎么说，这让学生们知道，成年人的生活不止是赚钱养家，嫖妓赌博，还有政治，还有一点超脱于世俗社会，试图改变这个社会的精神力量。这些活动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到了05年左右，虽然民族产业已经开始从谷底爬起，但后知后觉的社会力量又开始加了一项话题——保护核心产业，提升民族产业结构。之后，除了反转基因、反宪章这种小修改，新增的话题不多。

10年后的今天，左翼青年兴致勃勃来给我的讲的革命生活，基本流程还是如此。好多话不等他说完，我就能说，XX 也在 XX 活动吧，YY 又第一个发言吧，ZZ 年纪大了，还那么冲动么？ 这次散会有没有聚一下？谁结帐？是不是某某？得到的答案基本上不出我所料。10年过去了，基本上，左翼圈里的成年人还是那些。某些中年人变成了老人，某些老人不能来了。 但是，当年座上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变成30多岁的中年人，还是有不少20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继续一脸崇拜地听演讲，一脸激动地唱红歌。

年龄断层的原因很简单，到门槛了。几十年前有句话说的好。30岁之前不当左派没良心30岁之后当左派没脑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多岁的时候，刚看到社会的黑暗面，觉得很恐怖，本着基本的良心决定改造社会。到了30岁，社会阅历深了，觉得单纯的反对没用，必须有可执行的替代方案才行，但很明显，大部分左翼运动没有提供这种东西。所以，等到听抱怨听到厌烦，听口号听到羞愧，等到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加班赚钱，送孩子读幼儿园了，自然也就会慢慢淡出左派圈子。这样的人往往还会在 bbs 上对左翼思潮表示支持，但行动也仅限于此。换了几次手机号，搬了几次家，往往原来的左翼小组也自然就解散了。只有2000年前后已经四五十岁的人，这10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看不惯，越来越有空闲，才一直保持在这个运动里。总的来说，这个活动圈子和苏联久加诺夫的支持者一样，年轻人一轮又一轮的加入，不断有20岁左右的新人，也不断有30岁左右的人淡出，比例比较稳定。唯有老年人是坚定的参与者，但总数不断下降。

我这么说，估计好多左翼青年很不忿，也有不少我当年的朋友很不忿。他们会说，你马前卒瞎扯，谁说毛派没有提出可行方案？谁说共产主义者我们没想法？难道文革经验不是方案？巴黎公社经验不是经验？马列主义不是指导？对于这种批判，我得先说一句，眼下唱红歌的20多岁年轻人中，大部分人没有真的读过马列，大部分人停留在毛选+共产党宣言+乌有之乡的宣传文章层次。我这话不是乱说，最起码我知道七八个网上知名的左 派 id 没读过资本论，当然了，一般的回答是“还没来得及”。我很感谢他们的坦率回答，但我也必须得说，每天在网上号召别人革命的人，最好还是要有点思想基础才行的。

现在的左翼运动，和10年前没有本质的变化，一个庞杂的运动，大部分人是因为反对社会的阴暗面加入，少数人为了政治投机而参与，还有一些人需要寻找政治归属感，需要听众，所以一直不离开。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比如说因为大学扩招，年轻人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没有增加到质变的地步。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民族主义色彩上升，2000年前后的左翼，虽然也和民族主义掺杂在一起，但至少很清楚阶级斗争是自己的思想基础，把社会革命放在中国崛起这个目标的前面。所以杨帆、左大培这样的民族主义经济吹鼓手屡屡声明“我不是左派！”。唯恐别人说他们要搞社会革命。现在呢？倒是要讲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者不断声明，“我不是左派”，因为左派意味着为中国的帝国之路欢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个“左派”圈子是越来越右了，甚至要比自由派靠右的多。

另一种对我以上厥词不忿的人，应该是一批同样对这个左派圈子有不满的同志。他们很不满大批左派连马列原著都没读过的现状，很不满民族主义成为“左派”精神支柱的现状。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转而读经救国，只是这次读经，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马恩列斯毛全集。既然有他们在，我如何能说没有人去给出一个可操作方案呢？

毫无疑问，我很支持读马列，很支持年轻人读这些大部头。虽然我不赞成反复读，皓首穷经，但如果你试图戴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对着大一新生喷吐沫大谈革命精神，总要去读读这些曾经指导千百万人翻天覆地的东西。光翻翻摘要，读别人的介绍文字，或许也可以，但总归少了一个和马克思的直接交流。我只是说，万万不可以为靠读经能读出个未来，靠读马列能够对整个社会应付裕如。如果你已经是真正的成年人，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实际负责过具体的项目，就应该知道，原则性指导和具体的项目操作到底有多远。马列原著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但那不是现代革命者的操作手册。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牛顿力学和牛顿的数学工具是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不是科学）。基本上，除了少数天文、测量、电子行业，基本上大部分工程科目，都是在牛顿时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呢，推导过程暂且不论，微积分和牛三定律，引力定律，液体摩擦定律，折射定律，这些基本上是中学就该学到，最迟到大一就该烂熟的东西。为啥不是人人都能当工程师呢？ 因为世界太复杂，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所谓理论指导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以至于我们必须花费几年的时间去学专业课，把这些在特定情况下推演出来的公式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现在，马列原著就算是牛顿力学在工程中的地位，也不能指望大家能端着本原著去改造世界。

当然了，不管咋说，读经救国还是高于左派大杂烩。因为大部分“左翼青年”甚至不去考虑什么基本原则，根本是从“常识”出发讨论问题。我刚刚就听到过一句总结陈述：“我当左派，是因为我想当个好人”。

“当个好人” 啥是好人？ 怎么算“好？”这话问的貌似很愚蠢。啥是好人你都不知道，雷锋是好人，焦裕禄是好人，你这都看不出来，你有常识没？我承认大部分人按照常识来分辨谁是好人，不过，啥是常识呢？常识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动物，在日常的生活圈子里建立的本能判断。比如说，不吃饭会饿，不喝水会渴，助人为乐的是好人，铁比棉花重……等等。但是，常识不是科学，是建立在日常生活里的经验，一旦超出这个经验范围，是否适用就要重新考量了。比如说，挖一个一尺深的坑很容易，抡起锄头铁锹就行，挖一米深，也不过是多费点力气。但如果你想挖个10米的坑，就不能随便挖了，人多也不

行。因为10米的坑，边坡一般会出问题，必须事先有勘探，施工中有支护，施工完了设置挡土墙，否则连人带工具一起埋到土里，救都没法救。这就是说，常识不能随便放大。又比如，走路人人会走，但几万人一起走路，比如说参加什么大型游园活动，就必须在活动举行前就考虑到人流疏散问题。否则万一前面挤住了，后面的人不知道还往前涌，踩踏死人不是好玩的。常识说铁不会燃烧，木头不耐火，这来自我们平日点灯做饭的小火苗留下的经验。但是，在建筑防火的角度来说，钢铁热容量小，被火苗一扫，没等燃烧就升温失稳了，很容易垮掉。世贸中心就是这么栽的。木头呢，热容量大，而且被点燃了也是逐层剥落，反而比钢铁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大家看纪录片，也经常看到许多燃烧的木梁还坚持在火场上方。这说明，在特定的燃烧规模和温度下，木结构反而比钢铁结构更抗火。在这个问题上，常识一旦放大到一定层面，反而成了谬误。

类似的，社会是几千几万人构成的，不能随便地拿“常识”来套。比如说在三五个人的家庭内部，搞公有制很简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可，遇到需求用冲突的时候，互谅互让，总能过去。但类似的经验推广到整个社会就不行。成千上万人，且不说物资不足的时候能否互谅互让，就算大家有这个想法，也必须有一套制度能做到信息充分交流，否则“谅”和“让”都找不到需要物资的对象。好多左派想着公有制一用就灵，果真如此，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复辟？一个制度连维护自己的机制都产生不了？总而言之，设计社会必须是以科学为基础，然后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细节，一步步来。“当好人”也是如此。不掌握科学，不掌握社会的细节，很容易被掌握这些东西的“专家”“领导”忽悠，直接把事实拧过来你也不知道，还觉得人家说的符合常识。

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批判别人。也该说点建设性的话了。

还是从那句当好人说起。其实呢，我一点不鄙视这句话。这句话是普通人搞共产主义的基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要是你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好人干的事情，又何必加入这个运动？甚至从历史上说，共产主义也是这么产生的。马克思之前就有空想共产主义，就是想当好人，过好日子，用善良去改变世界。这个想法本身没什么错，只是，在一个大工业时代，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没有小社区关起门过好日子的说法，你关门种地，人家可是开着坦克要来打你。更何况工业时代，一个小社区自己玩不成工业化，要想不过穷日子就得加入这个大体系。所以马克思一定要搞“科学共产主义”，核心就是不指望好人的美好愿望来构造理想社会，而是用阶级斗争来促进社会进步。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者抛弃“常识”，捡起科学的过程。我们要科学地“当好人”。

“当好人”，三个字 其实可以分解成2部分。1“当” 2 “好人”。 先定义后者，才能去执行前者。

啥是好人？这个问法听起来太土了，我们换个时髦说法，啥是普世价值？左派听到普世价值这几个字一定很警惕，这不是自由主义玩的东西么？但人家玩的东西，不等于我们不可以玩。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可以用来评判整个世界的价值标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人好不好，不能自己说了算，必须大伙都说好，才是好人。所以说，必须有普世价值，否则你连当好人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没有标准，何来好？现在美国人提普世价值，你可以反对，反对可以从2个方面说，一是说，按你美国的标准，你自己也不普世，二是说，你的标准本来就不好，不完整。这样才能否定人家的普世价值。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说你没有普世价值——你没有价值，谈什么评价？你的价值不普世，凭啥拿来评判美

国人？美国的普世价值虽然是假的，大忽悠，但假的比没得好，你要是说不要普世价值，那人家就算再差，是0.01，也比你0要强无数倍。你把敌人的价值贬的一文不值，也就是个0么，0比0，打平，求个不败。要赢美国的话，只能是我们也去搞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从哪来的？ 有人说，可以从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道德里推出来。说这话的兄弟，我麻烦他给我请一位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先。几年前，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谁是无产阶级，谁是人民”。我当即指着火车站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流说，这就是，你没别的选择。当时广场上有出门的打工族，有票贩子，有小偷，有为了一个塑料瓶子厮打的拾荒者，有警察，有学生……他们的想法千变万化，互相冲突，但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适合新社会的价值观来。人不一定总作道德的事，但作恶的人只要伪善，就已经说明承认了道德。这个价值观有原始社会的生物基础，有农业社会的文化基因，有工业社会的冲击，甚至现在和100年前都有很大去区别。所以，要提出一个好坏的标准非常不容易，要经历庞大的社会调查和辛苦的分析。不是一句简单的当好人就可以解决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的自由发展，但自由必须有边界，有个框框，普世价值就是这个框框。

普世价值的核心，不在于要什么，而在于各种分项价值之间的交换。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类对什么是正面价值异议不是很大，比如说平等、富裕、社会福利、安全。大家都认同这些东西很好，越多越好。问题是，如果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我们怎么权衡各种利益？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打个极端比方，假如有一天人类决定集体出资搞小行星防御工程。那么，该拿出多大的投资呢？每年一万亿？每年十万亿？这涉及到你如何为生命和文明定价的问题。假如你说，文明无价！那么，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即便是每年百万分之一，乘以无限大还是无限大。所以，全部剩余物资都应该拿来搞行星防御系统，为此大伙住窝棚、吃粗粮在所不惜。什么音乐厅、体育场，好莱坞，都成了不必要的东西。这种世界，仔细想想，不如让小行星撞了好。

问题出来哪里？其实呢，文明本身就需要剩余物资和有闲阶级来支撑的，你把所有剩余物资都抽走了，文明本身的价值也会下跌。之所以物资被抽走，是因为你把“文明存在”这个价值定义到了无限大。而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表现。理性的表现是，文明的安全很有价值，可以定很高的价值，但不能是无限大这种没法量化的东西。说“无价”很简单，定一个实在价则很难，这就是科学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不如煽情容易。但不讨人喜欢的科学很有用，你定出这个价格，才能拿去和其他的价值观作比较。

这个问题，说起来貌似有点大而无当。我们可以回到个人角度考虑一个问题。在大街上你随便拦住一个人，问他，你的命卖多少钱？他的反应肯定是你疯了，多少钱也不卖。但实际上呢，命是有价的，可以在社会统计数据里面计算出来。比如说，工作 A 是矿工，工作 B 是库房搬运工，两者劳动强度差不多，工作时间也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依然有差别，比较危险的工作收入要高一些。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为生命危险而付出的价格。两者收入之差别除以死亡率之差，就是普通人在社会中实际选择的生命价格。当然，实际计算起来远没这么简单。因为一个人选择工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也很难找到两个工作环境一样，只是安全程度有差异的工作。但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的职业，用统计数字来压倒随机性，或者把其他的因素也作为参数纳入计算。总归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的问题。又比如，我们说，孩子的未来无价，也说亲情无价。那么当老人需要一大笔钱治病的时候，我们会拿出多少积蓄去寻求好的医疗环境？留下多少积蓄给孩子作

教育投资？这些问题的权衡，在各个家庭不同，但从整个社会来说，都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

之所以要衡量这些数据，要用冷冰冰的数字去衡量温暖的感情，去构成神圣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要用来指导社会投资的。分洪区的建设，就是这个社会在衡量各个地区的生命、财产之间的比率；房屋抗震标准，既不能高到谁也盖不起房子，也不能低到3级地震就垮，必须有个标准来指导。一个人，一家人，可以凭着感觉定这些事情，但一个社会要投资，要改变社会结构，要设计一种新社会，不能说跟着感觉走，必须拿着数据去下决定。革命也好，改造社会也罢，都是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量化，你怎么说服别人你作的对？怎么"作好人？"

这种思考方式，看似冷酷，其实是对价值观最好的描述。只有价值观明确，你才能说你要建设的社会是"好"的。才能论证你那个目标社会，比如说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一味的煽情，一味的说"XX 无价"。啥都无价，咋作评判？咋作决策？。经常看到有人讨论"公平和效率"这种问题，动不动学大专辩论会，引经据典地吵上几十页。我看到这种讨论一般直接跳过。古代有云，三纸无驴，我跳过这种东西，主要是三页看不到一个数据（页码除外，）看不到一个对统计数据的引用，看不到一条曲线。形而上学的东西，咋吵都有道理。但没有一本本的年鉴支撑，没有庞大的社会调查和对社会的深入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另一个搞共产主义的大国，苏联，号称在五年计划和20年长期计划之上，还有一个更长期的伦理——科学可能性规划，用来指导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但很显然，苏联一直没弄好这个东西，否则也不会解体了。美国人搞普世价值，弄的虽然不好，但含糊的地方还有宗教填空，含糊一下。现在共产主义者咋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呢？等着这东西天上掉下来？

有了"好人"的标准，下一个是当好人。咋"当"？这就不是对价值观本身的评判了，而是怎么实践你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公平是按劳分配，这个是价值观了。但怎么实现按劳分配？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比如说，一群科学家一起研究一个课题，在一个人的方向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如何衡量他的成果，如何衡量他的报酬？80年代中国没少吵这类问题。很显然，此人的成功，既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别人配合的因素。在不同技术方向上探索，一个方向出现了突破，没有突破的方向也有价值；就像派出10个侦察兵，1个人发现了敌人，但其他9个没发现敌人，证明那9个方向很安全，也很重要。所以这里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说有成果才有值得拿高报酬。这种问题虽然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作指导，但往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不掌握足够的技术细节，没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别指望临阵磨枪就能分析好。这就是行政官僚所掌握的力量。有经验的行政官僚或许做不到最优分配方案，但他可以在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时间限制下，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能够让整个体系持续运转，这就足够了——反对行政官僚的人，往往拿不出能让体系运转的方案。这些年，有好多工人占据工厂的案例，往往是资本家表示愿意谈判，但要求工人开会，拿出一个谈判方案，包括内部分配方案的。结果……十有八九是工人自己根本拿不出方案，不了了之。要谈革命，谈共产主义，先要保证自己在这种场合下，比资本家更能制定方案，更能达成内部妥协。

还有民主，也同样涉及到复杂的制度和程序问题。因为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是简单的同意或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次投票都是简单的是、否、弃权，那么往往程序就能决定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程序，谁来制定？谁来主持？怎么定义一个程序

比另一个程序更民主？能拿出比较数据么？没有数据如何服人？程序之外，还有个信息交流问题。如何保证所有人都充分交换了意见？三五个人的时候聊天就行，十几亿人的时候呢？电台怎么分配？网站头条归谁？须知美式民主用钱和院外集团来解决这些问题，起码是个规矩，有规矩就比没有好。总比无法达成任何决策，干脆不要民主要好。光坐在电脑前声讨美式民主是不行的，关键是你能拿出啥来替换它。

上面这两个问题仅仅是简单的管理问题，当工业技术问题也掺和进来时，问题还要复杂好几倍。一个技术问题，往往是监督起来比重做还要复杂。因为技术问题千变万化，这就是技术官僚的威力了。技术官僚因此可以很隐蔽地作一套既能运行，又能够给自己带来丰厚收益的制度。试图取代他们的人，发现自己或许能做到换人，但甚至拿不出一套可以勉强运行的管理方式，所以总是失败。现代工业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环节不能运行，就要出问题，就要死人，甚至是大面积死人。不信你让现代城市的水电停上几天，再换一群新手控制应急体系试试。光是下水道里污物不能及时冲走，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没人处理，带来的传染病爆发就可能在几天内就让城市往生化危机的方向发展。

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无数人的合作。没能力协调这些人合作的组织，不要说进行社会改革，维持社会不崩溃都很难。如果光指望自己知道几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去改天换地，如果打算用那个从来没检验过的巴黎公社经验去管理社会，那必然是巨大的混乱。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最坏的政府，莫过于无政府。现在整天谈革命的兄弟们，如果忽然把政府，把社会交到你手里，你有能力让社会继续运行么？有能力在维持运行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造么？反正现在如果交到我手里的话，我自认做不到"又红又专"，宁可把这个机会扔回去。这说明啥？说明我们的共产主义规划很不成熟，我们在叶公好龙。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进入政权就是这个问题，不仅没法控制旧官僚，甚至缺乏监督旧官僚的能力。造反派当一把手，老干部就消极怠工，造反派抓不住把柄，自己又没法直接接手，最后还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承担社会舆论压力。左翼青年们如果打算把这样的事情再重复几遍。可以继续读经救国，可以继续唱红歌，声讨自由主义。可以继续指望高级官僚当自己的同盟。反正指望不上自己便是。

我有个左翼朋友，每次遇到他，要开一个玩笑——让他拿张纸画一张中国地图，要求不高，只要省界清楚就行。每次他都拒绝作这个测试。其实呢，如果说拿电脑游戏打比方的话，改造社会这个即时战略游戏很宏大，但翻来覆去就这一张战略地图。左翼青年们每天在自己设想的 mod 模式翻来覆去的演练，拿着哲学史天天研讨，为啥不能费点心背地图？因为那个层次太低？比不得哲学问题高级？

还是这个拒绝画地图的朋友，前几天谈到经济学中的排队问题。我主张，如果商品暂时的短缺不能解决，在收入差距合理的前提下，排队说明需要涨价，好让最需要商品的人优先得到。这个朋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说我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法。我解释说，涨价在不降低总的效用的同时，起码节约了排队时间。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最在乎这个节约的时间才对。要反驳我，就拿个数学模型出来，最简单的模型也行，先定义一个指标为"效益"，再证明排队可以带来效益。

这位朋友去琢磨模型了，2天了还没给我回话。我估计他现在没准在看地图呢。

除了看地图，在谈革命的同时，需要补充的基础资料还有很多很多。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管理学、经济学……我当然不是在开晋升院士的条件。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把这么多东西精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左派真的有心思搞社会革命，社会改造，建设共产主义，必须在整体上具备这种能力。作为个人，起码要对这些知识有个粗略的了解，然后对至少一门比较擅长，这才算是革命的螺丝钉吧。眼下当不成螺丝钉，总要往螺丝钉的方向发展吧。什么？你说啦啦队比螺丝钉好，还能趁机在同路的妹子身上揩油？那也好，唱红歌，追捧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啦啦队也没啥不好，但千万别装成个螺丝钉，别人要拧你的时候一拧就断，那样大家都难看了。

我是搞工程的。我们这个行当，如果搞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在施工之前有设计，设计之前有技术设计，技术设计之前有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前面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前有预可研和项目建议书。当然，这年头不少大工程也都是糊弄，好多文件都是事后补上来的。但真要是大到三峡工程那种级别的工程，谁也不敢糊弄，每个文件都是用数据和考察堆出来的。共产主义这个工程，比三峡工程大多少？一万倍差不多吧。这样的项目，大家光想着当好人么？那样肯定会悲剧的。我觉得左翼青年谈到共产主义，不说心里有本可行性研究报告，起码要知道项目建议书怎么写，能填些什么数据。然后，花上 10 年工夫，能给这个文件填几个数据，才算没有白顶个“革命”的帽子。

在这里，我随便转一个普通项目建议书的格式要求，有兴趣谈共产主义的朋友，可以想想，如果这个建议书是给自己憧憬的共产主义运动作的，自己可以填上多少？可以有理有据有数据的填上多少？

一、总论

1、项目名称：

2、承办单位概况（新建项目指筹建单位情况，技术改造项目指原企业情况）

3、拟建地点：

4、建设内容与规模：

5、建设年限：

6、概算投资：

7、效益分析：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条件

1、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2、建设条件分析：包括场址建设条件（地质、气候、交通、公用设施、征地拆迁工作、施工等）、其它条件分析（政策、资源、法律法规等）

3、资源条件评价（指资源开发项目）：包括资源可利用量（矿产地质储量、可采储量等）、资源品质情况（矿产品位、物理性能等）、资源赋存条件（矿体结构、埋藏深度、岩体性质等）

三、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

1、建设规模（达产达标后的规模）

2、产品方案（拟开发产品方案）

四、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

（一）技术方案

1、生产方法（包括原料路线）

2、工艺流程

（二）主要设备方案

1、主要设备选型（列出清单表）

2、主要设备来源

（三）工程方案

1、建、构筑物的建筑特征、结构及面积方案（附平面图、规划图）

2、建筑安装工程量及“三材”用量估算

3、主要建、构筑物工程一览表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1、建设投资估算（先总述总投资，后分述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安装费等）

2、流动资金估算

3、投资估算表（总资金估算表、单项工程投资估算表）

（二）资金筹措

1、自筹资金

2、其它来源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销售收入估算（编制销售收入估算表）

2、成本费用估算（编制总成本费用表和分项成本估算表）

3、利润与税收分析

4、投资回收期

5、投资利润率

（二）社会效益

七、结论

说了这么多，左翼同志一定对我很不满，说这个马前卒阴阳怪气的干吗？装高明？是不是要组织个委员会，审查别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论资排辈啊？

各位切莫动气，不是，我只是提一个建议。说一个事实。而且，说一句招人烦的话，我也的确认为共产主义运动需要资格。在朋友圈里当个好人不用什么资格，但要无数人跟着你当好人。这其中就像一个人走路和成千上万人在火灾时疏散的区别。前者干的好，不等于后者干的好。后者干不好，是要拖上世界垫背的。那样不行。

共产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必然要靠学习，不能靠直觉，不能靠本能，这句话听起来政治不正确，不讨人喜欢，但就是事实。承认比不承认好。现在资本主义靠忽悠乌合之众来搞政治，讲"常识"讲"天赋人权"渲染自己的正义性。我们绝不能迎合乌合之众去说："你们的直觉就是对的，尽管跟着感觉往前走吧，越走越有希望！"。那样就完蛋了。

前几年，曾有那么一码事。有个左翼领头人号召大伙搞很仪式化的毛主席纪念活动，比如见面喊毛主席万岁之类，我当面去问为啥搞这个明显有点恶搞性质的运动。得到的答复是："这事儿的确有点争议，但是你要考虑到左翼运动内部水平不一，有些文化水平较低，年纪较大的就好这一口，我们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左翼好谈文革，殊不知，文革最大的遗产之一就是大批孔孟之道，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拿出来翻来覆去的批。难道今天我们还打算用一群聪明人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往前走么？如果是这样，还不如自由主义来的好。

前几天，我把这样一段话给别人发过去，被人大肆抨击。

"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工人指出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大家可以查查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篡改别人的发言不打招呼。我在转载之前，很邪恶地删除了这段话里的几个定语。所以唱红歌的兄弟们以为我在影射什么人，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了，我承认，中国和苏联的经验都证明，人民支持共产党拿到政权，并不一定是因为理解共产主义。事实上，多数人根本不理解共产主义，只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能够消灭一个无论不可能更坏的旧秩序，能够在一片废墟上让这个国家勉强养活自己。这也算历史经验，但是，这种胜利一方面依赖于共产党有效管理社会的能力，一方面依赖于敌人的无比低能。这两个条件，我看今天都正好反过来了。历史经验可不能无视条件，随意引用。

今天已经是2011年了，未来如果有革命，将是第一次在识字率过半的世界出现革命，是在劳动者人人读书的时代革命，是有互联网的时代搞革命。总之人民是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需要一个成型的理想。本来这个世界乌合之众是越来越少，你偏要维持一个忽悠乌合之众的运行方式。结果就是有一天，你喊"搞革命啦！"。人民问你，咋搞？搞啥？拿

出来个像样的方案来看看？你只能回答“跟着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种低级失误，传销骨干也是不屑于此的。

说了这么多坏话，马前卒貌似在诋毁整个中国的左翼运动，摆一副众人独醉我独醒的样子，真是装逼不怕雷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最好等着看看我接下来要写的东西。10年以来，在中国左翼运动充当一个小角色，我尽管没干成什么事情，但肮脏、可笑的事情倒是见识了很多很多，我以后会陆续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毕竟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写之前，我得说说我对这些事的看法：

首先，我这10年还看了很多其他事情，共产主义运动，哪怕把打着这个旗号的都算进来，里面的肮脏事情并不比其他领域更多。其次，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在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崩溃的世界里的现实政治运动，而且是试图向政治领域伸手干涉的运动。政治是啥？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插手，一尘不染可能么？除非死掉的才干净。我们只能说，目标很纯洁，手段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但绝不求干干净净。看到肮脏就逃避，就绝望的，是书生。能从垃圾堆里看到希望的才是能成事的现实主义者。

不求一尘不染是真的，但缺点必须正视。有问题不可怕，讳疾忌医才可怕。没人泼冷水的运动，最终收场必然是狂欢之后的散伙。但是呢，外人批评，好多人说那是恶毒攻击；左翼自己说？好多人怕当恶人，不说话，这样不行的。我今年30岁了，应该比上一个10年多点担当，不在乎当这个恶人。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头。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比读者警醒10倍，时时敲打自己。

关于“玩革命”与革命理想

这几天在网上看了一些帖子，有一篇文章很不错。

http://jds.cass.cn/Article/20060310164228.asp

王奇生 2004 年出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再看看网友评论

：“清共是极其猛烈的，结果事后就是按最保守的数字被杀掉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其实绝大多数是 kmt 的中左分子，中共六大文件多年后公开也基本证明了这个情况”

：“结果 kmt 就变成了一个无基层的政党，实际上损害最大不仅仅是中共本身还有国民党本身”

：“一般以为清党最大的受害者是共党，实际是共党没跨，国民党在事实上跨了，受害的程度不比共产党小”

：“早晨 3 点左右在城外秘密集结军队，然后突然杀入.按西方记者描述:"刽子手疲惫不堪的挥舞着砍钝了的屠刀，砍掉的人头象熟透的梅子一样遍地乱滚，堆满了路边的沟渠."”

：“如果没有清共，GCD 内部那些软弱投降派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议会路线等等就还不会被淘汰，如果自己动手一是做不干净，二是毁了名声，再说陈独秀领导的 GCD 不可能有自清的勇气和魄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清共，GCD 就仍是一个大杂烩集团，而不是在遭到大屠杀后的那个团结、坚定、绝不妥协、充满了殉教精神和现实得残酷的组织。另外，通过清共，GMD 也把自己内部的左派和左派同情者一扫而空，从此只能能够依靠地主买办阶级和军警宪特黑道帮会来维持统治，也就是说再也无法进行社会改革，也把工人农民阶级推向了对立面。所以说，一时之间，GMD 似乎通过残酷的“清共”沉重打击了 GCD，但长远来看，这次行动反而对 GCD 有利而 GMD 却从此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

再看看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蒸蒸日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民党堕落的多快？这个帖子可以让你看看一个有趣的侧面。——《民国军人八卦》

从这些资料来看，玩革命的心态要不得。我说说我的看法。

从 21 年起，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分部的身份介入中国政治。共产国际虽然比不得殖民政府财大气粗，但毕竟背后有苏联这么一个工业大国撑腰，每年随便拿点钱，在半殖民地养个千八百的职业革命者还是很容易。当时包括毛主席在内，如果直属中央机关的话，一个月大约有那么 15 块大洋拿，顺利时还有 20 块大洋。这个收入，想发财不容易，但过个平民日子确实不难。我们今天如有人每月每人保证发 3000 块，恐怕大家都愿意扔了工作专心革命吧，毕竟革命比工作好玩多了。同样，广州国民政府也是靠了苏联援助起家的。没有苏联的现金和商船运来的军火，偷偷跑过来的浇灌，黄埔军团也就是个民兵组

织。靠上苏联的大树，其他几个暂时没有工业国家倾力支持的军阀简直不堪一击。黄埔军校其实也就是个士官学校，和北洋军事体系的完善军校体制根本不能比。最初几期中，有的只上了半年学。放在当年，我们这样的人物，检查一下身体，有个介绍人就能进去，除了 1 个月新兵训练外，最多用几个月学学看地图、基本战术动作和小分队指挥，然后就要出去打遍中国。结果，军阀是如此脆弱，27 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不可抵挡的占据中国精华地区了。

这么一批人轻松拿了天下，里面自然鱼龙混杂。当然，北伐有许多牺牲，但当时的中国，其实你什么都不干，危险也不会小。我的意思是说北伐打到武汉上海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兴起过程比后来的革命要容易的多，甚至比许多军阀崛起的过程都容易的多。这是一个小资的黄金时代。

在一个社会里，最高层和最底层都是身不由己的活着。底层要谋生，只能把一切精力放在工作养家上，不逼急了不造反。但造反的时候，失去的绝对只是锁链。最高层么，进了那个圈子，是想退就能退的吗？最近几个高官的下场就是榜样。所以相对自由度大一些的反而是中层，这个中层，上到我们在大学混的比较好的导师、小业主，下到我们这种月薪数千但还有空上网写文章的小喽罗，覆盖面很大的。还有一些纯粹的食利阶层，最多半代人就堕落的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了，我们不去考虑他们。中层的特点是不安于现在的生活。因为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脑子和精力能腾出来想想生活以外的生活。不管你叫它理想还是梦想，在我看来其实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27 年以前的共产党基层其实就是这么一票人组成的，国民党也是。共产主义也好，民族复兴也好，或者三民主义也好，反正都是离现在很远的一个理想，莫斯科也不太在意第三世界的革命者是追求民族革命还是共产主义，反正能给帝国主义找麻烦就是好同志，就可以从苏联拿物资去支撑你们的理想。当时也没网络游戏好玩，好多人就这么走上来了。

有理想有组织的军队肯定不是军阀部队可比的，但问题在于军阀以后怎么办。

靠大树的想法人人都有，因为靠大树很舒服啊，无论是拿日圆贷款、美国剩余物资还是苏联军火、现金。反正你是精英，那些庸俗的衣食问题，那些琐碎的基层问题都可以用靠大树来解决。除了毛主席和彭湃，鬼才愿意下乡去从基层解决问题。李立三 47 年到了东北，还不服气，一定要走城市路线，拒绝把机关从哈尔滨搬到乡下，林彪问他从城市里怎么搞补给，怎么搞兵员，他立刻说可以指望苏联红军来帮忙打么...........这种人，真是祸害万年在，早死早干净。

说远了，27 年的时候，北伐军一到，进去就有钱拿（虽然不多），有面子，还没什么大危险。最关键的是可以扔下平日的琐碎生活，把自己的梦想都寄托在三民主义或是共产主义上，换了今天的小资，难道不去吗？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倒是毛主席他们在乡下大搞农民运动，想彻底把中国翻个身，惹的不少北伐军中精英（认真的说，不分国共）大为不满——你干“革命事业”的军饷，在家买了几亩地，被农民分了，或者不交租子了，能不生气吗？好比今天你在上海养了套房子，贷款还了一半，结果你的一些野蛮同志强行宣布为廉租房租给穷人，房租还不够你还贷款，入了革命党的小资能不火吗？

靠大树靠成了习惯，就不在乎靠什么大树。对于那些“玩革命”的家伙来说，反正理想就是很遥远的，英美商团只要出钱，只要让我过上又有面子又轻松，还能让我享受理想的生活，那和共产国际也没什么区别。如果杀农会是革命任务，那他们也会象打军阀一样

去打。于是，蒋校长很容易的就带着这么一票人去杀剩余的革命党，不管你是国民党左派还是共产党。开始还有点人跟上汪主席抵抗，这些人也是小资，但没蒋派那么识时务。结果谈谈打打，觉得对方还是有道理的，于是携手杀共产党。这样搞来搞去，国民党里除了旧军阀势力、外国商团势力，主体就是这么一批“玩革命”的小资，或者说小地主子弟。这些人比起旧势力来说有点理想，有点忠诚，蒋校长一直用他们维系党政军，混到 49 年。这期间旧势力虽然还在，但肯定没法和蒋掰腕子——有理想和没理想是质的差别，比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区别还大。

反过来看共产党呢，当初和国民党成分差不多，多了几个主席和彭湃这样的死脑筋，但也实在没多几个。27 年分共，其实好多人死的也很冤枉呢，本来是和对手差不多的小资，只因为当初随机选择了共而不是国，甚至多说了几句倾向共产党的话，交了个左翼女朋友就死掉了。这种“玩革命”的小资要么被杀，要么立刻投诚，要么就逃到上海，把根扎在租界和秘密机关，拿苏联津贴（虽然比以前少多了，比国民党拿的少多了）过日子。时不时还可以跑出来玩个暗杀，带上红队和军统比比枪法什么的。一时跑不到上海的，还可以走走上层路线，叫上几个军阀搞兵变。至于主席那样的死脑筋，也被杀了一批，而且被杀的比例肯定比小资高，因为他们不投诚。好在死脑筋还剩下几个，跑去乡下，决心从此当一辈子死脑筋。

从此共产党分成两部分——上海的洋党和山上的土共。两者各有各的经济来源，各有各的路。上海洋党总想插手乡下的势力，但路不好走，乡下好玩不多，送命的机会却不少，也就放手让他们搞了，反正自己的根基也不在那边。直到上海站不住了，才跑过去祸害根据地，一路糟蹋到遵义，几个能闹的糟蹋到延安。还好主席运气不坏，把他们给压服气了。

说实在的，那些“玩革命的”，有时候玩的真挺专业，脑袋一热也不怕牺牲。比如顾顺章，带上红队搞暗杀，劫法场的时候也是身先士卒，送密信的时候也能镇定自若。许多人甚至 27 年被抓的时候也够硬气，要杀就杀，没话说。但如果你给他个思考时间，摆摆道理，谈谈人生，讲讲另一条道路的幸福生活，一般他们都会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该投诚就投诚了。或者说，关个一二十年，天天在另一边摆上光明道路，不怕他不投降。这种人的关键在于：他们不是享受革命的目标，只是在享受革命本身。资本主义把这些小资的生活弄的单调无聊，他们就要找条出路。革命成本低的话，革命就能提供这么一条路。他们可以脑袋一热，当水浒好汉，带人冲机枪阵地，但耐不起寂寞，经不起高墙二十年。他们可以在上海街头杀叛徒，反正不是牺牲就是去苏联避难，但绝对不会到农民夜校去搞社会调查。如果你告诉他干了某件事可以名垂青史，他们可以冒险，但如果你说这件事需要你默默无闻的干 20 年，他们恐怕第二天就不见了。

总而言之，某些人玩革命玩的是浪漫和刺激，革命的目标反而没那么重要。前面说了“如果杀农会是革命任务，那他们也会象打军阀一样去打”，他们其实很现实，很识时务，比起老官僚、老军阀来，不过多了点年轻时的轻狂而已。过上 20 年，他们也会成老官僚、老军阀。有句老话么“三十岁前不当左派没良心，三十岁后当左派没脑子”，说的就是这种人。他们并不热爱人民，不真热爱这个世界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热爱的是一个轰轰烈烈、浪漫刺激的革命。或者说一切轰轰烈烈、浪漫刺激的东西，可以是足球，也可以是毒品（左翼组织蜕变后贩毒真不少）。老蒋一分共，然后又反共 20 多年，杀了一批这种人，招降、吓跑了一批这种人，最后的结果是替共产党清洗了内部。反过来国民党只

能靠这种人来维系一点利益以外的东西。所以有人评论："一般以为清党最大的受害者是共党，实际是共党没跨，国民党在事实上跨了，受害的程度不比共产党小"。这个评论恰如其分。

共产主义运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考虑某些特殊机关的工作人员）相信现在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带着点理想主义来混这个行当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升官发财实在和共产主义靠不上边。但这批人大都是小资出身，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也有小资的浪漫幻想。暂时这两者还分不开，一旦世道变乱，在辉煌和寂寞的轮番考验下，区别肯定一下子就出来了。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 CCTV 的狗血连续剧——近年左派和民族主义，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变化观感

编者按：数日前，本站在一篇转载文章的按语中严肃且明确地表明了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就必须坚决批判改良主义和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左派只有把自己阵营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及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清理，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其过程可能会伴随诸多痛苦，但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本文作为反民族主义系列文章第二篇，对当代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做了深入剖析。为了彻底揭示左派民族主义的反动内核，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在文章前半部分加以大量铺叙，并从历史角度分别阐述了“落魄贵族”的历史特征，中国现当代史的几个要点，左派运动的形势及历史任务等。文章略长，但我们希望所有追求真理的同志都能认真读完全文，尤其是文章的后半部分。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这是163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 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

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 GDP 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19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情况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丧失了退回农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组成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200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在人身自由上也依附于奴隶主。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词，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下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的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911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我）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 ，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他宣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赞颂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1988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50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60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即刘少奇认为，问题出在地主富农等坏人身上，他们还拉了一批基层干部下水，这应该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看

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钦差的身份下去抓典型，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即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下去揪基层干部的问题。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 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的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 西安 “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来自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完全是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

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到了。92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负担。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洋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

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这种政府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抨击。那个时候网上的政治帖子，不是从底层的苦难说到政府丧权辱国，就是从军备不振扯到民生凋敝。总之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政府被视为买办，军队被视为溃疡，毛泽东作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兼顾了列宁和俾斯麦的角色，既是平民的革命领袖，也是小资们眼中能振作国势的铁血元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革被重新审视，从一个被唾骂了20年的疯狂时代重新成为值得思考甚至效仿的对象。面对振振有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听着他们声称要为美国入侵带路，为教育、医疗产业化辩护的言论。不管是左翼共运还是右翼民族主义都恨的牙根痒痒。一边怀念文革，一面暗暗的琢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政府还没有主动控制的意识。翻翻各个 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过，中国的运气不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转机到来的时刻。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人的既定国策已经从工业立国转向金融立国，这样美国就能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来和苏联一国死磕。等到冷战胜利，美国已经陷于发债印钱的金融毒品中不可自拔，甚至整个西方都在转移产业，印钱买东西的狂欢中迷失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更何况中国信仰混乱，统治集团那么好忽悠，转移点工业过去有啥大不了的？不知不觉，按照购买力体现的实际汇率折算，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虽然这个工业国的大部分红利都被西方用金融陷阱剥削走了，但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另一个运气是拥有苏联这个老朋友。苏联在1991年挂掉，让中国减少了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还给中国卖了一大批白菜价的军事技术。不过，死掉的苏联最宝贵的援助是休克疗法。苏联所谓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原教旨市场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寡头官僚们的抢劫盛宴。中国的官僚倒不是不羡慕这种抢劫，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划到自己名下的才算好东西。但是，再仔细一看苏联，抢劫之后，制造业已经完全垮了，剩下的只有资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中国要是这个抢法，以中国的军工和人均资源水平来看，抢劫犯们手里剩不下什么东西，只有十亿饥饿的民众。俗话说贼不走空，抢劫犯再有作案的欲望，也不会干这种亏本买卖。再一看俄罗斯国势日衰的惨样，哪个大国的统治集团也不想过那种日子。所以，尽管官僚们迷茫无知，尽管自由派的学者鼓噪游说，中国终究没有拆散自己最核心的工业，同时保持着对西方产业转移的来者不拒。

这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工业体系缺乏资本和升级的技术——西方正好在拼命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不要都不行，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如此看来，当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彻底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瘾头越来越大，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早晚会和俄罗斯一样乖，假装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实力，为

了眼前的利润和廉价消费品，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自己也是半梦半醒，看着苏联的榜样，觉得的确不能自己拆自己的核心产业；但眼下还的确是那些外资和民企主导的加工业赚钱。犹豫不决之下，两边都得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态度更是让西方国家转移产业、开放市场玩的更放心。

所以，尽管中国自己发展思路不清，但熬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和统治集团的自信心是已经到底了。2001年-2002年左右，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就业、技术积累都明显开始好转，老企业那些缺医保的下岗工人该死的也死差不多了，不再给政府添麻烦。帝国主义的配合和苏联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了中国一个神奇的机会。

谷底的时候，可以说是希望最大的时候，但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家伙，觉得中国变成第一工业国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想趁这个谷底扼杀这种趋势。宁可少用点廉价消费品，也要打击一下中国。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飞机，都是美国一步步紧逼，拉架势要动手的表现。那时的中国，第一批歼11（国产 su27）服役才几个月，国产神盾舰还要两年才能下水，解放军的主力装甲部队以59坦克为主，导弹核潜艇还是80年代初下水的老货色。最要命的是军队涣散了20年，还没从开妓院、走私柴油的美梦中缓过来。要是美国那时候就全面进逼的话，后果还真的很难说。至少中国会丧失接下来1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另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911事件。阿拉伯恐怖分子从侧面杀出来，一家伙撞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其实呢，世贸大楼被撞，美国的实际损失不算大，要是考虑到上千金融蛀虫提前见上帝，美国人实际上可能还省了不少钱。但从心理角度来说，这让安定了几十年，还沉浸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人人自危。曼哈顿岛上的滚滚浓烟让美国人弄错了战略方向，本来已经伸向中国的拳头拐了个弯，去中东了。美国人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对着伊朗挥舞一阵拳头后发现阿富汗还没有搞定，这一折腾就花了10年时间，上万亿美元。打仗要花钱，要养兵，美国人就自然更需要从中国购买工业品，更需要中国产品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美元。于是中国工业继续指数化膨胀，甚至还有了资源重新搞产业升级。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中东用兵，抬高原油价格。至于当年美国提携的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并称“金砖四国”。原因是中国工业大跃进，让另外三个国家出口资源发了点财，其他的一切照旧。等到美国人打了10年，意识到自己的的拳头打到了空气上，真正的对手已经成长成超级大国，在反卫星，反导弹，试飞自己的四代机了。

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俺为中国经济奇迹而总结的原因，这也不影响俺接下来想说的。前面这一堆文字，就是说明一个观点，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2002年的中国算是一个发展谷底，已经用最残酷的方式在底层甩掉了包袱，挖到了吊命的资源，之后进入了快速上行道。到了2005年，甚至连内地中小城市都从90年代的暮气中开始露出亮色。取消农业税、提高转移支付的举措则安抚了农村。只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描述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他们描述的没有错，只是实际上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比如那本抨击买办的《刷盘子还是读书》，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滞后于经济发展才有了些销路。

这种局面给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出了个大难题。本来这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90年代底层的苦难和国势的相对衰落。现在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在这场肮脏的比烂游戏

中，胜利者居然是掌握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底层的矛盾已经从最激化的时期开始缓和，国力开始相对上升。倒是一直被描绘成超级恶霸，强大无比，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西方帝国主义，这10年却是王小二过年，越过越凄惶。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同时兼顾思想中的左翼倾向和民族主义，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甚至连一些工业化的进步也完全指认为恶魔的工具。比如转基因。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至少能维持这个群体的政治自信心，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

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在官僚集团看来，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都是自己的。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赌博赌来的，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但客观来说，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议会民主？这个转弯有点大，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所以，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问政体，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府。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举措——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于是，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当然了，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在90年代对文革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文革的色彩。文革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个文革预言中的官僚集团（或者说它的后代）要收编这个带着文革色彩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吴国和越国人是世仇，但在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也必须同舟共济。即最好的团结方式是寻找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把外敌的威胁放到无穷大，那么再大的分歧也可以抹杀甚至歪曲。正好，泛左翼因为90年代的政府无能，认定西方帝国主义是重要敌人，自由主义是他们强大的代理人。要是能把这两个敌人无限制地夸大，再用资金支持和政治秀来表示善意，打着文革旗帜的泛左翼也未必不能和红色贵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客观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声势大，但无论如何谈不上对中国政治有什么主导作用。的确，官僚中有许多人还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经常谈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但这不过是潜意识里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官僚，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斯大林铁血作风的崇拜者，经常因为某个新来的上级"没魄力"（比如拆迁时不肯派出武警方阵）而抱怨。从高层来看，赵紫阳固然一度大谈自由主义，但一旦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反腐败、反官倒，把赵紫阳那个倒彩电的公子赵大军也列入批判行列，赵紫阳的反应绝不是"我爱儿子，更爱自由民主"，然后大义灭亲。而是悄悄谈判，让自由主义从官倒名单里拿掉赵大军，然后才出来搞政治秀。俄国的叶利钦，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和自由主义一起欢呼，跳到坦克上演讲。轮到别人对他玩议会政治的时候，叶利钦立刻叫了忠于自己的装甲部队，炮轰议会大楼。所

以说，官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个玩票的水平。有苏联解体的先例在前，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真诚地玩一把自由主义理想。

在政府之外，我得说自由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大潮中相对失落的文史科知识分子保住了8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承。但在扩招之后迅速增加的知识分子大潮中，他们的声音还是相对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为了解决理论神圣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在宗教（默认为基督教）中寻找终极价值来源。这基本上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这样的自由主义，谁要说能在中国建立一个买办政权，我第一个不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中也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和80年代末的时候正好相反。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干部喜欢谈自由民主，普通城市居民则只是简单的抱怨腐败。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老百姓的抱怨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坐出租车，健谈的司机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的就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听工厂门口无聊的保安对话，往往会把社会问题归结到缺乏选举上。这可能是目前的左翼最担心的一种倾向。但实际上，普通人之所以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抱怨，并不是他们真需要自由主义，而仅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的不满。80年代以来，普通人看着官僚一天天堕落，看到基层政权口是心非地重复空洞的口号，已经本能地对贴有共产主义符号的那些政治语言体系有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所以，80年代的老百姓看到社会丑恶现象和基层官僚的腐败，会说：“中央知道这事不？”；到了21世纪，新一代年轻人只会说：“真 tmd 烂透了，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这种趋势，扫一眼网易、新浪的新闻评论就能看得到。

此外，虽然普通人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没什么好感，但很明显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更愿意描述一个圆圆的外国月亮，用来表达对眼前那个月牙的不满。至于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帝国主义那一面来说，要说看着中国崛起而不着急，那当然是扯谈。他们绝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和你作对的怨妇，而是一个要首先保证自己生存的利益集团。现在的英法，打个利比亚尚且筋疲力尽，造个空壳航母都得中国机械上。显然不具备搞中国的能力。日本折腾自己的老龄化和核电站自顾不暇。德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几个营。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美国——万万离不开中国廉价商品的国家，仗着冷战遗产还是很威风。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集团就算因为美国的印钞权而出让了一部分利润，依然有能力不断扩张。过去的10年，他们已经错过了压制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机会，局部战争和和平演变是没法压制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倒是他们自己，在金融毒药的压力下日趋空心化。除非发动同归于尽的战争，否则西方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挡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当然，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了，中国正在大步地往工业霸主的位置上迈进。这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中国这个超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问题。对世界的资源、市场、后发国家的前途，乃至中国人民的长久幸福都作出了巨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崛起，从来是要对内压迫，对外扩张并行。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泛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

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点事，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但事实正好相反。

近年来左派第一个变化是仪式化。

10年前的左派，无论网上讨论还是网下聚会，大部分言论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至于讨论模式，倒不必太拘泥。现在有了网聊软件，聚会更方便了，我也经常参与一些左派网上聚会。内容暂且不论，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类似基督教会唱诗班的气氛。大部分聚会本身只有一个主题——赞颂毛泽东，花样翻新的赞颂，唱红歌、念诗篇、讲故事。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讨论现实问题，结果大家只需要两种表态——咒骂和赞颂，从来不需要辩证的思考，也没人去给出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死脑筋，总喜欢问具体问题，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刚刚咒骂过的那个问题到底该咋办，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督教有个话叫"因信称义"，即你要当"义人"，充分和必要条件都是信上帝。信了你就不用考虑别的细节了，唱赞美诗就行。现在的左派也喜欢这样。

必须承认，仪式化的东西好操作。中国古代总强调"以德治国"，实际下来都是"以礼治国"。就是因为"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搞一套既能让人有参与感，实际上又足够简单的东西来保证一个底线规则。但是呢，现在是21世纪，你谈政治，谈的是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总唱赞美诗算什么政治讨论？毛泽东的路线或许不错，但是具体操作方式呢？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原则性讨论，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政治讨论永远是空头政治，不可能。空头政治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很容易就让参与者获得激情的刺激，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威胁。如果那些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也只好说，随便吧，采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化。

当然，90年代末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翼运动几乎完全不可区分。但现在的左翼运动，除了挂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壳，把文革和阶级二字习惯性地放在文章标题里之外，实质内容几乎全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目前的左翼运动如果要攻击一个人，首先挂上的称号是"汉奸"，而不是"阶级敌人"。而左翼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声讨这些汉奸，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老板。只要你骂汉奸——骂一个你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人当然很容易，也没有心理负担——你就算是参与革命活动了。

一般来说，这个汉奸、买办主要指那些私营老板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除去这些人，剩下的就都是伟大的群众、可敬的领导核心。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即不打算当西方代理人的那些官僚，那些占有最多的中国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就这样被悄悄地划为了同志，至少也是同盟。

在许多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宣扬中国人相对外国人优越性的文章，即否认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种生物，拥有同样的权利。再进一步，宣扬汉民族主义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在左翼内部得到一致叫好。这样一群人宣称自己在"推进共产主义"，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极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个变化是最重要的：去理论化。

左翼阵营从来是一个理论争吵不断的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左翼一般来说会宣布自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把建设一个新社会作为大目标。既然要建设新社会，一切方案在没有落实之前，充分的讨论、辩论和争论都是必要的。天底下没有不需要修正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左翼主流中，这种争论正在渐渐减少。因为大家渐渐的不去谈如何建设新社会了，剩下的只有怀旧与一致的攻击——对自由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正确性——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不唯权威只唯真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理由非常不可理喻——马克思和列宁是外国人，所以理论的可靠性不如本土的领袖。毛泽东的神性光环可以结束一切争论，同时也把一个政治运动变成一个安抚人的宗教。

去理论化不仅仅限于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泛左翼的的思路也是一团糟。比如说现在左派阵营中最风行的“反转”，即对转基因的批判，大部分人根本不去讨论技术问题，直接声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我曾经认真地向几位左派同志请教，问他们到底转基因的害处如何详细论证。他们不是为我认真解答，而是立刻翻脸：“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处于什么目的问这个问题？”。也有几位同志要热情一些，会让我去读某某人的书，但当我问他自己读没读过，关键点在何处，是否对书里的数据有自己归纳的的时候，人家还是拂袖而去，到别的 QQ 群里说刚刚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总之，现在的左翼运动认为立场比事实和逻辑更重要。反转基因可以煽动反美的狂热性，在国内又没有真正树敌，所以只要指出转基因的技术来自美国，就足以证明这东西的邪恶性。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所以方舟子就成了敌人。而方舟子的敌人就是盟友——肖传国也值得为之辩护。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盟友。主动捉头猪来当同盟，这种事还真少见。

当然了，去理论化背后颇有深意。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所以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哪怕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字面意思的探讨，也可能把运动的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所以，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足够简单的逻辑，可以把肖传国和一些中医骗子拉到自己一边，同样也可以把美国（西方）之外的社会集团描绘成同一个阵营。所以说，逻辑简单倒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聪明人，或许有人聪明过头了。

第四个变化是体制化，完全可以说这其实是前三个变化的目的，同时也是原因。

迄今为止，左翼天生站在批判社会的一面。因为少数人占据社会大部分稀缺资源，少数人统治社会是几千年来的社会通例。左翼自称站在人民一边，自称要为大多数人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自然有必要批判已有的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当前最主流的剥削制度。现在，全世界的工业国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按说左翼的批判矛头应该及时修正才是。但实际上，中国左翼现在还是集中火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那些“买办+代理人”。同时，在现政权越来越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左翼却开始逐渐对现政权产生认同，声称这是一个能带领共产主义者反对内外敌人（重点是“外”，内部的敌人都被解释为外部的代理），走向共产主义的先进集团。这不仅仅是认识不清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倒退。

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随着文革被重新审视，以及苏联解体提供的教训，本来左翼内部已经逐渐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官僚集团的行事方式和阶级地位有了明确的界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左翼越活越回去了，开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进民退”而欢呼，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当年的左翼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中共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今天却越来越多地看见左翼给这个统治集团写血书、诚心诚意地进谏。要求“党内健康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全国7000万党员，如果真有百分之一的“健康力量”，全国2000多个县区，每个县区也应该分到几百。我不知道那些逐渐转向拥护体制的左派到底见过几个党员兼共产主义者，以至于对这个党如此有信心。反正我是没见过。但无论如何，对现有执政集团的全面批判已经开始在左翼内部边缘化，甚至被指责为“偏执”、“妄想”。不过，要是连这一点偏执都没有，左翼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公平的说，现在的主流左翼，并不是对整个官僚集团一味赞美的。对于党内一部分缺乏红色贵族背景的技术官僚，他们敢于大胆地影射、讽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罪名则毫无例外地是：“买办”“汉奸”“走狗”。同时忘不了对另一派官僚集团的称颂。尤其是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用肉麻来形容已经有点不够了。这种夸一派骂一派的做法，本质上是政治投机。即认定中国的统治集团将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贵族化，希望使用西方化政治外壳的官僚将日趋衰微。因此，提前选择赢面大的一方下注会有较大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政治投机本身连“投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个外包项目。到此，官僚集团应该很满意，因为90年代在城市中下层人口中很有影响力的泛左翼阵营，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维稳工具。最近，重庆公布了36首红歌的名单，第一首是《走向复兴》。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说我造谣，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觉得我说的太空泛。好在有一个网站为我这些叙述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是十年来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左翼网站。另外，这个网站没有附带的 bbs，所有文章都必须通过编辑审核后才能上传，因此倾向性特别明显，可以直接认为这里的文章反映了乌有之乡的政治态度。下面我分类列了几篇文章的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直接看看

1 关于左翼运动仪式化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1101/206873.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372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3/218474.html

2 民族主义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884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76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30841.html

3 去理论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5/23105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2/214886.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3/22221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548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4612.html

4 体制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5/231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647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09/50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3/2244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6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9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2730.html

更多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搜索。如果读者有心的话，还可以搜索一下过去几年的文章风格和现在的文章风格，看看变化趋势也很有趣。比如说，看看过去的五六年，谈阶级的文字，占同期文章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谈民族主义的又增加了多少。针对红二代的文章多了多少，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工运的报导数量有什么增减，和红歌会的消息哪个多？近十年来泛左翼和乌有之乡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上有明确的体现。看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现代社会的节奏真快，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群体就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

这个群体的变化，不仅我感受到了，那些“正牌”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谈什么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感受到了。我的朋友里就颇有不少这样的人，眼里从来只有中华民族（汉族）帝国的伟大与光荣，从来不在乎这个帝国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只要能让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照搬美国制度也好，纳粹也罢，都无所谓。在政治光谱上，这显然是极右派。前几年，这批人谈起乌有之乡的时候，满嘴都是不屑，说那里都是一群喜欢造谣的疯子。但在那些民族主义者朋友看来，乌有之乡这几年是越来越“进步”了。评价从“满是疯话”变成了“脑袋开始清楚起来”。其实，客观来说，不论是前几年还是现在，乌有之乡的确都有喜欢耸人听闻的毛病，对文章的可靠度审查不严。但是呢，这个毛病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的。前几年最多是传点花边新闻，近几年就干脆赤裸裸的使用谣言。这样一个网站之所以被极右翼认为“疯话”少了，少的显然不是真正的不靠谱文章，而是少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疯”话。

在乌有之乡常开讲座的，还有杨帆这一类纯粹的技术流民族主义，他们和我的那几个民族主义朋友差不多，也是只说国家不说阶级，只说民族主义不提共产主义的。前几年，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演讲，被冠以“左派”的名头。对于这个名头，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杨帆曾经公开表态：“我不是左派”。原因是当时的泛左翼和请他们开讲座的乌有之乡还经常谈阶级斗争，谈革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决不能挂上这个名头。

最近几年，我再次听到“我不是左派！”这句话。不过发言者不再是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些坚持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保持距离的人。他们觉得“左派”这个词在中国变了味道，从共产主义者的代名词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打手，所以宁愿把这个头衔留给民族主义者。

说到近年的乌有之乡，绕不过一个人——张宏良。我在左翼圈子里朋友很多，不过，2005年之前网上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据说是中央民院的一位教授兼研究所主任，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他在最近五六年之所以名声大噪，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网文和演讲，其中至少有一半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他很善于在演讲时调动听众气氛，善用惊人的数据，但缺点是激情压倒逻辑。听他的演讲几个小时，往往出门时忘了他都说过什么。上网翻翻他的文章，长短凑到一起几百篇，文风浮夸，形容词比一般文章要多一个数量级。抛开这些修饰的东西，他的观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如下：

1 转基因是美国的基因武器，中国人即将失去生育能力

“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民族劫难，将成天谴。30多年来，中国对科学与民主亵渎得太过严重，所有罪恶都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泛滥于世，甚至把数百万妇女逼良为娼，都歌颂为是科学与民主的文明进步。所以，上苍便借助科学和民主这两把利剑来惩罚中国，让科学家和民主派联手把转基因主粮强加于中国人头上，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把眼睛盯在中国人身上，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做出何种反应以后，再决定被称为生物学世纪的21世纪人类的发展方向。”

2 中国现在濒临亡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3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当前中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融于民族利益之中，首先是民族利益，其次才是阶级利益，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保住民族利益，才能谈得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所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逻辑链倒很完整，即美国对中国有阴谋，中国要亡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对付美国。

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

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8千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2009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

即按照他和乌有之乡的号召，向重庆的薄书记致敬。这就是张宏良的答案。

张宏良是推崇毛泽东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泛左翼里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期也有秋石客等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同样推崇红二代的红色新政，但风头都被张宏良盖过去了。但是，张宏良到底对对毛泽东了解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段发言：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和前面毛泽东评四清的话放在一起看。张宏良和他推崇的重庆模式到底离毛泽东有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张宏良还喜谈文革。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不过说到张宏良和文革，我倒有一段故事要说来听听。

2007年的时候，在龙的天空这个网站，有人发帖讨论文革问题。有人说到张春桥在文革结束后的审判中一言不发，我饶有兴味地回了个贴，说如果张春桥当时知道审判的确在向全国直播，估计还是会说几句的。于是我就动手在回帖里写了个“张春桥演讲”，内容如下：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

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然后呢？然后那个帖子讨论了几个回复就结束了，我忘了这事。

过了两年，我忽然在张宏良的博客里发现了这段话，他老人家还郑重其事地给我随手写的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按语：“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30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1975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然后，由于张宏良先生的广泛影响，我的这段无心伪作就在网上传开了。不止一个人推荐我去读这段“张春桥讲话”。我自己辟谣也毫无用处。现在用这段话的第一句当关键词一搜，还是无数的人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文件。我想，不管张宏良先生是故意弄错还是无意弄错，这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说明张宏良对文革、对历史的看法，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和可信度。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由张宏良这样的人当旗手，一方面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一方面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主动地为毛泽东文革要打倒的那个官僚集团的的长治久安而鼓吹。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搁到10年之前，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当然，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历史没有编剧，反而无所顾忌，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

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最时髦的政治标签，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三次呢？马克思没说，看来马克思的想象力也有限，没料到已经被证明是闹剧的东西还会被人重演一次。最近这几年，中国泛左翼的转变明显地超越了马克思的想象力。在反思文革、寻求新社会主义的标签底下，是红色贵族的合法性论证，是抹杀阶级斗争的和谐颂歌，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呼唤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当年文革时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现在居然再一次被贴上了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被左翼视为文革精神的传承。这算什么剧？

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正剧。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笑，但不乏严肃和真诚。

1966年，高干子弟以革命的名义捍卫特权，提出“血统论”，这是闹剧。缺乏真诚和严肃，唯有狂热的仪式、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

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血统论”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今天的“左翼”在做什么呢？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为红色贵族欢呼。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一定要找的话，只有今天 CCTV 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

CCTV 的古装剧里，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CCTV 的感情剧里，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临死还要说活的值；

CCTV 的现代剧里，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

CCTV 的史诗剧里，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意气昂扬地演讲，然后革命就胜利了。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廉价到不像人的血，倒像狗血。在刚刚过去的10年，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唯有到 CCTV 和狗血剧为伍，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后记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习惯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这在民族主义看来是一种威胁，我却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机遇。随着教育和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牢骚，已经在“后革命时代”重新意识到谈论政治、推动政治变革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本是大时代的先声。面对这种机遇，左翼主流不是积极应对，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度奔走鼓吹。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自绝于人民”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但是，谈共产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很多人看着共产主义是个笑话，我不怕被人笑，但我们搞共产主义，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还笑我们傻逼。这是我个人划定的一条底线。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零 前言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许多经典文献和网络作品，但由于写作时间拖的比较长，现在我无法一一指出致谢，在此我对未曾提到的参考文献作者一并致歉并表示真诚的感谢。各位朋友如对本书有什么批驳、看法，或是发现本书有什么错误和问题，请不吝赐教。邮件请 发renchonghao@yahoo.com.cn

一 、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称是科学历史观，这里要讨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就要先对“科学”下定义。在作者看来，所谓科学理论，首先是一套描述事实的自恰假说，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不自恰的东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别人？但自恰的理论有千千万万，我们必须用两个标准来筛选。

一是事实，你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象，用你的理论预测出来的结果必须符合未来的观测结果。这样的理论才能算科学，同样是逻辑推导，从事实（不管是纯观测的还是实验室的）出发的叫科学，从无法验证的假设（比如上帝至高无上）出发的是神学，从被歪曲的事实出发的则是骗术。

即便如此，自恰且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的理论依然千千万万，比如说，你可以宣布世界上所有的物体都每秒增大 10 倍,相应的物理参数也随之变化，因为所有的事物连同物理参数改变的比例相同，这个理论无法检验真伪。这就必须利用第二个标准：简洁——当两个理论能以同样的精度解释现实，或暂时无法比较他们的精度时，我们取更简单的一方。这个标准一般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刮掉一切多余的陈述。按照这个标准，“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每秒增大 10 倍”这个理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在让理论变的更复杂的同时没有增加描述精度。

两个标准筛选下来，一般我们可以获得 1 个实用的理论，或是在观测不足时获得一些并存的科学假说。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我们挑出眼下最好的假说叫科学理论。一旦有了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是有了解释世界更精确的假说，这个理论就退到科学史里面去了。这样的理论和假说可以帮我们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或推测现实中未曾观测的部分。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那么科学理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新理论取代。但科学精神——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

定义了科学，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科学历史观。这又要先给历史观下定义。其实，除了那些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而读历史的学生，任何人读了历史都有历史观。因为人不是计算机，一旦了解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然会思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发展方式，给自己一个总体的解释。建立历史观的过程，就是在无数个诸如“西历 1966 年在远东那片通常叫做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通常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单调描述中找到一些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目的和规律。举两个例子，在原教旨基督教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意愿，上帝无所不能。这就是历史观，教

徒读历史时可以根据历史观把所有的事件整理成脉络，分出主次。同样，在希特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铺垫德国的崛起，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伟大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会理解历史并指导实践。而所谓唯物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摆回到与其他万物一样的位置，丢掉面对人类自身或是“上帝造物”的敬畏，象研究蒸汽机或是狼群那样研究人类社会。这种研究方式虽然不免对人类有点不敬，但有利于我们保持客观，这正是科学的要素之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称的上科学，必然要通过前面说的检验标准。其实光是一个“简洁”的标准就足以简化一半探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否认历史有目的。因为科学从来不回答“事件 A 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只回答“事件 A 是否会以概率 C 导致事件 B?”。对目的的探讨不一定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但增加了不必要的繁琐，所以科学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外。加利略当年正是摆脱了传统的思路——“铁球落向地面的目的是什么？”，转而探讨“铁球如何落向地面？”才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所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寻找历史规律并描述，但绝不寻求它的目标。既然目的不在研究之列，那么唯物主义历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探索历史规律，我们必须说明某些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按照前面讨论的科学标准，这些规律只能来自对历史自身的观察和随后的归纳总结，而且要尽量的简单。

比如说，如果我们泛读史书，连续几次发现在强大的政权灭亡前夕,统治集团均有突破原有军事体系大规模使用雇佣军的记录（埃及的库施军团、罗马帝国的蛮族军团、阿拉伯帝国的突厥卫队），就可以初步归纳：古代强国的灭亡很可能与大规模使用体制外雇佣军的现象有关联。然后我们再读到某个国家的衰亡时，我们可以期望在更多的相关材料中找到反映雇佣军的重要性上升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三国史中看到军阀建立私募军队的过程与中央政权的衰落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就在“国家衰亡”和“体制外雇佣军”这两个事件之间确定了一定的联系。下一步是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我们需要在几个例子中寻找类似的结构。通过详细调查和对比，几个例子都表明：原有军事体系的败坏或是作为军事体系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会导致对雇佣军的需求，而新雇佣军的实力逐步上升又导致了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这样，我们就得出了比较有意义的结论——体制外雇佣军的扩大与稳定社会的衰退互为因果，很容易同时出现。考察晚清社会时，这个结论依然适用，这就是足以建立局部唯物历史观的一个科学假说了。当我们发现今天义务兵兵源质量的下降、士兵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与国家大力提倡军队职业化同时出现时，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条结论来推测一下未来。当然，根据科学的原则，从农业社会总结的规律用于工业社会这个不同的环境必须非常谨慎。必须认真的考察在农业社会导致雇佣军扩大的因果关系链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现代军队战斗力与现代化装备的应用密切相关，专业士官和职业军官比例的提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对这个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

上面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并举例进行了说明。其实这些原则并不新奇，任何一本合格的物理教科书都会教给你这些原则，本书只是将其转用于历史考察罢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来扫视我们的历史。建立一些基本规律，然后再从这些基本规律出发，对具体的事件进行解释，并尝试分析未来的趋势。

在研究人类历史之前，我们还必须先对地球这个人类历史的舞台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地球上的人类绝大多数居住在亚欧大陆、非洲大陆、南北美大陆和大洋洲这些主要陆地，其中大洋洲在近代以前只有很原始的文明。至于其余的几块陆地，亚欧大陆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一块，在全球化到来以前，这个大陆及附属岛屿集中了世界 80%以上的人口，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大航海时代以后，来自亚欧大陆的移民用传染病、战争和商业消灭了其他大陆的文明和文明胚胎，因此对现代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有 99%集中于这块“旧”大陆，唯物历史观的基础也正是来自对这块大陆上人类史的观测。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亚欧大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旧大陆（含北非地区，这一地区在地理上被撒哈拉沙漠与南方分隔，通过地中海和西奈半岛与亚欧相连）适合大规模人类社会存在的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 7 个部分：1 亚洲大陆核心部分的大草原干旱地区（从东欧延伸到蒙古）、2 欧洲农业地区（含英国和北欧）、3 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4 印度农业地区（从印度河到恒河再到斯里兰卡）、5 远东农业地区（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6 东南亚农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半岛和群岛）、7 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南部的干旱地区（一些早期南方农业地区灌溉系统被破坏后也应归入这一类）。

其中,1 和 7 适合游牧，以游牧文明为主，在现代火器出现以前从未被有效征服，一向是游牧蛮族的固有家园。不过 7 的面积较小、气候干旱，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远小于 1，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明显要小的多。其余几块都是农业文明地区，相互之间被高山大海或遥远的距离隔开。除了 6 的面积和人口稍小一些，经常会在文化或政治上从属于中国或印度外，2、3、4、5 几个地区在历史上始终旗鼓相当。在西欧发起最后的征服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地区能够在政治、军事、文化或经济上彻底征服其他区域。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特征，比如 2、3、4 之间存在内部水道（红海、地中海、黑海以及周围的海峡、河道），交通相对容易一些，文化交流比较多，远东相对而言比较孤立；印度和东南亚与游牧地区不直接接壤，军事传统稍弱；大草原的西侧要比东侧更肥沃、在埃及-黑海和阿富汗-新疆之间存在两个交通枢纽等等。这就是对人类历史主要舞台的一个极简描述。

从地图上看，地区 1 最大，在气候温暖湿润、冻土和沙漠暂时后退的年代可能会等于 2、3、4、5 几个主要农业地区之和。但农业，尤其是发达灌溉农业所支持的人口密度是游牧业根本无法相比的，因此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农业地区。人口稀少的游牧地区之所以取得在真实历史中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的军事优势而不是文化或经济因素。牧民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游牧才能保证在不同季节给牲畜供给足够的饲料、水和安全保障，这种生活方式迫使牧民们组织起来，靠部落的力量生存，同时服从领袖的命令和纪律。经济模式造就的组织资源和纪律性让游牧民在与松散的自耕农社会交战时占尽上风。除此之外，牧民组织骑兵比较容易，这使他们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两方面拥有战术优势。依靠牲畜群组织的后勤补给还给了牧民远远超出农业文明的战略机动能力。因为这些原因，游牧蛮族往往以很少的军队就征服十倍甚至百倍的农业人口。从地球仪上可以看出，地区 1 占据了旧大陆的核心位置，2、3、4、5 几个主要农业地区就分布在它周围的一个大圆弧上，这也为游牧民发起进攻提供了方便。不过，限于草原的面积和游牧生活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牧民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游牧生活无法支持稳定的文化发展与传承，因此游牧民族的进攻总是迅猛而无法持久。一旦新胜的锐气不再，或是游牧民的军队再也无法从游牧生活中补充新的组织资源，他们不是被优势人力的反击打回草原，就是被高级文化所同化。

在这种游牧民与农民的冲突中，农业文明的长处是人力、经济和技术，还有根基稳固的文化。因为后勤和气候因素，农业文明无法在干旱地区建立长期的军事据点，从而彻底消灭蛮族的威胁，因此战略上总是被动，但也从来没有哪个农业区域在游牧民的进攻下彻底丧失文明遗产和发展机会。游牧民因为自己的生活特性，无法通过时间的推移积累自己的力量，总是被动挨打的农民却因为文明有稳定的基地，发展连续不断，最终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压倒了牧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主体是农业民族，游牧民在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改变，只能看作一种固化的历史力量，不时的进行侵扰，但不能主动的促进进步。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地理条件不是现实中的样子，历史完全会有另外一个走向。比如干旱地区超出宜农地区数倍，且在地理上包围了农业地区。那么，牧民们会不断的洗劫乡村和城市，甚至把整个农业地区改造成牧场。农业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低水平上被打断，然后重复发展。整个世界完全可能会长期停滞在青铜时代，诸如工业革命、现代社会之类的概念只能在虚构中出现。因此，从唯物历史观看来，我们的历史主要是定居农业文明的历史这一事实，主要是由：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被气候和土壤所决定的农牧业生活特征、游牧地区相对农业地区的位置这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可能会有读者置疑作者这种随意设置历史条件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看来，地球只有一个，我所设想的另外一种地理模式下的历史没有意义。这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科学固然要以实际观测为基础，但对于许多暂时无法验证或观测的事实，如果相关的规律已经被充分认识，在头脑中作一些架空的试验是允许的。起码比盲目承认真实的历史就是必然结果要好。当然这种思考不可以用来推翻实验或观测的结果，只能用来检验现有理论的自恰性，或是把现有理论适当外推进行谨慎的预测。还是迦利略，当年在考虑惯性问题的时候苦于缺乏试验条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其实是很一般的条件）就屡次应用“理想实验”来进行推导，最终为牛顿定律建立了基础。即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得到“绝对真空”和“无摩擦运动”，但我们依然承认惯性定律，承认它是足够精确的描述，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不完美的试验中得到了足够的数据，足以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理论外推至理想状态。

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把科学理论定义为目前最好的假说，同时强调科学理论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更好的假说推翻。那么，我们在观测基础上通过架空思考而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可以是科学理论。

历史学的观测对象是人类社会自身，这是一个独特的事物，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其他星球上找到类似的智慧生命集体来进行对照。在观测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时，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事件来做对照，总结规律；但因为这种独特性，当考虑足以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规模相提并论的历史事件或讨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我们只能是以对一般性历史事件的总结为基础，用严密的逻辑进行谨慎的推导。这种推导可能有错误，但无论如何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把一切无法精确描述的事件丢给上帝或者命运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宁可相信精度差但是有依据的假说，也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上帝或命运。其实，不光历史学研究者会这样做，在其他往往只有一组可观测对象的学科，如天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也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理论体系。

另外，尽管现实只有一个，但当我们基于历史经验向未来张望时，必须明白未来的物质条件尚属未知。我们不会知道下一种能源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和多大的环境成本，也不知

道工厂式农业是否可行，不知道是否会有某种技术彻底解决人口问题，我们至多可以估计一下这些偶然事件的概率。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架空思考，历史经验就无法应用于未来。同样，在考察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可以作出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测就妄加评点。因为许多对我们来说属于已知的条件对于古人来说完全未知。比如说后面我们将要讨论西欧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英国曾经在工业革命的萌芽期就消耗了本土的大部分森林，对燃料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煤矿的开发和对海外的原料贸易，并最终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诱因。但我们不能因此评论英国人有远见或是砍伐森林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事实上，没有任何古人知道煤炭足以代替木材应付人类在工业化初期对燃料的需求，更没有人知道英国本土有多少煤炭储量，我们只能说，英国资本家运气不错，如此而已。唯物历史观是承认偶然性的，但除了纯随机事件的影响，历史中确实是有一些规律从过去延伸到未来，偶然事件必须在这些规律的约束下对历史产生影响，所以对历史进行适当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熟悉规律，帮助我们在当代利用历史经验。

就这个架空的话题展开说一下研究历史的思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中有一些规律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后面将谈到的经济基础主导论和人口的无限扩张趋向。这些规律比较稳定，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都会促成类似的社会结构，这种规律本身和规律的缓慢改变是历史学的重点，因为解决大部分历史问题都要用到它们。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对历史影响巨大，但基本属于偶然因素，人力无法改变或无法预测。比如美洲的发现（没有人可以在哥伦布出发以前预言他将带回多少黄金，更不可能预测他将带给处于生态危机边缘的欧洲一块几乎空白的大陆）和成吉思汗的军事成功。（游牧部落的冲击力和周围农业文明的暂时衰弱可以预计，但成吉思汗本人创建的基层军官-士官培训制度出现在那个时代却是偶然）。这些因素应当看做一些孤立性的事件，应当掌握，但除非我们能从中总结出规律（不大可能），否则无助于我们解决新问题。

关于普遍规律和偶然因素的关系，可以用比喻来说明问题：许多人喜欢把历史比做一条河流，把这个比喻推广一下，历史研究者就是一个试图从零开始考察河流的水文地理调查员。那些比较稳定的普遍规律就是牛顿力学定律、流体力学、水力学、沉积速度等基本的历史规律和参数。除了这些东西，河里还有一些搅动水流的礁石，如果河流遇到山脉必须转个方向。这些同样会影响水流的山峰和礁石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我们试图在某个具体河段考察水流的流向，作出具体描述和计算时，必须把水力学等基本原则和具体的礁石、山峰位置结合考虑，才能对水流真实流向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对无法直接观测的河段进行推断。当河流流入一段新的河道时（用历史规律去看未来），我们只能根据那些基本原则作出一个大致的预测，然后再进入河道，根据具体的礁石位置作出具体阐述。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精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对过去的观测，掌握一些历史规律后作出的推断依然可以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

二 、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

既然定居化的农业文明是历史的主体，至少是现代社会所直接继承的那部分历史的主体，那么对现代社会做出解释就必须基于对农业社会的观察。

我们可以从漫长的定居农业社会（区别于不断在迁移中烧荒种地的早期农业）中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

1 稳定性

在发明了轮子、冶金术、陶器、建筑学、历法，总结了初等的水利知识，过上定居生活以后，人类在基本的生产方式方面就陷入了停滞。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尽管各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的政府形式、文化特征、宗教千差万别，但农民们始终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生活水平在温饱线附近波动，同时向上层社会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期间只有高级宗教的产生和铁器取代青铜器真正算的上明显进步，不过前者的影响主要还在上层社会，农民们的信仰始终搀杂着原始宗教的迷信（许多欧洲的偏远山区直到宗教改革尚未真正皈依基督教）；后者则使农业地区变的更广阔，让农民从此可以把青铜器和石器无法改造的密林、沼泽变成农田，但没有改变农业生活本身。

这种稳定意味着人均财富、经济总量上限、社会结构、文化的全面停滞，直到大航海时代从美洲带回的新物种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上限。随后的工业革命通过从生物界之外引入新能源的方式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结构。从宏观来看，几千年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人口从 2-3 亿增长到接近 10 亿，手工业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增长速度几乎可以忽略。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社会的经济或技术水平上限为纵轴做一条发展图，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 1500 年，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条总走向几乎水平的曲线。如果从曲线起点到终点引一条直线，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直线存在正的斜率，终点比起点有微小的抬升（这种增长是客观存在的，并最后触发了工业革命，只是绝对速度极低）。如果把这条曲线画到 2005 年，我们一定会发现这 500 年中曲线以前所未有的斜率向上抬升。作为一个生活在高速增长的社会的现代人，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看到显著的经济增长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研究漫长的农业社会时，必须时刻记住停滞是它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到技术史时还要进一步阐述。

2 波动性

我们说经济发展在几千年中陷入停滞，并不是说经济水平始终不变。确切的说，停滞的只是技术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的上限。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偶然冲击的影响，各个农业文明的实际经济水平和规模一直在波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资源比例的变动所带来的波动。

吃饱是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而近代以前，人类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人口-粮食供应的矛盾，因此农业社会的经济的基础是种植业。在 18 世纪以前，除了象罗马帝国、中国统一王朝、土耳其帝国这样的大国通过水路运输调运一些粮食外，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在本地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而即便是拥有内海或内陆运河的的大帝国（商业联盟），也只试图解决几个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相对整个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微不足道。至于跨文明区域的粮食运输，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余所有经济/文化/军事等非农业部门的人力供应都受到本文明粮食生产剩余的限制。粮食剩余一般来说在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不大，大部分粮食都用来供养它的生产者——农民。但正是这一小部分粮食的数量与比例决定了农业文明之间的主要区别。

一般说来，粮食生产由四个因素决定：气候、土地、人力和技术。如果考察长期趋势，气候可以看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参数，丰年和荒年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工业革命前夕，农业技术也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的因素。那么粮食的总产量和剩余产量（可以拿出来供养不参与农业的人口的部分）主要取决于土地和人力两个变量。很显然，任何一个变

量的增加（新土地被开垦，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都可以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同步跟上，那么这种增长严格遵循效益递减原则。具体而言，当劳动力不变，土地无限供应的时候，开垦第一亩土地可以得到最高的产量增长，随着土地增加，总产量也增加，但人力不足会逐步让单产下降，直到趋近于 0，新增土地不再增加产量；同样，如果可开垦土地有限，劳动力不断繁衍，那么第一个新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然后逐个递减，随着粮食单产达到精耕细作的极限，每个新增劳动力能带来的产量增长为 0。

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靠的是人口增殖，土地供应的增加却只能通过开垦来实现。正如马尔萨斯或达尔文所言，人类和绝大部分生物一样，具有无限繁衍后代的趋向。因此在大部分成熟的社会里，相对稀缺的是农田而不是劳动力。在古代，农业民族进行大移民来释放过剩人口是很罕见的，一旦人口的繁衍超出土地负载能力，新增加的人口无法使粮食相应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过剩人口对生态的破坏反而会降低产量），剩余粮食（先是人均、然后是总量）就开始下降。在农业社会（其实也适用于今天），这意味着可以供养的非农业人口开始减少，军人、贵族、工匠、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的人数与生活水平都同步下跌。

一般来说，上层社会不会坦然接受这种现实，他们会利用自己统治社会的权力提高实际税率，并雇佣过剩的流民加强对下层的镇压。可相对长期积累的矛盾，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社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最终导致暴动、内战、分裂、水利失修、蛮族入侵等灾难性事件。从长期来看，灾难性事件会减少人口，让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回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但短期内灾难性事件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生产，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制造更多人祸。即便人口已经被灾难减到了过剩以前的水平，也不会有一只上帝之手让内战、分裂等人祸在瞬间停下来。灾难还会继续，直到社会崩溃带来的矛盾充分释放后才会停止。经此大灾，人口大幅度减少，过剩的反而是自然资源，于是人口开始重新增长，各种被损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社会一片繁荣。如果没有太大的偶然冲击，人口将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超过土地承载能力，下一个周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开始。

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周期，灾难性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余大部分时间可以划分为人口过剩前的增长期与人口过剩后的衰落期。在增长期，人口快速增长，剩余粮食总量不断增加，由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基础设施的修复，人均粮食剩余甚至也会增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可以转为依附于农业的牧业（每亩牧业土地能养活的人口要远少于农业，但能提供更多的肉、蛋、奶），让各个阶层的生活更舒适。社会可以供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将更多的财富投入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承受各种新制度的试验成本。而人力的相对稀缺也会产生对节约人力的技术的需求，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让经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提高（当然提高很有限）。无论是对于后世的评论者还是对于当时的百姓，增长期都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一旦人口的增加致使剩余粮食总量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剩余的减少趋势压倒了纳税人口的增加），农业社会就进入了人口周期的衰落期。由于政治军事宗教精英们占有统治地位，他们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是有刚性的，剩余产品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生活的艰难，还导致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减少，社会在外表上立刻就萧条了下来。人口过剩还有另一个重要影响——任何可以节约人力的技术进步都将被废弃。因为没有哪个前工业化社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能力，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不仅新技术消耗的资源比人力可能要贵

的多，节约的人力也无法再次融入社会，必然成为流民和暴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理智的统治者不会在衰落期推广节约劳动力的发明，这也是一个技术停滞甚至后退的时代。罗马皇帝曾拒绝用原始蒸汽机取代人力去竖起石柱，理由是让穷人获得面包；晚清的中国官僚拒绝用海运代替漕运，用铁路代替骡马，因为担心裁减的人力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是对的。在彻底崩溃以前，这种衰退期可能持续很久，但明智的观察者会从基层的经济变动中看到危机。

除了人口——资源比的变动所导致的波动，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上限，其他一些意外冲击也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波动。比如蒙古人对整个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入侵，黑死病对中东和欧洲的影响，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等。农业社会的全部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都是为了应付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构筑的，一旦环境剧烈变动或社会结构被暂时破坏，经济水平会立刻下降，然后再重新向既有的上限发展。这种波动在历史发展曲线上应该是一个 V 型。最后，即便没有其他冲击，消耗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本身的腐化堕落也会引发革命与内战，制造出一个相对有效的上层社会，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前提下，这也是一种周期性波动。不同的社会由于客观条件或偶然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同的波动所主导，其中人口自然繁衍导致的波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原因导致的波动一般也会大幅度减少人口，造成人口——资源比的变动，从而产生类似的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的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上限的停滞，人类社会无法在短期内用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人口压力或应对环境的变化，只能进入衰退或崩溃阶段。但除了少数几次生态灾难外（如中东部分地区在生态退化和蒙古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变成荒漠），大部分导致经济水平下降的的灾害并没有伤及农业文明的基础——农田，因此幸存的人口可以在废墟上重建社会，让经济重新恢复到原有水平。各种波动不是独立出现的，它们可能互相叠加，可能互相抵消，还可能互相影响。由于缺乏足够的古代气象和自然地理资料，我们很难量化的用这种模型去解释全部宏观政治史或军事史，但近似的考察是可能的。中国在汉朝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周期约为 300 年的主要波动。其他几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虽然人口规模与中国相近，但经济-人口波动周期明显要长一些，约为 400 年-450 年，这或许可以用文明的相互影响来解释：欧洲、中东、印度之间有通畅的水路交通，又没有可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中亚沙漠相比的地理险阻，因此一个文明兴盛的时候可以通过掠夺、不平等贸易、殖民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优势，释放部分矛盾与过剩人口，延长增长期；衰落时又要受其他文明的压制，复苏要慢一些，循环周期自然要比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中国稍长。（本段推测成分较多，请读者多提意见）

3 地域性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长期经营的肥沃土地和同样无法移动的灌溉系统（在气候稳定的部分地区，靠天吃饭也会有好收成，但已经开垦的熟田依然是无法移动的）。除了盐和金属这两种物资以外，大部分农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关键生产物资仰赖于长距离贸易。因此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象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同时，铁矿的分布远远比青铜所需的铜、锡等矿藏广泛，因此在冶铁术普及以后，盐成了粮食以外最重要的长距离贸易物资（忽略那些服务于少数人且数额不大的奢侈品贸易），如果能解决盐的供应问题，大部分地区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历次长期分裂（三国、五代、南北朝），如果并存的政权不能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下进行稳定贸易，那么各自的领地内必然至少有一处盐的主要供应地（如山西的盐池、四川的盐井、沿海盐场）。但从整个大陆的视角来看，农业文明地

区都分布在湿润的沿海地区，因此没有哪个农业文明不能独立产盐。所以，从经济上看，旧大陆在农业时代不存在对跨文明区域统一经济体系的需求。

军事行动是将不同的地区统一的最直接的方式。但对战争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战略机动性被游牧民族所垄断，它们的经济基础本来就依赖于游牧，整个民族和财产（牲畜、帐篷）都可能和军队一起行军，庞大的畜群可以运输粮草，自身也可以充当食物，因此他们可以发起横跨大陆的征服。但农业文明的军队不行，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补给线，农业文明的军队在给敌人造成伤害以前就会自行解体。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铁路出现以前，陆上运输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马车、驮马、或民夫自己也是需要粮食的，有效的运输效率随距离而下降，因此军事行动的规模随着活动半径增加将逐渐减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缺乏补给的军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沿途劫掠，但这往往会激起巨大的反抗，减慢行军速度，如果身处荒野或贫瘠地区，劫掠或就地征发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从后勤角度来说，任何跨越文明区域的军事行动都不大可能成功，即便侥幸成功（往往利用了游牧民的力量或依托于内陆水道），也只能是短暂的袭击，然后或失败或分裂。这种天然的防御优势导致了农业文明在政治上的分立。一个农业政权或一个文明体系无法在农业时代通过暴力无限推广自己的制度。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还限制了农业人口迁徙的频率和规模。考虑到长距离贸易限于少量非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随之产生的文化扩散也很缓慢。除了几个高级宗教能够同时影响数个农业文明外，其他基本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民风、世界观、聚居方式等，各地都各有特色。这其中有当地地理环境塑造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迁徙比例低造成的文化自然分化。即便是基督教、佛教等影响广阔地区的宗教，在被引入各个地区后也受到改造，带上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他们的创始地反而不见踪影了（伊斯兰教创立比较晚，因此分化和消亡较少）。

总结下来，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铁路出现以前陆地运输成本的高昂决定了农业文明的定居性与自给自足性，从而限制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因此，基本生产方式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文化、社会结构的完全一致。

4 农业组织方式的一般变化趋势

游牧社会或采集游猎社会是一个强调基层组织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或一个小家庭能够独立的在草原上游荡，应付各种猛兽、恶劣的气候和食物匮乏的艰难季节。那个年代没有无线电，交流与协作只能在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进行，这导致在非定居生活中离开熟悉的团体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生活，因此恶劣的环境强迫非定居者结成紧密的基层团体。

在初期的农业社会，人们同样需要严密的基层组织，因为这种利用金属农具在熟田上进行反复耕作的经济模式在旧大陆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很难在社区以外找到类似的条件，比如稳定的金属工具供应、统一的灌溉规划、可靠的军事保护、稀缺商品的供应（盐、木料）等等。因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旧大陆各地最早的农业社区基本都是城邦模式。城邦一般会包含数万核心人口，拥有城墙或卫城，向居民提供金属农具、灌溉体系管理和保护。其中保护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城邦往往被落后的非定居人口所包围，好似蛮荒部落的大海中的一些孤岛，再加上城邦之间的一些冲突，农民只能从受城邦保护的土地上获得收

益。在早期农业城邦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和粮食储备的统治集团也会严密的控制城邦成员，不断发出指令，以保证城邦本身的存在。

随着农业地区逐渐拓展，农业社区开始从一个个孤岛连成一片，最终把旧大陆中央干旱区南侧的巨大弧形区域变成了稳定的农业地区，城邦层次的灌溉管理开始显的落后。冶铁业把金属工具的制造变的更简单、更廉价，也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管理。农民们发现做一个自耕农，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土地上无法生产的东西要比在城邦下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更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长期的斗争，平均统治成本更低的统一大型农业国家最终取代了城邦，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并认真的保护自己的税源——维护社会秩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水利。从此，小型而有力的基层城邦和强大的地方军事-宗教贵族丧失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收税，不具体管理经济生活的统一政府与大量零散的自耕农。

人口增殖压力迫使相当一部分人口进入干旱地区，选择牧业生活。而农业社会的进步为牧民提供了可供交换的粮食及金属工具，保证了游牧社会的稳定性，到公元前 1000 年左右，游牧民族已基本填满了旧大陆的干旱地区，开始频繁袭扰周边的农业文明。人数众多的骑兵入侵不是孤立的城邦能阻挡的，因此只有那些建立统一常备军的地区才可能保持自己的农业文明。庞大的职业军队在永久性的工事掩护下足以与蛮族对峙，还可以用来打击内部的分裂倾向，新秩序拥有了强大的暴力基础。

占据整个大河流域或农业地区的国家取代城邦，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弱化和一个高层组织的建立。新的国家肯定要比以往任何的城邦都强大，但具体到个人而言，它们并不试图象旧的城邦那样干涉具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不打算创造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用人身依附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层秩序，因为喜欢那样做的统治集团基本没有机会取得政权。理智的统治集团只是尽量维护好社会秩序，让农民们按自己的想法去经营土地，从而生产出尽量多的剩余产品可供交税收，稳定是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农业资源尚属稀缺的早期，城邦只有通过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才能制造足够的生产要素（安定的环境、运行良好的灌溉系统、金属工具），而农业的普及化使孤立的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旦生产要素得以满足，难以严密监控的农业劳动显然以家庭或略大于家庭的小村社为单位进行更有效率。

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几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安定的环境都再次成为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劳动只有在军事强权保护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于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化再次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和社区对生产的干涉成为有效率的选择。统一的大国家会再次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社区，在衰落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政治力量成为社区的核心，世袭、拥有特权，明确有别于平民的军事贵族阶层开始出现。一时间似乎整个社会倒退到了农业社会早期，一般我们称这种变化为“封建化”。由于高比例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存在和封建集团无法遏止的内斗，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本是很高的，随着秩序的恢复和农业的自然扩张，这种制度将逐步让位于拥有官僚体系的统一国家。

在西欧、中国、中东统一大帝国崩溃的时候都有封建化进程，当某个落后军事集团刚刚完成对广大地区的征服时，也往往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和相关的技术在整个旧大陆越来越深地扎根，灾难对农业本身的破坏相对越来越小，因此基层社区的弱化和地区性国家权力的强化是一个普遍趋势。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

相对其他地区较早的进入这个状态。而西欧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曾经在军事贵族分立的封建社会停留了较长时间，后面将详细谈到这一现象的成因和影响。

三 、物竞天择

在前面总结农业社会特征的时候，作者已经在无意中应用了一个唯物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在给定的外界条件下，任何社会都有自发调整自身结构的趋势，使社会的经济水平接近外界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换成常见的一句话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条很有用的规律，不过传统上对这个原则的定义不够确切，许多人在应用时又不分条件的随意外推，从而引发了许多荒谬愚蠢的结论。为了更好的理解并应用规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逻辑推导开始，弄清这个原则的来龙去脉。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唯物历史观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进化论的出现。进化论的出现也是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理论突破之一，我们通常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许多人因此认为进化论给出了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物会在进化中胜出。但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必然会发现“适者生存”这句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适者”的定义正是在进化中生存并能繁衍后代的生物，它不一定意味着更快，也不等价于更凶猛，或是产卵更迅速。这句话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事实上，“适者生存”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陈述，而不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它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生物形态都是自然界各种外界条件（以及一些偶然性）造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什么造物主的意愿或伟大的目标而产生的精巧设计，并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出预测。

今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达尔文的思路。生物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形态必然要受周围物质条件的塑造。引入一个上帝或高于一切的目的只能徒增复杂，并不能让我们更精确、更方便的描述世界。既然上帝不能被证实存在也不能被证实不存在，那么达尔文宁愿让自然独立完成造人的工作，让上帝下岗。只是长久以来，因为人也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个把人类从世界中心拉出来的理论，不愿意承认人和生物界的规律可以用科学原则去研究。达尔文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整理，以过人的胆识，把生物研究归入了讲究实证的科学范畴，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虽然进化论没有对具体的研究提供任何标准，但从此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生物学和人类学，这就是进化论的意义所在。至于达尔文提出的其他一些具体假说和结论，在现代遗传学和基因科学确立以前，只是缺乏根基的假说。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说达尔文的智慧和运气都超出常人。

与生物学和人类学在进化论以前的的地位相似，历史学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排斥科学的研究方法（天文学中也有类似现象）。因为整个历史是都是人类独自继承的遗产，今天的全部人类生活也将变为历史。人们很难相信人类生活和最卑微、最平常的自然事物会遵循一样的规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研究。同时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总喜欢制造出一套理论来证明当前社会的神圣性、永存性。因此人们竭力要为历史找到目的，用当代的善恶标准或某个集团（民族、阶层）的价值观为历史设定方向或规则，而不愿意象研究物理学那样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规则去进行研究。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类最终还是意识到应该把科学的原则（就是本书开头的那两个标

准）应用于历史研究，不过在一开始大部分人对此仍保持怀疑。直到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了第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指出经济基础塑造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解释历史和现实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唯物主义历史观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说了，进化论指出目前存在的所有物种不分强弱大小，都是竞争的结果。由于自然界的养料和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争取养料和生存空间的物种可以存活下来，并在客观上扼杀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必须注意的是，物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只是一种结构，物质和能量迅速的流过这种结构，前一辈的生物很快就会成土壤的养料，为但我们并不认为物种因此发生了本质变化。对于某些喜欢走极端的生物学家来说，物种不过是基因复制自身的一种合作方式而已。与之类似，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也只是一种保持动态稳定的结构，它们的存在需要消耗人力和物资——经济活动的成果、人类社会的稀缺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在人类社会某个时期内，各种上层建筑的组合方式之间存在着与自然界类似的竞争，那么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制度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

回顾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是可以满足这个竞争条件的：

首先，旧大陆各地主导的文明形态都是定居农业文明，而且始终存在交流。只要有机会，大部分制度可以很方便的在另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保证了整个旧大陆是一个完整的竞技场。

其次，竞争是文明之间的事情，农业文明在地理上的分隔状态保证了制度变异和新制度出现的机会，不会因为某个政权将旧大陆统一成铁板一块而终止竞争。即便在某一个稳定的文明体系内部，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气候、新农作物的引入）的变化，某一地区率先出现制度变革并独立于其他地区建立新制度依然可能（存在许多经济上对外依赖较少的地区）。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以与生物界中物种基因的变异相提并论。

最后，农业文明土壤上的各种制度和文化确实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工业化之前，制度在农业文明中传播不外乎军事征服、随人口扩散和和平传播三种。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基本与经济剩余成正比，产生过剩人口并占有其他地区意味着人口基数大，和平传播则意味着对方感受到了新制度的诱惑或压力。无论上层建筑的构造模式以哪种方式进行，经济水平高、规模较大的一方都会占上风。另外，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威胁虽然与经济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作为一种常设的外部条件，也有助于淘汰那些人力、物力、组织能力不足的文明。

鉴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尝试用竞争原则去解释农业社会历史。按照本书开头提出的科学原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客观条件的指标，然后比较各种制度下的历史上限，最后确定是否新制度一般会比旧制度更适合新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简单却非常耗篇幅的考据工程，恐怕不是本书这几万字能完整陈述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奉为传奇的历史段落，总是那些以少胜多，以弱击强的战役，或是从奴隶到将军式的传记、以及理想主义者的成功故事。这正好说明了这些历史事件在历史中的独特性，说明大部分历史事件的结局都是物质力量较强一方的简单胜利。这些胜利因太平凡而显的单调，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历史的主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偶然事件会被总

体趋势所淹没，因此，占据主流地位的制度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投入经济剩余来扩张自身的制度。

如果进一步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从采集社会转向农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变革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规律。因为采集社会也是一个在地理上均匀、分散的社会，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或政治上的惯性来阻止制度随经济基础变化。马达加斯加的某些地方和其他一些大洋岛屿直到近代才引入水稻种植，这种新技术立刻就引起了一场革命——传统上与采集-旱地刀耕火种经济相配合的大家族迅速在 2 代人的时间内分裂成依赖小块稻田土地生存的小家庭，而私有土地产权的建立也促进了阶级、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发育。这种变革在大约 1 万年前曾在所有的旧大陆农业地区发生过，不过毕竟太遥远了，太平洋小岛和其他一些生存环境和经济基础因为全球化而出现巨变的国家可以为验证前面的结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

从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在这大约 10000 年中，以经济基础为主的外部条件基本确定了了社会上层建筑的面貌。在本书的分析中，作者把所有制度都用经济——所有社会活动的动力之源这一天平来衡量，承认各种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但同时指出：经济压力和随经济压力而来的社会、军事、文化压力保证了只有那些利于经济扩张的制度变化会得到足够物质力量支持。因此最终稳定下来的制度一般是能在既有的外部条件下最大限度发展经济的制度。对历史的观察和对近代社会的人类学观察也验证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方式蔑视任何权威、宗教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用纯粹的物质分析来解释历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解释方法与兽医观察动物的方式并无差别，有辱人类的尊严。其实，人类来自生物界，自然也继承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这种视角没什么好奇怪。我们之所以能用与进化论相类似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人类与海胆、蘑菇或袋鼠一样，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至少到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论断依然适用。但在具体应用这条规律以前，应该要先明确什么算是上层建筑的外部条件和经济基础。

气候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庄稼的收成，庄稼无法象牛羊那样被赶到雨量、土壤和阳光更适于它们生长的地方去，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平均气候来制订种植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任何气候变动几乎都会打乱农民的种植计划，让以往的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作废，给农业文明带来灾难。一般说来，气候变冷带来的灾难更大一些。

长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许多，比如秦汉和隋唐大一统帝国就各自与一个长且稳定的温暖湿润周期相对应。在随后的冷周期内，南方的许多河流经常封冻，让北方的游牧骑兵如履平地。在黄河到海河乃至辽河之间,许多原本繁盛的农业地区都出现了产量急剧下降的问题。这时，原来常设的儒家官僚机构虽然一度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今却成了过分精巧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在动乱中统治成本较低的地方性政治组织和军事体系迅速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下取代了原有制度，这一过程绵延数百年。由于类似的原因，第一个从旧大陆向西去美洲的的移民群体（维京人对冰岛的移民）也在小冰期的作用下从农业社会退化为采集社会。当然，气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做统计分析的话，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变动（趋势是从复杂、统一的结构后退）与气候波动之间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

气候的短期波动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但也可以触发一些历史事件。1815 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曾在大气里散布了太多的粉尘，许多本该射到地面的阳光被反射回宇宙，这导致全球气候短暂下降。温带地区失去了一个夏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骚乱，德国近代第一次全民性的反犹暴动因此而爆发。1982 年墨西哥的火山爆发给苏联随后几年带来的农业歉收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间接因素。没有火山爆发，苏联很可能还会解体，但未必会是在 90 年代初期了。

除了气候，其他的一些非可抗力因素也算外部条件，比如欧洲沿海鱼群分布因为一些人类至今不掌握的规律而变动，曾对近代西欧航海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造成了显著影响。还有一些条件，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确定，比如海陆分布，比如矿产资源的位置。由于没有人或神灵事先给人类设计发展路线，在某个条件没有进入历史以前，人们无从知道它将带来什么后果。以石油为例，在机械工业进步到可以制造内燃机以前，油田存在与否对人类无关紧要的，但一旦人类把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油田的分布与储量就足以对历史发展作出重要影响。当英帝国随意的在中东的土地上为阿拉伯王公们划定国界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半个世纪以后，虽然这些王族的后代依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腐败堕落、乐于内斗，而且没有建立任何象样的自主工业，但他们拥有的石油财富却可以让他们和世界列强坐在一起谈判。既然在石油变的重要起来以前没人知道它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如果石油不存在，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式一定和今天有巨大的不同。石油和其他矿产的性质、数量和位置应当看做随机的外界条件。

与之类似的还有农业物种的分布。美洲存在一些旧大陆没有的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和土豆，这些作物传到旧大陆以后，在整个旧大陆引发了人口爆炸（相对此前的停滞而言）。不过我们在 1400 年同样无法控制或预测航海家将从海洋的另一边带回什么，因此这也算外部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工业化以前，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也应该视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参数。技术进步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进步是一种罕见的随机现象。因为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业与初等手工业，绝对技术水平很低，基本的材料和运用方式都已经在农业时代的开端得到充分尝试，如果不改变技术探索的领域，那么可供探索的空间并不太多。因此，当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技术进步体现为一系列的零散突破，不能在经济或军事领域造成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艰难和可预计的微小收益反过来又压制了人们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的愿望。当然，在某些时期，科学作为满足有闲阶级好奇心的一种工具确实得到了有意识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科学和技术之间并无联系，生产技术的进步只依赖于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运气。

工业革命以前，冶金术发明以后，没有哪项技术能够取得足够的重要性，以至于它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经济部门的大发展，也没有哪项技术可以直接促成其他技术进步。因此大部分技术进步的影响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既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也无法促进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任何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努力，其收益与成本之比都非常低。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不会有意识的鼓励开发新技术，因为那样做基本上等于浪费资源。这种文化特征又反过来加强了技术的停滞倾向。

技术进步本身是偶然现象，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往往被复杂的无效工艺或神秘主义仪式所掩盖。19 世纪英国化工厂把蓝色染料放在铁锅里拼命搅拌，认为搅拌的声音与染

料的质量成正比，并以这种染料获得了高额利润。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只是搅拌时刮下来的铁屑。现代化学出现以后，通过向染料锅中添加铁化合物的方法，德国人李比锡很轻松的抛弃了这道工序。类似的，部分土家族部落通过知道使用抗蛇药草和根据蛇的行动规律来决定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采草药的伤亡，但这些知识是通过一种叫“锁蛇”的神秘仪式表现的，还伴有一些秘密口诀，外人根本无从判别究竟是哪个环节起主导作用。其实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中医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药理，把零散的草药知识总结成书。这些在农业时代很难看清的技术成果让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模仿来学习技术，即便是非常简单的技术。由于技术本身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至多是不拒绝新技术，很难做到有意识的传播。造纸术算是简单而又实用的技术了，但它向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却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象西方向东方刺探丝绸制造技术那样的有意识传播是很罕见的例外。

正如前面指出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口资源比有利的时候科学往往昌盛，但那与技术创新无关。至于技术，技术传播不畅导致许多技术在不适合应用时被放弃，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重新发明。人力成本高的时期技术进步迅速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更可能被广泛利用而得到流传，而不是因为随机出现的创新更多。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在人类刚刚从采集社会转向定居农业社会的那一两千年中，农业和定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新空间，人类的农业技术从 0 开始发展，很快掌握了门槛并不高的大部分农业-手工业技术，技术增长比较快；从这以后，直到到工业革命以前的六七千年间，技术创新始终是个别、零散的现象。同期技术的传播同样是通过无意识的缓慢扩散来进行。由于旧大陆和周围的海洋在地理上的连通性，技术扩散缓慢却不停顿，没有哪个政治组织能够有效的促进或阻止这种扩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技术水平几乎不相上下。

在掌握足够史料并确定标准后，耐心的唯物主义者可以给出农业时代稳定以后的旧大陆文明技术进步与扩散的平均速度。作者并不试图在本书中完成这个工作，前面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从长期来看，把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 1500 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太平洋小岛上因为探险队的到来而产生的迅猛技术进步属于例外）而既然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决定上层建筑的外部背景条件之一。

另外，当某个制度-文化体系因适应了长期不变的经济基础而固化的时候，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也将成为部分上层建筑中短期变化的背景条件。比如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前后的主导制度都是军事贵族+统一教会的松散统治，但对东方的远征消耗了许多人力，尤其是大量消耗资源的贵族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提高了人均生活水平和贵族的财富。贵族们有财力也有精力去为游吟诗人支付薪水，从而带来了骑士文学的黄金时期。骑士文学只是上层建筑的一小部分，其兴亡对整个封建制度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骑士文学的一个固定背景条件，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带来的经济因素则是触发这种文化繁荣的一个原因。后面将要谈到的宗教对政治制度的适应也是类似现象的一个表现。

各种制度和文化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一般来说，取胜的一方往往并不是把所有资源和人力的利用效率都提到极限的制度。那样的制度往往因为内部的不稳定、运行成本过高和无法应付微小变动而迅速崩溃。在历史舞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够使

“稳定”、“高效”、“运行成本低”这三个指标互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的追求某个时段的“高效”。

以东亚盛行的儒家制度为例，儒家主张“不患寡而不均”，“以农为本”，从表面上看压制了经济中较活跃部分的发展，但事实上，这正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存在上限的经济特点。因为土地和资源的总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上限（在几百年的时段内可视为不变）。在农业文明的上升期，允许商人的积极活动，鼓励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商品自由流通固然可以优化短期内的资源配置，让实际产出接近经济上限，甚至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但考虑到工业革命以前社会转移支付的低效，这也意味着经济一旦收缩或波动，将会有人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经济产出上限限制了自由经济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增长，投资的边际收益将在接近经济上限时迅速下降到 0，少量的经济盈余主要体现为粮食和人力的积累——无法长期储存，或用来进行有效投资，更无法在荒年得到有效分配。在丰年时放弃了自己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口将发现自己无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往往破产，卖身为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做奴隶都不可能，只有饿死一途。

具体到某个人类个体而言，在荒年的破产和死亡是无法通过以后丰年的人口增长来弥补的。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民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将不惜铤而走险，愿意挑战一切既有规则，这很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秩序，让大动乱提前到来。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频繁发生的的动乱都会大大降低长期平均经济水平，进而减弱了它的扩张能力和自身的稳定性。儒家制度虽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资源时刻得到最佳配置，但可以保证相对稳定的经济产出，因此与其他农业文明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的东亚农业社会最终塑造出了以儒家官僚为中心的上层建筑。

再以在大部分农业文明中都盛行的世袭制和身份等级制为例，它们的确立和固然有生物保护自己基因的本能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农业时代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传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依据和标准——就每件事而言不一定是最好的标准，但肯定是最无可争议、让交接成本最低的标准。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政治权力的世袭还是财产控制权的世袭，都无法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来掌握这个社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采用贵族制度更是匪夷所思。不过，这是从我们以这个时代的物质条件为出发点的看法。现代社会有先进的通讯手段、有义务教育、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的根本）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可以批量培养并考察，这使社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挑选出比较有能力的人进入上层社会担当较重要的责任，选拔的方式可以作到尽量客观，至少让大多数人无法拒绝这种选拔。而在古代，人们几乎无法考察陌生人的才能，大部分以选“贤”为名的制度最后都因为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无法运行而被放弃，选拔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很难兼得，所以世袭制成了许多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作为贵族的后备军，上层社会的子孙（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往往以嫡长为序）未必能力超群，但起码血缘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制度一旦确立，就不会出现多个候选人互相斗争，引发起内战和分裂的情况，这节约了选拔成本。同时，农业社会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管理，维持稳定是上层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所在，因血缘关系而获得权力或财富的贵族们只要不是太无能，一般也足以应付其责任。因此，等级化和世袭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大特征。

农业时代唯一长期有效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的儒家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名为选贤，但稳定、客观这两个指标依然占了上风。显然，无论是精美的辞赋还是空泛的策论其实都不足以考察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当管理整个社会的能力，但这起码是一个客观标准，起码算是一个智力测验，选拔过程的公正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从而具有了权威性。而中国上层社会相对较小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对其他国家的整个贵族、宗教阶层的权力）也并不要求官僚们具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只要智力中上，在大的决策上不出问题，对中央保持忠诚，乐于维系农业社会的现状就足够了。事实上，持续千年的儒家科举制度在农业社会是一个例外，因为即便是这样一个形式大于真实意义的考试，成本也不是一般农业社会所能承受的（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制度成本）。只有经济规模足够大，足够稳定的农业文明地区才可能把官僚机构的考察成本分摊在整个各个地区，从而把成本降到其他制度以下。一些试图独立建立这套制度的小国都无法避免地方官僚封建贵族化的结局。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要与同类制度进行竞争。相对于政治制度，宗教的创造门槛比较低——任何人都有可能光凭真诚、口才和个人魅力开创一个宗教或教派，所以宗教之间的竞争相对政治制度的竞争还要激烈。不过，一旦宗教制度扩展到一定的规模，无法再凭少数人的真诚与教义的精妙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它必然要与世俗社会打交道。历史无数次向后人证实，那些一味挑战既有的社会制度，拒绝融入世俗社会的宗教早晚要被那些成熟的竞争对手淘汰。具体而言，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在轴心时代前后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几大世界性宗教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比如主张一神论（预防了多神教中的分裂倾向，给了单一上帝无限的权力）、给出一个存在于未来或地球以外的天国（既给了信徒希望，又不对政治力量产生威胁）、建立固定的寺院，允许寺院占有地产（保证了稳定的脱产僧侣的存在）、建立稳定的僧侣等级制度和权力传递制度（利于宗教的统一和控制，及时排斥异己）、与政治力量互相承认，互相为对方的权威提供支持（保证自身的安全）、赞美普通人的劳动和勤勉（不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唾骂偷盗奸淫（维护社会主流秩序）等等。这只能解释为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淘汰了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宗教。从表面上看，宗教是纯粹精神世界的问题，但和政治制度一样，宗教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样要服从物质世界的规律。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作者为了举例，对历史上一些制度在农业社会的适应性进行了分析。但如果读者认为作者在对比各个制度的优劣，那应该是对本文的误读。在这里，作者重申一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不以任何先入为主的道德标准评判一个制度或文化现象。前面的部分只是以客观的态度讨论什么样的制度会在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上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什么样的制度或文化能够稳定的延续，能够有力的扩张或复制到其他地区，能够控制资源并排斥其他制度。胜者未必好，败者未必坏，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好”和“坏”的标准。制度的胜利甚至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生活是否舒适，是否幸福没有关系。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从采集社会向农业城邦的转化就很难说是一个让普通人觉得幸福快乐的过程。

对于这个问题，最客观的说法是：不同文化的世界观不同，“舒适”和“幸福”的定义不存在统一标准，所以人们是否觉得幸福是个伪问题，不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范畴。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普世文明开始形成后，对人类社会进行道德评价才有实际意义。但那已经超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畴了。

四、 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

自从人类告别了采集游猎社会，社会等级就产生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存在等级的社会制度在农业经济基础下更具有竞争力。既然等级制是农业经济基础的结果，那么等级制度自然意味着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等级社会中，一小部分负责管理、协调、保卫整个农业经济的人类利用他们的特权取得了超额的报酬，其余的人口则居于底层，付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来供养上层。由于上文已经谈过的理由，在稳定的阶级社会中，一定存在严格的规则把社会等级固化，世袭化，规定了各个等级的法律地位，并以各种礼仪进行区分，这就是阶级的由来。

不同的阶级显然是不平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上层社会拥有控制社会的技术和国家暴力机器的支持，他们可以占有绝大多数剩余产品。而普通的农民尽管付出了最多汗水，却始终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和耕种，不可能有太多的闲暇和享受。这其中有农业社会剩余产品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低的原因，也有人口无限扩张的趋势（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扩张）吃掉剩余产品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在制度之间的竞争。如前所述，农业社会剩余产品是无法用来进行持续投资的，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 10%，生产上限的存在使再投资效益在不高的水平上就下降为 0。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把大量的剩余产品留在下层，那么这些剩余产品只能作为提高平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品存在，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产出。如果上层社会将剩余产品收缴一空，只给平民留下可以维持生存、生产的物资，虽然降低了平民的生活水平，但也不会对未来的经济水平带来损害（人力和土地都未受损失，技术进步速度的变化微不足道）。上层却可以以更多的资源来维系自身的稳定，向其他的政权、制度所占的空间扩张。因此，在所有稳定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始终保持在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上，由上层社会占有绝大多数剩余产品。（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即便所有的产品平均分配，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农业时代的平民们依然只能在赤贫中生活）

当然，上层社会占有的剩余产品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被上层社会自身消耗掉了，许多财富甚至在征收的过程中就被官吏和底层贵族贪污。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在不剥夺基本生存、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征收的剩余产品越多，整个制度就越稳定，扩张能力越强。因此制度之间的长期竞争有利于尽量多征收剩余产品的制度（但不能征收农民生存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物资）。

这种不平等使所有文明都分裂成两部分。因为剩余产品被征收，世界各地的普通农民（和附属于农业的手工业者）都被迫在生存线上挣扎，为了温饱而日夜劳作。直到工业革命以前，由于整个旧大陆农业地区都以非常相似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世界各地的平民生活（除了美洲移民这种人口资源比特别有利的地方）都非常相象。不过，各地上层社会的的生活方式与运行规律却差异巨大。因为在经济基础相似的情况下，文明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文化上的分化。文化本身是剩余产品的产物，不能直接产出粮食，所以剩余产品的多少决定了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否。上层社会占有了大部分剩余产品，因此有较多的机会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作出自己的选择。今天现代社会继承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半来自农业时代的上层，至于占人口 90%以上的平民的生活，大半早已经被历史湮没了。

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为这一秩序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上层社会拥有军队、警察等常设暴力机关；各种宗教、神话、道德也都把上层社会的统治说成天经地义的事实，暴力和文化的优势都在上层社会一方。由于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责任都在上层社会，因此平民们没有什么组织资源，平时总是保持在一团散沙的状态，少数想挑战既有秩序的人只能凭着运气和强悍去对抗训练有素的军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赌博的结果就是把身家性命赔光。因此大部分底层农民平时还是宁愿过着温饱线上的日子，而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除非连这种日子也过不上。

不过，除了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偶然冲击会引起农业社会变化外，一个表面上稳定的社会自己也会从内部产生破坏性因素。前面曾经指出过人口资源比带来的社会压力会周期性的打击经济，此外，外敌入侵，统治集团的堕落或分裂也都会带来社会动荡和经济产出的下降。当危机到来时，上层阶级或许可以靠积蓄或提高税率来暂时维系奢侈生活，一直生存在温饱线上的农民却只能独自面对破产与死亡的威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下层社会才会放弃一切得过且过的幻想，用暴力破坏甚至试图颠覆整个社会制度，这就是农业社会的阶级战争。在上层社会逐步堕落的年代里积累的怨气和矛盾在阶级战争中转化为仇恨和士气，为了活命而战的农民们无须动员就会参加叛乱，从而使农民们拥有了人力优势，可以与上层社会残余的军事政治组织能力相对抗。

鉴于农民所占的人口比例，他们的造反声势浩大，一旦整个文明区域内的农民同时因社会矛盾起事，他们有很大的的机会消灭旧政权。在动荡年代，他们还会提出各种新奇的设想去代替原有的上层建筑，但他们却无法真正改变这个社会。当动荡结束的时候，原有的上层社会成员可能被替换，部分造反者可能会进入上层社会，但大部分原有的制度还会重新建立，甚至比动荡以前更稳固。原因很简单，经济基础没有变，背景条件没有变，从长期趋势来看，原有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最有竞争力的制度，动荡的原因在于人口过剩或旧制度的失灵，而不是制度本身失去了竞争力。一旦人口过剩问题得到解决，堕落的上层阶级被清除，率先采取成熟旧制度的势力将会取得巨大的经济优势，动荡时期的各种新奇制度将因为没有长久的经济基础而被迅速消灭。

当然，制度也不是毫无变化。如果旧的社会不是因为人口压力、天灾等非可抗因素崩溃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意味着上层社会内部的问题，比如官僚的普遍腐败，贵族阶层的堕落，教士和军事贵族的内斗，失去控制的军官与文官争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上层社会失去了管理能力，导致水利失修、军备废弛、治安混乱，导致社会解体；要么上层社会失去了自我约束能力，横征暴敛到了农民无法活命的地步，激起民变。新来的统治者作为动荡年代的受益者，显然会从前一个时代的崩溃中取得教训，很小心的注意不给新的竞争者以起家的土壤。同时旧的统治集团中堕落无能的部分受到了清洗，不合理的制度细节也会受到修改。与失效的旧制度相对比，新的统治秩序自然会带来新气象。但从制度之间的竞争来看，这种新气象本身不过是某个成熟制度内部的调整，不代表任何“变化”，更不代表任何“进步”。

如果在社会动荡的同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给出了另外一种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可行性，那么阶级冲突可能会给新制度的崛起提供一个机会。但迄今为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工业革命。这种孤立事件事先不可预测，因此不能说阶级冲突一

定会为新制度开辟道路。事实上，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否认历史存在任何命定的方向性。某些长期趋势的存在是客观条件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道德目标，也不存在任何确定无疑的结果（偶然因素太多了，而且不可预知，我们只能用概率来描述历史的趋势）。因此不仅对阶级冲突而言，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能也不应该用“先进-落后”这个标准来衡量。

农业时代并是不只有农业一个经济部门，手工业、商业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作者在前面几章强调农业只是因为种植业的决定性作用。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开始，纯粹的“自然经济”就已经被和与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复杂农业取代了。

最初的手工业包括木匠、冶金业（打造金属农具）、土木业（盖房、筑路、水利）、采矿业（铜、铁、贵金属、食盐）等个体农户无法独立进行的工作。随着农业社会的成熟，许多更专门的行业如武器制造、造船业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农业社会结束。没有这些手工业者，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定居农业社会稳定下来以后，许多工作虽然可以由农户独立完成，如纺织、食品加工（磨米 磨面），但由专业人员完成显然更有效率。只要不是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时期，这也会产生对专业手工业者的需求。

既然有了分工，交换就不可避免。早期的农业城邦还可能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内部计划来解决各个行业的交换问题，但随着农业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独立的行业越来越多，这种计划分配变的越来越不可能。最终手工业者独立经营，通过市场与农民交换产品，这就是最早的大宗商业需求，市场经济就此产生。此外，由于某些自然资源和特产在地理上的分隔，各地生产效率的不同，大部分农业地区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食盐、金属、马匹等重要商品，这是长距离商业存在的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由手工业者自己经营的商业和专事交换的商业得到了繁荣发展。

商人们在繁荣的农业社会中有许多选择，可以经营大宗的经济物资，如粮食、金属、食盐，也可以经营少量的奢侈品，如丝绸与香料；可以乘船和组成商队穿过整个已知世界，也可以就地开店，收购特产；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血管。不过，在不同的地区，商业的地位也不同，这同样可以用背景条件的不同来解释：中国处于大陆东端，又兼人口稠密，经济总量大，商业对社会的影响要相对小一些。而中东在灌溉系统退化以后人口密度低，又有横贯大陆的商路通过，许多小型的文明社区因此能够以纯商业为生。地中海沿岸的欧洲虽然也处于大陆一端，却拥有天然的内陆水道（和众多的半岛），为大宗商品的交换提供了便利，一些沿海工商业城邦因此可以脱离农业腹地而存在（陆地运输大宗商品在铁路出现以前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的都是农业经济本身所必需的工商业。除此之外，由于上层社会征收了过量的剩余产品，他们得以用这些剩余物资来供养一些专门以奢侈品生产和贸易为生的工商业者。这种工商业的根基不深，规模不大（剩余产品毕竟是少数），一旦出现社会动荡，他们是首先被抛弃的对象。不过，由于他们不服务于一般生产，可以不惜时间和资源制作特定商品，他们往往可以创造出一些惊人的奇迹。某些工艺品或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工程可以代表当时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交换的极限水平。

除了商业、手工业，农业时代还有服务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层社会就是提供垄断性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的服务业社会集团，但这里作者不采取这个

说法）。不过，由于大部分平民拥有的剩余产品太少，服务业只在人口资源比比较有利的年代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大多数时间里，服务业也是上层阶级的一种附庸性产业。

在工业革命以前，无论是手工业、商业还是服务业，都具有和农业类似的特征——存在效率极限。熟练的工匠或许可以拥有平常工匠 2 倍的效率，但这种效率却无法通过时间来积累。任何一个学徒都必须从 0 开始学习，师傅的经验或许可以帮他学的快一些，却无法使他突破前辈。偶发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效率，但技术进步一旦扩散完毕，效率进步将再次停滞。其实这和效率的来源有关。在农业社会，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的劳动力、畜力去劳作，并辅以一些无法改造的自然力如风力、水力进行生产。其中风力、水力非人力所能控，只能方便某些地方的居民，无法扩大规模。而农业地区畜力的扩大需要挤占农田种饲料，人力的扩大提高了消费人口基数，都无法以扩大使用规模的方式提高人均资源。这种以人力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上限。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工业革命的时候将详细论述。

土地是不能移动的生产资料，因此农业生产必须分散在广大地区内进行。不能随意集中。而一般的手工业和商业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有降低生产成本或交易成本的可能，就可以向城市、交通枢纽集中。事实上，由于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不存在电报，信息传递速度并不比物资传递速度高多少。为了追求更高的交换效率、更低的交易成本，工商业和物资本身往往过度集中于少数中心都市和港口，在大航海时代则过度集中于核心国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中心比周边地区，比农业地区更“先进”或更“发达”，这只是说明它们的地理位置更适于做物流枢纽，海军能更有效地保证物流安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的繁荣和这种繁荣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

现代社会以工商业、第三产业为基础，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将化石能源 （严格的说是负熵源而不是能量源）引入生产，先是提高了工商业的效率上限，又回头促进了农业效率革命。显然，农业的需求存在上限，而工业品的需求近乎无限，这造就了今天工业远大于农业的产业比例。某些历史研究者学风浮躁，不细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发展路径，一味的以工商业比例和重要性来衡量文明的发展水平，读者当引以为戒。

五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当代社会的主流社会结构，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工业化社会的扩张几乎同步进行，在分析古代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前，必须先弄清资本主义的内涵与特点。

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所谓资本，简单的定义就是经营的本钱，牟取利益的凭借，是用来生钱的钱。如果一笔资金或一批物资（某些情况下还有技术）被用来支付日常生活的开销，那它们不是资本，但如果你用这笔钱或物资或技术来开办店铺、工厂、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以换取利润，那么它们就是资本。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资本的牟利过程为核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大部分资金和物资都是资本，归属于以利润为目标的各个机构，与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或其他经济活动，通过卖出有形或无形的商品来获得利润；而利润除一部分被消费外，大部分加入到资本的行列，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而继续参与经济活动。

鉴于目前社会的的一般看法，必须指出：在本书中，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上一章所述，只要有自由的交换就会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里可能会存在以牟利为动机的资本和资本的经营者，但在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中，更多的参与者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者、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以及简单的卖出好年景剩余产品的农牧民。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牟利，如果能利用市场经济实现这一点，资本当然乐意参与市场交换，但如果用其他方式能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利润，资本也从来不认为市场经济是必需的选择。事实上，资本甚至不认为生产与交换是必然的选择，只要有利润，对资本的正确描述是“不择手段”。

当然，人类社会对财富和利润的最终定义还是能满足人类欲望的消费品，因此资本主义还是要把物质生产-消费作为利润的基础。但随着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化，直接将资金投入生产和商业不一定在所有领域都能获得最大利润，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资本牟利的多种方式：

先是军事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最直观的存在方式就是战争债券乃至战争股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军费的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发售债券解决的，英美拥有过剩资金和物资的资本集团认为日本有能力打赢战争并偿还贷款本息，因此愿意冒风险为这个亚洲国家提供军费。不过，军事资本主义更常见的方式是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资本集团为了利润直接发动战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积极承担这个任务，从英荷战争到布尔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资本集团从来不忌讳用大炮去夺取或保卫利润。

还有政治资本主义，中国人最熟悉的例子应该就是吕不韦对秦国王族的长期投资——“....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不论这段对话是否真实存在，这足以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很清楚资本可以通过干预政治来获取利润。在近代的欧洲，南欧的许多大资本集团在失去商业霸权后也以向北方的政权贷款为利润来源，当然，资本与政治结合最紧密的年代还是今天的世界，这一点在后面几章还将进一步分析。

最传统的行业——农业也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载体。在美国的拓荒时代，农民们一路向西，开辟出新的农场卖给后来的移民。拿到现金后他们再次向西拓荒，购买新的土地做农场，如此循环，直到太平洋才停止，这是农业资本主义。读者还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宗教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至于常见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已经为大家所熟知，这里不再多说。前面已经指出资本为了利润可以不择手段，这里详细列举了几种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只是想帮助读者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要把资本主义的概念局限于工厂与商铺。

利润加入资本是利润增加的必然前提和重要方式，因为利润率的提高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扩大资本，利润的绝对数额就无法持续增长。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要求生产、经营的规模必须不断扩大。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种扩张完全可行，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用于投资的物资和人力越来越多。在前面我们有过结论，在稳定的农业社会里，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生产上限，无论你对任何行业投资，回报率随着投资规模的增加都会迅速减少到 0，因此农业社会肯定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良好土壤。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

作者可以认为：在农业社会里，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只存在于那些存在生产扩张空间的局部地区或领域。事实也正是如此，农业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就是通常称为古代资本主义的现象。那里也有不断的再投资和扩张、有雇佣，有剥削，（可能对农业、商业或手工业），但一旦扩张碰到了人力和资源决定的上限，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远一点的例子我们可以以看迦太基商团、徽商的经营，在近代社会里，美国农民在中西部的扩张也和现代工业技术没多大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张空间。

在农业社会里，一旦经济增长碰到了物质条件给定的边界，资本主义这种天生要扩张的制度将如何呢？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专门用于开拓市场、扩大生产能力、选择再投资方向的人员、机构、物资都成了累赘，因为任何增加利润的努力都不会有回报。由于存在巨大的多余运行成本，根据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制度之间的竞争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会消亡，取代它的将是那些原本就适应了停滞农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就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农业社会的那些制度。规模和交换方式都趋于稳定的商业交换也将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变成纯粹的市场经济或指令性交换。（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的稳定甚至会减少那些本来因混乱而产生的畸形商业，比如奴隶贸易和灾荒年间的粮食囤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资本主义的建立视为“进步”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退化”为政治结构和市场经济。这正是所有古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具体过程将在后面几章进行分析）在给某些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的同时还通过先进的交通方式把其他地区变为发达地区的市场。这给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资本主义作为农业社会中一种适应不断扩张的制度，在发达地区迅速取代了所有其他制度。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不仅巨大，而且连续不断，这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1 个多世纪中没有碰到绝对边界，因此资本主义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制度。这种制度革命是符合前面几章提到的制度塑造规律的，资本主义的兴盛应当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

在前面，作者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取得主流地位以前，任何社会分配财富的方式都非常不平等。这是客观条件竞争的结果，不受任何道德判断的影响（倒是分配方式常常影响道德本身），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也是如此。既然资本主义的生存基础是扩张，利润增长也依赖于扩张，那么能主导扩张的人显然要在利润分配中占上风。比如：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如果 A 拥有某种特殊机器（或技术，或特殊的物资、通行权）从而可以降低某项生产的成本（也可以是生产、贩卖某种别人生产不了的东西，这意味着别人的经营成本是无限大），那么他可以用这种机器开办企业，赢得大量利润。如果他的机器可以复制，那么他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扩张，不断的把利润加入资本，因为他拥有别人不具有的扩张空间。根据前面的推理，当他的企业（以及可能存在的竞争者）占有所有的同类商品市场时，扩张会终止，但我们这里只考察扩张中的利润分配。在这种资本主义扩张中，他所雇佣的人力来自他的生产体系以外，只要他能支付的工资等于新技术引入以前的平均工资（或者说人力成本），他就可以进行生产。这样，利润全部归于 A，更确切的说法是全部归于资本，具体是谁拥有资本并不重要。在这里,资本的定义显然并不限于金钱，无论是技术、特许权、还是土地，凡是相对稀缺，能够与劳动力结合带来利润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充当资本。

当然，A 的企业可能会因为雇佣过多的人力造成这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上涨，但如果 A 的企业规模不大，从其他地区涌入的劳动力可以迅速把工资降低到原来的水

平。即便 A 的产业会影响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劳动力供需，只要 A 的利润来源于他的特殊机器或权利（不一定要垄断，是稀缺品即可），那么他也将获得工资提高后利润的全部。某些读者可能会抗议说这只考虑了一个因垄断而不平衡的市场状态，但正如对市场交换分析的很透彻的西方经济学所指出：一个因完全竞争而平衡的市场的利润率为 0。资本主义是不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上存在的，达到稳定态的经济会用市场经济消灭资本主义。

利润将被那些拥有资本（生产稀缺要素）的人或社会集团获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剥削”。被雇佣者和资本共同完成了生产，而利润却与劳动力无关（除非稀缺生产要素，比如技术，和劳动力共同出卖）。许多人认为这很不公平，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买卖自由，非常公平。唯物主义历史观里并不包括公平与否的问题，作者只想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分配制度都是客观物质条件的结果。工人如果建立工会，用打断生产停滞的威胁来阻止其他廉价劳动力的竞争，那么他们可以分享到利润；如果他们建立政权，将资本公有化，他们可以占有全部利润，当然这两种方式都与当今主流资本主义水火不容。

无论你如何理解剥削，少数人占有全部或大部分利润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客观存在。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生产过剩。在所有的利润都通过出卖商品得到时，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往往无法由其内部成员购买所有商品。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利润的定义式就是利润=商品的价格-工资-其他成本。把等式稍做变换，我们可以得到：利润+工资=商品的价格-其他成本，这一等式对任何一企业都成立，自然对整个经济体系也成立。显然，造出来的商品除了一部分用来维系生产，也就是填补“其他成本”外，必须用全部工资和利润来购买才能买光。作为工人，把全部工资都用来消费是很合理的，但占有利润的阶层（可能是资本家、官僚或贵族），一般不会把 100%的收入都用于消费，这就意味着有些商品必须在资本主义以外找到销路，才能保证不出现商品过剩，因此，资本主义必须在自身之外找到购买力。

当外部市场无法扩大或不存在外部市场的时候，比如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到全世界,或交通问题断绝了外部市场与产业中心的联系。资本主义只有 3 种选择：要么由占有利润的富裕阶层买下所有商品，以奢侈消费消耗掉过剩生产力；要么用多余的商品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还有一种畸形选择就是销毁过剩商品，解雇工人，减少商品生产能力。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少数人聚敛的财富过多，第一种情况很少出现，因为这样做的富裕阶层会被乐于投资的同行淘汰；第二种情况可以用一种看起来过的去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把今天的问题推到了明天。因为被扩大的生产能力继续被少数人占有，会在未来制造更多的过剩；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因此，不断寻求外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需，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规律。另外，技术进步也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商品过剩问题，后面也将谈到这个问题。

本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定义可能与以往的许多定义不尽一致，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定义只在本书内部使用，以简化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并不与其他的定义混用。如果换一个名词来命名这种以扩张为唯一目标的制度，也不会影响后面的讨论。至于某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只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以今天的道德标准评判起来比较“好”的部分是资本主义，或者把一切现代社会的优点都赋予资本主义，这种以道德和个人好恶来给历史概念下定义的方式是和本书前半部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冲突的，作者在此忽视这种无聊的讨论。

六 、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扩张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作者反复强调工业革命的历史重要性，认为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不过，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大部分历史学研究者看来，工业革命远没有那么重要。一般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自 16 世纪以来扩张过程的一部分，或者认为工业革命是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独立的历史事件。考虑到现实中一些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他们这种看法确实可以理解。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末期，在这以前，欧洲已经早就摆脱了穷乡僻壤的地位，它的海军控制了各大海洋，它的商业网络伸展到大半个世界，它的殖民者征服了数块空白的大陆（美洲、大洋洲）。一个人口稠密的旧大陆文明（印度）即将彻底落入西欧人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革命虽然依然是个重要事件，但看起来更象是锦上添花式的发展，而不是根本性转变。

这种观点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历史细节和深层运行方式分析不细，习惯性的把表层相似的事件归为一类。从表面上看，西欧文明及其派生的美国-俄罗斯等文明确实存在一个 16 世纪到 20 世纪的连续扩张过程，但如果仔细研究扩张力量的来源，你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前后的扩张存在巨大区别。打个比方，企鹅的形体看起来和鱼非常类似，甚至还有一双与鱼类非常相似的鳍，但如果认真研究生物进化史，你会发现那其实是一对翅膀，从鸟类祖先那里继承的翅膀——外观上的相似并不一定意味着来源和结构的相似。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将欧洲列为旧大陆适于农耕的主要地区之一。不过，在古典文明时期，现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如德国、法国北部、英国、比利时等地区的开发程度非常低，主要的农业文明地区都集中在地中海盆地。当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混乱结束以后，农业人口开始逐步向北方扩张。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相似的事件，汉朝解体后南方湿润地区持续的被开发或许可以与之相比。在一个稳固的农业地区，可开垦土地的增长意味着生产上限的提高，欧洲北方的被开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代，但欧洲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种增长遭到了相对其他文明地区更多的压制。

亚欧大陆中心的干旱地区有一个重要特征——越向西，水源和肥沃的草场就越多，这一特征的形成与贯穿北半球温带大陆地区的西风带有重要关系。西风带携带着水蒸气从大西洋向内陆进发，一路上不断的通过降雨释放水蒸气，最终耗尽。于是沿途地区的降水量明显呈西多东少的局面。这个受西风带影响的干旱地区从东欧一直延伸到中国的长城，在东部与季风气候下的半湿润地区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相对西部而言），在西部则在东欧逐步过渡为适于农耕的湿润地区。这一特征使大草原上的牧民部落(包括草原西端的半农半牧部落)天生有自东而西的迁移趋势，只要中国和中东地区的文明政权还能作出有效的抵抗，牧民就会下意识的向西迁徙以释放过剩人口。

严酷的干旱草原环境迫使东部牧民们建立起较大、较严格的政治-经济组织以领导牧民们在冬季牧场与夏季牧场间往返，领导牧民们应对更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西方的邻居相比,东部牧民驯养的马匹也更有耐力，能够在长距离迁徙中保持力量。强有力的组织和坚韧的马群使他们在向西迁徙的路上所向披靡，被夺走牧场的西方牧民只好继续向西或向南进攻，试图从更软弱的邻居身上得到补偿，欧洲就是这种侵略浪潮的终点。再加上周围偏

僻地区的非游牧蛮族（比如北欧维京人，与中国的女真族类似）入侵，欧洲农业地区的安全情况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所有农业地区最差的。这种政治条件导致了欧洲在古典文明结束以后，始终不能出现稳定的农业文明。文明在胚胎中就被蛮族入侵消灭，或因抵御蛮族入侵耗尽了活力，大半个欧洲由无知的地方军事贵族统治着，因为他们至少可以保证城堡附近的庄稼会安全的被收割。文化和科技方面的发展陷入停滞。所谓“黑暗中世纪”就是指这个时代。

从 10 世纪开始，欧洲农业地区的经济力量逐渐开始压倒蛮族的入侵浪潮，在外来侵略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原来在各个地方军事力量保护半径外的空地成了新的资源，欧洲开始了一次“内部扩张”，人口资源比变的有利起来。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意味着一个繁荣时期的到来，直到人口增长使资源再次紧张。不过，欧洲这种“正常”的循环在达到生产上限以前曾被两个偶然事件所打断——十字军运动和黑死病。

十字军运动、黑死病和通常因人口过剩而产生的动荡有一个共同特征——减少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十字军运动是向外输出压力，让过剩的军事贵族到万里之外亡命，在夺取财富的同时和平地减轻了社会的人口压力；黑死病则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无差别的屠杀各个阶层的人口，一旦灾难过去，社会可以很快恢复正常。这两个减少人口的事件并不需要社会付出太大的代价（如内战、长时间的割据，基础设施被破坏等等），社会可以在保持原来科技、文化成果的前提下提高人均资源量，从而让繁荣年代持续下去，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内部扩张，其时间远长于一般的繁荣周期。

在繁荣年代，科学和有效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迅速扩张，人均生活水平（具体而言就是食物质量、人均寿命、人均纺织品等等）上升，政治结构开始复杂化，资本主义有了用武之地.........欧洲因为偶然原因的影响，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上升周期，这抵偿了历次蛮族入侵带来的停滞和衰落，使欧洲（确切的说是西欧和南欧，东欧始终未能从频繁的游牧民袭击中恢复过来）在 15 世纪达到了与其他主要农业文明差不多的经济、文化、技术水平。

漫长的扩张年代还给欧洲留下了另外一个遗产——一个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其实任何文明在人口资源比有利的上升阶段都会有这种现象，只是欧洲这一次的扩张时间要长的多，因此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或社会结构与大部分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相比更适合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也在这个社会中萌芽、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甚至开始尝试着挑战军事贵族的传统权力。不过，由于经济总量和剩余产品持续增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分享经济增量的方式去化解，所以统治集团的总体趋势是各个集团合流，并持续扩张。

进入 15 世纪后，西欧内部的扩张再次接近极限，但习惯于扩张的上层建筑依然保持着它的运行惯性，试图不断的在持续增长的经济基础上扩大自身的规模，这就需要得到新的资源。然而，欧洲附近地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占。阿拉伯势力已被赶出西班牙半岛，北非在灌溉系统被柏柏尔人破坏以后，土地退化，油水不大，东面是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直到 1683 年还能以装备了近代火器的军队围困维也纳，难以挑战。于是过剩的人力开始向海外寻求发展，开拓商路、寻求空白的拓殖地区或可奴役的弱小的民族。

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海外扩张上具有相当的优势。欧洲的主要农业地区被夹在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两个深入内陆的海域之间，在无法测量经度和对抗风暴的年代，内海航行的安全性远远高于在开放的外海或大洋上航行，这使欧洲人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就可以享受到海运的便利，从而为未来的大洋航行在技术、文化、人力上都提供了基础。从欧洲内部近代航海国家分布来看，这一优势不可忽略。比如说，最早、最关键的几次航海发现都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队取得，正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这一有利条件为这两个国家的远洋探险提供了基础。再以发现美洲为例，领导者哥伦布来自地中海航运中心意大利，然后从内外海交界处的西班牙政府得到远洋探险经费来远航，这充分说明了内海的存在对远洋探险的意义。至于其他文明，中东虽然也有内海，但与主要农业地区接近的内海（黑海、东地中海）并不与大洋直接连通；东南亚农业地区主要分布于半岛和群岛，但在雨林包围之下，其技术水平与几个处于温带的主要文明尚有差距。因此，在 1500 年前后，从社会基础来看，欧洲是最容易走上远洋扩张方式的文明。

欧洲的航海技术也受益于整个旧大陆缓慢提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拥有来自中国、中东、印度等各个文明的航海仪器、测量仪器和天文-数学知识，还有在各个海域锤炼过无数次的帆具。那个时候并没有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说法，技术传播缓慢却不停顿。如果以世纪为时间单位，在工业革命以前各个文明体系可以共享差不多的技术。虽然在农业文明时期旧大陆各个文明都可以在海外探险时用上当时差不多最先进的技术，但从长期来看技术水平确实在提高。当时的欧洲探险者与几百或数千年前的同行不同，拥有可以横跨大洋并返回的船只，以及能够向后来者精确描述路线的绘图、测量技术。而希腊人、阿拉伯人在他们拥有海外扩张欲望的年代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西欧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它的宏观地理位置。拿起一个地球仪（注意不能是平面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全部可定居的陆地的中心位置就在西欧沿海（海洋的中心差不多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干旱地区），而从旧大陆主要文明地区前往新大陆的富饶地区（对于无计划的探险来说，到达贫瘠地区是没有意义的，不会促进进一步的探索），最方便的路线就是从西欧西进。当然，当时的西欧航海人员并不知道这些优势，但由于地球的大陆分布状态，没有人会有意识的去搜索一块肥沃的新大陆，也不会有人预先知道是否存在一条绕过非洲去印度的航线，所有的海外探险都是赌博。在这场赌博中，如果说欧洲只需要用 3 个骰子掷出 12 点就能胜利的话，其他文明至少要 16 点或 18 点。因此尽管是无意识的下注，欧洲的赢面要大的多。

在 1500 年前后，以造船业技术水平、投入航海的资源等方面而论，欧洲在航海探险竞赛中只是略有优势，但由于地理位置等一些随机因素，欧洲率先发现了绕过非洲的航线和美洲大陆。不过，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建立在连续数百年扩张性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 1500 年前后，欧洲的整个上层阶级已经形成了强大扩张的惯性，这种惯性是其他始终处于人口-资源循环中的文明在这一时期所不具备的。同时，欧洲农业在很长的时间内能够提供高比例的剩余粮食，养活了大量的工商业者，一旦扩张停滞，这些工商业者和他们提供非农业产品立刻就显得过剩，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因此，本来处在衰退前夜的欧洲一旦取得海上优势，体制的压力就促使它迅速的把这种地理发现转化为经济利益，进而保持了扩张状态下技术和文化的繁荣，保证了非农产业和上层社会的持续扩张。欧洲航海技术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发展到了手工制造业所能达到的上限，这反过来又巩固了欧洲的海上优势。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具体而言，大航海时代对欧洲经济有 4 个重要影响：

第一个是欧洲商人和海军掌握了工业时代以前的主要商业物流渠道。

当欧洲的帆船进入印度洋、发现新大陆时，中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海外探索计划。而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延伸到印度的第二代伊斯兰教诸帝国刚刚把突厥蛮族的冲击力和火器与农业文明的经济优势融为一体，势力如日中天，又占据了旧大陆农业地区的中心位置，满足于扩大陆地商路及沿海贸易的利润和巩固陆地上的扩张，对大洋上的扩张并无太大兴趣。至于比较落后且不统一的东南亚文明，实在没有实力与欧洲人在海上对抗。因此葡萄牙人和随后而来的西欧所有国家的船队很轻松的用野蛮手段获得了海上霸权——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大，仅仅是因为有能力对抗他们的文明暂时不需要海外扩张，而愿意作战的对手又太弱。

掌握商业渠道意味着西欧商人可以享受许多垄断性利润，刺激了对航海投入的增加，更多的探险家和水手加入商业冒险，更多、更好的舰队被建立起来，这巩固了西欧的海上霸权，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利润的增加。不过，光是掌握海上交通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大陆立足点，并不足以让欧洲获得根本性利益。因为与旧大陆那些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文明相比，欧洲的手工业并不占优势，也没有多少过剩物资可出口，因此，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暂时还无法通过自己的贸易渠道和平卖出大宗商品。至于以海盗方式野蛮抢掠的物资，毕竟是少数。欧洲早期的和平贸易限于奢侈品贸易，而且主要以进口为主（当然，他们可以在通货不足的时候选择不买，这也勉强算个好处）。这样的贸易确实可以改变欧洲内部的资源分布，促进远洋商业，甚至释放一些过剩人口（葡萄牙霸权最强大的那几年 从本土出发的船 能到远东的只有 67% 船员损耗超过 50%），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给欧洲的经济或平民带来多大的益处，它的最大作用是为另外的几个重要影响提供了条件。

第二个影响是他们可以从容选择弱小的文明进行征服，同时与强大的农业文明保持和平接触。

光掌握海上运输线并不能让当时欧洲军事贵族-资本家的联盟感到满意，因为从纯粹的物资流来看，欧洲只是从海外运回了一些珍贵的奢侈品，却要为此付出贵金属和大量人力物力。掌握远洋贸易的集团发了大财，但既然没有在欧洲以外得到真正的经济物资或通货，他们的富强必然要以其他统治集团的衰落为代价，这会使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因此，暂时无力在和平贸易中获得真正利益的欧洲人必须用其他手段来实现真正的扩张与剥削。否则必然会困于内部冲突。

军事扩张显然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过，即便远洋海运大大降低了跨文明区域军事行动的成本，即便海上霸权带来了很大的机动性优势，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最多也只能支持万人左右的海外远征军，这种人力上的绝对劣势限制了他们的野心。好在海军的优势使他们不必担心报复，可以对各个文明进行试探性进攻，然后选择弱小的的发起征服。第一个牺牲品就是衰弱的印度。

印度是几个主要农业文明中唯一不与亚洲中部大草原直接接壤的，除了几个容易防御的山口外，印度被青藏高原和沙漠、大海严密的保护起来，不必时刻承受游牧蛮族的军事压力。因此，各个农业社区不必结成统一帝国、筹划对北方蛮族的边防也能存活。这使得印度文明投入军事方面的资源相对比例较低。不过，没有经常性的入侵威胁不意味着永久的安全，由于印度的军事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相对比较差，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不断

的有文明化或半文明化的军事集团从西北方向入侵印度。据我们所知，第一个是带来印度教的雅利安人，最出名的则是亚历山大远征军，莫卧儿帝国就是由这些冒险集团里的最后一个建立的。如果没有经常性的外部压力，非本土化的军事集团堕落非常快，莫卧儿帝国也不例外。到了 17 世纪中叶，莫卧儿帝国已经四分五裂，衰弱不堪，无力维系秩序。印度次大陆因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而衰弱不堪，暂时成为欧亚大陆最弱的一个文明，事实上已经处于下一次大入侵的前夜。就在这时，欧洲人乘虚而入，迅速的在经济上控制了这块人口众多的大陆，并逐步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

以往印度的征服者是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军事冒险家，或是已经接受了中亚文明影响的半蛮族部落。它们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上层社会集团，征服印度后满足于消灭原有的上层社会，但大体上维系原有制度不变，以征收剩余产品的方式来收取自己的“利润”。西欧的征服则是另外一个发达农业文明通过少量前哨站对整个次大陆的经济征服。新的征服者是商人，除了通过几次短促的战争掠夺一些财富外，它们在本土的压力下，迫切需要用新的经济手段牟取长期利润，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不平等关税。这些商人兼军官利用手中的商业渠道和暴力强行为印度与西欧之间的贸易指定了关税，来自欧洲的产品进入印度的税率保持在个位数甚至为 0，国内的政府还要给商人担保和奖励。而印度商品进入英国和欧洲的税率被抬到不可理喻的 70%甚至更多。当英国人发现自己薄弱的纺织业在关税保护下依然不成气候时，干脆在 1700 年制定法律禁止在国内销售印度棉布。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印度不择手段的为自己的商品打开销路，在英国独占印度的控制权后更是如此。

由于西欧人占有海上商业渠道，而且在印度次大陆取得了军事霸权，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贸易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印度繁荣了数千年的手工业与商业在 1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即告衰落。以往农业社会经济基础在和平状态下发生这种转变一般需要上千年，以这个标准，印度工商业的衰落几乎算的上是一瞬间的事情。农业社会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行把人口重新分配到农业，也无法通过转移支付解决问题，于是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因失业而饿死。当工业时代到来后，许多繁荣的市镇因为远方机器的竞争而变成废墟，白骨蔽野。印度剩余的农矿业人口被迫向欧洲购买商品，向外输出粮食和贵金属。

通过这种方式，西欧（尤其是英国）在手工业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一般观点是劣势）为自己开辟了数亿人口的倾销市场，并从这个大市场中获得了高昂的利润，为自己已经过剩的非农产业找到了出路，工商业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这不仅意味着眼下的繁荣，在不久的未来还是工业革命的重要诱发和保障因素，只是没有人可以预知这一点。

除了印度，还有部分非洲沿海地区、美洲自发形成的殖民地、美洲、非洲原有的文明以及亚洲其他主要文明的一些边缘地区屈服于西欧的军事讨伐，被迫接受欧洲的不平等贸易。这倒不是因为西欧这时就拥有了天下无敌的武力，而是由于旧大陆几个主要农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技术发展水平远胜于其他地区，在军事上更是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西欧这一时期的军事水平并不是旧大陆最突出的，却是旧大陆唯一有能力且有意愿把正规军投放海外的地区。所以那些在军事上软弱的地区尽入西欧人之手，印度的工商业被摧毁，非洲则在奴隶贸易中损失了 1 亿人口，美洲和东南亚某些地区的文明更是被连根拔起，它们以自身的生存为代价，为欧洲的发展做了垫脚石。

同时被西欧作为经济殖民地的还有以二次农奴化为代价的东欧，不过，即便欧洲没有海外开拓，在西欧进入扩张期后，落后的东欧也会暂时的从属于西欧，所以这倒不能算是大航海时代的直接结果。

第三个是海外贵金属矿藏的发掘。

前面说过，在西欧取得海上控制权的早期，西欧还没有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相称的手工业，因而必须先消灭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工商业，或是等待空白的新大陆殖民地产生足够的购买力，才可能通过卖出商品来获得利润。而这需要时间。在这以前，欧洲的海上控制权只能用来与旧大陆的陆上商路竞争，赚一点转手利润。

海上商路的畅通不仅把落后地区暴露在欧洲的攻击之下，也把欧洲与那些更古老、工商业更发达的文明连接起来。即便有关税壁垒的保护，欧洲相对落后的非农产业依然遇到了强劲的竞争，欧洲消费者乐于用自己的贵金属和初级产品去东方换取精美的商品。他们毕竟只控制了印度，中国、波斯、土耳其、日本等国家的强大和富饶是西欧暂时无法比拟的。在工业革命以前，如果没有足够的支付手段，欧洲至多可以通过海上优势保护自己不成为经济殖民地，通过工商业超越其他文明还需要长期的积累。

就在欧洲苦于通货外流时，他们在美洲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金银矿。由于可以随意的把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本土的破产农民赶入矿井，这成了西欧统治集团的一笔天外横财。在大航海时代的早期，美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的从拉丁美洲运往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本土，分散到整个西欧，再由东行的商船运向中国、印度或者奥斯曼帝国，从而使欧洲可以保持与东方的贸易平衡。鉴于美洲贵金属对西欧（尤其是西班牙）社会的重要性，西欧对殖民地本土势力从美洲直接贩运贵金属到远东的行为一直是严厉打击的。

西欧最终打垮了印度本土工商业，通过工业革命和毒品贸易解决了对中国的出超问题，还从奴隶贸易中获益非浅，但在这以前，美洲的贵金属是唯一能够维系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东西。如果没有美洲的贵金属提供对内和对外的购买力，欧洲的手工业无疑会受到严重的压制，进行海外贸易的兴趣会比历史上低的多，海军和海外贸易网络的规模可能不及真实历史中一个零头。从欧洲内部来说，如果没有美洲贵金属流入，一个只会从本土搜集水手和通货，从海外运回制成品的商业集团必然会受到主流本土势力的排斥，因为这个海外商业集团是东方发达农业文明的“买办”。无论是从欧洲当时的角度去观察，还是考虑手工业水平进步和海外贸易网络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美洲贵金属对西欧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影响是最重要的——美洲、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空白”可开发土地被西欧占有。彻底改变了西欧文明的人口-资源比。

由于欧亚大陆文明相对其他陆地的绝对技术-军事优势，西欧人征服那些海外领土要比征服印度容易的多。南美洲数千万人口的印加帝国、中美洲尚武的阿兹特克，都被欧洲规模很小的军事探险队打的落花流水，至于北美洲、澳大利亚那些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始部落更是只有被屠杀的份。落后地区的人口先是在军事上被征服，然后是由传染病无意识的屠杀（人口稠密地区的人类对传染病的免疫力要强的多，携带的病菌病毒也更多），最后是被殖民者残酷的奴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本来就低于旧大陆，经此磨难，几乎彻底变成了空白地区，可以让西欧殖民者随心所欲的开垦。

人类社会在此前从未有哪个文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之多的土地资源。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当人均可利用自然资源上升时，社会将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人均收入、劳动力价格、肉食比例、技术进步速度、文化繁荣程度在这个时期都会上升，西欧发生的事实正是如此。不过，与金银矿产或贸易利润不同，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产生决定性作用要在发现美洲 2 个世纪以后。

由于农业文明几千年发展的惯性和早期航海的高风险性，起初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新大陆的意义，向海外释放人口和从海外得到自然资源以抵消本土环境压力的过程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规模。在这以前，美洲和大洋洲的经济意义还不如几个热带岛屿（金银矿除外），社会意义限于当做免费的监狱，只有罪犯、异端、少数教派、赤贫者等生活不如意的人才愿意永久迁居新领土，18 世纪中期，自然资源远超过欧洲的北美洲仅有 200 万人口。

17 世纪以后，即便有海外贸易的贴补，欧洲的人口还是给环境造成了沉重压力。连续的经济衰退横扫欧洲，饥荒开始在局部地区出现，这迫使西欧人开始大规模向美洲移民。而已经到达美洲的移民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迅速繁衍，人口增长率远高于他们在欧洲的同胞。这种人口分布的变化给掌握海外商路的西欧带来了两个后果。

先是本土人口压力的减轻，减轻了欧洲本土的环境压力和社会压力，其原因在前面谈到人口-资源比所引发的农业社会发展周期时已经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如果要看例子的话，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爱尔兰，一个在二战前始终未能进入工业时代的小国，在几百年间向海外移民 600 多万。同期有 150 万人死于灾荒，这还是在美洲高产作物——土豆充分种植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欧洲不通过海外移民释放人口，那么激烈的生存斗争随时会在一个充满过剩人口的欧洲发生，那些无法获得海外贸易利润的偏僻角落一定会以传统的的战争方式去争夺资源。移民人口主要以赤贫者为主，还有大量少数教派，他们是社会危机的火药桶和打火石，正是因为卸去了这些危险力量，欧洲才得以轻松的走向工业革命，而不是陷入以往农业文明的周期循环。

欧洲的殖民地接纳了本土的过剩人口，这些人力与殖民地的广阔天地相结合，生产了大量过剩粮食，不仅可以支持殖民地人口的快速增长，还可以向欧洲出口。而工商业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产业在殖民地的发展尚需时间，于是欧洲可以很轻松的用手工业产品换取大量的过剩粮食，继续保持本土高比例的非农产业和繁荣的经济。殖民地还出口大量的棉花、油料、食糖等初级产品，它们一样要占用口粮田，因此与出口剩余粮食的效果是一样的。控制殖民地的西欧国家在这种贸易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制订政策禁止殖民地发展自主的工商业，限制殖民地向其他地区出口初级原料和粮食。除了农产品，新大陆还有大片的无人地带，西欧从中获得了木材、矿石、兽皮、鱼干等重要物资而无须进一步破坏本土环境，避免了环境灾难。总而言之，海运的便利使西欧可以利用海外资源来促进自己的繁荣。

西欧先因为游牧民族的迁徙倾向经历了数百年以地方性军事贵族为基础的“黑暗时代”，然后又因为发展惯性和恰当的地理条件进入了长期的繁荣时期。虽然农业时代的经济波动有限，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脱节，最重要的矛盾就在于黑暗时代的地方军事贵族在这个时期成为了无用的累赘。海外扩张比较顺利的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可以释放部分矛盾，通过低烈度的内战和革命修正制度，法国和德国等偏重大陆利益的国

家却只能从内部解决问题。德国的发展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让原有的军事贵族保持其地位，并为此付出了分裂和军国主义的代价；法国则爆发了欧洲烈度最大的革命，余波回荡了近一个世纪，旧贵族阶层在革命和内战中退出历史舞台，但法国永远失去了建立世界帝国的机会。在大航海时代这个可以让军事力量在海外释放社会矛盾的年代，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北欧国家相对其他地区付出了更小的转型成本。

从十字军时代到黑死病再到文艺复兴，西欧从连续蛮族入侵的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文明地区，这一时期欧洲的发展与旧大陆大部分文明的循环式发展没什么区别。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 3 个世纪，西欧文明控制了大量殖民地，征服了一个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人均财富与其他地区拉开了差距，手工业水平和军事技术也有明显提高，科学文化进步很快。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欧洲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发展时机进行了海外扩张，而且很幸运的位于一个很方便进行海外扩张的地点。因此西欧文明能够利用那些人类从未想到过的富饶土地，随意的选择其他古老文明的薄弱点发动进攻，从而暂时摆脱了旧大陆农业文明的旧发展模式。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欧洲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地区，不过，这时的欧洲还远不是世界的主宰。

1780 年，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欧洲以海权和过剩资源为基础的繁荣时代结束了（欧洲即将进入另一个繁荣时代，但原因不同），欧洲从未享有过如此的繁荣。不过，就在不久前的 1683 年，奥斯曼土耳其还有能力围攻维也纳，并在随后的 1 个多世纪里与欧洲强权正面对抗。尽管西欧人终于开始控制印度内地，但他们在其他强大文明的势力内，最多只拥有一些小小的贸易站，而即便是这些贸易站的存在也要依赖于那些古老文明的允许。这说明欧洲的胜利还远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引用斯塔夫理阿诺斯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状况："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六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地区，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到此为止，本书为 1780 年之前的世界史做出了一个粗糙的总结。假如回到 1780 年，除去作者大脑中关于未来历史和科技进步的记忆，让作者对未来进行预测，作者可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海运能力的上升，空白大陆将陆续得到开发，世界人口将继续扩张，直到把整个地球的可开垦土地都用完。同时欧洲领跑世界的基础只是并不太超前的航海技术和海外领土，我预计其他文明会随后仿效欧洲的发展模式。随着各地定居人口的增加和恢复，欧洲海外领土的工商业发展是无法阻止的，随着人口和实力的增长，他们会摆脱欧洲的控制，利用自己的资源发展成强大的农业文明。因为粮食供应充足，世界人口增长会很快，在人口再次过剩时发生动荡。在未来的动荡中，使用风帆战舰和火炮的海军将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个人的社会理想在这样的世界上依然要向残酷的现实低头......根据本书前面所总结的那些历史规律，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些结果。

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上，1780 之后的 2 个世纪内，世界经济会有突飞猛进的增长，速度超出农业原有增长速度数个数量级；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会征服包括最强大的农业文明在内的全世界；而即便在欧洲人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后，他们依然

会在欧洲本土发动 2 次规模空前的大战，屠杀掉数千万人口，彻底失去世界中心的地位；残酷的世界大战会催生打破历史规律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工业革命。

由于工业革命的存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的历史规律无法用来推测以后的发展，甚至无法确定这个规律本身是否还会存在。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说，工业革命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无法预计的事件，下面一章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论述。

七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定居农业社会出现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历史事件。以作者的想象力而论，很可能今后 1000 年内也不会再有能与之相比的经济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的物理基础。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必须从物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入手，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分析经济活动。

生物生存需要消耗什么？大部分人会想到空气、水、食物、空间等必需品。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没有被真正消耗。物质不灭定律规定了氧气、水和食物的原子只是经过生物的身体，以另外一种组合方式被排出体外；即便有一部分留在生物体内成为生物的组成部分，这些物质也会在生物死后被分解，返回自然界，因此，物质无法被消耗。至于空间，对人类而言不生不灭，自然也不会被生物永久占用。

物质和空间都不会被真正消耗，那么能量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候选答案。食物在生物的身体里被氧化，放出化学能，供生物日常们消耗和制造下一代。生物排出的物质要比吃进的食物少了不少化学能。要把生物排出的各种原子重新组合成原来的食物、水和氧气，无论是通过自然生物生长过程（如把粪肥送到田里，动物的尸体在野外腐烂）还是工厂式循环（目前限于航天项目实验）都必须与其他能量相结合（太阳能或化石能源 ）。因此，一般的说法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要消耗能量而生存。

但读者应该记得还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和物质一样，无法被消耗，只能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化。食物在体内产生的化学能最终变成热能回到自然界，而不是去了另外一个宇宙。因此，说生物消耗能量而生存也是不合适的，能量只是在我们的身体里经过。不过，耗散到自然界的热能不会自发地重新变成可利用的能量，能量和能量之间似乎还有分别。为了搞清楚生物究竟消耗什么，必须引入一个常用物理量：熵。

熵的热力学定义是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热能的变化）对温度求导，不过读者没必要去研读热力学以弄清这些概念，只要记得是熵是衡量混乱程度的物理量就够了。在任何封闭系统中，熵，也就是混乱程度总是不断增大的，只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才会维系不变。比如：你把食盐和花椒倒在一起，那么任何对这个混合体的随机触动都只能让黑白两种颗粒更彻底的混合，直到达到一种近均匀分布状态，也就是最高熵状态。又比如，对温度不同的两桶水，我们可以通过温差发电来获得有用的能量流，但一旦两桶水完全混合，虽然总热能依然不变，均匀分布到两桶水的能量却无法再被用来做功了。最简单的例子是打开一罐压缩空气，让原来集中在一个小空间的空气分子分散到整个外部空间，原本可以用来推动风车或活塞的空气密度差消失了，空气泄出时排挤外部空气会产生热能，但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耗散到整个空气的热能再收集起来作功。由以上的例子，读者应该看到一个简单的

规律：我们只能利用那些混乱程度低的有序能量，达到最高熵的能量是无法利用的。利用能量的代价是能量（或者说含有这些能量的物质）的混乱程度增加，即熵的增加。

既然熵可以衡量一个体系的混乱程度，那么简单的把熵加上一个负号——“负熵”，这显然就是表示系统有序程度和可利用能源数量的一个物理量。事实上，在给定边界条件以后，“负熵”可以直接定义为“信息”，即一个体系的可了解程度。熵的增加意味着负熵的减少，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无法改变物理规律使能量消失，但能量在流过生物体的过程中减少了负熵，增加了混乱程度，无法被再次利用。只是因为人类和自然界可以从太阳或地下的化石能源 中引入负熵，才可以使耗散到自然界中的有序物质和能量再次降熵，进入循环。因此，生物生存真正消耗的是负熵。

人类作为生物的一部分，同样要消耗负熵来维持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是采集和利用负熵的活动。即便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任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举动必然意味着改造世界。而人类正是以自己的需求做蓝本去改造世界，按既定的目标改造世界就是把环境“有序”化，降低产品和生活环境中的熵。物理定律规定了负熵不可能无中生有，人类制造产品、运输货物、互相提供服务并维护这个生活体系运转（这个体系熵的总在自发增大）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负熵流。因此，从物理学的角度看，经济活动本质上就是人类采集和利用负熵的过程。

在工业革命以前，负熵基本来自植物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低熵化学物质。人类和驯养的动物通过饮食补充负熵，而采集和进一步利用负熵的工作如盖房子、修路、耕地、纺织等工作都需要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至于其他的一些次要负熵来源，如水力、风力、木柴的热量等因为携带和转化困难，规模和形式都不稳定，只在少数特定场合或地区才得到广泛利用。这些辅助的负熵源地域性很强，一般只能用于特定的工作，不能象人力和畜力一样通用化，所以储量再丰富也无法取代农牧（渔）业的地位。

农耕地区太阳能所能提供的负熵流是有限的，光合作用的转化效率基本稳定在 0.02%（能量基数计入植物之间的空地所吸收的太阳能），生物界食物链中各层次之间的负熵传递效率一般也无法超过 15%-20%的上限，所以以低熵植物化学能为基础的经济必然存在一个由气候、地理、植物物种确定的规模上限。这就是前面几章总结的农业社会基本规律的物理基础。

在农业社会，不仅经济体系能获得的负熵流量存在上限，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也很低。灵长类动物固然拥有最灵巧的手，但与机器相比，人手的效率和加工精度依然很差劲。大部分低熵物质或负熵流只能通过一次性释放的方式利用其一小部分，比如煤炭或木柴只能用来取暖，风力和水力只能直接用来驱动帆船和水磨。如果人类试图储存或引导负熵流，使其以最合适的方式释放以提高利用效率，低精度的手工劳动和简单工具往往会对负熵流造成极大扰动。随机扰动意味着增加系统的混乱度，即提高系统的熵，所以扰动本身会造成极大的负熵浪费，对负熵流进行多层次复杂利用是不经济的。设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公元前后制造蒸汽机，让煤炭里蕴涵的低熵转化为通用化的动力，以当时手工业制造汽缸、活塞和传动机构的精度，恐怕造出来的机器连现代蒸汽机 10%的效率也达不到。再考虑到以手工业制造和维护蒸汽机所需要付出的负熵，这样的机器在负熵核算上必然是亏损的，还不如直接用人力推动机器更划算。要想改变这种低下的负熵流利用效率，只有改进工具和基础设施。但工业社会里的手工工具与基础设施不可能由双手直接打造出来，

即便不考虑建设问题，光是维护这些工具（本身也是低熵物质，很容易向高熵转变）所需要的负熵就足以耗光农业社会的人力。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比今天的纯农业地区还要落后的多。

现代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负熵来源不同。现代社会的负熵主要来自地下的化石能源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等。这些负熵源可以推动机械，不仅可以完成原来靠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让人类从艰苦、无聊的简单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还能完成许多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工作。现代身边的一些寻常物品，如多层住宅楼、镜子、金属炊具等等，其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极限。前所未有的负熵流给了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人类得以开发利用一些以前因埋藏过深或提取困难而无法利用的低熵物质（如太阳能、浅海石油平台），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流入经济体系的负熵量。尤其是在电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后，人类社会不仅靠开发一次性的化石能源来维系经济运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和对太阳能的直接利用使得工业社会中可持续的负熵流入也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

除了负熵的来源大大扩大以外，工业社会对负熵的利用水平也远胜前代。煤在农业时代只能用来烧饭取暖；在工业社会，同样的煤不仅可以通过大型锅炉和热力管道带来更多的温暖，还可以作为化工原料做成各种器物甚至纺织品。原来大部分通过烟囱和煤渣耗散的负熵如今可以被更充分的利用。工业社会还发展了自动控制机构和计算机等“管理机器的机器”，人类从此不仅可以让机械替代自己的肌肉，还可以用机械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大大提高对利用负熵过程的控制精度。所以，即便有一天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人类也能够享受到远胜前代的生活。（其实，从信息=负熵的角度来说，“提高负熵流的利用水平”也可以看做另外一种扩大负熵源的方式，但这样分开讨论更有利于理解问题。如果读者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尝试寻找一种通用、简单的描述方式，把两者统一起来。这种统一的描述如果存在，必将大大简化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物理描述）

根据前面的讨论，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负熵流的来源和利用水平不同而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关键就在于转换负熵流的来源与利用方式，这就是“工业化”的含义。

不过，“工业革命”这个词不仅包含了“工业化”的内容，还意味着“革命式”的变化而不是长期渐变。在真实的历史中，从 1781 年到 1830 年，还不到 2 代人的时间，英国在农业-手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了第一个工业经济。随后这个工业体系又花了 2 代人的时间扩展到大半个世界，确立了工业对经济的统治。在"漫长的 19 世纪”（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业不仅用铁路、机枪和战舰征服了世界，还以廉价商品和流水线彻底改变了平民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甚至对千年不变的宗教与文化的神圣性构成了威胁。这种触及每个人的变革从发端到席卷世界，前后只用了 100 年左右的时间，比蒙古骑兵的征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深刻（成吉思汗生于 1167 年，1281 年元朝远征日本未果，1303 年蒙古人袭击印度失败，全面扩张结束，历时 1 个多世纪）。习惯于渐变的人类社会上层建筑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以革命、战争这种大动荡的方式来赶上经济基础的脚步。我们之所以称 18-19 世纪之交英国所发生的产业升级为“工业革命”，原因也正在于此。

前面费了几千字的篇幅，其目的就是要为工业革命做出一个清晰定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农业社会通过向生物界以外寻求负熵来源、同时提高负熵利用效率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有了确切定义，我们才好探讨工业革命的前因后果，把工业革命与同期的其他历史事件区分开来。

工业革命（以下特指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 2 个关键点：蒸汽机和机床。其他的标志性成就如铁路、蒸汽船、铁桥、化工厂、大规模冶金、流水线等不过是这两个关键机械与传统技术和人力结合的产物。如最初的铁路是蒸汽机动力与机床加工的铁轨结合的产物，早期蒸汽船是帆船时代的船体与蒸汽动力结合的产物，化工厂是原有的经验性生产技术与金属机床提供的标准化设备合作的产物，现代纺织工业是蒸汽动力和以金属部件制作的工作机的结合.....因此分析工业革命必须先弄清楚这两个关键点的作用。

先说蒸汽机。虽然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蒸汽可以产生推力，甚至在公元前后就有数个文明曾经制造过早期蒸汽机（不能往复，只能一次膨胀，没有用于经济部门的记录），但蒸汽机真正的应用于生产却是在 1700 年前后的英国。最早实用化的蒸汽机并没有被当时繁盛的纺织业所采用，而是服务于矿井，主要用途是在煤矿中抽水，有时也用来为较深的巷道通风。这是因为当时的蒸汽机非常笨重，只能做往复式运动，效率低下，同时煤炭或木柴的价格相对人力还很贵，因此蒸汽机只在煤矿这种工作简单、煤炭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取代人力。

不过，读者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种蒸汽机的动力来源正是来自它所服务的矿井！（注意，这里是本书少数几个关键点之一）早期蒸汽机的效率虽然低，但应用于矿井还是能降低煤炭的采掘成本，而煤炭价格下降又使蒸汽机的适用范围增加。这种循环促进的增长方式在工程上叫正反馈循环，意思是两个条件可以互相促进激励，从而达到循环扩大的效果。正反馈循环增长如果没有边界限制或回报率下降的话，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在当时的英国，增长边界就是市场上的煤炭净需求总量和可以用这种早期蒸汽机辅助采矿的矿井数，一旦到了这个边界，这种指数性增长就要停止了。不过，由于蒸汽机辅助采煤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蒸汽机的基数非常小，对早期煤炭开采的影响有限。因此，即便到了 18 世纪后期，英国的蒸汽机只有 200 台或更少，并不是所有的矿井都得到了蒸汽动力的支持。在基数较低的前提下，新增加的蒸汽机依然可以带来效率增长，因此这种能源开采—动力机数量互相促进的增长到了工业革命前夕仍在继续。

机床的发展是另外一个关键点。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所拥有的工具、器物或艺术品所具有的精度是有限的，因为人类手工切削、研磨的能力存在极限。常用的木头、石头等物质韧性和抗磨损性太差，金属加工起来太困难。特别是工具本身的粗糙决定了产品也不可能很精密。如果不惜代价的话，可以让经验丰富的工匠反复制作同一型号的的产品，靠概率碰运气，以极高的废品率来使少数成品满足精度要求，但这样做成本极高，而且也无法持续的提高精度，上限依然存在。

到工业革命产生突破的前夕，繁盛的纺织业虽然发展了许多新奇的工作机，如珍妮纺纱机等，但这已经基本达到了手工业所能支持的工具精密度的上限，如果再增加机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势必会受到动力和零件精度、运行成本的限制。1771 年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固然先进，但在没有合适河流的地方就无法使用，这种低效率水力机械设置过多还会造成河道淤塞。即便动力问题可以解决，任何试图扩大机械规模或复杂程度的尝试也会因为

木制零件（可能会包铁皮）的强度和变形问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靠人力纠正错误，结果并不节约人力。使用高精度的零件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正如前面的讨论，非金属部件磨损快，合格的金属部件加工成本高，都不能真正节约劳动。机械对经济效率进一步的促进有待于部件精度的提高或成本的下降。

早期的金属加工机床正可以满足这种对高精度低成本零件的需求。当然，和早期蒸汽机一样，早期的机床只是手工业的一个延伸，对效率的提高有限。本身成本也很高，影响了推广。但很关键的一点是：金属加工机床本身也是需要精密部件的机械（注意：工业革命的又一个关键点），它的效率、效益与金属部件的精度、成本密切相关，事实上，除了最初的一些工作母机，大部分机床本身就是机床的产品。一旦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机床，只要金属本身的物理性质允许，金属加工机床自身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正反馈循环系统。

经济的增长总是要有正反馈循环现象出现的。农民开垦土地，付出劳动和种子，得到收获，作为一个理智而勤劳的农民必须保证收获≥种子+为了维系劳动而吃掉的粮食；手工业者必须保证做出的产品足够他交换衣食和原材料。当他们的收获大于成本时，经济就可以发展。不过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农业时代生物资源与耕地的数量决定了生产上限，以种植业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发展在很久以前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新大陆或其他可开垦地区的发现可以带来繁荣和发展，但本质上是原有经济在空白地区的复制而不是质量的提高。由于一切生产都离不开人力，而人本身又是经济成果的消费者，所以人均产品无法持续增长，正反馈循环现象将在新土地被充分开发后结束。技术进步也可以带来发展，但正如前面对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特征的讨论，农业时代的技术进步是随机、孤立的进步，一项技术带来的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技术充分扩散后也会立刻停止。

类似的，蒸汽机的和金属加工能力的进步如果只是两个孤立的技术，那么在技术进步接近其应用极限或物理定律所允许的边界后，正反馈循环现象中每一次循环促进带来的进步会逐步趋向于 0，因此产生的经济扩张也会停止。比如，当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有排水问题的煤矿都用上了蒸汽机，当通过简单机械放大的人力再也无法加工出比机床本身更精密的零件时，经济上限就再次停在一个稍高的状态。两项技术进步出现的前后对比起来，纺织业会节约一些人力，煤炭会便宜一些，但依然无法达到今天最落后的工业地区的经济水平。

幸运的是，本来因成本高昂、移动困难而被限制于煤矿的蒸汽动力和局限于人力操作（在木加工领域有一定的水力参与）的机械加工业之间存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正反馈循环结构：

高精度的金属零件首先是改善了机械传动的效率和精确性，从而使为机械安装控制机构成为可能。这不仅提高了传统产业如纺织业的效率，还在本来就由金属制造的蒸汽机中引入了离心式调速器，节流阀，传动齿轮等传统零件无法组成的辅助机构。这些机构减少了使用蒸汽机所需要的维护人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蒸汽机的热效率。回转机构和传动轴使往复运动的活塞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运动，于是蒸汽机的用途更加广泛。还有最重要的金属镗床，它大大降低了蒸汽机关键部件——汽缸和活塞的加工误差，从而使漏气带来的效率损失、摩擦带来的传动损耗都降了一个数量级。最后，精确加工的部件使蒸汽在多个容器之间的密封传递变为可能，冷凝器得以与汽缸分置，为蒸汽机节约了大量的热量。这些以金属加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改进彻底改变了蒸汽机，使它从一种笨重、昂贵、专用化

的罕见机械变成具有重大工业价值，可以在各种场合和地点使用的通用动力机，这正是瓦特及其他工程师在工业革命中完成的进步。这些进步固然伟大，但如果仔细研究科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或有突破性的进展，几个主要改进的基本结构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各种工艺品或生产机械中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成本或材料加工水平的限制才无法应用于蒸汽机和其他承受巨大力量的机械。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为这些技术进步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即便瓦特这个人不存在，在 1800 年前后也会有其他人利用新的金属零件去改造钮可门蒸汽机。

没有动力的机床不会自动运转，无论是切削还是锻压，只要你想得到特定形状的零件就必须对金属作功。不过，金属的硬度和韧性都很高，想靠弱小的人力准确的改变金属材料的外型非常困难。从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到工业革命前期的手工机床，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通过各种工具来集中人的力量。铁匠用数秒种的时间挥动大锤，然后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向铁块释放锤子的动能，才能把铁块的形状改变一点点，这是把在时间上集中力量。扳手手柄要旋转几十厘米，工作面才旋转几厘米，从而使人力可以扭转金属，这是在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能量守恒定律，简单机械可以省力却不能省功，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必然以增加作功的时间和距离为代价。所以，金属加工业最终要受到外界输入动力的限制。只要人力不仅用来调整零件的形状，还要负责提供破坏、重组金属晶体结构所需要的能量，金属零件的加工效率就始终是有限的，无法持续提高。鉴于动力在金属零件制作中的重要性，蒸汽机作为一种强大、稳定的通用动力源显然会给金属加工业带来根本性变化。蒸汽机一出现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动力将使人类可以制造以前难以成型的金属部件，同时大大降低复杂部件、大型部件的成本，这反过来也会促进蒸汽机的效率和推广。

1830 年前后，带有蒸汽动力的机床已经开始批量使用。在这以前 20 年，瓦特完成了第一代通用蒸汽机的改进，这标志着蒸汽-采煤和金属加工机床这两个正反馈循环系统已经结合为一体，两个工业部门通过交换越来越多的可利用能源和复杂的机械来循环扩大、提升，最终使蒸汽机在大部分行业及地区成为比人畜力更廉价的负熵来源。一旦化石能源的成本降至这一关键点，数量几乎可以无限增加，成本却还在持续降低的蒸汽机械就开始在整个社会中取代简单劳动力；掌握这一技术的社会自然能够节约并创造出更多的资源。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工业社会开始压倒传统农牧业社会。

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次要关键点。蒸汽机和各种机械作为化石能源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限于煤炭、）与各种经济部门的复杂需求之间的媒介，必须用能够被精确加工且耐磨的物质来制造。在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材料中，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物质就是金属，而铁在当时可以冶炼的金属中储量最大，分布也最广泛，当仁不让的成为最重要的工业材料。许多历史学家因此称 19 世纪是煤和铁的时代。当然，铁矿分布广、储量大、易冶炼的特性在农业社会就被人发现了。远在公元前后，旧大陆几个主要文明基本上都进入了铁器时代，农具、武器等关键工具都用钢铁来制造。在从铁器取代铜、锡到工业革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之所以钢铁没有创造后来那么多的奇迹，主要是因为缺乏加工它所需要的巨大力量和精确加工的工具。等到蒸汽机和机床的进步结合为工业革命，钢铁的潜力才真正被开发出来，蒸汽机的力量和机床的精度也以钢铁为载体得到了大发展。

在工业革命的前期，由于人类社会远没有把钢铁可加工的精度和可承受的力量（包括抗拉、抗扭、抗剪、抗扭等各种强度、刚度）开发到极限，因此，尽管蒸汽机不断的增加马力，机床加工着越来越复杂的部件，依旧按旧方式冶炼的钢铁还足以应付。但是，不管来自农业社会的金属冶炼业有多大潜力，蒸汽机-车床这个以指数方式增长的新经济体早晚会受到其物理特性的限制。事实上，仅仅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熟铁的硬度和抗疲劳性就不足以应付高速转动部件的要求了，而少数以渗透法冶炼的钢材又过于昂贵，工业革命遇到了第一个发展边界。

与蒸汽机和金属加工机床在偶然的情况下结合为正反馈循环系统不同，钢铁冶炼业的技术突破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方面发达的蒸汽机制造和机械制造业给钢铁冶炼提供了足够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越来越便宜的煤炭价格、强大的蒸汽动力、金属部件的加工水平为新型冶炼方式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从 1855 年到 1865 年，转炉炼钢法与平炉炼钢法相继实用化，钢铁的质量不断提升，强度足以让发明家们制造更好的机械和蒸汽机，而成本的下降则使这些新发明得以推广应用。很显然，在机械制造业、蒸汽机与钢铁冶炼业之间形成了另外一个正反馈循环体系：钢铁性能的提升与成本下降使机械变的更精密，蒸汽机的效率更高，蒸汽机为选矿厂、高炉鼓风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精密的机械使精确控制炼钢过程，提高钢铁质量成为可能，三者可以互相促进。不过，由于钢铁冶炼业的进步比较靠后，而且是在蒸汽机与机械制造业取得了革命性进展后才被动的进入工业革命，它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明显要低一些。

从农业社会历史来看，欧洲，尤其是西欧金属冶炼业一直落后于其他主要文明，尤其落后于远东，中国北宋时华北钢铁产量和质量就不逊于工业革命前的西北欧，18 世纪印度依然可以出产比西欧更好的铁锭；而英国的金属冶炼业在欧洲也并不突出，除了满足农业需要外，剩余钢铁产量最多的国家一直是偏僻的瑞典。在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终于学会制造可锻铸铁，学会用焦碳代替木炭炼铁，用炒钢法代替渗透法制钢，但这不过是重复其他农业社会已取得的成就，把农业社会的冶炼水平发展到手工业所允许的上限而已。即便金属的物理特性不允许人类进一步提高其加工精度和强度（这并不影响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蒸汽机与机床的革命性突破依然可以依托于农业社会的钢铁冶炼业改变整个世界，或许幅度会小一些，但肯定也足以当的起“工业革命”的称号。所以我们只把蒸汽机和机床并列为工业革命的基础。后面讨论工业革命的原因时，我们会用到这个结论。

作为 19 世纪最主要动力源的的蒸汽机和作为机械工业核心的机床成为经济转型的两个关键点并不是偶然的。读者应该还记得这一章的开头给出了经济的定义——采集和利用负熵流。蒸汽机的作用正是把原来只能取暖的煤炭转化为通用动力源，在生物界以外引入了负熵流；以机床为中心的机械工业则给人类提供了统一的工业标准，让负熵得以在各道工序中以较小的损耗流动，让人类能够制造更复杂、含有更多信息、熵更低的产品，从而提高了熵的利用效率。当这两个分别对应于经济基本要素的技术不仅可以自行进步，还结合起来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反馈循环系统时，不断增长且能与各个行业相配合的负熵流自然会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内节约人力、增进效率，钢铁业的突破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人类的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发生爆炸性的突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蒸汽机与机床的结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重工业部门，在蒸汽动力机床和通用化蒸汽机刚刚出现的早期，整个农业社会都是这个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发展的空间。因此这个幼稚

的重工业部门只需要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类的效率。随着初级工业化的展开，特别是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靠重工业质量的提高做基础。已经习惯于从工业中获得利润的工厂主下意识的向重工业投资，要求技工和最早一批屈尊来关心经济部门的科学家们提供更好的机械和动力。他们很幸运，金属材料的硬度、屈服点、煤炭和金属矿的储量（特别是西欧和英国的储量）都足以支持这种要求。西欧蒸汽动力和机械工业在互相促进的循环中不仅通过开采更多矿藏，雇佣更多人力的方式得到了扩张，还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水平。

我们可以随手找到重工业自行进步的标志性事件：1841 年英国人规定了标准螺纹，为世界经济制订了第一个全球性标准；1873 年，美国斯潘塞制成单轴自动车床；在此期间，蒸汽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单机马力都不断增加，还出现了复胀式蒸汽机，热效率从 2%增加到接近 10%.........这是蒸汽和机械的时代。源源不断的负熵流不仅在所有需要简单人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取代了双手，还通过新的机械工具完成了许多以前的人类只敢在梦中想一想的奇迹。包括达芬奇、培根在内，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在数百年前就根据一些简单的逻辑完成了一些超前设想，比如自行车、升降机、坦克、钢铁战舰、变速箱、机枪、城市规划等，这些空想尽管在原理上可行，但由于缺乏廉价、可靠的部件和同样廉价的动力，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变成了现实。其实，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有足够小聪明和想象力的发明家，明人笔记中曾记述工匠万户试图用火箭和椅子组装飞行器，这应该是中国人熟悉的一个例子。但只有工业革命后的最初一代西欧人因为基础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而拥有了把狂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个时代的西欧发明家比他们的前辈或其他地区的同行要幸运的多，甚至他们的子孙都会羡慕他们拥有过的无限发明空间。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过，由于人类是一种独特的生物，重工业提供的负熵流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释放，才能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象纺织业那种只需要周期性动力和精密机械的部门，重工业部门可以直接提供动力和部件。在交通、农业、科研、化工、军事这些需求比较多样的部门，重工业的促进作用就没有这么直接。来自煤炭或其他矿石能源的负熵流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被其他产业部门所利用。比如：交通部门主要得益于铁路和轮船，两者都从蒸汽机得到动力，以精密的部件组成自控系统和控制系统，铁路实用化以后的铁轨和轮船的钢铁船体也只能来自现代重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可以通过应用蒸汽机和简单机械节约人力，这对土地相对过剩的海外殖民地尤为重要。那些尚有荒地可垦的国家都通过使用轧棉机、蒸汽水泵、蒸汽磨、脱粒机等替代人力的机械提高了粮食产量。等到化肥和农药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不仅可以节约人力，还可以真正提高以面积计算的农作物单产。科研本身的方式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但工业化提供了标准化实验器具和低成本的试剂，许多原来只能设想的实验如今可以实际操作并在遥远的实验室进行重复。这导致科学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并最终与工业技术相结合，形成了真正具有持续扩张能力的现代工业体系。

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消耗负熵才能运转，所以重工业部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化石燃料所能提供的负熵流与具体生产所需要的负熵流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其间的转化需要成本。如果这个转化成本高于化石燃料所能带来的利益，那么早期工业革命就无法促进这个工业部门的效益。比如，尽管含有同样热值的煤炭要比含同样热值的食物便宜的多，但在化肥和现代育种技术出现以前，工业负熵流只能取代一些人力，而

不能直接干涉庄稼的生长，也就无法提高粮食亩产的上限。在中国这种劳动力相对土地过剩的国家，早期工业是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的。所以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对绝大部分人类所需的经济生产都可以被早期重工业所促进这一事实应当感到幸运。这种事实与任何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个人决策无关，只是因为人类的运气。

到了 19 世纪末，就在蒸汽机和钢铁的效率与精度经过 1 个多世纪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时，因为人类开掘资源能力的增长，石油和伴生的天然气作为新的主要负熵源进入了历史。石油是一种比最好的煤还要优秀的负熵源，它热值高、运输方便、开采安全；本身是液体的特性使它可以在发动机内部燃烧，直接以高温燃气而不是间接用低温蒸汽推动活塞，热效率比蒸汽机高了数倍。因此石油一出现就在能得到这项资源的工业国家取代了煤炭的地位。除了做能源提供负熵流，石油还是新材料的来源。石油可以制造轻巧、易加工却又坚固的塑料，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水平。由于石油的出现，工业革命得以持续它的指数化发展方式。

与石油大致同时进入工业的还有电力机械。尽管地球上没有电池矿，但电力容易输送的特性使电流立刻成了主要的负熵流动方式。截面十几平方厘米的输电线往往能比数米粗的输油管或几十米宽的运煤道路更快、损耗更低地输送负熵。水流、风力、潮汐提供的动能也可以方便的转化为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从长远来看，电力科技比石油革命还要重要，因为电不仅可以用来输送负熵流，还可以脱离宏观物质载体，传递最纯净的负熵——信息。这把自动控制系统的成本降低了十几个数量级，脱离机械模拟计算的生产控制机构应运而生，为下一次技术突破——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电力革命以后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计算机、生物科学、航天科技、人工智能、超导技术、核聚变技术.......各种科技突破先后出现，给经济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想必大部分读者对此颇为熟悉，本书不再赘述。这一章重点在于分析工业革命的本质而不是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

鉴于人类的人均财富水平已经在农业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停滞，开始自 1800 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反常现象”，当然，绝大多数读者应该已经把这种“反常”看成了常态。这种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当然在于地球上有足够的潜在负熵源（包括有限的化石燃料、重元素和可再生的太阳能、水能等等）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物质（如铁矿、木材）。不过，大部分对今天的经济有意义的资源是无法被农业社会直接开发的——手工业不能从黄砂中制出电脑芯片，炉子里也烧不出核裂变。我们必须经历煤铁时代的工业革命才可能达到今天的技术水平。工业革命是把人类从负熵流限于生物界的农业社会引入新天地的桥梁。一个能够从农业社会脱胎的煤铁复合体使得人类获得了足够的负熵“本钱”去开发这些新的资源。这就是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意义。

八 、工业革命的起因

上一章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具体过程。一旦这一过程得到了明确定义，引出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真实历史中的那个时间、地点开始？为什么人类必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度过近一万年才能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农业文明会率先享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前面几章分析了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工业革命的本

质，并对近代西欧社会的扩张进行了详细解释，本章将尝试在这一基础上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1687 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旷世巨著，诗人蒲珀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毫不夸张的的评价："大自然和她的法则隐匿于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天地一片光明！..."牛顿作为历史上空前，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天才，给人类带来了解释万物运动的精确理论——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还有微积分——将简单的物理定律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连的桥梁。这些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其他成就，比如光谱的发现、热传导公式等，虽然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发现者名垂青史，却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自牛顿以后，人类得以量化的理解自然规律，进而作出量化的预测，有意识的设计各种新机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经验和运气来取得新发明。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学开始自牛顿，现代世界正在牛顿开创的道路上运行。

从牛顿开始展露天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世纪。两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而言）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小国（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 1%），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这种巧合为一种常见的观点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时间上靠的如此之近的重大事件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于是他们宣布工业革命是牛顿时代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来类比。

用望远镜巡视宇宙，可以发现一些靠的很近的恒星，如果两两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双星。大部分双星之所以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确实离的很近，互相吸引，绕质量中心旋转，这叫物理双星，1/3 或更多的恒星都与邻居结为物理双星。不过，不是所有的双星都是物理双星，宇宙空间相对微小的恒星光点虽然非常浩瀚，但当被观测的星星足够多的时候，还是有某些星星不是因为真的距离很近，而是因为在天球上的投影恰巧靠在一起，从而表现为双星，这叫光学双星。天文学的入门者无法分辨两种双星，往往会认为自己看到的靠在一起的恒星都是互相绕行的邻居，更进一步的观测可以很容易的用光谱分析来区别这两种双星。

类似的，历史重大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搅动社会，引发其他的重大事件，从而使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集中于少数转折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年代、地理上接近的历史事件之间都一定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同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历史或物理定律禁止两个在时间上相近的事件各自独立产生并带来自己的影响。如果认真分析，我们会发现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和不久以后的工业革命之间正是如此。

说到科学，我们必须先指出技术和科学之间的技术与分别。科学的定义在本书的开头已经给出了：所谓科学，就是在事实和简单这两个标准约束下描述世界的一种体系。而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技术是指制造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简单一点说，科学试图描述并预测世界，关心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技术则是经验主义，关心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否行的通。从历史上看，技术和科学不一定有联系。古希腊就存在过与现代科学体系非常相似的科学体系，他们也讲事实，讲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最简描述，但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经济技术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如果不是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阿基米德绝不屑于与奴隶或下等人站在一

起制造机械。近代早期的科学界这种风气也很严重。一般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正式结合应当在电力革命前后，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以发掘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一直和经济部门里的具体技术相分离呢？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技术为什么不向科学寻求支持？这就需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中各自的具体作用。

由于今天科学和技术已经在经济领域内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科学建立自身体系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简而繁。科学先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如相信事实、尊重逻辑，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自然规律作出定性判断，如地球的形状接近球体、物体存在惯性，慢慢的从定性到定量，如衡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地球的半径。最后才是通过这些规律进行预测并进行验证，如根据物体的运动规律来给大炮加准星，根据微生物生长的特性降低葡萄酒制造过程中的变质率等等。而技术则是彻底的反过来，酿酒师傅根据经验告诉徒弟葡萄酒如何放置可以不变质，炮手根据大炮的仰角放在多少可以打中指定距离的敌人制作标尺，伐木工探讨如何砍树最省力气......这一层次的技术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或条件反射，然后为了便于掌握再把相近的技术进行合并归纳，自下而上，自繁而简的建立体系。科学与技术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影响具体的人类活动，它们的结合点和结合时间取决于两者伸展的速度。

对于技工来说，技术熟练与见闻广博很难兼得，技术体系一般局限于某个经济部门以内，所以技术很难向上突破发展为科学，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农业社会时已经充分介绍了。而长期以来，科学向下伸展的速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科学的原则是简单，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自然界和人工制品中，很难找到足够的“简单体系”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很容易取得标准化制造的天平、砝码、尺子、低摩擦的导轨、无色透明的玻璃容器和透镜、钟表等实验材料，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都是非常昂贵的物资。因此科学家们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抽象思考能力和悟性，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从非常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简单的规律。实验条件的恶劣甚至逼迫科学家们在遥远的天体里去寻找“无摩擦运动”和可以用简单参数描述的轨道。力学是与最普通的人类活动紧密相关的学科，近代以前的进展却多与天文学观测成果有关，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个免费的实验室，大部分研究只能作出定性的判断，离指导具体生产还很远。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机床和蒸汽机提供的便宜、精确的实验器具才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抽象中的理想化实验，科学因得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而飞速发展。很快，不断细化、具体化的科学终于能够定量的解释已经被机器工业足够简化的生产流程（表面上工厂的工艺比作坊复杂，但具体到每一道工序里的主要参数，确实是简化），并作出预测和指导。科学与技术在这时终于上下相通，在大多数领域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以前，科学是无法真正影响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或许有人会指出欧洲人向西航行以求到达中国的新航路这一举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地是球体，认为这是科学的作用。不过，如果哥伦布真的知道地球的真实大小，如果他知道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有太平洋和美洲，他肯定不会向西航行。运气和科学是两回事情。

从上一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核心部分的本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收集、利用负熵流的形式。既然在工业革命产生一定效果以前，科学对技术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认为科学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是不合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技术革命并使之发挥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基础在于生物界以外存在大量的低熵物质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矿产。但这是所有文明共享的潜在财富，因此不能说明 18 世纪西欧的独特性。不过，前面的分析还表明，工业革命的存在依赖在以下于三点：

A 技术进步达到了可开发生物界以外负熵源的水平，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条件

B 从开始系统利用生物界以外的负熵到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其间技术进步所需时间不能太长。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必须在短期内全部发展出来，否则这一工业化进程不能称为“革命”。

C 社会结构必须给这些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的升华，在这场技术革命爆发以前，一切社会规律依然在农业社会的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以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讨论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因。

先考虑条件 A。正如前面指出的，“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 1500 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长期技术增长速度是一个基本独立存在的，稍大于 0 的参数。因此，无论是考察平均水平还是最高水平，公元 1500 年的技术水平应该和公元 1600 年相差无几，但肯定显著高于公元 500 年，与公元前后的技术水平相差更大。工业革命初期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虽然很粗糙，但至少也要有一台能在任一主要经济领域取得效益的蒸汽机，和能够制造第一台金属机床的手工金属加工能力。从什么时候起，旧大陆人类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这 2 个条件呢？罗马帝国和汉朝鼎盛的古典时代，连螺栓螺母都没出现，水车刚刚发明，显然不合格。虽然火药最晚在 9 世纪就出现了，但 1300 年前后东西方才有铸造的火炮（即密封的高精度金属管）出现。考虑到军事技术一向领先于民用，这表明 1300 年以前金属加工技术不足以制造蒸汽机所必需的承压密封管道与汽缸。不过，要想从 1300 到 1780 年之间定一个确切的界限，似乎不太容易。农业时代技术增长的平均速度实在太低，而且短期内还会有反复，无法对数百年的技术史进行定量讨论。我们权且把这个年代的上限定在 1300 年，这样就很方便的排除了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

再考虑条件 B。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农业文明技术进步相对较快，以至于可能领先世界平均水准的年代就是那些粮食剩余较多，非农人口比例高的年代。在旧大陆基础技术水平足以允许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后，那些正处于循环上升期或是因为对外扩张取得过剩资源的文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 取得技术突破。

写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科学进步的问题，根据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科学和文化一样，无法直接生产粮食。农业社会的科学因为不能与生产技术相结合，其性质是上层阶级用来娱乐的奢侈品，因此它的繁盛与否也总是和剩余粮食数量或人口资源比同步变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西欧的海外扩张来解释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用地中海盆地农业和贸易的恢复来解释文艺复兴。这样，科学进步、文艺复兴和导致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同步性就容易理解了。

还有条件 C。应该注意到，工业革命是在开始很久以后才能通过化肥、育种等技术提高农业单产的。在那以前，新生的工业只能节约一些人力，并不能在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中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一个处于人口过剩或人口平衡态的农业文明如果拥有了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必然会让很多劳工失业。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多余人力，而粮食产量没有同步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会彻底抵消节约少许人力的益处。中国清朝政府早期抵制修铁路的理由之一就是会造成民夫失业；长江上的船夫曾联合起来抵制轮船公司；当英国占领印度手工业品市场时，表面上印度人获得了性价比更好的产品，但本土工商业的崩溃使得："悲惨的情况在商业史上无与伦比，棉织工人的白骨染白了原野"。这种现象限制了工业革命的发生。相反，在土地相对过剩的文明中，即便是最粗糙的重工业部门也足以用节约人力的方式同时提高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要把因人力短缺而无法开垦的荒地纳入考虑）和粮食总剩余。因此，无论技术突破在哪里出现，由于工业革命爆发并不一定能立刻提高粮食剩余，只有人力相对稀缺的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工业化充分展开。

这三个条件对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作出了限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断言超出条件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毕竟小概率事件总是存在的。不过人类只能考虑那些在自己理智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对各个文明的历史进行一番扫描，看看各个文明和时代与条件的吻合情况，从而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个条件剔除了 1300 年以前的所有时代。同时告诉我们 1300 年以后是充满机会的年代，在这以后取得技术突破的文明有很大希望利用工业的力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继续领先。西欧在 1300 年以后正处于一个超长的发展循环的上升段，同期的其他文明都因为没有类似的条件而依然保持稳定的循环周期，上升段最多持续 300-400 年就要转入衰落，因此西欧一旦弥补了以前衰落时期的落后，技术领先时间要长的多。在这场无意识的赛跑中。西欧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至于第二、第三个条件，通过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读者应当可以发现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否能降低人口-资源比。西欧因取得美洲和压制印度的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空白土地和原材料，这既促进了技术进步，也给重工业这个排挤简单劳动力的新经济部门让出了发展空间。因此，综合各方面考虑，西欧是当时最可能取得工业突破的农业文明。

前面指出了西欧的主要优势。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爆发，比如英国恰好在打败其他海军竞争对手，取得海上霸权的同时砍光了自己的燃料林，被迫大规模开发煤矿；而英国的煤矿含水量较同期另一个采煤大国——中国要高的多，排水问题严重，这都促进了英国蒸汽机的使用。又比如欧洲内部市场渠道发育较晚，商品和贵金属的长距离流通都被少数大资本垄断，经常受到政权干涉，反观中国和土耳其这种较早进入平衡态的农业帝国，稳定的市场经济已经压制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大资本。当出现一个彻底打破农业社会经济平衡的重工业部门时，是垄断性的大资本而不是经济权力充分分散的工商业网络更利于其投资。另外，相对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中层组织和庞大的企业管理机构，恰好西欧有大量的、正在逐步消亡的军事贵族阶层。这本来是落后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累赘，这时却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组织力量，使西欧不必再付出社会成本从头建立组织。100 年后的日本还会因这种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得到便利，象中国这种已经基本淘汰了世袭军事贵族的文明却会因此而放慢进入工业时代的步伐。

不过，这些次要因素的存在与否充其量只能把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前后推动几十年，或是决定工业革命爆发于西欧的哪个地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大势。西欧自从海外扩张开始，其经济中心先后从葡萄牙挪到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才是英国，在这以前还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工商业繁荣和汉萨同盟的 200 年霸权。数百年间，最具有扩张性的经济制度几乎绕了欧洲大陆一圈，而美洲、大洋洲还有许多空地没有开发。即便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在英国，我们可以预料有利的人口资源比态势还将在西方文明中持续几个世纪，总会有一个西方文明的经济中心适合重工业发展。自从西欧率先占有了美洲和印度附近的制海权，结合当时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考虑，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点最可能爆发的地点就是西欧（或西欧的北美殖民地）。

后面谈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会论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技术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同时重工业体系将通过垄断工业物资生产权的方式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个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必然会用经济、军事等手段排斥可能的新生独立重工业体系，并通过技术扩散方式影响其他地区。一旦西欧的工业化结束，其他地区即便具备了独立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无法重现西欧的工业革命。19 世纪，实际统治埃及的突厥军官团就曾经试图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结果，英国贸易部长科布登（此人因主张自由贸易，到今天依然为西方经济学的拥趸所推崇）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随后英国军队用大炮和军舰强迫埃及放弃了自己的工业化，继续充当英国的殖民地。这种现象在接下来的 1 个世纪中还将反复出现，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近代以来西欧是最容易发生工业革命的地点，想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西欧会经历独立的工业革命了。

以上内容和前面一章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西欧工业革命原因的分析。从游牧民族入侵到黑死病，再到航海技术和美洲的发现，在各种因素几百年合力影响下，工业革命终于在西欧爆发。西欧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经此分析，某些读者或许会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颇有天命所归的意味，发展起来一路顺风，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概率来解释。这其实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千个乒乓球上写上 1 到 1000 的数字，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随机抓出一个，抓到任何一个号码的概率都是 1/1000。如果你事先预言了你要抓到什么数字，然后一抓一准，这看起来确实象是有上帝相助。但如果你事先不预言会抓哪个球，事后却对你以 1/1000 的概率抓到某个球的事实大发感慨，这种感慨就显得无聊。因为事后诸葛亮是不可以夸耀才华的。同样，只要地球上存在足够的低熵物质，只要技术链允许人类以手工业为基础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地球上总有一个地区会爆发工业革命，不是西欧也会是其他地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工业革命必然是各种长期趋势和偶然因素在几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慢慢积累影响的结果。既然读者们不是在一千年前做预测，而是对着已经发生的历史做评论，就没必要认为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说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 1500 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

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确实是手工业借助自然界低熵物质的一次“升华”。不过，正如前文的论述，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科学还没有与技术相结合。既然科学并没有对技术进步进行指导，那么自然没有人可以规划工业革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旧大陆的科技水平宏观上不断上涨，具体到每个文明却是时涨时落，一旦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某个水平，工业革命就具备了可能性。西欧恰好在这个时期领先于其他地区，最先达成了技术突破，而且社会条件利于排挤人力的重工业发展，因此率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事件，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类似的历史案例做比照。

一般认为，旧大陆中央大草原的存在使得旧大陆各主要农业文明得以便利的从其他文明学习技术。同时，由于印度与中东之间、中东与欧洲之间存在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它们之间的技术交流要比同远东文明的交流容易的多。只是由于农业时代出现新技术的频率实在太低，即便技术的自然扩散很慢，各次技术进步之间的间隔依然足够技术传遍整个旧大陆。僻处远东的中国没有因地理位置不利而明显落后于旧大陆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反，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相对安定，许多技术在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术细节，从而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顶峰。

在定居农业时代的早期，技术进步随机出现的频率要比成熟农业时代快的多，冶炼、轮子、石工技术、陶器技术.........在短时间内先后涌现。因此印度、中东、欧洲三个联系紧密的农业地区在技术上较远东、东南亚要先进一些。这也正是第一、第二个农业文明都出现在西亚水陆交通枢纽（今叙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原因。典型例子就是炼铁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然后是欧洲、印度，最后才传到中国或通过间接影响触发了中国金属炼铁技术的出现。（中国炼铁技术应出现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西亚在公元前 1400 年或更早，印度和欧洲均为公元前 1200 年，铁器在中国真正普及要到西汉）

铁器时代的姗姗来迟使中国在青铜时代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在西方诸文明已经用块炼铁取代了成本昂贵、原料复杂的青铜时，中国人还在努力改进青铜技术。结果，包括高温冶炼、大型铸件、原料破碎、强力鼓风技术在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等到炼铁技术在中国出现，这些从未在其他文明得到广泛应用的青铜冶炼技术让中国很自然的直接发明生铁冶炼技术。同时，由于其他文明过早的结束了青铜时代，没有哪个文明会努力发掘青铜冶炼技术细节，自然也无法从铜冶炼技术中领悟出钢铁冶炼的高级技巧，生铁冶炼要到 14 世纪才会在中国以外出现。炼铁技术的超前还使中国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就能够大规模制造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在东汉就能以炒钢法炼钢技术，在明朝利用焦碳冶炼技术，这些技术在西欧的出现都要等到 1700 年前后，离工业革命只有不到 1 个世纪。

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唐宋时期相对其他主要农业文明拥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优质廉价的钢铁不仅节约了人力，还增加了可开垦的土地，改善了人口-资源比。，中国在长达 1000 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技术上均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是

因为相对独立的地理背景，钢铁冶炼技术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种上千年的相对富足并非是某个伟大人物或社会集团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也一样。

作者习惯于对历史做假设，用理想中的实验来验证一些事实。比如，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不变，但改变一些山川河流的分布，改变一些历史初始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一些听起来荒诞但合乎逻辑的工业革命方式。

工业化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与一个扩张中的社会结合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作者注意到在农业社会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一般意味着崇尚武力，而作为初期重工业部门的煤铁复合体最先促进的就是兵器工业，如铸炮、铸枪弹、刀箭等。因此，一个以军工需求驱动的工业革命也是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在虚拟的世界中，由于游牧地区的广大，一个类似蒙古帝国式的游牧帝国以不大的代价忽然征服了一个技术上刚好到达工业革命突破点的农业文明，然后这个类似元朝的二元帝国试图动员农业文明的力量去继续它的征服。那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战争为标准的帝国政府或许不会关心传统经济部门的前途，却肯定会对一个能够自行扩张、升级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加工能力的重工业部门感兴趣。考虑到早期煤铁复合体生产能力的弱小（1800 年英国工厂只用了数千台蒸汽机，法国达到这个水平在 50 年以后），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军事订货足以让它发展到 19 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的水平。然后，随着重工业平均成本的下降，一旦某个足够聪明的工程师或商人认识到重工业部门其实也可以在民用产业中节约人力，考虑到战争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短缺，工业革命就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另外一种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是奉行一神论的宗教。宗教僧侣们不仅有宣扬教义的强烈愿望，往往还会在修道院或专门的宗教圣地内创造一种半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独特生活方式。在真实的历史中，火药最初来自炼丹道士，西方化学起源于炼金术，古登堡印刷术最先用来出版圣经，现代机械表最早用来提醒教士们作礼拜的时间不要迟到。在一个接近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社会里，由某个自力更生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劳动时率先发明了蒸汽机和金属机床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实。然后，如果教士们把这两者结合的神奇力量归结为上帝的恩赐。那么，早期重工业技术完全可能与宗教结合。事实上，僧侣或祭司们利用一些未曾普及的技术装神弄鬼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即便社会暂时不缺人力，提倡自力更生的早期修道院也完全可能用机器的力量——上帝的恩赐来取代一些人力劳动，直到平民也充分理解这项技术。

这两种假设中的历史只在本书中存在，不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真正需要的条件——技术基础、技术突破和初期的需求。回顾历史，其实有许多文明在某个时期具备其中的一或两个条件，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或许要加上第四个限制：在地球不够大的时候，必须保证地球上没有其他地区已经爆发过工业革命）。在公元 7-8 世纪，扩张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可能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前最接近于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历史时空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在征服中变的适应扩张，征服的广大地区足以释放人口，而跨三大洲的帝国又引发了空前的科技交流与进步。遗憾的是技术水平起点低，旧大陆的技术水平尚不允许最原始的实用蒸汽机与金属车床的出现，因此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另外两个可能的候选是明朝和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却因为人口过剩和内部市场交流过于发达、缺乏大资本而未能实现。

除了假设其他的工业革命可能性，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地球上不存在煤炭，或铁的物理性质稍有不同、不允许被精密加工成工业部件。那么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应该还会在大致相同的轨迹上前进，但西欧就不会在 1800 年前后因为暂时的繁荣和资源过剩而爆发工业革命，更无法凭借手工业和农业来统治一个同样有发达农业文明的世界。在这样的历史中，随着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不太困难的学到西欧人的航海能力，随着殖民地凭借迅速繁衍的人力赶走本土的军事贵族，西欧短暂且只波及沿海地区的 200 多年海外霸权会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迅速崩溃。1600 之后的两个世纪或许会被称为“海上蛮族征服时代”，与蒙古人对大草原周边地区的征服并称。事实上，斯塔夫理阿诺斯已经在全球通史中对这一时期做了总结：

“..........1500 年至 1763 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 在 18 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东和九州。如果 18 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西欧因工业革命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这奇迹并不是西欧命中注定的结果。

总之，工业革命既是一个历史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客观物质基础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产物。只有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发生原因，我们才能真正就它的影响进行讨论。

九 、工业革命的影响

从物理学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人类从此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幅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前人类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属于直接的生产活动，为自己、家人和上层阶级谋吃谋穿；其余的人类活动也都围绕着经济主轴运转。所以，工业革命最先也最直接的在经济领域展示它的影响，为人类开启了一扇财富之门。

财富的含义并不是金银。工业革命确实增加了贵金属生产，但这只是它的副产品。工业革命真正增加的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如衣服、粮食、房屋等传统消费品，以及汽车、化纤、电脑游戏等前所未有的的新消费品。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金银矿的开发不同，真正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

这些财富不是在一夜间降临的，工业革命后发生突变的是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财富本身。工业革命前的人类不仅习惯于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还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停滞的经济或低于 1%的年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长，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给平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工业革命爆发后，所有能享用到工业利益的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今天看来并不出奇，在工业革命早期，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 2-4%上下。真正起决定性意义的倒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持续增长的时间。3%左右的人均财富增长率看似不惊人，但只要持续 1 个世纪，足以让人均财富增长 16 倍或

更多。1780 年以前西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在人均寿命、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房屋面积等关键指标上只是略微领先于旧大陆平均水平。到了 1 个世纪后的 1880 年，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西欧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2 倍，到 1913 年则达到 3 倍以上。在工业革命爆发 2 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变成了 1：8 甚至更高。

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重要物质进步经常会被忽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各种媒体上赞美"美丽的田园生活"，诅咒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的机器。但如果让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到一个儿童夭折率高达 40%的社会，一个没有塑料，一个陶碗价值壮年男子数天工资的社会，一个人均寿命只有 36 岁（1800 年旧大陆平均）的社会，一个 95%的人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一个气候稍有变化就有 10%的农民死亡或沦为奴隶的社会，一个 95%的人活不到癌症发作期，以至于没有癌症的社会，想必他宁愿去当囚犯。2 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多，许多工业化带来的改变已经完全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方式。象高成功率的外科手术、稳定的粮食供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的基本福利已经被一些人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幻想中想象农业社会，向往一种既有工业化以后的物质享受，又不必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新秩序所约束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影响之深刻，说明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其实包含了大量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物质财富。

除了经济绝对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和依赖关系。

在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的剩余限制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规模，是最基础的经济部门；还有一些为上层社会生产奢侈品的经济部门居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其余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缺了任何一个职业（如铁匠、农民、小商贩）或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就会无法运行或至少受到重大影响。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脱离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增长，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通过一两项技术进步推进整个经济的同步发展。当然，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即便农业产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他产业依然无法直接从中受益，粮食以外的产品，如食盐、铁器、房屋的人均生产率还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要想提高产量，只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后应该清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类似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负熵流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占有最基础的地位。但农业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限，除非出现偶然的物种交流（如美洲玉米的引入），只能在其他产业部门的辅助下维系自己的生产水平，并不能象重工业部门那样，通过扩大负熵流的方式提供增长空间。所以今天的广义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稳定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或许农业革命早期，尚未达到自然生产上限的农业可以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工业相比。

现在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是在既定的科技背景下各个企业或经济部门独立进行的技术改进。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技术被看作一个连续可变的参数，长期技术进步被解释为各行业微小进步的简单加法积累，经济本身则是一个基本平衡，不断趋向稳定的系统。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的理想状

态意味着让经济通过私有企业自由地伸展到现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同时让各个经济部门自由、随机的向各个方向进行技术探索。

尽管这个理论体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的异常精妙自恰，但作者必须指出：这一描述与工业革命后主要经济地区的宏观经济史完全相反：工业革命爆发后，一小部分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重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提高着经济发展的上限，人类开采、利用负熵流的方式——具体消费品生产的技术背景始终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人类还没有在现有工业水平所允许的经济空间内充分发展，关键工业技术的进步就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象蒸汽汽车、机械计算机、洲际飞艇等一度看似合理的产品尚未量产就被内燃机、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了。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关键新技术对现有经济结构的破立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促进作用；在既定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充分发掘反而退到了第二位。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如电动机、蒸汽轮机、海上采油技术、石油分馏、计算机、数控机床等，其共同的物理特征是能促进负熵流的开采或能提高负熵的利用效率。从 1800 年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完全违背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产生于农业时代，16 世纪后西欧农业文明的繁盛给了它充分发展的空间，这些思想在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只来得及看到工业革命曙光的学者手中得到第一次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在形成基本框架后才被迫正视工业革命，力图在不改变自身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把工业革命纳入自身体系。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贬低了工业革命的作用，将西欧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繁盛与工业革命之后的霸权混为一谈，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不过，顺便说一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逝于 1790 年，死前烧掉了所有手稿。我们不知道当时已经开始展示威力的工业革命与亚当-斯密焚稿事件是否有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很值得我们玩味。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没有把工业革命纳入基础理论的学说，自然无法在工业时代很好的解释经济史或预测经济前景。好在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参数太多，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以精确的计算来作出预测，象作者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学研究暂时只能止步于定性分析。所以经济学家们总是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天才，从成功案例中找到有利于其理论体系的论据。比如，他们先是说新教伦理有利于经济自由，然后在日本崛起后急忙改口说儒家伦理也一样（无视日本在儒家文明圈中的边缘地位）。刚刚有几个天才学者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中找到共同点，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衰退”，于是他们又修正理论说儒家管理方式有天生的非自由倾向.........又如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世界得利，但一旦那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遇到了困难，他们立刻转而指责这些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尚未放开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彻底导致了问题，而故意忽视那些自由贸易领域更少的国家没有遇到同样危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因社会学尚不严密而产生的学术空隙中钻来钻去，不断的制造理由来回避因无视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矛盾。

经济学家们如何掩饰他们的无能只是个具体的手段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准主流地位的原因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局部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用处。尽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整个社会的技术背景，但在局部的经济领域中，由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成本很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技术背景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因此，西方经济学还可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相对精确的描述与预测。其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不平衡，少数发达地区获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显然有利于这些地区从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考虑到历史上思想的传播往往是由大炮而不是学术讨论来完成的，少数发达地区所主张的、对它们有利的思想体系成为全球主流并不奇怪。

不过，对于试图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随大流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在本书前面的部分，作者已经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本质和由来。认真读过的读者应该可以从中理解作者的如下论断：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冲击绝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于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以经济发动机面貌出现的重工业部门（广义）取得了超出所有经济部门的地位，从而彻底破坏了成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工业革命应该被看做一次特殊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某种社会模式的必然结果。

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体现为生产力的高速、持续增长，并造就了一个能驱动经济的重工业部门。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革。

从绝对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世界。铁路、青霉素、机关枪使工业社会能够深入原来难以进入的落后地区；定期远洋邮轮、越野车、直升飞机、罐头食品则使人类能够在缺乏农业基础的荒岛、极地、沙漠中生存；飞机、潜水艇、矿井乃至航天器甚至使人类达到原来只能在想象中到达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是扩大了，尤其是对于从一个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半岛出发，最后征服世界的欧洲人而言。当然，这个扩大的“世界”只对那些从全球化交流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有意义。

新机械扩大了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也以更大的幅度提高了“文明世界”内部交通的速度。十六世纪以前各个文明地区之间的旅行，时间经常要以年来衡量，而且旅行者要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大航海时代用事故率极高的风帆商船联系了大部分文明的沿海地区，也不过是把时间单位压缩到月。由于手工业和畜力限制了船只的规模和速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交通速率并没有比蒙古帝国时期的草原商队或是环航非洲的腓尼基探险者高出多少。铁路和蒸汽船在几十年内就把洲际交通的时间单位改为“天”，随后的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又把这一单位改为小时甚至分钟。从交通的意义上说，世界大大缩小了。

世界在变“大”的同时“缩小”，这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既偏僻又无经济价值的角落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工业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与 11 世纪大草原周边地区的短暂交流和大航海时代沿海（包括通航外流河沿岸）地区的“全球化”相比，这次全球化是彻底的、可能也是永久性的。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各个时代创新（不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频率与传播速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世界各地的面貌是否一致。游猎部落时代创新的频率与传播速度都非常缓慢，但创新频率更低，所以各个地区差别很小。到了农业时代，传播速度逐渐落后于创新频率（以今天的标准，两者的数值依然都很低），所以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成不同的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创新发生频率和传播速度都大幅

度增加，但传播速度增加更快，传播时间几乎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整个世界又被同一种工业文明所占据。前面曾谈到不可能出现两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时代的全球统一暂时还不等于全球均匀发展，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内有发达的核心地区，也有混乱穷困的外围和边缘。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无论核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不得不承认，本地区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无法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他地区引起的反应。英国和德国的海上争霸从北冰洋打到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群岛，美国为了把日本军队逐出太平洋岛屿要雇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远洋航线的建立会导致亚洲腹地的沙漠商人丢掉饭碗，甚至非洲的半原始游牧民都会因为资源价格上涨而遭到莫名其妙的屠杀，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了。

另外，这种由技术到文化的统一也第一次允许并要求人类真正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为答案的评定给出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标准。从人类命运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后面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前面说过，工业力量使人类得以在此前因缺乏农业基础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立足。如果这些地区恰好具有重要的工业资源，那么，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立刻就会成为繁荣的工业城市，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发展出新的文明。中东的石油王朝虽然缺乏根基，但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军事地位已经丧失，应该承认这是工业资源创造新文明的一个例子。即便一些地区连矿产资源都没有，交通地位也可能成为一种资源。最早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就是为了在远东和西欧之间建立航海补给站而开辟殖民地的，贫瘠的直布罗佗、马耳他、巴拿马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期间，飞行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北极圈内的冰岛变成了对峙前线与交通枢纽。我们在考虑工业时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工业经济对经济地理的修正。

重工业带来的负熵流使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注意到，部分人类行事不一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改造世界也未必就是建设。重工业部门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和以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部门紧密结合，军事和经济的相关性在工业革命后比农业时代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所以工业化在军事上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得以彻底压倒游牧民族的军队。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军事优势体现为可以动员更高比例的过剩人力投入战争，但粮食剩余终究是少数，游牧民族的全民动员优势可以轻易抵消发达农业文明的剩余人力，而手工业的发展上限使农业文明并不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压倒牧民（少数消极防御战除外）。由于游牧民族占有机动性高、组织严密、民风剽悍、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似等优势，还可以很容易的仿造或夺取农业文明的技术兵器，所以游牧民族一直占有战略主动权。蒙古帝国对旧大陆的征服就是典型的蛮族骑兵压倒在技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文明地区的例子。即便到了热兵器的早期，拥有火器的中亚骑兵或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骑马步枪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工业革命到来以后，即便游牧骑兵占领了最先进的兵工厂，缺乏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游牧生活方式也无法让牧民们同时享用到机动性和先进的武器。而即便在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罐头食品和铁路也显著提升了文明地区军队的机动力，标准化的步枪、子弹和火炮使军队可以通过技术兵器成十倍的提升火力。游牧军队在数量、质量、和机动上都丧失了优

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内燃机的出现甚至使游牧地区丧失了提供军事运输畜力的特殊地位。或许不是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在工业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在讨论随后的历史时，忽略牧民的作用不会对讨论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重工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体系。在拥有铁路和轮船构成的后勤网络以后，远征军的规模不再随作战半径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到 0，因此工业强国可以发动跨文明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行动。19 世纪，在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的多次战争中，西欧工业强国与本土作战的传统农业文明对抗，不仅在火力与技术装备等方面占上风，往往还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人数优势，靠的就是工业化的军事体系。

能促进消费品生产的重工业水平与军事能力在工业时代几乎划上了等号，“富国”和“强兵”往往被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看做同一个目标的两个表现方式。由于工业化强国的军队可以跨地区发动征服，遥远的距离和高山大海再也无法保护社会制度的随机变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工业时代达到了极致。凡是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就能存活并扩张，不利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要么灭亡，要么被改造为强国经济体系的边缘部分。再加上各个文明内部各种次级上层建筑的竞争、变异，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已。这个插曲之所以尚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此前游牧民族用几千年时间积累的军事威名。

在农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也会互相残杀，但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弱小限制了战争的危害。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破坏能力的增长很快就让地球都显得狭小。早在 20 世纪初，战列舰主炮在射击时就不得不考虑地球自身的曲率，到了 20 世纪中期，核武器的出现终于让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能力，这是工业化军队发展的必然结果。（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核武器是一种特殊技术兵器，但即便忽略核武器，以 20 世纪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油气炸弹等准战略武器的发展来看，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能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现代战争的残酷面前，农业时代的军事冲突宛如儿戏一般。罗马人灭迦太基，亚述人占领叙利亚，最残酷的报复不过是将敌人平民卖为奴隶，在首都周围的农业地区撒盐以防止重新开发。到了 20 世纪，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记录屡见不鲜，纳粹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核武器轰炸下的土地不止是存草不生，还有流毒千年的辐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不惜用落叶剂毁灭对方的植被........当然，只要有机会，对手也绝对不会因为同情心而放弃报复，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双方都意识到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后果以后，才可能出现“恐怖的平衡”。

工业革命使武器的破坏力开始威胁到全人类，甚至不会放过胜利者，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过，全球性危机倒不一定来自战争，80 年代以来充斥媒体的环保言论已经向读者展示了无数种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小到生物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大到温室气体的排放，短期的有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差错，长期的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里作者不再一一枚举人类因科技进步而给自身带来的威胁，总而言之一句话，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前面曾经指出全球化允许人类真正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因为人类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威胁则从相反的方向强迫人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行事规则。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的描述，农业社会的人均财富非常低，除了很小的一个上层社会外，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于温饱，剩余产品基本被上层社会和公共开支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度，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谋生。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在土地相对过剩的繁荣时期，平民才有可能暂时的拥有一些闲暇和自由，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以指数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会消灭这种生活。至于上层社会，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与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存规律生活。不过，上层社会这个小圈子位于社会决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那些不努力扮演自己应有角色的统治者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上层社会也并不自由。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即便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在儒家统治秩序比较正常的年代，如果不安于代表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责任，试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来展示一下运动或艺术才能，也一定会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指责，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被废黜。

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从宏观来看，农业社会的人类都只能按照被经济背景所决定的社会规则去生存。即便他们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以经济为中心和竞争标准的社会也很难容纳这种异类，生存竞争很快就会将其淘汰。还有一些专职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人类，要么放弃了正常的经济位置、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要么专门取悦统治者，依附于上层社会，从而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为后代创造了大部分文化遗产。但这种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低，从未取得主流地位。从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脱胎于物竞天择的生物界。在人均财富停留于温饱线上下、文化传播依赖于人口繁衍、迁移的农业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律自然还是生存竞争规律。我们之所以在农业社会总结出“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逐渐增加的财富一开始还是在这种基本规律下起作用。慢慢的，由于复杂的工业体系（包括工业经济所必须的社会管理机构）需要雇佣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集团以工业经济所必需的专业技术换得了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其绝对数量庞大，内部生存竞争相对不强，又不必为整个社会的运转负责，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自由。在这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有条件且有意愿去追求自由生活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富裕城邦公民还是宋帝国黄金时期的城市有闲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其绝对人数、占人口比例和收入超出生存需要的程度都无法与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集团相提并论。（当然，与人口总量相比，这个中产阶级还只占很小的比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某些主要社会集团不一定要准确的按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轨迹运行。因为生存竞争规律有效的前提是生物占有的资源接近于生存的底线。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只能供大多数人以温饱，然后残酷的生存淘汰赛会消灭那些不竭力为自己和子孙谋生存的人类。工业革命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改善了相当大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均财富状况，人均财富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许多人即使不再严格的按某种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的模式生活，也不会立刻在肉体上被淘汰。生存竞争规律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历史。

另外，农业时代人类交流困难，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传播只有在人口和物质文明扩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象军事征服、人口迁徙、家族繁衍等事件都是主要的文化传播

途径。因此象文化和思想等上层建筑的“软件”，其发展规律也因生存竞争的存在而服从经济基础所确定的发展轨迹。工业革命通过现代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改变了文化、思想传播的方式，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不需要与特定人类群体的扩张、迁移相结合，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存竞争规律的影响。 历史进入 20 世纪以后，尽管人类经历了 2 次世界大战，尽管发达工业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还对移民关上了大门，但工业经济确实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在工业经济内从事技术性工作。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准中产化，第三世也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收入获得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文化和思想也因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传播成本。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自然就不再准确了。

当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生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的运行存在惯性，以及很大一部分人类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还有数亿人在捱饥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塑造肯定还要在 21 世纪持续下去，只是不再具有决定性地位。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但人类依然从 1780 年以前的农业时代甚至游猎时代继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在前几章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农业革命的遗产后。本章的讨论把工业革命的后果总结为人均财富的增长、全球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限制减弱、自身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全球性危机这四项主要影响，以及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等次要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变，作为分析基础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变，之所以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本身的变化要花上这么多的笔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是一个超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的变数。

前面作者曾将历史进程比喻成河流，把社会内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喻成水力学知识，那么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好比历史之河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河道，这段河道的宽度（历史发展的自由度）、坡度（历史进程的快慢）、礁石数量（特殊事件的数量）都远大于农业社会，因此水流的具体流动方式很难预测，浪花、旋涡层出不穷。考察这样一段河流，我们需要知道水的物理特征，更需要了解既定河道的几何形状（地球资源所能支持的工业体系的具体特征）。即便如此，在如此之宽的河道内，对具体的水流作出任何具体预测都必须慎而又慎。

十 、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前面详细讨论了工业革命的内容，还对本书内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定义。读者应该能理解工业革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盛是 2 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比较合适的描述是：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引起人类力量爆发式提升的事件，因此它的出现需要和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结合，资本主义、军事帝国或一神论宗教都是可能的候选者。前面作者设想了另外两种在逻辑上说的通的工业革命方式，分别与军事帝国和一神论宗教相对应。在真实的历史中，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夕恰好处于一个因占据海外空白地区而产生的工（手工）商业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充分，所以促进并利用工业革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少数军事贵族的扩张掠夺欲望或基督教惟我独尊的传教活动和工业经济有一定的互相促进，但相对灵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还是处于绝对的附属地位。

只要有扩张空间，资本主义就能从中找到牟利的机会。工业革命最终创造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又以低廉的交通成本把全世界都连通成一个大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对于西欧和北美东部的工业社会（最初限于英国和比利时）而言，它们暂时垄断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因此可以独享农业世界的庞大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特别繁盛，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沦为这两个中心地区牟利的附属品。

中心地区暂时占有着近乎无限的利润空间，一切内部矛盾都可以用向外扩张（军事或商业）的方式来化解。很显然，由于利润和购买力来自似乎没有尽头的世界市场，上层社会与其为了瓜分利益而内斗，还不如直接用商品和大炮去征服更多的地区。资本家们不希望别人来分享自己的利益，也基本不干涉同行的牟利活动，所以西欧北美盛行的是崇尚绝对自由和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本章标题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概括为"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19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一般要经历如下的典型过程。首先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用资本从殖民地或本土取得（购买或夺取）资源，利用已有的重工业体系生产机器。然后用类似的方式取得原料，在本土雇佣人力，用机器制造商品，商品一部分在本土,大部分运到国外销售。商品换来了大于原始资本的现金或直接换取一部分原料，这些现金和原料成了新的资本。资本家再利用这些新资本雇佣更多的人力，向重工业体系订购更多的机器，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同步扩张。同时，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器订货，从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些利润也成为重工业的资本，被用来雇佣人力、开发矿山，制造更多的机器和重工业部门自己所需要的工业母机，或者用来开发下一代重工业装备。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

以上描述的只是这种牟利循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 19 世纪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为了让这种循环进行的更快、更有效，西欧和北美的资本家（包括被他们控制的政府）还有许多其他花样。比如，商品可能不直接去换取现金，而是先拿到非洲，向被有意挑动而互相攻击的部落购买黑人（必要时直接捕捉），然后把这些黑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做奴隶。种植园支付的奴隶款可以带回国内，也可以就地购买棉花等原料。卖出商品，输入原料和现金的循环中插入一个奴隶贸易只是为了更高的利润率。为了保证殖民地或充当市场的传统文明接受这种贸易，装备了蒸汽船和机关枪的远征军时刻准备着去镇压反抗、强迫别国开放市场，有的时候还要驱赶一下竞争者。由政府或公司派出的商业间谍深入大陆腹地搜集市场和原材料的情报。传教士在军队的保护下，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既传教，也间接的推广西方的商品，还为各国政府或大公司做公关。至于精炼毒品，以外交手段间接控制土地等手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总之，为了贩卖商品和获得原材料，工业资本家是不择手段的。

分析这种典型资本循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循环的规模取决于四个条件：重工业规模、工业资源（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购买力、劳动力。具体而言：重工业的规模决定了机器产量和商品产量；原料和能源不够的话，轻重工业都无法充分开工；购买力的多少限定了销量；劳动力的数目决定最多有多少台机器可以有人操作，对包括轻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体系规模做出了限制。这四个条件分布在整个循环链上，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让循环得以进行，对于欧美列强而言，整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利润总额就取决于四个条件中最弱的一个。作者接下来就以这个推论为基础，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强国的兴

衰。另外，同以往的时代一样，战争依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偶然性的重要来源，也将被纳入作者的讨论。

对于中等以上的国家，劳动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在 2 次世界大战到来以前，没有哪个中等国家的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占用了农业社会的人力。由于工业国可以用工业品从海外换粮食，随后重工业又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与亩产，所以，只要人口增长足以应付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力并不是很要命的限制。真正被人力所限制的工业化国家只有比利时这个小国。比利时工业化较早，从相对比例上看甚至一度领先英国，但本土面积和人口都实在不足以支持与其他强国（哪怕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强国）的竞争，所以被排斥在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外，并最终失去了它在工业化初期的相对地位。

资源限制在 19 世纪也并不严重，早期的现代工业体系只需要煤铁两种主要矿石资源，其余的原材料由包括农业在内的传统产业部门供给。由于煤矿和铁矿都是分布广泛的主要矿产，所以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当时并不缺制造机器的原料和发动机器的能源，至少可以通过贸易或殖民战争弄到足够的煤铁。而相对弱小的重工业部门，传统农业-手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原材料近乎无限，稀缺的是机器、技工而不是资源。当然，矿产资源的质量问题也有一些非关键性影响：英国威尔士无烟煤优秀的燃烧特性对英国工业和海军发展都很有利，出产优质煤、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中易手也影响了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到 1900 年前后，西欧强国的重工业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本土的煤铁资源无法满足的程度。重工业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必需资源的种类，如石油、稀有金属、钨、锡、橡胶、金刚石等。特别是石油的出现，不光可以充当能源，给工业带来了更方便利用的负熵流，还可以经化学加工为塑料、尼龙、化纤等材料，成了重要性仅次于金属的工业原料，被称为“工业血液”。由于大部分新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占有工业所需的全部矿产，因此资源开始成为限制某些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缺乏殖民地的后发工业强国尤其如此。而英国法国占有广阔的殖民地，俄国、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供应不仅可以基本满足本国需要，还可以出口关键资源给德、日等国换取垄断利润。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也是决定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但在本章涉及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源问题还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规模取决于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与社会结构所容许的增长速度。英国先于所有同级竞争对手约 2 代人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因此在 19 世纪中后期成为世界工厂，更坚实地握有世界霸权。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重工业的威力，因为按照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英国本来已经在 19 世纪进入相对衰落周期，但现代工业的出现帮助英国把霸权维系到 20 世纪初。这里作者略微花一点笔墨来研究这个典型个例。

从 1790 年到 1800 年，由于肥沃的土地、造船的木材可以近乎无限供应，人口繁衍和移民迁入都异常迅速，手工业技术也很方便的达到了农业社会的上限（这个上限本来就很低，从 0 开始追赶也不需要多长时间），因此美国在农业-手工业所确定的经济实力上迅速赶上了传统强国。同时，俄罗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 19 世纪中期，美国商船吨位已经与英国并驾齐驱，；俄罗斯则吞并了整个游牧地带的北部，屡屡南下挑衅中国、波斯等传统农业地区。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俄美两国以边区的资源为后盾，即将把英国这个这个

农业-手工业时代的海岛强国推下世界霸主的位置。就在这时，工业革命作为一个超出农业社会规律的事件改变了这个趋势：在 19 世纪早期因规模小而未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工业部门终于强大起来，为英国商人生产出了划时代的蒸汽轮船，为英国工厂主生产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机器厂，为英国军队生产了新式的铁甲战舰和标准化的大炮，还训练了大量习惯于工业化秩序的人员,其数量足以扭转世界格局。英国因此继续保持全球海权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能够维持其霸权。直到 1916 年，英国还能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以明显的数量优势取得最后一次战略胜利。俄罗斯和美国因为没有在工业革命之初占得先机，要等到 1 个世纪以后才真正成为全球性霸权。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读者特别要注意区分 1850-1860 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前后，英国全球霸权的不同基础。

不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无意中被触发的。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前，连英国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真正优势与别国的威胁所在。控制着大片殖民地和全球海运物流的英国不仅可以向经济殖民地倾销工业品获利，还可以通过垄断物资转运、特产专卖、限制殖民地工业甚至贩卖毒品等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对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热心。由于殖民地多且零散，早期的机器工业尚不能灵活调整组合，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相对成熟手工业品优势不大，所以英国的重工业发展赶不上市场扩张，反而保存了大批小型落后的半手工企业，这种问题长期积累下来，最后成了英国衰落的关键原因。同时期的德国日本作为后发国家，资本家对现代工业的力量认识较深刻，在暂时没有足够的国外购买力的情况下依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工业，所以取得了较高的重工业增长速度。作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重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德国和日本因此在较低的工业利润下建设了强大的军队，并用军队来争夺殖民地和利润。

法国一直是欧洲传统强国，长期拥有欧洲最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同时是欧洲文化中心。即便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一等强国，其驻外大使也长期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让自己的家眷穿巴黎时装。法国的这种优势使它在文化产品和奢侈品生产两方面处于准垄断地位，短期内生产文化产品或奢侈品往往比发展冷冰冰的工业对法国资本家更有利。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受到沉重打击，大地产被分割卖给农民，精英阶层无法象他们的英国同行那样，把小农户从土地上赶进工厂，这提高了工业化的成本。另外，发达的手工业同样阻碍了法国重工业的扩大与升级。例如，在 1900 年前后，法国资本家依然以法国技师心灵手巧，可以用手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荣。只是在不久以后的 1914 年，手工技巧不如法国的美国人福特就建立了汽车生产线，用钢铁的精确来抵消法国人的手工技术，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业革命爆发在英国，法国在大国中第二个投入工业化，但英、法重工业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前面指出的多方面原因所致。作者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与国民优秀与否或领导人是否明智无关。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工业进步能一直持续下去，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遗产，没有人会预计到重工业部门最终成了利润的重要条件和现代军队的基础。到本章叙述的时代为止，历史惯性和客观的物质条件（或者再包含一些运气）决定了各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德国和日本比较类似，都是在英国的重工业部门充分显露威力后才开始在外围地区进行工业化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重工业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力，明确制订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因为德、日相对落后，所以先后被英国放心的拉为盟友，协助英国维护地区秩序。两国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与头号工业强国结盟，得到

了技术和工业母机的支持。另外，虽然没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两国国内都有过剩而强大的军事贵族势力，军国主义势力以军事订货支持了重工业以超出消费品工业的速度发展。在 1890 年前后，德国的重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在不拥有海权和广阔殖民地的前提下还是争夺到了一些市场空间，在某些项目上甚至领先英国。

美国的前身是一个非主流移民建立的殖民地，文化积累少，地广人稀，手工业水平相对低，人力成本相对高。一旦英国的经验证明了发展重工业可以大大节约人力，没有什么内部因素会阻止重工业以接近理想状态的速度扩张。当然，后面要提到的购买力不足偶尔是个问题。至于其他殖民地，此时要么在大国的严密控制下不得发展工商业，要么被西欧溢出的军事贵族所控制，为了上层社会的利益而积极发展农牧业和矿业。由于资源相对人口暂时过剩，这些殖民地过的也不一定很差。阿根廷就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象阿根廷一样富"，这句口号从 19 世纪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独立重工业的澳大利亚到今天还很富裕。

旧大陆还有一些暂时未被工业国家征服的古老农业文明。那些力量太弱小，离西欧较近的地区即便想发展独立的重工业，也立刻会被西欧的远征军制止。英国对埃及工业化的干涉就是榜样。象中国、朝鲜、土耳其本土、波斯这些地区或因距离遥远，或因农业文明实力强大而很难被干涉，中国和土耳其还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正面击败西欧工业国家的军队，暂时还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正如前面几章解答为什么西欧以外的地区未能爆发工业革命一样，两国发展成熟的农业社会制度在原有的轨迹下运转良好，既然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根本性的挑战，自然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动力。再考虑到成熟农业地区稠密人口对节约人力的机器的抵制（美洲作物带来的人口上升空间已基本耗尽），这些形式上独立的传统文明没有建立任何独立重工业。

在决定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四个条件中，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购买力。从前面的讨论读者可以看到，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在早期并不显著；在某些国家，基数不大的重工业本身也很容易实现指数化的增长，因此扩大生产潜力并不难。但产品只有在被卖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利润，让资本在循环中扩大，所以能否为工业经济的产品找到销路成为了关键所在。

本书前面几章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进行了探讨，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无法从体系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否则扩张的主导要素（资本）就不能获得利润。具体到本章所讨论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操作机器的劳动力来自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对早期弱小的工业经济而言可以近无限供应。而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机器、能源和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工程师与高级技工）主要来自工业自身，只能从 0 开始逐步积累，所以属于稀缺品，可以充当资本。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绝大多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被少数有能力投资的富人所占有，劳动者只能得到和农业时代差不多的收入。（考虑到工业化早期城市基础设施的简陋和城市文化的贫乏，普通工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可能还比不上原来的自耕农）显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财富分配如此两极化，穷人即便花光他们的工资（事实上他们确实花光了）也无法买下多少商品，富人占有大量财富却只需要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因此，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只能消费一小部分工业产品，要维持其运行并发展，必须向这个体系以外寻求购买力。

工业经济以外的购买力只有 3 种来源：未能工业化的殖民地、直接能进入流通的贵金属矿山或其替代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殖民地土地资源充足，可以用农牧产品或地产、矿产交换工业品，占有贵金属矿山的独立地区可以直接用硬通货购买，传统农业文明则可以同时提供农产品和贵金属。另外，某些地区出产皮毛和宝石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容易携带和保存，价值为大部分文明社会所公认，因此也能产生与黄金类似的效果。比如南非的钻石、西伯利亚的貂皮也可以用来交换西欧的过剩产品。19 世纪各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占有或垄断这些市场。

英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其中有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富产黄金、钻石、象牙的南非、西非殖民地，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英国一度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供应。英国还有世界第一的舰队、商船队、全球军事基地网，可以随意的进入中国、拉丁美洲等地的市场，必要时还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因此，英国在早期工业国中市场压力最小，工业资本主义可以相对自由的扩张。通过限制殖民地产业发展，阻止他国商品进入，向新殖民地倾销，转卖商品等方式，英国即便在工业不再领先的时候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支持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流强国”几乎成了特指英国的一个专有名词。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的独立其实是法国和英国两个欧洲国家争霸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正规军、舰队和援助资金将英国派往北美的军队耗的精疲力尽以后，英国决定把这片缺乏特产的土地留给那些小农场主的民兵，以便抽出力量投入收益更大的其他地区。于是美国得以成为第一个独立的主要殖民地。虽然英国官吏和亲英的大地产主被赶走了，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地广人稀的美国以农业立国，出口粮食、棉花和资源，进口制成品仍然是有着最佳的短期效益，因而也是美国最容易走上的道路。事实上，1789 年美国制订的进口关税只在 5-15%之间，平均为 9%，远不够在旧大陆的繁荣手工业和英国正在工业化的经济面前保护本土产业。美国的未来似乎与其他先后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保持依附地位的殖民地没什么两样。

不过，作为英国异端分子的接纳地和英帝国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美国在建国初期与英国关系紧张，和战不定。拥有海权的英国常常会干涉美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客观上阻止了美国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一旦海上大宗贸易被切断，9%的关税立刻变为无限大，美国本土的工业从无到有的开始发展。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门槛还比较低，而且新移民中不乏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英国本土移居美国的技术工人，美国工商业很快在这块人力成本高昂的土地上模仿英国建立了重工业体系，1807 年美国人率先造出蒸汽轮船，1817 年已有多家工厂以机器生产蒸汽机，1840 年前后，蒸汽机和机床已经是美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工商业利润丰厚，所以原来以地产为根基的美国上层社会也纷纷把资产投入工业。由于美国上层社会从保护性关税中尝到了甜头，在后来局势缓和的时候，被工商业税收所左右的美国政府反而提高了关税，继续阻止外国（主要指英国）工业品入侵。1816 年关税率提高到 7.5-30%，1824 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达到 40%，1818 年再提高到 45%。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基本垄断本土的购买力，只有南方因为残余大地产和奴隶制庄园较多，才保留了一些依附于外国的农业地区。在 1861 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中，北方以重工业和人力彻底压倒南军优越的军事素养，荡平了与外国工业体系结合的大地产，把全国都变成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

在美国最初的 13 州殖民地与太平洋之间，有着 700 万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这些土地上人口稀少，一部分由鞭长莫及的西欧强国在名义上领有，一部分是落后的印第安人的家园。通过威胁、欺诈、战争、屠杀、强行购买等方式，美国很轻松的占有了这些土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这些土地在被开发之初不属于任何贵族或奴隶主。为了开发中西部，美国政府允许开发者以很低的代价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许多大企业和空头公司利用这一政策发了财，但确实还有大批无产者因此拥有了自己的耕地。迅速繁衍的人口与大量外来移民、重工业提供的农业机械、无限供应的可开垦土地，这三者结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由农民自己占有大量过剩农产品的社会。在其他宗主国上层社会未被破坏的殖民地，同样数量庞大的过剩农产品基本由少数地产主占有，因此只能形成少数购买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不断扩张的农业社会可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买下本国的绝大部分工业品。

除了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西部其他资源的开发也提供了一些购买力，最重要的就是贵金属。富饶的美国西部存在大量金银矿藏，西进的移民狂热的开采这些无主财富，很大一部分的贵金属被分散到普通采矿者手中。由于美国上层社会没有能力在当时的西部建立秩序，所以即便某些富矿被先到的公司或幸运的个人所占据，狂热的淘金者依然会藐视一切产权去采矿。与农业剩余相类似，这种分散的硬通货形成的购买力百倍于它们集中于少数人的状态。

虽然早期的美国无法象英国那样把商品倾销到全世界，但美国的特殊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给它带来了超出任何国家的本土购买力。光靠本土市场的支持，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重工业核心就能够高速发展近一个世纪。在 19 世纪，美国资本集团由于拥有足够的国内购买力，所以并不急于用暴力夺取海外市场，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愿意在海外独自付出代价的美国资本集团满足于和其他先行扩张的殖民者分享市场，而不是以武力排斥其他强国，建立自己垄断的经济殖民地。一般认为，1898 年美西战争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寻求海外剩余购买力的标志，但在这以前，美国工业产能已超过了英国、德国之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只是物质和硬通货储备还远不如已称霸百年的英国。

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位居第二，但其绝对数量远不能和英国相比。（定居人口之比 为 2.2 亿/不到 1 千万）在法国大革命将本土大地产分给小农以后，法国本土的农业也能提供一定的购买力，只是人均购买力远不如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至于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扩张，法国起步也较早，但海权一直被英国压制，所以也没有起到太大影响。不过，前面曾经提到法国第二个开始工业革命，虽然重工业发展不快，但奢侈品出口和文化产业繁盛，所以生产过剩的压力并不大。另外，法国传统上是欧洲第一强国，积累的资本虽然无法被本国工业经济完全吸纳，但至少可以进入别国安全的获得利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滞后的损失。在上述因素及后面要提到的战争因素综合影响下，法国一方面保持了工业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工业强国内的相对地位在整个 19 世纪呈下滑趋势。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与英国霸权并存的垄断殖民地。如前所述，两国勉力建成的重工业体系必须在政府和军队订货的支持下才得以存活、发展。不过，在无法从国外输入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订货所支付的货款要么是凭空发行的纸币，要么是征收自平民的实物赋税（劳动力或农产品），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在工业化的同时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两国修筑了铁路，建立了现代化军

队，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美、法工人的 1/5 到 4/5，日本平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国农民，这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革命的土壤。为了释放矛盾避免革命，为了挑战英国霸权，为了获得购买力，两国原本就过剩的残余军事贵族积极筹备战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军事建设。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日本和德国的环境也不完全一致。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农业较发达，可开垦荒地较多，又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接壤，因此尚能释放部分社会矛盾，提供少许购买力。德国开始工业化时先被英国当做牵制法国的工具在海外市场上得到了一些回报；然后恰逢英国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实行部分自由贸易的年代，获得了一些市场空间。因此德国发展相对顺利，大部分重工业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消费品生产获得利润。到 19 世纪末，德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工业国，在化工产品、机械生产等领域占有优势。不过德国既不拥有海权也没有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维系生产所必需的市场和资源都仰赖于别国，因此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让本国统治集团和它潜在的敌人都忧虑不已。

日本本土资源贫乏，工业化起步最晚，错过了竞争相对缓和的年代,早期的工业化资本只能来自对本国各个阶层的剥夺，如减少武士俸禄、增加田赋等。这引发了武士阶层的叛乱与平民的频繁暴动。日本资本集团不得不以提前发动军事冒险，以争夺市场与资源。不过，与德国相比，日本最幸运的一点是近邻中没有其他工业化强国。俄罗斯的远东领土在当时还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远征能力的英国则因日本可以帮助它控制远东而与之结盟。有利的周边环境和使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发动全面战争的工业国。1894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击败了经济规模 10 倍于己的中国，1904 年日本又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前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赶回黑龙江流域。通过两次以微弱优势取胜的的军事冒险，日本获得了辽河流域、朝鲜、台湾作为殖民地，以及中国内地的部分市场，这使日本始终在危机边缘的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维系发展。不过，对于日本飞速发展的重工业而言，这些市场还远远不够。

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过这几个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足够的殖民地（以有购买力的人口计），因此相对衰弱。只有俄罗斯因其广阔的国土尚能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不过，在局部战场上还是被日本痛击）这里不再详述其发展历程。

在全球化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这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平静年代，战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局部战争基本可分成三种：工业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普法战争；工业国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海外战争，如日俄战争；工业国征服非工业国为殖民地的战争，如甲午战争。有些战争兼有几种性质，如布尔战争中英国打败了德国暗中支持的布尔人，日俄战争中英国美国提供贷款军费支持日本人等。

鉴于现代工业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那些重工业发展超出消费品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国家虽然存在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却往往能在短期冲突中取得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战果，从而抵偿一些经济危机的压力。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结果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在布尔战争中，重工业发展不及下游产业的英国虽然最终通过长期战争获得全胜，但也元气大伤，暴露了其弱点和实力极限。英国从此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主，变成了后发工业国觊觎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重工业的重要性。其实，重工业作为军民通

用的负熵流来源，在简单劳动力可以无限供应的年代是潜在财富和潜在力量的来源，但资本主义这种利润至上的制度却不断限制重工业发展，只有在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的战争年代，资产阶级集团才能正视它的意义和真正的增长潜力。这种矛盾反映了这一时期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致命问题，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本章从重工业、资源、购买力、人力和军事冲突五个方面分析了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作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不能掌握现代工业力量的地区已基本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方面有名义上的独立地位），附属于主要地区的历史；尚未被控制的地区则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等待着工业世界来接收。西欧、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区在工业革命爆发时恰好具有适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个强国俱乐部里，虽然内部冲突不断，但由于庞大的传统农业世界和新大陆富裕的农民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而且加入工业竞争的国家有限，所以世界性战争一直没有爆发，世界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只对少数国家内的少数人口有意义，其余的人口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动荡，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文化体系被推翻，在大部分人的实际感受中，生活水平可能还不如传统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的力量实在强大，只要几个工业强权之间不爆发全面战争，骚动的下层人民（世界范围内）可以被控制了工业力量的上层社会轻松控制。即便中国、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地区出现规模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1857 年土兵起义的反抗，为数不多的工业化军队也可以迅速予以镇压。所以，在那些能够分享工业化收益的资产阶级、买办、传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黄金时代。

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源头不在工业社会。西欧在工业革命以前数百年的扩张虽然没有脱出农业社会的经济水平，却使中心区可以向边缘、空白地区释放矛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少数发达西欧国家成了暂时的主流政治形式。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让西欧继续保持它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非工业化地区获得利润，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得以继续发展，同时向其他地区扩展或被其他地区所仿效。这一制度有许多致命矛盾和问题，但只要工业生产力还能够在无限的市场中自由扩展，只要还有源源不断的利润流入中心地区，已经获得先发优势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就能继续它的黄金时代——直到这个体系碰到市场的边界，在真实历史中就是 1914 年。

矛盾的总爆发还有待时日，但战争和死神已经在黄金时代的辉煌外表下达成了协议，等待着利润不再增长的那一天，等待着人们因为生产财富的能力过于庞大而殊死拼杀。日后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第三世界的独立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内部矛盾中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当时的世界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切。在英国，一个叫马克思的穷学者用他锐利的目光解剖了这个社会，指出了矛盾所在，对未来做出了预言，还尝试着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尽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因其时代局限性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悲哀的发现：他的“可怕”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十一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称霸全球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或神灵的设计成果。在工业革命爆发之时，自由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制度更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无限扩张空间，因此它能够在工业时代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把原来浮于表面且即将结束的海上优势发展成绝对性的世界霸权。既然自由资本主义兴盛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共同创造的、几乎是无限的扩张空间；到了 1900 年前后，当这个“无限空间”与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比不再无限的时候，客观条件的变化自然会促使新的制度来取代旧的上层建筑。

如果市场空间饱和或接近饱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才能顺利扩大利润。在全球市场被瓜分一空的情况下，各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必须从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转为步步为营的推进。很显然，在这种外部竞争条件下，那些步伐一致，内耗较少的资本主义体系会获得更高的利润。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一向不拘形式。于是原本分散的企业在资本家的理智选择下逐渐聚拢起来。到了 19 世纪后期，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强国已不止一个，市场竞争绝不会停留在工商业领域。战争可以让资本集团以最直接的方式掠夺财富、占领市场空间、打击敌人生产能力和商业网络，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争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赢得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严格的纪律和长期的谋划，与战争相配合的政治、经济行动也一样。所以频繁的军事行动也迫使一向崇尚自由的资本家们协调他们的行动。

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趋势只与扩张空间与现有经济规模之间的比例有关，我们可以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中找到类似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荷兰霸权时代，西欧（尤其是荷兰）弱小的生产能力与庞大的世界市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大部分利润依赖于转运其他地区的物资和贩运香料等奢侈品。因此，相对后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荷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非常松散，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属于各个公司而不是政府。在战争时期，企业仍然可以与敌国进行贸易，甚至独立发动战争，享有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在其他较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崛起后，工业革命爆发以前，随着海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政治结构成了荷兰霸权衰亡的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因为荷兰实在太小）。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不再具有类似的发展条件（由一个人口、土地、生产能力都不多的小国控制世界经济），也永远不再让本国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企业或个人享有类似的“自由”。

令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工业经济的发展。

随着重工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发动机，重工业的运行、发展特征也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那些更适合重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因为重工业在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有-三个显著特征不可忽视：

第一个特征是整体化

在农业时代，绝对技术水平低下，行业之间的技术壁垒很低。各个产业部门除了都要从农业取得剩余粮食以外，基本上是独立运行的。象造船、军工、炼铁等手工业部门可以在部门内部制造大部分工具，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并培养自身的技术人员。因此，只要有需求、资源和剩余粮食，大部分产业部门可以独立扩大规模和提高技术水平。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让各个行业的企业独立决定其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显然更有利于其发展。

工业革命以后，重工业作为通用负熵流的来源和可提高负熵利用率的工业装备的来源，将所有产业部门联成一个整体。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除非把生产能力降低到接近农业时代的水平，所有的工业部门都不可能独立运行、发展，只有和上下游产业部门相配合才能体现其效率。这和农业时代的规律截然不同。所以，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做出真正独立的经济决策，不依赖于上下游部门扩大生产规模或改变生产方式。

第二个特征是中间产品标准化。

农业时代的经济相对简单，大部分产业部门直接生产最终消费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物资交换相对较少，因此中间产品标准化对效率并没有多大影响。秦始皇把经济、文化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成一个国家，不过是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其中只有统一车轮距算是对制成品的规格实行标准化，但也不是因为上下游产业的配合。另外，不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中间产品，农业时代的产品都是手工劳动的成果，考虑到手工劳动的不确定性，将中间产品标准化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农业时代各个经济部门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物理特征制造简单的产品，这也是农业时代负熵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主要的中间产品都由机器制造，经济体系内部的标准化有了可行性；另一方面机器的运行与效率也需要中间产品的标准化来保证。含水量较多的粮食或规格与要求不合的木材在农业时代可能会降价出售，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尺寸或公差与定单不符的机器零件，或是杂质太多的化工原料在工业时代却只能成为废铁。所以工业经济需要在中间产品中实行标准化，才能利用状态、品位不一的资源批量生产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

第三个特征是关键技术的出现。

这一特征在前面分析工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工业时代的经济依赖于来自生物界以外的负熵流和远胜前代的负熵利用效率，因此能提供更多、更稳定的负熵流的技术和促进负熵利用效率的技术在经济体系内处于最基础的位置。比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机床制造技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的炼油业、内燃机和电力设备制造技术，70 年代的计算机技术等。其他一些次要技术的实现则有赖于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农业时代各个产业部门独立运行，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一系列随机分布、互不联系的微小进步。因此，工业革命以前让各个产业部门乃至企业自主的决定科研投入（或决定不投入）比较符合当时的经济基础条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速度大大提高，少数工矿业部门的关键技术也体现出了超出其他技术的特殊地位。正如前面指出的，主要经济增长来源于越来越强大，利用率越来越高的负熵流，而不是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经济增长出现了关键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有意识的对这些领域进行重点投资要比让各个企业或行业自行试探，独立决定投资、发展方向要更有利一些。

工业的整体化、标准化、将投资集中于关键领域,这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种无摩擦的市场，人们交流信息、达成妥协、预测未来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市场达到最优状态也是有成本的，如：时间、破产的企业、浪费的资源等等。特别是在工业整体化、标准化以后，任何一点微小的外界条件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整个工业生产体系最优状态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非常频繁的话，让无数个独立的企业的独立决策通过市场组合成最优状态的成本可能会很高,效率则很低，很可能在市场达到最优状态之

前，最优点就已经再次移动了。事实上，由于技术不断的进步，所谓“使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最优平衡点”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工业关键技术的迅速进步使企业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新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负熵流的来源和可能利用方式持续提高，市场经济的信息交流即便得到了电报网的加强也无法跟上这种技术进步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关键技术的分布相对集中，其范畴、开发方式和影响都可以通过科学来进行预测，所以对经济进行集中指导甚至一定程度的计划成为可能。在这种统一指导下，人类以自己的理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作出计划，可能会有偏差甚至失误，但只要计划指导的范围不超出重工业和被重工业充分改造的经济部门，其精确性就可以在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领域的前提下得到保证，其损失可以被它的长处所弥补。

在重工业部门和相关经济部门中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在工业时代有两个优点：首先是有利于少数关键技术的开发，从而以打破旧经济模式，提高生产上限的方式促进了生产。其次是让经济结构以高于市场调配的速度迅速达到一个接近暂时最优点的位置。工业革命以后新技术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越来越复杂；同时，对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新技术具有鲜明的特征，人类对新技术的影响和新技术产生方式的预测远高于前代。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计划经济损耗巨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节制的计划经济会在长期发展中比纯粹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计划经济的有形损失往往会小于市场经济因交流成本所未曾创造的那些“无形损失”。在制度竞争中获胜的一方不一定是完美的制度，但肯定是相对效率较高的制度。其实,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即便是农业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是由远远超出家庭规模的企业而不是无数个体经营者组成的，其原因就在于局部范围内的计划经济运行成本远低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但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充分展开以后，技术背景条件才使得计划经济可能在整个行业甚至国家的范围内优于自由市场经济。

英法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强权确实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所拥有的工业力量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因此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并充分的利用这种优势，没有把整个地球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消灭一切可能的竞争者。在这个时代，一些传统的强权仍能暂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其中几个最终变成了新的工业强国。这些后来者的存在保证了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保证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存在竞争。所以，在技术背景与相对市场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19 世纪的世界上有足够的竞争压力促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随之改变，具体而言就是集团化、垄断化、军事化。一般称这个时代以后的资本主义为垄断资本主义（传统上又称为帝国主义，但容易引起歧义，本书不采用这个别称）。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经济部门被少数寡头控制，甚至被一个大企业垄断。这种现象在重工业部门，尤其是军工部门尤其明显。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和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些大规模企业集团以金融资本为粘合剂，不断的向上下游扩张、合并；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一体化、官僚化，最终把自由资本主义赶出了关键经济部门。在垄断组织发育比较充分的的日本和美国，几个最大的资本集团完全可以联手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在政治领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力量分散于中小业主，所以上层社会内部一度盛行民主、分权制度。在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以后，政治结构也向集权和专制演化，地方政府和议会的权利都被大大缩小，文官政府的权

力与垄断集团和军官阶层紧密结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时代只是浮于表面的一层装饰品。

经过几十年的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不再是主流制度。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惯性不同，各国发生这个转变的时间与转变速度也不完全相同。英国、法国的历史包袱重，既有体制的惯性大，所以转变较慢。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短，政府直接有意识的介入了工业化进程，所以转

变较快，德、日等国的军事传统和专制倾向也加强了这一转变的速度和它们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二波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具有军国主义和专制倾向，这并不是简单地巧合。在 19 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空间与工业化生产能力之间的基本比例和重工业在经济内部的地位，都是被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确定的外部条件，这决定了军国主义专制国家更容易（注意不是必然）在这个时代崛起。，

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它们分享工业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口来自农业-手工业和初期矿业的原料和农产品，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形式。由于本国并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把这些农业、矿业、商业企业结合成整体，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依然以自由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同时，中心地区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刚刚结束，其上层建筑依然带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色彩，所以在边缘地区从纯粹的稳定农业社会向经济殖民地转化的过程中，总会有部分知识分子与买办相结合，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名义来推行自由资本主义。不过，欧洲以自由资本主义触发工业革命并因此称霸的历史条件无法再现，这种缺乏根据的空想往往只是加强了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中心地位和殖民地的从属地位。

在中心地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从 1870 年左右开始的。从 1870 年到 1910 年，虽然世界市场还未被完全瓜分，但随着剩余空间的减少，开发新市场的速度开始下降，一旦稍有波折，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就会追上市场边界。因此经济危机频繁发生，1873 年就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机。不过，既然世界市场还有开发的余地，随着危机销毁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新市场的开发，主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还可以在危机后向空白地区扩张，避免了直接冲突。但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到 1900 年左右，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均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正如本书前面曾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制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目标，从来不会拘泥于某种既有形式。西欧、美国、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完全是因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以垄断化面貌出现的资本主义更能谋取利润和实现自身的扩张，从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淘汰了那些拒绝变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以竞争压力促使其他资本主义体系向垄断方向转化。

垄断资本主义依然还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获得利润和扩张的制度。它在工业化充分展开、生产力潜力直逼世界市场极限的 19 世纪末期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具有竞争力。率先采取这一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会取得竞争优势，从其他资本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内夺取利润和扩张空间。但一旦所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已经转入这个发展阶段，除了日益增长的军备投入会吸纳一些过剩生产能力外，市场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的严酷问题依然存在。在世界市场空间被全部占领开发后，无法向外部倾销产品的资本主义体系只能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去争夺对手的殖民地，或干脆以摧毁对方工业体系的方式来减少自身生产能力的过剩。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并没有避免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可怕预言，世界大战在 20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如期爆发。

十二 、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生于 1818 年，逝于 1883 年，作为律师世家的后代和接受了大学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马克思本可以很轻松的成为上层社会的成员，享用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财富和地位。但马克思放弃了这种富裕舒适的生活，他宁愿去做一个叛逆者，一个与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的叛逆者。马克思不仅参与了工人国际组织的活动，以行动为击败资本主义贡献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当然，除了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和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方式也做了重要预言。1848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了《共产党宣言》，1867 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两篇作品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搅的世界天翻地覆，给共产主义做出了初步规划也深刻的改变了资本主义。考虑到马克思作出这种分析和预言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个天才。

列宁生于 1870 年，逝于 1924 年，如果说马克思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那么列宁的伟大则体现于他的行动。列宁也曾在 1916 年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论述，科学的解释了世界大战的原因。不过，列宁最伟大的行动肯定是在 1917 年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第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但它是第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下来，让所有敌人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其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年残酷的战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包括来自世界所有强国的正规干涉军在内的数百万敌人，在世界 1/6 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国家。这个国家继承的是所有资本主义强权中最弱小的经济基础，但在列宁逝世后，它粉碎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侵略，然后在一种与主流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成为超级大国，将 2-3 亿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赤贫提升到世界中上水平，还支援了数十个国家的民族、阶级革命。虽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理想在这个政权内部消逝的甚至更早，但作为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将永远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追求理想主义的一个典范。

从 1848 年欧洲革命到 1871 年巴黎公社，再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和二战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浪潮，社会主义运动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力也在不断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飞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红旗下纷纷独立，渴求面包与尊严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迎接全球革命到来；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却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被产品过剩和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导致的暴动所困扰，逐步垄断化、军国化，最终以两次自杀性的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自己。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此消彼长，源于西欧的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榜样似乎即将成为世界的未来，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很严重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最终间接导致了第一次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它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宏观运动描述最精确，预测最准确的理论，这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本章下面的部分就将以 19 世纪与 20 世纪前期的历史为背景简述这一理论。

在分析以前必须说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和列宁均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再出现绝对“权威”的理论阐述。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马列主义思想甚至未必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不过，对于生活于 21 世纪，要从理论分析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的作者与读者而言，有意义的是在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运动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流地位，被大多数世人所认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因此本章暂且忽视那些非主流的马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自身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和社会研究，主张从绝对客观的视角去考察人类社会，这也正是本书的出发点之一但是，马列主义不仅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做出陈述的理论，马克思自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马列主义是革命者理解社会的背景材料，同时也是革命者推翻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重新规划新社会的指导理论。革命者不仅用历史规律去解释新社会的胜利，还宣称新社会是一个更美好，更进步，更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

这种目标其实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科学是客观的，绝对不会以道德为基础给任何历史事件带上“进步”或“美好”的帽子，为历史设定一个目标更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精神，后面几章将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把“先进”定义为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扩大，那么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后的数百年内确实在“进步”，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直接或间接从这种“进步”中得益。即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把尽量发展工业经济、让大部分社会成员享用到尽可能多的工业财富做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还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传统马列主义的核心论点之一。既然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那么就不应该把思想、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运动看做独立的领域，更不应该认为精神运动具有什么独特性，以至于会主导物质世界。（应当注意，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作者并不认为一切思维都被外界条件精确的决定，毕竟牛顿时代机械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主张人人平等的宗教容易在下层社会得到支持，而主张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宗教则更受上层社会的青睐，这并不是因为两种人的头脑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不过，必须指出，这个结论是一个长期统计性的结论，不能用来精确预测每一个人和某个具体时间的社会状况，唯物主义是承认偶然性的。而且传统马列主义也不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事实上，革命作为一种以人的智慧来对社会进行规划的行动，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进行干涉的体现。但从长期和宏观来看，人类群体的社会存在确实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革命最终还是把改变社会结构作为主要目标和巩固革命本身的必要手段。绝对不存在只停留于精神生活的革命。

既然“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而言，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挥，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生产关系要么在制度竞争中被淘汰，要么被内部产生的新制度取代，所以在长期看

来，生产关系因为自己对生产力的作用而服从于生产力水平。道德、文化、宗教、艺术等附属于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也因此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本文前面的部分也反复应用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不过，任何规律都不能无条件成立。具体到这条规律，只有在生产关系能够利用生产力的增长来淘汰或取代旧制度时，生产力的变动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同步变化。前面几章论证了旧大陆农业社会基本符合这个条件，但这条规律在工业时代是否能成立，仍然需要考察。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后的军事力量与工业经济规模和水平基本成正比，而且人类从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制度之间的外部竞争压力大大加强了。不过，当人类的破坏力足以摧毁全人类以后，继续扩大破坏力并不能增加军事竞争优势。人毕竟不能被屠杀 2 次，地球环境的崩溃也无法通过发达的工业经济来挽救，所以军事竞争压力的增长有一个限度。具体到我们这个世界，军事竞争的极限就是核武器的量产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苏联的核武器发展到足以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全面破坏，在这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军事竞争依然可以提供足够的外部压力，作为淘汰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的制度的重要方式。

外部竞争压力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地球上有足够的竞争者来参与竞争。在农业时代，不需要太大的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为新制度提供运行空间，这一点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了。在早期工业时代，由于技术并不复杂，主要关键资源如煤、铁等分布广泛，因此有多个社会条件合适的国家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入工业时代，参与全球性制度竞争。但随着工业体系越来越庞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落后地区很难产生新的工业国家参与竞争，另外一方面既有的工业经济体不断合并、扩大，最终形成了几个互相依赖的寡头，竞争的有效性下降了。另外，在工业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足以和地球的大小相比时，由于重点工业资源和市场分布极端不均衡，取得先发优势的经济体，其领先地位很难被后来者撼动，虽然后者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转变大概发生在 20 世纪前期。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有大小不等的 7-8 个强国拥有基本独立的工业经济，并基本能做到重工业所需的资源自给（来自本土或殖民地）。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能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这说明当时的世界还可以比拟为一个经济制度的竞技场，外部竞争压力能够促使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生产力发生变化。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旧制度内部取代它。农业社会取代游猎采集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一个文明在短期内获得庞大的扩张空间时，如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的局面，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内部产生，并在能够开发外部资源的中心地区率先取代原有制度。比如说某个企业可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率先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拥有无限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排挤、并购、以竞争压力促使他人仿效的方式来进行制度扩张。随着新制度的壮大，海外贸易的受益集团与旧秩序中的上层阶级会争夺权力和资源，最终爆发直接冲突，完成新旧制度的更替。不过，这种事实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新制度能够在小到一个企业的范围内表现它相对旧制度更强大的竞争力。如果某个新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表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那么它是很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旧制度内部得到发展的，因为这种新制度多半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前被自发淘汰。

上一章曾经指出，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相对独立的各个经济部门在工业时代因共同的重工业基础而一体化、标准化。没有哪个企业或部门可以脱离整个工业体系谈“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某个新兴的制度能够促进整个工业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除非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取得对整个工业经济的控制权，否则的话由于工业经济的一体化和标准化，新经济制度所控制的少数领域要么改变自身、屈从于旧秩序的压力以保证自身能够依托于工业经济而生存，要么只有灭亡一条路。由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新经济制度往往无法从 0 开始，以渐进的方式取代旧制度，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或对外战争等事件。当然，这种规模壁垒毕竟只是一种静态的障碍，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在经济上更优越的新制度总有机会取得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工业革命以后历史进程越来越快，往往等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技术背景和大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就已经再次变化了，所以，在某些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地区，大工业体系的运行特性成了导致经济制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发展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工业时代，英国的许多重工业部门依然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结束，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完全结合成垄断组织以前，这种滞后现象并不严重。

总而言之，马列主义中常用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直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在大体上还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它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依然成立，但对于需要解释历史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个结论的指导作用还是很充分的。

从文明出现到 21 世纪，旧大陆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部分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名为国家的政治集团内生活。对此事实，马列主义解释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家出现的原因，国家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这一论断也要放 在 19 世纪-20 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拥有有固定疆域、国民、稳定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以及官僚机构和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的国家并没有神圣的光环，它的出现和教会、企业、海盗、黑手党等团体的出现一样，都是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延续的产物。前面已经具体解释了制度更替的两种方式——外部竞争和从内部萌生新制度，在制度竞争中，国家这种制度长时间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因为它的竞争优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漫长的竞争中，与一味追求暴力的纯军事团体或只强调文化认同的宗教团体、只关心利润的商人团体相比，国家把金钱、暴力、文化的力量一并结合。它既承认上层阶级的特权，也注意不把下层社会逼入绝路；既能压制内部新制度的挑战，又能在外部竞争中抵挡入侵并进行扩张，因此国家制度占据了大部分农业地区，把大部分人口都纳入自己的控制。

当然，国家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了所有土地、人口和力量。海岛上有海盗，商业发达地区有商团，非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独立教会，深山里有土匪，江湖上有黑社会，远东地区有儒士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不受或不完全受国家控制，拥有相对独立的暴力、文化或经济权力，它们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度竞争的结果。直到今天，虽然相对实力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加强的国家制度基本上垄断了土地和人口的归属，还把许多经济权力结合到国家政权内部，但独立于国家的权力依然存在。权力和资源在各个制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竞争环境，没有哪种制度具有天然的必然性。

制度竞争包括内部更替和外部竞争两种，一种制度的产生肯定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能抵御其他制度的军事入侵与文化渗透，必要时还要对其他制度的地盘发动入侵，扩大自身的存在范围；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保持内部的稳定性，既不能让上层社会聚敛太甚，迫使下层发动革命，又不能让下层保留太多的剩余产品，以至于上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源以保持其文化特性并与其他制度相对峙。简单点说，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量自卫和扩张（力量不限于军事，文化、宗教、工商业都可能帮助制度扩张），一方面要保证内部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矛盾不激化。国家就是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一种制度。

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国家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但传统马列主义的似乎偏重于后者——“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固然，一种无法解决内部阶级冲突的制度是无法稳定存在的，但光是有内部矛盾，还不足以让国家这种形态在历史中占据如此之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会让国家以我们熟悉的面貌出现。传统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调内部矛盾，必须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和此前的海上霸权使西欧的工商业以远超过农业增长的速度发展，工商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超出了此前和同期的任何地区性文明。大部分工商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效率在迅速扩张的年代要远高于小业主的家庭作坊，在工业革命后尤其如此，因此工商业的迅速增长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曾经是农民或个体工商业者，他们在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下放弃了自己在农业社会中的位置，平均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并不比同期的农民更差。不过，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经济衰退时取得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同样贫困的农民。另外，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因为离开固化的农业社会而增长了见识，知道如何建立新组织、利用组织的力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这些特性在几千前中一直是由上层社会垄断的，因此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倾向和能力远远超出此前被禁锢在传统农业小社区里的农民。随着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和制度的持续，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上层社会必须安抚或镇压尖锐程度远胜于以往社的会阶级矛盾。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是工业革命的诱因，同时，海外扩张也使得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后都拥有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空间。因此，在工业革命前后，虽然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强弱不断改变，但它们面临的外部条件是相似的——与其倾全力在本土向邻国发动战争，不如用更小的代价到海外争夺利益。1870 年以前，在盛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欧，上层社会之间维系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当然，和平不是绝对的，偶尔也会有拿破仑战争这样的事件，但很少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某国的制度产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从总体来说，上层社会之间竞争的缓和使得国家机构的作用偏重于对内镇压破坏性力量，直到普法战争后，各大国才把国家机器的中心偏向于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但依然时刻警惕着下层的革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日益增多，经济危机频繁出现，欧美社会内部相对和平的年代，各国上层阶级建立远超前代的警察、监狱、军队、法庭和庞大的文官体系自然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威胁。考虑到此前欧洲因中世纪政治体制残余而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经济上，传统马列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换。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不参与劳动，不创造价值，却占有商品的部分价值（剩余价值），因此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因为资本家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具有相应的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避免生产相对过剩。在过剩产品无法向外倾销和技术进步不足以提供投资需求的前提下，社会会爆发经济危机，生产和消费螺旋下降，过剩与贫穷并存，直到生产力被降低到一定水准。

马列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论显然是马列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关键所在，因此也是反对者集中火力批判、攻击甚至漫骂的领域。本书在此也将结合 19 世纪-20 世纪前期的历史背景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

先说劳动价值论。不考虑少数人占有垄断性自然资源，如耕地、石油、关键交通枢纽的情况，人类用来消费、交换的物品肯定是劳动成果，里面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如果把主流社会的劳动强度、效率都取一个理论上的平均值，然后以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动做计量单位，确实可以算出生产大部分商品所需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一般来说，人们并非是按照这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交换商品的，商品的价格由供需决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商品的交换价格会在其真实价值附近上下浮动，平均值接近其价值。

既然价值只有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平均价格中才能体现出来，能以劳动价值论准确的描述的社会就应该是那些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否则就得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或是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局部范围。从工业革命到今天，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规模和占有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劳动力和资源基本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但除了工业革命最初的一代人时间，重工业产品——生产扩张的根源所在，却只能来自重工业自身，因此重工业产品和重工业本身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稀缺的重要物资，整个社会自然也不能被看做一个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一个严格依照劳动价值论设计的经济制度和古典西方经济学一样，只适用于局部领域的分析。

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必然推导结果。既然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劳动，那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占有商品显然就不属于“合理”分配。不过，读过开头几章的读者应该知道，本书作者是坚决反对把“合理”这种属性引入唯物主义分析的。唯物主义分析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如果你试图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历史，就不应该使用道德标签或感性描述。

具体到剥削这个问题，作者还是要强调，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工业社会都远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经济体，直到今天，工业生产能力尚且没有满足全人类的生活需求，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能力甚至没有完全占满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在不断的扩张。正如前面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能主导扩张的一方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优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时，资本家占有工厂和重工业产品，而无产阶级只能出卖劳动力。只能来自重工业的重工业物资供应有限，劳动力却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无限征集，在工业水平能够提高农业生产上限后更是如此，因此占有相对稀缺资源的资本家占有全部利润，无产阶级却只能索取勉强维系生存的工资。这也可以理解为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收入实在太低，低到了只能勉强维系生存的程度。即便工业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

一旦只提供简单劳动的工人可以取得稍高于温饱线，也就是高于一般农民的报酬，自然就会有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把工资重新拉回温饱线。只要工业还能够从传统社会得到廉价劳动力，简单操作工人的收入就不会超出温饱线太远。

当然，光是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还不足以支持工业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技术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熟悉工业生产，能够维系工厂运转和促进工业进步的工程师、经理、技工是不能由传统农业社会提供，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产物。因此，相对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他们也是一种稀缺"物资"，能够分享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增长，获得远高于养家糊口所需的报酬。不过，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第一代工业母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操作都非常简单，技术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还不象后来这么高，工业经济也不需要多少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所以不仅科研、技术人员占工业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他们能分享的财富也非常有限。由于工业技术简单，扩散快，体力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熟练技工，或者资本家本身直接承担技术、管理工作，所以，相对物质资本，科技、管理人员的稀缺程度要差的很远，工业化产生的剩余财富大部分还是被资本家占有。科技-管理阶层要等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内燃机革命）才能在工业剩余财富分配中占据不可忽视的份额。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剥削的本质，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少数资本家因为他们拥有的工业资本而占有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除此之外，只有少数技术、管理人员拥有高于温饱线的收入，大部分工业人口都属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与农民相差无几。因此，如潮水一般从工厂里涌出的工业品肯定无法在工业社会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即便考虑到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前面讨论资本主义特性时已有了详细论述。在工业时代，由于现代工业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工业部门够创造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保持在温饱线上的工资，所以产品相对过剩的问题比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严重的多，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找到市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有一天这个矛盾的激化将给无产阶级接管世界创造机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随着主要工业国家的全部人口基本工业化，同时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地区人口流入的限制，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即便不占有资本和技术，也可以因为竞争的缓和而获得超出温饱线的收入。另外，在内战和革命的威胁下，发达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和因为科技迅速进步而产生的生产设备更新需求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购买力。这些情况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意料之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但起码缓和了矛盾，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生活未能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而同步提高，而这种现象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同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以垄断选举权、限制候选人资本，以私有媒体和政治捐款干涉选举等方式垄断了政治权利，从而保证没有人可以用合法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转化为平民的购买力。结果，在工业科技为经济提供了无限增长可能的年代，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传统马列主义把这种问题全部归咎于私有制，认为这种以追求私有财富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规则造成了人类的贫困，同时还给规则自身带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马列主义认为，有且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条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由少数资本家拥有且直接经营，购买力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确实直接体现为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体现为私有制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禁锢。不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简单的废除私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技术-管理阶层的权力急剧扩大，且很难制约，这同样会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某些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资源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倾销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并压制新的工业经济体出现。因此购买力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购买力不足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不是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制能解决的，事实上，象苏联这种号称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少数人占有超出平均水平的财富和“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情况。

传统马列主义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根本危机，也为它的结束做出了美好的预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重工业对农业进行改造后，也包括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将取代资产阶级或是残留的土地贵族、军阀等统治集团，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新社会中，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会象过去那样参与生产，而且还会管理生产，占有所有财富。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剩余产品都会被分配给它的成员消费，拥有无限扩张可能的工业不再受到购买力的限制，所以，它也是一个富饶的社会。

这个预言是颠覆性的，因为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由少数人在事实上垄断政治权利和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几千年中从未变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此解释为农业社会的制度竞争淘汰了那些平均分配剩余产品的社会。同时，所有的上层阶级都有一套完美的理论，证明少数人统治社会（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合理性和神圣性，甚至是神秘性。如今马克思说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接管社会。列宁则真的领导工人赶走了资本家和政府，破坏了帝俄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系，旧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习惯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此绝不能接受。大部分批评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少数理智一些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马克思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趋势来看，这其实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很自然的一个推导结果。

前面在分析农业社会时，作者曾经指出：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财富和权力集中于上层社会是因为上层社会要承受制度竞争的压力。在经济比较稳定、无法超越自然上限的前提下，把剩余产品分配于下层会减少这个制度的竞争力，这是农业社会的规律。到了工业社会，由于某个制度的竞争力决定于这个制度所控制的现代工业规模和水平，而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不断增长的潜力，所以制度竞争主要体现为比较哪个制度更能促进工业的增长。至于把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这种小小的竞争优势，在指数化增长的工业经济面前不值一提。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导致工业经济体系不能以理论速度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市场不足。英国因为占有广阔的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因为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而破坏宝贵的工业能力。随着传统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外部购买力越来越少，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马克思认为在废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后，不需要考虑市场限制的公有制工业社会将取得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够以更强大的物质实力来淘汰现有社会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结论。旧俄国的工业基础曾是资本主义列强中最弱的，但苏维埃政权根据现代工业的具体结构而不是贫穷的工人的购买力制订基本的经济政策，把一切剩余产品用于分配或投资，从而取得了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经历了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后还是坐到了第二大工业强国的位置，这体现的就是新社会的经济竞争优势。当然，在提升最终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上，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确实有其优势，公有计划经济确实不够灵活。但在大工业时代，这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可以通过在消费品生产分配领域保留一部分的市场经济来解决，后文将会继续分析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后期，另一个现象是技术-管理精英相对地位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工业技术比较简单，技术相对资本分享利润较少；同时因为企业规模小，资本家能够亲自参与管理；再加上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技术工人和非资方管理人员的收入始终与缺乏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的纯粹无产阶级拉不开差距。因此，当时工业社会基本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资本家为一方，包括技术-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阶级为另一方。

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前面曾指出，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马克思和列宁敏锐的观察到：虽然工业物资和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同样是工业经济运行、扩张所必须的稀缺品，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工业物资不必非得属于少数资本家才能起作用，技术能力却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存在。事实上，在 19 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主要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许多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后代沦落为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社会寄生虫。所以，消灭资本家，让无产阶级自己来管理生产，看起来是既可行，又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更有希望在制度竞争中取胜。

从破除市场限制和消灭无用的食利阶层两个角度考虑，马克思认为一个消灭资本家阶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接管的社会在制度竞争中会占有优势。此外，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无产阶级必然有自发促进这一变化进行的愿望和行动。由于无产阶级人数众多，且真正控制了这个社会的运行，所以马克思认为新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速度会比制度竞争所导致的制度更替更快，更自然。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马克思这个预言似乎没有应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倒是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政权已经灭亡或变质了。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这个建议，才得以进入战后的繁荣，一直把霸权维系到今天。从产权角度看，福利制度、高累进税、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允许工会的存在、对工作待遇和劳资关系进行限制、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社会调控措施其实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严格限制。同时，资本主义强国还向无产阶级提供额外的收入以增加购买力、稳定本国底层社会。必要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会把企业国有化。从政治方面来看，19 世纪受到性别、财产、种族、受教育程度严格限制的上层社会选举权已经基本扩大为普选权，被选举权也在

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这些制度在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和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即便不是罪大恶极的共产主义，也算是离经叛道、破坏自由主义原则了。

至于说无产阶级接管社会，其实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阶层早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控制权。且不论在中国、苏联、东欧管理社会的精英官僚，即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主导经济运行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垄断企业也基本成为了股权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分散的结果是所有者无法具体操控资产的运行，甚至无法控制利润的分配。专业壁垒和个人权力的分散使得监督成本越来越高——本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就是所有者没有管理、维护工业体系的能力，监督自然也无从谈起。股东只能听任公司的经理们通过官僚体制给公司做决策，给自己发高薪，甚至把股权向高级管理人员转移。另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在社会总产值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一般要占 40%或更多，这意味着技术官僚合法地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财富的流向。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许多公司的股东自身也是由无数分散股东所有的法人，而不是自然人，各种法人互相持股、交错控制是很常见的现象。技术官僚们只要稍有合作就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全部资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透过复杂的产权网络，和经理、律师、基金管理人、工程师们组成的技术官僚集团相对抗、主张自己微弱的权利。在名义上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中、苏两国，官僚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自身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象日本这种后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技术官僚干脆把私有企业这层外壳丢掉，通过数个根本无从寻找所有者的大集团来统治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安抚下层阶级。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那种产权明确、经营自主、资方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如今只能在消费品工业等低利润、低技术附属产业或是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区才能找到了。

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私有制将被消灭，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把私有制定义为他们生活的年代里的那种不受控制、产权明确到具体资本家的私有制，那么资本主义至少在其核心地区的主要经济领域消灭了这种私有制，因为它并不适合大工业时代。他们还预言无产阶级将控制社会，预言也应验了，但取得权利的只是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他们先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作为小资产阶级而存在，然后他们和资本家结成联盟，最后他们干脆把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附属品，反过来统治自己曾经的同伴，限制这一进程的继续进行。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没有想到的。

只要有利润，能实现扩张，资本主义不会被任何具体制度所限制，这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在 20 世纪，资本家阶层不过是资本在某个发展阶段合适的代理人，如果这个阶层的霸权会阻碍资本的扩张，那么这个阶层自然会在竞争中被削弱或干脆消灭。不过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变，它都是一种在制度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既不一定和人类的福利相合，也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必然性。地球的空间、资源和物质刺激能给人类带来的幸福都是有限的，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何况大部分制度修正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将来或边缘地区。在中国和苏联相继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失去了外部竞争压力，自身又基本结合为一体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势必遇到全面危机。

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最重要的预言自然是共产主义。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指出了灭亡的道路，同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灭亡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似乎“共产”是

关键，其实这是中文翻译的一个结果。在共产主义中，共产只是方式，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人类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而不能自由的生活。比如说农业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 80%以上的人口必须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艰苦、单调的劳动，而无暇顾及艺术、文化，这是物质条件对自由的限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本来人们可以自由的相爱，但社会压力促使人们按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挑选夫妻，以在集市上买肉的方式进行性交易，这是社会结构对自由的限制，也叫异化。两种限制常常互相结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限制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人类利用工业带来的发展潜能扩大自己的自由。

共产主义所说的自由发展并非是无限自由。至少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人类绝对不会拥有随意去其他恒星系旅游的自由，也不会拥有随意杀人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在那里人类能够在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尽量的利用现有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自由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显然是现代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会。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消灭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不平等和经济危机，不仅生产力会迅速发展，平等的人类也可以从中获得天堂。当然，这个天堂是需要劳动来维护，但马克思认为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把劳动变成人类的需求与享受，而不是痛苦。

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社会变化恰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所以共产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顺应历史潮流，消灭资产阶级，接管社会，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改造社会。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短暂专政阶段。传统马列主义还预言共产主义革命一旦在某个主要国家出现就会立刻蔓延到全世界。这个时间先是被一些共产主义者放在 19 世纪末，然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使大家认为这个时间也许就是 191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主义浪潮和越南战争也曾经是被共产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时刻。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事件和时刻都已经成为历史。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最重要的预言——共产主义的来临，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依然统治着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很显然，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走向的把握和对未来的规划都有一些偏差，这种有偏差的理论虽然足以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足以让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进入工业时代，但还不足以指导世界进入共产主义。具体而言，传统马列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弹性，没有预想到资本主义会从共产主义思想中借鉴如此之多的内容，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传统马列主义也低估了管理、改造社会的难度，没想到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远不足以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另外，传统马列主义也没有想到世界的发展如此不平衡，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压制落后国家，从而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分出一部分利润去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更重要的，唯物主义虽然是科学的考察方式，但已有的大部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 20 世纪以前总结的，19 世纪和此前的农业社会是一个以物质力量为基础进行激烈制度竞争的年代。到了 20 世纪，制度竞争的规模和方式都和以前大不相同，原有规律的适用性甚至规律是否存在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讨论。

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是自由工业资本主义盛极而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建立的时代。他们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给出了一个最精确的描述和具有

最大可能性的预言。不过，他们不是上帝，无法把那些他们逝去以后才出现的客观条件变化和历史的偶然性全部纳入考虑，因此他们的预言显然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具有历史局限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图像比做一个三维的形体，其中某个延伸方向代表时间轴，那么，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平面，平面对历史这个三维形体有一个截面，马克思和列宁对这个截面做了足够精确的描述，并预测这个截面将延着时间轴平移，构成未来的历史。作者和读者处于 21 世纪，距离那个时代已有 1 个世纪，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维度（三维）来观看这段历史，自然要比从一个截面（二维）去推断未来的传统马列主义者看的清楚。

马克思和列宁都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因此能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及以前的历史规律作出精辟的总结，根据当时的历史趋势对未来作出了尽可能精确的预言，但传统马列主义却并非因他二人而出现。唯物主义历史分析方法是人类共有的科学工具，工业革命前后人类社会的巨变也是所有人都可以观测的事实，无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更是在还不知道马列主义的具体内容前就做出了革命尝试。即便马克思和列宁都不幸在童年夭折，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类似的理论也肯定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被其他人提出。其实这也应该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小小结论——马列主义是具有普适性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其存亡自然与具体的个人无关。

科学和艺术不一样，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任何人都可以对科学理论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和论证，修正甚至推翻理论也是合乎科学精神的做法。曾被无数革命者奉为真理的传统马列主义也一样。在后面的章节，作者将对 20 世纪历史运行方式的变化和今天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行分析，尝试给一些传统马列主义已经不能再做出有效解答的问题作出解释。

十三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

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依托于物质，是物质运动的产物。当然，这里说的物质运动不限于飞机飞行这种宏观机械运动，也不限于铁矿石被造成汽车这种不涉及人类自身变化的运动。象人类身体中的神经电讯号这种微观复杂运动，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变异这种社会运动，其本质上也都是物质运动。从理论上讲可以用科学手段去研究。但是，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积累的知识数量出发，人类对微观领域或足够复杂的体系，如人脑的具体运行过程还很难做到量化解释和精确预测。至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不仅异常复杂，而且涉及到人类自身，研究者既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考察，也无法随意做试验，相对的认识水平还要更低。如果用物理学来比拟的话，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应该还处于前牛顿时代。人类只能对这些领域进行很模糊的定性描述，或是在图书馆、档案馆中记录大量的、无法准确阐述其联系的孤立事实。

因此，今天的人类和以往的人类都不能精确的描述那些直接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物质运动，比如人类尚且不能通过测量某人在某个时刻的大脑状态和外部刺激来预言此人下一步的思维与运动，也不能很精确的指出某个文化事件将在人类社会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人类甚至不能明确指出人类的意识究竟与什么样的物理或化学现象直接相关，也不知道如何直接干涉思维的运行。（即便人类拥有这个能力，恐怕这方面的科学实验也不会被允

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不掌握这些领域的物质运动规律。一般所说的“规律”主要存在于物理、化学、工业技术等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科学领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事实：首先，来自生物界的竞争规律也被人类社会所继承，各个人类个体和各种人类团体始终在不断的竞争，竞争的基础就是宏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其次，在 20 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传播依赖于特定人类的迁移和特定社会组织的扩张。在这两个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不论上层建筑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不论某个人类个体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如何变异，以外界物质力量为基础的竞争都为最终的结果划定了可能的存在范围。具体而言，可以视为客观条件的科技背景和物质条件共同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的上限，那些能够促使生产力达到甚至提高此上限的人类团体将在竞争中扩张，而不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人类团体将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被淘汰。在人类团体通过互相竞争进行淘汰的过程中，依附于人类团体的上层建筑也随之扩张或被淘汰。同时，物质条件、科技背景和制度构成了人类个体的外部环境，由于人类个体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 因此依附于人类肉体的个人意识也会受到竞争规律的左右。最终能最大限度促进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在这个上层建筑内获取利益的个人意识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历史规律的由来。

这两个历史规律其实并不能帮助人类理解社会和思维的具体变化过程，但既然上层建筑和思维都必须依托于外界的宏观物质力量而存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宏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来推测上层建筑和思维运动的变动趋势。这是一个很简单，同时也很巧妙的科学方法，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进化论的创立就是很相似的一个例子。19 世纪，达尔文在给出进化论的时候，并不知道遗传基因的存在，甚至连同时代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假说都不了解（孟德尔的理论到 1900 年才被重新发现，在 1920 年代才得到验证）。但他通过观察确认自然界中存在以食物和生存空间为基础的生存竞争，再考虑到生物的先天性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代。于是，达尔文推论：千奇百怪的物种和各个物种的特异器官都是地球环境塑造的结果，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进化路线基本决定了生命的样式。无论生物基因的变异是随机变动还是遵循什么人类所不知道的规律，生存竞争只允许那些适应环境的生物占据主流地位。比如北极不会有不耐寒的动物，赤道上也少见毛发厚重的物种。至于究竟是什么内部原因决定了这些物种的性状，达尔文坦率的回答“尚待考察”。

通过对竞争原则的巧妙运用，马克思和达尔文绕过了人类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对历史和生物界做出了简明而不失精确的解释，这是他们智慧结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本文前半部分的原则。不过，所有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在利用某个规律来解释事实、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确定规律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了眼下的情况，所分析的样本发生剧烈变动时尤其如此。本书前面的部分曾粗略的论证了竞争规律在 19 世纪以前，也就是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以前的适用性，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简要分析。鉴于工业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连续不断的冲击，在这一章，作者将考察常用的两条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否在工业革命后的当代社会成立，以及是否能用来指导未来。

通过详细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条规律的由来后，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成立的几个前提：

首先，这两条规律都是统计规律。所谓统计规律，就是忽视具体个体的运动方式和特性，只考察整个群体的平均特性和整体运动趋势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这种规律不能用来解释或准确预测单次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但只要被考察的个体和范围不断增加，这种规律就有其用武之地。比如热力学定律可以指导蒸汽机的设计，但不能用来预言单个水分子的运行轨迹；交通流调查数据可以用来为路网建设做依据，但不能帮助交通警察追捕肇事逃逸的汽车。同样，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体到某次社会制度变革和某个特定的个体的思想变动，遵循唯物主义的科学在今天尚且无法完全解释和精确预言。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与社会地位不相适应的思想完全可能在某个单次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不过，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个人或制度）足够多，社会变革或思想斗争足够频繁，那些在当前背景下更能促进物质财富开发利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肯定会取得绝对的优势，那些与大趋势相反的偶然现象会被更多的其他正面现象所淹没。

统计规律的有效性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具体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承载制度的“样本”就是能维系一个制度独立存在的文明社会，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联盟、一次冲突等等。前面已经论证了:由于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旧大陆农业地带内部的相似性，农业时代的旧大陆可以算做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制度竞技场，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足以保证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采用最符合当时技术背景的制度。

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使交通越来越方便、通讯越来越便利；工业财富的增长也给一个庞大、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体系创造了生存条件，这意味着国家或帝国的规模上限越来越大（包括它们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象英国、美国、苏联这种世界性霸权和中国、印度这种本土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都成了寻常之事。同时，全球性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渗透在轮船和铁路的支持下成为可能，竞争烈度不断上升，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连同它们所支持的上层建筑一并被消灭，或沦为附庸。

国家规模的扩大也和已探索地理空间的扩张有关。旧大陆的人类曾利用航海技术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控制，一些世界性帝国的基础也正是远洋商船和舰队。不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是有限的，在美洲、非洲、大洋洲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空白土地供殖民者开发。因此帝国扩张的速度很快就就超过了可开发土地的增长速度，帝国的规模最终足以和整个地球的大小相比，参与竞争的独立社会集团自然越来越少。19 世纪早期还有六七个欧洲强权争霸，另有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保持传统大国地位；到了世界大战时代就只剩英、德、美三国在附庸国的帮助下角逐霸权，冷战只有美、苏两个主角。

随着参与竞争的社会集团越来越少，竞争结果的偶然性将越来越大。打个比方，如果棋手 A 略强于棋手 B，对奕有六成把握取胜，那么如果比赛 1000 局，几乎可以肯定棋手 A 将在总成绩上领先，强者胜率接近 100%；随着总局数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来越高。在七局四胜时胜率为 71%，五局三胜时为 68.7%，三局两胜制下，胜率降到 65.2%，单局决胜负时胜率又回到 60%。类似的，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是很好的例子（后文将就这一事实做详细讨论，这里只做抽象的论证）。

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不受控制的经济自由竞争会导向垄断，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竞争也一样。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主导、结合西欧日本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基

本上一统世界，垄断了先进工业技术、控制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铸币权；能够随时消灭挑战现秩序的中小国家而不必顾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大国的意见。以往多种制度依托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进行竞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读者应该记得，前一章曾经指出工业经济体系内部很难产生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因此，现存的垄断性西方体制在内部和外部都缺乏竞争压力，统治集团和依附于它的上层建筑没有随生产技术增长而更替、变革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总结而来的唯物主义规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是物质力量能够主导思想、社会运动。具体而言，这要求文化、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依附于特定的社区、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集团，思想依附于特定的人类个体。当某个社会集团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时，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随其扩张而扩张，或是迫使其他社会集团向其学习；竞争失利则意味着特定的上层建筑随社会集团的衰弱或灭亡而被淘汰。思想在社会内部的传播也一样，社会地位较高、闲暇时间多的的人很容易赢得追随者，穷困而死的寒士甚至没有机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理论创新。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早期，宏观的物质力量给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划定了严格的轨迹。

通过分析物质力量对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影响方式，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思想传播缓慢，生存竞争残酷、人类个体迁徙较少的社会中才成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不成立，都足以威胁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本身的基础——如果思想传播足够便利、成本足够低，比如说人人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那么即便是最穷的人，只要提出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有可能在饿死之前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主流思潮。如果生存竞争不残酷，比如说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那么一时得不到足够财富的人或组织就无法和他们的文化、制度一起被淘汰。如果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断的长途迁徙，缺乏物质竞争力的思想和文化就无法随特定社区的消亡而被彻底淘汰。

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但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两三代人以后，这三个条件都开始消亡：现代工业支持的印刷术和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义务教育大大提高了思想传播速度，同时把思想传播的成本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水平，这一进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1848 年欧洲大革命和 1870 年巴黎公社虽然失败，却能逼迫统治集团开始为无产者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险；远洋航运和政治经济格局的迅速变化则促进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到了 20 世纪，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在核心地区也不再成立了。

思想和上层建筑的扩张并不等于有形的物质结构的扩张，任何时候都不是。只是在农业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一度限制了它们的自由传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集团或人类个体取得竞争优势时，思想和上层建筑才能被动的扩张。但即使在农业社会，某些局部领域内也有相反的个别例子,比如说适量的苦修或殉道行为有时会增加某个宗教的皈依者。这同螳螂的生殖方式相似——完成交配的雄螳螂按基因的指示把自己做为雌螳螂的食物，用自身遗传因子的消亡换取更多遗传因子的可靠复制，从而使这种自杀方式能代代相传。在考察古代史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考察的主体是思想和上层建筑，人类和人类社区就象雄螳螂的躯壳，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

既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得以成立的 2 个前提条件均已不成立，这些曾经很有效地解释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规律就不能再用来解释当代社会，更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不过，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状态并不比他们的农民祖先好多少（如果不是更差），温饱、医疗等生存问题依然是影响这些人口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只能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减少这种贫困社区的数量。因此，物质竞争规律还可以解释今天许多具体社会问题，这在第三世界尤其明显。但无论如何，以竞争规律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不再应该用来预测全人类的未来，因为读者和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今后数十年甚至数年的历史走向，而不是千年以后是否会有人间天堂。本书前面十几章所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即便这些规律继续成立，在短期内（几年或几十年），偶然性或其他因素往往会压倒长期趋势。

以物质竞争为基础的历史规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的结束。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特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规律。本书标题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正是指这两条规律已经不再有效。不过，这两条规律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分析传统社会时的两个成果。它们因其简洁、有效而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志，甚至被某些人认做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全部，这种错误观点应该得到纠正。

在本章的开头，作者已经指出：物质运动的范畴远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运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变动也属于物质运动，可以被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所考察，并用尽量简洁的规律进行概括。规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所以背景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历史规律的出现和结束。但某个规律的结束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是科学原则的结束，即便这个规律已经因为历史因素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虽然不是人类考察世界的完美工具，却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东西。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里，作者将继续以科学原则为基础，尝试寻找新的历史-社会规律；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用简洁的规律来概括的现实和偶发事件，作者也将尽量精确地对其进行逐个描述，从而为探讨当前和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依据。

十四 、最初的世界文化-道德体系

人类是理性的，人类做某件事的时候，总要考虑“能不能做到”和“这样做的后果”，以此作为做行动计划的依据。不过，人类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样做对不对”尽管无法量化的用数据或事实来考核，却也是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往往还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认为不对的事情，有利于自己也可能不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可能“知其不不可为而为之”。看来在物理定律以外，还存在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化-道德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文化-道德体系真正提供的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通过把具体的人类行和这个终极目标相比照，我们可以给每件事加上善、恶、好、坏的标签，然后决定是否该去做。比如,在中世纪的西欧上层社会，这个终极目标就是上帝的光荣，人类的行为规范就是要按既定的社会秩序为上帝服务。具体而言：教士用祈祷来赞颂上帝的光荣，贵族（和骑士）用剑保卫上帝的属民，农民用劳动来供养前

两种人。服从这个秩序的行为就是正确、善行，应该得到肯定和奖赏；挑战这一秩序就是错误、邪恶，应该被制止并谴责。

对于身处其间的人类来说，文化-道德体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其他行为规范其实都是文化-道德体系的某种表现形式，法律就是一部分道德的量化体现。在大部分社会里，执法部门能够用暴力干涉某些人类的行为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而且这种暴力行为还能够得到社会认同，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认为某些行为（比如主动杀人）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处或至少被阻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的按道德规范行事，这其中有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罪犯，也有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不过，铤而走险的罪犯事实上并不否认现有道德的主流地位，至于伪君子，正如一句老话"虚伪是邪恶向美德传达的最高敬意"，他们都算不得文化-道德体系的真正敌人。真正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反对既有文化-道德体系的叛逆者、或者说彻底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总是绝对少数。除了那些天翻地覆的变革年代，大部分社会都拥有一个稳定的，足以给绝大多数人提供终极目标和行为规范的文化-道德体系。

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古人而言，他们的文化-道德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借助宗教的力量披上神圣色彩。但在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世考察者看来，道德体系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将各个社会集团的长期利益分配矛盾进行调和的一种规则，是制度之间竞争的暂时胜利者。在物质竞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里，文化-道德体系的特征和基本结构都已经被经济基础所确定。本书前半部分对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变化规律做了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作者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几条主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工业化充分展开后已经结束，因此无法完全解释现代史和当代社会的文明史。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将对工业化充分展开以后的社会变化趋势进行总结，为本书的当代史部分和当代社会研究确立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道德体系发展过程的探讨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全球化。不过，一般认为：广义的全球化从 1500 年左右开始。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工业革命使全球化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且不可逆的事件。在本书中，作者以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1840 年前后）为界，把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旧大陆发达的航海技术使得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也使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有能力把海外的弱小文明及空白地区征服为殖民地。一个连接了所有文明地区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各个文明地区（含殖民地）之间能够进行以往陆地交通所不能实现（成本太高或根本无陆路可通）的经济交流。不过，在工业革命以前，发达地区并不能对落后地区取得绝对的生产效率优势，在旧大陆诸文明中并不存在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核心地区；而远洋运输所能输送的人力和物资有限，无法用军事或移民等方式改变一个发达农业文明的基本面貌。同时，陆地运输依然保持在此前数千年的低水平上。因此工业革命以前的全球化并只是意味着各个文明之间部分剩余物资的交流，和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变革，各个主要文明地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差异并没有消除。除了西欧的部分发达地区，其他主要文明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形式都大体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由于生物的可复制性，在这一阶段，美洲和旧大陆之间进行的物种交换如土豆、烟草、玉米、马匹、天花、梅毒等，要比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物资、贵金属、文化、人口更重要。

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使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帆船时代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被蒸汽船和铁路所改造，能容许物资、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流量通过这一网络进行交换。即便考虑到工业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总量和世界人口，全球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和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到了不可忽视的水平。同时，西欧和美国率先从现代工业中受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潜力都达到了其他农业社会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的使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主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地区迫使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从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用军事手段保卫这种霸权。在这种局面下，任何地区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主要的唯物主义规律在工业社会早期还基本适用。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最终将带来一种全球通行的主流文化和道德体系，至少在已经被新的世界经济改造过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是这样。曾经因为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而并存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道德体系将同时发生变化，最终互相融合。当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预计：即便这种主流道德体系得以建立，由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上层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同，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区别属于同一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永久性的分化。在历史上，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可以信奉同一个上帝，接受同一批宗教知识分子对道德体系的阐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也同时对儒家官僚和农民有效。虽然同一个道德体系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标准，但底层民众和上层社会之间并不因此而认为对方“不道德”。如果我们认为此前的历史发展将继续保持自身的运行轨迹，可以想象，在财富分配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大背景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文化-道德也将是一个维护既得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地区呈不同面貌却又统一的体系。

在实际的历史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最多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工业革命爆发、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到 1914 年，大概有一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从工业革命爆发到工业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也需要时间。一般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是证明工业财富和力量已经压倒旧秩序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工业强权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暴力，迫使非工业强国屈服、开放市场。这样算来，工业时代的道德和文化只按照传统唯物主义规律运行了五、六十年，不到 2 代人的时间。由于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所以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

尽管这种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扩展到全世界，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核心地区取得垄断地位。但它毕竟是第一个“世界文化”，第一个能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地区都取得相当数量皈依者的文化-道德体系，第一个形成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它的主要载体是核心地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边缘地区的部分买办-知识分子西化精英——主导 20 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大多来自或师承于这一集团。因此 20 世纪的文化-道德发展受到了这一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道德体系也为世界各地之间的人类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深刻的影响了随后的历史。下面将对它的内容和由来进行探讨：

这文化-道德体系的首要特征是乐观与自信：

18 世纪的欧美人还在怀疑人均生活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过希腊-罗马时期，担心飞速增长的人口是否会压跨经济，甚至争论历史是否在走向另一个黑暗时代。考虑到欧美社会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繁荣的根源只是数百艘木制风帆战舰所保证的海权和新大陆过剩的生物资源，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至少在英、法、德、美等核心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显得很荒谬了。19 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居民和他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和工业财富的飞速增长，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口都承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超出以往任何时代的时代。即便这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工业财富确实改善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如果这一发展趋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最终人类（白人，至少是那些祖籍西北欧的白人）将消灭贫穷、饥饿和疾病，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富足、安宁的乐园。

高速扩张的经济基础和繁荣的社会造就了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文化。具体而言，在一个扩张性的繁荣社会里，那些过分谨慎小心、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把大量资源用于维持现状或储蓄备荒的个人或团体相对缺乏竞争力，无法分享迅速增长的工业财富，最终会被淘汰。反过来，那些敢于冒险，愿意做长期投资，积极寻求扩张的个人和团体将获得大部分社会经济增量，成为主流集团。在这个时代，经济基础最后一次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尽管现代工业经济以指数化的速度扩张，但它毕竟从零开始只发展了大半个世纪，绝对规模与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还非常渺小。所以没有人担心资源被耗尽，或是人类生存环境会遭到永久性破坏。在看到喷吐黑烟的工厂或是采空废弃的矿井时，人类心中只会感到自豪，而不是担忧。即便纯粹的破坏性力量——军队，也在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张自己的力量，但对于一个世纪未尝见过大规模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即便是拿破仑战争也没有对平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真正的大战恐怕要上溯到三十年战争）的西欧人来说，那不过是自身霸权地位的可靠保障，不值得为之恐惧。

工业财富的高速增长与近乎无限的可开发资源并存，生产力还没有被市场的绝对边界所限制，这种局面保证了充斥整个中上层欧美社会的乐观、自信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阴影。凡尔纳和笛福的小说，浪漫主义的美术和建筑作品就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

理性化与功利化是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另一个特征。

工业和此前已经很繁荣的海外贸易都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本土的地产和稳定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不再是上层社会物质力量的唯一来源，甚至不再是主要来源。因此，欧洲稳定了几百上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让位给新的社会结构。尽管保守分子们竭力宣扬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的神圣性，但在这个时代，文化-道德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力量的竞争，那些只适应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很快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剩下的一些残片只能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试图指导世俗生活。

另外，从全球来看，由于工业经济体迅速的扩展,原本局限于各个地区的文明互相融合，至少也会互相竞争。原本局限于各个文明内部，声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道德体系发现自己被迫与许多同样自称至高无上的同类共存。显然，对于具体的信徒而言，上帝和安拉，孔子和穆罕默德，神父和拉比不可能同时同时具有绝对的神圣，即便在

盛行基督教的欧美社会内部，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以及各种小教派也被迫接受共存的事实。这种以宗教冲突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竞争也沉重打击了它们原本的神圣性。

传统权威被打倒，但正如前文所述，“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工业社会无法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构筑稳定的文化-道德体系，被打倒的传统道德没有相应的替代品，这促成了文化-道德体系理性化、功利化。事实上，这是所有社会转型期的共同特征。但这个时代与以往的社会转型期并不完全相同。

以往的新技术突破，无论它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也只能造成一次性的冲击。因经济基础变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有明确的方向，一旦经济转型结束，上层建筑的变化目标也就基本确定，社会重新进入稳定时期。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连续不断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计算机革命..........工业技术的革新从 1800 年到 20 世纪，几乎从未停止过。其中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基本生产技术的彻底变革。（负熵来源和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冲击都足以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或是新大陆农作物的引入相比。由于经济基础本身一直不能稳定下来，作为依附品的文化-道德体系不仅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甚至缺乏稳定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理性、宽容，不被任何既有规则所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风气自然成为社会主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技术问题，还试图用纯粹的功利计算和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本身。尽管真正的科学拒绝探讨人生的目的问题，但很显然，科学不主张自身的神圣性，承认自身不过是一系列目前最好的假说的汇总，随时可以根据最新的现实进行修正，这种灵活度高的柔性规则非常适合这个动荡的时代。至于宗教和其他传统的道德体系，都属于相对固化的行为规则。它们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与当年一统精神世界的盛况相比，几乎可以算的上灭绝了。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质财富的潜在生产上限不断提高，那些试图协调既有利益分配的固定上层建筑无论运行的多么和谐，也无法在竞争中胜过那些鼓励其成员直截了当去追求物质财富的上层建筑。一度盛行的理性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代表了这种文化特征。

否认任何既定权威的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一个崇尚力量的拜物教时代，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

达尔文的学说本是一个生物学理论，在作者看来，这一学说的核心部分甚至不能被称为“理论”。因为达尔文只是简单的把塑造生物的神圣使命从上帝手中夺出来，还给毫无意识的自然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上帝与其他神灵也同时失去了为人类历史设定目标的任务。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本无既定目标，弱肉强食是唯一的规则。更准确的说法是只有崇拜力量、认定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的社会集团才能生存下去、占据这个时代的主流地位。于是，为暴力竞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在社会的“潜意识”中成为主流。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本质区别。达尔文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了物质世界塑造现实的事实，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试图为这个现实贴上道德标签，认为强者侵略弱者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相配合的思潮而不是科学。另外，达尔文学说只是指出“适者生存”的事实，是一个事后观察者角度的描述。但在宏观物质力量成为主要竞争指标的 19 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主张“强

者生存”，把单纯的物质力量——财富和暴力做为预先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和个人追求的目标。

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使人们习惯于把道德而不是单纯的财富或暴力作为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接近一个世纪以后，政治家和政府发言人也总是习惯性地为战争和外交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借口终究只是借口，一旦到了不必顾及面子的场合，比如秘密外交谈判，所有的的决策理由其实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无论是友谊、道德还是诺言，在利益面前分文不值。所谓“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至于个人或企业的决策，更是如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开始脱离现实，但由于思想文化变化相对物质基础变化滞后，“人人自利，社会利益自然最大化”的理论正好赶上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支持。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主流舆论认为底层人口穷困愚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缺乏智慧，不配掌握这个社会的财富，从而为少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财富的现实找到了道德解释。在短期内，甚至连穷困的底层人口都暂时的承认财富分配两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是努力爬上社会金字塔,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直到他们在世界大战的苦难中回想起马克思的预言。

对力量的崇拜导致尚武精神，或者说暴力的高回报导致暴力盛行。虽然在这个缺乏总动员的年代，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很清楚工商业利润需要暴力来保卫——无论是针对落后民族还是其他工业国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会认为英帝国的富强与皇家海军的霸权无关。同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工业国家的平民们已经习惯于以自己国家的扩张为荣。因此很少进行激烈战斗的军队在社会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另外，欧、美、日军官团大多脱胎于旧的贵族武士，与政治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直接和非直接的军人干政屡见不鲜，在德国、日本等后发工业国尤其明显。

在西方扩张的大背景下，工业国战无不胜的军队使西方人们相信，尚武和勇敢是西方人区别于“劣等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其他民族要么被认为“不开化”、“不懂得战斗的荣誉”，要么被认为“民风柔弱，不会战斗”，少数几个剽悍民族被形容为“蛮勇而无纪律”。大部分西方精英认为：西方为了维系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保持这种特殊的品质。日俄战争虽然给了这种论点当头一棒，但很快也就被解释为日本学习西方比较彻底，或是干脆解释为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在这一阶段，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已经成了西方人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标志。

这种文化特征在边缘地区的精英中也有体现。边缘地区同样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建设独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而边缘地区向工业化地区最先学习的领域也正是军事领域。属于这个工业化世界而不是农业社会旧体制的边缘地区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军队或其他暴力团体里。因此，尚武精神也是新精英们将自己与无纪律的平民区分开来的标志。

1870 年以后，由于可扩张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少，各工业国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新的扩张空间必须到其他工业国家（在许多情况下特指英国）手中去夺取。于是军备开支和军队规模都迅速扩大，原本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尚武精神逐步上升为被认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族精神。最终，尚武精神对增加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惨烈程度起了很大作用。

对力量和财富的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各种文化标志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是艾菲尔铁塔、英国水晶宫、帝国大厦这种体现工业力量的工程奇迹，以及各个国家以工商业财富改造的富丽堂皇的首都。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一生奉行种族歧视和及帝国主义，不停赞美白人的“力量与责任”的吉卜林才能成为“世界性”（这个由工业社会精英构成的“世界”）的文学大家。1899 年吉卜林在美国身染重病。美国报纸曾逐日刊登他的病情公报。德国皇帝也致电给他的妻子表示慰问，荣耀无以复加。当然，吉卜林晚年也曾反思帝国主义前途和战争，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了他儿子的性命以后。至于前卫派艺术等反思既有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形式，虽然在这个时代萌芽，但根本无足轻重、发展缓慢，真正在公众中取得影响也要等到世界大战过后。这和吉卜林的转变一样，都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崇拜的是丰厚的现实利益。

在政治上，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前面曾经指出过，自由主义因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而成为主流。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由于扩张空间广大，经济发展对各个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联系要求较少，所以自由主义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1870 年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逐步侵占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投射到上层建筑需要时间、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以及英国等主要大国社会的运行惯性，所以自由主义共和制度依然暂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将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物质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所以，即便在西欧地区，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也还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工业革命以后，凡是在现代工业经济占统治性地位的领域，传统上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权利分配模式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一致质疑。在核心地区，甚至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利益集团都不得不承认：应该通过选举、考试等方式不断选拔有才干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不应主要依据一个人的出身来决定他的前途。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同样可以解释这种变化。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化太快，社会始终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依据血缘、等级等方式确定的政治权力传承尽管可以减少交接成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但在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来管理工厂和社会的工业时代，血缘政治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带来的少许优点根本无法抵偿用人失当的劣势；何况在许多情况下，稳定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物质财富生产最大化。其次，人口的繁衍和各个经济经济部门的全面繁荣使上层社会的人数和比例都扩大，统治集团的绝对人数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血缘关系足以协调利益分配的规模，因此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开始成为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调和矛盾的主要方式。在内部矛盾较小，大部分问题可以通过扩张来的解决的年代，资产阶级用议会政治足以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欧洲古老的贵族阶级逐渐变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因农业社会日趋发达而出现的集中决策政体尚未成熟就开始消亡。具体到各个国家，究竟议会的法统是来古老的蛮族武士集会传统，还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口号，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历史观只关心发展趋势，随机的触发因素很少能真正左右形势。

当然，议会政治并不意味着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至少在巴黎公社让西欧统治集团认识到应该对本国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以前，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只开放给少数人。被选举权的限制则更严格，80%以上的西欧成年男子都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在

1870 年以后，许多所谓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也不过允许 30%-40%的成年人口进行投票。除了象新西兰、挪威那样的偏远国家或白人殖民地，在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有选举权的成年人口过半数要等到世界大战。

归根结底，选举政治的根源并不在于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或是权利公有。在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依旧有效的年代，任何上层建筑的稳定模式都只能用能增强外部竞争力或有利于调和内部矛盾来解释。在物质力量高速增长，不进则退的工业社会中，让那些占有相对稀缺、重要性更高的生产要素的阶层取得更多权利，显然有利于工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因此，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只能被上层社会分享，平民和贫民阶层连名义上的政治权力也没有。当然，这个上层社会已经比以前大了许多。同时，只要市场足够广阔，允许工业经济不断扩张，底层人口就能通过出卖简单劳动力够取得足够维系生活的收入，至少不比他们的前身——农民和手工业者差。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暂时忽视下层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不会导致太大的骚动。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模式是精英主导下的共和制度。在北美洲的一些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由于人力资源紧缺，简单劳动力和资本、技术同样是稀缺生产要素。因此一部分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享选举权，而不必用暴力革命去争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念而言，这种明确由少数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并无不妥。因为精英主义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特征之一。既然少数精英已经用垄断工业资本和技术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的相对优秀。那么，让这些在智力上相对优越的人也垄断政治权力，替其余大部分下等人做决定，自然合情合理。对统治阶层、对整个制度都有利。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财富成为分配选举权的最主要标准。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都根据纳税数量或是收入、财产总额划定了选举权的边界，给予不同阶层不同的投票权。同时，考虑到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掌握的工业技术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也允许收入暂时不高，但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掌握技术的阶层拥有选举权。某些国家甚至专门为大学留出了议会席位。除了富裕阶层和技术、管理阶层，传统上占有土地和管理经验的旧贵族、旧官僚分享了剩余的政治权力。一般无产阶级则处于无权地位，甚至被禁止结社。直等到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劳动力也变的相对稀缺，他们才在名义上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精英主义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就是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祖籍西北欧的少数白人幸运的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力量，从而在整个地球获得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霸权。大部分白人认为霸权源于自己优秀的血统，冷静一些的评论者则认为白人特殊的文化是世界霸权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或是新教是白人取胜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看法，都把白人眼下的短暂优势归结为某种生而俱来的特殊优点，认为其他种族或民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达到与白人，尤其是西欧白人相同的发展水平。从这个前提出发，白人保持他们现有的地位，无条件的统治其他民族被认为是正当的，落后民族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引导”下，才能分享现代文明。

在 1914 年以前，白人的经济-军事双重霸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非西方人都把这一切看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接受了白人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在殖民地甚至还会传的更离奇。在白人血统优越论的指导下，不止一个国家曾试图招揽西方移民以“改善”本国的血统。由于西欧的工业帝国在海外连战连胜，许多殖民地士兵直到被宗主国驱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才终于在事实面前相信：原来白人也是可以被击

败，可以被子弹打倒的。即便是那些相对理智、相信本民族能够走出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命运的民族领袖，也基本上把目标和手段定为全盘照搬西欧的发展历程。对西欧发展模式的反思取得主流地位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主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中心地区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从长期来看，当以城邦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扩张性农业社会结束以后，在以稳定和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大环境中，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对于绝大多数底层人口来说并不很重要。温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水平保证了绝大多数底层人口始终生存在温饱线上，同时由上层社会拿走绝大多数剩余产品用于制度竞争或奢侈消费，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占有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底层人口“宛如一袋子土豆那样彼此相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底层人口会接受所有不太过分的上层阶级的统治，从而被这些不同的统治集团划归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即便在中国这种“早熟”的民族国家，只要侵略者能采用儒家官僚体制，下层社会也不会太计较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一般来说，在农业社会，从文化概念上消灭一个民族需要的只是彻底摧毁它的整个统治阶层。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集团受到了威胁，譬如在面对尚未半文明化的游牧民族劫掠时，整个社会才可能会以民族为单位做出反应、产生真正渗透到全民的民族认同感。

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能够动员全部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竞争，而不是一味维系社会结构，寻求稳定的社会团体能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基础。具体而言，社会变动促使底层社会成员加入各种团体寻求稳定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上层社会则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迎接挑战。（可能是应付危机，如蒙古入侵，也有可能是在增长的大潮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提高相对地位，如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和此前欧洲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提供了这种客观环境，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着资本主义进入主流地位是同步的。

在列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本国的消费者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买本国的产品，那么本国的企业显然会因此排挤竞争对手，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本国的企业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雇佣本国工人，或是本国的劳动力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制止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那么本国的劳动力就能减轻劳动力相对资本的过剩，获得稍微多一些的工资。这是一种互利的循环。在存在外部空间可供扩张的前提下，如果本国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和解，以寻求外部扩张、掠夺市场与资源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矛盾，那么他们确实可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西欧和美国、日本获得了经济基础，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爱好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这种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存在过的全民性集体认同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下层的，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新型的政权必须同时依靠全民教育体系和警察的力量，才能让底层民众对民族国家产生认同感并尽义务。在意大利、奥匈帝国等虚弱的工业国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新的统治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尚且不能达成利益同盟，民族主义也就缺乏自发形成的动力。在这种地方，国家或统治集团强行制造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行为更明显一些。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游戏规则，试图带领本国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也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种族文化相对

单一的岛国日本真正走通了这条道路，并在本国大部分人口中建立了现代的民族主义，其他边缘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还只是存在于少数西化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雏形。甚至连俄罗斯这种半工业国家都无法让普通的平民接受现代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多数人口中尚未建立，但已经接受民族主义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资源。因此在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将决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具体走向，并以经济侵略和工业化战争的方式逼迫那些尚未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

一个文化-道德体系首先定义的是世界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各种事物做出价值判断，最后以这些为前提，为其中的成员定义人生观，作为一个目标来指导人们该怎么活。人们与文化-道德体系的日常接触就是通过人生观来进行的。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的精英们也在这个“世界”文化-道德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用语言描述一代人的人生观很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用一部电影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这里只能对其进行简单描述。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对于本书来说，这个最初的世界性文化-道德体系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着重论证的是它的存在。

在这一代工业社会的精英们看来，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始。虽然财产和一部分头衔可以世袭、但至少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出身而否定他从事某项职业，甚至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对于这一点，虽然一些保留了许多前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地区还有一些不甚认同，但这种反对是无法拿到公开场合来讨论的，最多体现为个人的歧视。这种在国家内部广泛上的平等对于早早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不算太希奇，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贵族传统浓厚的欧洲，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事物。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阶层与地域之间。随着女性证明自己同样可以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工作，女性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某些国家的女权运动甚至开始争取将普选权和被选举权赋予所有成年女性。当然，直到这个时代在世界大战中结束，女性依然处于依附性地位。

伴随平等而来的是自由，这意味着尽可能的让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下决定。比如选择职业、择偶、选择居住地点等等，甚至允许一个人自主的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国籍。而这些权利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属于领主、家族和宗教机构的。当然，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这种“自由”并不自由。但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坦然接受别人强迫性的决定。

这种平等和自由即便有很多限制，但也是农业社会中任何组织所不承认的。同时，大量的人口在各个地区之间不断迁徙，不再安于祖辈的稳定生活。因此西欧社会传统上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解体，工业社会中的人开始以个人身份而不是家族、村社、教团等社会组织来面对这个频繁变动的世界。个人不再对身边的人负责，也无法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尽管许多人不再固定的从属于某个社会组织或阶层，但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驱动下，工业化社会的成员从此大都拥有固定的国籍和民族身份。这种身份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生活，尽义务并享受一些权利，只是其强度远弱于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小型组织。

个人主义和不断发展的世界导致竞争被看做这种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每个人都要在力图比别人、比过去做的更好。如果某个人因为没有进取心而被淘汰，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情他。个人奋斗，努力爬上社会阶梯，从此成为这种文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富足成为最

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人生评判标准。在这种人生观下，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自由的参与社会竞争，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博得自身幸福生活的过程。

以上是对这一时期主流人生观的简述。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这种人生观的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是因为遵从它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技术—管理人员，并为统治阶层积累更多的资本。由于工业物资（资本）和技术-管理人员是这一时期工业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因此这种人生观占主流地位的国家能够更快的发展工业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类似的，同样占据主流地位的财产私有制则可以用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来解释。当然，激烈的个人竞争自然会产生对平静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但一般来说，这种怀念虽必不可少却始终无法占据主流地位，不过是冰冷工业社会中的一点温情点缀罢了。

从理论上讲，这种生活是全人类的目标和未来，这种生活值得尊重并向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按前面提出的标准，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技术-管理阶层的经理、职员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即便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大多数人也只能摸到这种生活的一点皮毛。许多除了一套正装和当月薪水外一无所有的小职员只能在电影院里憧憬美好人生。至于庞大的下层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受过初等教育），在物质上并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多远，根本无暇关心所谓的新人生观。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被工业化精英们忽略了。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贫民区的火灾还是中国的内战，成千上万的生命损失都无法在报纸上比泰坦尼克号轮船占到更多版面；中产阶级妇女们组成的女权组织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雇佣的女工在超负荷劳动；这一时期奥运会对职业选手的限制则基本上把体育运动设置成上流社会的消遣。所谓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生活模式，其实只存在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世界性的，主要还是与农业社会世界各地上层社会分立的世界观相比，也因为它在接下来的 20 世纪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工业化世界在真正扩张到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同时，也有选择地继承了这种人生观和人生观背后的文化-道德体系。具体的影响将在后面几章谈到。

大部分认同这种人生观的工业社会成员在无法享受理想生活的同时，对正在快速扩展的工业化社会还是持乐观态度，19 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大致接受这种人生观对理想人生的定义。所以，无论是奉行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权，还是提倡社会改革的左翼政治力量，都许诺将带给所有人类这样的生活。并以此给自己的存在赋予合理性。即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大众宣传时，也不得不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个太过抽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用主流人生观重新阐述。

新的文化-道德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农业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它引导着大部分工业人口走向 20 世纪。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几乎所有认同这一文化-道德体系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希望维持现状的保守右派到主张社会革命的激进左派，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定义不同，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也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将在既有的惯性下运行，走向人间天堂。如果有什么波折，也是可以承受的小小代价。

历史将证明人类想错了。

十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 800 万到 1000 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　1887 年 12 月 15 日

20 世纪初世界上有 16-18 亿人，除去农业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工业国家的边缘阶层，大概有 1/10-1/8 即不到 2 亿的人口能分享到一些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善；其中数百万中产阶级及几十万旧贵族、资产阶级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世界在“进步”，可以指望自己的子孙过上令自己羡慕的生活，拥有比自己更多的生活选择。这些能分享到工业利益的少数人统治了 1900 年的世界,因此主流文化充满乐观。在这个时代，少数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控制了 84%的可利用土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着农业世界的一半人口，并把除了日本人之外的另外一半农民逐步变成自己的附庸。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1914 年以后延续 30 多年的世界大战、大萧条、大屠杀与这个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关心一下 16 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我们会发现 1914 年绝不是一个明显的时代分水岭。自 1800 年以后，西方崛起的冲击波得到了工业力量的加强，能够渗透到全球的每个基层社区。当 1914 年到来时，整个农业世界已经在动荡和混乱中度过了 1 个多世纪，一些最早遭到西方侵犯的地区甚至已经被奴役了几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发起的进攻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有传统农业社会被占领、掠夺甚至毁灭。欧美少数人的“盛世”对许多农民来说只意味着更深的奴役。当然，从基层社区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廉价的西方工业品。这些冲击打断了农业社会的既有规律，毁灭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静生活；农业社会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被消灭，还有一部分沦为高贵的傀儡；适应稳定农业社会的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即便没有被消灭，也被动摇了基础。对于旧大陆的大多数居民而言，这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时代。

公正的说。以今天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标准而论，即便世道太平，风调雨顺，传统农业社会中平民的生活也根本就谈不上“幸福”。传说中的“美好田园生活”要么属于少数富裕乡绅，要么是空头文学家的创作，要么就是简单的把工业社会里的富农生活简单的套在古代背景上，总之从来没在历史上存在过。真正的古代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农、农奴，在物质生活上都极端贫乏。除非在土地资源非常过剩的上升期，否则平民很难吃到肉食，很少有机会换新衣服，基本上一辈子都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生活。为了维系人口—粮食之间的平衡，农民们被迫溺婴，尤其是女婴。大部分病人只能无助的等待自愈或是死亡。在现代人看来很平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如廉价的纺织品、瓷器等，在当时都是只有统治集团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农业社会采集、利用负熵的水平所决定了农业社会平民生活的绝对贫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千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所有成熟的农业社区都建立了一些简单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均财富贫乏、剩余产品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的现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为包括最底层人口在内的农民们提供了一些生存保障，提高了农业社会的资源利用率，保持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村落或宗族往往设有公田，以部分收益扶助老弱、还为包括贫民子弟在内的儿童设立私塾。设于外地商埠的会馆、同乡会往往会对本乡人提供一些基本的衣食。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这些都是农业社区为贫民提供的一些福利。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产品转移到最下层——这些产品能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地方，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另外，一些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无论是大乘、小乘还是藏传佛教的信徒，或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只要坚信自己的幸福在来世、天堂而不奢望今生的富足，他们就不会因穷困而试图去破坏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的理论则为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的现实提供了充分的道德论据。如前所述，类似的文化结构都是人类社会长期竞争的结果：具备这些文化结构的社会能够向上层集中更多的剩余产品，相对不容易被内部矛盾所瓦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文化结构最终扩展到整个旧大陆的农业社会。这些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非常可怜、可笑的福利制度和文化结构，在客观上调和了农业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是农业社会上层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环节。

随着西方工业国家的步步入侵，在那些在经济上依附于工业国的地区，农业社区开始变质乃至逐渐消亡。新的经济秩序未必会减少农业社区的经济收入，平民们也至少要得到与原来相当的收入才肯主动转入工业生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足够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决定了早期工业社会给平民提供的收入不会显著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新生的无产阶级和为工业国生产原料的小农户无法指望因进入工业时代而迅速摆脱贫困。这样，一方面早期工业时代的平民并不比原来的农民更富裕，另一方面他们却逐渐丧失了农业社会曾经提供过的基本福利。蔑视一切传统权威、道德的主流文化则将旧道德对平民的柔性约束一扫而空。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原来的农业社会绝不仅仅是他获得衣食的地方，而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得意时要和乡邻分享快乐和财富，走投无路时也能指望从家族或村社得到帮助；遇到纠纷，他可以要乡间的士绅、阿訇来裁定；遇到麻烦，他可以向神父、长老寻求生活指导和心理安慰；他结婚要求助于长辈和媒人，孩子若想上学，多半也要读族中的私塾，死后若是无钱下葬，没准还得向附近的佛寺求一块义冢。一旦他进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他的身份将成为城市贫民、农业工人或是依附于商业网络的专业小农。新的谋生方式未必不能供一家糊口，但原来农业社会能给他的安全感、归属感、生活目标和道德约束都一并消失了。如果新的世界经济体内不能为他提供这一切，他将被迫向工会、帮会、秘密会党等组织寻求，最终在客观上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个秩序本来就不属于他。

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生产能力。遗憾的是，由于建设现代工业的稀缺要素为少数人所掌握，所以这些新增财富归属于少数人，大部分被卷入现代工业经济的人口并不能分享这些财富。这些已经脱离了传统农业社区，却依然贫困的庞大人口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而社会动荡将严重威胁这种社会体制的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社会体制的生存。严重

的威胁迫使工业社会的统治集团拿出一部分财富安抚下层。不过，正如前面曾指出的，上层建筑的变化要略微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工业社会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时间。直到经历了 1848 年和 1870 年两次革命，工业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才开始在西欧出现。同时走上前台的还有能够调和社会矛盾，且适合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现代民族主义。

安抚下层需要付出一部分物质财富，但现代工业所创造的财富增量基本被欧美这些核心地区的统治集团所占有，其他农业文明的统治集阶层能维护原有的收入已属不易，根本没有资源在工业经济迅速扩展的大背景下应对越来越大的动荡。事实上，他们自身难保。工业强国需要传统农业文明地区驯服地提供资源和购买力，如果旧统治集团愿意消极合作，列强并不介意让他们留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他们不合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西方军队或政治贷款会迅速消灭他们，用殖民政府或傀儡争取取而代之。因此统治集团也丧失了安全感，那些丧失了权力和地位的前统治集团成员也被抛入下层，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最后，由于西方商品的倾销和铁路、轮船交通工具的引入，传统农业文明的手工业、运输业甚至农业都遭到沉重打击。欧美的过剩劳动力可以转入现代工业部门，或者为工业新贵们提供服务。但在边缘地区，大批失业人口在短期内无法找到谋生之道，这也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在广西兴起，能在两湖得到大量人力补充，西方入侵引起的硬通货外流和内地贸易路线转移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工业经济的扩展给大部分人类带来的是动荡的生活。动荡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展，直到搅乱整个世界。这是因为工业经济体的扩展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只有打破稳定的的农业社会，卖出大量的过剩产品，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贵金属，工业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在维护内部稳定的前提下扩张。核心地区的稳定和边缘地区的动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而，地球再大也是有限的，当整个农业社会都在经济意义上沦为工业强国的殖民地以后，只有扩张才能生存的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撞上了扩张的自然边界。这时，不仅整个地球都已经被瓜分完毕，就连已经占有的殖民地由于遭到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甚至不能保持既有的购买力，更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空间。资本主义无法再通过加剧边缘地区的混乱来保持核心地区的稳定。对于停止扩张即死亡的工业资本主义集团来说，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两个——抢占其他集团的殖民地，或是消灭其他集团的商品生产能力。这两个选择都意味着战争。英国这个地盘、名望与实际潜力极不相称的庞大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个广阔而腐败的国家成了新兴工业国最好的目标。世界大战的动机到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世界上除了发达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地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的国家——如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或许还包括意大利。它们地处西欧外围，在工业革命尚未使西欧列强的实力产生飞跃时就与其密切接触，因此这几个国家一方面受到工业强国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半独立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具备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工业经济的扩张碰到市场边界时，它们一方面要解决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市场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应付国内骚动的庞大农业人口。在两方面压力下，如果不发动对外战争，这几个国家将最先面临生存问题。众所周知，正是这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对抗导致了世界大战。

在竞争的压力下，工业强国的统治集团有争夺势力范围的本能，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自我毁灭。如果他们能预知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后果，知道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不是任何一方，他们或许不会那么轻松的走向全面战争。但问题在于，大战的祸根并不是在一天内埋下的。开始，在市场边界问题还不是那么紧迫的时候，可能是一艘巡洋舰的巡视为某个帝国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沿海贸易站，几千名殖民地士兵的示威就征服了一个王国，或是一艘炮艇阻止了对方的廉价走私货进入自己的殖民地。于是各国都尝到了军国主义的甜头，开始扩军，外交政策也逐步向建立军事同盟侧重。在竞争的开始阶段，军备竞赛的规模并不大，1870 年普法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陆军在西欧本土交战，参战兵力合计还不到百万。不过，在这个全球竞争的时代，一国扩军必将导致邻国和竞争对手的警惕，一个军事联盟的建立必将导致对手们的团结，反之亦然。这种恶性循环与本来就显得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相配合，在扩张空间日趋紧张的一代人时间里打造了数支庞大无比的军队。在开战后几个月，英国这个传统上不重陆军的岛国就编成了 100 万陆军，此时法国和德国分别拥有 440 万和 760 万军队。工业化军队的火力、机动能力与 19 世纪的步兵方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军备竞赛中，英法等国在海军、资源、贵金属库存方面占有优势，德国和它的盟国则在陆军质量、重工业、中层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占有优势。两者互有短长，短期内难分高下。因此直到彻底摊牌，没有任何一方在竞赛中认输。

海权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称霸的前提。20 世纪早期，当德国决定建立一支公海无畏舰队，试图以更强大的工业力量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时，军备竞赛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期间，土耳其于 1908 年、中国于 1911 年爆发革命,依附于欧美工业强国的旧秩序被推翻。从宏观视角来看，最强大的和最古老的农业帝国同时崩溃，这标志着农业社会的旧秩序已经被工业革命的冲击波彻底粉碎，世界上不再有能提供剩余购买力的空白空间可供扩张。从这时起，任何工业强国的发展都必须以其他工业强国的削弱为代价，大战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阵营和交战方式或许还有变数，但一场工业强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只欠一个火种，而在 20 世纪的世界上，列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摩洛哥的一笔贷款会引起德法两大陆军强国的对抗，俄罗斯在大连建立港口会导致日本发动战争，南非的布尔人对英国的游击战居然能让德国人欢欣鼓舞。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大战在 1914 年开始绝不应被理解成一个偶然事件。或许，1914 年爆发战争已经够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经过已经有无数本书进行了描述，为节省篇幅和读者的阅读时间，本书只做必要的简述：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刺。一开始，已经习惯于各种摩擦的列强开始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个发生在欧洲角落的事件。但奥匈帝国（包括它背后的德国）略微低估了俄国（以及它背后的英国）对干涉巴尔干的反应，俄国则低估了奥匈帝国借此事释放内部矛盾的决心和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支持强度。结果俄国 7 月 30 日宣布总动员。由于这个时代军队的战斗能力在动员前后有极大的差异，晚动员的一方要承受极大的初期损失，而对峙的各方都把希望寄于一场速决战，所以动员迟缓几乎等于自杀。各方面都在迅速动员的同时要求对方停止动员以表明和平诚意，在互相递送了一系列最后通牒以后，政客和军官们发现几台同时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没有停下的选择。世界大战就此爆发，历时 30 年的工业化大屠杀从此开始。

1914 年，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占尽上风，西线打到巴黎城下才被挡住，东线的防守反击彻底粉碎了俄国匆忙集结的第一攻击波,海军的一次冒险远征则把对英国早有不满的土耳其拉做盟友，截断了俄国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不过，这种胜利是有代价的，多线作战意味着分散兵力，这导致德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无法达到速胜。1914 年东线的胜利和对奥匈帝国东线的支援都从西线主战场抽调了兵力，这直接决定了德国不能在英国（将来可能还有美国）动员起足够力量以前打垮法国。由于没有海权，长期对峙对缺乏资源的同盟国非常不利。

与德国的战绩相比，德国的盟友要虚弱的多，意大利在协约国海权与利益的软硬兼施下，首鼠两端，最后在 1915 年反倒加入协约国，但也无法越过阿尔卑斯山威胁中欧。奥匈帝国在对俄战争中屡屡失利，只是靠了德国援助方才顶住内外压力。土耳其的军队野战能力极差，只能在一些次要战场如中东、高加索吸引协约国少许兵力，唯一的价值在于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的人力无法和英国相对充裕的工业物资相结合。

工业国之间的战争代表了当时工业社会的最高科技水准。在战争爆发时，内燃机和电力技术远未成熟。一旦离开了离前线最近的铁路线，部队唯一可以指望的非生物力就是弹药中火（炸）药的爆炸力。这种破坏性力量只能用来杀伤敌人，不能进行可控释放。己方部队和装备的有序运动，主要还是靠人、畜力，和几千年前的罗马军团没有本质区别。当然，战争中有利用汽车进行补给和增援的例子，战争后期也出现了内燃机装甲车辆和飞机，但这要么是紧急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要么规模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既有的工业技术和发展速度决定了规模化的机械化军队要在一代人以后才能出现。由于缺乏能在野外高速推进且保持作战状态的军队，更缺乏在这种状态下对部队进行控制、补给的技术手段，战争的节奏依然要由士兵的步行速度来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战归根结底还是步兵、炮兵(畜力拖曳)和工兵的战争。

炸药的能量决定了工业时代的火器威力，以人力驱动的冷兵器已经沦为礼仪性工具，工业化的土木建筑能力也远远超过农业时代，但同时野战军的补给和运动还要靠前工业化时代的人、畜力。这意味着火力和防御压倒了机动，三个作战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均衡，防守相对进攻要占更大的优势。在经历几个月的战斗后，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现实，认真的布置了防线。在主要战场西线，双方在动员后，短短数百公里战线上摆开了近千万大军，全面防守成为可能。即便一方以集中兵力、火力奋力突破，一般也只能在对方的防线上打出浅浅的“坑”而不是穿过防线，威胁后方薄弱地域的“洞”。从 1914 年到战争结束，除了 1918 年德国孤注一掷的大进攻和和协约国在压倒性优势下的反扑，战线的移动始终不超过数十公里，几公里的推进和一个要点的得失往往要付出数十万伤亡。西线这个主战场出现了对峙。

西线的对峙使德国愿意且有能力抽调一部分兵力和资源去东线。东线的战线广阔，无法象西线那样构筑连续的防线，这削弱了防守一方的优势。同时，由于兵力相对分散，军事效率更高的一方集中兵力达成突破成为可能。因此德国试图先击败这个最弱的对手，避免两线作战。不过，尽管德军的素质远远高于俄国，但一些客观原因依然使得德国亦无法在东线速胜。首先，东线广阔的空间固然给了进攻者可乘之机，但也是这个时代任何后勤机构无法跨越的障碍。无论德国在具体的战役上取得多么大的胜利，也无法在短期内消灭俄国的战争潜力。其次，奥匈帝国这个盟友过于虚弱，不仅不能帮助德国打败俄国，却经常要德国来帮忙维持战线，即便在面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小国时也是如此。最后，无限的空

间后面，俄罗斯有着近乎无限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1914 年它拥有 1.8 亿人口，比德、奥之和还要多 50%，领土更是从东欧直达太平洋。因此，即便俄国无法从黑海得到英国的大宗物资，即便平均到每个士兵的重炮火力只有德国的 1/5，即便某些部队要数人合用一支步枪、赤脚作战，露天宿营，这个国家还是无法被迅速击败。在取得几次漂亮但非决定性胜利后，德国不得不再次把决胜的希望放到西线。最终毁灭沙皇俄国的是内部的革命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征服。

海战是舰队之间的战争，平静开阔的海面要比复杂的陆地地形简单的多。因此海战的偶然性远小于陆战，大规模海战的结果很少偏离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1900 年前后海军技术的突破给了工业实力更强的德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机会。但德国海陆兼顾的军事战略限制了它投入海军的资源。开战时英德无畏战列舰的数量对比是 20:14，如果算上战列巡洋舰则是 29:18，在前无畏舰和较轻型军舰方面，英国的优势更大。这反映了英国数百年海上霸权的积累成果。如果考虑到英国遍布地球的海军基地网和殖民地，工业规模刚刚超过英国几年的德国其实离海军霸权还很远。开战后不久，德国在海外的少数据点就被迅速封锁、拔除。这导致大洋袭击舰打了胜仗无法扩大战果，失败却无可挽回。一些远离本土的德国舰队虽然转战数月，严重威胁了协约国航运，甚至歼灭较弱的英国分舰队，但他们的战绩也仅限于此。到了 1915 年，只在英、德本土之间还存在海军正面对抗。

德国的公海舰队明显超出了一个大陆国家的海军需要。但在英国大舰队的压力下，这支舰队只能在岸防部队和水雷的掩护下保护自己的海岸，防止协约国登陆部队直接攻击本土。北海制海权属于英国人。在整个战争中，真正的主力对抗只有 1916 年虎头蛇尾的日德兰海战。日德兰一战，德国虽然在战术上占了上风，但当 30 多艘英国主力舰倾巢而出，在海上列队冲击时，德国人立刻认识到英国海军的霸权依旧不可动摇。在整个战争中，德国再没有尝试去获得制海权。同样被优势兵力封锁的还有亚得里亚海深处的奥匈帝国舰队。由于舰队决战毫无希望，同盟国只有派出伪装袭击舰和潜艇去破坏协约国的航运。此举等于宣布放弃了获取海外资源和殖民地人力的努力，因为袭击舰和潜艇无法用来护航。袭击战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17 年英国政府曾因为商船损失巨大而害怕无法继续战争。但现代工业国的战争很少因一两种新武器或新战术而定胜负，协约国很快发现护航编队可以有效防御潜艇，同盟国靠潜艇取胜的希望消失了。相反，无限制潜艇战还成为了协约国攻击德国的口实。

1917 年，美国加入协约国作战。许多战史将美国参战归结于德国潜艇对公海航行自由的破坏，这过高的估计了潜艇战的作用，忽视了潜艇战并非在 1917 年开始的事实，也忽视了英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单方面禁止中立国与同盟国贸易的行为，哪怕是通过公海。美国对英国公然以武力威胁公海航行自由的行为给予了最大的容忍，却因为德国的潜艇战而宣战。其真正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集团已经和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密不可分，与新兴的德国工业集团则尚有距离。这种态势既和协约国占有海权有关，也和各个资本集团的发展历史有关。正如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佩奇在 1917 年 3 月 5 日给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说："从现在开始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的压力已超过了摩根王朝为英法政府支付押金的能力……为了维持我们大好的经济形势并避免混乱，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宣战，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资本集团必须维护协约国的胜利，同时以参战为条件，在英法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利益。

开始，德国并没有太在乎美国的作用。1916 年的美国军队只有 20 万训练不足的军队。但美国拥有无限的潜力，从 1917 年底开始，美国可以每月向欧洲发送 5 万训练、装备水平都很高的正规军，这个数字随着时间推移还在不断增加。美国的参战最终毁灭了德国取胜的希望。在一场工业时代的全面战争中，工业规模和有组织的人口数量远比一线兵团重要。

除了东、西线陆战和海上战场，还有一些次要战场，如意大利战场、近东、中东、非洲、甚至远东太平洋战场等等。南欧和中欧之间恶劣的地形限制了任何一方在意、奥边界或巴尔干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此之外，只有土耳其本土勉强顶住了协约国的进攻，其他战场都因为协约国占有海权而在战略上呈一边倒的趋势。

战争开始之初，各国都认为这将是一场以己方胜利为结果的速决战。但实力对比和战争的技术水平使战争旷日持久的拖了下来。那些没有足够工业资源来维系生存的帝国最终被拖垮（而不是被击败），第一个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列强中最不缺简单人力，最缺技术兵器和后勤资源。所以这个国家被迫用人命来对抗对手的工业。显然，大炮不会造反，但受虐待和忽视的士兵早晚会意识到自己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对人力的滥用最终导致了俄国革命。先是中层的精英借助兵变和社会骚动逼走了沙皇，然后新政府试图以战争证明自己的实力——失败了。俄军主力只在对付奥匈帝国时前进了 30 公里，然后在德国的打击下一败涂地，死伤惨重。由失望到绝望的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决心走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路。俄国割让了大片领土和势力范围，退出战争。关于俄国的未来，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

虽然终于把一个强敌打到出局，但美国的到来使德国的希望更加渺茫。德国决定在西线孤注一掷，抢在美国全面参战以前打垮法国。1918 年 3 月-6 月，德国采用了这四年中的一切新战术，将包括巴黎大炮在内的所有新式武器送上战场，居然真的在西线的壁垒中打出一个缺口，经常每天推进数公里，这在机械化战争出现以前是惊人的速度。德国再度逼到巴黎城下，几乎看到了艾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成就是打破了对手的堑壕体系，得以威胁协约国后勤体系和未展开的部队。不过，德国在这一过程中消耗掉了大部分机动兵力，而且也缺乏利用这一突破的摩托化部队和战术思想。最终防线的缺口被美国援军堵住，协约国开始利用美国的新锐力量进行反攻，德国大势已去。

1918 年的秋天，同盟国整体崩溃，所有的战线，包括有阿尔卑斯山天险的意大利方向都出现了突破。这反映了协约国在资源方面的优势。不等到协约国军队开进柏林和维也纳（君士坦丁堡已经投降），同盟国内部就开始解体，军队兵变，工人起义，被统治民族则要求独立。当 11 月 11 日战争结束时，同盟国统治集团其实已经无力控制内部局势，被迫向协约国求助来镇压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从事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这个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无论是人口、资源还是陆军规模，协约国都比同盟国高出至少 50%。如果把美国和意大利计算在内则优势更大。在这种条件下，值得研究的倒不是协约国的胜利，而是胜利居然要等上 4 年。前面所说的缺乏机械化军队的理由似乎可以解释胜利的姗姗来迟，但在这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德国在掌握主要陆地战场的主动权，德国能够在 1917 年逼迫俄国退出战争，在 1918 年还将战线深入法国，威胁巴黎，战争旷日持久其实

有利于协约国而不是相反。这样看来，协约国在占尽上风的条件下还胜的如此艰难，德国这个后发工业国利用资源的能力和进行竞争的能力明显远胜于英法等第一代工业国。

按照本书最前面几章的说法，对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竞争能力更强的制度将在长期竞争中取胜。应用这个结论时，必须注意“长期竞争”这个限制条件。单次竞争要看具体的条件，偶然性起很大的作用。只有反复竞争和长期对峙才能用长期趋势消灭偶然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定事件中，由于德国不享有海权，无法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也就无从在战争期间利用更高的发展速度来改善实力对比，只能消耗此前积累的力量以求速胜。但这个时代的战争节奏决定了战争必然旷日持久。1914 年和 1918 年，德国两次在西线赌博，虽然未必没有一线胜利机会，但运气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类似的赌博还有日德兰海战。当所有赌博都不出意料的失败以后，战争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这验证了前面指出过的一个结论：“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当然，尽管竞争规律不再有效，但历史本身还是遵循唯物主义规律的，只是显得更复杂了，需要更详细的考察具体发展过程。这是这一章及以后的章节比本书前面的部分更琐碎，更注重细节描述的原因。

从名义上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控制着 2/3 的地球人口。虽然中国、日本和拉丁美洲诸参战国对战争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但考虑到参战国的大片殖民地，至少也有 1/2 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战争达到最高潮时，有 3700 万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对峙，最终有 1000 万军人战死，2000 万军人受伤。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可能有数百万，但因为工农业资源被抽去供给战争，间接导致的平民人口损失必然远远超过此数。战争中总共制造了 2761 万支步枪，100 万挺机枪，17 万门火炮。如果能把制造这些兵器（连同它们发射的弹药）所耗费的资源，以及双方损失的 1285 万吨商船用于民用经济，能产生的财富也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战争开始时飞机刚刚发明，坦克尚未出现，但到战争结束时，两种兵器分别制造了 18 万架和 9.2 万辆。化学武器和对敌方平民的战略空袭并不是开始自一战，但被大规模使用并视为正常的战争手段却是从这时开始。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场空前(很遗憾，但不绝后)残酷的战争。

这次大战彻底改变了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开战之前，英国是无可置疑的世界霸主，其他国家至多占有区域性优势。法国有强大的陆军，在保持欧洲强国地位的同时也抢占了许多海外殖民地，拥有大量海外投资。俄国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国土，也被认为是强国。这三个国家占有了大部分殖民地和资源产地，并在剩余的半殖民地如拉丁美洲、中国占有主要的利益。美国虽然有潜力，但在大战给它提供了方便的扩张机会之前，只是一个美洲大国，和日本、德国一样只占有少许殖民地，海外投资不多且缺乏保障。德国工业强大，但周围强国密布，资源仰赖海外，海军和商船进出世界要通过英国近海，发展前景很不乐观。

大战以后，首先英国的霸主地位被削弱。英国有限的人力，尤其是统治集团的精华人力在大战中遭到严重消耗，成千上万原本可以充做殖民地官员、海军军官、商业经理的人员在堑壕战中被屠杀。另外，英国被迫在全球让出大量权益给自己的“盟友”，一方面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打赢大战，另一方面英国也确实不再有守住这些权益的能力。当大战结束后，表面上英国的势力范围扩大了，但实际上，拉丁美洲的市场沦于美国，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市场要和美国、日本等后来者分享，并通过九国公约加以确认。在中东、印度、非洲、加拿大等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本土精英的力量日趋壮大，也必须承认他们有独

立或投向另一个大国（一般意味着美国）的权利。就连英帝国的根本——海军也被条约限制在和美国相同的水平上，事实上，英国也不再拥有和美国进行海军竞赛的本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本土工业薄弱，垄断化程度低，人力资源供给被潜在的社会阶层所限制等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失去了世界海权和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英帝国被迫改组为英联邦。

在本土作战的法国承受了德国的主要压力，这对于工业规模只有德国 1/3 强的法国来说实在勉为其难。因此，法国在战争中损失了 3.5%的人口，受伤数字还要多上几倍，青壮年男子损失殆尽。从 1914 年到 1918 年，战线始终停留在法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最后法国取得胜利，但战线扫过的地区，一切皆成废墟，连基本的农业建设也得从头做起。1919 年法国的工业产量只及战前的 57%。战前法国已经要靠投资利润来抵消贸易逆差，在战时，一向被倚为支柱的 600 亿法郎海外资产有一半被变卖为战争物资，因此战后法国既少了大宗投资利润流入又没有竞争力强大的工业，国际收支非常困难。同时胜利的名头让法国统治集团背上了太多的责任和野心，对欧洲霸权的渴望使得它在战后争夺虚幻的欧洲盟主，在海外维系地盘，这既引起了与旧盟友的冲突，也超出了它的能力。最后，法国面对复兴的德国只能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保持守势。

德国战败，根据协定。德国割让了一些领土，交出大批武器和运输工具，负担巨额赔款。而且战后的军队规模和水平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惩罚看似严厉，却没有伤及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根本——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和高度组织化的人力资源。假以时日，德国仍然有世界性强国的潜力。而从更高的战略层次来看，尽管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取胜，德国却是大国中唯一取得所有预定战略目标的大国——英国的世界霸权被打垮，法国一蹶不振，俄罗斯帝国崩溃，中欧分裂成一系列小国，依然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以内。此外，战胜国意大利和日本未能在战后分赃中得到满足，又不再被英国的海权所压制，逐渐与德国有了共同的利益和敌人，为德国增加了强大的盟友。甚至新出现的苏联都在英美法的敌视下与德国进行了妥协。自普鲁士时代以来，德国第一次发现周围没有与之重量级相当的对手。因此，只要注入一定的流动资金，德国可以很迅速的再次成长为经济－军事霸权（相对周围衰落的欧洲列强而言）。当然，作为事后的观察者，我们知道德国低估了苏联，但在 1941 年以前，这并不是致命问题，因为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苏联。

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确切的说是维也纳以西的欧洲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除了美国和 1905 年以后的日本，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欧洲运转。其他地区的精英，即便是那些对这个秩序不满的阶层，也都把欧洲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当做发展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欧洲，这严重的削弱了欧洲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它们被迫把派往殖民地的人力物力调回本土，把向殖民地倾销的物资转为军火生产，甚至还要征调殖民地军队来助战。这一方面放松了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彻底破坏了欧洲人不可击败的神话。理智一些的旁观者还会想到欧洲奉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远不完美，因为它导致了如此野蛮残酷、几乎等于自杀的战争。欧洲衰落了。不过，这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工业国并未在大战中受打击，因此欧洲衰落的真正受益者并不是边缘农业地区的本土资本主义集团，也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残余力量，而是美国日本这两个欧洲以外的工业资本主义集团。除了离美国日本都足够远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边缘地区的本土力量要等到下一场更残酷，更野蛮、波及范围更广的大战才真正有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

美国在战前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某些统计资料甚至认为美国当时的工业产能已经相当于英德法日四强之和。正如前文所述，如此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源于美国内部得天独厚的资源、社会条件，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并没有太多的争霸举动。但这些内部条件能提供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生产也逼近市场边界，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1914 年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只有 50%，美国急需更多的海外市场来释放压力。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执行太平洋战略，取得了一些战略要地。可欧洲战事一开，不仅欧洲列强的工业转入军品生产，给美国产品让出了海外市场，就连协约国自身也成为了美国商品的大客户，美国工业资本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扩张的天赐良机。大战期间，美国很少有利润率低于 25%的工业企业，商船吨位从 100 万吨增至 1108 万吨，出口总值增加 2 倍，战时出超 116 亿美圆（读者应该记得这是 1918 年的美圆）。当战争结束时，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工业资本集团收回了战前 20 亿的外国投资，在海外增加 70 亿美圆投资，另借给协约国 100 亿美圆，世界 40%的黄金储备已转入美国。就连好莱坞的影片出口也增长了 5 倍。

这一切的代价仅仅是 12 万士兵的性命。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此奠定。

日本是最后一个进入工业时代的列强。无论是战前战后，它的工业-军事能力在欧美列强看来都不值一提。大战中的日本也仅仅扮演了一个配角，攻占数千人把守的青岛已经是它最抢眼的表现。不过，日本得益于远离主战场却接近欧洲殖民地。它的统治集团在统一的规划下，向欧洲输出物资，替协约国组织海运，当然也趁机抢占殖民权益。战前日本是债务国，战后的日本已经有了一小笔净债权。大战期间，日本工业产能翻了一番，重工业扩张比例还要更高。在中国这块最大的公用经济殖民地，日本进口货物占总进口量比例从战前的 20%增长到 40%强，已超过英美商品进口之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也从 14 亿日圆增长到 35 亿日圆。中国逐步从英国主导的公用经济殖民地变成日本独占的经济殖民地，因列强互相牵制而保持的名义独立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

不过，与美国不同，即便到了 1918 年，日本依然是列强中最弱的一个。世界大战揭示了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本质，日本统治集团对既有地位既不满意，也感到恐惧，将大部分资源用于再投资和扩军。结果，在工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由于民用物资被大量出口到欧洲，物价高涨，1919 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比 1914 年反而下降了 32%。国内骚动不已，罢工和动乱愈演愈烈，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移民和继续扩张，即便这意味着战争也别无选择。日本接下来几十年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

归根结底，世界大战的原因在于商品的“过剩”。工业革命创造了太多的财富，而已经习惯于贫穷的世界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它们。为了推销过剩的商品，强国互相敌视，最终走向全面战争。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这么想，因为当时的世界明明有人需要这些财富来改善贫困的生活。不过，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包括“荒谬”这个评价标准的。在存在边界限制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那个宏观物质力量决定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道德、文化观念能阻止各个工业资本主义集团互相屠杀。1000 万士兵的尸体，十几个王族的灭亡甚至无法阻止被竞争压力所挟持的统治集团走向下一次大屠杀。不过，工业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副产品——全球文化-道德体系。尽管这个全球文化-道德体系到今天也很难说成熟，尽管这个全球文化-道德体系在当时只覆盖了少数人口，但毕竟它可以作为一个根据，让人类反思一下自古以来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对世界大战做

出“荒谬”的普遍评价，就是因为当年的全球文化-道德体系的衍生品已经根深蒂固。在1917年，少数智者的反思与无数底层平民的不满相结合，终于引爆了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说，这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十六、 共产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与动物不同，人类有一个过于复杂的大脑。除了按本能趋利避害行事，人类还会思考未来，做远期规划或者仅仅是憧憬。“希望”和粮食、空气、水一样，都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各方面具体的希望或憧憬凑在一起，除去那些互相抵触的部分，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轮廓，人们通常称之为天堂。天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天国、大同社会、黄金时代，桃花源、上古盛世、共产主义等，这里通称天堂。

人类总有梦想。作为人类向往的目标，梦想显然要大大超出现实生活，物质上更丰富，精神上更快乐。梦想比现实生活更“好”，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不过，作者在前文曾反复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里并没有“好”和“坏”的定义。每个社会和社会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道德体系来定义梦想“超出”现实生活的方式。所以梦想的内容是由现实决定的。梦想能存在的两个前提是稳定的现实生活与文化-道德体系。前者为梦想提供一个对比的基础，后者则决定了梦想在现实生活的哪一侧。

所有的梦想都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人的自由发展。人在现实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愿望不能满足，无法满足的原因要么是受限于物质条件，要么是社会既有的制度不允许，所以人们感到不自由，所以人类需要梦想。不过，天堂是梦想的综合而不是孤立的梦想，完整的天堂梦想需要让各种梦想互相妥协，这意味着天堂生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另外，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不会创造一个独居的天堂。既然天堂里还有其他人，那么我们要尊重彼此的梦想。这就需要用文化-道德体系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必须承认一些在天堂和人间都同样有效的道德规则，然后在理论才上有享受天堂生活的可能。从历史上看，许多宗教典籍和文艺作品都有对天堂的详细描述。描述本身即意味着限制。比如：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天堂不会供应猪肉，想要在北欧海盗的天堂里生活就得天天打仗。为了保证天堂这个梦想的自恰，天堂也需要规则。因此，天堂的确切定义应该是：特定文化-道德体系约束下的人类自由发展，正如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

人类向往天堂，但在存在有效竞争压力的前提下，历史规律不会被人类的意志所改造，哪怕是许多人的意志。在我们的历史中，任何稳定存在的农业社会都被既有条件下最能调动资源、参与竞争的制度所统治。除非经济背景出现了变化，否则一个偏离稳定的社会制度，把天堂当做设计蓝图的社会必然是自取灭亡。因此原教旨主义者很少能当上历史的主角。即便在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宗教性事件中，那些狂热的信徒也只能为追求实利的领主、商人当炮灰；在宗教气氛薄弱的中国，也曾有一个失败的儒家书呆子叫王莽。这种人或许可以因为真诚、狂热、执着而辉煌一时，最终必然要被更适应物质竞争的主流制度所消灭。农业社会的天堂要么在天上，要么在遥远的古代或未来，惟独不可能是现实。

当然，这并不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解释古代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事实上，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它自身的位置和作用。相对无政府状态，任何存在过的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低熵结构，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绝大多数偶然冲击会使低熵结构趋向解体。为了避

免热力学第二定律消灭人类社会这个低熵结构，人类不仅要从自然界输入负熵流来应付社会的自然消耗，也要通过道德、文化等“软”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秩序，避免秩序自发溃散。因此竞争规律决定了大部分社会制度都必须为其成员提供一个高于既有社会的道德标准，从而不断的为社会提供秩序，对抗制度自发解体的倾向。显然，为了全面指导现实，这种高于现实的道德标准最好组合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社会。

归根结底，天堂这个概念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维护既有的秩序，让潜在的不满者把希望寄于现实以外，另一方面它又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一些比照，给出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范例，有利于维系现有社会的道德体系。这两个作用是天堂（以及地狱）的传说能在激烈的物质竞争中存在的基础。所以,几乎所有社会，包括最现实的商业社会都有自己的天堂。这种现实从农业社会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

前面几章曾简述了工业革命前后西欧文明的扩张：西欧文明这个扩张型的旧大陆地方农业文明先借海运之利获得了薄弱的全球优势，然后又率先利用工业的威力统治了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农业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的一部分被工业社会改造，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全球性文化-道德体系。这种文化-道德体系适应于不断扩张的经济基础和脱离了农业社区的工商业人口，是海外扩张和工业革命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并没有立刻否定竞争规律的有效性，因此对应于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天堂也应运而生。在核心地区大部分劳动力从固定于农业社区内部的平民转化为无产阶级以后，新的天堂概念已经取代了农业社会的梦想。不过，前面已经指出，由于经济基础相对变化太快，“.....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所以早期工业社会的天堂也有许多杂乱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公有制天堂、无政府主义小生产者的极端自由天堂、中产阶级的技术天堂、破产农民和过气贵族对“过去的好时光”的回忆等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它们尚未融合成完整的体系。

工业革命前后的准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经济基础不断扩张的世界，也是一个物质力量至上的世界，工业化社会认识到自身正处于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这深刻的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的天堂概念，具体而言就是大部分“先知”都把天堂放在了现实世界，一般都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一些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试图立刻着手建立自己的天堂。不过，只要竞争还是历史的主要动力，超越竞争规律的天堂就不可能存在于人间。尽管许多人为人间天堂付出了金钱、精力、甚至生命，建立了许多如新模范村、巴黎公社那样的社会。但在竞争压力下，这些社会早晚会被内外压力所粉碎。比如说，只要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竞争优势，平等程度过大的试验性团体就很难生存。在这个时代，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而不是人类的理智主导着人类社会。不过，工业革命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

对于特定的人类，天堂是一个绝对化的概念，但在农业时代，农业经济的地域性决定了各个地区文明拥有不同的文化-道德体系，也造就了不同的天堂。这种文明差异曾经是无数战争和冲突的直接原因。当近代的航海体系将各个文明地区联成一体时，这个早期世界体系中显然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公认的普世天堂。某些人的天堂完全有可能正是他人的地狱。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本身并不刻意的支持某种文化-道德体系，但文化-道德体系决定于经济基础。随着工业经济的扩张，世界逐步围绕着工业经济体结合成统一的世界体系。在这种经济基础下，虽然各地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依然在勉力维系自己的半独立地位，到了 1900 年，一个以工业社会中产阶级为载体的主流文化-道德体系已经在所有地区的统治集团中取得了大批皈依者。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文化-道德体系几经变化，终于在整个世界取得了绝对认同。在绝大多数地区，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甚至没有权利拒绝以这个文化-道德体系为基础的教育体系，这既是对全球道德-文化体系权威的确认，也加强了它的权威。在进行政治活动时，无论政客们的实际行事原则如何，他们总要依据这个文化-道德体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指责对手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大众舆论中，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反人类”、“缺乏人性”等形容词来描述那些公认的罪恶行为，国际法庭也会以这些理由惩处犯人。这些事实表明，一个与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相对应的文化-道德体系已经取得了无可辩驳的统治性地位。在这样的 条件下，一个至少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天堂，或者说一张不会招致太多反对意见的理想社会蓝图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从今天工业社会的现实来看，人类最多的争论集中在实现这一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

无论如何，人类是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动物，物质财富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保障。在几千年的农业历史中，大部分人都仅能维系温饱水平的生存。因此，大部分农业社会的天堂传说都强调应有尽有的财富，至少要描述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工业革命以后，平民贫困依旧，而统治集团在扩张的惯性下渴求财富，因此物质财富的富足还是天堂的首要特征。如果想在人间建设天堂或者说理想社会，充足的财富或者至少许诺一个富裕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快速扩张的工业经济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前提。

此外，无论是社会还是人，只有摆脱了基本生存问题才有可能去设计未来。如果某些人纯粹为了生存而改造既有的社会机构，其行事方式和结果完全在唯物主义规律限制之内，这一点前面已经有详细论证。因此，足够的人均财富也是以理想主义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和平民的贫困阻止了人类按自己的意图去设计未来。只有当工业革命充分展开以后，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更庞大的无产阶级也最终从工业财富中得到了略微超出基本生存水平的收入。这种现实为新的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社会基础。

无论人类想追求哪种理想社会，只要竞争规律还主导着历史，那些在物质竞争中被最能调动物质力量进行扩张的制度将取得胜利，主动规划社会的愿望无法与直接的物质利益相对抗，除非人类的理想社会恰好就是最适应竞争的社会制度——靠这种方式来实现人间天堂无异于饿肚子的时候等天上掉馅饼、穷困潦倒时指望买彩票脱贫。归根结底，上帝或者说运气是靠不住的，人类的理想社会必然要由人类自己来设计、建造。既然竞争压力对理想化社会制度的淘汰是一个客观规律，无可回避。那么，只有等到竞争压力不能主导一切之后，人类的理智和理想才有发挥余地，人间天堂才有存在的可能。

根据前面的论证，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竞争压力完全主导历史的时代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此后的历史发展依然要不断屈从于竞争压力，但毕竟人类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隙，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个空隙会越来越大。就在这个空隙出现的前夜，马克思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这个历史趋势，作出了对今天的人类影响最大的关于人间天堂的预言——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以往人类只能服从历史规律而不能创造历史，如今人类有条件把人间天堂变成现实。只要等到资本主义内

部矛盾的爆发，一个更强大，更美好，能够解放全人类，让人类自由发展的社会就会降临。

1917 年，世界大战进入第三个年头，马克思的预言开始在俄国应验。

十月革命和苏联如今已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但在革命之初，很少有人看好苏维埃政权的前景。当时的观察家不一定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得知：信奉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者一向只是历史的配角，偶尔的胜利是昙花一现。维系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超出了理想主义者的能力。因此，尽管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将发生巨变，但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还是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共产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则完全被各国统治集团忽视了。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他们的看法倒也不无道理：20 世纪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一批缺乏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内部派别林立。直到 1917 年 3 月，其中组织最好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不过数千人。除了回忆 1870 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这样一群人宣称要取代运行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打破数千年的规律，要在一个强权即真理、数百万军队只是寻常数字的世界上建立新社会。确实是匪夷所思。

现实的奇特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被预计为一场速决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的拖了下来。沙俄这个虚弱的半工业化国家能在这场工业时代的大战中拖到 1917 年，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诧。即便按 19 世纪的标准，沙俄统治集团的衰朽不堪，面临危机时的麻木不仁也到了骇人的程度。以军队为例，大批军官仅靠出身就当到将官；执掌军务的陆军大臣居然无暇花完购买炮弹的专款（1915 年，许多一线炮兵奉命每天每门炮射击不得超过三发！）；从 1908 年到 1914 年，俄国总参谋长换了 6 任，根本没有一个连贯的备战计划；在战争最激烈的 1916 年 5 月，总参谋部还有 15 天休假，所有部门空无一人。这样的军队，在新败给日本之后就要主动进攻世界第一陆军强国，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 600 万农民士兵的生命。1915 年，俄军一线步兵的步枪配备率不到 2/3， 1916 年，许多俄军士兵只能用捆绑了刺刀的棍棒当武器，用手去拆除对方的铁丝网，农民士兵最终拒绝了这种自杀式战斗。1917 年初已经有 100 万士兵，即现役部队的 1/6 开小差，政府既无力阻止也无力追捕他们。这些事实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比列宁的革命更难以置信。

在日趋恶化的的局势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力量逐步扩大了影响，但谁也没有想到革命来的如此之突然。1917 年 3 月 8 日，彼得格勒市民因面包涨价而骚动，几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也在同一天游行。由于左翼势力的鼓动，游行人数最终达到 20 万人，惊恐的沙皇政府命令军队镇压。3 月 11 日，军官强令士兵向游行队伍射击，一些贵族军官甚至亲自开火。同样出身贫民的士兵对屠杀大为不满，当晚哗变，16 万首都驻军一夜散尽。到第二天早上，只剩不到 2000 军队还在名义上忠于沙皇。其余士兵有的自行回家，大部分与市民联合造反。若非沙皇亲自去了前线督战，恐怕当晚就会成为革命士兵的俘虏。俄罗斯帝国、世界列强之一的首都就这样不可思议地陷落了。

革命军占领首都的消息当天传遍全国。一旦发现沙皇的统治机器原来如此脆弱，工人和士兵迅速起义，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几天内落入革命军之手。前线军队也受到革命影响，下层军官和士兵选举代表，监督军官，派人回后方参加革命，军官无力弹

压。3 月 13 日沙皇试图冒险回首都恢复秩序，发现铁路工人根本不允许他通过。绝望的沙皇在普斯科夫被军官团说服，决定退位以安抚民众。被指定继位的米哈伊尔大公慑于革命之威，拒绝了这个危险的皇位，沙皇统治就此结束，二月（以旧俄历计算）革命获取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革命是沙俄旧制度整体衰竭的必然结果。作为马后炮，今天的人可以找到许多革命必然爆发的理由。在经济方面，战争的持久化使沙俄耗尽了积累的现代工业资源，英法等工业物资相对充足的协约国却不能打通黑海航线，提供足够的补充。沙俄被迫把动员起来的工业产能尽量转向军工。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 1/3，而统治集团却没有足够的工业财富去安抚、控制下层，促进农业。结果 1916 年罢工比 1914 年多了 20 多倍，参加的人数增长了 30 多倍，革命的大部分动员工作已经由沙俄政府完成了。在军事方面，工业时代的大战使得伤亡数字大大提高。在消耗战中，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一般法则，贵族军官团中相对有活力和责任感的成员迅速消耗殆尽。同时军队人数从 140 万扩张到接近 700 万，增补的军官要么是无能的纨绔子弟，要么来自不满现秩序的底层。由于类似的原因，在士官、士兵这两个更庞大的阶层中，富农、哥萨克、流氓无产者等半职业士兵不再是军队的主力，同情革命的一般工农子弟已经占了大多数。这样的军队事实上无法用来镇压革命。在当时，作战各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在缺乏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民族问题复杂的沙俄，此问题尤为严重。这样的军队结构还意味着大批专业军事人员是潜在的革命者，1870 年巴黎公社对对军事资源的闲置、浪费，以及在一些基本军事问题上的失策绝不会在这次俄国革命中重演。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沙俄外强中干，日久必然生变，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还是高估了这个政权的耐力。在 1917 年，没有哪个组织或集团主动的去策动起义。当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冒险成功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在革命前的俄国，合法的反对派基本存在于战时休会的国家杜马即议会，因此有的起义者认为应该服从杜马的领导，一些杜马议员也认为自己理应取得政权，于是部分杜马议员出面组织了临时政府。不过，杜马是一个畸形的议会，它由多层选举产生，在选举复选代表时，每个土地贵族的一票相当于大资本所有者的 4 票、中产阶级的 65 票、农民的 260 票、工人的 543 票。如此产生的议员自然难以服众，于是大部分工人士兵决定按 1905 年革命时的经验组织苏维埃（俄语意为会议），自己执掌政权。其他地区也成立了地方苏维埃，还派出了代表组建全国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两套政权体系。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是多种政治势力、多党派的联合体。临时政府脱胎于杜马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原沙俄社会中上层左右，倾向于维持既定国策，保持原有社会基本结构，然后进行平缓的改良。另外，由于俄国工业部门中外资比例很高，英、法等国可以通过经济部门的代理人和经济-军事援助对临时政府施加影响。苏维埃是起义的工人、士兵自行组织的议事机构，下设各种委员会作为执政机关。工人士兵久受左翼宣传，倾向于共产主义，二月革命时革命军就以马塞曲和红旗作为自己的标志。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主张激进社会革命的一些左派政党很迅速的在苏维埃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两个并存且倾向不同的的政权自然迅速发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沙俄倒台以后，原来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的各种政治势力、民族独立运动得以公开活动，尤其以长期被压制的左翼政治势力为甚。流亡在外的政治人物纷纷回国，如普列汉诺夫因主张继续对德作战被英国军方专程送回，列宁因主张继续推进革命得以在德国默许

下穿过战线。一时间，无数种互相冲突的意见充斥俄国舆论。这种纷乱使所有人都清楚俄国因为人民革命而正在发生巨变，并期望新的政府和社会制度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希望，至少希望能够得到和平。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人民在革命中展示的力量阻止了内战立刻爆发。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先是合并了彼此的军事机构，然后在 5 月份达成暂时妥协。由于暂时没有进行社会革命，所以原政权的军政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脱胎于杜马的临时政府看起来比新建的苏维埃更善于管理这套机构，因此妥协的方式是临时政府接受苏维埃的代表加入政府，分享权利。

临时政府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新气象，英法的统治集团需要俄国攻击德国来表明自己依然是盟友，旧军官团需要作战来恢复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纪律可以成为打击苏维埃的最好借口。因此回避了内战的临时政府决定继续参与世界大战。6 月份，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亲自巡视前线，剥夺了士兵委员会的一些权利，重申贵族军官团的权威，从整个国家抽调可靠的精锐部队，竭泽而渔的搜集军事物资。7 月 1 日，俄军大举进攻。不过，沙皇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临时政府也无法驱使渴望和平的士兵做到。两周的攻势使俄军消灭了几万德、奥、土联军，前进了几十公里。7 月 19 日德国人的精锐部队一到，已经耗尽工业资源和精力的俄军立刻全线溃退，许多师在后撤过程中自行解体。只一周时间，不但最近的战果全部丧失，1916 年以来占据的全部领土也丢给了德国人。到了 9 月份，德国人已经能威胁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军事冒险来巩固地位的希望破灭了。

在后方，各地群众不断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不尽快结束战争。许多失望的群众在游行中提出由主张和平的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象它的前任一样报以镇压。由于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临时政府查封了它的机关报，通缉列宁，逮捕托洛斯基，不惜代价地维系自身地位。但右派认为临时政府还是过于软弱，希望能对激进左翼赶尽杀绝。俄军总司令利用右翼军官团的这种倾向发动军事政变，结果被工人和士兵的消极抵抗所挫败。政变之后克伦斯基自任总司令，只是让局势更加混乱。人民需要“土地、和平与面包”，但临时政府既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无力平息所有骚动。随着每日面包配给从一磅变到半磅，被压制的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主要地区的苏维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列宁终于发出夺权的号召。1917 年 11 月 7 日，革命部队轻取冬宫，无人抵抗。莫斯科也在一星期后被占领，25 日旧军队投降。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取得了俄国政权，史称十月革命。漏网的克伦斯基只能得到数百部队的效忠，绝望之余逃亡海外。

苏维埃取得了中央政权，但列宁和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大局已定：在国外，德国和土耳其依然在进攻，英、法宣称将惩戒背叛的盟国，日、美则想趁乱夺取领土和资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苏维埃的敌人。国内民生凋敝，叛乱四起，国库空空如也，旧军队毫无战斗力，专业技术人员消极怠工，甚至几万名战俘都可以横行数千里。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狂妄的白卫军宣称将很快恢复旧秩序，外国干涉军则相约瓜分俄国，把俄国变成殖民地。在这种危机之下，初次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只能勉力维持，尽人事听天命。当新政权的寿命超过上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时（不过两个半月），甚至列宁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庆幸且值得纪念的事件。当时革命政权的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协约国认定苏维埃根本不会管理国家，德国试图观望俄国局势，等最强势力出头后再进行打击，维持俄国的内乱状态，其他同盟国则缺乏攻击能力。由于认为俄罗斯旧统治集

团和旧军队会很快平息共产主义者的“闹剧”，尚在全力作战的列强没有立刻给反革命势力提供实质性支持，因此初期的叛乱缺乏协调和工业资源支撑，主要以旧军官团叛乱和民族地区叛乱为主。这给了新生的苏维埃以喘息之机。在革命士兵的绝对支持下，苏维埃政权镇压了旧军队，掌握了沙俄帝国的核心地区，为迎接更严酷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同时，旧军队的无能和不可靠使布尔什维克决心建立新的武装力量，1918 年 1 月 28 日，苏维埃政权以革命军人为基础成立红军，并吸收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旧军官。这支部队很快就以行动证明自己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1918 年初，立宪会议召开，4000 万人参与投票，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这个选举结果其实并不出乎意料，苏维埃的根基本来就在于城市，最早的苏维埃甚至没有农民代表。比起临时政府，苏维埃因为士兵中包含大量农民、倾向于土改而和农村关系稍近一些，但最多也只能换得农民的善意中立而不是支持。农民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社会革命和未来，不关心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只希望排除外界干扰，过上平静的小农生活。最终，一直主张维护村社土地制度，以农村为基础，迷信恐怖主义威力的社会革命党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排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列宁对这个选举结果嗤之以鼻，用军队解散了立宪会议，以工人和士兵控制的苏维埃为唯一的议会和执政机构。列宁不相信农民的选择代表俄国和世界的未来，不相信几个刺客能够抵抗磨刀霍霍的德军与协约国军队，更不相信改良派能阻止旧统治集团回来废除一切改良成果。为了生存与革命，他决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1918 年春天，同盟国和协约国向苏维埃政权发起正式进攻，国内随即爆发了大规模叛乱。与红军相对应，宣称要消灭革命的叛军一般被称为白卫军或白军。

最先发难的是同盟国，1918 年 2 月 9 日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割让大片领土。负责谈判的托洛斯基高估了德国内部危机，于是中断谈判，宣布单方面停止战争。2 月 18 日，同盟国发起全面进攻。旧军队一如既往的无能，刚刚成军的红军只能防御一些要点，无力阻止德国的全面推进。3 月 3 日，列宁宣布承认同盟国已经占领的一切，包括 1/3 的领土和几乎全部的煤、铁矿，以换取暂时的生存空间。和约签定后，内部确实存在问题的德国军队停止了全线进攻，但依然占领了一些局部目标，建立了一系列傀儡国家和反苏维埃政权。德国在战败投降后，协约国还勒令德国在协约国接管前继续控制俄罗斯西部，以遏制苏维埃政权。直到内战结束，德国始终是苏维埃的大敌。

1918 年 3 月，英、美、日等协约国军队在一切够的着的俄国港口登陆。由于美国加入战争和德国力量的衰竭，协约国能够拿出大批物资支援白卫军，苏维埃的真正考验到来了。在随后的 2 年内，原沙俄帝国的土地上一片大乱，数十条战线同时开火。在内战的特定条件下，战线往往非常模糊，经常纠缠在一起，最终蹂躏了俄国大部分土地。战线的一边通常是红军，另一边是来自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部队和千奇百怪的白卫军。主要的敌人有英、法、日、美等国在北方和远东港口附近的干涉军、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南方的邓尼金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他们各拥有十几万到数十万的正规部队。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小规模的白军集团，和来自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干涉军，规模从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难以一一罗列。所有的白卫军和干涉军都可以指望协约国强大的工业和海运支持，并在 1918 年 11 月以后利用协约国堆积如山的战争剩余物资。红军建立时只有 10 万部队，到 1918 年末也只有 50 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不到 40 万。由于大部分军官反对革命，早期红军的军事素养不如白军，更不如协约国干涉军。苏维埃政权只能对乌拉尔山和

波罗的海之间北方内陆地区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有效利用（白海沿海不在内），其中列宁格勒（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两城附近，与 15 世纪莫斯科公国大致相当的地区勉强算是稳固的根据地。由于战乱和封锁，苏维埃控制区内的工农业比大战前萎缩了一半以上。无论是比资源、人力还是生产能力，内战前期的红军都远不如自己的对手。然而，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打败了所有敌人。到 1919 年底，红军已经发展到 200 万，将所有敌人赶出了俄罗斯核心区域，让所有对手都承认它是俄国唯一值得进行谈判的势力。如果把胜利和内战开始时的实力对比结合起来看，胜利是惊人的。

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得益于敌人内部的混乱与分歧。各支白卫军以及在背后支持它们的列强都有自己的利益。初期白卫军蔑视苏维埃政权，盲目攻击以抢占地盘，并企图为战后瓜分利益争功。到了内战中期，虽然形势需要有组织的作战，但建立在地方势力和旧军官团基础上的白卫军本来就缺乏真正的权威，一旦部队规模变大，占领富庶地区，军阀的短视本色就显露出来。各个白卫军派系内部尚且做不到有效指挥，更无从指望派系之间乃至和中间势力的合作。至于协约国列强，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利益不一，正为了更重要地区的利益吵的天翻地覆，也不愿意为了消灭苏维埃消耗太大的实力。而红军一方指挥统一，各部队尽力合作，又占据了铁路网的中心地区，享有内线优势。因此红军得以灵活调动主力，利用不同方向敌人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差应付各路危机。

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内线优势比内战中的红军还要大的多，因此光是内线优势不足以解释俄国内战的结果。在世界大战中，工人发现自己不仅要为统治集团赚取财富，而且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他们的财产。他们对这个要求自己付出一切，却不能给他们温饱与尊严的制度极端不满，对新兴的革命政权充满向往。这才是苏维埃政权最大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是所有对手的劣势。因为占据了这一优势，苏维埃政权在所有的城市中拥有天然盟友，可以利用所有的铁路、工厂来支持红军，至少可以通过发动工人来阻止对手有效利用工业资源。红军也因此在城市中拥有了可靠的兵源，危急时刻还可以就地动员工人民兵来保卫关键要点，这些民兵往往和红军一样善于作战。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这些优势非常关键。由于类似的理由，无论出身工人还是农民，旧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革命。沙皇和军官团先后驱使他们为了沙皇在中欧的利益或英法在东欧的利益作战，苏维埃政权却号召他们保卫自己的政权，这种对比严重影响了白卫军的士气和作战意志，为红军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士兵。

无产阶级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国内。4 年的大屠杀过后，英、法虽然战胜，但国内无产阶级发现自己依旧一无所有。他们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牺牲只是为统治阶层赢得了利润，因此坚决反对继续打仗，更反对政府派干涉军去扼杀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左翼政党组织工人游行示威，港口人员拒绝装运支持白卫军的物资，共产主义者则向干涉军宣扬革命。这些运动不仅给各国政府干涉俄国革命带来了困难，也让统治集团意识到再次动员、组建大规模远征军的可怕后果——彼得格勒兵变的教训就在眼前。所以，尽管白卫军很快证明自己不能抵御红军，但直到苏维埃政权彻底胜利，各国的干涉军始终没有足够兵力进军俄国腹地。

农民们对这场工业时代的内战持中立态度。社会主义革命与贵族军官的光荣都是农民无法理解的东西，征集余粮的布尔什维克和喜欢烧杀抢掠的白卫军都不会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但农民们从革命中得到了土地，因此，如果一定要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宁愿接受苏

维埃政权而不是声称恢复旧制度的白卫军。1918 年 6 月份苏维埃政权组建贫农协会，以富农为代价动员了一部分农村资源。总的来说，农村是倾向于新政权的。

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是本来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新政权因此不需要顾及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动员一切资源来支持作战。在经济方面，1918 年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在工人支持下将大工业国有化，监督一般工业的运行；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所有物资都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生产并重新分配。这使得苏维埃政权能在狭小且被封锁的控制区内动员出远大于沙皇时代的资源，而各路白卫军只能利用残破的民政机构来支持战争。尽管白卫军一度占领了富庶的南方，但征集的物资必须先由原来的地方势力经手，然后在军阀和军官团之间分配，最后才能低效率地用于战争。协约国通过海运提供的物资无法弥补如此巨大的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在军事方面，布尔什维克党最初极端缺乏军事人才，领导人中只有当过军事记者的托洛斯基算是行伍出身，但士兵、士官和基层军官对革命的支持为组建一支正规红军提供了基础。托洛斯基征召了大批不赞成革命的旧军官加入军队，同时依靠军队底层的支持向各个红军单位派出政治委员，从而建立起兼顾军事素质和忠诚可靠的红军。到 1920 年，红军在军事素质和骑兵作战方面已经和自己的对手旗鼓相当，士气和作战意志则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共产党（1918 年，布尔什维克改称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是取胜的关键条件。在十月革命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与战争制造了大批左翼组织。但惟有布尔什维克既主张发动人民实行广泛的革命，又坚持要建立一个坚定、强有力、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不论这一主张是否符合对共产主义理想，在俄国内战的年代，这是唯一能让革命政府生存下去的组织模式。内战期间，共产党员从 1 万多增至 70 万，依然保持中央集权和纪律严明的特征，还有特务组织负责清查内部。这种组织模式不仅将各地相对独立的革命力量组织成强有力的军政力量，还吸引了不少民族主义者站到苏维埃一边。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苏维埃才得以发挥其他优势，最终战胜组织涣散，目标不明确的敌人。

尽管苏维埃政权占有上述许多有利条件，但它们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布尔什维克最初只有数千人，红军需要从无到有的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必须一面作战，一面发展、巩固自己。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内战几经波折，苏维埃政权不止一次被逼到看似山穷水尽的境地。1918 年 7 月，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统帅主力野战军的东方面军司令随即叛变，几乎联合捷克军团攻占莫斯科。1919 年，敌人一度攻入列宁格勒郊区，攻占库尔斯克，威胁莫斯科。

苏维埃和红军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极大代价，或许还带了几分运气，才得以在 1920 年春天基本肃清了沙俄帝国的中心地区，迫使波兰以外的相邻敌国要求谈判。

最后一次决定性挑战来自西线。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英、法、美都非常重视这个东欧“大国”对苏维埃政权的遏制作用。由于协约国（尤其是法国）的支持，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和过度的自信，波兰政府制订了宏大的扩张计划，试图将历史上波兰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全部占领。1919 年，波兰趁俄国内战占领了明斯克，控制了半个乌克兰。1920 年春，波兰已拥有 74 万军队，在国内利益集团和英、法的鼓动下提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被拒绝后于 4 月 25 日大举进攻，5 月 6 日攻克基辅。然而，已经基本扫平内部的红军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在初期的慌乱过后，红军进行反击。离后勤基地太远、

野心太大的波兰军全线失败，几乎在敌境内被全歼。红军跟随败退的波兰军直逼华沙，宣称要将革命引向中欧，这令西方列强惊恐不已，一直等待波兰胜利的英国立刻出面调停。调停尚未有结果，历史就再次让观察者吃惊。在法国全力支持下的波兰军在华沙城下重整防线，又打了一个漂亮反击，歼灭了后勤不继的红军一线兵团，双方遂签订和约，俄国放弃了一些领土，波兰则暂时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扩张野心。这一战役的几次转折表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已经根基稳固，但缺乏将革命引向境外的能力。

波兰战役以后，国内已经没有能和苏维埃政权对抗的势力。弗兰格尔指挥的南线残余白卫军于 1920 年末被赶下大海，在法国舰队协助下撤退。中亚、高加索地区也先后被红军占领。日军于 1922 年撤出远东，苏维埃政权终于统一了全国。从 1921 年起，苏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征集制度，转入和平建设。

5 年内战，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00 万平民死亡，100 万红军战死，伤残者数倍于此，工农业产量分别下降到 1913 年的 20%和 50%。这些枯燥的数字充分说明了内战的惨烈。共产党员在内战中英勇作战，5 万多党员战死或殉职，战前入党的党员损失过半。巨大的损失与共产党的迅速扩张降低了党员的质量和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保存了党的机构和目标。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世界 1/6 的土地将被这个宣称将建设人间天堂的政权所控制，其余的地区也将被它深刻改变。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科学共产主义是唯一走入现实并站住脚跟的天堂梦想。

科学共产主义对天堂的定义一如既往的简单："人类的自由发展"。这并没有什么出奇。但与以往的各种天堂概念相比，出现在 19 世纪的科学共产主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科学"。科学共产主义不仅以唯物主义观去考察历史和现实，同时也将自身纳入唯物主义历史观。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大的特点是不对历史事件贴道德评判`，而且认为物质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这种立场下，革命者为共产主义理想贴上的最显著的标签是"先进性"、"必然性"而不是道德上的优越性。革命者破除了既往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神秘性，否认有什么不言自明的道理。在总结历史上那些天堂梦想未能实现的原因时，他们不会把原因归结为古人不够努力或者道德水平不足，而是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上找原因，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失败尝试。因此，革命者很理智的认识到，人间天堂必须在旧制度的裂缝中萌芽，在资本主义的残骸上建立。在世界大战把欧洲打成一片废墟以前，资本主义用全球霸权证明了自己依旧适合这个世界，因此共产主义者很有耐心的等到 1917 年。

在发动革命时，革命者不会指望能通过说教解决主要问题，他们直接发动那些最可以依靠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去参与革命，通过暴力而不是宣传去打倒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取得政权，根据唯物主义历史原则，革命者将立刻改造社会结构，以此巩固革命，消灭资本主义主义社会带来的问题。然后的主要目标将是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以物质力量压倒敌人、保卫自己。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的信徒是世界上最现实，对世界认识最清晰、最适应工业时代的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科学"或者说客观规律的尊重是胜利的基础。

不过，能在 1917 年带来胜利的思想不一定能保证永久的胜利。

夺得政权的科学共产主义者急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为这样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同时，新生的苏联既受到整个世界的敌视，又困于国

内经济部门的残破，因此迅速发展工业经济成为了官僚集团的头号目标。列宁也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及其继任者的诸多问题，但他认定“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潜台词是其他问题将在经济发展后迎刃而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将这一政策推行的更加彻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财富太多而陷入大萧条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相对地位远超沙俄的军事强权。然而，物质竞争并不是历史的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胜利已经证明竞争压力不再是塑造社会制度的唯一力量。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布尔什维克本应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巨大的成功和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当然也因为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和惰性，苏联继续在一味追求物质力量的道路上前进。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指望经济发展带来共产主义，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则赞美经济发展本身。

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使它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承受了最重的军事压力和最大的损失，苏联还是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并在许多邻国建立了类似的社会体制。苏联的新官僚对自身体制的信任和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在这时达到顶峰。官僚们忘记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类自由地追求新生活，而不是继续在地球这个竞技场中无限制的比拼物质力量——虽然物质力量的竞争依然很重要。一味追求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同时放弃世界革命理想的苏联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单纯的物质竞争，用竞争压力而不是人类的理想来塑造自身社会。事实上，苏联已经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等级，在平民中大力宣扬民族主义，甚至掠夺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盟国来发展经济。苏联尚且如此，其他在苏联影响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依样画葫芦，如此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理想和武器——摆脱物质竞争规律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让人类自由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体制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它的资本主义对手并无区别，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因受到社会主义压力而改良的资本主义。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完善了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医疗体系，建立了世界第一的陆军，制造了亿吨级的核武器，让成千上万的平民拥有了家庭轿车和别墅，在人均经济水平接近西方的同时将社会财富更平均的分配。但它依然不能让自己的人民满意。当社会主义把赢得物质力量的竞赛作为唯一目标以后，那个至少在名义上依然追求理想主义的官僚机构就显得很多余了，更不要说那些关心自身利益胜于关心经济发展的官僚。一旦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社会就动荡不安。最终，苏联在 1991 年解体，其余按苏式体制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渐变，或崩溃，也在大致的时间彻底转向西方体制。这其中原因很多，但 20 世纪科学共产主义的主流理论过于强调物质力量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强调人类自由发展的理论却要在已经确定的历史规律中找到自身的“先进性”和“必然性”，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僵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不能也不想去解决这个矛盾。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最初就因此而埋下了隐患。究竟这一矛盾是马克思的失误还是革命者的曲解，或者是形式所迫，在作者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矛盾本身。

十七、 战后动荡

1918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协约国赢得了胜利。除了正在为生存而战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其他欧洲强国的统治政权立刻把注意力转向瓜分同盟国的遗产，从而抵偿自己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

同盟国的遗产包括 3 部分：

1 硬通货和可以变现或直接利用的物资

2 海外殖民地

3 本土工业体系。

从真实价值来说，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本土工业体系无疑是价值最大的遗产。不过，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缺乏资源和市场，协约国（除了美国）虽然也因为战争而民穷财尽，但它们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惯性决定了他们渴求市场胜于一切。如果有市场、有资源、有利润，他们本可以轻松的将自身的工业规模在短时间内翻上一番或更多，没有必要吞并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来增加已经很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至于说拆散德国的工业体系，在消灭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的同时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本是协约国的计划之一，但由于英国统治集团不愿意看到法国独占中、西欧，这个计划在遍布欧洲的革命浪潮威胁下被放弃了。随后的历史证明，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没有拆散德国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德国在战败之时已经交出了大批工业-军事物资，然后又背上了 300 多亿美圆的赔款。由于大战的消耗，前者相对工业列强的经济规模来说微不足道；后者则因为不切实际的数目而没有真正偿付，协约国指望靠赔款充当利润也是不可能的。倒是德国傲视它国的工业技术（尤其是化学工业）引起了胜利者的兴趣，美国企业借战胜之威，在政府支持下贱买甚至掠夺技术，从德国取得了 3200 项关键化工专利，其中 1200 项被杜邦公司获得。不过，在这个时代，基础科学研究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应用技术主要还是依附于特定工业体系的技艺，因此技术流失还没有动摇德国的国本，或是明显增加战胜国的战争红利。

最后，只有那些诱人的海外殖民地来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了。但是，读者应该记得德国为什么会发起这场空前的大战——英法以及附庸的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拉美诸国等工业资本主义集团基本垄断了全球海权和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德国工业资本主义集团为了给迅速扩张的工业体系提供廉价资源，给不断增长的过剩产品找到市场，迫切试图打破这一体系。缺乏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正是德国战前的特征之一。至于奥匈帝国，它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弱国，海外殖民地很少，只在东欧拥有一些落后地区做半殖民地，暂时也足以应付其不多的过剩商品。由于靠近苏联，这些半殖民地在战后不得不独立出来，以保证民族主义不会和革命相结合。因此同盟国实在没有多少殖民地遗产来满足协约国的胃口。（土耳其在战前已经算是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种局面意味着胜利者既没有取得真正的市场增量也没有消灭潜在对手的工业潜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美国的工业产能在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加剧了生产过剩的趋势。随着德国的复兴和日本的崛起，这一矛盾将越来越尖锐，下一次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件。在凡尔赛和约签定后，法国元帅福煦对这一和约所规划的未来做出了恰当的评论——“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的休战”。

英法及其附庸国虽然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但毕竟取得了胜利，在外表上保住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英国依然占有广阔的殖民地和无数海外基地，法国则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甚至

连比利时、荷兰等国都能维系自己的殖民帝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胜利的光环下，运行惯性足以保证这些帝国继续保持一段时间。不过，正如虚弱的比利时、荷兰等国只是因为允许英、法资本集团分享殖民地利益才得以在二十世纪保持殖民帝国一样，英法得为了保持既有地位也必须向美国甚至日本让步。早在 1900 年，美国就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机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先行在中国占据牢固势力范围的各国（尤其是英国）允许美国享有同样的贸易权利和投资机会。类似的，日本趁欧洲战争激烈的时候抢占青岛和德国的其他远东殖民地，大肆在中国进行投资、倾销，还提出了“二十一条”试图把中国变成独占的殖民地。战后美国——不是英国,要求按既有实力对这一情况作出修正。在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一方面要求列强的商品和资本可以平等的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允许日本保持一些在华特殊权益；《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则赋予美国和英国平等的海权，给予日本远超战前的海权。除了少数控制牢固的殖民地如印度外，海外殖民帝国（政治意义上的和经济意义上的）已经不再是英法资本独享的自留地了，美国、日本、意大利，甚至复兴的德国都争相拥入这些地区，争夺资源和市场。1931 年，英国本土资本集团被迫在《威斯敏斯特法》中给予部分殖民地本土统治集团一定地位，以放弃部分长期利益的方式，来保证英帝国不至于在大萧条中解体。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削弱了英法殖民帝国，为其他后发工业强国崛起开辟了道路。

英法的相对衰落给了其他工业国家发展的机会，但开放的公共殖民地（如中国、拉丁美洲）只有利于强大的工业国，美国和复兴的德国都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日本、意大利等相对较弱的工业国得益不大，它们既无法通过投资和倾销与一等强国竞争，又不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强国有“主场”之利，也没有足够的既有海外投资来贴补外贸，因此对这个秩序依然不满。它们既反对英、法旧殖民势力的剩余部分，又对强大的美国心怀恐惧，更害怕无法转移的国内矛盾最终酿成革命。最终，日本和意大利这两个二等工业国在下一次大战中站到了再次挑战既有秩序的德国一边，并得以在打击英、法旧殖民势力的过程中暂时维系美、苏两强的中立态度。这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有更多的工业资本集团加入世界霸权的角逐，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影响范围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奥、土三大帝国，削弱了英、法两国，欧洲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出现了松动，在苏联的压力或支援下，第三世界的本土势力逐步结合成现代意义上的准政治集团。如在形式上独立的波兰、中国（国民党政权）、土耳其、泰国，以及一些独立性更差的政治集团，如中国的军阀、朝鲜流亡政府、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爱尔兰新芬党等。这些政治集团在政治上是工业化国家的仿制品，经济上是工业强国的依附品，但毕竟还是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地位。世界大战一方面打破了西方的严密统治，另一方面也给这些独立的统治集团做出了榜样——所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核心不过是弱肉强食。因此，这些半独立的政权很快就适应了赤裸裸的物质力量竞争，崇尚暴力和民族主义，试图重现欧美列强的发展道路。在那些直接面临德、日、意扩张威胁的地区，这些政治集团会抵抗入侵，迅速提高战争的烈度；在那些还在英、法、美控制下的地区，这些本土政治集团反而会和德、日合作，试图在夹缝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局面表明了物质力量竞争的空前激烈，也预示着下次大战将给第三世界本土利益集团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类创造了一个沙漠，把它叫做和平”——汉森·鲍德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幸福，自 30 年战争以来，欧洲平民第一次被如此深刻的卷入战争。在以往的战争中，贵族和少数专业军人进行短促的交战，决定王位或是一小片土地的归属，战场以外的地区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的存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前线的数千万军队，整个国家的工业、农业、商业、男人甚至女人都被发动起来追求胜利，国家订货吃掉了所有的剩余产品，崇尚自由经济的政府被迫以配给制和计划经济来分配资源。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主要参战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而民穷财尽。政府订货和经济管制不仅成为维持军队后勤的手段，也成为整个经济消灭过剩产品、保证平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一旦战争结束，军事化的经济管制结束，一方面欧洲平民比战前还要穷困，另一方面过剩产品却比战前多（考虑到美国的生产能力）。欧洲很快又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因为上千万士兵复员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20 年前后，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无数受过军事训练后失业的无产阶级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同时，当人们回顾大战带来的巨大伤亡与破坏时，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力量由于他们一贯的反战立场而广受支持，旧有统治集团的权威因为发动了如此荒谬的一场战争而受到质疑，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整个欧洲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俄国士兵和失业工人已经在一个旧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宣称为无产阶级建设天堂的政权，更多的西欧无产阶级相信自己也能做类似的事情。甚至远在东方的日本，派出的干涉军士兵受到革命影响后，回国后也组织失业工人与佃农起来对抗财阀。在德国、前奥匈帝国控制区、以及在战争中损失巨大的意大利等中欧地区，由于不能以战利品来缓和经济问题，革命思潮已经变成了现实。德国战败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海军士兵的起义，随后柏林象彼得堡一样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19 年春天，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匈牙利甚至先后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同期的意大利工人组织几乎控制了整个意大利的工业。即便在英、法、美等确实得到了实惠的战胜国，工人的左倾思潮和罢工也阻止了统治集团深入干涉革命。因此各国统治集团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无产阶级。

就在整个欧洲的旧秩序风雨飘摇之际，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到 1920 年，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俄国内部站住了脚，还能借反击波兰入侵的机会让红军冲出国境，直扑华沙。1920 年 8 月，已有数十万红军集于华沙城下。已经支援了波兰大批物资的协约国力劝波兰政府割地求和。很明显，红军的战略目标绝不仅仅是攻克华沙，甚至不是在整个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1919 年 3 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已经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应该与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支持狭隘民族主义的社会党划清界限，不再寄希望于改造旧制度。当世界大战在革命中结束时，这些国际共产党人认为发动世界革命、以暴力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发动欧洲革命！如果红军控制了波兰，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正在酝酿革命的中欧。当时的许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列宁和英帝国首相劳合－乔治都相信，一旦红军进入中欧，得到支援的当地无产阶级将迅速击败旧统治集团，然后结合中欧的工业和东欧的人力，一举在整个欧洲建立苏维埃政权。事实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是德语而不是俄语。

然而，华沙战役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只有波兰统帅毕苏斯基是个例外。毕苏斯基冷静的分析了红军的弱点——一线战斗兵员过少，后勤薄弱，属于一支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力量。在以少量装甲汽车对红军补给线大肆骚扰后，他抽调了所有机动兵力，利用红军军官团的内部矛盾，攻入红军后方。波兰军很明确地以华沙－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

间的道路为主要目标，彻底毁灭了红军的补给线。红军因此全线溃退，几天前还显得的无坚不摧的红军成了可以被任意追捕的散兵，抵抗消失的速度甚至超出了波兰人的预料。最终，红军损失了 15 万的战斗兵员，近 10 万战俘被虐杀或死于战俘营。华沙战役后，红军完全退回本国，虽然勉强挡住了波兰军的再次入侵，但短期内失去了进兵中欧的能力。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旧秩序就一直处于革命的边缘。在干涉俄国革命受挫后，整个世界都认识到共产主义者确实有能力建立一种新秩序，绝非只会造反，不能建设的暴民。因此，对旧统治集团而言，遍布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暂时的骚乱，而是对整个旧秩序实实在在的永久性威胁。如果无法在华沙挡住红军向中欧的进军，世界革命，或者至少说欧洲革命看起来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军止步于华沙，让旧秩序有了喘息之机，遍布中欧的革命火星先后被残酷镇压，没有燃成燎原大火。所以，许多历史学家或政治人物把华沙会战看作一个历史转折点，认为毕苏斯基的偶然胜利把无产阶级革命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挽救了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偶然性干涉历史大势的典型例子。

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从 1920 年 8 月的局势来看，波兰军队无论是选择撤退还是投降都不会让人惊奇。华沙会战以前，红军高层视华沙为囊中之物，甚至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战术意图，总攻华沙的命令居然是用明码电报发出的——这一举动倒是在华沙城内有效地制造了恐慌，各国使馆纷纷撤出华沙，只有少数军事代表留下来准备见证波兰政权的灭亡。直到波兰反攻得手后三天，红军高层还认为自己只是稍受挫折，期待着整顿部队以后卷土重来。而波兰一方，不在毕苏斯基直接掌握下的两个军团居然不敢追击败退中的红军。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对波兰的胜利有信心的人，仅毕苏斯基一人而已。红军的失败因此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主导了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毕苏斯基也因此被视为波兰政权乃至中西欧旧秩序的救世主。

当事人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对失败表示了如下的遗憾：“……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者都在张惶失措，劳动者都在仰首期待，准备揭竿而起。那是毫无疑问的，假使我们在维斯瓦河上获得了胜利，则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了。假使不是我们战略错误和在会战中失败了，则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西欧革命之间的一个连锁。假使我们能够击败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军队，则波兰劳动阶级的革命即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波兰的边界也决不能挡着这场大火。于是就好像狂潮一样；会淹没了整个的西欧………”?。在战线的另一面，英国驻柏林大使则表示“………..在现代文明史中，没有比一九二〇年华沙会战还更为重要的事情，而其意义在今天却很少有人能认清。当时的欧洲，其存亡之机实已间不容发。假使在这一战中，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则在欧洲史中将构成一个转向点，因为毫无疑问的，在当时的全部中欧地区都有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和苏俄侵入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很难于加以抵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对于一九二〇年的事实有值得注意的必要。这一次胜利的获得，最主要的应该感谢一个人（毕苏斯基）的战略天才。在作那样危险的行动，所需要的实际上还不只是天才，而更是英雄的气质了。政治作家们应负起责任来向欧洲人解释清楚：在一九二〇年，波兰曾经拯救了欧洲，而且必须使波兰强大，并与西欧文明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为对于亚洲人侵入的永存威胁，波兰总是一个壁垒……….”?

不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华沙会战前后的历史，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应该比当事人看的更清楚。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社会都会以全体成员的名义，由中层的官僚、军官去动员下层的人力，对抗试图推翻现有秩序的力量。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驱动并组织这种镇压行动的阶层并不一样。在 19 世纪的欧洲，这种权利和能力基本被大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所垄断。那些拥有独立企业或海外股权的业主在议会中行使自己的权力，送自己的子侄去军校或大学。同时旧贵族占据议会上院，世袭关键军政职位，与资产阶级联姻，保证本国资本集团的团结协作。在这种严格尊重私有产业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中，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才是真正拥有这个社会的人，更严谨一点说，他们是竞争压力所选定的资本代理人。

到了 20 世纪，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事务的逐步复杂化，以及行政和军事机构越来越庞大，大批不直接占有产业或政治特权的经理、官僚、职业军官逐步取得了社会的实际管理权。另外，在一个市场相对不足的年代，充足的物质资本不足以确保维系利润的增长，资本必须和技术及管理能力结合才可能以新产品占据市场，排挤同样拥有基本工业物资的对手。因此，几个基本生产要素可以按稀缺程度做如下排序：技术（包括管理技能）>资本（广义的工业物资）>简单劳动力(无产阶级)。而技术和管理能力正是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因此，中产阶级的地位与力量与日俱增，这种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工业化的媒体，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型股份制企业和相对独立的经理人阶层的出现。而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的地位逐渐削弱，无论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他们的所有权越来越趋于象征化。只是由于社会运行的惯性，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才得以在发达国家把地位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首次全面大战。它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单纯的人力已经不足以左右战局。在这个时代，暴力冲突的基础是与工业力量相结合的人力。只有用工业物资装备，以标准方式训练，并通过完整的现代工业进行补给的军队才能取得有意义的战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组织的人力相对工业资源而言是过剩的，因此，工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无论是内战还是国际战争。

工业资源依赖于这样几个条件：资源、工业设备、受过工业训练的人口。正如前面指出的：20 世纪的主要工业人口已经分化成技术-管理阶层和普通的无产阶级。前者掌握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或能够熟练的协调工业生产，后者则只受过简单的工业训练，并有一定的纪律性。在一个农业还可以不断供给劳动力的年代，无产阶级收入仅够糊口，生计时刻受经济波动的威胁，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付出生命而一无所得。因此，他们仇恨旧制度并期盼一个新社会，很容易为革命所动员，是共产主义者依靠并寄予希望的阶层。而技术-管理阶层由于相对稀缺，收入很高，且在一般的经济波动中保持稳定，因此倾向于维护旧秩序。他们（包括以专业技术管理工业化军队的军官阶层）虽然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资产阶级，但确实和资产阶级乃至旧贵族暂时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列宁这一代共产党人看来，这些“布尔乔亚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已经被排除出了无产阶级的范畴，是革命的敌人。

从历史趋势看来，工业经济体系和军事体系越发达，所需要的专业人员比例就越高，中产阶级的力量也越强。在中西欧、北美等发达的工业地区，中产阶级在事实上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只要这个中产阶级没有因为工业经济的消失而被解体，他们就有能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在德国，职业军官和资产者的联盟镇压了多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人力优势难以压倒职业军人的军事技能和组织能力，更无法对抗资产者的经济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产阶级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控制工业与国家机器，但无产阶级和共产

主义者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经验，也没有替代旧秩序的完整经济理论。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配合，他们只能在比较落后的工业国中暂时维系工业体系的运行，无法保证工业经济长期正常运转、发展、升级。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工业经济的运转，不得不留用大批管理-技术人员；甚至在军队中留用敌视新政权的职业军官。意大利的工人曾在 1920 年发动起义，控制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工厂，却无法把它有效的转化为物质力量。反过来，由于无法保证全部无产阶级都参与革命，只要中产阶级忠于旧秩序，反革命势力可以迅速的找到替代罢工者的人力，革命者甚至无法有效的抵制旧秩序正常运行。1922 年意大利的交通行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结果法西斯势力很迅速的为他们找到了替代者，维持了社会秩序，罢工的结果反而为法西斯增加了政治声望。这说明，不掌握工业社会稀缺资源的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谈判筹码，很难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与中产阶级和资产者的联盟进行正面、长期的对抗。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在中、西欧发达工业地区，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潮看似声势浩大，但一旦中产阶级发力镇压，没有哪个革命政权真正能组织起工业化的军队保卫自己。

东欧的情况有所不同。东欧各国的工业经济比亚洲、拉美等殖民地要强，但远不如西欧和美国。工业经济的绝对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都无法与英、法、德、美等国家相提并论。因此，一方面中产阶级在东欧的力量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人数远小于农民，大部分人口还在农业社区里生活。如果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中产阶级的抵制或镇压要比西欧弱的多，无产阶级也有能力暂时管理简单的工业为新政权所用。同时，光是控制国家的工业资源不等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如果不能从农村取得支持，任何政权都无法在东欧国家立足。

俄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艰难胜利。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胜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首先，俄国无产阶级在工业人口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能在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就控制并利用主要的工业设施和交通系统。即便便弱小的中产阶级并不乐于合作，无产阶级依然可以取得相当数量的的工业资源，这保证了红军能够对抗由协约国提供工业物资的叛军。其次，布尔什维克借鉴了社会革命党的成功经验，向农民无偿分配地产。虽然这一举动并非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它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内战时期最受农民欢迎的政治力量。最后，沙皇体制和临时政府解体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从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正式的国家政权，各路叛军要么以少数民族的名义要求独立，要么依附于其他工业强国，苏维埃政权在无形中成为民族主义的唯一代表。许多利益与统一国家密切相关的旧军官和中产阶级因此宁愿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维护国家的统一。布尔什维克恰当的利用了这三个有利条件的支持，最终在俄罗斯建立了稳定的革命政权。

尽管占据了这些有利条件，但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到巩固的过程依然非常艰难。上一章比较详细的讲述了这一过程，读者从中应该可以看到苏维埃政权成功的偶然性。在几次危机时刻，胜负只在一线之间，革命政权完全有可能被消灭，就象协约国在匈牙利镇压革命一样。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类似的革命势必受到更大的阻力，成功的可能性更低，乃至完全不可能。具体而言，在工业经济比俄国更发达的国家，旧统治集团可以利用中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容易的镇压革命；在那些工业经济更弱的国家，革命的关键在于农村，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城市暴动取得国家政权，自然也就没有取得政权后再分配土地，博取农民支持的机会。苏式革命的模式真正适合的是俄国这种半边缘地区，很难在俄国以外的地区得到复制。几十年后的中国革命就曾经在仿效苏联的道路上

碰壁，最后中国的革命者把土地改革当做革命的基础而不是工具，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取得了胜利。

东欧的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结构与俄国非常相似，因此是相对最适合苏式革命的地区。如果再加上红军跨国境的支援，确实有可能建立稳定的苏维埃政权，不过，这种外来的支援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比如说对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能够顺利地向农民分配土地，从而彻底毁灭了农村旧秩序，得以动员农村的资源为己所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红军士兵大多来自本国农村，在军队里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受现代工业社会影响，是苏维埃这个城市政权与农村之间的天然纽带。一旦异国作战，一方面时间不允许红军在农村分配土地，另一方面红军也缺乏本土人力来执行这一政策，事实上，红军在波兰乡村征发了大批物资，这引起了严重的抵制情绪。因此红军无法迅速打破农村的旧秩序，能够动员农村资源支援作战的是充满敌意的地主贵族阶层，而不是苏维埃政权，波兰的情况正是如此。另外，苏维埃赢得内战，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红军异国作战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把中产阶级精英推向革命的反面。所以红军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远没有控制一个俄罗斯或乌克兰省份那么轻松。

无论如何，在苏波战争中，苏联以大击小，将革命激情与民族主义对侵略战争的报复情绪结合起来，兵临华沙城下。若非毕苏斯基力排众议，在准确把握红军弱点的前提下冒险抽调兵力出击，红军占领华沙乃至在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史实。不过，根据前面的分析，历史的偶然性也到此为止，再向西，由于协约国没有触动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中产阶级，红军很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激起有实际军事意义的革命浪潮，革命只能在红军到达以后发生。从华沙到柏林的道路必须由红军自己打出来。

东欧并非工业发达的地区，战前的俄罗斯帝国虽然算是世界列强，但国力主要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工业相对西欧北美不值一提。在 20 世纪的全面战争中，这样的国家打防御战尚可，越境作战就只能靠长时间积蓄工业物资，然后发动一次性的突袭，稍遇不利必一败涂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向中欧的进军中，红军要依靠这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的二等工业国保障后勤，曾经向帝俄提供工业物资的协约国如今是他们的敌人。在攻至华沙城下时，波兰有 20 万不到的军队，依托囤积于华沙的大批协约国物资进行抵抗。在红军一方由于缺乏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技术能力，后勤线由 3 万 5 千辆农用马车来维持，军火要依赖缴获的协约国物资（从叛军和波兰军那里缴获）才得以保障进攻。这样脆弱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了红军境外作战的力量。红军越过国境线的人数虽然号称百万，但大部分是后勤人员，战斗兵员不足 20 万，还不到大战期间俄国一线兵力的 1/5。当然，1920 年的红军比起 1914 年的俄帝国军队多一些士气和凝聚力，但更缺乏训练有素且忠诚的职业军人。综合考虑军队的质量与数量，这支红军的实力远不如当年处于同一战场上的帝俄军队，脆弱的后勤是它的致命要害。毕苏斯基利用这一弱点击溃了华沙城下的红军。但即便红军赢得了华沙战役，考虑到苏联濒临崩溃的经济，红军也不大可能派出规模更大的部队去进攻柏林。协约国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工业，只是限制了德国的军队规模。如果红军只能派出十几万或更少的军队进兵德国，我们不难想象战争的结局。更何况协约国还可能因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前解除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总而言之，华沙之战的结局确实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另一种可能的历史中，红军可能攻克华沙，占领大半个波兰，但除非上帝相助，否则他们也只能到此为止。中、西欧的社会条件和苏联自身的物质力量决定了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想象，波兰苏维埃将会加入苏联）。世界革命因为两个马克思未曾料到的因素——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没有发生。中产阶级力量强大，所以革命无法在发达国家成功；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缺乏无产阶级的落后国家也难以依靠无产阶级的忠诚进行苏式革命。而俄国这个半边缘国家的既有物质力量决定了苏联支援他国革命的规模——其规模不足以改变远方大国的力量平衡。所以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之内。此外，由于民族是资本结合的重要纽带，民族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 1917 年革命在俄国的成功以及在俄国以外地区的失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以那些已经部分工业化，破坏了旧制度但并非中心发达地区的国家为土壤。这一结论对今天的中国也非常有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革命浪潮以及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一点——在这个时代，旧资产阶级、旧贵族和他们维系的旧秩序既不能高效的促进资本增殖，也不能对内镇压或安抚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甚至无力保证自身的生存。于是，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中产阶级本能的起来保卫这一秩序，他们以民兵团、社民党、行业协会、甚至校友会、俱乐部等形式组织起来，在事实上接管了社会。新旧资本代理人的交替本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因为大战的动乱和欧洲革命的威胁而大大加快，随后又因为 20 年代的的经济增长而在比较富庶的国家出现了一定的回潮，或者说新的统治集团不得不借用旧统治集团的外壳。但总的来说，这是竞争压力下，工业经济的结构特征在工业化社会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由于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地区所达到的阶段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对欧洲各国革命的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定的工业化水平在俄国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更发达或更落后的地区却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甚至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进入 2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骚动的无产阶级（以及下层中产阶级）被暂时安抚下来，在俄国以外的地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挺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

十八 、大萧条

欧洲的骚动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只要无产阶级得不到工作和安全感，革命的威胁就会一直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联手镇压可以保证一时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永远的安宁。因此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一面在废墟中奋力谋生，一面期待着欧洲革命的迅速爆发能给俄国革命政权带来安全。但是，就象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超级经济危机摧毁了足够数量的生产力与商品，从而为经济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带来了空间。

1923 年，大战已经结束 5 年，但英国和法国的工业产值分别只有 1913 年的 79%和 88%；德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工业产值统计口径不一，但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战前的六成；俄国与部分东欧国家的工业生产已经因为战乱而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即便生产能力未曾受到战争直接打击的美、日两国生产能力有了飞速增长，至多也只能勉强补偿西欧的产能衰退。不过，由于中产阶级在 20 年代初控制住了局势，这种经济衰退没有摧垮欧

洲资本主义，反而使生产过剩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缓和。另外，在大战期间，由于发达国家将工业产能用于战争，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落后地区得以在没有成熟工业经济竞争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工业。连本来已相对过剩的农产品和简单劳务在战时特殊条件下也为第三世界赚到了不少硬通货，这都是战后资本主义强国的的利润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第一次世界性的总体战争。各工业国为了取得胜利，大大增加了对科学技术的投入。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新技术的欧洲民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特权阶层相对不足的奢侈消费以及好奇心来支撑（如汽车、运动型飞机、豪华邮轮），平民的大宗消费更需要的是既有工业技术的推广。等到战前的军备竞赛开始，新技术部门忽然有了军方这个胃口无限的大卖主。许多进展缓慢的技术研究因此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许多从未有过的工业部门在军用需求刺激下得到了迅速成长，比如电力、内燃机、航空等门类。以航空工业为例，1903 年人类才第一次实现飞行，1913 年世界上只有 1000 架简陋的飞机，而到了 1919 年，各交战国累计制造飞机已达 18 万架。等到战争和经济危机结束，这些新型的机械和先进技术使得民用行业的设备与生产方式一下子显得大为过时，因此各国工业、交通业企业在经济复苏后都迅速更新设备，战争以超出市场规律的方式为世界经济强行提供了更新设备的需求。这次设备更新规模虽然远不如二战后的类似浪潮，但也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相当一部分投资最终体现为工人的工资和农民出卖农产品的收益，因此也反过来提供了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并刺激下一轮投资。在这些投资再次以利润方式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之前，这样的循环会持续许多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因此而正常运转数年，达到超出战前水平的高度。

欧洲工业产能衰退、第三世界积攒了一定的通货、设备更新提供了需求、革命，在这几个条件综合作用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暂时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梦魇，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法国在 20 年代中前期相对得意。由于扩张了领土、获得了资源和赔款、巩固了殖民地，曾遭受巨大战争破坏的法国在 1924 年达到了 1913 年的工业产能，是欧洲主要参战国中最快恢复到战前水平的国家。在随后 5 年里，法国保持 5%以上的工业增长率，本土工业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人口。即便法国资本集团在大战和革命中损失了巨额海外投资，但经过数年的高增长后，在残破的欧洲大陆背景中，法国似乎是唯一的大陆强权。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战败的德国资本集团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战略性目标，削弱了欧洲其他所有工业资本集团的发展潜力。只是由于割地、赔款、和战败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冲击，德国的恢复要稍微慢一些。到了 20 年代初，安定下来的德国缺少的只是一笔流动性资金。不论当时的法国资本集团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法国苦苦逼债，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占领鲁尔区的行为确实在短期内阻止了德国获得复兴资本。德国政府在暂时无力对抗法国占领与高额赔款的情况下，对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采取了放纵态度，任凭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 1：64 贬为 1：4,200,000,000,000，坐视汉堡工人建立苏维埃、希特勒领导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这样既规避了一部分以马克结算的赔款，又可以夸大法国的欧陆霸权以及中欧动荡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

结果，英美被法国人的霸权幻影和德国经济崩溃的可能后果所刺激，决定与德国联手抵制法国：一方面法国空耗占领费，却无法驱使消极抵抗的德国人开采资源；另一方面，

英国、美国抛售法郎和法国证券使法郎被动贬值 1/4。最终，法国屈服于英美联盟。听任德国复兴，同时接受英美对法国边界承担的安全保障。这导致了 1924 年的道威斯计划和后继的 1929 年杨格计划。这两个计划减少了德国的赔款总额，限制了每年的赔款总量，还以美国过剩的现金为德国提供了急需的贷款。自 1924 年到 1929 年，德国共支付赔款 110 亿金马克，但得到贷款（主要是美圆）250 亿金马克，德国以允许美国经济渗透的代价获得了急需的流动资金，经济开始复苏。在 1927 年德国工业达到了战前水平，1929 年已经达到 1913 年工业实力的 117%，是 1923 年经济谷底时工业产值的 2 倍，同期法国的 1.5 倍。德国经济再次压倒了法国、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贸易强国，但经济严重依赖于英、美资金，同时在军事上继续保持低调。欧洲大陆出现了令英、美两个海洋强国满意的均衡。特别要指出的是，未曾在大战中受损的德国重工业与新技术部门增长极快，1923～1928 年，硬煤产量增长 1.6 倍，生铁产量增长了 1.7 倍,钢产量增长 1.6 倍，发电能力和汽车产量增长约 6 倍，铝产量扩大了 31 倍。惊人的增长表明世界大战并没有伤到德国的根本。

英国之所以对法国的欧陆霸权忧心忡忡，是因为在 20 年代法国貌似高速复兴的同时，英国并没有走出大战的阴影。英国是战前的全球霸主，广阔的独占殖民地、资源、战略要地是世界列强而不仅仅是德国觊觎的对象。大战虽胜，但英国受到严重削弱，被迫与前盟友如美国、日本等新兴强国分享世界市场和海权。在“门户开放”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新贸易规则下，英国工业水平、尤其是新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极端依赖外贸的英国连恢复性增长都异常艰难。1925 年的英国工业产值才达到战前水平的 86%。另外，由于数百年未曾经历过社会革命，英国资本-军事集团的等级制度非常僵化。即便在世界大战导致大批上层社会精英死伤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开放社会等级，改革“精英”与平民分离的教育制度。这导致了英国统治阶层的能力和意志明显下降。在各国中产阶级崛起的大背景下，英国的基层文官、殖民地官员、商业经理和贵族军官不再是令其他国家衷心敬畏的一个群体。这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的远虑甚至胜于眼下经济停滞的近忧。

这种局面是 1870 年以来英国长期衰落在短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英国早在 19 世纪就失去了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1910 年前后又被德国超过。真正支撑其霸权的是广阔的殖民地、占世界全部跨国投资 43%的海外产业、以及世界贸易-金融网络以伦敦为中心的运行惯性。20 世纪英国资本集团的霸权基础是祖先的遗产而不是自身的工业实力。一旦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迫使各国消耗掉财富存量以求生存，半个世纪的工业相对衰落就会在短期内表现出来，衰落是一个自然而言的结果。即便世界大战晚几年爆发，甚至以另外的形势爆发，英国的衰落也是是注定的事情。

世界大战提供了市场空间。因此未全力参战的新兴工业国在 20 年代继续保持高增长。意大利和日本在 20 年代各自将工业实提升了一倍，只是基数实在太小，到 1929 年，日、意两国的工业实力大概都只有世界总量的 3%左右，不足法国的一半，英国或德国的 1/3。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工业经济增长发生在美国。

世界大战为美国工业提供了市场，同时直接打击了欧洲资本集团的工业，消耗了它们的积蓄。1913－1920 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跃升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日本意大利在内）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世界大战也打破了国际经济的运行惯性，让美国获得了与其经济实力更相称的政治、金融、贸易地位。比如美国已经能够公然提出“公海航行的

绝对自由”，对英国海权及贸易霸权提出质疑并加以实施。这使得 20 年代的美国获得了比大战前更有利的发展条件。虽然平民的购买力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的扩张，但在国际市场和投资需求支撑下，工业以 6%以上的速度稳定增长了 10 年，汽车、石油、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更是让德国的复兴相形失色。1919 年美国生产了 150 万辆汽车，1929 年猛增到将近 540 万辆，一个零头就接近英、法、德产量之和（51 万辆）。同期美国汽油产量从 8600 万桶增至 4.4 亿桶，约为 15 年后德国最高消费量的 5 倍有余(德国计入合成燃料)。在世界大战带来的震荡中，美国自 1865 年内战结束以来积蓄的实力展露无遗。

必须指出，虽然 20 年代是一个恢复与增长的“繁荣年代”，但对于欧洲老资格工业国来说，这个“繁荣年代”远不能和 1913 年以前或是 1950 年—1972 年相比。1929 年的世界工业产值只是 1922 年的 153%，这其中还要包括战乱地区的恢复性增长，以及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多半的美、日、苏等新兴工业国的高速增长，而且增长的质量远不能与战后相提并论。在 1924 年（道威斯计划、英国工党执政）——1929 年（大萧条）之间这个“真正的繁荣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实际失业率从来没有低于 10%——这个数据放在大战以前意味着经济危机，但此刻值得除法国以外的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一致羡慕。在北欧、东欧等地，我们甚至可以说繁荣从未回来过，动辄 20%的失业率使大部分工业人口始终生活在冻饿的恐惧之中。在日本、意大利两国，虽然工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本国的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对外又缺乏有价值的殖民地可供倾销。因此在工业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工人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甚至因为美国的竞争和国际市场的波动，工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呈大幅下降趋势（同时工业人口上升），这与英国一个世纪以前工业化初期的情况非常相似，工业经济的利益只属于少数人。只是在此前的世界大战、革命风潮以及此后的大萧条反衬之下，这段短暂的平静时期才显的令人向往。

通观 20 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或改善平民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只有美国。这倒并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独特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上，由于经济现状和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国际竞争能力一枝独秀，在整个 20 年代，主张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与东部大财团利益结合相对更紧密的共和党连续执政。税收，尤其是所得税一减再减，高度累退的消费税等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大资产阶级春风得意。 到 1929 年，美国国家财富的 3／5 由 2％的人所拥有；3.6 万个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总和，等于 1100 万个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总和。美国平民所得到的利益增量，终究是工业经济收益的一小部分。美国平民之所以能够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利益，既因为美国增长率的绝对值高、投资旺盛；也因为美国此时不仅是第一工业强国，在贸易体系中也已经攀上了世界顶峰，不需要象日本、意大利那样出口低级产品（如生丝）来换取机床、重武器等工业物资，反而能够大量出口并进行海外投资。1929 年大萧条前夕，美国的工业产能接近世界工业产值的 50%，远远超过了 1870 年正在鼎盛时期的英国（32%）；美国的黄金储备则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之和；在英国一向占优势的国际贸易方面，美国也以 14％的比例压倒了英国（13.2%），成为空前的世界强国。

每当一个社会结构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总会有人站出来宣扬“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幸运地进入了永久的黄金时代。这一次也不例外。尽管美国以外的世界处于动荡之中，但当柯立芝在 1925 年就任美国总统时，依然洋洋自得地说：“美国人民已经终于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1928 年，他又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我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我国经济

所储实力之雄，不但我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但现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我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我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从前面几章的论证中，作者可以知道，资本主义，至少是自由资本主义永远需要外部市场的支撑。除非资本主义对自身实施脱胎换骨的改革，否则仅靠“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肯定是无法保证繁荣的持久。至于“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早在 1914 年世界市场就已经饱和过一次。虽然世界大战制造了一定的新需求，德、奥、俄、土四大帝国的崩溃也让出了一定的扩张空间，但除了战争以外，资本主义尚没有学会用其他方式制造新购买力。因此过多的工业财富迟早还会引起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二十年休战”的诅咒在 20 年代看似危言耸听，但在能站在事外观察的后人看来，却是无可回避的命运。

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大战中赚得了一些利润，但很快就被复兴的工业国盘剥一空。以中国为例，1914 年以前中国沿海城市一直大量进口西方面粉消费，1915 年大战一起就转为出口，直至 1921 年，出口量均稳定于 200 万袋以上，荣（毅仁）氏家族即借此契机起家。到了 1922 年，欧洲战火熄灭、革命被镇压，面粉贸易额当年急转为入超 1100 万两（约合 500 万袋），1923 年入超增至 2000 多万两，到 20 年代中期，中国机制面粉市场再次被进口货及外资企业占据。同期，以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代表的民族资本纺织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萎缩的的过程。到了 20 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民族工商业再次沦为外国附庸，拉丁美洲已经基本被工业国垄断企业所控制，政府可以被大资本集团随意废立。这除了欧州列强复兴的原因外，日本、美国等新兴强国的经济扩张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新的市场空间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就无可阻挡的向另一个 1914 年走去。

最致命的问题还是出在发达国家内部。在 20 年代初的美、法、德、日、意等工业国或准工业国，农村人口依然能占到 50%左右的比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内燃机和电力机械的效率，在美国，农业机械化比例从 1920 年的 23%增加到 1930 年的 56%，被机械所替代的农业劳动力因此被迫转入城市寻求工作。在新增简单劳动力竞争下，尽管经济不断增长，工人工资却始终停滞，1929 年工人平均周工资反比 1921 年低了 1.27 美圆(当然，和日本、意大利一样，能从工业经济取得工资收入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平民的人均货币收入依然在上升)。按美国总人口平均计算，美国人的可自由支配年收入在 20 年代从 635 美元增至 693 美元，提高约 9％，但占总人口 1％的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却从 7492 美元增至 13114 美元，提高约 75％。很显然，富人不会因为发了财就吃掉 10 倍的食物，一般百姓才会因为工资增加而让全家人吃的更饱，或是把食谱中的面包换成肉、蛋、奶、蔬菜。城市平民的工资停滞限制了农产品的需求。1919 年时农场主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6％，而在 1929 年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8.8％。结果是农民和工人都无法为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增量，大批的剩余产品转入投资。以 20 年代美国经济的平均值计算，机器、卡车等生产资料的产量年增长率为 6.4％，而消费品产量的年增长率为 2.8%，相差 2.3 倍。投资短期内是剩余产品的出路，长期来看却制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

在投资以外，美国的过剩产品还需要国际市场。除了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国的倾销对象，欧洲本土也因为重建或本国企业无力竞争而购买了大量商品。从 1921 年到 1929 年，美国对外商品输出从 39.7 亿美元增加到 51.6 亿美元。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有 81％由美国制造。大批商品流入欧洲，利润流回美国。由于美国国土广阔，需要进口的资源不多，欧洲国家只有靠黄金储备和美国的贷款、投资来保持收支平衡。同时，在美国国内，急于卖出积压商品的制造商发明了分期付款的促销方式，允许消费者用未来的收入购买大件商品。在这个年代，欧洲的政府、企业家和还是美国的普通消费者一样，都把偿还欠款的希望寄托于未来收入的稳定和增长。一旦经济增长稍不如意，这些现金已被盘剥一空的组织或个人就会彻底丧失支付能力，同时拉上投资者或制造商一齐破产。他们是经济繁荣与危机的放大器。

另一个更有效的放大器是美国的证券市场。富人们占有了财富增量的绝大多数，那些远远超出他们奢侈消费能力的财富被投入证券市场以博取更多的利益。20 年代初，美国各种证券平均每年成交 3 亿股，1929 年即达到 11 亿股。从 1921 年到 1929 年，美国股票市值每年增加 1/3 强！道琼斯指数在 8 年内从 75 点增至 363 点！美国无线电公司在没有任何分红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在一年内涨了三倍！这不仅远远超出了消费品的增长，也完全脱离了工业产能的增长。惊人的经济泡沫在代表繁荣的同时也蕴涵了巨大的危机。到了 20 年代末，科技进步引发的设备更新基本结束，大战中损失的基础设施也补充完毕。工业经济的过剩问题开始显现。1929 年 6 月，美国工业经济的开工率降至到 80%，市面上还有 60 亿美圆的分期付款未曾支付，那些外汇紧张的国家也逐渐开始拖欠美圆债务。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却继续疯涨不止，通用电气、美国钢铁等生产资料企业的股票市值在 3 个月内就增长了 50%以上，支撑股价的资金有相当数量直接来自贷款………此时的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和 1914 年的欧洲政局一样，处于极端的不稳定状态。

关于大萧条的直接诱因，有人说是 28 年的木材价格下跌引发了最初的恶性跌价循环，有人说是加拿大谷物大丰收彻底打跨了农民的购买力，还有人归罪于英格兰银行调高利率或是美国银行未结成大集团。不过作者并不想弄清楚这个细节，列举这些说法只是想说明：如果大萧条是场火灾的话，那个已经堆满了汽油桶的世界上早晚会有人乱丢烟蒂。在一个工业品只有通过出卖才能变成社会财富的世界上，既然购买力永远追不上生产力的扩张，由投资者的乐观预期而产生的利润本来就是空中楼阁。一旦普遍的乐观气氛被任何偶然事件打断，事情就无法挽回。到了 1929 年，连工业国中受创最重的英国工业经济都达到了战前水平，下一次经济危机指日可待。

1929 年，美国这个经济中心的股票市场先是在 9 月份从高涨转为震荡，10 月 19 日开始下跌，然后在 24 日全线崩溃。当天光是知名的金融富翁就有 11 人自杀。10 月 28 日市值一天跌去 12%，此前的五天美国股票市值合计损失 22%，到了 11 月份，股票市值不足最高点的一半。300 多亿美圆，能买下全世界黄金储备 4 次、供全体美国人按平均生活水平吃用两年半、或是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部军费有余的帐面财富在一个月内灰飞烟灭。次年 4 月份，股票市场曾有短暂反弹，但紧接着又是六次暴跌。股票指数最终从 386 点跌至 41 点，除少数实业股外，大部分股票已形同废纸。股票市场的低落沉重打击了社会购买力，商品积压急剧上升，已买到商品的消费者无力继续付款，这使无数工商业企业以及农场主陷入缺乏现金的困境。但投资者要么破产，要么失去了投资信心，拒绝再向这些显然没有可预见利润的企业或农场投入现金。结果就是企业大批破产，把老板、经理和

工人的购买力一齐消灭，使危机更进一步。美国经济就如此简单而可怕的循环中崩溃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正式开幕。

从 1929 年 5 月到 1932 年 7 月，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55.6%，绝对规模仅与 1905 年相当，人口却多了 50%（1900 年美国人口 8000 万左右，1929 年 1.2 亿），实际经济水平退至 19 世纪。生产资料部门的损失还要高于平均率，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机床制造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煤炭业的开工率分别只有：13%、15%、5%和 60%。20 世纪以来新建的现代工业几乎消失。失业人口达到 1400 万~1700 万，占劳动人口的 1/4~1/3。能保住工作的人在无数失业者的竞争之下，也只能勉强维系温饱。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因回到农村谋生而未被计入失业人口，但他们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在一个农场必须靠工业物资来维系运转的年代，没有市场的农场主买不起汽油、种子、农业机械，雇不起汽车运走产品。农民如果此前已经还清贷款，取得了足够的个人土地，尚有做个自耕农的退路，否则立刻就要被银行赶出自己的农场，成为流浪汉。密西西比州 1/4 的农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强制拍卖。当然，在一个产品价格尚不能抵消运价的年代，很少有人会购买农场或破产企业，因此在股灾中幸免的银行免不了被坏帐所拖垮。1932 年，全国 1.8 万多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 60 亿美元，却要应付 410 亿美元的存款，惊恐的挤兑人群使银行的破产变的更加迅速。到 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时，美国已没有一家银行正常营业，甚至总统本人都很难在华盛顿兑现支票。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世界上最繁荣的工业化社会走到了解体边缘。

1929 年早已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人的购买力收缩不仅会让本国工厂倒闭，也会让欧洲的商品滞销。缺乏现金的美国投资者不仅会坐视本国亏损企业倒闭，还会从欧洲抽回资金自保。更不用说许多欧洲人本来就是美国股市的直接受害者。美国的危机因此迅速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就是苏联国界以外的整个地球。

德国 2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美国资金和市场。随着美国金融机构迅速回收贷款，德国经济最先跟随美国倒下。从 1929 年到 1932 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 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 40%，对外贸易额下降 60%，物价下跌 30%。和美国一样，德国重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 70%，造船业产值下跌 80%。。1931 年 7 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 23.9 亿马克减少到 13.6 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1932 年有超过 600 万工人失业，失业率高达 43.8%，加上半失业者 22.6%，则 1932 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

英国在整个 20 年代一直都没有摆脱世界大战的阴影，直到 1929 年才勉强赶上战前水平。这些工业产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旧殖民帝国提供市场，因此工业经济在大萧条中“仅仅”跌落了 24%。失业人数为 300 万。即便如此，英国的国际收支还是在 1931 年第一次出现 1.1 亿英镑的赤字。（已经计入海外投资收入 3 亿英镑，实际逆差 4.1 亿英镑）这个本土缺乏资源的岛国资本集团受到了破产的威胁。为保证英国能够熬过大萧条，英国政府在 1931 年 9 月放弃延续了 110 年的金本位，实施英镑贬值。

法国获得了相当数量德国赔款，战后的恢复与发展对美国资本依赖较少，也没有在德国大量投资。因此没有象英、德那样立刻被金融风暴吹到经济崩溃。但在世界市场整体萎缩的大环境下，法国也仅仅多撑了 1 年。1930 年秋，法国工业经济也出现连锁性下跌，金融界随之破产，2 年内工业经济缩减了 36%，倒退 20 年有余。只是由于小农经济尚未完

全解体，以百万计算的城市人口可以回到农村靠自然经济勉强过活，所以法国城市里“只”有 85 万全失业工人。小麦价格在危机期间下跌 50%以上，农民们能勉强吃饱，但除了吃饱以外换不到什么工业品。由于基础工业竞争力差，法国在整个 30 年代都没有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其他工业国在 32 年后都多少有一定的复苏，法国则一蹶不振，整个 30 年代工业水平都在 1913 年水平附近打转。大萧条以前，其工业产值占全球比例一度曾提高到 8%，经济危机一起即回落 1913 年前后的不足 5%。在恶劣的竞争条件下，法国在一战中的实际损失终于走上前台。

日本、意大利作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后发工业国。市场极端依赖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因此在 29 年大萧条中也受到严重冲击。从 1929 年到 1932 年，工业均平均下跌 1/3 强，与世界工业生产的平均损失相当。两国也各产生了数百万失业工人。这两个国家既缺乏市场也缺乏资源，更没有足够的积蓄可以缓解危机，因此最先被逼到了要用武力扩张来保证本国工业资本集团生存的地步。两次大战之间的休战期最先被这两个国家打破。

大萧条也同样没有放过第三世界。此时的第三世界经济已经被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三部分。残余的自然经济、市场化的农业、依附于工业国经济的商业与低级工业。自然经济部分受到地理和战乱的保护，虽然不断缩减却依然存在；市场化的农业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工业化农场的廉价商品粮竞争下，主要种植那些劳动力密集型、暂不能利用工业物资提高效率的经济作物，如咖啡、茶叶、黄麻、橡胶等；依附于工业国的工商业主要以进出口转运、轻工业品生产为主。这三个部分中，自然经济部分在危机中是被侵略的对象，中国东北于 1931 年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成了转嫁危机的牺牲品；英国在印度实行食盐专营，迫使一向驯服的国大党授权甘地领导独立运动。后两个部分则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如拉丁美洲出口缩减一半，失业工人达 600 万，引发了 1930 年巴西革命；中国逆差大幅上升，1932 年达到 8.6 亿元，为近代历史之冠，农民大批破产，半数农户负债，工农红军在农村得到了迅速扩张，连续粉碎围剿。为了缓解危机，各国资本也不断的在第三世界扩大投资，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营就在这种扩张中逐步形成。不过总的来说，工业国以外地区的平民受大萧条的影响远没有工业国那样深刻。

工业产能的扩张反而给人类带来了一个衰败的世界。在危机最严重的 1932 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量不足 1929 年的 2/3，三年间全人类的财富生产能力损失了 36%，平均每年 1/9！国际贸易则缩减到 1929 年的 37%。不算那些返回农村谋生的工人，全世界共有 3500 万或更多的全失业人口。这是蒙古征服、黑死病、17 世纪小冰期也从未达到的经济破坏力。当然，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化节奏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只是分别在四五年时间内使经济规模比战前高峰缩减了 1/10 和 1/5。大萧条未发一枪一弹，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相对损失已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按损失的财富比例计算，即便不考虑 1932 年以后经济的长期停滞，1929 年大萧条也是一万年以来最严重的单次经济灾难。在接下来的 30 年代里，只有那些实施或准备实施军事扩张的国家才可能摆脱经济危机，保证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他工业国始终徘徊在危机的边缘。

此外，必须指出两个事实：1 在大萧条爆发前夜，苏联已占有世界工业产值的 5%，并在整个三十年代里把这个比例提高到接近 20%。2 大萧条打击的是整个工业中最活跃，最现代化的部分。在现代工业全面停产的同时，许多人口被迫放弃现代工商农业，向自己的祖先学习，以自然经济来谋生。如果把这两个因素纳入考虑，大萧条在资本主义世界造成

的恐怖远不是一句“经济跌落 1/3”所能描述的。对于和作者一样生活于资本主义繁荣年代的读者，只有接近当时平民生活的细节，才能够真正体会大萧条的可怕与荒谬。

20 年代的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工业化社会。工人和职员已经习惯于每月获得稳定的薪水，然后去市场购买一切生活用品。除此之外，他无法想象靠什么来保证一家温饱。农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环境下，也失去了维系自然经济的能力。除了单纯种田以外，大部分农民不做任何事情。他需要用农产品换来的现金购买衣服、家具，支付税款、孩子的学费、还贷款，还要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油料………．最重要的，他还得靠商业网络卖出自己的产品。由于分工的彻底化，离开商业网络的农民或牧民甚至无法让家人吃到种类合适的食物。在工商业崩溃的情况下，美国平民发现自己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威廉·曼彻斯特曾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对这一阶段的平民生活做了生动描绘。

“…………1932 年 6 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 21974 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拚命找工作。那时连在纽约百贷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瞧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万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革，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 2 亿 5 千万元………美国人口进入一个逆增长时期，结婚率和生育率（生育率从 20 年代末的 20‰降低到 16.6‰）都十分低…………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自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可以御寒；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烂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九百英里，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三百人，有五千人来应征。华盛顿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二十九人饿死，另有一百一十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二十五名因失手伤亡。……(流浪女子) 为了活命，她们只能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 100 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 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

约市 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 82 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最富庶的美国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比大萧条本身更荒谬的是统治集团的应对方式。已经习惯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下意识的认为应当保卫自己的利润，把利润过多导致萧条的说法看做乱党马克思的邪说。他们降低工资、削减救济金、以私家军队向工会开火、还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减少企业的税收，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走出萧条或至少是保住自身的固定资产。他们所操纵的舆论也象 2000 年前后的中国媒体一样，一齐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角度鼓噪，如：“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亨利·福特）；“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幸福》月刊）；“人们总会换掉破旧的衣物，把积攒下来的钱花出去（《纽约时报》）”。自由主义者胡佛总统就是这一观点的总代表。胡佛曾有一个著名竞选口号“使每个工人家庭的菜锅里有一只嫩鸡,每间车库里有一辆汽车，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当为他设计这一口号的人已经因大萧条而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依然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法是各人自己想办法”。他在 1932 年否决国会的救济法案，指责这是“空前未有滥用国家巨款”的行为。1932 年，数万生活无着的一战退伍老兵来到首都和平示威，要求补发退役金，胡佛坚定地报以军队镇压，甚至铲除他们为自救而在难民营里种的蔬菜。事后胡佛自诩“………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欧洲各国也大致如此，英国德国的统治集团一齐削减失业救济金，降低工资，甚至向工人征收新税以保护企业利润，坚信这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举措可以让经济转入上升循环。很显然这只会使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面对这种局面，稍有眼光的人无不绝望。当有人问凯恩斯历史上是否有什么事情可以与大萧条比拟的时候，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指罗马帝国崩溃后地中海世界的衰退），前后共 400 年。”

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 1933 年，那一年罗斯福和希特勒取得了最高权力，并一起执政到 1945 年。他们以改良资本主义的方式对付大萧条，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在 1933 年前的地球上，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地方就是苏联。

十九 、苏联的工业化

20 世纪 20 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带领工人与士兵取得内战胜利时，他们发现自己接收了一个经济状况完全可以说是绝望的国家。正如大萧条所证实的：富庶的美国，在经济跌

落一半的情况下已是摇摇欲坠。而战前人均收入不足美国 1/8 的俄国，在经历 8 年战乱后工业产量不足战前的 1/10，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 40%。1921 年俄国大旱，刚刚结束战乱的国家没有任何救灾储备，高尔基出面，请求敌对世界提供粮食援助，挽救这个“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格林卡的国家”，苏维埃政府被迫掏空国库，拿最后的一笔黄金储备购买粮食而不是急需的工业物资。水兵和工人一向是新政权的最坚定支持者，此刻也开始以暴力表示他们的不满。整个国家已经站到了悬崖边缘——或许已经在往下掉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世界建设自己承诺的人间天堂以前，必须先解决本国的生存问题。

当时俄国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即在不改变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征集一切剩余资源并以指令进行分配。在时刻需要向关键点集中力量的战时状态结束后，取消这种制度是很自然的选择。从 1922 年到列宁逝世后的 1926 年，苏联实施的是“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控制银行、外贸、和重工业，其余经济部门自由发展，并乐于与外国资本合作。由于战前的俄国只有 1.75%的人口从事工业，这意味着苏联几乎恢复了旧沙俄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不同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 13 万贵族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 24 万忠诚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已更名为共产党）执政不久，成员大多经过战争考验与筛选，腐败与个人特权尚未蔓延，因此活力和效率远高于沙俄相当腐化的贵族群体，管理成本却低的多。在新的权力核心管理下，俄国工农业产量于 1927 年超越了战前最高水平。

然而，每年 40 美圆的人均收入和人间天堂的允诺相去甚远。简单的以红色官僚取代贵族的位置也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理想。更致命的现实是：这个国家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但它和沙俄一样，缺乏足够的工业物资来保卫自己。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继承沙俄的政策意味着继续接受工业化世界的半边缘地位，与发达工业国（尤其是德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不对这个国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等到红色官僚蜕化成新贵族，等到红军失去锐气，革命和共产主义就将成为南柯一梦，整个国家也可能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找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这条路不光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让自己迅速富强。

列宁逝于 1924 年，他没有也不必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后继者则无可回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能帮什么忙。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为例，提出的共产主义道路无非是：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以 20 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些方案要么过于迂阔，要么是细枝末节，还有一些已经被苏共所实行，剩下的都是有了足够物质力量以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至于如何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入侵？如何在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建设工业经济？如何把半边缘地区的革命推向世界？如何给正在迅速膨胀的人口提供吃穿………书上没有讲，也不必讲，因为从马克思到苏联成立，共产主义者一直都在等待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革命。在一国之内，尤其是在穷国之内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在考虑之列。但在 1926 年，这是逼到眼前的现实问题。

书上找不到答案，以往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也没什么用处。巴黎公社是一个只存活了几个月的城市政权，领导者甚至不懂得接管银行和组织正规军的意义。更近一点有 1919 年的匈牙利苏维埃，但它的寿命甚至还不如巴黎公社。苏共虽然年轻，却比这两个前驱成熟的多。作为第一个有机会考虑长期政策的共产主义团体，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历史而不是复制历史。列宁之后的苏共官僚因这个问题而分裂，或者说在在某种程度上，因权力之争而导致的分裂制造了不同的政见。具体的观点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意见以托洛茨基为代表。托洛茨基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主持了红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以“红军之父”著称。他也曾加入过孟什维克，1918 年主持新政权外交，几乎葬送了苏维埃的前途。20 年代的托洛茨基深受列宁器重，在列宁遗嘱中，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并列。1925 年时，托洛茨基仍执掌红军，并任政治局委员。

托洛茨基认为把党或苏维埃政权变成一个官僚机构是错误的。这既无助于经济发展，也会彻底毁灭革命成果。他从 1905 年和 1917 年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要依靠“纯粹的”无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作为一切的基础，以工人委员会取代庞大的官僚结构。这既是向共产主义转化的步骤，也被托洛茨基认为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因此他建议要对列宁、斯大林乃至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官僚制度进行革命，即继续革命论。继续革命论也同样适用于国际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在一国内建成，更不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建成，苏联这个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必须通过把革命引向全球来解决。总之，托洛茨基对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有两个：解散官僚机构和世界革命。

第二种是布哈林的重农主张。布哈林曾任《真理报》主编，在内战初期是一个激进派，坚决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与德国打到底。1925 年时仍主管《真理报》，是政治局委员，后来还一度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

布哈林认为应该继续发扬俄国的农业优势，给予农民（尤其是富农）优惠政策，鼓励他们种粮食，用剩余粮食去换取工业资源。认为苏联不应该急于成为一个工业国，更不该为此而迅速改造看起来很繁荣的农村。这一政策事实上是沙俄时期经济政策的改良，或是新经济政策的加强版。1913 年以前，俄罗斯六成的出口是粮食，一成是木材，即便在国内大灾荒时期，政府依然征收大量粮食出口，从而换来了维系政权所需的工业物资。布哈林和列宁一样，认定红色官员远胜于沙俄贵族集团，因此可以减少这一贸易方式的运行成本，更好的刺激农业、矿业生产，从而以这些产品的出口来繁荣国家。

第三种就是斯大林的工业建设计划。斯大林是共产党官僚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一个著名神学院的叛逆者。内战期间在多个军政部门担任过负责职务。1922 年斯大林在列宁推荐下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托洛茨基分掌军政。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党政机关的第一人。在 20 年代结束以前，斯大林将在党内的所有对手或潜在对手排挤出权力中心，并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直到 1953 年去世。

斯大林认为苏联除了迅速工业化以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主张集中一切资源发展重工业，迅速提升苏联的工业水平和规模。为了这一目标，短期内一切工业物资都应用于再投资，因此没有什么工业品可卖到农村或是出口。这意味着必须以行政手段而不是贸易手段征集粮食，用征集的粮食养活工业化人口，必要时还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工业产品。在党和政府内部，必须强化并扩大官僚机构、培养大量技术官僚以保证工业化的进行。另外，斯大林断定短期内苏联并没有将革命扩展到全世界的能力，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国内建设，把世界革命的理想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而不是解决眼下危机的手段。至于其他问题和工业化计划本身惹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等到工业规模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三种意见在苏共内部引起了严重争论，同时也搀杂着列宁去世后的权力之争。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确定某种意见的支持者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还是为了和对手表现的不一样而刻意提出反对意见。考虑到主要当事人既是冒死革命数十年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官僚机构残酷内斗的胜利者，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两者的混合。但不管怎样，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斯大林显然更了解如何在一个官僚机构内取得权力。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输掉了争论，还输掉了政治生命，最终托洛茨基被驱逐，然后被暗杀，布哈林被逮捕、枪决。争论的失败者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创立了第四国际，一个比苏联更长久的少数派共产主义组织。本书后面的部分还将谈到他，但在 20 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和他的强制工业化观点是完全的胜利者。

1927 年，即共产主义者夺取俄国政权后的 10 年。苏共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基本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可以着手实施他的建设政策，其核心就是工业五年计划。在此之前，苏联已经有一个负责经济计划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这个机构曾经对自身的任务下过间接定义："………只有市场才能对一切行动的正确性作自动的控制，市场才能作为表示每个部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企业单独活动的自动计数器………"。换句话说， 1927 年以前的计委不过是个经济的协调与修正部门。在斯大林手里，它变成了整个

经济体系的指挥者和监督者。只要计委一声令下，整个国家的物资、人力、资金、贵金属尽归其调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计划经济委员会尽可能的搜集了全国的统计资料，如人口、资源、技术人员、工业基础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计委为重工业、轻工业、军事工业、农业、贸易、金融、教育等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部门制定了详细规划。计划的核心部分，即由计委直接给出的文件即有三卷 1600 页。这 1600 页的文件为许多重点企业和机构设定了具体任务、划拨了所需的资金、物资、人力，也规定了使用方式。另外一些篇幅则为次要经济部门（地区）制定了指导性任务，即向这些部门分配总额已被限定的一批物资、人力，然后在要求它们在本部门（地区）内部自行制定详细的分配、使用方案，以按期达到计委要求的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整个官僚机构都被改组、扩编，1924 年苏联中央政府只有 10 个直属部，其中 6 个负责经济工作，到了 1936 年，18 个直属部中有 12 个负责经济工作，1947 年直属部多达 60 个，其中 50 个负责经济工作。这反映了计委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力。

物资平衡是计委的目标，但绝不是主要目标，因为物资的调拨和使用都是计委自身制订的，平衡仅仅意味着所有的物资都被分配——这绝不是什么难事。计委的真正目标在于按党的指示确定经济的目标，然后把除必要民生物资以外的所有资源都用于实现这一目标。对此，日后的苏联计划经济教科书做了总结："计划经济的第一条原则是突出重点，第二条是物资平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在 20-30 年代的苏联，计划经济的重点就是重工业。70%的工业产品被用于投资。自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到 1927 年，10 年间苏联总共只进行了 265 亿卢布的投资；而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约 4 年），苏联即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645 亿卢布（二五期间为 1334 卢布），其中 86%被投入与眼下的消费品生产无关的重工业。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钢铁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得到极大扩充；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从无到有的建立。1500 个大型工厂在没有直接消费需求的情况下拔地而起，并出现了一批世界级工程及企业，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第聂伯河水利枢纽等。在 1929 年-1938 年的 10 年间，苏联的工业产能占世界的比例从 5%（英国的一半，法国的 3/4） 变为 17.6%(英、法、意之和)，从一个残破的半工业国变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地看着苏联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脱胎换骨。当然，应该考虑到同期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大萧条的的动荡之中，这大大提升了苏联工业的相对地位。但即便看工业生产的绝对增长，20-30 年代的苏联经济也的确在爆炸性发展。同样是在 1929-1938 年，苏联每年的钢产量由 430 万吨增加为 1830 万吨，煤由 3550 万吨增加为 1.6 亿吨，石油由 1170 万吨增加为 3100 多万吨，发电量由 50 亿度增加为 483 亿度，机床、拖拉机、汽车等机械产品增产数十倍不等。在一五期间和二五期间，苏联宣称工业增长率分别为 20%和 17%！这是一个骇人的速度，意味着工业规模每隔四-五年就会翻一番，此前没有任何大国经历过类似的增长期。因此许多人认为苏联人在说谎，甚至一些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认为这些数字在宣传中被夸大，但随后的世界大战用最残酷的考验证实了了这些增长数据。直到解体，苏联一直保持着它 在 30 年代取得的世界第二大工业经济体的地位。

快速发展的工业不仅使苏联能够制造越来越多的钢铁和电力，社会也在经济发展中现代化。战前俄国的城市化比例为 18%，每千人只有 0.18 个医生，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 26%。到了 1940 年，虽然中间经历了内战、灾荒和大清洗，这些数据却分别变为 33%、

0.8、和 8.1%。人均预期寿命从 20 世纪初的 32 岁增至 1926 年的 44 岁再增加到 55 岁。教育事业作为工业建设的前提，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工业本身。识字率在 12 年间从 25%猛增至 87%。1913 年的俄国，只有 6.6%的居民接受过普通教育，20%的适龄儿童能入学，中等技术学校每年只有 7400 名毕业生，大学在校生合计 12 万人。到了 1938 年，苏联在废除所有神学院、贵族大学的情况下，儿童入学率接近 100%，每年有近 30 万人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大学在校生达 55 万。50%的劳动力已经脱离农业生产。30 年代的苏联不仅在经济结构上成为工业强国，也使自己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

必须指出，在工业高速扩张的同时，苏联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同步扩张，因为大部分工业产品被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或向农村换取农产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一直只把 30%左右的工业产能用于消费品生产，其余 70%用于投资或军备。在 1934 年以前，甚至军队的需求也必须为重工业投资让路。很显然，在工业产能每 4-5 年就翻一番的条件下，10 年后的 30%产能会显著高于 10 年前的 100%，但将农业国的一半人口工业化意味着更多的人抛弃了半自然经济，有了更多对工业化消费品的需求，因此消费品供应一直不足。更严重的问题是原来由统治阶层掌握的粮食剩余如今在革命中和土地一起分给了自耕农。共产党在掌握城市工业的同时也必须负担城市消费，但工业剩余都被用于投资，没有什么工业品可用于向农民交换粮食。因此斯大林决定以农业现代化为名实施农业集体化。毫无疑问，从长期来看，在可开垦地广阔的苏联实施集体机械化农业可以有效的提高粮食产量、节约农业劳动力。但在工业资源均被集中用于工业体系内部投资的 30 年代前期，集体化本身并不带来效率。在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的真正作用是将农民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通过高征购、压低收购价等手段，把剩余粮食收缴到苏维埃政权手中，用来供养工业化人口，甚至出口换取工业物资。这导致了农民的强烈抵制。农民们屠杀自己的牲畜，在集体农庄里消极怠工，勾结基层干部私藏粮食，甚至直接武力对抗政府。结果在政府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以前，畜力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在三年内下降了 19%。在粮食产量出乎意料地下降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还是得到了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工业化人口，代价是农民恢复到了 1913 年以前那种缺乏余粮抗灾的状态。1931 年以前连续的丰年掩盖了这个问题，当气候在 1932 年变得恶劣时，周期性的灾荒回来了，上百万的农民死去，城市粮食供应也变的紧张。直到 1934 年，苏联才停止了全面粮食配给政策。

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遇到了各种阻力，苏联共产党还是坚定地指挥苏联完成了 2 个五年计划，并在二战前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此时的苏联已然是一个工业国。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其他工业化居民点，所有的城市都有整洁的街道、干净的自来水、充足的食品供应、以及面向平民服务的公交与医疗设施。当然城市周围还有繁荣的工业，工业已在总产值中占 86%。另外一半农业人口能够得到大量的拖拉机、化肥和电力支援。到了 1937 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集体农庄或是国营农场，在大批工业物资的支持下，尽管农民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尽管苏联割让了大片农业地区，粮食产量还是比战前最好年份高出 10%，总产量接近 1 亿吨。同时苏联还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总产值比战前增加 34%。从贸易来看，40 年的苏联还要进口许多高技术产品，如航空汽油、精密轴承，但也只有美、英、德三强才够资格成为苏联寻求大宗技术产品的对象。苏联已经不再依靠进口设备来建设新工厂，反而能出口相当数量的工业品。在军事上，一直被世界各国政府敌视、受邻国觊觎的苏联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装甲兵、空军，伞兵、战略空军等兵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领先其他大国数年。从个人消费上来看，苏联还处于半工业化社会，但从

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苏联已经接近了发达工业国的人均水平，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则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距离那个相对经济规模不断下降、先后败于日本和德国、每年卫生教育部门合计只有 1.5 亿卢布经费的旧俄罗斯不过 20 年，从大规模工业化算起还不到 15 年，革命后出生的孩子此时还在读书或是充当实习生。以 20 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来衡量，苏联的崛起简直是一个奇迹。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有许多条件有利于苏联经济快速增长，自 1929 年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大萧条，苏联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购买设备和技术。中欧长时期没有强大的军备，使苏联相对能够节约许多军费。苏联 1920 年的工业生产只有 1913 年的 1/10，恢复性增长的速度一般说来总是很快。苏联没收了敌国——在 20 年代初的环境下意味着所有工业国的在俄投资，否认了外债——1913 年利息要占沙俄财政的 1/7。这都是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但从另一面看，不利因素也同样多，甚至许多积极因素本身也是两面的。比如说，大萧条固然降低了利用外国技术的成本，但同时也促使日本德国扩张军备；德国只有 10 万军队是好事，可苏联的敌人是全世界；苏联和英、法、美的的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代价是承认沙俄战债以外的大部分外债；没收敌国资产的结果是利用外资的成本增加。至于恢复性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 1927 年经济超过历史水平时已经消失。沙俄留下的基础设施有相当部分根本无法利用，以一直依赖进口的锅炉和内燃机为例，1921 年时一半以上已经报废。在革命和内战中，大批出身贵族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官僚出逃国外。至于那些本来就由外国投资管理的工厂，在革命前是俄国现代工业的主力，工人政权可以在设备未老化前勉强它们维系运转，但要想发展、升级，革命前实在没有多少遗产可以提供帮助。

在理想和初期的冲劲耗尽以前，苏共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官僚集团。他们在复行沙俄经济制度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还能够把腐败、特权约束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使自己和旧帝俄的沙皇有明确区别，甚至还能有意识的建立约束自身的制度，如监察委员会。从成绩来看，这个官僚集团以很低的管理成本把经济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之上，同时还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足以在不接受工业国物资援助的同时保卫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历史上类似的新兴官僚集团还有很多，如中国西汉中期后的儒家官僚、唐朝初期以后的庶族官僚、奥斯曼帝国的奴官近卫军官僚等。这些新兴官僚集团固然强大，也不乏信仰和理想，但肯定没有过在一代人内改造国家、将一个衰败中的帝国提升为世界第二强国（旧大陆首强）的先例。事实上，苏共作为一个党员数量迅速膨胀，与官僚机构密不可分的党，党员质量下降很快，在 30 年代也犯了许多错误。苏共的组织结构甚至马克思的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联迅速崛起的直接原因。

苏联崛起的核心在于工业经济的迅速膨胀。有了足够的重工业支持，以步兵骑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迅速机械化，消极抵制的农民能生产出远超出战前最好年份的粮食，落后的轻工业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提供足够的民生物资，甚至连不断自我清洗的官僚化共产党也可以因为足够的重工业物资而越来越稳固。这和本书前面的论证是一致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轻工业和服务业本身不具备扩大负熵来源的能力，只能在本部门内提高负熵利用效率——这一效率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负熵流规模所严格限定。农业虽然能扩大负熵来源，但要受到耕地供应的限制。

因此从长期来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极限。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部门利用负熵的效率再低，只要输入的负熵持续增长，产出的增长率早晚会跟上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本书前面也做了总结："……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作者看来，解释苏联的经济奇迹其实可以归结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苏联重工业为什么能取得前所未有的长期高速增长？

自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重工业的增长（当然包括附属而不可缺少的科研、教育机构）就只可能来自重工业自身的扩张。即用既有的机床、原料（主要是金属）、能源（如煤炭石油）、人力去制造更多的机床、收集更多的能源、开采提炼更多的原料、培养更多的人力。从纯粹的物质和负熵流向来看，重工业生产的物资要分三部分，一部分被轻工业、农业、建筑业、军事等部门所消耗；一部分用于补充重工业自身的消耗，其余部分用于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其中用于重工业部门内部投资的部分越大，重工业增长就越快。如果把除自身消耗外的所有或大部分重工业合理地用于重工业自身投资，那么重工业部门的增长就可以达到或接近既有条件下的极限速度。长期经济增长也就随之接近增长极限。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这一极限取决于许多方面：比如建筑的建造周期——再多的钢材、水泥也必须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变成生产钢材、水泥的新厂房；能源的利用效率——开采煤炭本身所耗费的既有煤炭越少，投资的效果就越大；人力的培养周期——用既有的优质人力当老师，把简单劳动力培养成工程师、技术工人、熟练工的速度越快，工业扩张也就越便利。广义的重工业部门是一个包含加工、开采、教育、科研、管理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性体系，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如技术工人的熟练可以弥补机床精度的不足，工程师培养体系的强大可以弥补技术工人传带制度的不足，煤炭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石油等等，反之亦然。但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而且代价巨大。二战时德国具有过剩的煤炭资源，因此试图以煤炭液化来代替石油，但油料不足始终是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瓶颈。90 年代的朝鲜缺乏频率、电压稳定的电力供应，被迫以高级技工的经验弥补机床加工精度的缺陷，但设备维护水平还是步步下跌。因此，重工业的发展极限速度取决于各必备部分中发展最弱的环节。

不过，通过前面对历史的阐述，读者应该能发现：在苏联建立以前，重工业，或者说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极限却不在工业经济之内。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率先与现代工业经济结合的的社会制度是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扩张才能生存，而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必须通过由购买力形成的利润来实现。前面曾对这一过程做了具体描述："……19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读者可以自行回顾一下这段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重工业的增长受制于两点：购买力的增长，市场需求增量与重工业增长之间的反馈效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市场并没有绝对的饱和，这是本文的一个结论。但世界市场不饱和并不等于整个世界都乐意接纳工业国的商品和投资，这只是意味着还有许多由本土手工业品占据的市场可以开发。如果现代工业品可以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和那些手工业品进行长期竞争，那么工业国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但事实上，即便清帝国无法抵抗英帝国的战列舰，中国的平民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鸦片以外的英国货；虽然布尔游击队

和祖鲁兵团最终败给了英国，但南非还是争得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甚至连海地这样的黑人奴隶聚集地都敢于利用大国矛盾挑战法国正规军。廉价的工业品必须克服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壁垒才可能获得利润，只是与后来正面对抗其他工业国相比，资本家和农业世界的残余力量作战才显得轻松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每一次大幅扩张都伴随着战争或是阴谋。资本家必须先联合起来打开市场，然后才可以把资本投入正常的经济投资，违反这个投资顺序会导致严重的损失乃至破产。因此大部分投资被用于轻工业的改造，以使自己的产品尽量符合各农业国的消费风格；或是以税收、战争公债等方式集中到政府，然后用于战争、政治等方面。以1840年为例，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英国有独一无二的现代工业，双方实际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英国国内税率约为16%，另有占经济总量8%的战争公债，两者相加足有24%，明显压倒了实际税率约5%的远东农业帝国。大量投资被类似鸦片战争的市场开拓计划所消耗，自然减少了工业自身的投资。当然，部分军事订货可以越过轻工业的层次直接刺激重工业，但半工业化的军队并没有20世纪军队那么大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军事需求本身也非常不稳定，难以支持重工业快速发展。等到19世纪末期军队（尤其是海军）完全工业化，开拓市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营者甚至会把工商业企业当作封建地产来经营，赚得的利润用于奢侈消费而不是再投资。在一个工业经济的扩张依赖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市场空间限制了工业增长速度。

第二个问题是重工业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在工业化前期，除了少数物资如煤炭、染料外，大部分重工业物资都必须通过轻工业、农业、服务业才能转化为一般消费品。与轻工业需要在市场开拓的刺激下被动发展相类似，重工业的扩张与提升基本依赖于轻工业和农业的需求。在工业企业尚未庞大到融合上下游产业成为托拉斯、康采恩之前，各个独立企业很难产生对重工业投资的主动意愿。即便有重工业投资，大部分也着重于重工业的扩张而不是升级。许多重工业部门的控制者尚未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提供更新、更好的重工业物资来提升轻工业品的质量、降低轻工业品的价格，从而主动地扩张市场。这种因为自由资本主义而生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垄断化，垄断企业国家化逐步减轻。

另外，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的三个显著特征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三个显著特征分别是：整体化、中间产品标准化、关键技术的出现。其中“整体化”和“中间产品标准化”两个特征决定了重工业投资不可能象轻工业、农业投资那样迅速产生回报。因为轻工业和农业在单独一个企业、一个农场的规模下即可运行，与其他企业竞争。而重工业必须成体系运行才有意义。这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既制约了既有工业国的资本家向重工业（包括科研）投资，也压制了后发国家的重工业发展。从19世纪的趋势看。在已经成为工业国的国家里，垄断化和国家干预会带来长期的重工业高速增长。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这一趋势的延续。

在这两个条件限制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来没达到或接近过自然条件、技术发展速度所决定的重工业部门发展速度理论上限，即便是增长最快的日本、美国也不例外。其中市场空间的绝对限制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从消费品利润到重工业增长的反馈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弱点。资本主义世界的投资比例远低于后来的苏联，而投资的大多数则给了直接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这倒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关注眼下的民生，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基本都要在资本主义以外消费，而本国消

费的大头又被资产阶级自身占有，还有许多剩余物资消耗于军事和政治斗争，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本国消费总额并无必然联系。这种工业增长方式足以压倒官僚或贵族的稳定地产收益，但显然不是大工业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

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这两个问题相对应，苏联制度的真正长处在于两点：不需要外部市场和国家管制，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苏联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国家，尽管掌权的官僚未必都有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肯定不会为多出来的消费品发愁。在一个实施公有制的国家，公民拥有的是整个国家，不象一般的选举制国家那样只拥有政府财产，因此所有经济部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公民消费（包括军事开支这种公共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因此，哪怕重工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扩张再快，苏联人也不会因为购买力不足而担心。对于剩余产品，即便是战时共产主义式的配给制，也肯定要比倒进大海更有效率，何况苏联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工资-市场体制。基于这个根本性差别，与总是存在过剩商品和买方市场的资本主义相比，苏联一直是“短缺经济”。苏联计委可以放下购买力问题，从资源、人力、物力等纯粹的工程角度去规划经济增长。

完全的公有制迫使苏联官僚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具体负责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的官僚并没有管理所属物资、人力的全权，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管理的资源完成上级指令，没有多少独立决策的选择。即便从纯粹的自利角度去考虑，他也应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提升来扩大权力，而不是尽量增殖自己控制的资源。到了中央计委这一级，他们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指标，而不是具体某个部门的现金流。他们不需要等长期经济指标变化后再追加配套生产能力。因为经济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指令。

计划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突出重工业，但在实际操作上，苏联没有不重视重工业的选择。从 1920 年到 1940 年不过 20 年，作为一个曾被全世界围攻的政权。在战后的最初 20 年把军事工业的前提——重工业提到第一位毫不奇怪。何况 3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英、德、日三大工业国都是苏联潜在的敌人。日苏还屡屡在远东大打出手。在这样一个重工业薄弱、边境漫长、强敌环伺的国家实施计划经济，突出重工业是很自然的选择。

就这样，一个不需要担心购买力、国家全盘考虑所有产业，且有意识地提高重工业地位的大国在地球上出现了。以 21 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非常粗糙，极端缺乏合格的技术官僚，经常因为官僚内部争斗而作出可笑的决策，在军备上投入了过量（以二战前的标准而言）的资源。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尚未过气、其他国家忙于用销毁产品的方式解决萧条的 20 世纪前期。这样一个错误百出的国家规避了最荒谬的错误——只在能获得以通货结算的利润时，才进行投资。结果，苏联计委在搜集一切剩余资源的同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考虑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极限，让工程师、农艺师来决定经济发展，而不是把规划交给市场。再加上革命带来的理想主义和苏联丰富的资源，苏联重工业能够以它本应有的速度扩张，然后逐渐拉动其他经济部门赶上它的发展速度，这就是苏联崛起的关键。苏联的相对高速增长不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什么奇迹，而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被自身的体制所限制，无法在二战前的和平时期使经发展济达到“正常”速度。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荒谬性。

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在二战后的前 20 年保持了这种势头。其他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者纷纷效仿这种体制。因此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政策被当成了共产主义

者乃至泛左翼的标签，甚至许多人把它们当成了共产主义本身。但在 1930 年前后看这个世界，应该注意到侧重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不是苏联的首创，它们本身只是共产主义者的工具而不是目标。考虑到随后几十年整个世界苏式计划经济的历史，作者甚至怀疑苏联党政官僚（包括斯大林本人）是否清晰地意识到了重工业的特殊经济地位，是否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定为扩大负熵流、提高负熵流的利用效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固然强调第一部类（即广义的重工业）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第二部类（农业、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但并没有定性地给出期间的关系，而且反复强调各部门的平衡重于突出重点。从斯大林 1946 年，即实施计划经济 20 年之后的讲话来看："……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 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 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 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在苏联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原因中，危急的军事形势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论原因是什么，1927 年以后苏联的经济政策确实迅速提高了流入苏联经济体系的负熵流，和苏联工业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这一过程损耗巨大，但从上面的分析看，它所损耗的财富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根本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因此，付出巨大代价的苏联在短时间内使自己成为无人能侮的工业强国，也使染上 30 年代苏联色彩的共产主义制度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这给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动荡。

二十 、从萧条到备战

无论它许诺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在 20 年代初期，共产主义革命还只是一场值得关注的社会实验。或许它可以给俄国人带来面包、土地与和平，但短期内也仅限于此，一旦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工业国的发展前景看上去还是要比创痍满目的苏联要好的多。与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设想不同，共产主义革命率先爆发于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其余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恢复性的经济增长，勉强安抚了国民。因此革命未能象早期共产主义者预计的那样，立刻自发扩展到整个工业化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之间，苏联共产主义者只在农业国找到了一些弱小而不可靠的盟友，如中国国民党政权、土耳其凯末尔政权。欧美各国中，只有工业经济差劲（直到二战开始，钢产量都少于比利时）却有大批无产阶级的意大利，以及靠近苏联且与其有宿怨的德国、波兰、芬兰等国能直接感受到共产主义对旧秩序的一定威胁。事实上，在整个 20 年代，苏联和它的邻国一样担心被入侵，只是那些邻国统治集团担心的是红军，苏联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直到 30 年代这个特定时期，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总崩溃的同时，苏联实现了高速工业化，并建设了一个粗糙的福利国家。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此消彼长，苏联制度的优越性才开始被世界认真看待。

1929 年大萧条与以往大危机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史无前例的规模与破坏力。在以往的危机中，统治集团只会为自己的利润和底层民众的暴动而担忧，同时对症下药，以扩张（军事或经济）来解决危机。苏联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无产者的暴动可以升华为目标明确的革命，另一方面也将世界 1/6 的土地变成无人敢轻言入侵的国土。（另外的 5/6 世界已经被列强分割殆尽）在这一时期，虽然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直接出兵促成世界革命的打算，虽然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优势也在迅速流失。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苏式共产主义的成功依然从内部严重威胁了各工业国的旧秩序。在资本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第三世界，苏联的少许支援就可以发动起巨大的民众力量，不可忽视地削弱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这样的局面无疑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同时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变革的竞争压力。

对于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板；资本主义则从一个可以忍受并指望改良的制度滑向地狱。于是，绝望的无产阶级试图逃离或摧毁这个因财富“过剩”而让国民饥寒交迫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转向左翼，参与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去，打算把对旧秩序的反抗变为一场革命。在美国这个最富庶，最缺乏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也逼到了统治集团的眼前。成千上万的工人到苏联驻美外交和商务机构要求移民，纽约的一家苏联贸易公司每天收到数百份移居申请书，一个招募 6 千技工到苏联工作的广告会引来 10 万报名者。缺乏技术工人的苏联的确乐于接受被美国经济抛弃的 “过剩”劳动力。但在这个阶段，苏联也没有太多的消费品和粮食供养城市人口，因此最终只有十万左右的美国人打算移民且得到了许可，更多的的美国工人必须在国内想办法谋生。很自然的，他们会试图在国内建立一个苏联式的社会。

还是威廉-曼彻斯特写到：“. . . . . 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三万五千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新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禽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四千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五千人占据了十层搂的市政府大厦，五千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四十二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 . . . 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 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 的俄国佬. . . . . . . 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 . . . . 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 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 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 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 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 . . . ”。

无产阶级的觉醒加上统治集团的混乱，自从 1917 年以来，谁都知道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

除了德国外，欧洲的生产过剩危机比美国略为和缓，但危机前残破的欧洲经济水平已远逊于美国，绝对的经济困难并不更轻。在中西欧地区这个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左翼力量也在大萧条中大大扩展了影响。在英国，工党于 1929 年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工党内阁。（1924 年曾在自由党支持下作为少数党组阁，执政数月即倒台）。1932 年，法国左翼组阁，社会党第一次直接参与执政，更激进的法国共产党在 1933 年获得了 150 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遭受过清洗和屠杀，并一直受到合法或非法的排挤，到了 1928 年还是保有 330 万张选票，并在大萧条开始后的 1930 年又取得另外 130 万张选票。考虑到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面对大萧条时表现的无能和顽固，一时间，欧洲资本主义似乎要会走上恩格斯曾设想过的一种“和平过渡”道路，即不需要通过革命战争，直接通过议会民主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地处远东，远离欧洲革命中心的日本社会也开始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指出：“在日本、意大利两国，虽然工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本国的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对外又缺乏有价值的殖民地可供倾销。因此在工业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工人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甚至因为美国的竞争和国际市场的波动，工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呈大幅下降趋势”。由于工业整体水平依然低于欧洲，随着欧洲老牌列强的产品重返东方市场，日本工业在大战之后也经历了市场大幅下跌的打击。1922 年，干涉军退出西伯利亚，日本没有从苏联夺得土地，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却带回了共产主义思想。日本共产党即于 1922 年成立。

整个 20 年代，日本的贸易逆差共计 33 亿日元，再加上 1923 年关东大地震损失的 100 亿日元，日本被迫和德国一样，靠举债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工业升级。1923 年－1927 年，日本向英美举债 9.1 亿美元，平民生活日趋艰难，共产主义影响越来越大。到了 1927 年，日本共产党居然敢于公开宣布要废除天皇制，对旧制度发起了全面挑战。日本统治集团被迫以暴力解散共产党。大萧条开始后，日本出口再次猛跌 3/4。1918 年出口萎缩导致 1000 万人（总人口的 1/4）参加“米骚动”的记忆犹在眼前，日本统治集团因经济困难而寝食难安。虽然在《治安维持法》等严苛法令限制下，共产党一次次被解散，左翼力量暂时还未能和不满的民众结合。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不能摆脱大萧条，和 1917 年的俄国同样处于半工业化社会的日本就只能坐视革命来消灭旧秩序。

在沙皇俄国的前车之鉴下，欧美及日本的统治集团并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王侯将相那样麻木不仁、坐视末日到来。各国政府或是有意识的做为，或是无奈的应对，一批政治、经济应对措施先后出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重建金融秩序。

经济危机固然是生产过剩的必然结果，但也同时引发了极大的经济恐慌。在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命脉之后，一方面金融界可以帮助资本主义体系应付暂时性的过剩，延长繁荣周期；另一方面也会在危机真正到来时助长危机的发展，加深危机的谷底。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等危机结束，但 1929 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必须在革命到来之前尽快解决危机。所以稳定金融业，重建投资信心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萧条之后最紧迫的任务。

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先是承认金融业崩溃的现实，在执政第三天暂时关闭了所有银行进行审查。审查淘汰了 40%的银行，其余 60％被立刻允许开业，在随后 2 年内得到了 10 亿美元的国家援助。然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成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对平民存款进行全额保险，从而使平民手中的现金重新回到金融系统。同时，美国禁止黄金出口，宣布私人拥有黄金为非法，一切黄金债权人必须接受纸币偿债，从而放弃了限制通货的金本位制；新发行的美元贬值 40％，改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既促进了出口，也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现金。

在这一系列措施背后，美国政府有历年巨大的贸易顺差、数百亿美元的战争盈余和世界一半的黄金储量做后盾。除天然橡胶外，基本工业原料在美国本土均有足够出产，所以美国不需要为货币贬值付出通货膨胀失控、丧失货币信用的代价。只要愿意放弃部分不良资产，果断直接干预经济，恢复一定的经济信心并非难事。正如罗斯福所说：“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政府执政一个月后，流入银行的储蓄已经超过存款。再加上罗斯福以中央财政收购大批农业物资销毁，以农业限产补贴配合 1934 年旱灾打击农业生产力。美国经济终于离开了通货紧缩的谷底。

30 年代的德国远没有如此宽松的周转余地。魏玛政府的信用和外汇早已因为连年赔款和经济衰退丧失殆尽，货币贬值对于刚经历过世界上最剧烈通货膨胀的德国经济没有任何刺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治集团无力自行收拾局面，只能求助于美国。在此之前的战后大规模资本输出中，美国已经在德国拥有大量投资，包括克虏伯在内的德国重工业均被美国资本控股、参股。希望能保障投资收益的美国统治集团也计划进一步向德国投资。不过，在革命的风雨中，他们需要挑选一位可靠的铁腕代理人，替他们看好自己的钱。

1932 年，由美国资本组织的德国大企业联合向兴登堡政府施压，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随后美德大资本为希特勒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应付竞选经费和纳粹党的开支。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在 1933 年 8 月和美国银行协会达成延期还款的协议，并要求美国资本的利润暂时不汇出，在德国扩大投资。在这之前的 1931 年，美国为保护自己的战争债权和投资，已宣布容许德国暂时停付赔款；1932 年的洛桑会议又将德国的赔款数减为固定的 30 亿马克，3 年内暂不支付。（最终德国也未偿付）德国终于在美国贷款和停付赔款的政策共同支持下勉强达到了收支平衡，重建了政府信用，进而得到了在大萧条后重新组织工业经济的机会。美国资本通过这一过程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当时的德国统治集团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或许可以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来调侃自己的境地：“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问题爆发之前）”。但希特勒做为德国大资本的管家，思路必须比别人更“长期”一些。数年后他决定：与其在被吞并和破产之间做选择，倒不如在这发生之前发动战争。

在美国和德国整顿金融之前，长期停滞的英国已经未雨绸缪，于 1931 年放弃金本位，英镑大幅贬值，从而促进了出口。再加上后面将要谈到的贸易保护和加强殖民地控制，英国并没有遇到明显金融崩溃。与之相对照的法国由于进入大萧条较晚，且政局不稳，所以直到 1936 年才由政府实施货币贬值等政策。其代价就是整个 30 年代都没有摆脱萧条，重新被德国压制。至于剩下的两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日本和意大利，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惯于以政府指导经济部门，金融业自不例外。但对于这两个资源贫乏，甚至不能粮食自给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军事扩张，然后才可能考虑其他问题。

金融崩溃只是经济危机最外层的表现。经济问题的本质在于由少数人占据大部分财富增量的分配制度，这样的经济体制无法在内部创造出足够需求。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外部获得购买力这一老套路外，只有靠国家以暴力来修正经济秩序，制造购买力以维系生产－消费－投资的循环。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国家组织投资，实施以往各自为政的企业难以实施的建设项目，以投资消耗过剩产品，可以解决短期过剩问题；二是为资本制定纪律，强迫资本出让部分利润给消费倾向较高的底层，缓解中长期矛盾。在 30 年代，德国、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因此受大萧条的打击最重；两国又同样缺乏牢固控制的专属殖民地可供转嫁矛盾，都必须首先在内部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内部制度调整幅度较大，不约而同地对上述方案全盘采纳，缺乏资本积累的德国尤其为甚。至少在 30 年代，这两个国家主要通过内部改造缓解了矛盾。在分析二战前后的资本主义变化趋势时，本书即以此两国为内部制度改良的典型。

以公共工程署、民用工程署为主导，美国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前后向公共工程投入 200 多亿美元，计划雇佣 1400 万失业者中的 500 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实际雇佣人数随新政的实施阶段而变动，但在二战前始终保持在 200 万－300 万之间。同时，还有主要针对青年低技术劳动力的青年劳动总署、民间资源保护队，针对农业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机构，各自雇佣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劳动力。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前期，平均每年有接近 400 万人靠政府提供的工作糊口，总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军队。在成百亿投资的驱动下，数百万廉价劳工作出了惊人的成就，除了胡佛水坝和田纳西流域水利工程外，他们的成就还包括 850 座飞机场、12.5 万座公共建筑、8000 座公园、100 万公里的公路、7.7 万座桥梁和大批水库，并在美国农村普及了电力网。

与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相比，直接发放赈济更不容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联邦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会发放少量的赈济款，其中 95％发放给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个人慈善基金来实施赈济；1916 年，亚利桑那州的老年人援助法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1933 年 3 月 21 日，罗斯福要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首期要求 5 亿美元。反对议员宣布："这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 但在大萧条的动荡中，因为赈济能够最直接地促进需求、平息骚动，所以成为最先实施的一批新政项目。联邦紧急救济署最终在 1933 年 3 月末得以成立，共得到了 30 余亿美元的拨款.

无论从过程还是效果来看，政府投资和赈济都是不可区分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工程投资被用于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雇人在华盛顿用气球驱赶椋鸟，或是补贴在拉什莫尔山上雕刻总统头像的雕刻师；另一方面赈济计划也倾向于积极救助政策，如组织生产自助公社、以工代赈等。在一向奉行放任主义和平衡财政的美国，这些建设项目明显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教育和文化水平，提升了水利和能源行业的潜力，建立了初步的环保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对于 1916 年就拥有 40 万公里铁路的美国（2008 年中国铁路里程不足 8 万公里）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积极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效果是安抚了贫民，创造了有效需求。先后共有数千万贫民因赈济而得益，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而政府投资的工程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项目投资大部分转化为底层无产阶级的工资。无论是赈济款还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工资都远低于萧条前的底层工人工资，但至少足以让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养家糊口。同时，低工资意味着消费倾向接近 100％，200 亿的投资和赈济等于向美国市场注入了同等数量的需求。在危机前的 1929 年，美国个人总投资额是 158 亿美元，1932 年只有 9 亿美元，1937 年才回升

到 114 亿美元。在新政的最初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赈济为美国创造了宝贵的内部需求，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短期需求问题得以缓解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修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最容易的一步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由利益刺激而产生的个人积极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样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端而遭到抨击。只是眼下的社会解体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更严重，参众两院都以 90％以上的支持率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向全国的雇主和雇员征收工薪税、养老保险税等税种，然后向已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州返还工薪税款，并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在联邦政府压力下，48 个州在 2 年内均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持续到 21 世纪，成为大萧条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同时也需要持续地投入政府补助。因此力求平衡财政的罗斯福在社会保险制度制订的同时也实施了加税政策。与以往的税收政策不同，这一次他专门向富有阶层开刀，推出了严厉的累进税法。继前 2 年的温和增税之后，1935 年 8 月，新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上限分别从 59%、60%增至 75%、70%；企业所得税原为统一的 13.75%，现在依据利润是否超过 5 万美元而分别为 12.5%、15%。1936 年税法甚至进一步向企业未分配利润收税，强迫企业分红从而增加股东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源，美国政府不得不对鼓励无限制追求利润的旧政策作出修正，转而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更稳定的逐利方式。

1933 年 6 月，《工业复兴法》在议会通过。罗斯福表示："通过消除那些不仅折磨了正当的工商业、而且导致了劳工的不幸的海盗式的方式和措施，来保证工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劳工得到合理的生活工资………….. 历史也许会把这部法律作为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记录在案" 通过这部法律，罗斯福政府直接干预了企业的经营及利益分配。在苏维埃政权沉默的压力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实施了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自身修正。《工业复兴法》要求主要行业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规定产量、价格、劳动时间。这虽然不能改变生产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但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及时而造成的部分生产过剩，避免因企业之间互相转嫁危机而加深总体危机的问题。同时，《工业复兴法》还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限制，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卡特尔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扩张，美国经济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企业集中。在科研和内部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大工业时代，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外部竞争力。

无论卡特尔或托拉斯合并了多少企业，内部有多少争斗。在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这一点上，垄断企业的经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放纵这种倾向意味着重新走向大萧条。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另一部分内容要求企业界接受政府管制，向不满的无产阶级让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认工会拥有代表工人和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1918 年最高法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违宪的裁决也被推翻；童工被禁止。各同业公会被赋予协调资方与工会谈判的责任，以确定各行业萧条时代的工资政策。

由国家直接出面，支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利益，这是苏联之外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企业界对此报以激烈批评和消极抵制，法案订立一个多月后，仅有纺织行业达成了劳资妥协。为迅速解决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劳资双方威逼利诱。对达成妥协的卡特尔，政府给予补贴或在定价权上进行让步；对于拒绝让步的资方，则威胁将坐视企业独自

承受工人的暴动；如果工人试图在组织工会基础上提出更高政治要求，默认资本家的私兵可以血腥镇压。同时，罗斯福还发动了以舆论压力、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蓝鹰行动”，以个人名义向所有企业发出要约，即一份约定了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拒绝童工的协议，在各行业达成劳资妥协前，各企业可以此协议做为劳资妥协点。罗斯福本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如果资方愿意接受这份协议，则可以获得蓝鹰标志。政府订货将只和具有蓝鹰标志的企业谈判，并号召整个社会抵制无标志的企业。此举大获民心，几乎全部平民都加入了经济抵制运动，还以集会、示威、怠工、破坏等方式对未签约企业施压、泄愤。在 2 个月内，有 200 万雇主获取了蓝鹰标志，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由于蓝鹰标志确立了公认的谈判基点，并赋予这一基点以道德标尺的地位，大部分行业都在几个月内达成了劳资妥协。但在矛盾最尖锐的煤炭行业，资方拥有强大的准军事部队，工人则已经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甚至还有民兵组织。过去的几十年双方流血冲突不断，都很乐意用武力消灭对方。资本家因此担心一旦让工会合法化、拥有集体谈判的能力，煤矿将无利可图。因此继续拖延劳资妥协谈判，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煤矿罢工和血腥的镇压，急于解决社会危机的罗斯福愤怒的指责煤矿主不识大体，破坏大局——“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资方在 24 小时内让步。到 9 月 18 日，全部主要行业都达成了妥协协议。随后的 2 年内， 几百万人因此得到了工作，更多的人因此增加了工资。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增产 1/4 且没有使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工业复兴法》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之间存在尖锐冲突，资本家和文化界都需要时间来更新思路。在这之前，一旦整体崩溃的危机得到缓和，整体性的改良方案对旧的统治集团来说就太扎眼了。1935 年 5 月，《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前后只存在了 2 年。但它依然是一部有标志了历史转折点的法律。禁止童工、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合法工会、集体合同、行业管制等重要改良在此前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人提出。但得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统治集团立法认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在半个地球外的胜利，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福利，而且具有永久性的效果。1933 年之后，阶级妥协对美国的经济秩序来说已经是必需品，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废止并非意味着政策的转向。一批替代性法案，如《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迅速出台，主要行业的垄断化、大型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等进程也一直被保持到二战开场。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至少制止了持续衰退。保证了美国经济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解体。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由美国资本支持的希特勒采取了和罗斯福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投资来促进就业，规范统治秩序以减少过剩，促进大资本联合以减少内耗、增加对外竞争力。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纳粹政权对交通工程实施了重点投资，如公路、机场、航道、桥梁等，同时得到投资的还有农业和公共建筑、工人住宅区。绝大部分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机场规划相结合的高速公路体系，二战前共完成 3440 公里。并一直使用到今天；2006 年世界杯决赛也沿用了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1933 年当年即降低了 1/3，1936 年基本达到充分就业。在 1936 年之后，德国的基建重点开始转向军事，如兵营、军港、国防工事等，军火工业也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从解决就业问题角度来看，军事产业和民用产业有同样的效果。由于德国比其他工业强国更早的转入备战状态，在二战前夕，德国的的失业率只有 1.3%，而英、法、比、荷等西欧国家普遍在 10%左右。普遍就业安抚了社会，也为工商业提供了一定的需求。虽然

人均工资仍远低于危机之前，但工人收入总额还是从 1933 年的 136 亿马克增加到 1939 年的 294 亿马克。加上军备需求、重工业投资和后面将要提到的易货贸易所提供的需求，德国工业在希特勒执政的头 5 年翻了一番，产值已超过危机前最高水平，并将这种势头保持到二战中期。

没有退路的德国资本选择了极权主义，因此希特勒可以摆脱许多旧利益集团的掣肘，在改造资本主义时采取更直接的政策。正如希特勒 1928 年的演讲所言："…….与我们的对手方面做出的解释相反,纳粹党是以私人财产占有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从原则性和进攻性上讲,纳粹主义经济观念是反自由主义的。对于自由放任、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和竞争、市场经济的自由物价和工资形态来说,这里没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奉行的原则是先公后私…..”。在执政之初，纳粹政权就制订了《强制卡特尔法》，规定所有企业必须参与行业卡特尔，否则无权得到原料供应。如果行业卡特尔尚未建立，经济部会负责组建。企业在《价格冻结法》限制下丧失了定价权，生产模式、产品型号等具体问题也必须听从经济组织的命令。工业托拉斯国有化的口号虽然没有实施，但所有企业都不得不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听命于经济部。从 1936 年开始，一个由帝国元帅戈林领导的四年计划委员会得以建立，负责将工业体系转向自给自足的备战状态。这一委员会对经济的控制比经济部更加严密，企业的原料采购、劳工的数量与报酬、生产工艺都必须由委员会的批准，海外投资与外汇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在合成燃料和军火工业等方面，政府甚至设立一些新的国有企业来引导企业投资。到 30 年代末期，由政府指挥的垄断组织已经掌握了 85％以上的工业，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 17%，企业被禁止自行发售股票，只能从国家银行取得新增资本。与之相配合，1937 年之后一切资本少于 10 万马克的企业被强迫解散，规定新设企业资本不得少于 50 万马克，甚至直接以"清理不合理产业"的名义禁止数十万手工业者、小商业者营业。从 1933－1939 年，股份公司的数目从 9148 家减到 5353 家，资本从 220 万马克增加到 380 万马克；资本超过 2000 万马克的大公司从 174 家增加到 669 家，其中 1 亿马克以上的特大公司达 25 家。1932 年底，德国有 45%的股份公司纳入康采恩，所控资金达到全部股份公司总资金的 84% ；其中 981 家（占公司总数 10.1%）属于能够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仅仅过了 3 年，即 1935 年底，纳入康采恩的公司数增加到占总公司数的 48% ，所控资金达到 90% ；其中能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减少到 822 家。

经过纳粹党的改造，原来在德国经济中还具有重要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成分只剩下装饰性的点缀，上层建筑的改造与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同步进行。旧统治集团的结构被解散，议会共和、地方自治、政党政治等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形成的上层建筑被全部抛弃；德国改为中央集权制、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一概通过纳粹党向元首希特勒集中；任何不在纳粹党控制下的社团、政党均属非法。犹太人，不论其职业、阶层、性别、一律被贬为贱民，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和财产，然后被驱逐、监禁乃至屠杀，近百亿马克的财产被纳粹政权洗劫。对于希特勒的经济管制政策和极权政治，旧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抵制，毕竟交出权力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他们很快发现，纳粹党保留了原有国家机器部分的主体、吸收大批资本家经理进入经济管制机构，在德国经济总会中，旧企业主占据 12 席，纳粹党只占 5 席。只是重新被吸收入统治集团的旧精英如今丧失了大部分与统治秩序博弈的空间，必须在纳粹党的指导下工作。纳粹为此提供了丰厚、稳定的利润以供交换，并通过对犹太人的暴行杀鸡儆猴、表现了对局势的控制力。从 1933 年到 1938 年，德国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从 66 亿马克增加到 1938 年的 150 亿马克，危机期间政府以低价收购的股票也被发还原

主。虽然为了保证足够的投资额，可分配利润额被限定为 6%，但多余利润并没有被没收，不过是被要求继续投资或购买债券罢了，对于消费倾向本来就非常低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并不算是什么严厉措施。反而促进了工业产能的增长。

从 1933－1939 年，德国消费品生产增长 43%，用于再投资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 210%，军备生产增长了 1150%!可见工业的扩张主要体现为工业自身的循环增长和军备生产。同时德国的消费品出口有较大增长，进口受到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在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却有显著增加的同时,德国平民的实际物质消费总量并没有明显提高。此期间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很显然，低工资水平是低消费的唯一解释。1939 年时，50％工人的收入低于 1932 年即危机最低点的平均值。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 1932 年的 56.9％减少到 1938 年的 53.6％，资本利润比例却从 17.4％增加到 26.6％。为了维系这种经济秩序，纳粹在 1935 年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最高工资，甚至在劳动力紧张时，个别企业主增加工资以吸引工人的企图都被政府严厉制止。为了在日益扩大战备生产的同时，保证足够的利润空间，德国无产阶级被迫接受只能维持生活的低工资。从短期来看，上千万无产阶因经济危机而衣食无着的记忆尚在，能够忍受这种低工资但易于就业的现实。但可以换来温饱的低工资不能让平民积累个人财产。缺乏积蓄的普通平民没有任何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如医疗、事故，自然灾害等，因此在社会稍有动荡时就会走向反抗。另外，低收入阶层一贯地远离精神生活与娱乐，对既有秩序缺乏认同，乐于加入工会、苏维埃等左翼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在德国这个距离苏联最近的资本主义工业国，革命传统浓厚的无产阶级显然不会始终做顺民。

对此威胁，靠美德统治集团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而上台的纳粹党毫不手软地进行镇压。希特勒组阁不到一个月就火烧国会大厦，共产党及左翼组织被全部解散，骨干成员被关押乃至杀害。从而将自己在议会中很不稳固的相对优势转化为主导地位。随后，工会被废除，按照 1934 年 1 月的全国劳工管理法，企业主被任命为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 集体谈判、罢工、自由择业等权利，无论以前是否存在过，从此一概废除。做为工会的替代品，纳粹党组织了劳工阵线。不过，即便在书面上，法律也不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工人。按法律规定，劳工阵线工作人员必须是纳粹党员、或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成员。几十万工作人员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发挥出最大工作能力，只在工人的工作能力可能受损时才真正关心工人的生活状况。

当然，正如希特勒所言：“仅仅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维持统治”。为了在低工资水平下维持社会稳定，纳粹政府不仅重建了魏玛政府末期崩溃的社会保险体系，还通过《社会保险建设法》、《扩大保险范围法》、《手工业者养老金法》等法律，大大扩大了社保覆盖范围，40 岁以下的劳动者均获得保险。全民社会福利是纳粹最可自夸的成就之一。不过，即便这是成本相对最低的安抚方式，急于军事扩张的纳粹政权并也不打算承担全部成本。福利的实质是通过积累基金为平民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希望，无需立刻向受惠者全额支付，纳粹政权精明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许多社会福利，如养老保险、公债回报、分配土地等承诺的大规模兑现时间，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都被放到了大战之后——或者政府可以用战利品兑现，或者根本不用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用工人预付款建造的大众汽车厂，在战争开始前没有交付一辆民用轿车，大战一起就转为军工厂，直到被盟军占领。所谓的“社会福利”就这样转为战备物资。针对底层缺乏精神生活的问题，

纳粹政府相应提供了有组织的娱乐。劳工阵线等机构出面投资大型游轮、疗养院等设施，将工人每年带薪假期从 3 天增加到 6-12 天。在游轮被征为运兵船之前，每年有 1000 万人能享受廉价出游的待遇，无产阶级第一次象中产阶级一样，享有短暂的假期旅游。在同样的原则下，地方纳粹组织也通过组织体育协会、提供免费演出等方式来消除工人的不满。

通过开空头支票、精神抚慰等方式，纳粹明显减少了低工资带来的危机，甚至还缓和了德国扩张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在被德国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一旦实施和德国本土一致的保险制度，平民对纳粹政权的配合甚至会让流亡政府感到绝望。但无论如何，纳粹德国在军备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源，直到大战开始，德国也没有解决平民缺乏消费品的问题。只有在大战初期的成功扩张中，无产阶级才短暂地得到了少许战争“红利”，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和接下来的社会崩溃。

英、比、荷等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均有专属殖民地或稳定的外部市场，拥有一定资本积累与战争赔款，而工业产能增长较慢。所以这些国家对大萧条和革命威胁的主要应对方式是维护并加强原有殖民帝国，前殖民霸主英国是这一道路的范例。1932 年，在渥太华帝国会议上，英国和各自治领、殖民地签订了“特惠协定”，协定要求各地区内部互降关税。各协定国运往英国本土的货物，80％将获免税，其余 20％也只收 10％的低关税。同时英国向其他协定国的出口，原则上关税不高于 20％。对于帝国之外的进口，英国给予高关税，并要求其他属地的关税政策受英国指导，一起建立关税壁垒。同期的金融措施更进一步，原英帝国属地（除加拿大）和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埃及、伊拉克、阿根廷、巴西等国均加入英镑集团。参与国货币被要求对英镑维持固定比价，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按英镑换算，各国外汇准备金统一存放于伦敦各银行，供国际清算。通过加强对传统势力范围的经济控制，英国度过了 30 年代的萧条。1937 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比 1929 年增加了 23.7%，多少抵偿了 20 年代的明显停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工业产能和人口扩张迅速，因此最迫切地需要购买力与资源。但日本是最后进入列强俱乐部的国家，资本积累较少，老财阀和贵族势力强大，缺乏扩大内需的资本与社会结构。恰好欧美诸国控制薄弱的亚太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在眼前，日本很自然地选择了对外扩张的方式来应对萧条年代。从 1931 年起，日本以台湾和朝鲜为依托，从北向南，从东到西，向中国发起了连续侵略。1937 年日本即对中国发起全面攻击，次年通过《总动员法》，成为列强中最早进入动员状态的国家。同时，日本疯狂扩张海军。1934 年以前日本就通过虚报吨位、预留改装空间等方式建设了一支远超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分配份额的舰队。1934 年退出条约后，日本海军迅速扩张为可与英美正面对抗，争夺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权的远洋作战力量，并在海军航空兵、人员素质等方面领先列强。

为维持这样一支军队，日本不得不在动员前就将一半的财政开支用于军事（1937），因而完全没有缺乏安抚国民，扩大内需的资本，即便中层军官尝试清洗腐朽财阀也无济于事。在整个 30 年代资本主义大改良的年代，日本只能通过临时产业管理局等机构进行经济卡特尔化，大企业托拉斯化，减少统治集团内耗；无力推行平民福利制度。事实上，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过剩，朝鲜、中国奴工进入日本工业，日本无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在 1930 年－1937 年间，实际工资减少了 13%，劳动时间普遍增至 12 小时以上。从 1936 年开始，日本的工农运动又进入一个高潮，租佃纠纷频率比 29 年还高出一倍，罢工人次在 1937 年达到 210 万人（工人总数 260 万）。日本只能通过向新殖民地拓殖、从殖

民地获取廉价粮食来勉强安抚平民，这又迫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增加军费。日本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纯粹的军国主义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工业产能和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从 1929 年到 1938 年，日本的工业产能增加 70％，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 2.5%增至 3.8%；增速仅次于苏联，绝对产能已经超过了意大利，不再是列强中的末位。

如果说其他工业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忙于应付频发的社会危机，那么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可以说从未离开过危机。毫无疑问，意大利已经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一定的现代工业，20 年代末期已有数百万产业工人，另有 400 万农业工人。在脱离了传统农业社会之后，尤其是在苏联成立之后，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绝不会象同等数量的小农那样满足于温饱生活，而贫弱的意大利经济却无法在经济波动中保证他们有足够的面包。周边的列强均对意大利有压倒性优势，难以转嫁矛盾。意大利社会因此必须靠强力的上层建筑才能维持统治秩序。没有等到 1929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次小规模经济危机中，意大利旧统治集团就和第三世界那些更贫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早早地选择了法西斯极权体制。不过，墨索里尼刚一上台便赶上了 20 年代的经济缓和期，意大利从危机深处回到了边缘，故墨索里尼表示：“政府不应干预国家经济生活”，和胡佛一样实施了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到 1927 年，墨索里尼才开始尝试以行政干预降低工资水平，扩大劳工队伍。1929 年危机一起，墨索里尼立刻抛弃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实施严厉的国家管制。

和日本类似，意大利同样缺乏扩大内需的资本，以及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源，更没有英国那样广阔的殖民地。因此意大利统治集团也有进行军事扩张的愿望。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为自己征服了一块缺乏工业资源的贫穷殖民地。不过，意大利不仅在工业产能上低于欧美列强，增长速度和潜力也是工业国中最差的。它没有太多的工业产品用于出口或扩张，还要随时担心脆弱的统治体系被人民或旧统治集团推翻。因此，不论墨索里尼有多大的雄心壮志，30 年代的意大利对内对外都不可能有什么激烈的动作，只能以一个无奈的“凑合”原则来应对世界风云。直到大战的一方表现出足够的优势，意大利才会出手捞取战利品。

20 年代的法国春风得意，经济快速发展。当其他国家进入大萧条的时候，法国还在利用德国赔款进行基建投资，因此萧条开始较晚。即便在无可避免地进入生产过剩状态后，由于法国经济对出口依赖性较小，衰退发展的速度也比较慢。1933 年，当其他国家已经采取多重方式应对危机的时候，法国工业经济才开始进入真正的崩溃。温水煮青蛙的结果是法国统治集团没有受到足够的刺激，1934 年大资本犹犹豫豫地走向法西斯主义，被泛左翼力量阻止。在危机充分发展后，法国还有足够庞大的小农经济吸纳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缓和了失业问题。导致共产主义者也无法推进革命。从 1933 年到二战亡国，法国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政治经济政策应对危机，经济指标一路走低。二战前夕，法国工业规模退回到 1925 年的水平，只比 1913 年多 14％。

以上是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 30 年代发展趋势的描述。这一描述极为简略，忽略掉了很多次要方面。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各国统治集团应对大萧条的政策都是多方面的综合。比如说，在这一阶段以金融政策圈占经济殖民地的国家不止英国一家。美国有美元集团，法国有法郎集团，日本有日元集团，德国则有新奇的“易物贸易”设想，只是从规模和作用上看，最典型的还是英镑集团。至于基建投资扩大内需，军事投资消耗过剩商品、争夺购买力，建立平民福利制度等方式，也被大部分工业国采用，只是

程度不同。另外，在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国家都希望能转嫁危机。从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开始，各国都竞相提高本国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同时进行货币贬值、出口补贴。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来说，这毫无疑问加深了危机。但 30 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个个自顾不暇，绝无可能在出口问题上达成信任和妥协。因此这种贸易战愈演愈烈，成为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进一步探寻，读者还可以发现各国统治集团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应对方案，只是根据既有社会结构和可利用的资源，在摸索中缓解危机，避免崩溃。以罗斯福为例，尽管他在实际上奉行了凯恩斯主义以应对危机，但竞选时却坚定地反对胡佛时代的赤字财政；当政后也企图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登门造访的凯恩斯敷衍了事。只是被形势所迫，罗斯福才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在大萧条后的鸵鸟式政策并不难理解。

尽管各国统治集团绞尽脑汁地应对危机，但到 30 年代末，没有哪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能够宣称自己摆脱了危机，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正轨”。美国的萧条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从而产生了一个新词——特种萧条。在整个 30 年代中，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 1/2 跌至不足 1/3，海外投资减少了 1/3。1937 年的工业生产刚刚恢复 1929 年水平，立刻又在 1938 年暴跌了 23%，农业净收入也降低了 20%。同样受特种萧条折磨的还有英国和法国，1938 年的危机使两国的工业均跌落了 8%，若非 39 年军工生产传来利好，它们的萧条几乎看不到尽头。德国虽然解决了失业问题，保持工业持续扩张，但也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之所以没有爆发经济危机，靠的是国家财政寅吃卯粮，占用劳资双方的资金进行军工订货，同时在海权不及的远方倾销工业品，购买必需原料。此期间对捷克等小国的吞并也提供了大量资金。如果不发动战争，德国军工、重化工行业的巨额利润早晚会成为泡沫，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足以让希特勒不寒而栗。同理，处境更艰难的日本也必需靠扩张来解决眼下问题；意大利统治集团更不能指望无产阶级长久地忍耐。战争红利成为三个法西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的唯一指望。

正如前几章所论述的，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个别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企业垄断化不过是降低产业内耗，增加竞争力，不能增加实际需求。以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或是引导企业更新设备可以带来短期的需求增长，但一方面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增加政府债务；另一方面扩大了生产能力，可能反而加剧危机。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改变分配比例确实能够增加长期需求，但除非分配绝大多数利润，否则依然会有少数人占有过多财富、消费能力不足的现象。以 3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力度，既不能实施全面的经济国有化，又不能彻底改变利润分配比例，反而大大降低了平均工资。于是各国更急切地寻求外部市场。但本币贬值、出口补贴、贸易壁垒等方式至多可能缓和某个工业国的生产矛盾，而不能解决整体问题，而且必然会加剧其他国家的危机。在以邻为壑的外交指导原则下，它们剩下的选择就只有扩军备战一条路。

军队是非生产部门。扩军可以消耗掉大量过剩物资，吸收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并不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因而可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其本质与直接销毁过剩物资无异。同其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措施一样，扩军必然会大大增加政府开支，顺便能促进军工厂工人和军人的就业。考虑到现代军事工业的高额利润和军事物资的成本构成，其实这是一种社会效益很低的投资。不过，军队还是暴力工具，可以对外扩张，对内镇压。军事胜利能够带来新的购买力（殖民地），或至少可以消灭敌人的生产能力；对于那些内部不稳、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军队还可以通过镇压民众、掠夺资源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预期

利润，这是简单地销毁过剩物资所办不到的。于是，在大萧条之后的年代，扩军最终成为了解决危机的普遍手段，同时也是避免灭亡的唯一选择。那些对扩军不那么热衷的国家也在潜在敌人的军事压力下加入这一循环。在 30 年代后期，当 6 个工业产值合计占世界比例 70％的工业强国一齐陷入经济困境并进行军备竞赛时，下一场世界大战已经注定无可避免了。

二十一 、从列宁到斯大林

“如果一艘军舰要由地中海驶向黑海，它必须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管莫斯科的政府是沙皇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维辛斯基对苏联要求达达尼尔海峡通行权的解释

1928 年 10 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斯大林的坚持，五年计划采用了指标最高的一套方案。许多人指责这一指标不切实际，认为高指标反而会降低最终的工业成就甚至可能破坏整个工业　　　计划。抛开那些因新制度的怪异而产生的本能抵制心理，这些批评者的理由确实很充分，但他们和斯大林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的大萧条。

1929 年，需求不足把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逼上了绝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都迫切需要订单。无论订单内容是什么、来自何方，在大萧条的年代它都意味着预期利润和救命的现金流。在理论上说，苏联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但在英美互为假想敌，德法继续互相仇恨的 30 年代，针对苏联这个贫弱共产主义国家的任何禁运协议都难得落实。所以苏联几乎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它想买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工业设备、技术支援还是成套的技术班子。1929～1930 年，苏联购买了 70％的英国外销设备，到 1932 年购买了 90％；世界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完全是在美国工程师指导下修建的，巴拿马运河的建设顾问到苏联为中亚干旱地带设计运河。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全套设备在美国制造安装后，整体拆运到苏联，德国为另一个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提供技术支持，还与苏联合作研制坦克，日后成为两国劲敌的红色装甲洪流即从此而起。当苏联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提供更多订单的时候，那些未在大萧条中破产的大银行主动提供贷款和信用证。在现金紧缺的年头，因为苏联可以用政府信用和稳定的增长做担保，西方银行宁愿投资苏联工业，也不为本国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虽然 30 年代的经济发展机会并不是苏联独有——苦于大萧条的西方资本急于谋取利润并规避风险，并不介意合作者是谁。但在当时，只有苏联同时占有三个有利条件——足以保卫自己的军事力量、统一而有活力的政权和不以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模式，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让人民的血汗得以转化成未来超级大国的基础。

1933 年苏联的官方媒体宣称：“美国的商业和科学与布尔什维克的智慧相结合，在三四年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描述了 30 年代苏联的经济成就，这里无须重复。但必须注意到：基本工业资料，如钢铁、原油、汽车、飞机的产量是衡量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但不是全部指标。一个工业化强国不仅要拥有强大的物资生产能力，还要拥有各种配套产业与相应的教育、民政、培训等社会结构，才能使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负熵流以人类需要的方式流入各种经济终端产业，比如军队的基层连队、轻工业的最终工序、零售商业网点等。对于拥有核心工业体系，又无需为需求操心的国家来说，建立这些配套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但需要时间。人类社会毕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改变。因此，即便苏联政

府在这些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还是远远跟不上 30 年代大工业可怕的扩张速度，更无法和欧美列强已经形成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工业社会相比。所以苏联的轻工业、农业都滞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最终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军队虽然得到了大批新装备，但由于工业门类不够齐全、严重缺乏合格的军官队伍，实际作战能力也远低于其表面实力。以石化工业为例，在整个 30 年代，虽然苏联已经是第二大产油国，同时拥有世界第一的坦克部队和空军部队，但特种油料，如航空煤油、高辛烷汽油、润滑油等，自给率不足 10%，其余缺口均依赖于美国进口。30 年代的苏联，正如一个急速发育的巨人，粗大的骨架已经足以撑起世界霸权的外壳，肌肉和血液还相对不足，停留在一般列强的水准，实际力量则介于两者之间。评价这一阶段的苏联实力，不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测算个别指标，必须对经济—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工业体系可以靠外国技术人员建立起来，但如果日常的维护都依赖于外国技术人员，这种“工业化”是非常脆弱的。既不能灵活地进行二级开发，充分发掘工业潜力，也无法全面带动社会变革，更不能支持军事对抗，苏联必须培养大批的技术人员来接管外国技术支持的工业。工业体系建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单次工程。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不进则退的残酷年代，只有不断升级的工业体系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否则北洋海军的覆灭足为前车之鉴。为此，苏联人不仅要掌握既有的工业技术，还要从基础科学做起，培养所有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人才，组织各种层次的研究、开发机构，并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一言以蔽之，布尔什维克们设计的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受过教育和培训工业化人口。

为未来的工业社会培养足够的人才，这是苏联教育体系在立国伊始就致力的目标。但由于教育基础太差，人类群体自身的改造需要一定的周期，在 30 年代，苏联只是勉强能在外来技术支援下，维持庞大工业的运行。下一代工业体系的开发升级工作虽然没有被忽视，但苏联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后出生，为苏维埃工业化社会定制的一代年轻人此时还在读书，苏联的经济官员指望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作用，建设一个空前富强的国家，却没有料到世界大战将会完全打断这个美好的前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8 亿人的苏联损失了 2500 万人，其中青壮年占了一多半，革命后成长的一代青年损失殆尽，苏联必须从头构筑自己的人才体系。好在来自欧美的技术转移连绵不断，整个 30 年代西方都没有走出萧条，技术采购成本极低。到了 40 年代，世界大战固然打断了建设进程，但也带来了租借计划，其中包括价值 6 亿美元的先进设备以及许多关键技术，再次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工业水平。1945 年，苏联占领了整个东欧，德国、奥地利、捷克的大片工业地区被苏联控制，由此获得的设备、技术和人力再次支持了苏联的工业进步。冷战时代自然再没有廉价的技术转让，但经过 15 年的追赶，苏联工业水平已经和最先进的国家相差无几，工业规模也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和英、法、德、日拉开了明显的差距。但由于合格人才的缺乏和长期的低成本技术输入，苏联出现了工业升级依赖外国技术输入的惯性，直到一代人之后的 70 年代，这一问题才得到缓解。

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依托于城市人口和工业的政权，农民因分得了土地而消极地支持它。一直到 1928 年，由于工作重点在城市，也因为缺乏足够的骨干力量，苏维埃政权一直没有在实质上把权力伸展到农村基层，自然也就不能把农产品的生产、分配纳入统一的经济计划。在这一阶段，苏维埃政权主要是采取粮食税和市场化购粮的方式来获得农村资源，并用更精彩的工业化生活来吸引农村精英进入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社会

的扩张，苏联政府必须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供应。从粮食增产幅度来看，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但实际上，苏联政府遇到了越来越频繁的粮食供应危机。

在革命前，俄国农民并不是在充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胃口之后才拿出粮食剩余的。1861 年改革中，地主保留了 20%的土地，但这 20%最好的土地产出占总产出的 1/3 或更多。斯托雷平改革固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使土地和剩余向少数富农集中。大部分农民为了谋生，还要继续承受高昂的地租与 20 亿卢布的土地赎金。再加上沙皇政府的剥削、征发，以及世界大战和内战的破坏，俄国农民留在手中的食物只是勉强地维持生活而已，远不能满足绝对意义上的温饱需求，也限制了人口增长速度。革命后，土地被分散到农户，农民显然会先让自己吃饱，用增产部分弥补本来就存在的需求缺口，养活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新增子女，然后才会出卖剩余粮食——如果有的话。革命政府摧毁了帝俄征收农业剩余的上层建筑，又没有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收集的剩余赶不上增产幅度几乎是必然的结果。1926－1927 年，农产品的商品率是 11%，仅为革命前 1913 年的一半。在 1925 年之前，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不高，城市人口绝对数字不大，用工业品交换粮食来养活新增工业人口的计划尚能勉强运行。1925 年之后，建设重点逐步向重工业转移，工业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工业品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向农村出售的比例大大降低，粮食供应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此时只有少数富农通过租佃经营等方式收集了农业剩余，手里有绝对意义上的余粮。熟悉市场规则的富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囤粮惜售，等待高价，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1927 年秋，在一五计划即将开展之际，苏联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粮食征购危机。毫无疑问，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粮食收集体制都无法支撑未来更庞大的工业计划，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既然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绝对没有因此减缓工业化进程的打算，改造农村是苏联唯一的选择。1927 年末的苏共 15 大做出了尽快实施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 年 11 月，苏共中央为各州的党政机构制订了明确的集体化时间表。

集体化首先意味着消灭富农，这不仅是对他们囤积粮食的报复，更是改造农村原有秩序，为新的基层政权、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寻求基础的政治手段。根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原则，富农的全部财产被集体农庄没收，其他农民的土地和力畜也归入集体农庄，只留下少许自留地和食用禽畜。上级党委从贫农中挑选官员管理集体农庄，负责组织生产、分配报酬、接受技术援助，并控制剩余产品的使用。政府组织的拖拉机站负责向集体农庄提供技术支持，也征收实物报酬。按照苏共中央的时间表，主要农业地区要求在 1931 年春季完成集体化，最慢的南高加索等地也要求在 1933 年末完成。毫无疑问，让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和大部分财产，把未来寄托于这样一种从未见过的生活模式非常困难。对于此前从未真正控制农村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集体化，还要在农村建立真正听命于上级党委的基层政权。阻力不亚于在内战中取得工业社会的控制权。事实上，集体化运动在许多地区的确是一场战争，农民们本能地保卫自己的私产，每个月都有几十万农民起来造反。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平息一次反抗需要装备重武器的几个正规师。但是，和内战时不同，苏联政府已经牢固地控制着城市、工业和交通线，因此所有的反抗都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引发跨地区的连锁反应。无奈的农民们转而进行消极抵制和个人破坏，尤其是损失最大的富农。自行宰杀牲畜，破坏集体农庄生产，故意毁坏财产、攻击积极分子等行为层出不穷。但对于苏联来说，工业化目标压倒一切，苏维埃不会向农民妥协，公开反抗者被镇压，抵制的富农被流放、判刑，数十万人背井离乡。虽然实际的操作不如计划顺利，但到了 1934 年，70%的农户和 80%的土地加入了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可以从上级得到农机、育种和贷款支持，但在集体化初期，这些支持很有限，分配的产品也只够农民们勉强吃饱。以 1937-1939 为例，苏联集体农庄而分配给庄员的口粮只占总产量的 30%左右。很大一部分产品用来交纳农业税、支付国家定价的种子和农机，还有相当比例的农产品被强制出售。这样的制度在得到足够工业资源之前没有什么效率，同时，由于农民的私自宰杀或消极抵抗，一半用来耕作的大牲畜在集体化过程中死亡。农业出现了大倒退，以产值计算损失近 30%。但国家控制了农民的消费比例，依然能够拿走或买到足够的粮食，用来支持日益扩大的工业社会。苏联政府因此宣布农业集体化运动获得了成功，从建设工业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成功。但农民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1932 年苏联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扣除宣传的水分，1500 个先进重工业企业是无可辩驳的成就。同年，苏联农村爆发大饥荒，气候因素是原因之一，但农民之所以无力抗灾，正是因为集体化拿走了农民革命以来的储备。无法预料类似的饥荒在帝俄时代或没有集体化的年代有什么样的后果，但在 1932-1933 年，苏联农村因此损失了 500 万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 1/32。欧洲部分的农村饿殍遍野，许多村子因饥饿而成废墟，中亚成千上万的农牧民穿越边境到中国求生。急于工业化的苏联政府将粮食出口减少了 80%，但没有停止用粮食换外汇；政府派出了安全人员以控制灾区秩序，舆论被禁止谈论灾荒。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减少饥荒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唯独缺乏救灾粮食，因为城市供应也捉襟见肘。农民们为苏共的工业计划付出了沉重代价。1934 年气候转好，支援农业的工业物资逐步增加，苏联走出了粮食危机。此后虽然还有气候波动，但苏联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可以把大量的工业资源投入农业或外贸。即便在二战后损失了 2000 万劳动力，或是在 1991 年后经济崩盘，苏联也不会经历类似的饥荒。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宴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美。桌上丰裕的酒食，使人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革命之后，苏联本来是不提倡过新年的………..这是生活困苦的一种表现。买不到鱼肉、面包，有什么过新年可谈…….今年苏联政府则尽力提倡人民举行快乐的新年节。 各俱乐部、公园中都有晚会，人民都可免费自由参加；各学校，幼稚园中亦举行儿童新年节。这是国家强富起来的一种现象。同时我看到男女所穿的衣服亦非常整齐、清洁、华丽。 绝对不能和一二年以前比较……”——蒋经国 1935 年末

到 30 年代后期，尽管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尽管数百万农民在几年前饿死，但很明显，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的未来。布尔什维克向未在饥荒中死去的人民承诺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至少可以期望未来的苏联工业为此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但共产主义社会的内涵远不止是充足的工业财富，还包括全人类的解放，给每个公民自由发展的机会。按马克思的设想，人类的解放应该既是苏联发展的目标，也是苏联获得进步的手段。毫无疑问，在对外宣传中，苏维埃政权会坚持说自己在马克思设计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实际上，残酷的事实和宣传相去甚远。

工业化构筑了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导致技术-管理人员的地位日趋上升。本书前面已经对此做了描述。“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

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不仅因为技术相对稀缺而越来越重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式还大大提高了监督成本。因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做出准确评判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即必须由另外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在那些不断发展升级、因而无法对最新的生产流程做出定量评价的经济部门——这类经济部门正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所在，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但在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比工业资本更稀缺的世界上，将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抽出来投入监察工作意味着大大降低发展速度。还必须考虑到监察者同样是人而不是机器来进行，本身也需要监督。工业社会越分化，监督成本就越大，对技术人员进行完善监督所需要的技术力量很快会需要超出投入实际工作的部分，对一个完美监察体系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无限的成本。因此，放弃对技术工作的全程监督是很自然的选择，即容忍一定程度的勾结、怠工、谋私，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监督力度，在工作效率和监督成本之间取平衡。但这样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放弃全程监督之后，技术人员利用个人垄断的第一手资料对抗监督者、检查者，考虑到大部分复杂技术工作难以再现，这种现象非常有利于先介入技术工作的人推脱责任，乃至和检查者联手掩盖问题。总而言之，复杂劳动中的失误和问题均难以发现。这导致了技术人员的违规成本降低，即被查处后的处罚力度与被查处的概率之积大大减少，最终会小于违规行为为个人带来的收益，导致技术人员丧失责任心或谋私。这意味着既有的经济秩序无法维持，竞争压力将推出新的制度。

根据一般的逻辑推断，可用来替代旧秩序的解决方案有三种。

第一种方案是高薪养廉。在技术人员违规被查处的概率较低的情况下，增加他们的正常收入即意味着增加了违规后被查处所导致的损失，保持处罚力度×被查处的概率>违规行为的收益，从而让经济体系继续运转。这似乎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工业经济的复杂程度日甚一日，被查处的概率也进一步降低，为了维系这个不等式，正常情况下的收入也必须持续增加。最终，技术人员的“正常”收入将接近甚至等于整个工业经济的收益，减少甚至消灭投资者进一步投资的动力，经济发展将停滞乃至倒退。

第一种方案的问题催生了第二种方案。既然技术人员瓜分利润会削弱投资者的投资倾向，那么如果技术人员和投资者身份重合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投资者，或者说资本家未必赞成这一提议，但竞争压力会利用每一次偶然的波动来促成这一转变。这一转变的形式不拘于技术人员夺权一种，也可以能是投资者即资本家家族向技术官僚集团转变，也可能是新生集团集二者功能为一体。最终形成的社会结构只在外壳上有差别，内部运行方式完全一致。

第三种方案是直接增加处罚力度，用有罪推定来增加被查处概率。对较小的谋私行为、甚至是意外失误加以严厉的惩罚。将一切抵制行动推定为有组织的破坏，对可能成立但证据不足的罪行即施加惩罚。这种方案维持工业社会秩序的物质成本最低，但也有严重的劣势：首先，对个人来说，惩罚的上限即是死刑，死刑会消灭技术人员本身，而错误的死刑是无法事后挽回的错误；其次，有罪推定，即使只适用于少数人，也和人类一般的逻辑和道德观念不符，很难公开推行；最后，处罚并维护秩序本身也需要技术-管理阶层来

实行，长期实施过量惩罚会导致执行集团消灭自身。不过，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解决短期问题。

资本主义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的资本家集团开始拥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意识形态也允许高收入的存在，因此都是从第一套解决方案入手，向第二套方案转变。其中英、美财富积累较多，因此实施第一套方案的时间较长，向第二套方案转化较慢，过程平缓；德、日虽然也沿同一套路线转变，但由于积累不足，最终的过渡方式是较激烈的法西斯专政。到 30 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工业强国均进入大工业时代，技术官僚控制社会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苏联利用大萧条的机会努力追赶，也赶在 30 年代迈进了大工业时代的门槛，于是也遇到了技术人员的监督成本问题。

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不大的集团，在随后的 20 年中。布尔什维克一方面迅速扩大自身规模，一方面和原有的技术阶层联盟，同时改造教育体系，在城市中培养新的技术人才。共产党干部、旧技术人才、新技术人才这三个互有交集的群体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技术-管理阶层。在他们之上,是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之下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和集体农庄里不满的农民，各个阶层的合作促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对外宣传时，共产党表示 20-30 年代的建设成就非常令人振奋，但实际上，无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还是以快速工业化、在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中取胜这一目标来衡量，30 年代的苏联还差得很远。大量的贪污、浪费、决策失误、怠工现象从革命胜利那一天就已出现，严重影响了发展速度，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作者看来并不意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政权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按照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支付报酬。所以，高薪养廉显然不在革命政权最初的考虑之列，无论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劳动者。简单劳动报酬可以很方便地用计件工资或者特定工艺规范下的计时工资来衡量。但如果复杂劳动也用类似的方式来评定报酬，即便考虑到劳动者学习这些技能所需的时间，报酬依然远低于西方国家类似工作的收入，甚至低于第三世界类似工作的收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依照稀缺性和职位本身带来的博弈优势来确定收入，劳动时间只具有参照性作用。讨论那一种分配方式更“合理”不符合本书主旨。但按照前面的讨论，这会导致苏联技术官僚的预期违规损失过低，降低工作效率。对此，革命政权还有另一个假设，即所有的劳动者都会充满热情、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但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掌握最多实际信息的共产党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也同样深知这一点。

客观的说，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非全部源于技术官僚的私心，高层领导人对经济管理缺乏经验，普通人民也缺乏工业化劳动训练，这都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混乱。但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身份领导国家，无视也不会承认决策者的失误，以保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不被质疑。普通人缺乏工业化训练是旧俄国的遗产，属于经济建设的外部条件，况且且他们已经用汗水和生命为工业化付出了代价。因此，在斯大林的视角看来，整肃技术官僚阶层来加快工业化建设是很自然的选择。另外，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权都不是为工业化目标周密设计的产物，而是革命形势塑造的特定结构。党本是一个因胜利而凝聚的小集团，胜利后接管了旧政权而不是从头创建国家机器，最后才通过迅速扩张来掌握国家。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高层，在根基稳固后重新整理统治机器，定做机器零件，也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1934 年，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这本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 30 年代的特殊背景和客观需求下，基洛夫遇刺被解释为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

谋。按照大清洗的理论，多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潜伏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和一切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均有勾结，要对苏联的一切问题负责，刺杀基洛夫只是他们进行全面破坏的开始。这些集团必须必须被彻底消灭。

高级干部首先受到清洗，数十名高级干部被指控组织或参与反党集团。在最著名的三次公审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主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干部被判决有罪，并在压力和拷打下公开承认了“罪行”，最后被枪决或判刑。上行下效，以国家安全局等内务机构为核心，整个苏联官僚体系都依照同样的逻辑，追查各个反党集团的“爪牙”、代理人，或寻找新反党集团的线索。任何微小的贪污、浪费、怠工、盗窃都被上纲上线地解释为反党阴谋的一部分，甚至纯粹的疏忽和意外也必须用敌人破坏来解释。这导致政治犯和被判处重刑的人数猛增，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犯了轻微错误，甚至根本就是各级官僚机构内斗的牺牲品。

到 39 年为止，30 多万人被处以死刑，上百万人因政治犯指控而受到牵连。一半以上的党员曾被逮捕调查。一般来说，除了斯大林及其亲信，越高的地位意味着在大清洗中越危险，清洗的打击主要落在了苏联工业社会精英头上。苏共十七大 1966 名中央代表，有 1108 人在大清洗中获罪；同届 139 名中央委员有 98 人获罪。17 名政治局成员除基洛夫遇刺外，5 人遭处决。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 284 人，其中 1936 年前死亡的 45 人，大清洗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 188 人，自杀的 8 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 22 人，幸免者仅 21 人。类似的清洗方式也被用于军队系统，细小的错误、军事思想上的争执、模糊的外国情报，都可以被用于指控和定罪。军队中清洗了 3 万多军官，其中 1 万人被枪决，元帅、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分别有 60%、86%、67%、69%被清洗。甚至安全机构本身也不能从中幸免。大清洗期间具体主持清洗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先后有两任被指控反对苏联，逮捕后枪决。

大清洗保证了苏联已无人能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更不可能挑战他的社会改造计划，代价是每年 10 万多技术官僚丧命，更多的受害者被迫坐牢或服苦役。苏联承受不起这样的技术人员损失。因此到了 1939 年，斯大林主动叫停了大清洗，并承认一定的错误：“………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 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大清洗结束了，虽然从绝对规模来说，大清洗带来的灾难远小于 30 年代前期的饥荒。但大清洗的受害者大多是工业化社会的精英，从人类历史上来看，这比大饥荒还要罕见的多。因此在外界看来，这是比大饥荒更具标志性的政治事件。

大清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苏联完全放弃了高薪保证效率的制度，相反，苏联正是在斯大林时代建立了严密的等级体系，并为这个等级体系配上了相应的收入和特权。1922 年，苏联的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8 倍，1934 年扩大为 30 倍， 斯大林去世前扩大到 40 倍以上。根据等级不同，技术-管理人员还有各种额外津贴，在购买优质商品、分配住房、交通工具、疗养等方面具有优先权。同时，大清洗的结束也不等于苏联放弃向对工业精英施加过量压力。1941 年德国入侵，整个社会都转入严酷的军事体制，战后依然有大清洗的余波和威慑。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工业化精英们一面享受着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物质待遇，一面因恐惧而战战兢兢地工作，基本满足了快速工业化并赢得战争的要求。

从维持工业社会秩序的效果上来看，实行等级制、高薪养廉和大清洗的严刑峻法并不冲突，都能增加违规成本，而且效果互相叠加。作为一个必须迅速工业化才能生存下来的后发工业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既缺乏物质积累，也缺乏技术人员，同时革命带来的平等意识依然有巨大影响，因此最终在竞争压力下形成了这种第三种方案和第一种方案的组合。斯大林时代结束后，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技术官僚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苏联也积攒起相当的财富。此时赫鲁晓夫作为技术官僚的代表上台，急于和斯大林时代划清政治界限，以保证自己在技术官僚中的权威。苏联开始全面转向第一种解决方案。不过，苏联自命为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技术官僚的实际收入受到相当的限制，虽然他们的物质享受明显区别于一般平民，但与资本主义国家掌管同样权力和财富的同行相比，物质享受水平要低得多。一直到 70 年代，以放纵技术官僚集团和夸耀富贵著称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但除其履行国家领导人职能所需的必要特权外，实际生活水平和美国的上层中产阶级差不多相当，日常居所只是一套 5 楼的 5 居室公寓房。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顶级人物也基本如此，远不能和西方的高级经理、政府高官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苏联不能用足够高的正常收入来保证技术官僚的违约成本，工业社会的纪律因此受到了影响。在苏联前期，革命政权的锐气尚存，为共产主义运动献身的思想还能够有效地动员一些技术官僚，在收入较低情况下认真工作，甚至枵腹从公的苏联高官比比皆是。到了苏联后期，信仰淡化，官僚集团日趋稳定，阶层世袭化开始出现，苏联已经在事实上向第二种社会管理方案转变。即名义上苏联的权力和财富由全民所有，实际让执掌国家的技术官僚阶层成为国家的拥有者。这一转变最终在苏联解体后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渐变再次证明了竞争压力对制度的塑造。但在苏联存在的 70 年间，苏联始终实行了一套与欧差异巨大的社会制度，这又表明：在 20 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制度变化相对滞后，远不能和外界竞争条件的变化保持同步。

共产主义运动自马克思开始就是世界性运动，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发展。1919 年列宁号召成立共产国际以统一协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国认同共产主义目标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方式的政党都作为支部加入共产国际，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但自从苏波战争结束，红军退回国境开始，苏联就成了唯一的共产主义政权，并且完整地占有一个大国的资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开始从西欧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反而成了苏共的下属部门，由苏共指派领导者，从苏联获得资源，支援并全权指挥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此时的苏共具有双重角色，它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要和和其他国家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建立联系并可能协作；另一方面，苏共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要指挥各国共产党推翻本国的旧政权，建立颠覆一切的共产主义政府。如果这两个角色的需求一致，那苏共当然乐于推进世界革命，但这两个角色的需求往往是冲突的。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苏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优先照顾苏联的本国利益。比如说，中国共产党被命令向敌对势力交出武装，法国共产党在在德国入侵之际受命鼓动工人破坏备战，苏德妥协期间，苏联甚至应德国的请求，将一些在本国被通缉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移交给纳粹政权。客观的说，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年代，苏联的发展速度确实可以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亡，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苏联的快速发展得到了支援。但不可否认，别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共产主义运动原则本身，都为苏联的工业社会建设付出了代价。

苏联是一小群理想主义者根据从未验证过的理论建立的国家。一朝胜利，他们立刻尝试建设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也要用自由发展的原则尽可能解放原有的社会，并在新建的工业社会中推行这些原则。所以，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婚姻自由、信

仰自由、社会平等等原则站在革命初期得到极大的提倡，道德上风行宽容主义，堕胎、同性恋、先锋艺术流派、宗教等许多在传统社会离经叛道的事物都得到了合法地位，而且政府还鼓励人们自由地去创造从未出现过的生活方式。革命之后，一向强调等级和服从的军队取消了军衔制。整个 20 年代，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受实际限制；苏联的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多的教育模式创新。1927 年，法律承认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以鼓励新的家庭模式。但这些制度、文化创新基本上停留在自己的领域内，缺乏相互配合，不能被组合为设计新社会的完整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建筑创新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绝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真正塑造社会的还是借苏维埃政府之手起作用的经济形势和外界竞争压力。因此，一旦苏联全面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新鲜的尝试立刻冰消雪融，或被取缔，或自行消亡。最终出现在苏联的是一套和快速工业化道路相配合的上层建筑：在快速增加人口的需求下，非医疗性堕胎自 1936 年起成为违法行为；离婚逐渐受到经济限制，需支付补偿金，大家庭和多子女则受到经济鼓励。为了统一思想，进而集中资源工业化，1929 年之后，文艺创作开始受到管制，1934 年成立的作家协会将所有文学作者纳入政府控制。在军队里，军衔制也开始恢复，1935 年恢复了校官以下的军衔，“将军”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沙俄统治象征的名词最终在 1939 年回到军队中。这些变化中不乏向旧社会倒退的成分。

民主政治的消失是更重要的变化。1918 年列宁的确解散了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但列宁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所恃的正是城市和军队中的支持率。在全国的大城市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均占多数；在彼得格勒等地的驻军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因此列宁能够解散立宪会议，并压倒反对者。在革命初期，尽管占人口大多数农民态度暧昧，但毫无疑问，依靠工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能在任何限于城市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依靠士兵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派驻的政委可以带领旧军队改编的红军打败所有敌人。这样，尽管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中央集权、少数人决定政策的党，并且领导者本能地想主导一切，早期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依然带有很大的民主色彩，至少工人可以在苏维埃里畅所欲言，并对一些局部问题做出决策。士兵委员会积极做出决议，甚至频频压倒政委的命令。1918 年的时候，俄罗斯苏维埃立法授予全体 18 岁以上劳动者选举权，选举权覆盖比例超越所有国家。迟至 1925 年，还有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决议，不接受苏共 14 大决议的事例。但到了斯大林时代，党委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外壳掌管一切，上级党委的决议不仅不能否定，甚至不能质疑，已有的民主色彩完全消失。这一转变是在苏联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大大加快的背景下进行的。1925 年的城市人口比例是 17%，二战前夕增加到 33%，从革命时期的经验来看，这本应大大的扩展共产党的支持率，并促使政治民主化，结果却完全相反。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问题。

靠军事斗争起家的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迫保持半军事化的集权体制，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在第一代的革命者中，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列宁自己，曾真诚地相信可以依据人民的民主决策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并相信这个结构可以自然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促成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因为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述如何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民主政治。马克思只是抽象地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应当实行。巴黎公社的成员们依照模糊的直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示去实践，建立了一个以普选为基础，让专业委员会+非常设低薪官僚负责社会事务的政府。但这个政府甚至不能有效地利用巴黎资源，最后自取灭亡，实属恶例。布尔什维克现在要在一个大国解决这个问题，能做的只有继续尝试，依照直觉行事。正如新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摧毁了旧政

权掠夺粮食剩余的上层建筑一样；早期革命者在保留了选举制度的同时，将欧美列强在基层投票之上的复杂、庞大的政治结构斥为资本专政的工具，完全不予采纳。客观的说，布尔什维克这一论断并无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工具和宣传诱导，再加上贵族院、王室、半封闭的军官团等保留下来的旧式统治机构，欧美的政党政治得以一方面让选举人得到足够的参与感，另一方面基本保证了重要决策符合国家大资本扩张的要求。这确实不是"人民统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民得到足够的工业财富，但至少这种体制可以在一个大国内有效地的连接基层选举和高层决策，可以保证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布尔什维克拒绝了这些上层政治体制并消灭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民主政治就只剩下单纯的选举和议行合一的苏维埃。结果，他们很快发现，即便只是维持一个大型现代社会的运转，只有一个选举制度的"民主"体制也无能为力。没有了以经济利益结合的政党，分散的选举人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没有了稳定的技术官僚，管理大型社会完全是一个笑话；贵族集团和精英教育消失了，长期战略却必须有合格的制订者。至于指挥军队赢得战争，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建设一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等目标，完全不可能靠一个简单的民主理念和善良的出发点来实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们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无能为力，却在实践中发现，集权的党机关能从各个层次做出有效决策，还能高效率地保证决策得到实施。于是共产党机关渐渐成为基层单位之上的真正权力机构，并在战争和管理社会的考验中淘汰了其他管理模式。苏联建国后，革命者依然没有更合适的制度来取代共产党专政，面临的生存压力却毫不减轻，于是党机关专政的模式越来越根深蒂固，最终促成了绝对集权体制的形成。与其同时，稳定的技术官僚队伍，准贵族集团、精英教育等制度开始重建或新建；苏联的宣传机构负责鼓吹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工人们得到了福利，在基层社区用可怜的权力决定无关紧要的生活性事务；安全机关随时准备消灭不安定因素。坐在权力金字塔最高层的斯大林成了这一切的象征。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代，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早期革命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个穷困、落后、愚昧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碾碎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和梦想，也为亿万人提供了更富足的生活和新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苏联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这一切，为更残酷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因此振奋，认为这给出了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但更原教旨化的托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一时期的苏联非常不满，流亡的托洛茨基评论说："………. 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托派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是如此巨大的一个社会运动，斯大林乃至整个苏共领导集团没有背叛或毁灭它的能力。在这个时代，个人意志依旧要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残酷的竞争压力。

亮剑，英雄主义的童话和民族主义的呓语

引言

回顾30年来的文艺思潮演化是饶有趣味的。80年代，伤痕文学用铺天盖地的眼泪感召着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反思；但是，到了90年代，这些泪水哺育出的意识形态在带血的履带前却显出弱不禁风的尴尬；这时， “迷茫”与“荒诞”就成了人们描述世界和刻画心灵的最恰当手段；再后来，王朔又把优雅的泪水说成不过就是小便失禁、把沸腾的热血说成不过就是女人一月一潮。到了这个境地，中国文艺似乎除了沉湎于香软温润已别无它途；然而，却有一种叫做“硬汉子文学”的东西带着阳刚洒脱的惊喜在无病呻吟和脂粉迷离中勃然雄起。

《亮剑（小说）》就是在“红歌未兴，伤痕已艾”的文艺没落中脱颖而出的。

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娓娓道来的生命哲理和细腻的心灵刻画不同；在《亮剑》里，李云龙用语言粗鄙、外形粗糙、习惯粗俗、行为粗野、脾气粗鲁的“痞子”形象承载着勇于拼杀、决不屈服、虽死犹荣的粗犷与豪迈。

依然不同的是，在海明威那里，老人就是老人，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既不比别处的鲨鱼好，也不比其他的鲨鱼坏。而在这里，即使同是一样的鲨鱼，李云龙却能比其他的鲨鱼无理占三分。这让我想起在炮制了《苏拉密：展望，朝鲜将对韩国发动“颜色革命”！》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908/100105.html 一贴后，有左派缠着一定要我解释文中“愤青”的涵义，我答道：就是把“China bank”翻译为“中国很行”。很行就是很行，只要是中国就一定很行。即使病入膏肓也顶多不过是“不高兴”，而绝对不可能是苟延残喘；即使“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健康力量们也照样能盖起新的小房子，怀抱着新的小希望。愤青们的“很行”和阿 Q 的“很能做”一样，是无需任何理由的。

做为“伤痕主义”的余觞，《亮剑（小说）》后半部分演绎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文革）“悲惨世界”，已是俗套得不能更加俗套；但作品前半部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歌功颂德却呈现出史诗的壮美。看得出来，作者是吮吸“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奶水长大的。

为了不至于让“伤痕党”们30年来持之以恒没完没了哭哭啼啼倒了观众的胃口，《亮剑（电视）》忍痛割去了小说对社会主义的“罄竹难书”，意犹未尽地选择了对新民主主义浓墨重彩的渲染。

毋庸置疑，《亮剑（电视）》是新千年以来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之一。这点可以从“亮剑”和“忽悠”一起演变为汉语新词得到证明。按照语言学的说法，任何新语词的诞生，都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的发生。诸如“科学发展观亮剑中国”“和谐生产亮剑富士康” “中国海军亮剑南海” “装甲巡逻车亮剑街头”. . . 等文章标题的高频出现，都足以说明：“亮剑”已经从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延伸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那么， “亮剑精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进行了07年至今的思考后，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其做出剥茧抽丝的研究，以鉴别它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

第一章 “亮剑精神”的内涵

一、民族主义

《亮剑》剧情从抗日战争展开。

虽然作品中也“泄露”了不少红军时期的轶事，但均是以回忆的方式片段捉取的，不构成剧情主线。虽然作品也对解放战争进行延展性描写，但在阶级大对决的辽、淮、平、江、南五大战场中，李云龙虽有幸摊上了淮海战役，但刚一开打就负了伤，因此从战争中出局。这样，“亮剑精神”中“同族相杀”的污点减少了，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主动划清了，人也就清白了。

抗日战争是作品中故事最为完整、情节最为曲折、过程最为详尽的部分。作品刻意要用民族斗争去磨砺剑锋，那么“亮剑精神”就必然成为一曲酣畅淋漓的民族主义咏叹调。

在《亮剑》剧情里吗，作品多次通过各种人物向观众灌输民族主义的基本信条。

楚云飞曾真诚地表白：“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

丁伟在他的军事学院毕业论文构思过程中，对李云龙说：“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

山本一木这样评价李云龙和楚云飞：“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民族和国家）他们随时愿意和魔鬼合作。”

... ...

当我们回观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以上台词似乎剽窃了王明的文章：

“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如果你保持足够的耐心，以下我们还会看到，那些越是高喊“民族大义高于意识形态”的人，越是意识形态最坚定的人。他们要做的不过是去“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去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而代以王明的意识形态而已。

和小说相比，电视剧借助声光电手段更加注重情绪的煽动，主题歌用激昂的旋律、铿锵的语言在36集里反复激起观众汹涌澎湃的热血：

如果祖国遭受到侵犯,

热血男儿当自强.

喝干这碗家乡的酒,

壮士一去不复返.

滚滚黄河,滔滔长江,

给我生命给我力量,

就让鲜血染成最美的花,

撒在我的胸膛上.

红旗飘飘,军号响.

剑已出鞘,雷鸣电闪.

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向前进,向前进,

向前进,向前进,

中国军魂!

但是，我们很快注意到：假如把歌词中“滚滚黄河，滔滔长江”修改为“巍巍富士，滔滔东洋”那么主题歌就完全可以定音在“大皇军魂”上。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不搭理“黄河长江”那些浑水清水，径直将“红旗飘飘军号响”改为“青天白日大地红”，就可以定音为“中正军魂”了。

在“中国军魂”里，子弟军为穷人翻身解放打江山的阶级使命被剔骨抽筋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黄河、长江、红旗”的空瘪皮囊；“生命力量、雷鸣闪电”也不过是和要求男人长“把儿”一样——全世界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好勇斗狠。据说，就是受了“中国军魂”的启发，曾有人大代表提案要将“人民币”改名为“中国圆”。“中国军魂”“中国圆”，一下子就洗白了阶级性。

既然“中国军魂”、“大皇军魂”、“中正军魂”可以互换，那么就说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亮剑精神”就不再是中国愤青可以独霸的神兵利器。中国的愤青既不比东洋的愤青好，也不比党国的愤青坏；都是愤青，导演却安排李云龙战胜山本一木、战胜楚云飞就显得不那么以理服人。

二、英雄主义

作为“硬汉子文学”和“战争文学”组合的《亮剑》，英雄主义是作品的另一灵魂。作品无处不在着力体现“硬汉子精神”向“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

和楚云飞大闹县城、身缠炸药独闯“鸿门宴”；

“宁愿死在进攻的路上也绝不后退、进攻进攻永远进攻”的座右铭；

正面突围的果敢和骑兵连全军覆没的壮烈；

冒险攻打县城的幸运成功；

… …

作品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宣扬，在李云龙的军事学院毕业论文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军魂”层次：

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尤荣，这就是亮剑精神！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于是，“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起构成了“亮剑”之双锋。工农子弟兵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的阶级使命，子弟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统统被一种类似于“侠客精神”的“军魂”取而代之；而且还自鸣得意地宣布：“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

也就是说，那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军队可以没有毛泽东，但绝对不能没有所谓的“军魂”——亮剑精神!

很令人纳闷的是，根据剧情，在故事开始时，李云龙担任新一团团长，因犯错误被撤职，由丁伟接任；李云龙先是调任军服厂后又接手孔杰的独立团。按照李云龙激情大于逻辑的“首任军事首长决定论”，还真不好说“新一团”应该是姓“李”还是姓“丁”，“独立团”应该姓“孔”还是姓“李”？越想越觉得李云龙的“首任军事首长决定论”除了胡扯之外要说还有点道理，那就是为军队“军阀化”“派系化”制造理论根据——李云龙是不是想说，那支部队本不应该姓“毛”姓“共”，而应该姓“朱”“彭”“贺”？如果真是这样，李云龙“亮剑”时还能不能指望丁伟、孔杰拔刀相助？那就要看白崇禧买不买蒋公的涨了！

第二章 “亮剑精神”的欺骗性

《亮剑》塑造了一批抗日战争时期中级军事指挥员的勇武群像。八路军方面以李云龙为代表的团长孔杰、丁伟，理想政委赵刚；国民党方面的晋绥军上校团长楚云飞；侵华日军方面的特种部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李云龙的“剑”就是在此群狼间发力的。

既然“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是 “剑”之双锋，那么我们是否能问一问：楚云飞和山本是否也同样掌握了这种“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令对手心惊胆寒、令愤青神魂颠倒的神兵利器？

假如楚云飞和山本们没有掌握这种神兵利器，那么李云龙们先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那就顺理成章了。假如人家也掌握了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楚云飞和山本们做一客观的认识。

楚云飞

就英雄主义而言，楚李可谓珠联璧合。楚云飞胆略过人，几乎李云龙所有匪夷所思的英雄冒险都和这位“楚兄”形影不离。

楚李二人在晋西北都很有名气。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便把他们俩说成是会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两颗脑袋的价码涨到五万大洋。

稍后，楚李联手大闹县城，日军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之军官，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峻深感震惊，同时公布新的悬赏价格，二颗脑袋各大洋十万元。

抗战胜利后，楚李二人作为敌手在淮海战场遭遇，二人双双重创对方，尤其是李云龙，差点丢了性命。

就“民族大义”而论，楚云飞更是因深明大义而显得比李云龙多出了几分气度。

楚云飞说：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楚某的朋友。上面的事我管不了，但云龙兄如有困难，只管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

楚云飞还真是说到做到，得知李云龙打了鬼子一个伏击损耗惨重，楚云飞立刻派人送来五万发子弹，并致以真诚的祝贺。

在李云龙私自攻打县城的战役中，楚云飞不顾蒋委员长和阎长官“不可擅自和共产党军队联合作战”的训令，冒险为李云龙阻击一个联队的日军；当参谋长提醒他这是违令行动时，楚云飞大义凛然地说：都是中国之国防力量，不可见死不救，追查下来我来担纲。

比起李云龙帮助楚云飞平定了一次叛变就趁机掳走楚部一个营的装备，实在是让人觉得李云龙有点乘人之危。后来楚云飞要了几次，李云龙耍赖不给，楚也就作罢；要是换了践行睚眦必报的李云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山本一木

关于东洋愤青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我真的不敢在这里列举过多，即便是“打三折”讲来，也会另中国愤青无地自容。假如可着劲吹嘘，就会犯下“灭中华志气长鬼子威风”的汉奸罪而成为“锄奸队”的工作目标。

东洋愤青为了大和民族为了天皇陛下经常可以剖膛破肚，肠子下水流得满地；这事别说让学了，就是在屏幕里瞄一眼，都会让中国愤青噩梦连篇。

有人想用民族主义统帅中国，我看不错，但先要跟鬼子学会杀自己，至少先学个百八十年的试试看能不能学会再说。要是实在学艺不精，那我就不忍打击中国愤青的民族主义热情了。

言归正传。山本毕业于德国军事学院，所学为当时极为先进的特种作战，信奉小人物可创造大历史。就是说，在承认伟人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决不忽视小人物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比如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塞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小人物干掉，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能说小人物创造不了历史吗？当天平处于均衡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在战略的天平上，一支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突袭，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按他的理想，就是带领一支特种部队去重庆偷袭蒋介石的官邸，把光头委员长抓来游街。

山本的特种部队和特种作战，打碎了李云龙的新婚之夜，也给李云龙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颤栗，在《亮剑（小说）》里，李云龙后来的全部军事生涯，就是效法山本让他开了眼界的特种作战，直到永远。山本一木不愧为李云龙的终身之师。

从以上看，“亮剑军魂”之双锋——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楚云飞和山本那里不仅有，而且似乎一点也不钝于李云龙。

因此，说“亮剑精神”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的那支工农子弟军战无不胜的源泉，是禁不住一戳的欺世鬼话！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才是工农子弟军的军魂

当“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的“亮剑精神”不再是李云龙们独有的神兵利器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工农子弟军在装备极差，人数极少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敌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最后胜利？

那支子弟军手中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制胜法宝？——中国的阶级敌人没有，外来的帝国主义也绝不可能有的强大武器，从而奠定了胜利道路？

是毛泽东思想！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那支工农子弟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军事国防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军事与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世界所有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采取暴力手段，武装夺取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丰富、深刻、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可概括为立场、观点、方法三个层次。

一、无产阶级的建军与战争立场：

“争利益”。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开宗明义地阐明建军的目的是为阶级争夺利益，从而规定了子弟军为工农翻身解放而建军、而战争的阶级立场。

“建政权”。毛泽东更早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的是子弟军的阶段性目标是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党指挥枪”。军队的阶级立场决定军队的组织原则。子弟军的阶级性质决定了那支部队不同于军阀的私家军队，不同于官僚的国家军队而是工农阶级自己的军队。这就要求那支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工农阶级的先锋队手中，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三湾整编”的“支部建在连队上”“士兵委员会”都是为了保证子弟军不蜕变成为“国家利益”而镇压的国军、为集团利益而械斗的军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兵变哗变，一方只需“统战”敌方的“师座”“团座”就可以使整支部队改变阵营。《亮剑》中赵刚就成功“统战”了国民党的一个师；日伪就策变了楚云飞的一个营。而这种整建制投敌的现象在子弟军的军史上却是极为罕见的。一个师长想投敌，别说带走整个师或者一个团啦，就是连警卫排都很难带走；甚至警卫员击毙投敌首长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支部队本来就不是你长官个人的，你长官凭什么带走？那支部队是工农阶级的部队，是受工农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的；长官不过是党的指挥工具而已。

正因为如此，《亮剑》中楚云飞也曾设“鸿门宴”用“民族大义”、高官厚禄、江湖义气来“统战”李永龙，迫于历史的客观性，作者尚不至于让楚云飞的“统战”成功，而是让李云龙用腰缠炸药的方式保持了节操。然而，作品中李永龙在犯了错误由团长降级为营长后，却仍然可以在全团发号施令；他搬到了营部，团参谋长就鞍前马后地把团指挥部也搬到营部，甚至和团党委书记兼政委兼代理团长的赵刚拧着安排全团名义的军事行动；而赵刚却表现出妥协和顺从。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团到底是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军还是李云龙的“杆子”？

若再往前走一步，假如李云龙的个人操守出现动摇，他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团带走了？假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就不是亮不亮剑的问题了，而是为谁亮剑，向谁亮剑的严峻问题！不保证子弟军的阶级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又怎么能够保证亮剑精神成为捍卫工农利益的军魂？又怎能避免“亮剑精神”回过头来把剑锋指向生吾养吾的工农大众？

为了阶级利益向一切压迫阶级进行战争，是子弟军的最高历史使命。任何其他的政治纲领、军事纲领、斗争方式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相反。为了阶级斗争可以“反蒋抗日”，可以“逼蒋抗日”，可以“联蒋抗日”；也可以暂时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可以寻找统治阶级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的有利时机断然武装割据，点燃阶级战争的星星之火；更可以在抗战胜利后，无视美、英等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存在，不去构思与虎谋皮的“联蒋抗美”，而是迅速地把战争转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大对决上。这一切都要看历史提供的条件和可能，一切都是为了阶级力量的生存、发展、壮大和胜利。一句话，**统一战线、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相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动摇了子弟军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最高使命，什么时候革命就受到挫折，阶级利益就面临被出卖的危险。

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基本观点而得到国际的支持，进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回到延安的王明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路线的。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令很多与会人员无所适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了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高举着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没有得到全党认同，投降主义路线竟然占了上风。

彭德怀回忆说：“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迂回抵抗。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年底，在武汉主持长江局的王明，背着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无视国共两党阶级立场的对抗性，向蒋介石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

蒋介石得知后“龙颜大悦”，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同商榷两党关系问题。从此，王明就成了蒋介石在中共中央的代理人。

13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领导”的主张，和蒋介石 “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要求内外呼应。

王明的立场变节已经趋于明朗。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连毛泽东如此正当的组织防范要求，都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而同意王明去武汉。决定还追加了一条规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姗姗回到延安。因为王明心知肚明，“一个月”的规定，不过就是给毛泽东一个台阶。

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彭德怀回忆说：“（会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这是军队阶级立场模糊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这种阶级出卖的路线如得不到纠正，李云龙哪天被楚云飞策反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1938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年以来和投降主义进行斗争的总结。现在的毛泽东虽已取得了党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对国际早已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于是毛泽东采取了“纲领肯定、哲学否定”“路线肯定、军事否定”“表面肯定、实际否定”“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投降主义的根基进行了变相

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崭新论断，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承认”“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毛泽东的“承认”不是为了执行而是为了抵制。

毛泽东接着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这段话可概括为：**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实现阶级合作**。

毛泽东继续讲到：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内容，民族斗争是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服从于内容。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命题进行了证伪**。

接下来，毛泽东在整个下一部分用从具体分析出发，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执行性，得到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目的；为党的指导思想彻底扭转做理论准备。

按照投降主义路线的发展，即使李云龙不被楚云飞策反，也难逃被楚云飞一口吃掉的厄运；“皖南事变”就是最好不过的教材。

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委员项英等人，深受王明书记投降路线的影响，这些“海归”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所做出的领导，对毛泽东这位山沟里的“泥腿子”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为皖南新四军的悲剧奠定了政治基础。

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内的最高负责人，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还和王明沆瀣一气，强调“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坚持的方针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所造成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而不认为是国民党反动立场的体现。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时，项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全军覆没。有历史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立场”。

作为指导新四军组建并长期代表中央领导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时担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事变发生后，悲愤交加，在新华日报上奋笔提书：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但是周公是否能认识到，正是他的“同根”“同室”观念才是悲剧的根源？

周公也许没意识到，从陈胜在大泽乡和秦二世开“操”，到东汉末年魏、蜀、吴相“操”，到李闯王和大明王朝恶“操”...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五千年“同室操戈”的历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操”，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操”，皇权和割据势力“操” ... ...这些“同室操戈”无论从次数和烈度，都远远超过和外族的“室外操戈”。

周公应该还记得，1927年，是自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的第87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1175件“Unequal Treaty”和“Imposed Treaty”（不平等条约和强加条约）的凌辱和重压。辽东半岛和台湾正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着；美、英、法的军舰还在中国内河里横冲直撞，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还在中国的领土上执法，24处“国中国”的租界林立于中国的大地... ...但是，就在这年的9月9日，毛泽东高举起“斧头镰刀”的鲜红旗帜，进行秋收暴动和武装割据，毅然决然地“同室操戈”！

周公更不应该忘记，就在8年前，身为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周公，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拉开侵华序幕的严峻“民族危机”；不接受毛泽东迂回地、游动地、秘密地“操”的诀窍；公然排兵布阵、有声有色地和蒋委员长大搞“同室操戈”，结果呢？“操”不过人家，开始了“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美名其曰的“长征”。

仅仅悲愤交加，奋笔提书是不够的；周公应该牢记，工农子弟军存在的理由就是和压迫阶级“操戈”不管他是来自“室内”还是“室外”！“皖南事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心里还记挂着工农子弟军的阶级使命，就不会为来自阶级敌人的进攻感到意外。

皖南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淡薄了工农子弟军的阶级使命，什么时候就面临着被动挨“操”的危险。操在手里的“剑”都会掉落！**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段斗争历史曾作了简要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 ...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阶级斗争不仅是民族斗争的目的，而且是民族斗争的条件。

试想假如没有毛泽东带领红军用血与火的残酷手段突破阶级敌人制造的灭顶危境，而是被消灭在大渡河畔；那么，统一战线就不知道由谁来“统”了。

在《亮剑》故事的一开始，已经是八路军团长的李云龙，和晋绥军的楚云飞上校称兄道弟、膀子拍得不亦乐乎。假如我们把开端设定在1927年以前，楚云飞作为阔家少爷，李云龙作为楚家的放牛娃，故事就完全两样了：李云龙每天起早贪黑放牛去，楚少爷去省城上军校，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日本鬼子打到了家乡，富有民族气节的楚少爷拉起了抗日的队伍，已经长大的放牛娃最多不过是给楚司令当当马夫，而能够称兄道弟的可能甚小。也许楚云飞通过留学东洋的同学和山本一木拉上了关系，相互间云飞君山本君吆兮吆兮起来了，也还轮不到你李云龙。

凭着血性，也许李云龙不会甘心一直给楚云飞的小老婆端洗脚水，但最多也不过就像作品中的谢结巴一样，拉起几十个弟兄呼啸于林莽之间，打劫一下山本一木、楚云飞们的补给队，干干杀富济贫的勾当也还是有可能的。但若想“亮剑”，那可就是活得不耐烦了，结果还不是被另一个李云龙剿灭砍脑壳？

总之，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革命家举起了秋收暴动的长矛梭镖，开辟了以暴力和战争进行阶级斗争的解放道路，并在血淋淋的阶级对杀中一天天生存发展下来，就凭你李云龙还想“亮剑”？你亮个屁！“亮”把水果刀怕你也找不到！

《亮剑》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故意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他没忘而希望别人忘记这一点：**阶级斗争是被压迫阶级参与民族斗争并在民族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忘记了这一点，即使民族斗争胜利了，工农阶级也不过是“为人做嫁衣”“狗咬尿（shui）泡空喜欢”一场。

二、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过程。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战争主体观”**。阶级立场解决的是**“为了谁”**的问题，“战争主体观”要解决的是 **“谁来战”**的问题。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革命积极性进行战争？还是靠军事精英的“民族大义”“英雄主义”所构成的“亮剑精神”进行战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其他唯心主义和政治骗子的试金石。人民战争思想不仅不排斥朴实的民族感情和英雄行为反而予以提倡，但和“民族至上”“英雄主导”等各种欺骗人民、垄断历史的“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一系列伟大著作中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光辉原理：

无产阶级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无产阶级的战争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动员了广大军民，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缺陷，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

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

拉拢越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坏事。谁个不希望自己的“粉丝”多多？炮灰多多？蒋介石就提出过“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的口号，要求全国军民人人争当“精忠报国岳武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人民战争”呢？

然而，历史不是靠一厢情愿书写的。

在毛泽东这里，人民战争是建立在是工农利益基础上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密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军事体现，具有独一不二的阶级专属性；不是任何其他阶级和个人都可以学习和掌握的法宝。**没有鲜明的工农立场就没有人民战争，没有全心全意的群众路线就没有人民战争！**

而蒋先生的所谓“人民战争”不过就是靠鼓吹“民族大义”忽悠人民当炮灰。需要时要求你“精忠报国”，不需要时打你个“暴民聚反”——老佛爷对待“拳匪”的那套把戏，统治阶级们没有不精通老练的。

对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小资们也许很情愿接受，接受了也没啥了不起，大不了就是跟着委员长喊喊高调，反正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接受过了感觉有风险还可以跑昆明去搞搞联合大学。而没地方可跑的劳动人民自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读者们熟知的，另有一部更加伟大的作品《中国震撼世界 》http://www.chinashakestheworldbook.com/却是读者们不常听到的。为什么说它更加伟大？如果说前者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激情”，而后者则记录了“中国革命的理性”；为什么说它“理性”？因为它告诉读者：**“除了革命，中国别无出路！”**

作者杰克·贝尔登写道：“一九三三年在热河... ...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苏拉密注：相当于从北京到信阳，河北河南两个省的面积）。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

杰克·贝尔登用英语记下了中国农民惊世骇俗的语言："We don't know the Japanese. We know our own governor. If we can eat his liver and drink his blood, that's enough."

——“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华北。从“七七事变”起，从宛平到安阳，只有短短119天，诺大的华北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几乎没有发生像样的民众抵抗就全部沦陷了。

直到八路军来到华北，建立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惩办恶霸劣绅汉奸，实行减租减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战”“回民支队”“铁路飞虎队”“芦荡雁翎队”... ...等有组织的民众抵抗才开展起来，并形成燎原烈火。

历史还没有静止，比热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还在发生着。1942年，蒋介石集团不顾人民的死活，以“民族大义”为名，进行横征暴敛，置民众于濒临灭绝；从而激发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几万政府军被百姓缴械。**

以下为背景资料，建议耐心品读。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

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

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 **“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 1948 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毛泽东一边。

当有人像汤恩伯一样责骂河南农民时，杰克·贝尔登用英语记录了河南农民理直气壮的回答："could the Japanese be worse than the army of Chiang Kaishek? " ——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宁愿做亡国奴，也不愿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这就是建立在“民族大义”基础上的“人民战争”！

看到：“不让粮食资敌” “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的口号和说辞，我不禁想起了张宏良在那篇著名的“宰相”文章里的论断：

“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我想，张先生还应该在宋江、岳飞、左宗棠后面再加上“蒋介石”和“汤恩伯”的英名。我不知道“真诚地”歌颂蒋介石、汤恩伯的会是些什么人，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绝不会是河南的老百姓！在张先生这里，“民族大义”不过就是“造反有罪、镇压有理”的不同表述罢了。也许还应该有更加敏锐的某些先生们能从事件中到处忽闪着说的“教会”、“西方记者”、“《时代》周刊”等字眼，惊觉出“颜色革命”的影子... ...

战争的阶级性决定了群众的广泛性；群众的广泛性验证着立场的正义性。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把“人民利益第一”作为最高原则，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支持、参与；人民群众才能自觉地成为战争的主人。无论是民族战争还是阶级战争。从《鸡毛信》的羊尾巴到淮海战役的小车轮；历史已经证明，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亮剑》是漠视群众存在的的。在《亮剑》中，李云龙更注重武林高手的网罗，李云龙乐此不疲，从出自少林的和尚到学艺武当的段鹏。然而，作为根据地军事首长，李云龙对群众武装建设却只字不提。作品中唯一的群众角色就是李云龙的首席老婆秀芹，而秀芹的作用也不过是为了给李云龙攻打县城穿针引线。作品中还描述了一个区小队在为李云龙攻打县城的打援阻击中全队玉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鲜血装点着李云龙的“民族大义”和英雄之路。 李云龙毫不走样地实践着蒋委员长在“9.18事变”后的那段著名格言：“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电影《三毛从军记》再现了这个情节）

蒋委员长的“岳飞梦”也还是有实现的日子的。长春，曾经做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日本人在时叫“大同广场”，是日本人专为溥仪皇帝修建的。苏联红军把日本人赶走了，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纪念塔，塔顶上是一架飞机的模型，他们改名为 “乌托邦广场”。后来，党国的人来了，在那里悬挂起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两边还挂出两条巨幅标语：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令人惋惜的是委员长的两个“至上”并没能阻挡住工农大众翻身解放的欢快脚步。

第四章 “亮剑”是一株毒罂粟

一、改革开放——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回归

80年代初，随着对大跃进、文革的否定，“动乱论”、“崩溃论”击碎了“阶级斗争”、“大公无私”等固有的价值体系。失去价值观的中国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飘摇踌躇。废墟上是构建不出任何秩序的，包括剥削的秩序。

中国呼唤着新的价值观。

这个过程也是总设计师“换脑工程”的重要一环 。

1981年3月20日的深夜，一位“老朋友”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了中国。

这天，世界杯男排亚洲区预赛“中国-韩国”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胜者将代表亚洲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

中国队在先失2局的绝境中连扳3局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权。

比赛结束后已是3月21日的凌晨，北大学生点燃扫帚当火，敲着脸盆当锣鼓，高喊“振兴中华”的口号举行了自发的游行。

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纪实通讯，结尾这样写道。

“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大学生的喊声。

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从此，“振兴中华”成了一个时代的口号。那天，也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回归。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并驾的主流价值观，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民族崛起而改革开放”成为“社会共识”。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无处不闪烁着民族主义的影子。我们高唱着“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理直气壮地学习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先进经验一路走到今天；我们骄傲中华民族盛唐的辉煌，我们学会了桑拿浴鸳鸯浴花瓣浴，创作了超女快男杨贵妃大赛，接受了韩熙载们奢华的合理；我们分享中华民族大宋的富庶，我们营造了了潘金莲舞楼西门庆大药房清明上河苑… …

二、“亮剑”是一株毒罂粟

左派曾热衷于批判《色戒》，而对《亮剑》却熟视无睹甚至赞誉有加。认为《亮剑》弘扬了“民族正气”。

假如你一个人在家里看《色戒》，忽然你的女儿回来了，你会不假思索地关掉节目。假如你在看《亮剑》，你的儿子回来了，你会和他一起看下去，一齐为李云龙、楚云飞们的“民族大义”喝彩叫好，在叫好声中毛泽东思想远我们而去。

《色戒》是一瓶毒药，但商标上也注明了“剧毒”，反而危害不大。《亮剑》是一包奶粉，商标上写着营养丰富，暗里却包含了“三聚氰胺”，让你不知不觉地成为“牛黄制造体”。

《色戒》是一泡屎，你吃一口就感到了臭，《亮剑》是一包鸦片，你吃几次就再也离不开。

和《亮剑》同样成功的还有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大宅门》用点滴入微的情节刻画了资本家白景奇的创业、骨气、潇洒、刚毅、果敢以及怎么都不能忘掉的“民族大义”… …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羡慕，以至于连他为了取乐造成郑老屁吃饭撑死的事都让人恨不起来。

然而，《大宅门》至少还不至于误导人们把白景奇当作“毛泽东主义者”。《大宅门》不过是告诉你怎样去做一名好的民族资本家；就算是个民族资本家“培训班”，却也面临着学员“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当今社会能有多少 “资本家岗位”等着你去“上岗”？学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还不如跟“民族教练员”郭台铭练高台跳水容易获得成功。一种学员很难就业的学校，怎么说影响力也十分有限。

而《亮剑》对毛泽东思想的偷梁换柱却骗过了多少观众？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想，回答“为人民服务”的肯定不在少数。我觉得有必要通过一则寓言来说明这个问题：

古代有个国王很喜欢鸟。有一天，国王得到了一只非常美丽的鸟，国王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鸟的身上。国王给鸟送来最好的美酒，最好的鹿肉，让乐队给鸟演奏最动听的音乐，让裁缝给鸟制作最华丽的衣服… …几天以后，这只鸟死了。

从国王的角度出发，他已经是最“全心全意地为鸟服务”啦；但是，从鸟的立场看呢？你这哪里是“服务”，分明是迫害吗！你越“全心全意”我死得越快，你“半心半意”我倒还能多活两天。

这则寓言说明什么？是说即使是服务，也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错了，服务也有可能变为迫害，越“全心全意”，迫害也许更为严重！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立场第一的阶级斗争理论。为谁服务就从谁的立场出发，而不是像刘少奇包办代替地替工人认为：“工人阶级欢迎剥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最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做到和劳动人民心连心，才能够把人民引领上一条正确的解放道路。“为人民服务”是建立在毛泽东阶级理论这个核心和基础上的行为准则，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

亮剑的要害就在于用“民族大义”来混淆、置换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阶级斗争理论。

“宪政时代”与“屁股时代”（“网游”启示录）

一、顶呱呱的“宪政时代”

经常不得不和“民主派”朋友谈“宪政”这个纠缠不清的话题。

“宪政”的准确定义是什么？本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按我的理解，宪政就是**程序公正**。宪政是不在乎规则**合理性**的，而只在乎规则的**平等性**。比如，足球规则就最不合理：规定不准用人类进化最完美、最灵巧的手，而只准用脚；从合理性上讲，这简直是没天理啦！但是它平等；因为双方都只准用脚不用手。因此，只要不“黑哨”，足球就是“宪政”。甚至按照民主派朋友们的理念，即使黑哨，足球也仍然是宪政；因为黑哨并不是宪政本身的问题，而是裁判违反宪政的问题。假如有一天能够让计算机担任裁判，就可以杜绝黑哨，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宪政”。

可见，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政的基本内涵。

然而，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理想状态的宪政；为了研究，我们按照宪政运行方式，设计一种虚拟的、理想化社会模型——“网络游戏”（Online Games），简称“网游”。

在网络游戏里，玩家可以选择扮演商人、工匠、农夫、猎人、武士、法师、探险家、强盗等各种角色，去模拟社会，去追逐财富和成功。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游戏规则是否合理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在于游戏规则是程序设定的，是计算机执行的。因此，对任何玩家都是**绝对“公平”、绝对“宪政”**的。

那么，就请一起进入一款假想的网游，去领略宪政带给玩家的平等、合作、阶级、压迫、专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字塔型社会”、“橄榄型社会”**。我们姑且把这款虚构网游称作“宪政时代”。

啊，网游“宪政时代”开服啦（开服：指服务器启动）！对于玩家是个好消息。让我们下载客户端，注册 ID,登录服务器，开始我们在“宪政时代”的冒险生涯和爱恨情仇。

因为是新开的服务器，所有玩家都和我们一样是低级小号，怀揣着服务器配给的100个金币的启动资金，佩带着服务器配给的最简单装备进入游戏。早一点进来的最多也不过10级（服务器系统设定第一阶段满级为100级）；大家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着宪政带给大家的**平等**。

和所有的网游一样，“宪政时代”也同样需要玩家打怪积累经验升级和捡取掉落金钱、物品积累财富。我们作为最低级别的小号，最早要打的是一种叫做“史莱姆”的软体生物，此生物攻击和防御都只有1，很容易打，即使不使用武器，徒手也能将其拍死。每消灭1个可获得10点经验并有几率掉落1个金币。级别稍微高一点的玩家在不远的草场打性格温顺的绵羊，打1个可获得50点经验，并有几率掉落5个金币和羊毛，羊毛可以卖给NPC 商店（NPC：非玩家控制角色）或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玩家用于制作纺织品。更远是豺狼出没的郊外，目前尚没有玩家能到那里练级，豺狼除了经验多、金钱多、狼皮贵外，还有机率掉落最低级的装备——小刀，狼群里还可随机刷出 BOSS（头领）——狼王，狼王的生命、攻击、防御均为豺狼的2.5倍，经验及其它价值均为豺狼的7.5倍，掉落小刀的升级版——短剑。不练到20级，没人敢到那玩。

由于中国具有太多的待业青少年和混文凭的在校大学生作为玩家人群，一般说来，只要是新游戏开服就熙熙攘攘、人满为患。

人比怪都多，难免会发生抢怪、抢掉落的现象，这是资源相对短缺造成的，一点也不奇怪。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和别的玩家组队。组队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队伍里，只要有一个玩家打死了怪，他得到怪物的本有经验，其他队员也都分别获得主攻者所得经验的50%。这样，**“合作化”成为解决资源短缺和加速个体共同成长的有效途径**。

地窄人稠，在组队的情况下，队员没必要个个挤上去砍杀，有的可以专门捡钱，有的专门跑商店买药水，有的把怪引到一起，让法师用群攻技能集中消灭，有的负责给失血的武士和魔力消耗的法师加红蓝药水，有的给参战人员施加保护法术和医疗术，有的在阵外引吭高歌鼓舞士气…好一派**社会主义劳动**热火朝天的场面。有的暂时分配不到工作就躺在草地上吃“大锅饭”；或者一直挂着不管，靠优厚的“社会福利”积累经验，玩家本人该上班的上班，该看书的看书…这时的**“劳动”**，更多的是娱乐的**需要**和充卡买来的游戏**权利**，这和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劳动**性质极为相似。

在这个阶段，人与人的关系是很融洽的。会有很多玩家加你好友，相互交流练级的经验、加点的方法，甚至通电话相约上线成为现实中的朋友。每次登录游戏，都会得到系统温馨的提示：“您的好友×××、×××…已经在线”，也会把你上线的消息告诉对方：“您的好友×××上线啦”；这种**平等**、**合作**、**友好**的气氛是游戏的其他阶段难以营造的，就如同成年后虽然有很多朋友，却依然难忘儿时的伙伴一样。这个阶段，往往是玩家们最为怀恋的。

不久，友好的气氛成为“过去的好时光”，**社会**出现了**分化**。首先是夫妻、弟兄同练一个号的职业玩家靠多人轮换操作，24小时连续在线，用最快的方式冲高等级，他们靠打取装备卖人民币为生。在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极为稀缺的中国，用这种手段谋生，也算是一中无奈的选择。还有一些“老板玩家”，他们让秘书、司机、跟班轮流冲级，老板自己只是在酒足饭饱后上来炫耀一番靠人民币购得的极品装备，或是为满足自己的“虐待狂”心理，杀几个人施展淫威。

能够造成分化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一些懂得编程的玩家，开发了“外挂”程序，玩家本人脱机，用程序操作角色全天候练级，或是一些玩家发现了游戏 BUG（游戏系统漏洞），比如把怪引到某个特定地点消灭会获得比正常高几十倍的经验，或者在某个特定场景把钱扔在地上再捡起来会增加几倍。

我们讨论的是“绝对平等”的“宪政”，为了使“理想主义的宪政主义者” 能够死心塌地接受我们的研究成果，这里我们假定：“宪政时代”游戏系统不兼容任何“外挂”、不存在任何“BUG”等或可被认定为“作弊”的因素；这样就可以排除我们的“宪政 ”遭到质疑。

按理说，即使有“外挂”和“BUG”也仍然是宪政。因为游戏系统的程序和漏洞是平等、客观地摆在每个玩家面前的，你开发不出“外挂”是因为你的能力低，你发现不了“BUG”是因为你的运气差。这和“职业玩家”“老板玩家”用在线时间和社会实力打造角色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任何玩家面对的都是同一台**客观**、**平等**、冷冰冰的服务器；而且外挂也往往是“职业玩家”开发出来的，“老板玩家”雇用的练号人也经常是“职业玩家”，这使得作弊和“职业玩家”“老板玩家”更加难解难分。

虽说服务器依然“平等”，但阶级分化却继续在扩大。当大多数娱乐型普通业余玩家还停留在30级（小号）打老虎的时候，已经大约有10%左右的职业玩家、老板玩家练到了80级（大号），他们在练级岛的某场景中杀一些神兽，比如阿努比斯等；另有30%左右靠游戏消磨时光的“有闲玩家”也练到了50级（中号），他们在练级岛杀一些大型生物，比如巨蜥等。以我们小号目前的能力，走不到那里就会被怪物“挂”掉。

虽说只是一款游戏，游戏里不存在阶级剥削，却可以进行**阶级压迫**，从而打破了游戏**平衡**。

由于“职业玩家”对装备、游戏币等游戏资源垄断经营的需要，他们会联合封堵中号通往高级的道路，他们或者轮流把持固定的 BOSS 刷出点，使其他玩家不得染指；或者干脆封锁练级岛，谁进去就杀谁；杀得你将倾家荡产变卖所有有价物品刚刚购得的武器掉落，逼得你回去重新回去打羊攒钱再买短剑去打狼打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虽说杀人会“红名 ”（犯罪标记），回到城市会被“赏金猎人”捉拿投入监狱，但他们可以连续半月不回城，需要买卖装备药品可以让还没红名的轮流跑交通，直到哪一天玩累了需要睡觉，才回城去“挂监狱”，一觉醒来刑期已满。甚至有的可以行贿典狱长 NPC，前门进、后门出，和现实社会一模一样。

中号晋升的路被封死了，就只能回到原地和小号们混，他们如法炮制大号整他们的手段来整小号。中号也很苦，他们都50级了，现在升1级要100万的经验，要是能去练级岛杀巨蜥，杀1只5000经验，升1级也就一天的事，现在回来杀500经验的老虎，要杀多久啊！虽说凭他们现在的攻击力砍老虎可以一刀一个，但也得有那么多老虎给你砍。老虎不够砍就砍狼，可怜的小号们被重新压回到绵羊地。30级后升1级要20万经验，绵羊才50经验，升1级要杀4000只。就连绵羊也很难平平安安地杀，刚引来引去团聚了20只绵羊，准备让小法师用“风雨交加”来个群杀，突然跑来一个中级法师，抢先发动“暴风雪”给你抢了。

中号和小号难道不能合作吗？不能。按照一般的游戏设定，在组队的情况下，低级带高级，高级的可以获得低级所得经验的50%，如果是高级带低级，会按级差递减。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小号不劳而获。假如不这样规定，一个大号带一个1级小号到30万经验的顶级 BOSS 那组队刷经验，大号杀一个 BOSS 小号就可以升12级，杀5个就可以升到30级；这就很有点“世袭制”的味道，会严重影响游戏的“宪政精神”。所以，一般都是低级带高级。但是，让30级小号们到老虎区去带50级中号，你10刀才能砍死1只老虎，人家嫌你慢，人家不愿意让你带，让你挂在队伍中刷经验吧，你和人家相差20级，人家杀死1只老虎你所得到的经验只有20点，还不如回来挂在绵羊这里。

可见，即使是合作，阶级划分也在起着主要作用。你想和高层左派一起喝茅台，人家也得能看得上你，与其还不如和本阶级的小右一起喝杯二锅头来得痛快。

小号占60%、中号占30%、大号占10%的格局形成了，这就是人见人爱的**“金字塔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级高就是硬道理，有钱就是硬道理；原先看似人人平等的“宪政”程序越来越有利于大号们，**“宪政”已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资产阶级专政”**。可见**“宪政”和“专政”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大号们当然可以说，这种状况是合理的，平等的；因为我们的级也是一刀一刀砍出来的，是个人利用平等规则打拼出来的，不是像金二那样从他爹那继承的。你小号哪天练到大号，你也同样可以这样对待新来的小号，没人认为这不可以，所以**“很平等很合理”**。

认真说来不就是一款游戏吗？不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吗？平等不平等合理不合理有嘛要紧的？但是，游戏开始萧条了，“宪政时代”的**社会正在走向瓦解**。

打不出经验，升不了级，积累不起财富，还经常被杀得掉武器、金币，衣服有时都被掉得一丝不挂；无奈了，就跑到城门口赏金猎人旁，在**“法律保护”**下用公屏骂那些杀你的人，骂得五彩缤纷。骂一骂虽说很解恨，却种下了更大的祸根——被骂的会追杀你，你连出城都提心吊胆。

终于有一天你觉得玩得很累很累，我每月充百来块的月卡，难道不是为了来买开心吗？难道是为了被追杀被压迫吗？难道我疯了？我是自虐狂？在一连串的问号驱使下，你越来越懒得登录，越来越惧怕原来盼望不及的游戏时间。直到有一天，月卡到期了，你决定不再充值。

你、我、他，小号的2/3,中号的1/2都逐步淡出了游戏，喧嚣的服务器开始变得冷清，离“合服”（服务器合并）的日子不远了，好端端的“宪政时代”眼看着就要被“宪政”自身搅黄了。

怎么办？“宪政时代”运营商管理层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游戏的命运。有人提出要修补 BUG 和杜绝外挂，有人提出要延长杀人者的牢狱时间，并追加高额罚款…七嘴八舌，每个都不能说没道理。

这时，有一个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

（1）将角色满级上限由100级调至200级；

在200级面前，80级也勉强能算中号，起点再次被基本拉平。这就很有点像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和金正日的**“货币改革”**。

（2）角色消灭一个怪所得经验由原来等于怪物经验 n 调整为 n（200-X）%；（X 为角色级别）

原来分别为0级、50级、100级、150级的角色消灭1只老虎的经验都是500；使用这个公式后，现在分别为1000、750、500、250，消灭一个顶级 BOSS 原来都是30万，现在分别是60万、45万、30万、15万；

（3）角色在 NPC 商店交易物品的价格也做出有利于小号的类似调整，购买价调整 为 n（200+X）%，出售价格调整为 n（200-X）%；（n 为物品原价）

一个150级的大号想买一把原价30万的方天画戟，现在按 n（200+X）%计算为105万。

也就是说，级别越高获得经验的难度越大，买东西就越贵，卖东西就越便宜。这就很有点像北欧大比率征收富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

规则改革后，大号对小号的态度由不屑转变为讨好，要买东西的大号要找小号帮忙：“小妹妹，帮大哥买件武器吧”；一个150级的大号假如想到顶级 BOSS 那练级，累一身

臭汗也只能得到15万经验，假如他是190级，那就更惨，只有3万；假如他和30级小号组队去练，大号把 BOSS 杀得只剩一丝血，然后让小号杀死，小号获得51万主攻经验，大号获得主攻者的50%，即25.5万，比自己杀多出10.5万，身边还多了个边练级边聊天的朋友。为了防止小号被 BOSS 挂掉，大号还得给小号配置极品的装备、武器；级别越高的号，越得巴结小号。

原来被追杀被歧视的小号成了游戏里的香饽饽，级别越低，规则对你就越有利，我们姑且称这种社会有利于小号的体制为**“无产阶级专政”**。

小号不仅自己杀怪经验多，还有很多大号拉你去组队杀大 BOSS，升起级来就非常容易，很快就升到100级成为中号，而中号向高号挺进很难，还必须借助和小号合作，大号向满级挺进则更难。于是，角色越来越集中在120级左右，**“橄榄型社会”**形成了。

更多的失落者重新回来了，服务器再次热闹起来，无产阶级专政拯救了社会的没落。在这里，虽依然可能存在着纷争和 PK，但**合作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当然，原来的那些大号，会很不满意这次规则变动，认为侵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会在游戏论坛上发帖骂那么几天，甚至直接在游戏公屏上开骂，同样骂得五彩缤纷，但不会有人追杀他们。

假如他们能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维，这样想一下：如果游戏一开始就设定成这种规则，那不同样是对任何玩家都平等吗？那不同样是“宪政”吗？所不同的是现在是中途才改变规则，他们获得既得利益后再改他们就认为吃亏了。如果改变规则时人们所处的地位相同，我们还有理由骂吗？假如能放弃既得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不同样是宪政吗？**

哦，想开点吧，“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我们的结论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机遇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平等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抽象的、普世的平等；平等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概念，在阶级社会里它首先具有阶级属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凡是能够推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就是真正的平等。**就游戏而论，平等的意义在于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玩下去。**

下部分“屁股时代”将在本部分的基础上，同样借助于网游过程，揭示**“阶级地位决定阶级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批判小资产阶级 “觉悟决定论”“认识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二、“大衣”覆盖着的“屁股时代”

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回到“宪政时代”规则改变前的游戏中。

“职业玩家”和“老板玩家”们继续在 “平等”的游戏规则和环境中优哉游哉地晋级，在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阶级意识**也在成型：老子是在平等的规则下脱颖而出的精英，老子的成就来源于自身的勤奋、勇敢、智慧。老子现在享受资源是我们一刀一刀练

出来的结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假如也练成老子这样，你也同样可以获得这种待遇。在你没有足够的等级和老子对抗的情况下，你要来抢怪，那老子就顺手“挂”掉你，你要是开骂，老子就不客气地追杀你。这一切**天经地义**。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号们满级了，大号们摆脱了杀怪升级的枯燥，开始品尝功成名就的乐趣，同时也把游戏带入了“PK”阶段。职业玩家为了给装备做广告，不停地找中号杀；以此激发中号购买装备的需求。老板玩家为了显摆极品装备和练习“PK”技巧，见谁杀谁。

日子就这么过着。忽然有那么一天，一个老板玩家杀人杀腻味了，他决定封存这个满号，另行注册一个新号开玩，这次他不想再让下手们帮助练号，而是要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娱乐玩家，工作忙完的时候上来轻松一下。于是，他重新注册了小号，加入了小号们的杀羊队伍。

“幸福在于过程”，作为一名普通娱乐玩家的小号，现在他希望的就是自己独立去体会游戏的快乐。

可惜，事与愿违。他遭到了和其他小号同样的厄运。原来是杀人，现在是被杀；原来是垄断，现在是被剥夺，原来是压迫者，现在是被压迫。一次次被杀，一次次怒火中烧，终于有一天他也开始骂人了，开始被追杀了。

这时的他该怎么想？他还会认为杀人是平等的？压迫是合理的？垄断是应该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这时，他的想法应该和大多数的娱乐小号一样：老子不过只是想玩玩，寻找点快乐，竟这么难！该死的游戏，该死的规则，该死的“宪政时代”！

还好，他毕竟还是现实中的老板，游戏中的失意和苦恼可以从真实世界里补偿回来。

以上的案例说明，**阶级地位决定阶级利益，阶级利益决定阶级立场；地位变了，利益、立场也会随之改变**。即使是同一个人，哪怕是现实社会中的地位都丝毫没变，仅仅就是在游戏中所处的地位变了，他就会对游戏规则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的真理性所在。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也是这样——大致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大致相似的利益诉求，产生大致相似的立场和价值观。

一些小资产阶级，在左右斗争之时，把“屁股决定脑袋”的口诀背得麻溜顺口，以此来批判对方的“反动立场”是其利益决定的，但在面对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之时却显得结结巴巴。

当小资在声嘶力竭捍卫国有银行的时候，农民工说：关我屁事；

当小资在众志成城抵制家乐福的时候，失业工人说：能便宜1分就买；

当小资在沙龙、公园放歌缅怀的时候，劳动阶级在劳工市场插标待售；

当小资在义愤填膺声讨范跑跑的时候，全国人民看到老大娘摔倒就“跑”开；

……

于是，小资产阶级嘟嘟囔囔：“没觉醒”、“不觉悟”、“不觉悟的工农算无产阶级吗？”。

那么，到底什么是阶级？谁才算无产阶级呢？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可见，阶级指的就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阶级就是根据所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来划分的。只要你处于哪个地位，就属于哪个阶级。**阶级是客观经济地位的划分，而不是主观认识的划分**。

显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人，那些由破产农民、农民工、失业工人、体制外劳动者等所组成的广大阶层，就是当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不管他们觉悟不觉悟，不管小资们心里认可不认可、嘴上嘟囔不嘟囔，都改变不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客观现实。

面对世界、面对利益，他们对待事物会有一个判断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管和你小资一致不一致，不管你小资接受不接受，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这个出发点都叫**“无产阶级立场”**。

小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关于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的定义和论断是一万个不打算承认的，承认了这个，无异于否定了自我标榜的“无产阶级代表”身份，他们会搜肠刮肚地找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小资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例子，来证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与生俱来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天然享有的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地位与阶级立场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就单个阶级成员来说，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之间并存在“一个萝卜一个坑”机械对应。而是**作为群体符合“大数效应”——概率论**。也就是说，考察单个成员的立场也许是不确定的，而考察群体，就会发现，他们的立场有90%符合自己的阶级地位。

同时这也说明，在每个阶级的成员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则相对较多，都有一少部分本阶级的叛逆。毛泽东、澎湃就属于从小资产阶级叛变到无产阶级阵营来的知识分子。

之所以是毛泽东、澎湃，而不是陈独秀、王明能够叛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这也是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深入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实践，为无产阶级所为，想无产阶级所想。这为他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奠定了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只有从实践上首先转变为无产阶级才能从立场上转变为无产阶级**。这个过程用基督教语言表达，就是“以主性情行事为人，方能与主合二而一”

一个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从思想到感情上认可无产阶级为同类，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阿•托尔斯泰用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形容小资产阶级通往无产阶级立场的艰巨与遥远。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坦诚：一生都没有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

为什么转变如此困难？我们刚才说了，其他不同阶级地位的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依赖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是具有强烈阶级性的**，超越阶级的社会实践是十分苛刻的。比如：一个穷人很难去实践高尔夫球场的绿茵与阳光；小资的口袋里一旦还有几枚铜板，就很难实践到饥饿的滋味。这也使我们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要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意义；一些小资产阶级从“唤醒工农”到“先做工农的学生，再做工农的先生”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然而，距离毛主席要求的“永远做工农的小学生”仍然艰巨而遥远。注意，毛主席在这里要求的是“小学生”，不是“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更不是启蒙者和导师。

小资产阶级以启蒙者自居，他们的所谓启蒙，说得好听一点叫**领导**，说得难听一点叫**利用**。说来说去不过就是要无产阶级按他们规划好的路线行事；工农假如不听话，那就叫不觉悟，更加认为“唤醒”的迫切性、重要性、使命性、崇高性。这也是小资为什么要用“左”“右”划分来代替阶级划分的内在原因：用左右这个认识性的概念来取代阶级这个客观性的概念，并强调认识决定立场，而不是阶级决定认识，说到底是为了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难道无产阶级的立场真的会按照小资产阶级启蒙的方向去“进步”？我看那是妄想。在我看来，反而是小资产阶级更加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启蒙。在立场问题上，无产阶级从来比小资产阶级坚定、明确多了；只不过和小资的不同而已。

当小资产阶级在声嘶力竭地号召捍卫国有银行的时候，农民工说：“关我屁事”——这就是立场！

想想看，假如银行被日本收购，那么，因为语言、管理传统的不同，高、中层管理人员都要从日本带来，甚至因为讨好老板娘笨手笨脚，因为喝不惯清酒，坐不惯榻榻米，泡不好温泉浴，谈不出村正妖刀，剪不出和式园艺…等会影响团队生活圈的和式小社会的营造，连一些下层管理、园丁、厨师都要从日本带来。一下子就打碎了多少原国有银行体制内小资的中产梦!

然而，对于那些送纯净水、送盒饭、打扫卫生、冲便池、擦玻璃、勤杂工等体力劳动岗位日本人是不会带的，无产阶级该干嘛干嘛，可不“管我屁事”吗？兴许，人家还不兴搞“黑砖窑”呢！

小资会说了，不兴搞“黑砖窑”，可能兴搞“南京大屠杀”、“731”；那么我们问：南京大屠杀死了几个人？据说是30万吧？1938年委员长扯起“民族大义”，扒黄河让中原老百姓学游泳，直接呛水死亡89万，诱发饥荒瘟疫死亡300多万，合计400万。“731”据说用了好几百个活体“原木”；1942年委员长穿着“民族大衣”，在河南推行“不留一粒粮食资敌”政策，用活体实验人类耐饥饿极限，一次性消耗“原木”300多万！这么一比“南京大屠杀”、“731”还真不算是最可怕的。

小资们还会说，日本人会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牌，其实日本人想表达的意思是“华人男小资和女小资怀抱的宠物狗不得入内”，只是因为夷人汉语差，才误写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想想看，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来说，他们随时可以多重国籍，掏出绿卡来，你还能不让我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你就是啥牌牌也不挂，无产阶级有机会不顾肚子空瘪而去奢侈地逛园子吗？对于穷人来说，还用得着等日本鬼子来挂牌牌？你没见

现在很多“民族资本家”开设的星级宾馆都挂着“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牌牌？这不就是“农民工与流浪狗不得入内”的意思吗？

小资们还会说，日本人还会制定出“高丽人、支那人不得食白米”的条条；确实，日本人当年在满洲制定过类似的条条，但东北同胞还可以吃一些棒子、高粱、杂合面，倒是委员长大肆提倡“国人多喝环保牛奶，抵制转基因”的新文化运动，结果让河南连观音土都挖完了，仅1942一年、河南一省就饿死300多万人！

小资产阶级唬扯着“民族大义”，遮挡着实实在在的本阶级利益。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是“皮袍下面藏着‘小’”，大旗不过是虎皮，虎皮是为了包裹自己的阶级利益。

我们考察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在传统戏曲剧目中，宋朝题材所占份额最多，什么杨家将，呼家将、杨门女将、穆桂英、岳飞传、包公传…剧中到处弥散着“保大宋”“清君侧”的情节与说词。

元代是戏曲创作的高峰，这些剧目大多出自元代文人之手。难道亡国腐败的宋王朝就那么值得文人们泼墨如水？

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元王朝主政中原以后，废除了文人赖以寄生的科举制度。那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潦倒文人，为了混一口饭吃，被迫到班子给戏子写唱本，到青楼给妓女写流行歌词。作了“七娼八戏”的秘书，只好听往日被他们鄙视为下九流的戏子、妓女吆五喝六，那郁闷就不用再说了。于是，他们怀念那个能让他们出人头地的大宋王朝，歌颂那些能让大宋苟延残喘的清官和英雄，对昏庸的君王也做出了相当大度的宽宥。在他们笔下，国土沦丧的无可奈何被展现为民族大衣的英雄情怀，腐败堕落的社会溃烂被谱写为清官为民请命的天降大任，昏聩残暴的帝王政治被指鹿为“宰相卖国”。

这里，“民族大衣”和“天理良心”包裹着他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受宠环境、科举晋身的光明仕途、先生师爷的香辣饭碗。

在文人们对大宋依依难舍的同时，元代农民的生活比宋代得到很大的改善，元朝不仅废除科举制，还部分摒弃了宋朝的都市“大官人经济模式”，坚持以农业为主。忽必烈命编篡《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以，以先进的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命令各级地方官大力推广。生产技术、垦田面积、水利兴修、粮食产量、人口数量均得到极大发展。为了推动农业生产，元政府还在农村大力推行农业合作社，“凡五十家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主管及时农耕、开垦荒地、修治河渠、副业经营；并在田头路边立碑刻录社长功绩。

大农学家王祯在《农书》里对“社”记载到：“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

（白话：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成。相互协作，效率高还齐乐融融、没有人再偷懒耍滑。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于是，田地不再荒芜，每年都能取得好收成。秋收之后，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举办庆祝丰收的盛宴。）

（参见：《元朝农业经济的发展》http://tieba.baidu.com/f?kz=132829994）

文人被下了岗，老农万古流芳，农民安居乐业，你说怎不让破落文人耿耿于怀，遥想当年得意时？

（注：为了预防小资会提出既然元朝比大宋好，为什么元朝没有大宋寿命长的诘问；在这里，笔者谨慎地解答，元朝短寿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朝后期的36年遭遇了中国有文字记载至今最严重的低温冰期，导致农业歉收；其次，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帝王更换频繁；加之政治的不成熟等都是元朝短命的原因。参见《元朝的灭亡的真正原因: 天灾》http://tieba.baidu.com/f?kz=152492647）

无独有偶，东方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在都德的《最后一课》里，韩麦尔先生最后一次法文课堂上，那些有头有脸的“体面人”、 “文化人”都穿着“大衣”来了；——“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别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但是我们注意到，铁匠华希特和他的徒弟们没有来，估计还有更多的莱茵河码头“棒棒”、农夫、纱厂女工都没来，相对于“大衣”的华美体面来说，为能求到上帝赐给“每日的日用饮食”而奔波似乎更加重要。

韩麦尔先生讲到：“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

接着，韩麦尔先生先是指责劳动阶级的“大衣”太单薄而且汗渍斑斑：“你们的爹妈…为了多赚一点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

然后，韩麦尔先生开始反省自己的“大衣”也有几个微不足道的小窟窿：“我呢，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作为法文教师，韩麦尔先生就要失业，要被明天来的德语教师抢去饭碗了，丢了饭碗的法文教师可能要和中国元朝的文人们一样，需要靠给“茶花女”们写流行歌为生了。于是，他“脸色惨白”“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

还有那个“以前的镇长先生”，统治这个城镇的权力在这之前就被粗鲁的占领军指挥官剥夺了。 于是，他也没理由不“都很忧愁”。

但是，想来占领军不会剥夺铁匠华希特和徒弟们的职业，侵略者同样也需要有人在农田和纱厂干活。

试问：假如全法兰西的省长、市长、镇长大人们能够帮助劳动人民摆脱一些贫困，能够避免劳动家庭为了多赚几个小钱，而宁可让孩子辍学的悲剧；假如韩麦尔先生这些小资们都能放弃自己的“生活品位”，用钓鱼、爬山的精力去帮助农民们收几垄麦子拔几垄草，去帮铁匠师傅拉拉风箱；我想华希特和他的徒弟们就不会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占领军的布告，一边嘻嘻哈哈地嘲弄迟到的孩子： “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到学校的！”。**假如官僚和小资能把劳动阶级真正当做社会主人，就没有任何外敌胆敢入侵这个国家。**

为什么东、西方的小资产阶级都喜欢穿“大衣”？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决定的。

民族是什么？民族不同于阶级，阶级是“穷”与“富”的划分，是政治经济学概念；也不同于种族，种族是血缘关系的划分，是人类学概念；也不同于国家，国家是地缘政权的划分，是政治地理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民族是一种文化认同感划分。

既然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群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其他阶级相比，就和民族文化联系得更为重要和密切；本民族与文化弱化，小资就贬值。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把民族利益凌驾于各阶级利益之上，把民族矛盾凌驾于阶级矛盾之上，用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请问，在阶级社会里，存在有抽象的民族利益吗？

用观点认识混淆阶级地位的客观存在，进而用“左”“右”划分取代阶级划分，以达到“领导”无产阶级的目的；给本阶级的利益穿上“大衣”，进而达到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目的；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当前所采取的偷梁换柱手法。

当前，中国无产阶级尚处于“自在阶级”的阶段，他们往往不自觉地以为他们和特定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利害关系；比如，有些工人就认为只有企业兴旺发达，工人就自然能得到较优厚的工资和福利，假如工厂倒闭，自己就只能下岗失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只有在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并团结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

（**“自在阶级”是指某个阶级的成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相似的位置，而他们本身并未能意识到其所处的集体环境，也没有在这一环境中进行有意识地统一行动。“自为阶级”则是指，他们已经意识到本阶级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并且为了这一集体的利益而愿意采取统一的行动。**）

然而，在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艰辛曲折的道路上，资产阶级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干扰和阻挠，资产阶级通过“企业文化”“团队精神”“感恩的心”等意识形态的灌输，妄图牢牢地把无产阶级的意识捆绑在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中，妄图把无产阶级永远禁锢在“自在”阶段。

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穿上了“民族大衣”的法袍，同样是为了达到把无产阶级的意识捆绑在他们的“民族利益”之中，同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永远禁锢在“自在”阶段，永远别想“自为”。在阻挠无产阶级“自为”的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异曲同工！

只要资本无国界，工人阶级就没有祖国！但愿小资产阶级能厚着脸皮把虚伪的袈裟永远披挂下去。

（ 请关注后文：《法制与游码》《民主与权威》）

“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

一天，看到了一篇题目为《滴血之作：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文章，触发了我要写点什么的冲动。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著名左派学者吴辉，原文题目为《炮轰周小川，我的一张网络大字报》，我看到的是缩写版。

目录：

引子 巨无霸

公元1958年，是人类注定将要被改变的一年。

这年，毛泽东发起了“在较短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国家”的全民运动；这就是“大跃进”。评价“大跃进”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然而，占人类1/4的群体如此坚决地进行工业积累和投入，为不远的将来能够加入世界工业生产的行列而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产能格局一次空前绝后的改变；一下子就使全世界从事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人口翻了一番以上。

假如新的产能格局得以实现，将彻底改变人类工业生产与工业消费的力量对比：哪怕其他人全部停下来，只要这1/4人生产，就可满足全人类的工业需求。

这种巨大的产能，也许会为人类迎来崭新的文明或将世界拖入荒凉的枯竭；也许中国会因此奴役世界或被世界奴役。这一切都很不确定。

也许这巨大的产能会造成全球性“过剩”，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再是局部的，因此而不再可对外转移，不再具有以往的可逆性、轮回性；从而彻底终结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中国以“产能取代”的方式、以当前产能帝国的身份和当前的金融帝国——之前的产能、金融综合帝国——美国，结成了特殊的“中美国”经济体。“中美国”虽然不是中国产能建设的初始动机，但中国巨大的产能却是构建“中美国”的必备基础。

关于“中美国”之间“中国制造-美国印钞消费”、“中国低端-美国高端”、“中国实体-美国虚拟”的产业格局；关于“中美国”对中国资源、环境、劳动力、实体财

富……等掠夺，左派经济学家们早已义愤填膺地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全面的总结。但是，左派更喜欢立足于“民族大义”去谴责“美帝邪恶”和“买办卖国”，而对其间阶级矛盾的决定作用避之若讳。

本文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揭示 “中美国”产业格局的形成与未来。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上帝已经动工上帝必将完工。自1958年始，在经历了无论多么令人耿耿于怀，多么蜿蜒曲折，多么备受争议的20年之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至少在1979年那个春天来到之前，中国已建成了包括有3个子系统（东北、华东、西南）的完备大工业体系。虽说比当初“15年超英、20年赶美”的口号慢了一个节拍，但仍不失为奇迹。

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一为终极工业品的产生。大飞机、涡扇发动机、核潜艇、远程运载火箭等。也许有人会说其中有些项目，比如大飞机等是有争议的；那么我要说：假如没争议，那就不是笔者谨慎认为的“不失为奇迹”，而是要升格为“神迹”；就不是建成了“完备的大工业体系”，而是建成了“先进的大工业体系”；就不是比“15年超英、20年赶美”慢了一个节拍，而是胜利实现了目标。

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之二为产业结构的革命性改变。

中国节点年份产业结构百分比表

年 份	第一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1952	51.0	17.6	3.2	28.2
1978	28.1	44.1	3.8	23.7
2009	10.6	40.1	6.7	42.6

（工业和建筑业合称第二产业）

单看产业结构，1979年的中国比2009年的中国工业含量更高；若看终极产品，目前中国也还是那么一套，甚至还少了一些。

中国，一台包括了社会公平稳定、天量劳动人口的工业“巨无霸”已经在1979年之前巍然屹立于东亚大陆；一旦以市场规则启动它，就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产品填满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无需怀疑它的能力。

然而，这台机器归于谁？便成了它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所在。

第一章 所有的制改变

1979年的企业还叫“国营”，的完全涵义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也就是说国家只是代为经营管理，企业的产权并不是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公有”或者说是“私有”的。这种“全民所有制”，使得“公”与“私”的概念不再对立；我们甚至可以定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全民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化联合”。按当前的“股份制”原理，每个国民都应当是这些企业的“平均持股人”。

工业化的过程是痛苦的。按照愚蠢小猪、马前卒等新锐一派工业文明史家的观点，在工业机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的生活改善，甚至会工业化

越搞越穷。只有当工业机器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带来产品。日本的工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是二战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搞农业。这就是很多“吃不了苦中苦”的国家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原因。

当然，工业机器建成并不是绝对的戛然而止，也可以在工业机器有了雏形之后，在已建成部分的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持股人”分红——增加生活资料、设立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扩张。留下一部分用于工业机器的继续完善。事实上，中国工业的建设过程也正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在中国工业机器将成未成、建设要求不太急迫的197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的确良”等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化肥等用于推动农业的发展。

在中国工业机器建成之前，农业承担着全部的工业积累、投入和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生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农业是工业的“债权人”，农民们除了具有国民“平均持股人”身份外，农业还有理由在工业建设完成后要求工业偿还“债务”和红利。

此外，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建设中还发挥了超经济的主人公献身精神，他们付出的义务和贡献，都应该得到“创业股”的待遇。

然而，当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节约生活资料（或曰“勒紧裤腰带”）、贡献了所有财富积累之后，在中国这架工业巨无霸刚刚建成之际，它的产权忽然发生了模糊和变迁：1982年宪法文本中出现了“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文字，这为以后的 “国有化”奠定了基本法根据。

“国有制”的确立，使国民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业产权，从持股人和主人公身份沦为真正的的无产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圈地运动”。

在“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城市劳动者尚且可以依靠体制惯性下的劳动保障权，以工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等方式从国有工业链条上获得一定的分配；而农民却因户籍、行业、职业和享有耕地经营权的区别从此和国有工业资源斩断了一切分配联系，存在的只是购买关系。

以李昌平为代表的左派农业经济研究者，提出用“剪刀差”的概念解释“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说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建设是靠压低农产品价格、靠剥夺农民完成积累。但“剪刀差理论”怎么都解释不了，在“剪刀”下的70年代，城乡差别趋于缩小，而在没有“剪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别却越拉越大的客观事实。

“剪刀差”（price scissors）概念：“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这对于80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不适用的。那时，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固然很低，但农业获得工业产品也几乎为免费。比如，70年代笔者家乡地方政府要求生产队购买当地农机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价格为2400元；价格定的本来也就不算高，可生产队却大多以“没钱”为名故意磨磨蹭蹭，地方政府只好为所有“购买”者办理了无息贷款代交货款。3年后，政府又以减轻农业负担为名向国家申请免除生产队贷款债务；等于是白给了。类似的还有60年代的购买化肥贷款，50年代的水车井建设贷款等，每过数年国家都要制度性地赦免“陈年老账”。

实际上，在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贡献是一种投资，换来的是农民对工业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可企望的工业红利、以及工业成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把这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积累和投资定义为“剥夺”，是常识性的谬误。

因此，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化”切断了农民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权联系，剥夺了农民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已经唾手可得的工业红利。如果要说有“剪刀”，那还真是“剪”得干净利落—— 就是“国有化”这“卡擦”一剪子！

始于80年代的“国有化”，奠定了中国当前分配单一、“‘国’富‘民’穷”、内需低迷的所有制基础。

第二章 分配的倾斜

“国有化”还只是开始。

如果仅仅是将产权集中到国家，国家如果在支付了雇佣工人工资、政府管理开支、产业再建设投入后，把剩余红利用于社会公共保障（失业保障、居住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的话；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的需求能力也不会因为产权的转移而缩小。

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国家对集中到手的产权进行了再分割，这就是产权的“私有化”、“集团化”、“股份化”运动：从承包租赁、廉价出售到“零资产转让”；从全员承包到“管理层持股”…… ；既然是“国有”，国家当然有权处置自己的资产，处置自己的资产当然不用和任何人商量，你下岗不下岗本来管我屁事，我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给你搞点“买断”和“低保”；…… 就这样，经30年来不停顿的“经营机制改革”、“产权体制改革”，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产品分配的极度失衡。

特权和资本家集团无疑占据着财富和分配链的顶端；国家公务员、国家职员靠着皇粮国税成为体制的“分肥”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体制职工”靠着集团经营成为国有资产的利润瓜分集团，国有一般企业“体制职工”以 “零租赁”（指经营集团无需向国家交纳资产租用费）成为国有资产使用权的把持集团。以上4种人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化”和“再分割”的利益获得或部分利益保持群体。

第4种人属于第3种的边缘化。他们能否成为实际受益者要看“人品”——即行业景气、企业经营、企业领导集团等复杂因素。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下岗；但至少他们比“体制外”劳动者保持了国有资产的免费使用权或者这种权利的补偿——买断、低保。这个阶层和“毕业即失业”的高等院校左翼学生构成了左派主张“回归社会主义主人公地位”的主要受众。这部分人梦还在，这是他们用“穿长衫站着喝酒”的方式区别于外来民工的理由。

那么，被排除在以上4种人之外的其他普通劳动者呢？

普通劳动者的构成：

破产农民（包括城郊失地农民），私有、外资企业雇佣工人、国有企业“体制外”雇佣工人，城市“体制外”就业劳动者、自由劳动者，中等学校（包括技校）毕业生——他们以及家属构成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人群，约占中国人口的70%左右。这些无产阶级劳

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国家极少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往往被前面论及的4种和体制有关的人群占用。他们唯一获得社会分配的渠道就是廉价出卖劳动力——低工资。对于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失业就意味着饥饿。——我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

（注：1995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占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2%之间，只是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了2%。于此同时，包括了一些不具有工业体系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OECD）”34个国家平均为：20.7%）

这里需要论证**农民及农民工的阶级属性**。

农业生产存在着和工业生产完全不同的特点：

⑴ 农业劳动对产品填充具有季节性和不可连续性（比如，不到季节就不能进行收获劳动；地里如果没有了草，除草劳动再延续下去也是无效劳动）；

⑵ 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扩张性（除西北、东北外，内地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仅为1.2亩。目前，尚无手段像扩大矿物资源一样扩大耕地面积）；

⑶ 农业环境的相对不可改变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移动性（不能用盖厂房的方式完全改变农业生产环境，不能用4个轮子把耕地移动到环境更好的地域）；

这些因素决定了自80年代延续至今的家庭承包制农业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必然破产，WTO以后的国际市场影响更加剧了破产的彻底性。这是毫无选择的唯一结局。

以目前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地区为例，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为1亩，5口之家5亩土地在风调雨顺的最好年景全年最多可收获5吨粮食（小麦+玉米），最高产值为10000元，扣除6000元生产成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耕作），家庭可获工资性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为800元，人均月收入为66.6元，66.6元相当于66.6斤粮食，吃30天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吃盐，要保持裸体状况。这么说来，现有的农业生产是可以完成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维持劳动者不吃盐的裸体生存的，说“破产”还是有点耸人听闻的。

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最简单的再生产不仅包括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虽然计划生育缩小了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规模，但传宗接代还是要的吧？那么老爹老娘死了的火化费、老婆得癌症的化疗费、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费、女儿上高中的学杂费、儿媳生孩子的剖腹费、房屋漏了的修补费……这些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须成本从哪里来？

由于一些左派用“左”“右”来“简化”阶级划分、一些工人理论家缺失农村视野、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原著的生搬硬套，造成了一些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定义为“小资”性质的“小生产者”的现象。不错，“小生产者”他们曾经是，可现在他们已经破产了，破产的“小生产者”就叫无产阶级；破产得越彻底，就越无产阶级。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在本文案例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最高才800元，仅为5000元的16%。这个数据说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的破产，3亿农业劳动力被抛向社会，由“小生产者”转变为 “一般无产阶级劳动者”。

这里，我郑重建议，《乌有之乡》开辟《工农之声》板块，大家一起来学习工农，了解工农。

分配的极度低下导致这占全国70%除了果腹之外不再具有其他购买能力，他们被排除在工业品消费和现代化进程的门槛之外。从根本上看，那些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的整船整船产品就是这10亿人“节省”下来的。

第三章 生产的膨胀与低端化

分配的极度单一，——除微薄的工资外不再有任何渠道介入分配，决定了国家必须为这些除了劳动不再有任何出路的4亿无产阶级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国家必须引进外资，必须招商引资，必须加大基建投入，必须以 GDP 为纲，必须劳动力密集，必须不顾环境和资源的消耗……因为“稳定”可以“压倒一切”，却压不倒饥饿。

急迫的就业压力使中国的产能急剧膨胀起来，以基本工业品为例：

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为56780万吨，占世界总产121970万吨的47%，，是第二大国日本的6.5倍，是美国的10倍；

2009年，中国水泥产量为16.3亿吨，占世界总产量27.0亿吨的60.0%，是第三大水泥生产国美国0.6亿吨的27倍。

2009年，中国总发电量为37146.5亿千瓦时，美国总发电量为39511.17亿千瓦时；2010年中国可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电力国；

2009年中国煤炭产量约为33亿吨（包括规模以下煤矿的产量估值），占世界总产量69.4亿吨的47.6%，是第二煤炭大国美国9.7亿吨的3.4倍；

2009年中国石油产量为1.89亿吨（极限产量为1.90亿吨），排名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美国之后的第四位，排名第三的美国为2.67亿吨；

… …

哥生产的不是产品，

哥生产的是就业岗位和饭碗。

左派朋友们将“GDP 路线”、“产业低端化”、“断子绝孙的发展”视如洪水猛兽是绝对占有道德高度的，对那些“精英”师爷们仇人相见也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但是，左派朋友们想过没有？从最小的官乡长科长，到最大的主席总理，他们谁的智商都不见得比我们低，难道他们不知道“GDP”不代表利润、不代表财富、不代表发展、甚至不代表实体产品？但是，它代表就业、代表饭碗、代表稳定！——稳定，是中国最基本的核心利益。

（注：关于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多次阐述为：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哥没有追求 GDP，

哥追求的是稳定压倒一切。

关于产品的低端化，关于8000万条裤子换一架波音，吴辉先生早已泣血咯红。我们当然知道8000万条裤子所造成的环境资源消耗是1架波音的千百倍。但是吴辉先生想过没有？假如让中国把生产8000万条裤子改为生产1架波音，将会导致原来生产8000万条裤子的工人有95%失业？

以1万工人为例，假如我们让500个人进行大飞机生产，让减员下来的9500人做啦啦队，高喊“民族大义”“中国崛起”围观加油或者送茶送水，那场面固然很盛世、很崛起、很红火；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追问：等年底大飞机建成了，不仅创造了和8000万条裤子同样的价值，而且还发展了核心技术、保护了环境、节约了资源；那么，你们给不给那加油的9500人分配？假如能分配并且分配合理，那么“OK”，明年咱们换着来：我生产你加油。假如分配不合理或者根本就不分配呢？那么对不起，“拜拜”啦，咱们去搞点反饥饿反失业的群体事件；要是怕被银川骑定性为颜色革命呢，那就分散去偷你们的航空铝合金，卖废品收购站换了摩托车去抢你们千金的钻石戒子太太的白金项链。

这局面好玩吗？

吴辉先生是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吴辉先生说过“资源枯竭，是要断子绝孙的！农民愿意为了1块钱就断子绝孙吗？况且，困难只是暂时的。”（《吴辉：中国的出口产业需要进行战略性转移》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13）

年收入20万的小资家庭都可以搞“丁克”，为了致病率并不太高的三聚氰胺小资们都可以把整个网络掀个底朝天，凭啥让无产阶级劳动者在交不起火化费父母等待在停尸间、交不起住院费妻子忍耐在医院走廊、交不起学费女儿被迫遮盖着夜色走向红灯区的困境中为薪火相传的“民族大义”已经“暂时”了20多年还得继续“暂时”？

吴辉先生一味地希望劳动阶级永远风雨如歌：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不要哭毕竟我们还有梦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假如无产阶级劳动者对梦已经失去兴趣，假如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偏要来追问“为什么”呢？

吴辉先生是我所尊重的、左派中罕有的、具有理工科水准的经济学家。我想，吴辉先生可能是一时被买办气糊涂了，他想表达的意思实际是这样的：

“改善劳动者的分配和保障状况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再逼劳动者为了1块钱而进行断子绝孙的生产啦，劳动者的耐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代表了10亿人口的广大无产阶级分配的单一和低下，决定了中国生产的**被迫性**、生产规模的**膨胀性**、产品的**外向性**、产业结构的**低端性**、产品构成的**劳动密集性**、环境资源的**耗散性**……决定了中国必须放弃就业率贡献小的高端产业而选择就业率贡献大的低端产业。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要一天不改变这种分配模式，就一天必然是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将10亿劳动阶级不可妥协的**生存矛盾**（失业、饥饿）转化为可暂时妥协的**两级分化矛盾**。

能不能高端、低端一起上？这样不是更好吗：一方面解决就业维稳，一方面发展高端战略产业玩点崛起？

不能，当然不能。

按理说，早在1979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是一流的科技大国了。这些年来虽然下马、荒废了不少科技项目，要全面角逐世界高科技市场或许在很多领域已经力不从心；但是稍加整合满足自己国内部分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依然不能。

为什么？

因为美国会提出抗议：

我美国为了拉扯你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大生产，我已经停止了全部的一般工业品生产，腾出市场让你干了。为了满足你维稳所必须的强烈就业要求，我还积极响应你“引进外资”的号召，把工厂都搬到中国，让你就业，让你稳定；为了保证市场，我还得把产品销往美国国内或世界其他国家。我容易吗？我干嘛这么富有牺牲精神？不就是怕你重回计划经济、自力更生的老路吗？现在，你已经生产了那么多的低端产品，而我只仅仅保留了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高端产业，你却还要和我争夺！难道美国就不需要就业不需要维稳?

目前，美国的实际失业率为19%，相当于5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家庭在靠领取社会保障度日，人口高达6000万。比起中国的不明真相和情绪稳定，美国不过是靠着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减缓压力，但也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你不是要自己生产高端产品吗？好，你不要我的高端，我就不要你的低端。

美国才需要卖多大一点东西？即便美国的产品不仅附加值高，而且定价也高，2007年美国卖给中国的东西不过才652.4亿美元，而中国卖给美国的即便再便宜也卖了3215.1亿美元；中方顺差2562.7亿美元。2009年，在全世界经济萧条、各国都在靠国内投资救市的恶劣环境中，中美顺差依然高达 2268.3亿美元（2964.0 ——685.8）

3000亿的出口，2500亿的顺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1.6亿中国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就业岗位（2010年水平），或者3.5亿中国无产阶级人的年收入（2009年水平）！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游手好闲的美国虽然很不情愿自己生产低端工业品，也不打算挑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对于自己缺少的3000亿低端工业品，美国靠着自己的资本、技术，靠着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力，靠着失业的3000万劳动力和高度自动化；是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的，大不了再抖一抖当初闯荡天下吃苦冒险的牛仔精神。产品价格可能会高许多，但可以把节约下来的失业救济金用于生产补贴。3000万失业劳动力的年失业救济金大约为5400亿美元（美国失业救济金大约为1500美元/月），几乎是从中国进口3000亿商品的2倍。而且，还不一定需要这么做，美国还可以把低端市场让给印度和巴基斯坦，换取原来属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军火份额。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无力摆脱对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恐怕是一厢情愿的。

中国敢于为保护自己600亿的高端市场而放弃3000亿的美国低端市场吗？

庞大的就业岗位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有理由让中国让出点高端市场。提出要求就不怕你不答应。中国懂得“美国不高兴，后果很严重”的道理。——要高端就别要就业别要稳定！

中国选择高端产业则不能满足就业，而中国用有限的高端市场换取数倍的美国低端市场，中国解决了就业，美国也相当满意。——这叫“双赢”。

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双赢”的最好体现。

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实质内容除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外，一项核心的实体性内容是：中国对美开放核电、风电、太阳能等高端能源产业市场，换取美国“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国家地位”，以消除对中国低端产品的贸易壁垒。胡锦涛主席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寄希望于：“中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加强新能源、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等领域互利合作，夯实交流合作基础”。此后，中美签署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备忘录(续签)》等八项协议。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除了已经开工在建的三门、海阳2家核电站的4台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机组外；包括已知最近立项的“吉林赤松核电项目”在内，还有26家140台机组已经通过立项处于筹建之中。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确定的“**新建核电站将以AP1000技术为主**”的方向：“今后包括内陆、沿海所有新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项目，都将以 AP1000系列核电堆型为主”。（能源局：新建核电站将以 AP1000技术为主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9-03/03/content_67315019.htm）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或将要建造144台 AP1000机组，假如把在建核电站的2期工程也根据能源局的“方向”调整为为 AP1000，这个数字还将增加14台，达到158台之多。

按照每台150亿人民币和郎咸平先生下文提供的技术转让比例，总计高达80000亿人民币，比郎咸平先生的8000亿美元还要多。这也许是笔者以完全“AP1000化”计算所致。而能源局是“为主”，这和笔者毫无体面的“完全”也许会保持适度的距离。

郎咸平先生的文章并不长，全文转载如下：

郎咸平：漏油危机中的核电攻略

5月20日 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 BP 原油外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环保大灾难，鱼也死了、鸭子变得像烤鸭的感觉、乌龟也死了。然而，就是因为这个泄漏使得奥巴马的民调到达了历史的低点，他的支持率开始逐渐下滑、而他的不支持率则在上升达到了最高点。这使得奥巴马痛苦不堪，甚至根据媒体报道有超过半数的人对奥巴马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处理是不满意的，甚至危及到他以后的竞选连任，所以这个危机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你是奥巴马，碰到这种漏油事件，你能怎么办？你在能源政策上交出又快又好的成绩单，否则这个漏油事件怎么善终？而5月20日的漏油事件，5月24/25日就是第二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除了上次我说的新能源能让他加分之外，还有就是核能发电。当然核能发电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新能源，但是这个又不一样，这个玩意儿让我感到非常生气，数据显示2009年3月份，中国从美国西屋电气引进了4个机组，其中两个在浙江三门、两个在山东海阳。我们核电上打的其实是“万国牌”，其中有加拿大的设备叫做秦山三期、俄

罗斯的设备叫做田湾、法国核电站就是大亚湾的后续项目、现在又有了美国西屋电气叫做AP1000。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西屋 AP1000在2006年12月投标时胜出的原因是因为报价低，低了每千瓦1000到1500美元之间，而且我们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认为中国在2006年年底率先引进 AP1000的技术实际上是节约了成本。那么实际数据则是，2006年的国际招标是每千瓦1800-1900美元上报中央，而不是王炳华所说的1000-1500美元，而且负责引进的中国核电技术公司现在也要求中国政府准备按2000多美元一千瓦的价格来接盘，而且还附带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条件：上不封顶。

除了我们规划的1800到1900美元上报中央、要求政府以2000多美元接手之外，我们发现美国的技术还要再外加4300美元以上的每千瓦投资的研发费用、投资费用，加在一起6000多美元。与昂贵的外国第三代 AP 相比，我们自主设计的秦山二期核电站，每一千瓦全部加在一起只有1662美元，如果用 AP1000除了2000多美元价格接手之外还有4000多美元以上的每千瓦投资的钱。因此，它是我们自主建设的3倍。我们花了8000亿引进AP1000,8000亿拱手让人！

其实我对中国的工业一直报以怀疑的态度，但是核能方面，我必须老实的说中国是比美国先进的！我们已经掌握了第四代技术。核能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技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与第四代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技术和大家做个介绍呢，因为他们到处申诉到处投诉我们决定不用他的，因为他的技术太先进了。这技术的差别在于，前三代有个通病就是当你要对反应炉降温的话，必须插入控制棒。但是美国的三里岛、俄国的切尔诺贝利曾经发生过核能事故，原因在哪里？我们以三里岛为例，控制棒插进去之后融化掉了，融化掉之后温度就控制不住，就随时有核爆炸的危机，所以这个控制棒本身就是前三代技术的一个根本。控制棒就是前三代核能技术的根本，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核电站这么的困难，因为它解决不了控制棒的问题。而我们国家就提出了解决控制棒问题的技术，不用控制棒用汽冷，叫做高温汽冷的概念。直接查阅学术研究期刊会发现，2002年的《核工程核设计》发表了介绍清华大学关于100万千瓦的“模块式的高温汽冷堆”，就是不用控制棒来降低温度而用汽冷的方式，它的主编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介绍说：这是第一个第四代的反应堆，它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存在于现实中，虽然目前的设计只是一个小反应堆，它的所有部件和设计可以用到更大规模的电厂商都没有问题。所以04年的9月30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排下，世界第一座模块式高温汽冷核反应堆在北京，而不是在美国，首次对外进行了和安全试验。来自30多个国家，60余位国际原子能专家在现场看到了不插入控制棒的情况之下，如何搞冷却这么一个议题。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正在运行中的反应堆来进行事故的演练，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和平利用核能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我们的研究这么厉害，但是结果却是什么呢？我们竟然在第二次的中美经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会议中，同意与一个核能技术赶不上我们的美国共同分享这个第四代的技术。作为回报，美国提供第三代的技术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把最先进的技术和美国人分享，换来的却是继续把美国还没开发出来的技术在中国做活体实验，并且出钱让美国人来评审美国现在的技术，最后把一个8000亿的市场的份额拱手让与美国人。

最后我得讲句公道话，我并不怪政府，请你想想看，连我都知道的，我们搞核能的人员会不知道吗？今天只是我把核能的概念用非常简单的话语将给各位朋友听，请你再想想看，连我都知道、我们核能单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其好似我并不怪我们核能技术总公司，因为我们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那原因就是美国汇率大战的延伸。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704.html）

实际上，中国第四代核电技术比郎咸平先生介绍的还要成熟。郎咸平先生说的还只是清华大学02年的设计和04年的“实验堆”。目前的进展状况为，一台由清华大学完全自主设计的20万千瓦的“高温汽冷 HTGR”商用“示范堆”已经从2004年开始选址到09年于山东石岛湾破土动工；同时还规划了后续的6台100万千瓦级的“高温汽冷 HTGR”机组。这6台“高温汽冷 HTGR”是否也要根据能源局的“方向”调整为 AP1000？笔者不得而知，考虑到绅士应该有一条华美的领带，暂且可不计入可能调整之列。

作为第四代“高温汽冷堆 HTGR”的技术成熟性并不亚于西屋第三代 AP1000，因为在中国采用 AP1000之前，西屋并没有做过任何一台正式的商用 AP1000，在中国三门动工的第一台 AP1000同样具有示范意义。只不过人家一上手就用125万千瓦的大手笔示范，清华则是小心翼翼地用20万千瓦示范。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拥有“CNP1000”（完全自主研发的2代加改进型）和“CPR1000”（通过20多年来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具有知识产权，可完成设计、设备、建设、运行，自主化、本地化、国产化程度较高的2代加改进型 ）两种安全、稳定、低廉的产品；而且第四代“高温汽冷 HTGR”已经呼之欲出的条件下却要如此大规模地购买美国毫无运行经验、很快将成为落后技术的第三代 AP1000？而且还要答应把自己最先进的第四代技术和美国共享？

对此，郎咸平先生风趣地解释为“奥巴马不高兴”，这固然体现了郎先生的大师风范，“汇率大战”的提法也相当时尚。但是，在“汇率大战”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东西呢？

中美“汇率大战”是指中国坚持人民币低汇率，美国坚持人民币高汇率。在我的印象里，郎咸平先生似乎是坚持低汇率、低工资、高就业、高出口的；而吴辉先生则是主张通过“自由汇率”（或曰“市场汇率”）的方式来提高汇率，激活进口的；同时，吴辉先生是也是认可“人民币低汇率有利于中国出口，高汇率有利于美国出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参见《吴辉：炮轰周小川，我的一张网络大字报》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53）。

也就是说，郎咸平先生和中国政府一个立场，吴辉先生和美国政府一个立场。

汇率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

假如把这个问题提交一个毫无国际贸易知识的菜摊农妇，她的第一个答案是“高好”，因为“高”就意味着中国的“钱”更“值钱”了；假如你再告诉她“高”就意味着美国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土豆，她的土豆将卖不出去，那么她还会说“高好”吗？

在人民币汇率“高”与“低”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自我矛盾和犹豫不定，反映了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在“和谐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心灵挣扎。

第四章 出口 外汇 分化

一刻也不可停顿的生产、规模巨大的产能、分配的单一低下、低迷的内需、稳定压倒一切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中国必须不计代价寻求国际市场。

换个说法：出口的被迫性是生产的被迫性决定的，生产的被迫性和低端性是10亿无产阶级的生存（就业）矛盾的尖锐性决定的，生存矛盾的尖锐性是分配的极度单一性和低下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保持和扩大出口，是中国“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基本核心利益在当前分配格局下的必然选择。

哥出口的不是商品，

哥出口的是社会矛盾。

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285.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220亿美元的34%。贸易顺差约为3000亿美元（2954.6）。

净出口了3000亿美元的的社会矛盾。

能将社会矛盾出口给别人当然爽得一塌糊涂，马克思称之为“转嫁”。但是，危机并没有一去不复返，出口的实体产品带走了失业饥饿生存矛盾，顺差的美钞又带回了贫富两级分化。

出口商拿回来3000亿美元，央行就要印刷2万亿人民币把它买下来，美钞央行留下做外汇储备，人民币出口商拿去搞再生产。于是，中国社会的人民币流通总量增加了，“储备性通胀”发生了。假如2万亿人民币是平分给每个国民的，“通胀”也不那么可恶；然而，2万亿是给了出口商的，社会成员是根据与出口商这个“货币源”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来瓜分这笔货币的。于是，距离出口商位置最远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就成了获得最少的人。呵呵，平摊了“通胀”的负性，却获得了最少的补偿。贫富差距就这样越拉越大。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5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约为18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3.6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5倍）

也就是说，通过实体产品输出的“生存矛盾”，又通过逆差→汇换→储备→发钞的渠道返回来了，继而转化为“两极分化”的矛盾固化在中国社会之中。

有人会说，既然顺差会带回“储备性通胀”和“两极分化”，那么我们白送给他产品不要美钞顺差好了。

那不行！

因为中国虽然可以把产品以无偿援助的方式白白送给美国，但也必须同时付给出口商2万亿人民币；否则，出口商就无法维持再生产，失业就会立马产生。所以，美钞还是要要的，搁在那，做为外汇储备和印钞的担保。

央行通过发钞权给了出口商人2万亿人民币，发钞的成本也以“储备性通胀”的方式转嫁给了中国社会。在整个过程中央行只付出了印钞纸、工人工资、印钞机折旧等可忽略不计的成本，等于说是白白捡来了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那么，这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该干什么呢？按照吴辉先生的说法，应该进行国际采购，把采购来的实体财富投放中国市场，既增加中国的财富总量，又平抑发放2万亿人民币所造成的“储备性通胀”。（这和张宏良先生“用2万亿美元储备收购外资在华经济实体”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构想很好。

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吴辉先生，你打算采购些什么呢？

这里，我们不妨把可能采购的产品分为以下几类。

⑴ 资源性产品：石油、矿石、煤炭...

⑵ 高端产品：核电站、飞机、航母…

⑶ 廉价工业品…

… …

⑴类产品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中国一点也没少买这类产品，所谓的贸易顺差，就是购买过这类产品的节余。

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1.99亿吨，已高于自产的1.89亿吨，占总消费量的51%。假如全部进口，数千万石油工人的就业如何解决？稳定如何保持？2004 年，中国开始石油储备，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 上半年国际油价低谷期，以每天28万桶的速度共注入1.02 亿桶原油，成本为58美元/桶，低于目前80美元/桶的国际价格。第二阶段工程将于2011年竣工，可注入原油1.69 亿桶。但大规模抢购石油会造成国际油价上涨，而且规模过大从工程和安全角度技术上也不可行。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2.5万亿，假如按目前价格购买石油，可购入50亿 m3的原油，这是和黄河年入海水量同一个量级的概念。因此，用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石油，会把国际油价搞成热带风暴，买来也没地方搁，还极易形成生态灾难和战略负担。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以每年5亿吨原油的速度激增。

2009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3亿吨，占世界铁矿石总交易量9.0亿吨的70%。中国国内还有8.8亿吨的产量。如果中国再增加进口量，那就别怪价格要翻几番了。经常听到说国际矿商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面对你这么大的买主，人家不联合起来行吗？按理说，以中国这么大的采购份额，他们就是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掌握定价权，中国只要拖他半年，他们就会把定价权乖乖交给中国。但中国拖得起吗？即使钢铁厂的老总愿意拖——因为炼钢铁已经是微利，老总们早就想把资金抽出来去搞房地产呢，但近亿的钢铁工人拖得起吗？何况老总们都去搞房地产也不能缺少钢材呀。

生产的急迫性决定了“定价权”必然丧失。这也包括稀土等国内资源的出口定价权。

2009年，中国已正式确定为煤炭进口国，全年累计净进口9000万吨，对外依赖度为2.7%。2010年以来，进口势头有增无减，预计对外依赖度将超过4%。中国的煤炭产量已经占全世界的47.6%，却还要进口，如果缺口进一步加大，国际煤炭价格也会飞涨，甚至进都没地方进。

中国成为煤炭进口国的意义是重大的，标志着中国的经济达到了自然资源的边界。

⑵类高端产品是美国急于要卖给中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谈来谈去就是美国要用自己的廉价工业品市场换取中国的高端市场。高端产业也是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力争要保的，但保住保不住呢？

大飞机中国早已主动放弃了，核电站也已在“双赢”声中尘埃落定。中国为了先进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不被扼杀在摇篮当中，同意和美国共享，把美国也拉进来。把这种委曲求全的智慧结晶称之为“产业和亲”，可谓惟妙惟肖，也算是开辟了 “双赢”的最新模式。

吴辉先生还想买什么？莫不是看中了老美的航母吧？近年来，美国透过各种途径传达出要帮助中国搞航母的意向，前一阵子也流传过美国要把“B-2战略突防隐身轰炸机”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消息。搞定了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市场再突破军火市场，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左派朋友们不要信誓旦旦地“不相信不相信就是不相信”美国敢卖航母给中国，美国军火垄断资产阶级就是搞这个的，有啥不敢的？美国就是把现有的所有现役航母全部卖给中国，中国莫不是要驾着航母战斗群去攻击美国这个核大国吧？估计在几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航母战斗群就会被囫囵个地端上谈判桌。届时，吴辉先生们大可为“外汇储备转化为高端战略实体”弹冠相庆，但中国自主的军工产业和军工从业人员呢？

⑶类廉价工业品吴辉先生要买吗？那美国人肯定喜出望外，他会热情地询问你：“这些够不够？要是不够，我再去中国给您进口。”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贸易顺差或者外汇储备，是不能用采购国际实体产品的手段释放的，一旦释放就会对国内就业和产业格局产生毁灭性打击。

我们前面分析过，通过“生产→出口→逆差→汇换→发钞→储备”这个链条，把中国无产阶级不可缓和的生存（就业）矛盾转化为可暂时缓和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矛盾。外汇储备是这个转化链的最终凝结物，关禁闭还害怕关不牢呢，还敢释放？一旦释放，链条就会发生逆向运转。

哥储备的不是外汇，

哥储备的是失业和动荡。

第五章 中美民族矛盾与前景

“就业生存”被成功地转化为“两极分化”，除了制造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外，还制造了另一个成果：中国资源的巨大损耗。把社会矛盾以物化产品的形式输出，是资本采用市场生产方式而又要延缓产能过剩危机的必然手段。然而，输出社会矛盾是需要包装的，这个包装品就是廉价劳动力、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健康、人均寿命。全面的环境污染破坏、资源枯竭，甚至连煤炭都成为进口国，各种各样的污染病、职业病，人均寿命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都是社会矛盾输出不可规避的代价。

哥并不想消耗资源，

但哥需要包装材料。

资源的损耗与外汇的堆积，客观上造成了美帝国主义用印刷工艺品交换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中美民族矛盾的核心内容。然而，民族矛盾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10亿劳动阶级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这要这个内在矛盾一天得不到缓解，外在的民族矛盾就一天天扩大。

面对中国巨大的过剩产能，美国在享受中国人民劳动成果和中华民族子孙资源的时候也被搞得狼狈不堪。中国什么都要生产也什么都能生产，你敢5美元卖的东西，中国就敢1美元卖。这种恶性生产搞得美国的资本家什么都不敢投资，除非他们找到一种无论如何也从中国运不进来的产品；很幸运，他们找到了，——房地产；于是全美资本一拥而上制造泡沫。很不幸，泡沫终归是要破的，于是就发生了两房危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是清醒的，美国意识到了产业空壳化的危险性，美国比谁都更清楚危机来源于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作为经历过30年代大过剩大萧条的国家；美国深知这种过剩的可怕和危机的深远。

于是，美国试图依靠自己宽广的市场、相对不足的产能，充足的技术、资源、资本储备在这次全球性的大过剩中独善其身。美国将在美国和中国庞大的产能之间建立“防火墙”。单边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市场交换将成为主旋律。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美国不惜公开放弃“引领全人类走资本主义幸福道路”的使命，公开承认“中国不可能达到美国的幸福道路”。美国甚至督促中国改善分配模式，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美国已经在着手解体“中美国”，假如中国不能适应美国的这种改变，当“新孤立主义”这个美国以市场自主、消除逆差为内容的概念流行之时，大萧条将在中国降临。

万流归海见桑田——从 5000 年大视野看新中国前 30 年水治与农水建设对华夏农耕形态的深刻革命

副标题又：——从华夏 5000 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内容提要

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纪 70 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客观描述了自 50 年代兴起的全国大规模治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论述由水利建设引发的农业生态革命及其深远意义，从而凸显了农业集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道别高粱话沧桑

“洼地”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古农业生态要素，它的本质特征是水涝与盐碱。大面积种植高粱正是针对这种生态的必然选择。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态的本质，就只能在洼地里种植高粱。

第二部分 斥卤生粱说轮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先民与水患、盐碱进行了不息的抗争。但由于一直未能组织起强大的社会力量解决“排涝”这个核心问题，以致对大面积低洼、盐碱地的开发陷入周期性的轮回状态。

第三部分 万流归海见桑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大江大河进行彻底治理，大力兴建农业蓄、排、灌水利工程，一举改变了险恶的农业生态，从而引导了中国农业极为深刻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大禹治水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同时堪称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典范。

万流归海见桑田

——从 5000 年大视野看新中国前 30 年水治与农水建设对华夏农耕形态的深刻革命

本文缘起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高粱地已消失，高粱作为曾被我国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已退出历史舞台。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草桥关民”网友在人民网上发表《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归结于农村由“集体制”向“家庭制”的改革和农民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1]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你甚至还能发现这个观点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编著于公元 3 世纪的《博物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从西周早期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期。早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就开始进入“家庭制”。秦始皇统一中国标

志着农业“家庭制”的成熟。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几乎在中国农业进入“家庭制”的同时，孔夫子发出了“食不厌精”的感慨——这说明追求“精致生活”也并非现代人的专利。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没有看到高粱有丝毫“隐退”的迹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伫立了三千多年？又是什么原因偏偏让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本文就以高粱为脉络，通过描述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生态演变，对高粱的来、去之谜，做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在正式论述前，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谷子（粟）、水稻，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谷子之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人们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 年，全世界高粱种植面积 5019.1 万公顷，收获总量 7745.2 万吨，折算单产不足每（中国）亩 103 公斤。中国的高粱单产量比世界单产量要高。1986 年，中国共种植高粱 187.55 万公顷，总收获量为 538.4 万吨，折算单产每亩 191 公斤。而 1985 年，中国的水稻产量为每亩 356.5 公斤，玉米每亩 236.4 公斤，小麦每亩 198 公斤，谷子每亩 101 公斤。 [2]

除了产量低，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倒不是因为它所含营养低（其营养成分与玉米相近），而是因为其种皮里含有大量单宁（生柿子中也含有这种物质）。单宁的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 1.5%，它导致高粱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单宁的另一个特点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极不易被人体消化的胶体——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喝高粱面糊糊不能用筷子搅，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因为搅动会使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之难吃还在于和玉米、谷子相比，它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能给人以香适味觉，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没有玉米、小米那样鲜香可口。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产量既低、质量又差的粮食在中国的田间灶头活跃了三千多年。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1、从“洼地”和先民的聚落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 ，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孙喜旺的唱词，在中原一带可谓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这句唱词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中国北方农村稍有了解，你会发现“洼”字的使用极为广泛，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两千人的较大村庄，甚至连“东洼”、“西洼”、“南洼”、“北洼”都全了。

常常可以听到村民们互相打招呼，

“去哪里？”“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处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去七里营怎么走？”“一路向东。”

“有多远？”“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一洼的距离约等于一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单位的事物，必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且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意是指一个男人的身高（据说以大禹的身高为标准），故有“丈夫”之说。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尺”的长短发生了变化，使得十尺（一丈）的长度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大不相符，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语汇痕迹。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的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以公里作为尺度。

“洼”到底是什么？笔者如此定义它：“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它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才被新的生态元所取代。所谓“生态元”可以简单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文字学含义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七八千年前，中原大地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东北丹顶鹤的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水灾泛滥的年份里表面积水，在正常年份的少雨季节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迅速繁衍起来，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迁引起的生态变化极其缓慢，以千年计。这意味着，在数千年里，华夏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外力介入，这种状态仍将缓缓延续。

《诗经·卫风·氓》中的诗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描绘了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大平原三千多年前的生态景观。“隰”就是低洼积水地。距今八百年前左右，北宋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大象的踪影，但大型鳄鱼在京畿还时有活动。 [3] 可见前后生态之连续与稳定。

洼地在北方平原是否大规模存在？以北京为例：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地处北纬 40 度、东经 116 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它被称为“京西皮影之乡”；北京大年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如此种种，无须赘述。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说，那是“多了去了”。

“甸”就是大片的积水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即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甸方八里。”即一甸的长、宽均为八里见方。假如这个“里”和现在的一里长度相仿，则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出一甸约为两万四千亩。可见“甸”的度量值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

清代，北京许多地方仍沿用“甸”作为地名。这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比中原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 50 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应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西北郊区当时是大片的低洼积水。《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苇”也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庄。北方先民们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首先，人类不是“两栖”动物，因此要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自西周起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较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时，要拥有一件产自印度的“木棉袈裟”都很不容易，围绕这种宝贝，经常有血雨腥风的故事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旁栽种桑树是西周时就有的传统。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配偶——嫘祖在西周前两千年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顾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因征服或开发而形成聚落的早期，参加战争或开发的聚落成员可以按人头分得田地，并可传给后代。这些田地，官府要造册登记、岁亩完赋。为宣誓产权，村民常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定产权的证物，这就是通常说的“界石”。

“榆”即榆树。榆树成材周期长，耐旱而不耐涝，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和“桑田”相对的是距离聚落较远的“洼地”。

2、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洼地由于地势低，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或水灾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读者要把它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词汇联系起来，实际情况未免会让你大

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盎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相伴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1）洼地的“盐碱化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并将之从四周高地冲刷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浅层水中的盐分逐渐累积。我们把这种溶解——冲刷——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阳光辐射，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将表层土壤中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浓度已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然而，盐碱化并未就此停止。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所有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堆积到土壤表层，在冰封来临之前，整个洼地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厚度有的竟可达 10cm 以上。

（2）洼地的盐碱化挑战植物的生存极限和种植极限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耕种。通常只有少数几种杂草可以生存于其中，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提起莎草，对人类文明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往往会联想到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要说明的是，“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其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后可作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 1 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作观赏植物的，水栽几株可表现绮丽的“椰岛风光”。而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此等高雅的仪态。在土壤、水源良好的环境中，它可长到 30 厘米高；在恶劣的盐碱化水土中，它的高度一般在 10 厘米左右；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地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因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上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它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被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在华夏子孙抗争盐碱化一次次失败后，上天出于怜悯而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 [4]

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生命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作物，它的野生种（即“狗尾巴草”）在现在的大都市里仍可见到。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谷子依然是北方人民的主粮。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不耐盐碱。因此，洼地是谷子的禁区。它适应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在平原地区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史。

3、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发现了野生高粱，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 10 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经印度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何种植高粱长达三千余年？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1）高粱极耐干旱

中国北方的夏季高温干旱，高粱恰好非常耐旱。而中国南方先民早在此前一万年左右所驯化的水稻就不具耐旱性。为说明高粱的耐旱性，这里引入一个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 332，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 1 克干物质需消耗水分 332 克。谷子的蒸腾系数为 257，玉米为 368，小麦为 525，水稻为 650。 [5] 当然，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此处不深入讨论。

除蒸腾系数外，“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而这种现象在高粱地很少见，这皆因高粱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向内纵向卷曲，尽量减少暴露面积。若干旱进一步加重，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态；一旦遇水则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很多读者在电视上看到过大旱时期玉米叶卷曲的景象，殊不知高粱叶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2）高粱极耐水涝

高粱非常耐水涝， 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孔发育完整，即使被明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在水份饱和度超过 80%的土壤里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是洼地的积水期。 [6] 于是，“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成了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我奶奶讲过一个家族故事。那是在 1942 年，那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也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 20 多岁的她带着一个刚七八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止住，孩子饿得嗷嗷哭叫，而母亲的奶水已干涸。她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即将成熟的高粱，想收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就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使用的大陶盆，可盛水一百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直到晚上，我这位本家奶奶都没回来。第二天，人们先找到她娘家继而又找到洼地，发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从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身上没有枪伤，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孩子在沉“船”后被淹死了。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3）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耐碱度，即 PH 值。玉米适合生长的碱度上限为 PH8.0，高粱为 PH8.5，差别似乎不大。但碱度是以 PH7 为起点的，玉米耐碱度的上限偏碱值是 1.0，高粱的是 1.5，后者是前者的 1.5 倍。 [7]

再说耐盐性，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更大。高粱在含盐量 5.0/1000 的水环境中尚可生长发育。 [8] 5.0/1000 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 30.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 31.3/1000。而玉米在含盐量达到 2.0-2.5/1000 时就会停止生长，超过这个数字就会被“腌”死。 [9]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更不要说“精致选择”，连“粗糙选择”都没有。除了高粱，再找不出其他粮食作物能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在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方面，很晚才传入我国的玉米比起谷子来更适合替代高粱，但洼地的积水、盐碱使玉米“望而却步”。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

苍天，没有回答。

二、斥卤生粱说轮回

1、从洼地开发的周期性轮回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战乱、灾荒的发生，洼地的开垦与耕种处于周期性轮回状态，时废时起。

在天下太平、人口增长的年代，人们开始开发洼地。聚落之间、家族之间互相争夺开垦权，争夺激烈就以械斗解决，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分布极不对称的原因。一个村子的耕地向某个方向延伸几里甚至十几里，而在另一个方向却被其他村子挤占到村边。

在归属划定后，理论上讲，参与争夺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开垦权。但实际上经济能力低下的家庭所能开垦的土地比大户要小得多。有没有牲口，有没有农器具，有没有种子，这些都是制约开垦的重要因素。撅头刨与三头骡子双铧犁，效率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大户还能雇佣人力、畜力来开垦。

即便被开垦出来，洼地也不具有“永业”的意义。洼地的耕作风险极大。如果这年雨季提前，在高粱的幼、壮苗期洼地就开始积水，即便是高粱也会颗粒无收。一些经济薄弱的小户，即使遇上生、老、病、死、婚、嫁等正常变故，也会以极低的价格将洼地转让他人。他们宁愿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边田里。洼地距村子远，看护困难，成熟的庄稼被其他村“盗收”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当天灾人祸时，人们为降低渡荒风险 ，通常会抛荒洼地——与其种出来被别人收去，还不如节约种子聊以度荒。洼地“搁荒”久了就会被他人重新开垦。

土改分地时，我们村是按五亩洼地顶一亩桑田来计算的。即便如此，多数人也不愿意选择洼地。相较而言，经济殷实的大户更喜欢整块的洼地。原因有二：其一，类似于保险业遵循的规律，大户可以通过“大数效应”来规避风险；其二，成片洼地适合大骡子大马连片耕作。因为同样的原因，洼地也很容易被兼并。

永业田里常可见到坟岗、墓碑、柏树，这些象征历史传承的标志物在洼地是看不到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将来很可能不属于自己的水坑里浸泡。洼地里也没有榆树，只有柳树。柳树主干低矮、不堪大材，但极耐水涝、插枝成林、冠枝发达、生长迅速。栽种者在三五年内就能收获“把”、“柄”、“杆”、“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适合洼地积水、所有权不稳定的状况。在此意义上，是否可把洼地称作“柳田”？古文献中未见有此说法，姑且作为笔者的“发明”吧。

每当有大规模战乱、自然灾害发生时，洼地就会完全停止开垦耕作，重新进入荒芜状态。一经进入荒芜期，时间多以百年计。以小岗村为例，1194 年黄河南下夺淮，1855 年北归，在小岗村附近形成大片无人洼地，仅燃灯寺一带就有十万多亩。 [10] 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修建了“燃灯水库”，此地才再度进入开发期。

2、从聚落的“繁殖”说起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跨度内，洼地开发陷入周期性轮回，开发进程非常缓慢，能巩固下来的成果十分有限。这从地名的历史沿革与聚落的“繁殖”中可窥见蛛丝马迹。

“村”是先民较早建立的聚落名称，至今仍是最常见的通用地名。

在汉之前，聚落连同它周围的“桑田”、“洼地”一起被称作“野”。“野”这个名称反映了当时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文中，笔者谈到了洼地的兼并。兼并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便于看护庄稼、节省往返时间，大户会在洼地里或洼地边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长工、养牲口、打晒庄稼、收晾粮食，形成所谓的“庄院”。长工也要娶妻生子，庄主也会有失地的三亲六戚前来投靠——这就形成所谓的“庄户”。如果能在高地附近打出可供饮用的“甜水”，则一个新的“桑榆之地”就会渐渐形成。这类被“繁殖”出来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个通用地名——“庄”。

新聚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这片洼地就被改造成“桑榆之地”了。洼地非常大，若把它比作大海，聚落与“桑榆之地”则像一座座岛屿。新聚落的诞生不过是把一块高地由“无人岛”变成“有人岛”而已， 洼地依然是洼地。只要洼地的“积水”和“盐碱化机理”没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人们就只能面对“海”一样的洼地不断叹息。

“庄” 的形成是民间自发力量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也是民间自发力量开发洼地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一个“庄”的诞生过程十分曲折漫长。一方面，有没有和平环境保证兼并达到规模？洼地里有没有像样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这些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形成之初的一至三百年内，“庄”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其时“庄户”成员大多和“母聚落”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宗法（家族、祠堂、祖坟、社团等）联系。一旦遭遇因水灾以致高地被淹没、战乱期因庄户成员过少难以抵御匪盗、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等情况，“庄”便顷刻瓦解，成员仍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说来，一个“庄”要成为稳定的聚落需历时三至五百年。

除民间自行开发外，国家也会对洼地投入开发力量。在大规模战争、自然灾害、瘟疫过后，国家为了恢复经济、调整人口失衡，会强制性或政策性移民。据考证，在距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即“洪桐移民”）中，数百万山地居民被驱赶到大平原安家落户。然而，区区数百万人，对于广袤的大平原以及大片大片洼地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据《地方志》、《地名志》记载，这些移民大多补充、并入了现成的聚落，和天灾人祸后遗存的原居民共同复垦荒芜的“桑榆之地”。只有少部分族群强大的移民开辟了新的聚落点。正是这种和原居民的混杂、同化才制造了“洪桐移民”被无限夸大的“野史”。可见，大规模移民并不会对洼地开发造成太大影响。

国家有时候会将退伍军人、俘虏、收编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编制开赴洼地垦荒，这就是所谓的“屯田”。和“庄”的产生过程类似，“屯田”也会产生新的聚落，这种新聚落的通用地名就是“屯”。

“庄”和“屯”的产生轨迹记录了北方先民征服洼地的艰辛足迹。一次次开荒种地，一次次荒芜湮没……在无数次重复轮回中只有极少数的“庄”、“屯”延续、存留下来。步履何其缓慢！道路何其曲折！

3、从洼地的根治——“排”、“洗”说起

笔者查阅本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发现在清朝两百七十年历史里竟未产生新的庄和屯；纵有几个新聚落兴起，也和农业开发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庙、宗教的产物。能查明历史的庄和屯大多产生于明朝或之前。是当地已没有荒地、洼地了？不是。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地方国营博爱农场”还跨越县境、跨越丹河到距我村仅两公里的地方开垦了一千多亩的洼地，可见洼地之广。是当地人口密度不够吗？也不是。我县所处焦作地区古称“河内”，是有信史以来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没有开发所必须的和平环境吗？不。清王朝两百多年，其间，“康乾盛世”延续了一百多年。

那么，洼地得不到开发的原因何在？前文已说过，只要洼地的“积水”和“盐碱化机制”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先民们所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周期性的开荒种地”，根本不涉及改变洼地的本质属性。这种最浅层意义上的开发，决定了它的成果必然少而又少，进程慢而又慢，两百七十年停留在原地踏步是必然的结局。

那么，怎样才能把洼地彻底开发出来，使之成为万顷“桑田”、 “永业田”传之后世？方法很简单，历史上也不乏个别成功范例。战国时，魏国一位邺令（一说是西门豹，也有说是史起 [11] ），组织百姓凿沟渠，引漳之水溉邺之地，人民歌曰：“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就是盐碱，这里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谷子。何止谷子，只要引来活水连水稻都可以种植。古人总结的经验是：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

“洗盐碱”就是通过沟渠将洼地里的含盐积水排去，再灌入软水，当软水溶解了土壤里的盐碱后再排去，再灌入软水……通过反复排洗，土壤就会脱去盐碱。“洗盐碱”并不需停止种植、专门排洗，只要保证排水渠道畅通，积水就不会停留在洼地“晒盐”，地表水位也会随之下降数米。这时，只要引水灌溉，软水、雨水下渗会将盐分带入深层，水分下渗的脱盐机制被称之为“压盐”。一般来说，整个脱盐过程需时三年左右。脱盐后，如果排、灌系统遭到破坏，田地会再度盐碱化，我们称之为“返盐”。

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涝”往哪里排？往低处排。

哪里低？大海。

哦——

小河往大河里排，大河往黄河里排，黄河往大海里排。

没有小河不能排，没有大河也不能排，有小河、大河还是不能排。

哦？

黄河河底比平原高，怎么排？

谁来挖小河？谁来挖大河？谁来挖黄河？

先民们屡屡向苍天发问。

苍天，没有回答。

三、万流归海见桑田

1、 概说：惊天巨变

晋代葛洪在《神仙传・王远》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远路遇仙女麻姑，询问麻姑的年龄。麻姑答道，自成仙以来，已三次看到东海变成了桑田。后来，人们就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是神仙，自然没有麻姑的造化。但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一次“洼地变桑田”的巨变。这不是“形容”，不是“比喻”，不是“夸张”，这确实是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对于亲历者来说，整个过程仍历历在目。

1952 年，朝鲜战争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就在这一年的 10 月 31 日，毛泽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每当冬季农闲，大河两岸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在二十多年里，总共使用了 7.7 亿立方米的泥土和 1400 万立方米的石头，黄河被牢牢地夹在原地。在此前它年年决口，岁岁漫堤。7.7 亿立方米，相当于修筑四条万里长城，相当于铺设宽、厚各一米的泥土甬道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一周！ [12]

与此同时，“根治海河”、“修好淮河”两面拉开，使得这两条水系的总排海能力扩大了四倍——从 1949 年的 1.12 万立方米/秒扩大到 1979 年的 4.30 万立方米/秒。 [13]

顿时，苍天失色，大地动容。一洼洼积水相继退去，千里黄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这一过程中，全国总共有 2.8 亿亩低洼易涝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仅此一项就等于再造了

近十个埃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大地何时发生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14]

然后就是筑大坝、筑水库、修河渠、修堤堰，引黄灌溉、引淮灌溉，环环相扣，层层展开。

随着水利设施的兴建，大片大片洼地得到彻底改造。因耐涝、耐盐碱而被种植了三千多年的高粱渐渐远去。我记得最后一次喝高粱糊是在小学三年级，推算起来应该是 1972 年。以后还喝过几次，不过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生产队吃“忆苦饭”时。

低产、难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谷子，而是玉米、水稻。水库碧波荡漾，河渠哗哗奔流，田头水泵轰鸣，因耐干旱、耐贫瘠而曾倍受青睐的谷子也风采不再。小米很香甜，但产量太低，还需要“歇年”，今年种了谷子的地，来年就不能再种谷子，否则谷子与“狗尾巴草”重复杂交会产生“谷莠”，成语“良莠不分”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黄河两岸第一次出现大片大片的水稻田，浓厚的黄河水哺育出优质的“黄河大米”，由“人民胜利渠”浇灌的九十万亩 [15] “原阳大米”更是其中之珍品。黄河母亲毫不吝啬地淌出金色的乳汁。

那个时代总共兴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介绍势必汗牛充栋。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的对比一览梗略：1949 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 2.4 亿亩，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79 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 7.2 亿亩， [16] 仅黄淮海平原的 3 亿亩土地中就有 1.8 亿亩成为水浇地。 [17]

2、 世界农水工程奇迹——“淠史杭灌区” 、

说到农业水利工程，大多数人会想起古代的“都江堰”和当代的“红旗渠”。其实，在 1958—1976 年间，中国有一个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红旗渠”更磅礴，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

“淠史杭灌区”坐落于大别山山麓，构架在山峦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红旗渠”怎么能跟它比呢？“淠史杭”一天的输水量比“红旗渠”一年的还大。

它到底有多大？灌区内包括 5 座大型水库、23 座中型水库、1043 座小型水库、21 万处塘坝；总库容 86 亿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为年 200 亿立方米；大、中型河渠总延长 2.5 万公里，可通航河道总延长 1000 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1026 万亩，1979 年完成灌溉面积 826 多万亩，80%属于高渠自流灌溉。 [18]

以上数字意味着什么？先说它的库容——86 亿立方米，比 1949 年中国所有水库容量总和都大很多倍。三峡的防洪库容也只有 221.5 亿立方米，而三峡的水是不能用于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峡的水通过沟渠网络用于灌溉，工程将扩大数倍。

再看它的面积，1026 万亩。著名的“都江堰”是平原丰水灌区，比“淠史杭灌区”的水源、地形条件优越太多，经过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扩建，到 1950 年其灌溉面积也不过 288 万亩；而经过新中国的扩建，1979 年其灌溉面积达 1100 万亩。另一著名的“河套灌区”，1950 年灌溉面积是 290 万亩，1979 年为 722 万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是新中国赋予了“都江堰”这些古老的工程以新生。 [19]

比较一下世界上其他著名的水利工程，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淠史杭”工程的伟大。

“尼罗河灌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灌区。它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为 3000 万中国亩，这是埃及的全部耕地，这里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该灌区长久以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峰漫灌，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大规模筑渠引阿斯旺高坝水灌溉。

“因皮里尔灌区”是美国著名的人工灌区，也是世界上应用现代技术最多的人工灌区。其引水量为年 35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为 300 万中国亩。它始建于 1901 年，一百多年来经过多次先进技术手段的改造，但由于排水系统缺陷而被盐碱化困扰，目前仍未找到理想的灌溉模式。

3、 一个普通村庄的生态变迁

数字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们从单个“生态元”的变化说起。

我们村土改时人口 600 人左右，拥有“桑田”旱地 400 亩左右，都分布在村子周围，另有洼地 1000 多亩。村子南面紧靠沁河，也有一些滩地，其面积随主河道的变化而变化，很不确定。

沁河是黄河下游的最大支流，沁河大堤自古就有。据老年人讲，以前的堤很单薄，豁口很多，一遇大水就会从村上游不远处漫堤，几乎每三至五年就会漫堤一次。1956 年前后，作为治理黄河的一部分，人们对大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加修。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 1982 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时，发生了一次漫堤。

村北不到一公里处，有一条季节河，平时涓涓细流，汛期奔腾咆哮。由于没有堤防，汛期洪水四溢，漫进村子。为了阻止它和沁河上游漫堤的水害，明、清时期（或者在民国早期），人们在村周筑了一道护村围堰，和沁河大堤形成半月形，村子就坐落于其中。1956 年，合作化运动刚起步，沿河十几个村的群众为这条河修筑了堤防，集体力量第一次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显现。从此，这条河再未发生过水患。

过了这条河就是洼地。洼地很大，跨越两个乡的辖区，周边有近二十个村子。我们村和另外一个村的洼地一起分布在东西宽 1 公里，南北长 1.5 公里的范围内。

解放初，村里有四眼砖井供给饮用水。由于水层很浅，根本不需要辘轳，人们甚至可以趴着直接用桶提水。村外有几眼土井供浇菜园用，靠人力杠杆汲水。五十年代初、中期，合作社用国家免息贷款建造了几眼水车大井，村民习惯称之为“大洋井”，称水车为“洋水车”，要用牛拉水，水也不大，也只能用来浇园子。这几眼大井一直使用到 1970 年前后，后来被机井取代。以上就是我村解放初及五十年代的基本人文、水文和所有水利设施概况。

1958 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推动下，我村开始改造洼地，在东西宽 1 公里，南北长 1.5 公里的矩形地带，开挖了 3 条南北走向、2 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河，群众称之为“小涝河”。“小涝河”是相对于县里组织修筑的排涝干渠“大涝河”而言的。“大涝河”从洼地南端穿过，把“小涝河”排出的水带到下游汇入沁河。“大涝河”每段由所在地的大队组织开挖，大队之间由公社协调，县里只负责规划、测量、划线。大、小工程历时三年，正值三年灾害时期。村史资料记载，我村共开挖土方 12 万立方

米，全村青壮劳力每人平均挖了近千立方米。1961 年排涝河渠完工，从此洼地变成旱地。

据参加过“大涝河”工程的老干部回忆：寒冻腊月里，人们打破冰凌茬，下水挖泥，全线展开竞赛，进度最快的插红旗，稍次的插白旗，最慢的插黑旗。工程刚开始不久，据说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要来视察，省长吴芝圃亲自坐阵指挥，做迎接准备工作。他看到工地人员少，场面不够红火，就要求老人、妇女齐上阵。工地上拉着大红标语“老人赛似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还借来剧团的行头，要求化装，老年人化个大黄脸（黄忠），妇女化个大红脸（穆桂英）。几多诙谐，几多壮烈！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人民公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靠个体农民怎么完成这样的工程？单是河渠占地协调、补偿就很麻烦。

1969 年，为响应“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再次对整个工程进行了改造，在干渠源头筑坝引水，沿途加高河堤，建桥筑闸，变单一的排涝工程为排、引、灌一体工程。工程完成后，洼地由旱地升级为水浇良田。

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高粱必然被玉米取代，而且洼地具备了向水田演进的条件。1972 年，我父亲受命带领七名社员试种水稻。一时间，父亲热情焕发，《水稻育秧法》、《波尔多液的配制与应用》、《稻瘟病的防治》等农技书籍堆满桌面床头。最后改造出 70 亩水田，全村每人每年可分得净米 40 斤。我记得那时的政策还鼓励创新，改造田可以免交三年公粮。为蓄水应急，还开挖了四亩大的水塘，鱼和莲藕混养，往日的洼地变成了江南水乡。

写到这里，我耳畔又响起朗朗书声：

小河流过我门前，
我留小河玩一玩；
小河摇头不答应，
急急忙忙去浇田。
这确实是笔者家乡的真实写照：村前河渠环绕，大地稻谷飘香。

前文中，笔者曾提出，新聚落的出现是人们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本县在清朝的二百七十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和农业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新聚落出现。那么，1949 以后情况又怎样呢？

1958—1976 年，仅我们村边的大洼地里就有四个具有聚落性质的新据点出现。当然，这些据点能否稳定下来还要看历史的演变。

据点一：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分场，现存；
据点二：县苗木林场 /种畜场，现存；
据点三：社办工厂 /公社小农场，现为乡镇企业园区；
据点四：知青队 /新农村示范点，后被政策性撤消，现被一个从无水山区迁移下来的小村子沿用。

以上四个据点的产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有力地佐证了那个时代农业开发规模的波澜壮阔以及开发水准的陡峰壁立。

正是一片片洼地的改造，一个个“生态元”的改变，使中国农业的大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缓缓延续了五千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 1958—1976 年间突然像展开了翅膀，飞跃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至此，中国才能用占世界 8%的土地，养活占世界 22%的人口，才能在二十多年间剧增五亿人口。在这次辉煌壮丽的变革中，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谱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盐碱，“贴上膏药扎上针，开沟排水冲卤灰”[20]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劈山造田，“沟坡变梯田，荒山变粮川”……

埃及有句谚语：“时间战胜一切，金字塔战胜时间。”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不朽的；但总有一些人和事使历史显得渺小，让时间变得短促。毛泽东作为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硕长的手臂穿越漫长的时空和大禹、神农相握，五千年历史仿佛凝为一瞬；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位巨人，他转过身来，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等待有出息的子孙。

补遗 ：

“草桥关民”先生向“白垩纪”网友提出问题：“既然高粱退出是由水利条件改善造成的，为什么现在的水利条件比以前恶化了，农民们还不回头去再种高粱？”

我来回答：先民选择种植高粱主要是因为它耐涝、耐盐碱。现在淮河、海河哗哗朝海里排水，黄河也不决口“跑”水，整个大平原看不到一汪明水，你凭什么要让农民重新选择种高粱？赶明天你把淮河、海河堵了，把黄河大堤扒了，我保你立竿见影，明年就种高粱。

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黄淮海大平原到底有多少以前种水稻的土地，因为缺水现在不得不退回去种玉米？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现在我们应当忧虑的是，黄淮海大平原到底有多少目前种玉米的土地由于干旱面临着退回去种谷子的危险？还未见有这方面的报道。

高粱问题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相关资料：

我国纺织材料小史及棉花传入中国的途径［21］

我国人民普遍穿棉衣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棉花用于纺织，在各种植物原料中发展最晚。我国最早用于纺织的原料是葛、麻、蚕丝和羊毛。葛，即今天南方山区常见的葛藤，长达数十米，其皮坚韧，用沸水煮过，就会变软而分离出白而细的纤维来。用手拈搓，可成细线或粗绳，是古代先民用于结绳编网的主要材料。密编的网披在身上，用以代替原来的兽皮或树叶，成为最早的衣被。在《诗经》中，涉及葛的种植与纺织的词句多达四十余处。《周礼》中有管理葛纺生产的专门职官“掌葛”。《韩非子·五蠹》所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是先秦时的普遍现象。秦汉以后，葛布逐渐被丝、麻织物所取代。

麻是原产于我国的古老作物，与葛一样是最早的纺织原料。宋元以前，麻布是我国平民长期的主要衣着原料，“布衣”遂成为平民的代称。从《战国策·赵策二》的“布衣之

士”，到诸葛亮《出师表》的“臣本布衣”，这些“布”都是指麻布，不是棉布。宋元以后，棉花逐渐取代了麻而成为纺织业的主要原料，但用苎麻细纱织成的轻而薄的夏布则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夏季衣料和蚊帐用料。

棉花原产于印度和南美。其传入我国，大约有三条途径。其一是从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的海南岛及两广地区。《后汉书 ·南蛮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珠崖即今海南岛东北部，广幅布即棉布。可见，秦汉时海南岛已植棉生产棉布了。其二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其三是非洲棉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

棉花传入我国后，未能广泛传入中原。 851 年，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东游记》中，记述在今天北京地区所见到的棉花还是在花园之中作为“花”来观赏的。唐宋的文学作品中，“白叠布”、“木棉裘”都还是珍贵之物。北宋末年的《北征纪实》中还称棉布为“南货”，可见当时棉布主要还是在岭南地区生产的。直到元代时，棉花种植才迅速发展并超过桑麻而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

玉米、甘薯、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22］

玉米、甘薯、马铃薯原产于美洲，明中叶以后传入中国。

玉米在各地俗名很多，有包谷、包芦、棒子、珍珠米等名称；还有叫做六谷，意思是说五谷之外的又一种谷。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先见于明正德《颍州志》 (1511 年)，所以玉米很可能在 1500 年前后就传入中国，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的 1492 年不过 10 年左右。最初，人们只在菜圃里偶尔种一二株，给儿童吃；后来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根据各省通志、府县志和其他文献的记载，从 1511 到 1718 的 200 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 20 省。

明万历二十一年 (1593)，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即现在的菲律宾)经商，看到甘薯，心想将之传入祖国可以代粮食，遂以重价买得几尺薯藤回国(因为吕宋不准薯种出口)，在福州城外试种。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大荒年，就依靠大种甘薯度过了灾荒。但也有人说是先从吕宋传入泉州或漳州，然后向北推广到莆田、福清、长乐的。当时福建人侨居吕宋的很多，可能传入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传入后发展很快，明末福建成为最著名的甘薯产区。甘薯先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之一，以致产生了“红薯半年粮”的谚语。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马铃薯传入欧洲，不久在爱尔兰大获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因此也称为爱尔兰薯。在我国也称洋芋，在山西俗称山药蛋，广东叫做荷兰薯或爪哇薯。福建康熙《松溪县志》 (1700 年)所说马铃薯，是我国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其次是湖北乾隆《房县志》(1788 年)所说的洋芋。此外据西方文献，有人于 1650 年(顺治七年)在台湾看见过马铃薯。

到了 19 世纪中期，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说：“阳芋黔滇有之。……疗饥救荒，贫民之储。……俗呼山药蛋。”可见当时在某些地区栽培已相当多。又黄皖《致富纪实》(1896 年)说：“洋芋出俄罗斯。……三月种，五月熟。取子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粟米岁可两收，此与绿豆皆一岁三收。”

从以上所说来看，马铃薯和甘薯一样，也是最先传入南洋群岛，再由此传入我国。其后还继续由不同途径传入，有由北路从俄国传入的。

参考资料：

[1] “草桥关民”：《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人民网，2006 年 10.15

[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年版。本组数字根据该书中的 [高粱]、[水稻]、[玉米]、[小麦]、[谷子] 等相应条目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3]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95 页。

[4] 豆腐的发明者淮南王刘安（汉）主要活动于淮河流域，火药配方的最早记录者孙思邈（唐）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

[5] 高粱和谷子的蒸腾系数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高粱]、[谷子] 条目，此处取其所给数据的平均数。玉米的蒸腾系数见 “蒸腾系数”，生命经纬网，2005.8.15，2007.1.23< http://www.biox.cn/content/20050828/35676.htm > 。小麦和水稻的蒸腾系数见 “什么是蒸腾和蒸腾系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网，200610.10，2007.1.23< http://www.igsnrr.ac.cn/menu12/xiaobaike1.jsp?id=432 > 。此处取所给数据的平均数。

[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高粱] 、[玉米] 条目

[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高粱] 、[玉米] 条目

[8] 同上，[高粱] 条目。

[9] “作物耐盐能力（crop tolerance to salt ”，2007 年 1 月 23 日， 。

[10] “凤阳县燃灯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坝渗流观测系统设计、制造、采购、安装招标公告”，绿色建材网，2005.9.22，2007.1.23< http://data.6jc.cn/info/59961.html > 。本数据根据其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11]《史记·河渠书》中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吕氏春秋·乐成篇》则说这个工程是魏襄王时邺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后，“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版，[黄河大堤]条目。

[13] 同上，据 [海河防洪] 、[淮河防洪] 条目提供的数据：“海河排海能力达 20000 立方米 / 秒，增 8 倍”，“淮河入江入海能力由 8000 立方米 / 秒扩大至 13000 立方米 / 秒”，“新沭河、新沂河分别扩大为 4000 立方米 / 秒和 6000 立方米 / 秒，扩大 10 倍多”，合计得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征集资料的截止年限大多为 1985-1986 ，个别资料推迟于出版前补充。由于在 1979 年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停止，因此本文涉及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数据年限一律调整为 1979 年。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农田水利]条目。

[15] 同上，[人民胜利渠] 条目。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农田水利]条目。

[17] 同上， [黄淮海平原旱涝碱综合治理] 条目。

[18] 同上， [淠史杭灌区] 条目。其中“总库容 86 亿立方米”为大、中、小水库和塘坝的容积合计，“灌溉引水能力为年 200 亿立方米”根据复式库容 86 亿立方米×2.5 得出。

[1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都江堰] [套灌区] 条目。

[20] “贴上膏药”，指用黏土覆盖沙丘；“扎上针”，指种上柳树、泡桐和植被；“冲卤灰”，指排洗盐碱。

[21] 摘自 袁庭栋 :棉花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的，国学网，2006 年 12 月 12 日，2007 年 1 月 25 日 ＜http://bbs.guoxue.com/viewtopic.php?t=396469&start=0＞。

[22] 摘自 万国鼎：中国古今粮食作物的变化及其影响，国学网，2005 年 11 月 27 日，2007 年 1 月 25 日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012＞ 。

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更新至2011年03月09日）

一、为张宏良左派正名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甚至在之前的4年以来，有很多同志及朋友建议作者将**左派**二字加以引号（“”），以表示此左派并非真正的左派，也不代表左派的全部。而在作者看来，此**左派**二字却坚决不能增加引号。

左派是什么？

很多人会从教科书和百度词条里寻找答案，甚至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座位。然而，观察家们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左派定义“对于当代中国是不适用甚至相反的”。比如当代中国左派民族主义产业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愚蠢小猪’-钟庆就说过：在其它国家民族主义都属于右派甚至极右翼势力，在日本就是团结在靖国神社周围的那个群体；只有在中国算是左派。被左派公认为是“左派学者”的温铁军，因为弄不清楚当前的左右划法，干脆就声称自己“没派”。本文作者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左派认证为“著名左派”，但由于本人一再声明自己与左派阶级对立，并恶毒攻击左派旗手，吓得左派不敢再继续认证了。也有国际学者认为：“在中国，左派的名称是一种误称，‘左’和‘右’的理解与欧洲或美国完全不同”。

可见，用传统教科书的“刻舟求剑大法”是划不清楚中国当代左派的。

是从定义出发去划分左派？还是从左派的现实状态出发去给左派下定义？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郑人买履”。说的就是一些人宁可从具有人为**定义**性质的脚长尺度出发，而不愿从真实的脚出发的故事。对于这些人来说，假如到最后按尺度购买的鞋子穿不进去，那也不是就没办法了——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削足适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搜集现象，然后归纳出这些现象的共性，然后再抽象出本质，提炼出定义，从具体到一般。这也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手段—— “归纳法”。

如果我们也使用这种方法为左派定义，首先要做的是收集现实中的左派现象：

谁是左派？
——人们通常说的左派都包括哪些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左派代表人物”“左派经济学家”“左派学者”“左派旗手”“著名左派”“左派大佬”“左派网站”“左派论坛”等进行百度搜索；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张宏良、左大培、韩德强、孔庆东…乌有之乡、强国论坛、旗帜网、中华论坛…等结果。我们将这些结果通称为“张宏良群体”。

也就是说，虽然在当前中国，人们对“什么是左派？”在定义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对“谁是左派？”却有着广泛、确定的社会认同。

根据语言逻辑学“约定俗成”的原则，黄瓜之所以叫黄瓜，不是因为它黄，而是因为社会的约定俗成。厨长老师喊道：“来一条黄瓜”，你帮厨的小工不能拿一只金黄的老南瓜过来说：“这个黄，这个符合黄瓜的定义”。

同理，假如将来有历史学家要求来一名2010年前后的左派大佬，你不能抛开张宏良群体不屑一顾，去按书本上的左派定义，把符合“激进”标准的刘晓波和符合“代表底层”标准的胡小燕送上来。

因此，本文所说的左派，就是已经被社会广为认知为的、以张宏良为代表的那个宽泛群体；假如说教科书定义的左派和“张宏良群体”的性质不符，那不能说明张宏良不是左派，而只能说明那个定义严重背离了中国现实。假如你认为张宏良不代表你，“张宏良群体”不包括你，那你完全可以认为自己不是左派。你可以是周群自诩的“左的2次方派”——“真左派”（以后也难保不会出现“左的3次方”“左的4次方”…）；可以是苏拉密标榜的“阶论派”（阶级斗争学说派）；也可以是广大民众一致自动采取的、被左派道德家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屁民观’”的“范跑跑-打酱油”一派；更可以是张宏良判决过的“反革命沉船派”；但你必然没有资格是左派，因为左派已经被社会明确认知为“张宏良群体”了，已经“约定俗成”了。只要社会一天不改变这种认知，左派这个概念就属于“张宏良群体”。

这样，在明确了“谁是左派？”之后，我们对“张宏良群体”所包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法西斯）、阴谋论者、灭绝论者，新法家、新儒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乌托邦——也可以译为“忽悠之乡”）、修正主义、社民主义，新民主义派（走资派）、三中全会派（拨乱反正派）、红色世袭派、老造平反派、红歌派、乡建派、新合派（新合作化），…伟大崛起派、伟大复兴派、伟大转折派（左转）、长缨在手派、长空泪雨派、伊甸三曲派、天理良知派、正义回归派、哀号眼泪派、中国普京派、夫复何求派…等林林总总的“泛左翼”进行考察，可归纳出中国当代左派无一不具有的基本共性：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健康力量，反对多党制颜色革命。
2、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内斗。
3、坚持国有垄断资本，反对私有自由资本。

以上左派的“四坚持四反对”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四坚持四反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左派区别于其他派别的本质特征。

很久以来，大多数自认为是左派的网友对于作者苏拉密归纳的以上左派本质特征矢口否认，恼怒这个定义有把左派恶搞成“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嫌疑；不过对这个定义跳脚的大多数左派，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左”，而“左派大佬”们对这个定义早就“舍我其谁”了。

文风严谨的“法统左派”代表人物杨连旭同志，就比较早地敢于公开承认。他的“否定邓小平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同时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才能坚持党国法统”的重要论述，刹住了左派长期以来“挺毛贬邓”的意气用事，为中国当代左派运动开创了“求实维稳”的崭新阶段。

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乌有之乡》隆重置顶了‘愚悻’的文章《我对当前左派内耗的几点看法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1/211634.html》，针对“最近左翼营垒中骤然兴起、愈刮愈猛”的“倒张”风潮，在内部出现分化，旗手踉跄飘摇的关键历史时刻，左派老人愚悻中流砥柱，以70岁人生的炉火纯青，向左派队伍发出了具有“主心骨”意义的“护旗”呼召。

非常有幸，本文作者苏拉密竟然被列为“倒张”之首——“苏三”。

对本文作者，不知老人家是出于“治病救人”的高尚呢还是尚无理论勇气做出更加深入的甄别，竟轻描淡写地诊断为 “（与张宏良）思想方法差异，导致理念分道”。实际上，我和张宏良的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张宏良的分野在于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是阶级立场的对立。

在对本文作者的“定性”问题上，张宏良及粉丝可谓目光如炬；在这点，愚悻老人可算是“老眼昏花了”了。早在2009年夏，以张宏良粉丝组成的“锄奸团”就把本作者审定为“第一工作目标”，位列反毛分子袁腾飞之前。一年后的2010年，张宏良定义了“反革命双奸分子”（“反革命托奸”“反革命汉奸”），是人的都知道那说的就是我。真奇怪愚悻老人家怎么还能把我也归到“内耗左派”之列？

对文中列举的另一“倒张”代表人物——‘马门列夫’，老人家写道：“（在原则上）马门难道与张宏良有不同吗？没有，至少目前看不出区别”“只是提法、观点、策略上有不同，可算是大同中的小异”。这是何等的火眼金睛啊！——和本文作者简直就是“英雄所见”；本文作者也早以阶级斗争学说的高瞻远瞩，洞察出马门列夫的“‘草包族’马克思主义”和张宏良的民族大义是“换了包装的同类产品”。

接下来，愚悻老人以“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马识途，严肃地儆醒那些尚处于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羞羞答答、蹑手蹑脚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左派后生们：

张宏良的最突出点是“保皇”，而我真以为，“保皇”则是张宏良的最清醒点。
今天的“保皇”是什么？就是保共产党的领导！
黄河九十九道弯终归流向东海，万里长城起伏蜿曲而屹立不倒。自然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走的直线，我们怎么不容许一个政党在发展中的波折与迂回？！

再接着，老人家以不折腾不动摇的如磐党性，从“党国一体化”、“党左共生死”的高屋建瓴，深沉地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必须性：

第一，左派从民族大义出发，必须保卫共产党的领导。
要清醒看到，共产党目前做得再差，毕竟是中国核心，没有核心，中国就会分裂。
第二，左派要从自身利益和生命上考虑，必须确保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新自由派，比西方自由派更具血惺，一旦真的登政，必定千百万人头落地。第一个要杀的是张宏良，第二个要杀的就是你苏拉密和其他小左。
…

愚悻老人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山河为之动容，金石为之颤栗。那些还不敢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义无反顾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小左们，你们悔改吧，你们从了吧！——本文作者早在4年前就“从”了，你们怎么还拧着？趁早也从了吧！

在左派得到正名后，左氏家族还将加入许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来光耀门庭：

按以往的看法，孔子、慈禧太后、蒋介石无疑是属于极右的；但依据中国当代左派“四坚持四反对”的本质特征来衡量，他们都绝对属于大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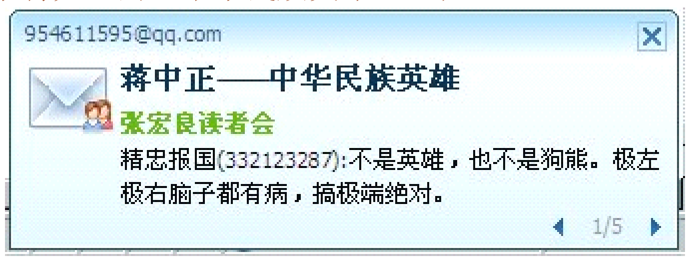
孔子坚持周天子姬姓党的领导，反对诸侯多党制，反对“三分晋”颜色革命，坚持九大铜鼎国有化，抵制割刀自由运动（“割不正”）。孔子在民族大义问题上尤为坚持原

则。孔子认为周武王纠结“三苗-盎格鲁-撒克逊”异族，攻伐同华族的领导核心殷纣王，是楚帝国主义阴谋唆使的“极左”行为；孔子对周武王这种践踏民族大义的行径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孔子还对“反革命沉船派”申侯勾结西方犬戎帝国主义，将民族领袖周幽王迫害致死、逼迫平王东迁的汉奸买办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慈禧坚持大清宗人党的领导，反对君主立宪颜色革命，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以一抵八”抗击帝国主义联合侵略。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坚决打击太平军、捻军、苗民、回民等内斗势力和疆独分裂势力，谱写了民族大义的灿烂篇章。

蒋委员长坚持党国法统的领导，反对“赤色农运”颜色革命。坚决打击朱毛“国中国”分裂势力和李济深、陈铭枢等“权利宣言-反革命沉船派”。蒋介石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宗旨指导下，坚持容共抗战、寸血抗战、决堤抗战、清野抗战、焦土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举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补遗：关于蒋中正先生的左派地位，张宏良粉丝们一直很不爽快。最近在本文作者和愚悖老人的合力撺掇下，张粉们终于“从了”。下图为张宏良粉丝团发出的 QQ 群发信件，已经承认了蒋先生的“中华民族英雄”地位：



张粉们现在才认下蒋先生，已经谈不上是多先进了；在左派大佬们那里，蒋先生早就是大左派了。孔庆东有一段语录，曾被粉丝们制作成招贴画片，大致是这样写的：

他们打倒了毛泽东，
就要打倒邓小平，
还要打倒蒋介石，
最后他们迎来汪精卫。

注释：

“决堤抗战”：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直接淹死和饿死平民多达89万人，诱发饥荒瘟疫造成间接死亡300多万，合计400多万。是“南京大屠杀”的近15倍，而日军只伤亡1000多人。

“清野抗战”：抗战中期，蒋介石在中日双方对峙的中部地区实行“清野清乡，不留一粒粮食资敌”的民族大义政策，造成仅1942一年河南一省就直接饿死300多万人。这场“活体耐饥饿实验”，规模相当于60支“731部队”的工作总量。

“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被电令要求贯彻蒋委员长“焦土抗战”的民族大义政策——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13日凌晨，湖南省政府组织纵火队伍将当时中国最繁荣富庶的长沙古城付之一炬。使长沙与被200多万士兵鲜血淹没的斯大林格勒、蘑菇云下的广岛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废墟指数”最高的三大城市，超过了日后的柏林和另一座蘑菇云城市长崎。

孔老圣人不仅是大左派，同时不愧为中国当代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克己复礼”，为当代左派领袖张宏良同志的“回归天理良知”奠定了千年不朽之理论基石。孔子巨型雕像的竖立，标志了中国已完成左转的“伟大转折”和左派们在政治博弈中已经“长缨在手”！

二、小资党、小资左派、新民主义、走资派的历史同源

概念说明：

当代 “当代”在中国指的是毛泽东逝世后至今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官方文献大量采用“新的历史时期”来表明“当代”。

小资 “小资”为“小资产阶级”的简称。本文不讨论小业主、小财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构成的物质型小资产阶级。本文“小资”是指“职业小资”——在职业上以知识技术、身份地位资格等“超劳动因素”为资本，获得和部分获得分配利益的人。以资本类型可划分为“知识小资”和“身份小资”。以和国家体制的关系可划分为“体制小资”和“体制外小资”。还可以根据小资所处的政治地位以及与“所有权”关系划分为“主人公小资”和“雇佣小资”。比如，在80年代初，小资处于社会领导地位，所有权也属于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有制”，那时的小资属于“主人公小资”；特征是单位和领导对小资没有处置权。后来虽然那个小资的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由于小资产阶级整体失去了社会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企业也经过了改制，“主人公小资”就沦为了被“官僚-资产阶级”雇佣的“雇佣小资”；特征是单位和领导对小资享有人事、劳动处置权。当然，能被“雇佣”也是需要“资本”的，或“知识”或“身份”。 “体制小资”还可进一步划分为“财政小资”和“国有小资”。

人的利益构成是复杂的。比如，一个高级电焊工的利益分配包括**“劳动因素”**——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超劳动因素”**——技术。也就是说，这个电焊工既有劳动阶级的成份，也有“知识小资”的成份。

“知识资本”和“身份资本”是可以重叠的。比如，一名正编教师既是“知识小资”，同时也是“体制小资”；或者他并不具有良好的职业水平，只是靠正编身份混工资，那他就是“身份小资”和“体制小资”的重叠。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劳动阶级的知识化，除了为数不多的高、精、尖职业外，像公务员、教师、甚至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这些普通职业，知识的资本性已经越来越小，起决定作用的是“身份”。或者是先“身份”，后“知识”。比如，一个人之所以能当公务员，并不在于他比农民工的知识、能力强多少，而是因为他的家庭、财富、权力等背景使他获得了公务员职业。他比农民工所具有的职业优势仅仅是“工作经验”、“工作能力”；而这些往往是在先获得身份之后，靠消耗国家资源“锻炼”出来的。给农民工同样的“身份”，自然也可以锻炼出来。因此，这种一般性的工作技能，我们不视为“知识资本”。

在资产阶级法权被彻底消灭之前，以知识构成个人资本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知识小资”往往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力量。而“身份”则属于封建等级性质的，因而“身份小资”往往表现为社会的反动力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小资产阶级由教师、医生、技术员、行政人员…等组成。他们都是社会地位几乎无差别的“国家干部”。

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小资随着利益分化，在观念上也逐步分化出“左”“右”来。“左”“右”的区分最容易表现为对党、国、民族的不同态度，我们简称之为“党认同”（或“体制认同”）而各派的“党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一）恢复新民主义——“资本主义复辟”

“美酒飘香歌声飞”“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流溢出80年代初中国当代小资难以掩饰的自命不凡。在阳光明媚的早春，他们一边擦拭着伤痕的泪花，一边呼叫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劳动阶级夺权，完成了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被赞颂为“第二次解放”的社会变革。——这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指认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自60年代后就一再警告“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80年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资本家群体和权利资本化群体，谁来复辟？，中国从来都没有实行过经典的资本主义，何谈“复辟”？

许多人也许从来就没弄清楚过，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曾经存在过一种啼笑皆非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本文习惯写为“新民主义”）。按定义，“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因此，毛泽东所说的 “资本主义”指的就是**新民主义**。毛泽东一再要打倒的**“走资派”**指的就是在新民主义时期坚持新民主义秩序100年不动摇；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要想方设法恢复新民主义秩序的党内当权派。也就是说，“走资派”本质上就是**“新民主义派”**。

80年代发生的那场社会“革命”，就是在党领导下，以体制小资为主体所进行的**全面恢复新民主义秩序**。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为新民主义派平反昭雪；将《75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为《54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带有群众自治色彩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政府机制；《82宪法》还将“全民所有制”不动声色地诠释为“国有制”；在企业恢复利润效益和厂长工程师负责制；在农村将人民公社恢复为新民主义土改后的小农平均地亩制度。

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三七开’**决议”，“七分成绩”肯定的就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部分，“三分错误”否定的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部分。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新民主义复辟”**。

虽说复辟后经30多年对新民主义的突破，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和经典资本主义已无质的差异；虽说这也是新民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但依然保留了许多新民主义的重要社会形态。如：党的领导、平均地亩制度等。

（二）小资产阶级政党

根据定义，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 然而，客观的历史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上海、武汉等少数城市存有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外，中国并不具有

规模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新民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工人阶级是呆在城市里等农民革命军去解放的。处于新民主义“领导”地位的到底是谁？实际上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骨骼所组成的政党；所谓“无产阶级领导”，说破了就是**党的领导**

那么，这个由“信仰”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政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通常的观点认为：在毛泽东逝世之前，是无产阶级政党。

难道这个结论就真的无可置疑了吗？　不是！

在本文之前，至少有斯大林和“国际”认为中共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农民小资党”。

“农民小资”的提法是违背中国现实的——因为中国和俄国的情况很不相同。自明朝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小农的破产，中国的大部分小农就得不到“自耕”标准了，他们连地主、资本家、官员、教授家丫鬟的地位高都没有，根本就没“资格”小资。然而，中共不是工人党而是“小资党”的说法却是成立的，只不过应当把“农民小资”替换为“知识小资”；因为“知识小资”才是党的骨骼（组织）和灵魂（意识形态）。—— “假小资”农民，被“真小资”以“无产阶级的名义”领导着。

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本身并不是问题；任何规模和复杂的社会活动都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领导。革命既是“大活”又是“细活”，当然需要知识分子。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之间能划等号吗？难道知识分子只要“信仰”了共产主义就必然改变其小资属性？从而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又是一个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与阶级利益——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反而是马克思多次批判的东西。“大同”与“乐园”的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梦想，“共产主义**理想**”既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也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注）。要不是因为阶级斗争血腥，地主资本家或许比工人农民更愿信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即“**阶级斗争学说**”；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谓“**信仰的阶级**”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信仰可以制造出一种基督教文化，但从来没听说过能够制造出一个“佛教阶级”或“伊斯兰教阶级”来，就算是对共同科学的信仰也没有能造就出一个“物理学阶级”。

注：柏拉图认为，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和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妻子、女儿也应视为公共财产。（见《柏拉图：理想国》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信仰”不仅改变不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用它来改变一个人的阶级立场也是不靠谱的。重庆有个甫志高，信仰共产主义，在酒馆中兴诵《共产党宣言》、醉唱《国际歌》，后来在“老虎凳”面前信仰不着调了，牵连了江姐、许云峰等四百多人，史称“挺进报事件”。据说甫志高的原型涂孝文在后来被国民党处死时，同样还高唱《国际歌》，信仰溜达一圈又回来了。有人会说，“这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信仰动摇的问题”。哦，信仰原来是会动摇的；那么如何才能治疗“动摇病”呢？我看“信仰论”者能开出的处方恐怕就只有“洗脑药水”了。还要再问一句，“信仰”和“迷信”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记得有一

个笔名为‘寒梅’的海外左派民族大义妹妹，谈起“信仰”眉飞色舞，据说是她让美国的白领阶层信仰了毛泽东。她是这么理解的：

左派的迷信叫信仰，
农民的信仰叫迷信；
粉领的偷情叫爱情，
工妹的爱情叫偷情。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当“阶级利益”融入一个人的社会实践而成为行为动机时，才能确立阶级立场，成为阶级斗士；在这之前，所谓**“阶级的信仰”**充其量不过是激励话语而已。

然而，超越阶级的社会实践是十分苛刻的。一个穷人很难去实践高尔夫球场的绿茵与阳光；小资的口袋里只要还有几枚铜板，就很难实践到饥饿的滋味。

因此，小资产阶级通往无产阶级的历程是艰辛而遥远的。阿•托尔斯泰用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描述小资向劳动阶级背叛的炼狱过程。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坦诚：一生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他在最后的反思中意识到：脱离了无产阶级实践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应当说明，瞿秋白在这里的反思依然是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内察”，依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

是毛泽东而不是陈独秀、瞿秋白能够从小资背叛到工农立场上来，是他们不同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毛泽东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深入工农的生活和实践，行工农所行，思工农所思。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只有阶级的实践，才有阶级的立场**。这个过程用宗教语言表达，就是“以主性情行事为人，方能与主合二而一” 。这也使我们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于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描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不是理想，而是批判**；不是对未来的理想，而是对现实的批判；不是对乐园的向往，而是对资本的反抗。马克思甚至辛辣地嘲弄忽悠之乡的红歌派们：“‘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女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２页）

邓小平却有许多肯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提法，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６３页）

刘少奇则认为，仅仅“信仰”还是不够的，还要再来点“内察”和“修养”。

以上，我们从“信仰不等于阶级属性”（社会意识不决定社会存在）的原理出发论述了“小资党”的可能性。而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和全部中共党史却证实了“小资党”猜想的真实性这一。——只有把中共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很多历史谜团才可以得到解释。

假如中共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1976年10月的高层“资产阶级政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夜之间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属性？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资产阶级路线”可以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畅行无阻？老左派说是上了邓小平的当，“当”是那么好“上”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和“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的电影台词一样喷饭呢？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打自己的嘴巴子去，都比“上当”这种苍白无力的推诿来得爽。

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个诞生于“五四运动”小资背景，壮大于小资以“民族大义”纷纷加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政党，本质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党”；虽然借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但广泛、深厚的小资基础却要求党只以最高纲领为“团队精神”，而以最低纲领为经营内容。是毛泽东依靠农民和后起的工人阶级，多次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工人农民党，最后没有成功。改造是一种外在的强力，一旦毛泽东去世，强力消失，它就恢复了本来面目。

一个组织的阶级属性由什么决定？首先是它的经济基础，其次是它的组织结构，而政治纲领往往是处于受制约、受支配的地位。比如：从经济基础看，上海周恩来中央的经济基础是国际经费，而苏区朱毛的经济基础是打土豪，这就决定了中央倾向于服从国际，而朱毛则倾向于保护农民武装；从组织结构看，如果某一处组织的结构是“单线联系”，那么上线的指示就是最高纲领，下线是不允许考虑是否和政治纲领相抵触的；从政治纲领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把“反人民”设定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谁都知道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是“三民主义”，但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经济基础和大军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从而被“小资党”抢班夺权。

（补遗：当本文碎片在《华岳论坛》被零散披露时，有左派批评本段“严重混淆了‘经济基础’与‘收入来源’的差别”。实际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对于整个社会形态来说；而“经济基础”对于具体的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谁的饭，给谁干；端谁的碗，归谁管”。在左派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高尚的学术；本不应该和“饭碗”这种庸俗的玩意有半点瓜葛。）

如果我们能够从阶级基础出发而不是从名义出发来定位党的性质，就很容易解释农民战争时期“毛泽东所代表的‘农民武装’和王明-周恩来所代表的‘小资中央’”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容易解释抗战时期毛泽东**“阶级利益”**与王明、彭德怀、项英**“民族大义”**之间的斗争；更使我们理解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多浪费点笔墨把毛泽东和王明、彭德怀、项英在抗战时期的斗争过程和本质讲清楚。

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分前后两次，第一次是井冈山-瑞金时期毛泽东**“农村路线”**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国际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被边缘化，又遵义复出为过程；这段历史史家多有评述。

第二次以 1937 年“洛川会议”和王明回国后“十二月会议”的路线对立开始，直到 1947 年蒋介石扒掉“民族大衣”，搞起“阶级裸斗”，大肆进攻解放区；小资们“和平民主新阶段”“进城搞议会斗争”的梦想彻底破灭结束。整整 10 年，毛泽东也曾一度被边缘化和孤立。这段历史史家解析不足。（请参阅《苏拉密：亮剑，一卷民族主义的梦呓》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7/163405.html）

1935 年 7-8 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中共“联蒋抗日”，放弃打倒蒋介石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口号。王明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理论，得到了国际支持。1937 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通过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宣言，淡化了“洛川会议”路线。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尚没有力量对抗来自国际的“民族大义”路线，毛泽东的“阶级利益”没有得到认同。

彭德怀在回忆中承认他“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没有拥护或反对”是彭德怀一贯的抵赖方式）

毛泽东后来说道：“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据史料记载：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已处于被边缘化状态，“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 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的王明、周恩来，背着毛泽东、张闻天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主动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蒋介石非常高兴，希望王明等“在汉相助”，共商国是。

1938 年 2 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提出了“军事上服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主张。和蒋介石 “一个军队”“统一军令”遥相呼应。

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毛泽东的要求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为了给毛泽东“下台阶”，会议决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但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直到 10 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

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这时的毛泽东虽已稳固了党的领袖地位，但对国际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毛泽东只得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进行迂回抵抗。

毛泽东接着讲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句话隐含了：民族斗争是形式，阶级斗争是内容，“形式服从内容”的哲学命题；和王明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大义”是沁人心脾的。本文作者曾经论述：不是因为小资不需要阶级利益而专好“民族大义”，正是为了本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才专好“民族大义”的。——民族的本质是文化认同，而资本无国界，劳动无祖国，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民族文化的稳定载体；所以“民族大义”就成了他们的专属阶级利益。从中国元朝文人深情怀恋腐朽的大宋王朝，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里的法文教师，他们的“民族大衣”无一不包裹着职业-饭碗-地位的活生生利益要求。（见《苏拉密：网游启示录-屁股时代》）

在小资党内部，王明的“民族大义”具有天然的土壤。是蒋介石一定要搞阶级斗争杀他们，为了活命他们才不得不跟着毛泽东搞起阶级斗争。但无论是来自蒋介石还是王明的“民族大义”口号，都无时不让小资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农民武装，都为小资的本性难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早于王明回国的 1937 年 10 月，彭德怀主导的“华北军委分会”就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的小册子，对“洛川路线”进行修正，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小册子说，如果改善国民党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就可以争取获得“战略上的反攻”，“改变华北战局”。彭德怀和王明回国后的“民族大义”路线可谓心有戚戚。

从一些史料可窥见彭德怀鼓吹王明“民族大义”路线造成的影响。《陈赓日记》1938 年 1 月 3 日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十二月会议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后来承认：“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

“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行不通时，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可参阅：1945 年中共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

“百团大战”就是“民族大义”路线的军事体现。

彭德怀不顾毛泽东多次电示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基本原则，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就调动 40 万大军，发动了一场长达 107 天（加之 29 天预备时间共计 131 天）的大规模损耗战。“为肯骨头咯掉牙”，“歼敌五千、自损一万”。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阵亡（含失踪、被俘）约 6500 人，伤一万多人，共计 17000 人（不含民兵）；日军阵亡（含伤死、失踪、被俘）2700 人-3000 人，伤约 6000 人，共计 9000 人（不含伪军）。

八路军牺牲的这 6500 人，精华是毛泽东从雪山草地的九死一生中带出来的江西子弟兵，是革命的“种子”。

百团大战后，日军抽出“正面战场”的 15 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和疯狂的扫荡。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生存造成了严峻的威胁。大扫荡使华北的老八路伤亡过半。以冀中根据地为例：因力量悬殊过大，主力只好退出，冀中被敌 1600 多个据点分割，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有所谓“一枪能打穿根据地”之说。直至 1944 年才恢复到大扫荡前的水平。给根据地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毁灭性的。如 1943 年 3 月，彭德怀在辽县（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

邓小平在 1943 年评价：“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更早的 1942 年，有着“当代孙子”之称的刘伯承将军评价：刻意强调正规军，放任地方部队，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仓促上阵。“如果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也不是这种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刘伯承：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1942-04-30》

刘伯承这里所说的“政治影响”，指的就是指某人要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正规军的国家尊严来，打出民族大义的气势如虹来。打出民族英雄的千古流芳来。

在 1945 年“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承认：“1940 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和国民党）‘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提法是受了王明路线影响，‘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彭德怀自述》）

“百团大战”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西北怎么会有 100 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该有多少？”

“百团大战”惊醒了蒋介石的“防共”警惕，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祸根。

“皖南事变”也是民族大义的“经典牌局”。

在王明和周恩来长江局（后迁部重庆改为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项英以“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

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不是统战的问题，而是统战不彻底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电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但项英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缺乏准备和安排，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全军覆没。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利益”。

1947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 10 年斗争历史作了简要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三）小资产阶级国度——新民主义

新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三民主义”。

新民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民主义的一路风雨选择。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借来的只是件小资用以“救国救民”的工具和标新立异的外衣，目的和内容仍然还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其实也借鉴了不少社会主义，新民主义的许多纲领和政策都是国民党制订的。比如作为新民主义最强劲动力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纲领是孙中山提出的，“二五减租”“翻本免息”“土地赎买”等都是国民政府颁行的法令，但是国民党自己搞不定，中共却坚决要帮助搞定，不接受帮助，就越俎代庖。——在“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里，“领导”就是取而代之。

“4.12”国共决裂的内在原因竟然是中共坚决地执行了国民政府的土改法令，篡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后来，陈诚和蒋经国同志在台湾也搞定了土地改革的“新民主义”。可见，新民主义原本就不是中共的专利，作为原创人的国民党，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完全有能力使其“产业化”。现在想来，“4.12”大屠杀原来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新民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最符合中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义革命目标和成果之一是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领导力量——小资党取得政权，小资取代旧官僚成为国家干部；之二是农民分得土地从而奠定社会安定局面；之三是建立民族资本主义；从而圆满中国小资产阶级自鸦片战争以来生生不息的民族崛起、国家富强之梦。对于中国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片乐土：外对帝国主义扬眉吐气，上无需仰大资产阶级的鼻息，中有良民炊烟袅袅，下有劳工勤劳朴实；小资们满腹经纶地操持着他们的祖国。

党和新民主义的小资性决定了复辟的必然性。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既可称为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可说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然

而，毛泽东“背信弃义”，利用工农力量和在党的最高纲领上的合法名义，搞起了“三分错误”的社会主义运动，背离了新民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打乱了新民主义的经济秩序和革命成果，文革又真的尝试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试图将革命的胜利者沦入被改造地位。

小资产阶级的怒气集中表现为1976年的“4.5运动”。“4.5运动”可以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寻找阶级领袖的“呼唤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导师风范、从《沁园春.雪》的帝王气象中找到了领袖；毛泽东越来越走向他们的反面，他们就寄希望于周恩来；周恩来逝世他们把目光投向邓小平；邓小平遭到“五人帮”重创，他们从绝望里发出呐喊。——后来有一出以“4.5运动”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核心台词就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几年后的1984年，“35大庆”成了小资的狂欢节，“小平您好！”恰如梦里寻他千百度的灯火阑珊。邓小平后来高度赞扬“‘4.5运动’为‘拨乱反正’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是绝无半点虚情假意的。

只要党在被改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它领导小资产阶级“拨乱反正”恢复新民主义秩序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邓小平也会有李小平。

姚文元根据毛泽东意思撰文《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里的“民主派”显然指的是“新民主派”，因为中共从来不是旧民主革命的主体。文章论证了“新民主派”与“走资派”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这里，毛泽东示意姚文元谨慎地隐去“新”字，是高深莫测的。莫不是因为“新”字代表了党的主体吗？若不隐去“新”字，就意味着毛泽东承认了改造党的失败？意味着毛泽东将选择和党的决裂？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难以解脱的历史桎梏。

要是姚文元不死，也许还会写一篇《从走资派到当代左派》；现在我来写，因为我活着。新老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指责“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从来就不敢承认自己这个阶级就是“复辟”的主体，整个小资产阶级整体都是“走资派”；只是“复辟”后过了一阵子，其中有一部分人感觉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复辟的胜利成果被另一部分人攫夺了，于是就气哼哼地成了左派，急头红脸地到党那告状，让人家把成果“吐”出来还给他。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分赃不公是复辟的必然结局，不是他霸占就是你霸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复辟。

（四）小资产阶级体制

土地小农化（农民分土地）和体制小资化（小资当干部）是新民主义革命的成果也是新民主义社会形态建立的基础。在革命和建国初期，由于新旧体制更迭、百废待兴，也由于教育落后的历史状态，一名高中或初级师范水平的人，只要拥护党，就会被动员“参加革命队伍”进入国家体制。初期的国家体制包括党、政、军机关，还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国家事业，工作人员均属于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新体制不仅吸纳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而且还在“土包子”革命战士中“速成”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旧体制遗留的“清白”人员也被改造利用，可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分了土地的小农在快乐地耕作，得了名分的小资在兴奋地为国效劳——“世界上最大的小资国”——温铁军语，在踌躇满志地前行。

然而，一个社会所能养活的“以知识为资本”“以脑力为工具”的小资不是无限的，政府财政所能承载的工作人员则更少。即便是当今美国这样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眼下也被过量的中产白领阶层拖累虚拟化、空壳化、泡沫化。可想而知，就当时中国的发达程度，若没有大规模的实体经济支撑，仅仅靠“干革命开工资”的“凯恩斯”经济是不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小资全部纳入体制的。也就是说，小资“傍”体制的新民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新民主义的另一条腿“土地小农化”也不会永远都诗情画意。随着人口骤增，人均土地越摊越薄，原本勉强能维持的“自耕自足”将面临“耕而不足”。一些不善经营的、缺少劳力的、好吃懒做的农民一碰到生老病死的关卡就习惯性卖地，新的土地兼并已有了苗头。自然状态的农业又旱涝不保收。小农化在觊觎着工程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大农业。

随着体制的稳定、教育的发展和连续产出，到了 50 年代中期，党已经不敢再像建国初期一样动员高中水平的青年学生“参加革命队伍”了，而是鼓励他们成为“祖国的建设者”、“普通劳动者”。

50 年代中期后，国家开始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体制”随之扩大到经济部门。“国营”（包括地方国营和大集体）正编工人和国家干部没啥差别，都属于“国家职工”。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数目最多的农村人民公社，未被纳入国家体制，社员未能获得以工资制度、供应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票证制度等“俸禄制度”构成的体制身份，仍然停留在“民”的等次。

小资和工人吃上“俸禄”当了“官”，而曾经的革命主力军却为人做嫁衣，依然完粮纳税、听天由命、生老病死。虽说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的延续，也是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体现；但是，这种体制性的等级制度合理吗？应该延续和能够延续吗？毛泽东很愤恨地说这叫“资产阶级法权”。一生追求平等、为农民说话办事、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毛泽东，进行人民公社化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人民公社也纳入国家体制，但这个努力终被 80 年代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化为泡影。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在兴起——“工人阶级”加入了国家体制。也许是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小资党”的问题，想通过“工人体制”来实现对“小资体制”的改变。但现在看来，通过“缔造”方式产生的“工人体制”并不见得比“小资体制”能好到哪里。

工人队伍在建立之初的 1956——1970 年，还是充满生机的。和农村的交流非常便捷，农民加入工人队伍相当容易。“大跃进”、“大三线”，每年都有成千万的青年农民自愿报名加入工人队伍，而在国家建设出现波折或低潮时，工人也可以随时“转业”为农民——就和现在的农民工差不多。当年在豫北一带流传着“高小毕业，西安打铁；啥也不会，鹤壁挖煤”的口头禅，这个“就业指导大纲”反映的就是农村青年加入工人队伍的随时性。

由于城乡差别的历史继承和城市就业的压力，工人队伍的活力在 1970 年以后逐步消失，农民不再能成为工人队伍的后备军。城市知青和工人子弟“下乡插队—招工返城”的

途径成为工农之间非常“表面化”的交流方式；就算这种“表面文章”随着 1979 年的知青大返城也彻底结束。工人队伍对农民表现出强烈的体制“排他性”。——不在乎你的知识体魄有没有农民子弟高，你能当工人就是因为你是干部子弟、工人子弟、城市青年——只要不是农民，似乎谁都可以当工人。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化”到此达到极致。

工人阶级的“体制化”，使工人阶级和小资一样“傍定”国家成为“官人”。当自己的革命先辈和同盟军——农民，在经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而越来越显示出无产阶级属性时，而新生的工人阶级却蜕变为“官”。他们通过享用国家对农村的征收而成为间接的“剥削者”；通过对工业产品的优先享用而成为特权阶层——工贵；“工贵”的本质是小资。

如果说在 70 年代中国有一个阶层最接近无产阶级的话，那绝不是模仿小资体制缔造出的体制工人，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的农民——既不私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中型以上的农机具，也不拥有国家体制的“隐资本”。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占社会人口 80%的农民尚处于基础生产资料（人均耕地）非常匮乏、相对于大自然的解放十分有限、却还在为工业建设艰苦地“挤”出剩余产品的历史阶段；任何其他社会各阶层去谋求自身的“优先解放”，都必然走向反动。工人阶级尤为突出，因为这意味着背叛。

这种体制化的“工人阶级”到底算不算是无产阶级？他们身上流淌的到底还是不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无私”的血液？

1967 年，武汉“百万雄师”用自己的行动和立场如是向历史发问。

有人说，没有私属生产资料，就是无产阶级。但请不要忘了，体制、身份、地位、特权也可以给人带来利益，只要能够带来劳动以外的利益就是资本。要不凭啥你的子弟可以加入工人队伍而农民子弟就不行？我们在以后的“企业改制”中会看到一种叫做“买断”的政策，所谓“买断”就是动用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置换正编职工的**身份**。不是资本凭啥人家和你置换？不是资本凭啥在同一个国企中你就可以比农民工多拿几倍？而且农民工在干苦活、重活、累活、危险活时你们做监工？如果以前你还可以说是知识的差异，那么现在农民子弟和其他体制外青年也都本科、专科化了，凭啥不能和你同等待遇？你是不是还可以说是“技术”的因素？你的技术是不是练出来的？其他人为啥就没资格用国家的材料设备去练技术？更有甚者，从破产倒闭的集体、地方企业流入国有打工的技术工人，干着技术活，拿的还不到体制内“吃干饭”人员的 1/3。

你比别人多吃多占多分配凭的就是身份！身份就是你的资本。别人可以不眼红你，因为公务员比你更“身份”，但你也绝无资格说自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文化知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资本，包括劳动阶级拥有的经验技术也同样具有资本的性质。但一般说来“知识小资”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当年的知识小资敢主动玩“深入基层”，不怕太“深”了撂在那被体制落（là）下（华罗庚就“深”出了“优选法”“统筹法”）。眼下的“知识小资”敢无视体制玩“跳槽”“下海”“打拼”，你“身份小资”敢吗？靠“身份”多吃多占，是社会的寄生虫，是最腐朽的阶级，比产业资产阶级还反动。说是“小资”，实际根本不配一个“资”字，说“封建余孽”倒还差不多。

左派领袖张宏良与“真左派”领袖周群异口同声要求“回归主人公地位”，代表的就是“身份小资”被大资和知识小资挤兑得“资”不起来了的眼泪和哀号。（见《张宏良：栾平的哀号，李涯的眼泪…》。

什么是左派？“身份小资”尚处于体制内但被边缘化了，求告老板“想当初你重用我的时候我可比他们忠心”的叫左派。（张宏良个人当属知识小资，正因为有“知识”，才有资格当身份小资的代言人）

什么叫“真左”？“身份小资”被体制彻底踢出，威胁主子“踢了大爷你们‘玩不转’，大爷迟早要回来收拾你们”的叫“真左”。

左派、“真左”都不过是想要改善和体制的关系，没人打算把体制作废。所以，左派主张“护场子”，“真左”声称要“接盘子”，没哪个要“踢场子”“砸盘子”的。

左派的反动性就在于对体制的依附性与寄生性。进一步说来，这种反动性甚至超出了体制本身；因为他们比体制自身更在乎体制。据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张良要遣散家奴去刺杀秦始皇，家奴们哭天抹地说：“主人可不能丢下我们啊，你走了我们怎么活哇！”。这就是“身份小资”的“更”。体制可以选择自我改变，“身份小资”决不答应体制有变。

若一个老板在一个项目上玩不转了，虽然老子心情很沉重，但为了保存实力东山再起，或换个地方继续当老板，宣布倒闭未尝不是一种方案；公司的“知识小资”可以神色坦然地选择换槽，“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而“身份小资”可就惨了，揪住衣襟，抱住大腿：“主子，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经常在 QQ 群、IS 频道听到左派的类似口气：“千万可不敢颜色，颜色了高官都有绿卡，可以飞美国享福去，丢下我们百姓在国内受苦！”左派们说的“百姓”恐怕是“身份小资”吧？对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农民工、失业学生来说“换盘子”也许还是个机会；特别是失业学生，赌对了筹码说不定还能捞一把。就算啥机会也没有，大不了是换个人来剥削压迫，又能坏到哪里去？只是新老板来了会养一批新的奴才，眼下的“身份小资”要想再“蹭”上“铁饭碗”可就不那么容易啦！

言归正传。在农民之外，体制依然不能接纳所有城市小资。党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戏剧《朝阳沟》反映了这段历史——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才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仍有优先机会被招入体制。未能招入体制的也有优先机会成为乡村教师等职业，但有了一个本质的不同，叫“民办教师”——“体制外小资”产生了，小资也被体制分割。据统计，50 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 4000 万城市知青参加过“上山下乡”。

在文革的“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干部插队落户等运动中，也有很大一批小资被边缘化或从体制排出。

毛泽东提出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同时也是消灭体制差别——“官”与“民”的差别。 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打倒干部”、“下放干部”、“干部能上能下”、“选拔工农干部”、“开门办大学”“社来社去、队来队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何尝不是为了打破体制垄断、砍剥体制的庞大、促

进体制新陈代谢？以将体制的差别降低到最低？有未经查实的数据显示：1968 年，北京市的干部由文革前的 5 万多人减少到 1 万多。

与体制的封闭性、排他性相反，农村则敞开了宽广的胸怀，一方面以“剩余产品”供养体制，一方面以人均耕地被“摊薄”为代价接纳上亿的（知青、下放干部、下放工人）体制冗余；而且还在默默地创造着消灭“二元化”、被体制“认同”的条件。

70 年代中期后，农业工业化、农村社会化、农民工人化已曙光初见。

以北京郊区双桥人民公社为例：在 1975——1981 年，双桥人民公社改制为“双桥农场”，生产大队为“分场”，实行职工工资化，干部国家化。分场和国营农场几无差别，分场厂部设有政工组、农工工会、妇联、工业组、农业组、渔业组、多种经营组、农工学校、医院、俱乐部…等机构。农工可与同地区城镇集体企业对调流动；干部或由国家派遣或由农工“以工代干”。

以河南省沁阳县西向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第八生产小队为例：由于开办玻璃钢工业， 1975 年，八队的集体存款已达 30 多万元。现在看 30 万不过就是一个科级小官僚一次受贿能拿到的数字，但在 1975 年农村建造一所占地 300m2、建筑面积 100m2 的 3 开间院落，造价仅为 500—1000 元。30 万约折合当今的 3000—5000 万。而这个生产队才 20 多户、150 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个家庭都有今天的 200 万。八队当时定的工资为 99 元，相当于 17 级干部（县委书记）、老红军、八级工（上海 102 元、北京 90 元）的水平，发生过“正式工”要求退职回家当农民的事。

在全国更普遍的范围，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机械、化肥等工业成果推动了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新兴的社队企业和原有的城镇集体企业享有同等地位。

体制在拒绝农民，而农民却在追求体制。这种追求也许包含着对体制消极因素的嫉妒与渴慕；但是，一个包括了所有社会成员的体制就是“无体制”，就是对体制的反动，就是打倒体制。这就如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描述的那样，“牙床”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滚一下牙床”却是革命！虽说消灭了这样的差别还会产生那样的差别；但是，消灭现存差别就是革命。

因为中国的农民最吃苦、最贫穷、最低层；只有消灭差别，他们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他们才能够成为消灭差别的最坚决动力；因此他们担负起了本应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使命；从而放射出了无产阶级的夺目光辉。

但是，在中国农民迎来工业化解放与社会化解放的万顷霞光之前，人民公社被社会主导力重又得到强化的小资产阶级解体了。以农民的“小生产”习性为“可接受”的前提，以社会主义运动创造的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的现代化成果为可依赖的基础，“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恢复为“现代小农体制”。一刀斩断了农民与他们以战争赢得的国家体制、以及用他们剩余产品奠基的工业体系的所有联系；任其自生自灭。为日后的“三农”问题埋下了祸根。但是，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体制差别、二元化、“三农”问题、小农破产…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为继承了先辈无产属性的“农民工”——大器晚成的中国真产业工人阶级播下了龙种——正因为被剥夺了所有机会，他们彻底绝望；正因为被“二元”，他们遭受多重的歧视压迫；因此，他们更加嫉恨体制，更加革命。

（五）、党的离弃与小资产阶级的没落

1976 年的“4.5 运动”是小资对领袖的呼唤，同时也是对体制的回归呐喊。拨乱反正以来，平反昭雪的，落实政策的，知青回城的、弥补损失的、抚慰伤痕的、高考升学的、大学毕业的，民办转正的、军人转业的、接班顶替的、特权安排的、统战需要的…甚至已经按“社来社去、队来队往”政策回到农村的工农兵大学生也被重新分配。一拨一拨的小资涌入了体制。出现了“夫妻局、父子科，外甥打水舅舅喝”的喧嚣。邓小平把毛泽东剥离或挡在外面的小资全部拉回体制，团结到自己身边；聚集了阶级斗争的力量，也背上阶级没落的沉疴。

满载着回归体制的欣喜若狂，在 80 年代初期，小资不仅自身不分左右，而且和党也是高度一体化的。党和邓小平“拨乱反正”，把他们从“十年动乱”被工农改造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他们没理由和党玩什么“左派”“右派”的歪门邪道。“解放思想向前看，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党和小资共同的话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的春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了获得领导阶级的名份，竟然还声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不是自贬身份吗？认真说来，体制工人才是小资的一部分呢！“小平您好！”标志了小资对党和领袖的高度阶级认同。那段时期党简直可以更名为“知识党”。

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大跃进、文革），“拨乱反正”曾有过一个左右逢源的大好局面。既可以像“分浮财”一样释放社会主义的物质积累，立竿见影地彰显自己；又可以平反社会主义“冤案”，积累“恩遇资本”。

但是，再多的积累也有挖空的时候，再大的恩遇也不能光感恩不吃饭。当正反积累耗尽，体制的庞大令财政捉襟见肘。就在 1984 年这个小资的盛世，邓小平一边享受着成就感，一边在琢磨着打算“甩包袱”的四个字：**放开、搞活**。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允许破产。为了保住小资体制的运行，先把工人从国家体制中踢除。工人阶级终于也有了要被体制“外化”的一天，我估计有不少农民在幸灾乐祸。在这之前，让回城知青“自谋出路”就让农民们偷着乐了好几年。

农民自有“乐”的道理。一方面因中国战略力量的生成而具有了和美国战略妥协的资格，不再需要“深挖洞广积粮”。免除了“储备粮”任务，农民一夜之间忽然发现可以啃上白馍馍了；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包产到户’就是好！”，为给即将到来的城市经济改革树立样板；连续几年提高农产品价格，并倾斜政策鼓励农民发家致富。农村呈现出一派“希望的田野”。

不及农村的好运，1984 年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就变现得颇为惊心动魄。

财政能力远跟不上体制的膨胀和腐化，就只好靠“赤字财政”和“贷款财政”来维持。除了部分企业靠贷款上交利润、发放工资奖金外，连党、政、军、事业单位都一哄而上为贷款而“办企业”。1988 年，人民币“百元大钞”问世。发钞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在尚处于“短缺经济”的 80 年代“发钞-通胀”的效应尤为激烈。通胀在“计划内价格”无法实现，就扑向“计划外价格”；造成了“内”和“外”几倍至十几倍的落差。这落差又催生了最早的权贵资本家——官倒。中央只好咬牙“价格闯关”——取消价格双轨制，完全市场化。这一闯不要紧闯出了大海啸般的“抢购潮”。“抢购潮”为第二年的“6.4”打下了深刻的社会基础。“抢购潮”和“6.4”一起标志着第一次城市经济改

革的失败。

（资料：1988 年 8 月 19 日，中央决定改革物价：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引发抢购，短时间内全国居民储蓄锐减 300 亿元。相当于 2010 年增加 20 万亿货币冲向日用零售市场）

1986 年以后，小资就觉得不妙。除了少数成员被“年轻化”“知识化”“化”为“权贵”外，更多小资的经济利益并没有随着“知识”和“人才”的桂冠而提高。工资不涨物价飞涨，家庭生活量入为出。眼看着体制内当官的掌权的摆起官派头，公开声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自己大捞好处；体制外的承包人、倒爷、个体户等“新阶层”活得虎虎生风，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有了滋味，失落感和嫉妒心油然而生。虽然党屡屡许诺“要让教师的收入超过公务员”，但“干四化”的豪言壮语还是被“做导弹不如煮茶叶蛋”“操手术刀不如操杀猪刀”的现实取代了——小资最不乐见的劳心者与劳力者利益倒置。80 年代下半期小资的经济地位就已经和社会地位不能保持同步了，小资们的精神优越感与囊中羞涩感交织在一起，“精神贵族”成为小资们的自嘲。

改革的“深化”渐渐地让小资的精神也优越不起来了，感觉由“不如意”变成了“不好受”。其一，“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内部已严重分化，形成了凌驾于该体制之上的“权贵阶层”。在以前，普通干部和领导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并不比领导矮多少，仗着“干部人事制度”的保护，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和领导论资格、攀高低、摽心眼、要手段，即使领导烦透了也无可奈何。现在可不行了，惹火了领导随时都会被退回人事部门，等着的是“不管不问”的“冷板凳”，或支农、扶贫。小资在体制内已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乖”。其二，大款、能人进政协、受特聘，成为党依靠的力量。小资以往对“土财主”嗤之以鼻的风度也矜持不下去了。其三，小资体制的“安全性”也受到了威胁。1987 年以后，官方媒体就开始批判“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的“包分配”制度，并“鼓励”人才流动和干部下海——“人才”们若对待遇不满，领导就会和言善语地“提醒”你：“可以流动或下海嘛”。

体制内分化出的权贵阶层和体制外“新阶层”在崛起，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在衰落。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地位开始没落，小资的理想王国——新民主义道路也熬到尽头。

“6.4”的本质就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在领导地位沦陷前的恐慌和挣扎。——若无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因，普通学潮绝无可能发展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地位危机”造成了小资和党关系破裂，“争民主、反腐败”不过是一篇用来“说事”的童话。

从“4.5”到“35 大庆”再到“6.4”，也就 10 多年的光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历经了一次跌宕起伏的爱恨沧桑。

当年毛泽东曾以“劳动化”来限制体制规模和缩小体制差别。而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对小资体制全面强化。起初，靠积累也着实让小资们“美酒飘香”了一阵子；“一份报纸一包烟，一杯茶水泡一天”成了小资舒适的“官生活”；但正常社会无法供养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急剧膨胀的“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这是小资产阶级没落的根源。没落，是“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寄生性统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他们的领导地位将被新的力量取代，这个力量就是权贵阶层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同一体——“官僚-资本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也决定了他们的依附性。小资要么归顺资产阶级，要么投诚无产阶级，绝无可能长久“自立为王”。人类不可能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种搞笑的社会形态中长期驻留；新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过渡”——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过渡到资本主义。

毛泽东早在 50 年代初就深刻地认识到了打破新民主义秩序的必然性，并主动向社会主义引导。针对当时党内流行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念，毛泽东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因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1 页》）

邓小平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依靠“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深厚的小资产阶级基础，领导党和小资产阶级再次恢复新民主义，但这次是通往资本主义。

一直到 1996 年之前，小资自身都没有分化出像样的左右来。但其间小资的“党认同”发生了变化。在 1986 年以前小资与党是高度一体化的， 1987 以后先是对党怨言满腹，然后又发展为背心背德。这倒不是因为小资变了，小资还是小资，而党却在“与时俱进”。党正在摆脱“小资党”的属性，向“官僚-资产阶级党”蜕演。几年后“三个代表”理论的建立和“资本家可以入党”的组织原则更新，标志着党转性完成。

财政无能、小资愤怒的现象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中期。特别是 1994 年朱镕基实行“分税制”，中央拿去了几乎所有好税种，把大批的小资的饭碗撇给地方财政，而地方还没学会“经营城市”的“土地财政”，中小企业又纷纷倒闭，地方只能靠“罚款财政”、“纵罪罚罪”的“钓鱼财政”、计划生育的“抢劫财政”维持，小资们的工资、经费、医疗费经常被克扣、拖欠得一塌糊涂。自 1979 年“开春”以来，小资碰上了结结实实的“倒春寒”。

比小资还要惨痛，体制工人遭遇的是滚滚“寒流”。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198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国营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1988 年宪法修正案》追认：“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进入 90 年代，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转型为“过剩经济”，开工不足、产品滞销、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困扰着所有企业。企业把车间、分厂一块一块地承包给“能人”“大款”。工人长期待工、工资无法兑现，医疗福利已实际消失。物价上涨、养家糊口都成了奢望。很多工人被迫开辟了很“失身份”的第二职业，比如摩托车载客、摆地摊、卖淫等聊以为生。

不过呢，小资和体制工人在这之前还都获得了一些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利益：子女安排、福利住房，坚持守住了“身份”，即便将来会被体制“踢出”，也赢得了被买断、低保的资格。这些都是农民做梦也追求不到的，虽说农民已进城打工已不再是白日做梦，但却得不到这些“身份”利益。城乡二元化表现出更加本质的“身份鸿沟”而不再是以前表面上反映出的“职业鸿沟”。

三、中国当代阶级分析—兼论左右派的阶级属性与体制根源

（一）左右分化的体制根源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犹如人格分裂；——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对立着。

一方面，党推行“甩包袱”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将带来全面的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只有那些采取了自由主义原则的人，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捕到鱼摸到虾。

另一方面，党又坚持“保党国”的集权主义，集权主义要求党必须在拆毁的“阶级-革命”价值观废墟上构建“党-国-民族”——“三位一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党啊妈妈”“共和国旗帜”“龙的传人”“大汉盛唐”“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拼搏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党的主旋律。

这里就出了问题：你让人家自由竞争去找饭辙，却要求人家吃饱后去膜拜“三位一体”，人格不分裂才怪呢！

为了江山社稷要坚持“三位一体”，为了市场经济又要容纳自由主义，甚至有时还得眉来眼去地挑逗一番。这就如同交际花周旋在几个男人中间，分寸很不好把握。

左派在追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自由主义社会思潮”与“党-国-民族——‘三位一体’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不同，责怪是党刻意主导了自由主义。实际上，党的“健康力量”从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党的“健康力量”从来都是党的主流力量。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81 页）”绝不是王婆卖瓜。只不过官方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汪洋大海中显得单身只影，经常地处于被孤立、嘲弄、围殴的地位；特别是“6.4”后，“吃了亏”的小资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健康力量”不得不采取守势而已。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按目前左派们的左右划分标准，党推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可算是右；而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大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颜色革命，从来都是左。

党采取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集权主义两条路线，邓小平称之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左派经常用“打左灯、向右拐”来责怪党，这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打左灯是党的本意，向右拐是“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必然；一旦上了这条道想不拐都不行。就像抽上了大烟，戒断意愿的“左灯”，抵挡不住满足烟瘾的“右拐”。——小资产阶级庞大的寄生性统治体制要吃饭要穿衣，不仅要比以前吃的饱、比劳动阶级吃的好，而且还要脚不沾泥、头不冒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任何当家人都会想办法踢出一部分人。毛泽东采取的是与工农结合的“劳动化”，邓小平采取的是用市场竞争来“两极分化”。不选“劳动化”，你就必须选“两极分化”。

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的“言行不一”，为日后小资分化为 “左派”“右派”埋下了体制根源。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后来的左派、右派都应当算是邓小平的衣钵传人，虽然左派右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骂邓小平；但是，左派右派两派又都坚持了邓小平的其中一个

方面；右派坚持邓的经济原则——自由主义，左派坚持邓的政治原则——党-国-民族的“三位一体”。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当代小资左右派的总掌门。

邓是“左右总舵”的观点，也体现在邓小平对官僚左右派的成功整合上：在小资尚未分化出左、右派之前，邓小平已可以驾驭陈云、邓力群等左派和赵紫阳、李锐等右派双方全都 “为我所用”。

北京有一位老人，用诙谐智慧的语言道破了这个让很多人都为之迷惑的问题：“左蛋、右蛋都是邓小平生的蛋；新左、老左全是邓左”。

体制内官僚阶层的“高高在上”、体制外新生资产阶级的“意气风发”让“碌碌无为”的小资心怀妒意，曾经“被改造”的历史伤痕还在隐隐作痛；历史与现实驱动着小资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于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成了中国小资追求的目标。这个时期小资的价值观与立场，按目前左派们的左右划分标准，应该算是“整体右派”。现在左派中的很多人，在那个时期也都属于“整体右派”。作者苏拉密在《强国论坛》有一位敬佩的兄长，他的《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05817.shtml》、《1949 年，时间开始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512/3845.html》在左派群体广为流传；他的笔名就叫‘右而左’。‘右而左’反映了中国当代左派脱胎于“整体右派”的心路历程。‘右而左’老兄不仅语言艺术犹如惊涛拍岸令人叹为观止，也是左派中较早对张宏良提出思考的人。

（二）左右派的阶级属性与体制属性

中国当代小资真正分化出左右两大阵营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不过，这种分化开始于邓小平 1992 年“南巡”。

“胆子再大一点”“不问姓资姓社”，1992 年邓小平南巡就是要打破新民主义秩序，向资本主义挺进。邓小平已经认识到了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而邓小平却一直不服气、不甘心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新民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邓小平由此而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党也不再甘心一直“小资”下去。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具备相应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恢复新民主义靠的是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体制的庞大和寄生性使得他们在恢复了社会领导地位之后却无法形成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政治上说都是统治阶级，从经济上说又都属于“无利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如果经济无“利益”那么政治就会无“地位”。“无利益阶级”是一种乌托邦，仅小资内部“出人头地”的倾轧都无法使之延续，更不要说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挑战。

（注：如何在未来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又不重蹈“体制化”、“国家化”的覆辙，是每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马列毛主义者需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没有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基础，任何统治都难免遭遇“6.4”的尴尬：平时就怨言漫天飞，“一根筷子吃肉，一根筷子骂娘”；一遇动荡更是推波助澜、“鼓破乱人捶”。“6.4”着实让邓小平出了一身冷汗。虽说改革已改出了官僚阶层和倒爷、承包人、个体户等“新阶层”，但由于体制的巨大惯性，“新阶层”往往需要看官僚和小资的

脸色、在官僚统治和小资管理的强大国家体制面前，他们只能在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况且他们在道义上也处于下风。虽说“倒爷”充满了海盗般的传奇色彩，令小资心旌摇曳，但“倒爷”一词在社会潜意识中并没有获得“干部”一样的褒义。新阶层仍保持着对体制的戒备和敌视。“官僚阶层”一时成了无阶级基础的“孤家寡人”——失去了旧有的小资产阶级基础，而新的阶级基础尚在形成之中。没有一个阶级肯挺身而出维护其统治，最后需要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搞定。

阶级力量不足的困局迫使邓小平在“6.4”以后的 3 年中采取了低调和蛰伏，“让子弹飞一会儿”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策略。“6.4”把党内右派送上了祭坛，党内左派在陈、江、李领导下对改革的烂摊子进行整顿。这就是第一次“左转”，也是新民主义的回光返照。

任何“炼石补天”的努力都阻挡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分化。90 年代后，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使经济活动包含了大量的“零和”因素——市场就那么大，只要你多生产一点，我就得少生产一点。在竞争原则下，就必然要发生破产、兼并的财富集中。这为官僚垄断资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促成小资产阶级进一步分化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仍保留在小资行列的，性质也由“主人公小资”转化为“雇佣小资”。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农村在“包产到户”之初确实呈现了“希望的田野”，但那是计划经济“计划”出来的。农产品提价，免征“战备粮”都是国家计划的结果。但在市场经济中，农业天然不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特别是在加入了 WTO 的国际市场后，小农已整体破产，小农回归了无产阶级行列。（ “整体破产说”和下一段“农民收入计算”详见《苏拉密：“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第二章-分配的倾斜》。

严格说来，包产到户形成的“小农体制”也是一种“身份资本”——不具有农民“身份”也无法获得“责任田”的承包权，但是，这个资本的获利性极小。本文作者详细计算得出，“小农体制”的土地正常受益为户均（5 口之家）年收入 4000 元、人均年收入 800 元，比城市最低户均年收入 6000 元（2 口人领取低保、无其它收入）还要低。人均年收入 800 元，只占农村人均全收入的 13.5%，城市人均年收入 4.0%（2010 年）。除了这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来源于“小农体制”外，农民的其他收入就彻底来源于完全无体制的“无人身依附、自由出卖劳动”。

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包产到户”形成的“体制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几乎所有收入来源于打工——“无身份工人”。因此，可以看作“纯无产阶级”。

毛泽东曾经想要工人阶级做为党的阶级基础，便推动“小资党”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业化过程中“缔造”了“体制工人”，但“体制工人”本质仍属于小资——本来就是“按照小资的模样造人”。而现在邓小平则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同样也可以“缔造”。但缔造的结果一定会和官僚阶层十分相像——因为缔造者已经是“官僚党”了。

南巡后的“企业改制”就是专业制造资本家的宏大工程，不挥动如此大手笔不足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靠个体户、私营企业那三脚猫功夫，恐怕再过 50 年都不一定发展出像样的资本家阶层来；而且官僚阶层对偷偷摸摸的贪污腐败也失去了耐心，他们需要更加直接的攫取。

破产、零转让、贱卖、股份制、贡献赠股、业绩送股、管理层持股...一夜之间就由官僚阶层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资本家阶层。

改制使中国的资本也发生了新的分布，由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体制职工平均国有制”转化为“官僚垄断国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

伴随着“官僚-资本阶级”的横空出世，是几千万“体制职工”被“砸三铁”踢出体制——下岗；在农村则是更加惨烈的“市场化”导致“体制小农”整体破产。

“体制职工”有的被买断，有的是先行扫地出门，然后给了一些补偿。被踢出的“知识小资”拿了补偿后换个地方继续“体制外雇佣知识小资”去了，被踢出的“身份小资”较少部分沦为“城市贫民”或回归农村，大部分还是在忿恨中保住了“市民阶层”。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市民”在当代中国也具有“身份资本”的性质。当下岗职工转化为“一般市民阶层”后，往往和体制还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体制的“翻脸不认人”耿耿于怀，一方面对“过去的好时光”延留着依恋和幻想。因此，他们往往是“红歌派”的构成部分。

他们和体制仍保留的联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许多下岗职工拥有的“福利住房”、“小产权房”等本身就是原有“体制身份”的延续。2010 年，中国农业产值只占社会总产值的 9.60%，说明城市是经济生活的主体。在城市拥有住房、拥有家庭是取得分配的“超劳动”因素。比如，就业成本低、可便利地介入零星第三产业经营、可顺利地融入市民社会（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6 页》。因此，一个人所处的社交层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等。有人认为生活住房不属于资本，那么我们问：“富士康”的职工宿舍算不算资本？你把城市看做个“大富士康”，再把城市住房看作“大富士康”内的“职工宿舍”就行了。

其次，下岗职工可优先获得“城市低保”、失业救济等，这是破产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当然，按规定再就业后会失去“低保”和救济。事实上呢，申领低保时确实是规定了很多苛刻条件，比如：不准安装电话、要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每月（或每周）报到一次…等，但多数形同虚设。不让安电话可以用手机，社区义务劳动可以让亲属代劳，每月报到可以不走得太远…目前中国领取城市低保为 2500 万人左右，再就业或不充分就业后仍在领取低保的不在少数。这样，他们比民工在同等就业情况下却可以比民工多领取一份“低保金”。——这也是“体制身份”的延续。

再次，下岗职工可以获得再就业“优待”，有的优待条件已转化为“资本”。在下岗的初期，党为了“稳定压倒一切”，至少做了一些“促进再就业”的表面文章。比如，追着给你颁发“个体执照”，有的还开办了“下岗职工市场”；下岗职工可以很优惠获得摊位和执照。后来不仅摊位可以几倍转租出去，“执照”也可以每月几百元转租。有的为“下岗职工”办理了“摩的许可证”，现在三轮摩托载客许可证可以每月 800 元转租给外来民工（相当于营运收入的 1/3）。有夫妻都办了“摩的”的，每月先收租 1600，如果还找不到好的营生就到广场和退休职工一起“红歌”去——这同样属于“体制身份”的延续。

还需要说明，有一部分“城市贫民”严格讲来根本就不属于“市民”。因为他们除了“非农业户口”外，在城市一无所有，不包括在任何“城市居委会体制”内，未进入保障部门的统计、管理范围，无处申领低保、失业救济，看病也没有百分之多少的报销，就业不稳定，也未能融入当地的市民社会。比如：“城市漂流族”。这部分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无疑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大都还在讲究“‘茴’字有四种写法”，或者“梦”还在，因而从“社会学”角度他们尚未加入无产阶级行列。

经过剧烈的分化，留在体制内的小资可分为公务员、教师等“财政小资”，和国企正编职工的“国有小资”。但随着所有制的嬗变，他们都从“主人公小资”降为“雇佣小资”；成为官僚-资本阶级的依附和“分肥”阶层；地位虽然降了，但利益却专一了；他们和官僚-资本阶级构成了“利益同盟”。

在不讨论小业主、小财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物质性小资的情况下，体制内外各种小资和“一般市民阶层”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主体。其中，对体制最敏感的是“身份小资”、体制退休职工等，他们唯恐体制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或者因为年龄已折腾不起，或者没多少可依赖的知识技术去另谋饭碗，体制要是再出了问题，他们可就“形如丧家”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也会被体制利益“边缘化”，有时也充满了妒忌——看见靠近利益中心的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但体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亲爹，但还是亲舅”。至于那些紧密围绕着体制中心的“身份小资”，应该算是“虽没本事但很会孝顺”的亲儿子吧。

据说，在一次讲座后，有人提问了“无产阶级”的问题；据说（还是据说），张宏良恼羞成怒地反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你们谁是无产阶级？

那么，让中国的社会现实，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剖析来回答张宏良的反问吧！

厦门郊区有一个靠出租“格子间”给外来打工者的农民业主，在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后认为可以根据人们的“家居”特点，把中国现社会划分为“流动”和“定居”两大阶级。这种划法咋一看很荒谬，细琢磨却暗合马克思的学说。

“流动”，非常符合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身依附性、自由出卖劳动”的本质。正因为小农破产、正因为下岗后得不到“低保”和像样的再就业“优待”，正因为毕业后不能按照“预期值”加入“体制”或“体面职业”，他们在传统驻地无法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流动”，到他处“讨生活”；但是，在能够“讨”得的地方，他们又买不起房、成不起家、交往不起社会…而又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段（一般是逢年过节，而并非农忙）千里迢迢“流动”回老家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从事 另一种“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娶妻生子、繁衍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正因为他们对资本和“体制”没有一点点诸如“保障局”、“摊位”等期盼和顾虑；他们才能“无牵无挂”地去“流动”！

李玉和说“无产者四海为家”，其实这是剧作者缺乏无产阶级实践的“想当然”，准确的说法是“无产者四海无家”；老“家”盖的房子虽还可以，就是没资格留去住；“家”里倒是娶了老婆，就是没资格一起生活。正应了耶稣的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八：20）。本文作者爷爷一辈上世纪 30 年代就是

“破产农民打工仔”，弟兄四个没有一个人能在上海安家的；父亲这一代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全当上了体制职工，都能在城市安身立命。

“流动”还是“定居”，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经济活动”的同时，还能不能进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区别“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种“生动”划分。这种划法也反映出城市风景的泾渭分明：民工吃饭的小饭馆，连比较贫穷的市民都是不去的；在公交车上，如果不是挤，民工旁是没人择座的；如果附近住了一群民工，市民们就会警惕民工偷东西…“民工”，一个“民”字划下了他们与城市“官人们”的鸿沟。

寻找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不是要到“洛阳周王城广场”的红歌队，也不是要“上”到郑州“黄委会”楼群的“葛丽英沙龙”，而是要乘电梯从葛丽英那“下”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和“插标待售”。那还只是零散出卖劳动的非“产业无产阶级”！那些身处深圳、东莞、佛山的外企私企产业工人，那些国有企业的“无名分”产业工人，那些学生工、临时工，那些富士康、广本，那些目无、小宝、止戈、赵理…等熟悉的 ID 们，他们吃的饭是馊的，每个月只能在网吧上 2 个小时网；那些在工地的噪音和粉尘中淌汗的民工，那些破产农民，那些城市贫民，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他们代表了 8 亿中国人口，但张宏良找不到！张宏良能找到的都是上午唱红歌中午有饭吃，下午开沙龙晚上有饭吃的“左派工人”，当然不会有无产阶级啦！

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构成了当代中国三大阶级。其中，身份小资和体制割舍不断，纵有怨言，也属“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知识小资则游离于体制内外、寻觅更好的买家，不在乎华与夷，不在乎国与资。二者不同的“体制认同”大致划定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左、右分野：左——身份，右——知识。

而无产阶级正在觉醒，他们“被代表”已成为昨日黄粱！

关 于 作 者

马前卒，本名任冲昊，又号马督公（工），现为土木工程设计员。

苏拉密，系笔名，本名孟凡贵，男，生于1962年，河南省沁阳市人；80年代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关于少年中国评论

少年中国评论（**http://review.youngchina.org/** ），一个简单的文摘系统。毛主席说世界是我们的，等待着我们去创造。但是为着创造的目的，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必须先研究社会。鉴于目前教育的巨大失败，事实上研究必须从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开始。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青年人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时间，只要我们努力，我们都能够成为“理论家”。对于初学者而言，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有良师从旁指导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热切期望那些对社会有深入思考的朋友能到这里来留下他们的智慧，以飨后来之人。同时我们会提供大量的优秀文章，以节约大家从一堆文字垃圾中掏取资料的时间。

编者注：

另有苏拉密的《成昆铁路：宏伟深远的战略决策，卓绝壮烈的英雄史诗 》由于图片较多不便录入；

经过咨询，苏拉密的《“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 和马前卒的《被忽视的成本——〈制度性干旱〉外行读后感》以及《谁在统治社会？——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些探讨》因为考据不足，不是非常成熟，故不录入；

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自行到网络上查阅。